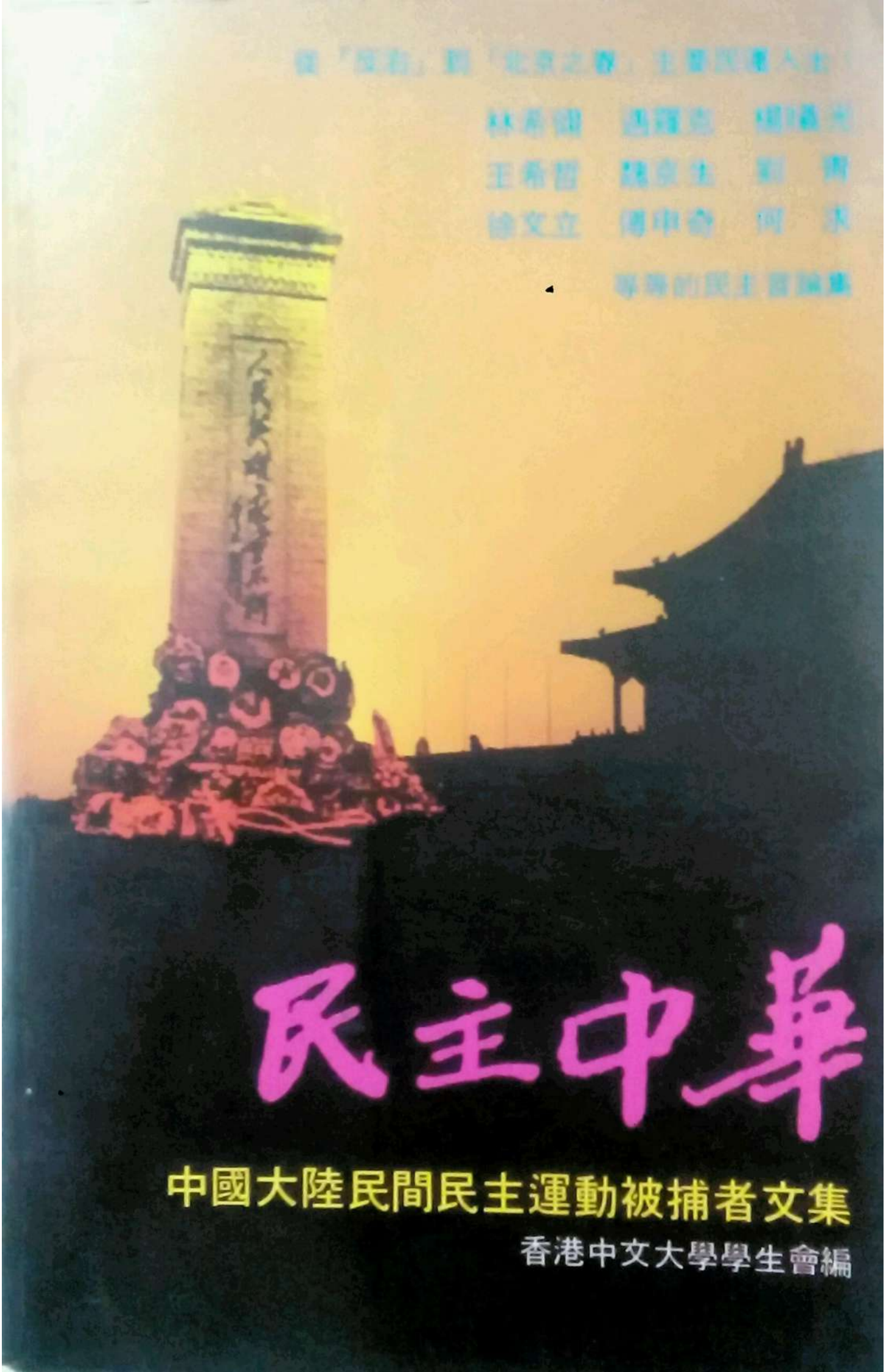


民主中華

中國大陸民間民主運動被捕者文集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編

CAVES BOOKS, LTD.
敦煌書局
103, CHUNG SHAN N. RD., SEC 2, TAIPEI, TAIWAN
TEL: 5371666 銘謝惠顧 THANK YOU

民主中華

中國大陸民間民主運動被捕者文集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編

保存版
香港・一九八六

民主中華　中國大陸民間民主運動被捕者文集

編　　者：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聯合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遠東事務評論社

承　　印：傳眞廣告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譚臣道17-23號504室

版　　次：一九八二年十月初版
　　一九八三年二月再版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版

定　　價：港幣三十八元

三版編者前言

這本《民主中華——中國大陸民間民主運動被捕者文集》於一九八二年出版以來，受到關心國情者的相當重視，以至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印。而在本文集初版迄今的四年多時間裏，中國亦已發生了頗大的多方面變化，特別是在走向「混合經濟化」的經濟改革進行了多年之後，近期再將政治改革提上日程——其重點在某種程度的「理性化」而非「民主化」，而且局限很多；根據當前的中國政治現實，在可見的將來，中共是不會改變其所謂「共產黨領導」的一黨專政的，當前的政治改革推動，也遠不可能觸及到這個層面。

在這種情況下，即在不觸動「共產黨領導」的一黨專政情況下，中國應正式制訂《出版法》，開放討論政治問題的民辦報刊，開放民間政團結社的合法活動。與此相配合，「北京之春」退潮後被拘禁的民運人仕如魏京生、王希哲、徐文立、傅申奇等應予重審釋放或特赦；在「雙百」方針應包括政治爭鳴這一標尺之下，這些民運人仕因政治言論而被判爲所謂「反革命」，實在大不公平，徐文立、王希哲等談論多黨制，也只不過是一種政治主張而已，「以言治罪」是不應在「雙百」方針包括政治爭鳴的前提下發生的，這是中國今後逐步走向民主化的起碼條件。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編者前言

（一）

同胞們，你到過長江，也到過黃河嗎？當在武漢和南京的江心看著那急流起湍的激浪，在濟南濼口堤上望著那黃泥水的急轉彎，或火車經過鄭州大橋時俯視那滔滔濁水，你會否心潮澎湃，感覺著我們民族的不簡單呢？

黃河、長江的吼聲使人心弦顫動，我們民族生命的巨龍仍在掙扎，我們民族新生代的民間英雄正在磨難中成長；驀然地，在耳際出現了不知誰人的聲音：

「有一句話說出就是禍，有一句話能點得著火。別看五千年沒有說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緘默？說不定是突然著了魔，突然青天裏一個霹靂，爆一聲：

咱們的中國！」

火山底已傳來隱約的隆响，民間覺醒的呼聲，人民對民主——自我掌握命運的要求，已經在神州大地重新蘊釀；這是歷史的鐵則，任何民族的創造性生命力，總是永遠源源不絕地來自民間，任何專制時代裏爲「人」的自由而戰的鬥士，也永遠前赴後繼地出自民間。正是在「北京之春」以來中國民間民運遭受全面鎮壓，各大城市的民運活躍人仕紛紛被捕的一九八一年，中國的歷史長河又來到了一道曲流；然而，就像北京民刊《四五論壇》的負責人劉青，於被捕後在獄中傳出的手記所說：

「倘若整個民族都容忍不公允而沒有勇氣對之指責，那麼，這個民族是注定要被淘汰的，是不值得憐憫和不配有更好的命運。中華民族不是這樣的民族，她在任何時候，那怕是最黑暗最專制的時期，也不缺乏捨身直言的兒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我們的中國實在太古老了！但我們亦同樣確信，古老中國有一句古老的話：「鳳凰在火浴中再生」！中國必將獲得新的文化生命。我們願意向一切爲了中國的更生再造、民主富强而鬥爭的同胞致敬，尤其對於已作出了重大犧牲的民間戰士，我們實在滿懷敬意，並只能說：

人類的悲劇之一，正在於黑暗中歌唱黎明的歌者，往往需要戴著鐐銬起舞！

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民間民運裏的主流派，是主張「上下結合」的「維新式」和平結構大改革的；結果，他們爲官方所不容而要鐺鐺入獄（判刑甚至長達十四、五年），這場延續了兩年半（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九八一年五月）的民間民主運動是完結了，很多活躍份子就他們個人的命運來說，也許亦實質上完結了，但可以肯定：民運裏所提出來的「上下結合維新式和平結構大改革」，以至以「人的價值」爲新文化核心的「民主社會主義」或「人道社會主義」總方向，却是今後中國不管以什麼形態具體發展，都離不開的民族出路本質所在。

（二）

這本《中國大陸民間民主運動被捕者文集》，正是爲了紀念二十多年來爲了中國民主化及民間覺醒而鬥爭的民間戰士的，亦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於近世民族解放革命烈潮中建立後，神州大地在新歷史條件下重新蘊釀新民主浪潮的歷程紀錄。

全書共分五大部份，即「鳴放」時期、「文化大革命」時期、「批林批孔」時期、「四五運動」時期、「北京之春」及民刊運動與首次基層「人大」選舉時期；其中最後一部份（即第五部份）又分爲甲、乙二部，甲部是「人權派」，乙部是「社會主義民主派」。共收作者二十三位，文章六十篇（另正文內附四篇，即共六十四篇），作者被捕前的活動地點分別在北京、長沙、廣州、宣威、南京、上海、青島、武漢、韶關等多個大中小城市，其中尤其集中在首都北京。

本書的作者選擇標準，第一是要對民間民主或民間覺醒做過積極的努力活動的，第二是曾經在其積極活動中被官方逮捕的，

第三是其言論觀點與所活動時代的特徵息息相關者。此外，在編輯安排上，要向讀者作出說明的，還有：關於第二部份所選的遇羅克、楊曦光，其文章雖非正面討論民主問題，但却有時代特徵地反映了「文革」期間不同形態的民間覺醒，並對以後的民間民運在思想上有著不少的影響，故本書加以收輯。關於第三部份所選的陳爾晉，他那題爲《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著作，原文超過十萬字，篇幅所限，本書只能收輯其中若干節錄；至於有「南京李一哲」之稱的徐水良，部份收在第三部份（即「批林批孔」時期）的文章，實際上是在「北京之春」期間才公開發表的。關於第四部份所選的韓志雄、王軍濤，他們是聞名全國的「四五」英雄，是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被捕者，但其時他們並沒有文章流傳，故這裏收輯的也是他們在「北京之春」期間發表的文章。關於第五部份的乙部，劉青自獄中傳出的《沮喪的回顧與瞻望——我向社會法庭控告……》（即所謂《獄中手記》）亦因太長（數逾十萬字），本書只能收輯其中部份節錄；王希哲的文章則只收《黨的領導與民主監督》一篇，因爲他的其他文章已有《王希哲論文集》收輯傳世；陳爾晉的《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重印前言》，由於是「北京之春」期間的作品，故另成一篇收在這部份；由傅申奇的兄弟及妹妹合寫的《我們的兄弟傅申奇》一文，是年前由國內輾轉流傳來港的，現在收在本書作爲正文內的附錄，是這篇文章的首次公開發表。

最後，本書除了正文五大部份之外，書末還附錄了海外、香港關注中國民主化人仕的評論民運文章四篇，以供讀者參考。

一九八二年九月

陳景祥　81－82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於無聲處聽驚雷

——香港學界參與中國民主運動的回顧

前言

要我爲這部書寫序，實在感到不好意思，因爲第一：我們這一代人並沒有親身經歷自四九年以後出現的民主運動；作爲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人，很多時只能依靠第二手的消息才知道神州發生的大小事情。面對一浪比一浪高的民主運動，很多香港青年都感到很「疏離」的。第二：我們對中國的民主運動貢獻太少了，不論從物質和精神上，都不能給民運多點支持。但這一切在一九七八年之後似乎有了轉機，自中共三中全會以來興起的民運浪潮，香港學界一開始就積極關注，標誌着香港大專界在中國問題上已由盲從回到理性分析。八〇年中期，香港與國內各地民運人士的接觸已相當廣泛，特別在大專界，不少同學親身赴內地與民運人仕交談，若干學生報相繼出版民運特輯，學生會及國是學會等亦組織不少民運講座，在學界發生了積極的宣傳作用。此外在中大又簽名支持北大學生自發起草的出版法草案。學界支持民運的態度，都本着一貫的立場：愛國家、愛民族，爲促進中國的民主化而盡一分力。逐步民主化是中國的出路，然而民主化在中國的發展卻並非一帆風順的。

黨和羣衆的矛盾

自從偉大的「五四運動」高舉科學、民主的目標之後，中國的進步人仕和進步改革力量無不以爭取這二個目標——特別是爭取民主——而奮鬥。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建黨始，就以爭取民族解放、民族獨立爲目標，但在漫天烽火的戰爭年代，需要的是鐵的紀律；爲了推倒三座大山——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要求紀律和集中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到了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後，情況又怎樣呢？

中共在建立政權後，馬上就進行了恢復國民經濟，一九五二年又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開始對生產資料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這一切改革都由共產黨作核心力量去推動的，它把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成爲全民所有制，個別的資本家被消滅了，但卻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高度集權。自從新中國誕生起，中共就上昇成爲掌權的執政黨，中共的黨員幹部分別担任國家的各級機關領導人員，形成一個從上到下的由各級領導人組成的統治階層，他們在政治上享有特別的權力，從而在經濟上也就享有不同程度的物質特權。這種特權所帶來的社會地位和作用，決定了各級幹部的共同利益，也腐蝕了他們原有的革命鬥志和「爲人民服務」的精神。一部份的黨員甚至開始變質成爲新的特權份子，官僚主義作風開始滋長、擴散。本來，作爲一個執政黨，負起領導國家改革的任務，擁有較大的權力是合理的，特別是要改造一盤散沙、積弱百多年的大國。然而，擁有較大的權力不等於黨可以脫離人民羣衆的監督和不受制於其他社會力量如人民代表大會、法院等。事實卻是：人民羣衆的民主權利並沒有得到保障，人民代表大會和法院反受黨的控制（名義說成是「黨的領導」），造成當權者享有無限的政治權力，卻沒有相對的制衡力量，這二者之間必會造成深刻的矛盾。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歸納的民主形式——㈠自上而下的公職人員，「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及㈡幹部由人民普選並可以由人民撤換，在中共建立政權後並沒有得到實現。歷史往往是很諷刺的，中國人民連三座大山都推倒了，有什麼理由不能當家作主、運用應有的民主權利、管理國家生產、並選舉、監督、罷免國家公職人員呢？中共以「先鋒黨」的姿態在中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果，僅完成了馬克思所期望的改造生產資料所有制，而中共自身的組織架構，卻製造了高高在上的黨官僚和微不足道的老百姓之間的矛盾。

既然產生了黨、羣的差別，而差別的主要原因是權力的高度集中，那麼解決的辦法第一步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國家憲法和法律可以限制幹部的特權，給予人民民主權力；獨立的司法制度可懲辦或撤換任何犯法的公民及幹部，保障人民確實的能行使其權利，最重要的，還是要將國家權力歸還人民手中。然而，中國的高層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卻依靠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及鼓勵人民自下而上的提意見，去揭露對中共政權的不滿。但我們要注意：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並不是最好的制衡方法，因爲它始終不能踰越一定的界線，就是要保持黨的絕對權威，而自下而上的提意見又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人民羣衆只能在官方允許下才能表達意見。

官方號召始、官方鎮壓終

自上而下施予式的民主，往往是由官方號召始，卻遭官方鎮壓而

告終的。緊接中共的八中全會之後，毛澤東表明他的態度：社會主義過渡經過生產資料所有制轉變後，還要通過不斷的階級鬥爭，包括意識形態的鬥爭才會鞏固下來。毛澤東十分重視「意識形態」的作用，他爲了改造中國社會，通過各種運動，企圖塑造一種文化範型——表彰雷鋒精神是其中之一。雷鋒的「螺絲釘精神」、「活着是爲了使別人活得更好」等內容，壓抑了個體的價值，個人爲了共產主義理想可以犧牲一切，甚至一己的生命，亦在所不惜。然而，更重要的觀點：共產主義的目的是爲了徹底解放人本身，卻被忽略了。拋棄個人得失，爲共產主義犧牲，往往伴隨着要求對黨的絕對忠誠，然而當黨自身仍未能革除傳統的封建意識和傳統勢力之時，過份强調對黨的忠誠，就會帶來對權威的盲目崇拜，甚至扼殺了個人的思想發展。加上我國經濟落後，無論生產水平、管理水平還很低，仍未能擺脫小生產習慣勢力的束縛。小生產是封建殘餘賴以生存的條件，小生產勢力不根除，要清除封建殘餘就十分困難，所以在建國後，廣大農村的封建迷信仍很流行，在政治上個人崇拜泛濫，便是最好的証明。

人民的民主意識既然不高，那麼自上而下地推行民主應該是可以容忍的，但關鍵是：官方號召人民批評政府之後，是否同時製訂法律去保障這個提意見的途經，吸納自下而上的羣衆呼聲。事實作出了回答，四九年後第一次官方號召的「民主運動」——「大鳴大放」，持續不到幾個月就遭到無情的打擊和鎮壓。一九五七年二月毛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後，催促人民羣衆，特別是知識份子，放胆揭露社會矛盾，批評黨的各種不良作風。中共受到建國以來最嚴厲的批評，羣衆指出黨正在退化，新的特權官僚正在形成，並且嚴重脫離羣衆。同年六月，黨終於發動了龐大的反擊行動，曾經積極支持過這個運動的人，現在反過來要爲自己辯護了。鳴放換來了「反右」運動，大批曾批評過黨的知識份子被遣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羣衆得到了教訓，也認清了自下而上的表達意見，只能依循黨的吩咐才可以實現。在運動中提出的如自由與民主、個人與黨、革命和官僚等問題，在當時並沒有得到解決，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和七八年的「北京之春」時都再次提出。

年輕一代的覺醒

急風驟雨式的文化大革命震撼了中國，也震撼了每一個中國人民的心。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又再號召羣衆對黨提意見、批評。文革把人民與官僚之間的矛盾又再次暴露無遺，假如說五七年的大鳴大放令人

民羣衆產生了對官僚體制的質疑，那麼文革對整個國家性質的質疑都提出來了。廣泛地運用「四大」這種民主形式去冲擊整個官僚體制，在中國的民主化歷程中無疑是個飛躍，而這個飛躍只有藉「文革」這樣的大動盪才能夠實現。毛澤東在運動之初依賴羣衆對他的那份虔敬崇拜，發動他們向「黨內走資派」進攻，但這次毛估計錯誤了，他煽動了羣衆，卻把握不住羣衆，正如「李一哲大字報」中所說：

「與其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是揭露和摧毀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不如說是爲了鍛鍊人民羣衆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

人民羣衆眞的被動員起來了，四處都鬧着「奪權」，冲擊黨政機關，毛澤東所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給推倒了，他也不再讓人民的革命繼續下去；全面軍事管制，是毛澤東鎮壓羣衆運動的開始。他提出建立「革委會」，將權力又收回到軍隊官僚和政府官僚手中，然而羣衆的革命激情還沒有給完全壓下去，「省無聯」首先樹起了「反復辟」的第一面旗幟。他們要推翻新的官僚統治機構——革委會，並批判了上山下鄉、臨時工制等政策。他們提出《中國往何處去》，這無疑是中國年輕一代第一次提出如此尖銳的問題，自下而上的民主意識可以說已初步在新一代中植根下來了。文革之後官方再號召、發動的各種運動，諸如「批林批孔」、「反潮流」、「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等，都只能換來冷漠的對待。

工人和青年一代經過文革的洗禮後，加上林彪事件引起的震動，他們已不再如文革前對黨和毛澤東那樣崇拜了。人民了解到民主的可貴，加上政治覺悟提高了，人民羣衆開始爭取應有的權利，甚至批評黨的政策，「李一哲大字報」是其中的代表者，它藉著批林批孔而批評當時的所謂「林彪體系」，及向四屆人大提出六項建議。

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人民用鮮血來表達爭取民主的決心，並預告「四人幫」式的官僚幹部的末日即將來臨；人民宣告：「秦始皇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當一九七七年一月周總理逝世一週年紀念期間，有數百人在中南海請願示威，那時的大字報已明確要求爭取「社會主義民主」、「人民羣衆有選舉和罷免官員的權利」及「確保人民羣衆有表達各自的政治觀點的權利」。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人民的意識和行動已越過了黨的規範控制，這正是歷次自上而下號召的民主運動鍛鍊得來的成果。

一九七八年的北京之春

當人民羣衆不滿意「人民當家作主」只是一句口號，而要爭取它

成爲事實之時，一場更大規模的民主浪潮又告出現，它就是有名的「北京之春」。歷史將會歌頌七八年年底的這場大字報運動，因爲這次已不再是官方特許下出現的「民主運動」，民主牆上貼着的大字報提出的問題比以前更尖銳，突破了不少思想框框。更令人高興的，是除了大字報外，各地羣衆在這一次運動中辦起了自己的刊物，這些民刊的內容多姿多采：有評價四九年以後的歷史的、有批判及反映社會現實的，有提出各種改革意見的，甚至有文藝性質很重的。

我們要注意，七八年的這一次民主運動和以往的有幾點不同：

㈠正如上面說過，七八年的「北京之春」除了大字報潮外，全國各地還湧現了不少民間自辦的刊物；

㈡民刊的主要負責人和執筆者是工人，這批工人理論家的理論修養可能不太高，但他們都是「在紅旗下成長」的一代，親身經歷了各次運動，能夠把握到時代的脈搏，特別在反省人的價值方面，有很可喜的論述（例如王希哲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道的專政》）；

㈢新一代醒覺的知識份子出現，特別是恢復高考之後入大學的七七、七八級學生。他們在十年動亂的日子中堅持自學，對國家民族有强烈的使命感，對中國的基層（如農村、工廠）情況瞭如指掌（因爲很多七七、七八級的學生入學前都長期在農村、工廠中工作），對國家的發展有自己的看法。在全國進行的第一次縣級人大代表選舉中，就有不少大學生參選，分別提出了自己的政見。經歷了現實政治生活的鍛鍊，他們將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據筆者所知，七七級畢業的有些已進入了政府機關中工作，隨着中國逐漸起用有專業知識的幹部，這批大學生必將爲中國帶來一番新面貌；

㈣不再空泛提出自由、民主的要求，而是切實地要求「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認眞檢視社會主義制度下民主化的必要性，確認社會主義必須有民主，民主不單是手段，而應該是目的，社會主義要依照大多數人民羣衆的意志去處理國家大政的方針，要完善社會主義的法制，如制定新的出版法，用法律形式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實現對黨的監督；

㈤當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要求高唱入雲之際，官方也同時進行一份廣泛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在經濟上實行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立職工大會等，政治上實行全國的縣級人民代表選舉，並制定一連串的法律如：刑法、刑事訴訟法；

㈥上下結合的觀念初步萌芽。民刊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四五論壇》的徐文立就曾經力主在中國現時的情況下，只有上下結合才能改

革中國。中共中央改革研究室研究員廖蓋隆的《庚申改革》方案，就更具體地從形式上確立上下結合的運作模式（如改革人大、建立獨立的農會、保障新聞記者獨立報導新聞等），而筆者個人爲認爲中國民主化的出路應該循上下結合的模式發展。

春去冬來——七號、九號文件下達

在「北京之春」這場運中，羣衆畢竟還只是寫文章、寫大字報而已，有組織的反抗力量根本完全談不上。及至官方下達「七號文件」和「九號文件」後，全國又掀起了一片收風，各地民刊的負責人紛紛被捕，看來七八年興起的這場民主運動又以官方鎮壓而告終。但事情的發展令這次鎮壓和以往有點不同：

㈠曾參加競選的大學生大部份沒有遭逮捕，雖然他們不能再像鎮壓之前一樣出版刊物，自由發表意見，但這羣經過冲擊的大學生將來必定會爲中國的民主化繼續努力；

㈡在中國大陸以外的支持力量，大部份被動員起來，積極關注，並多次發表聲明和呼籲，支持被捕的民運人仕。在八一年一月，一羣熱心支持民運的朋友開始討論組成一條聯合陣線，並成立「中國民主運動每月通訊」，將國內傳出的民刊資料作初步整理，向本港及海外的中外人士提供中國民運的消息。自「九號文件」下達後，國內的形勢逐漸緊張，香港方面亦同樣作了緊急回應，在五月初成立「中國民主運動關注小組」，召開記者招待會及發表公佈，將各地遭逮捕的民選人仕的消息公佈。六月四日「關注小組」改爲「香港支援中國民主運動協會」，並召開記者招待會發表了一份《致海外緊急呼籲書》。香港學界方面，亦部署了一連串行動。在支援民運方面，香港學界可算是盡了很大努力的。

學界關注民主運動概況介紹

早在七九年下半年，香港學界就不斷出版專輯、舉辦講座、學習班等，介紹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八零年八月初，五屆人大召開，官方把民刊定爲「非法刊物」，把民間組織定爲「非法組織」，此外又決定在人大修憲時取消「四大」；在這情況下，八個大專學生團體（中大學生報、學苑、理工學生報、新亞學生會、港大國是學會、中大國是學會、中大社工隊、港大現代思潮學會）發表《向全國人民代表的呼籲聲明》，反對取消四大，要求釋放被捕民運人仕及澄清劉青事件眞相。八零年底，北大廿二名學生聯合草擬「出版法草案」，要求各地學生簽名，草案傳到香港，中大校內發動了一次簽名，交香港人

大代表轉送北京。八一年四月，中大同學自廣州回港，告知王希哲被捕消息，學界爲証實消息，派出「學界聯合調查團」四人，親赴廣州。五月四日學聯發表了「對我國民主發展的一點意見」；五月二十日，學聯國是委員會及中大、港大、理工學生會聯合發表《爲了祖國的明天——就王希哲、徐文立等人被捕向全球同胞發出之呼籲書》，要求國家落實憲法中賦予人民的權利等，又要求各界人仕聲援，後來收到海外於梨華、陳若曦兩位女仕的來信，表示支持。至此，民運人仕被捕的事件漸趨平靜，學界（其他各界亦如是）似乎已進入沉寂期，對於如何把關注行動繼續發展下去，大家正在苦苦思索。

五・四上京查詢及調查王希哲被判刑

事隔一年，被捕的廿多位民運人仕（據可証實的資料統計）音訊全無，海外及香港的有心人都焦急地等待他們的消息。無論在校內、校外，關注民運的氣氛都冷下來了，加上消息中斷太久，要引起關注，非得有點突破行動不可。故此中大及港大學生會決定在八二年五月四日赴北京，查詢各地被捕民運人仕的消息。事前學生會分別致信全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人大常委及國務院，到北京後亦分別到以上機關詢問各被捕民運人仕下落。學生會對爲此行除了查詢消息外，應該同時向中國當局反映兩大學生會時中國民主化的意見，故此起草了一份《中國民主化意見書初擬》，寄發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及屬下的法學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法律系以及北京政法學院。

回顧整個查詢行動，在輿論界引起不少的關注，香港各報章都作了詳細報導，雜誌亦作了專訪，路透社亦將消息發到了外國，只可惜五月份各院校都正值考試期間，在院校內未能引起較大的回响和討論。

查詢消息方面，具體地每位被捕人仕的情況不能得到確實答覆，主要因爲不明白國內公、檢、法機關的編制，到中央的公、檢、法機關時他們卻說這些案件是由地方處理，令我們處於被動地位。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此行對中國官方施加了一定的壓力，從接見我們的過程中有秘書在場，逐字逐句記錄，發言人的小心謹愼，都可見一斑。還有更積極的作用，就是一年後仍然積極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不是其他團體，卻是强調愛國的香港大專學生，這點會令中國官方對民運有不同的評價。而這次查詢行動亦表明今年兩大學生會是一年後一股仍然關注中國民主運動、有實力而又有條件進行查詢的力量，從意識到行動都成爲先行者，故此行有一定的歷史意義。

六月六日，港大學生會接獲消息，謂王希哲已判刑十四年，兩大

爲証實此消息，派二名代表赴穗求証，廣州法院負責人確實王被控「策劃及組織反革命集團、反革命煽動宣傳，破壞國家法律、法令的實施」，判徒刑十四年。王不服判刑，要求上訴。爲了將此消息帶到海外，兩大學生會及學聯國是委員會起草函件致海外學人，要求他們向中國領導人轉達海外對王希哲被判刑的關注。此外，亦致信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要求公開王案的第二審，准許王希哲本人辯護及批准學界派代表旁聽第二審。到底王希哲本人的命運如何，各地被捕民運人仕的下落又是怎樣，都有待我們繼續關注，及查探消息。

學界關注民運的立場和原則

香港學界在介入七八年這場民主運動時，所把持的立場和原則是怎麼呢？以下嘗試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㈠從關心國家大事、民族發展的立場出發。學界第一份有關文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呼籲聲明」的第一段即爲：「我們作爲香港的中國同胞，從關心國家大事出發，發表如下意見。」這個立場有利於把學界和其他有背景的團體區別開來，在關注民運中走一條獨立自主的路。獨立自主不表示斷絕和外界接獨，學界在交流觀點和資料方面儘可兼容並包，但在行動上就必定要保持獨立路線，以免學界有受別的團體牽制的感覺。在以後致國內的其他文件中，「關心國家大事」都是最基本的立場，直到八二年五月四日上京查詢時，接見我們的政府機關都表明充份支持學界這個立場。

㈡肯定自下而上的民意表達，而最終應邁向上下結合的改革方向，實現眞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人民對國家政策和措施應有發表意見，及參與決策的權利，但當前一下子達到這個目標似乎不大可能，而目前民刊這種形式的自下而上表達意見，應是全盤肯定的。在目前出版權利遭官方壟斷之時，民刊本身負起了獨立於官方控制之外的民間輿論，直接反映人民的心聲。當人民羣衆擁有自己的輿論機器之時，便能對政府造成壓力，監督幹部是否貫徹執行國家政策。在正常的民主社會中，民辦刊物都是受到法律保障的，但檢視現今中國社會的實況，就算是容許民刊生存下去，但仍未足以帶動整個國家進行建設和改革，因爲它畢竟還只是扮演輿論的角色。在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畢竟自上而下地進行改革還是必須的，但這自上而下的改革，還是應該貫串民主化這個目標的。廖蓋隆先生在《庚申改革》提出「黨政分工」、「企業管理的民主化」、「黨中央設三個委員會互相監督、制約」、「推行基層直接的民主」等，都是自上而下地實行改革，但實質的目的仍是：「實現黨和國家的民主化」。只有官方朝着民主化

的方向進行改革，配合吸納民意，讓人民的喉舌監督人民的公僕——各級幹部，這樣才是適合國情，富强祖國的道路。

㈢民運並非拖四個現代化後腿，四化的阻礙之一是官僚主義。官方常指責民運不利於安定團結，而國家建設須要安定團結。我們在承認現代化建設須要安定團結之時，不要忘記另一事實，就是建設「四化」的過程中，往往是官僚主義作風產生各種障礙。渤海二號翻沉事件，寶鋼的盲目投資等，不正是官僚們不聽取廣大的專家和技術人員的意見而造成的惡果嗎？幹部的貪污、走後門、營私舞弊等不正是脫離人民監督，一心爲私的官僚主義作風造成的嗎？民運的其中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收集人民的不滿，滙成輿論，攻擊官僚主義，冲擊現實的黑暗面。它有助於掃除官僚主義，促進四化建設，這又怎可說是拖了四化後腿呢？

㈣肯定要進行整體改革，而非單單搞好經濟建設即可。現代化不單只是經濟方面的富强，還須要各方面的配合和改革，而經濟發展後，又會帶動上層建築領域的改革。現代化需要先進的知識，故此發展教育，獎勵科研，幫助人文科學的發展等都必須同時進行。要人心安定，防止大亂，和平地進行建設，就要健全法制，並貫徹執行，令人人有法可依，凡事依法處理，令人民對國家的眞正安定團結有信心。要實現人民監督國家幹部，防止官僚主義滋長，就要保障羣衆表達意見的民主權利。只有這各個方面的改革配合經濟建設，中國才能富强。

㈤不單要求民主權利，還要同時健全法制，把民主精神落實；其中最受爭論的是出版法。按照現行出版法規定的話，人民幾乎沒有可能自辦任何形式的刊物，因爲按例須二間舖保才可出版刊物，試問現在中國那裏找舖保？北大學生起草的「出版印刷發行法草案」中，就說明了出版自由的出版法應保障各羣衆團體都可經營出版印刷發行業務，取消黨和國家在出版方面的壟斷，羣衆團體在出版方面利用的物資應和國家、黨的出版事業享有平等權利；出版、印刷、發行業的負責人只能由司法機關依法律程序追究責任，任何侵犯出版自由的團體和個人都要由司法機關進究法律責任。爲了落實憲法中人民的言論自由，官方從速修改出版法以配合客觀情況，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事。

此外是關於幹部制度：現時幹部的擢升採等級授職（委任制），造成各級幹部只對上級負責，不須向人民交代。今年國務院精簡機構計劃亦沒有訂明仔細具體的幹部銓敍制度，八二憲法草案亦只規定了最高領導人和司法部門最高負責人的任期。幹部不須受人民監督，便有機會利用個人職權謀取利益，這方面中國領導人應記取教訓。要改

善幹部制度，使他們向人民負責，就要保証有充足途徑讓羣衆可以批評時政，另由人民直接選舉自己的代表，組成地方及全國的人大，落實對各級幹部的監督和任免，此外，建立獨立的紀律檢查制度，對解決官僚主義、健全幹部制度，都很有幫助。

結語：我們可以做甚麼

學界從七八年底開始就一直是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中堅力量，直到今年五月四日上京查詢開始，又再引起香港和海外關注被捕民選人仕的下落及現況。然而民運現時已轉入沉寂，到底學界關注民運應如何繼續下去呢？

首先，爲了令香港和海外關注民運的朋友得到最新的消息，學界應積極負起查詢消息的責任，因爲這是學界以外任何團體都不可能去做的工作，只有查詢得到消息，才能再次引起香港和海外的關注，才能清晰目前要做的工作。

有了消息後，才可以發動輿論，促使官方正視我們的要求。在中國大陸以外，我們必須向香港各界及海外進行更多的宣傳，讓其他人都知道民運是怎麼一回事，特別要向官方表達我們反對思想入罪、希望中國逐步邁向民主化的立場。我個人和我許多熟悉的朋友，都是支持民主運動的，因爲我確認民主化是中國發展的方向，而民主運動是促進民主化的一般可貴力量。七八年的民主運動中湧現的年輕工人和大學生都是醒覺的一代，他們將是中國未來的希望。

我們這一代是中國未來的主人翁，而民主化又是中國的出路，那麼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我們這一代應以促進中國的民主化爲歷史責任，努力不懈，爲中華民族的振興、富强而奮鬥。

陳景祥

一九八二年七月

張家敏 81－82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

中國民主化的道路

（一）前言

在一九七七年天安門事件平反、一九七八年的三中全會後，中國帶來了一片改革的呼聲，與此同時，民間人士亦響應官方的改革，相應地在民間開展了一個以刊物、大字報、大討論爲主的民主運動，這運動在中國每一省份，都有很多人士響應，人民批評着官僚主義、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制度，並積極建議了很多改革國家的方法，中國呈現着一片自由活潑的氣氛。然而，大鎮壓開始了，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官方把全國積極的民運份子拘捕，更阻撓着民間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在這個冷却的時刻，我們實有必要重溫一下專制獨裁的禍害、民主運動的意義、中國實行民主的困難及民主化的出路諸問題。

（二）專制獨裁的禍害

中共建國後，面臨着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經歷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君主和官僚的統治，舊中國的殘餘在我國的民族中仍留下深刻的痕跡，由於中國還未經歷過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所以廣大的人民仍受着封建殘餘的嚴重影響，缺乏個體生活的活潑發展，使我國的民主制度無從建立。

一、民主化的不足，使國家帶來了極大的動盪，在沒有民主的制度下，不同的意見及利益冲突，只有靠黨內不同的派系以鬥爭的方式來解決，政策是否執行，全仗個人的實力和威望，這種在高度集中政權下進行的權力鬥爭，往往使國家帶來極大之災難，例如一九五八年彭德懷的下台、三年的經濟大危機、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四人幫的掌權及延綿不絕的權力鬥爭。

二、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更容易使人絕對腐化。中共由於功能上的需要而逐漸脫離人民的監督，在此情況下，共產黨逐漸變爲一特權階級，由於得到國家的特別照顧和種種的特權，以致很多黨員

都可以窮奢極侈，浪費國家資財，他們甚至勾結黨羽、成立山頭、打擊異己及對人民作出種種剝削。由於官僚主義的存在，使人民在政治上受壓迫，經濟搞不上去和埋沒專才，使人民的積極無從發展。

三、縱然獨裁的政府也有改革國家的良好願望，但是人存政擧、人亡政息始終是施與式自上而下改革之最大弊端，當改革者們一旦下台或者繼承者缺乏魄力與改革熱誠的時候，整個改革便會壽終正寢。此外，僅倚靠獨裁政府由上而下的改革力量是難以抗拒舊體制下整個官僚架構的反抗，由於改革者始終是整個架構的一份子，其生活及繼續運作是極有賴於整個系統的支持，這樣又局限了他們作整體結構上的改變，因爲太徹底的改革會侵犯整個官僚制度的利益，而改革者亦會失去支持而被打倒。在此限制下，改革始終是極其的有限。再加上政策的具體執行需要由大量下層幹部負責，只要他們對中央改革的幹部是爲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在建制內，互通一氣，結成幫派體系，阻撓任何改革的要求，繼續在自己勢力範圍內享受着特權。

四、獨裁政府的政策制定往往忽視人民由下而上的意見而逐漸脫離實際。中國地方大，人口多，國情複雜，單靠統治階層的小部份人根本無可能瞭解民間的實況及人民的需要，加上在現存的架構下，不少政策被歪曲變樣。此外，由於政策的制定是由上層決定，個人的積極性及潛能由於權力的過份集中而受限制，人民只成了政府的一只螺絲釘，社會遂缺乏了發展的動力，而獨裁政府所帶來的一元化的價值觀，壓抑着人民多元化的慾望，人民生活更顯得單調。

（三）由下而上民主運動的功能及意義

自從七七年天安門事件平反，七八年召開的三中全會，中國呈現一片改革的現象，與此同時，民間的民運份子紛紛根據憲法中人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出版刊物，並運用四大自由等權利揭露批評社會種種弊病，更進行理論的研究及向官方提出積極之建議。

經歷了十年文革的衝擊，人民對社會弊端開始醒覺，他們思索爲什麼文革會造成這麼大的災難，這就不能不考慮到現存的政治制度及經濟體制上去，他們開始批評社會上的官僚主義與其帶來之等級授權、剝削羣衆及破壞四化等，進而指出官僚主義的根源不能全歸咎四人幫，而是封建意識殘餘、人民缺乏民主意識、法制不健全和共產黨一元化全面領導等。深入的分析更探討了中國社會之本質，及提出各種評論。除理論分析外，民運人士更針對現實社會的一些問題如貪污、强姦、殺人、欺騙等等，以認眞的科學態度，探求這些問題的社會

基礎。由於民主運動人士多是經歷文革洗禮而又關心國事的年青一輩，他們懷着熱誠，希望爲建設一强大富强的國家而努力。

回顧歷史，民運興起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的。中國卅年來的發展，經歷了好幾次路綫鬥爭，然而每一次的鬥爭都局限在高層領導之中，人民只得依循黨的吩咐，支持某一派的路綫，根本沒有自決的權利。人民羣衆長年累月的處於被動地位，並不能窒息了他們的思考，相反逼使他們逐漸培養起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決心，四·五天安門事件便是人民醒覺起來的表現。

此外，法制的不健全，造成大量的寃假錯案，無數善良的羣衆遭到無理逼害，有些甚至家破人亡。四人幫倒台之後平反了大量寃假錯案，羣衆從血的教訓中，再不能保持緘默，他們强烈要求建立健全的法制，要求尊重法制，依法辦事，有法必依。

黨的一元化領導，牢牢地掌握了國家的政權、經濟命脈及制訂各種政策的權力，但在中國卻同時缺乏一股强而有力的監督力量，因此黨員幹部中不少貪污、腐敗，以至踐踏人民的正當權利，令羣衆意識到只有透過輿論等方法，才能實踐人民對黨的監督。民運人士與自發的學運、工運或民間選舉未必有聯繫，但從這些波瀾壯闊的羣衆要求可看出，民運的基礎是十分雄厚的，民刊人士的特點是結合起社會的需要，在討論民主權利的當時，亦積極地替羣衆表達意願，反映報導各地羣衆的要求。

在我們由於自上而下的改革有一定之局限，故中國政府接受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變法才是切實可行的道路。我們認爲由下而上的民主運動有如下之歷史意義：

一、安穩的政治運作　人民當家作主，國家是人民所組成的，所以他們有發表意見及參與決策的權利。民主制度的確立，不同的意見觀點可通過多方面的渠道，以和平競爭的方法協商解決而不須再倚靠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這樣我國便可以保證野心家無法壟斷政權。若有充份的監督，就不會再出現像渤海二號、寶鋼等浪費行動，使我國付出極大的代價。在更積極方面來說，民主制度的確立可保障改革的貫徹執行而打破傳統獨裁政治的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局限。

二、健全社會的理想　今天我國人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之奮鬥目標，是要把我國建成一個經濟上高度發達，政治上高度民主的强國。我們不能設想，廣大人民只要求物質上過富裕的生活，而在政治上甘於沒有自由民主。我以爲民主是一個社會朝往的目標，它能創造一活潑氣氛，使人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樣便可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

性，充份的發揮他們之聰明才智，人的價值方能眞正體驗。

三、民主實際的功能　客觀上，自下而上的民運對國家運行也有很大的好處，它幫助了健全縱（上層及下層）、橫（各平衡單位之間）的溝通；由於政府組織龐大，上情下達、下情上達或單位部門間之溝通出現了很大的困難，但如果有民間組織存在，人民有機會走在一起，對一些問題交換意見，更可提供一些消息，彌補官方提出之改革方案中不足的地方，民運的發揚，是制訂和執行正確的經濟建設路綫、方針、政策的重要保證。建設國家是異常複雜的事情，各個政策都必須建立在科學學的基礎上和對實際情況的充份理解上，因此必要密切聯繫羣衆，傾聽羣衆的意見，才能保證政策的正確，如果脫離羣衆，不了解實際情況，就會犯主觀主義、瞎指揮的錯誤，造成經濟上之失敗。

除了爭鳴國事、出謀獻策外，人民擁有自己的團體、擁有自己的刊物更能對政府造成一定之壓力，更能監察督促地方幹部徹底執行上級的決定，起到民間壓力團體的作用，這對鞏固我國民主法制、打擊官僚、實現四化有極大的意義。

（四）獨裁主義得以在我國實行的社會基礎

一、傳統中國文化與社會結構的限制——獨裁主義在中國實行了數千年，雖然中間經歷過無數次的改朝換代，然而始終沒有改變獨裁政府的形態。政治制度的確立或改變是牽制於整個社會的發展，基於此，我認爲甚有需要就傳統社會分析一下獨裁制度牢不可破的原因。

中國自周末商鞅變法於秦後，逐漸將傳統的封建領主分封制改爲可容許土地自由買賣的地主經濟，這一改變使中國的一盤散沙的小農經濟得以大量存在，並爲獨裁主義帶來經濟上的基礎。

此外，秦始皇於統一六國後，總結了周代亡國的經驗，了解到若繼續奉行封建制（把土地分封與其子），則過數百年後必由於血緣之漸漸淡薄而重新產生分裂之情況，故爲免此情況發生他遂將王權擴大，把權力直接集中於皇帝手中，而將國家分爲郡縣，派遣中央大員管轄地方（官員不同貴族之處是由於他們不是那土地的絕對控制者，而隨時可被皇帝撤換），此外由於經濟已非原來的封建貴族授地制，而是土地私有自由買賣制度，故要將這渙散的小農經濟組織起來，國家政權的權力需加以擴大。所以中國從秦始皇時代開始，就形成一個以自然小農經濟爲基礎的封建專制主義，這個政權以官僚政治爲主體，以常備軍爲封建王朝的支柱，以家庭作爲組織社會基層之結構，由於

傳統中國生產技術落後，大部份人民受土地束縛，眼光短淺，知識也貧乏，反映在思想上就是把事物簡單化、極端化，對已有的習俗與規範，懷有絕對而僵固的看法。加以中國傳統以孝道維繫家庭的觀念，而這種思想反映在政治制度上，便造成了中國人民對權威的無限崇拜，然而面對於不同於自己的信仰、意見及價值觀卻不能容忍。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之後，雖然做了很多翻天覆地之改革，然而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在我國最頑強的傳統勢力，並不是未經完整發展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是有兩千多年悠久歷史的封建意識及傳統思想，而這對我國民主的發展帶來一定的阻力。

本人同意馬克思的分析，任何社會若缺乏一個經濟上的重大突破，一個直正徹底的社會及政治革命根本不會出現，而社會亦只會停留在既定的形態。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竪立其上幷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死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爲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然而中國社會在數千年來並無經歷過在經濟上重大的突破，每一個新王朝所面對的，仍是一個一盤散沙，以小農爲基礎的經濟組織，所以爲動員起這個渙散的社會及作出更有效的管理，獨裁君主們便繼續着傳統的政治運作模式。

在這裏，我希望以孫中山爲例，看他怎樣面對中國的社會結構。孫中山是一個長久居住外國，對西方文化了解甚深及傾慕之人，終他的一生相信民主能救中國。一九一二年由孫發動的反袁二次革命失敗後，他了解到要發動整個中國社會，非要倚靠一强大之政權不可，爲

了克服國民黨一向的渙散組織，他把國民黨改名爲中華革命黨，一切黨員入黨都要打下手指模並宣誓必絕對服從領袖的帶導，此後，在一九二四年的國民黨大會中，孫先生更指出「中國革命一定要以俄爲師，否則斷無成功之理。」他又派蔣介石留俄學習蘇聯紅軍的制度，更大量聘請俄國專家，以蘇俄模式爲參考，改組國民黨。在三民主義一書中孫更指出由於中國是一個小農經濟的社會，自由不是太少而是自由太多。我不斷引孫的例子是希望指出像孫這樣一個接受西方文化如此深的知識份子及被中共稱爲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人，在特定的環境下，他仍逃不出歷史的限制，在分散的社會中調動人民也鼓吹一集中之政權。

二、建國以來民主法制的不健全，官僚主義的出現，加上中國人民長期缺乏民主生活的鍛煉，使民主的土壤不能滋生——自從一九四九年革命後，共產黨便成爲執政黨。由於建國後要儘快爭取實現工業化及反擊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接受了蘇聯的指令式的計劃經濟，及增强黨的一元化領導，從而中國的行政、立法、司法等大權全都在黨領導之下。然而由於缺乏民主的實踐，健全的法制亦未能迅速建立，故部份黨員逐漸脫離羣衆，成爲特權份子，他們有些人藉着革命的榮耀，製造種種特權，浪費國家資財，成立山頭，打擊異己及對人民作出種種剝削，雖然官方在四人幫倒台後提出健全民主與法制的改革，然而爲了保存既得利益，他們阻撓及拒絕落實執行中央改革，及打擊地方民運份子，從這些事例可知，官僚主義的存在使中國民主化的發展受到極大阻礙。

三、經濟落後是我國民主化不能儘速發展的另一因素，經濟是社會的基礎，很多社會現象都可從經濟上究其根源，舊中國是一個經濟極端落後之國家，建國後雖然經濟獲得巨大的發展，然而由於生產水平，管理水平還相當落後，勞動生產率相當低，使我國經濟仍未擺脫小生產習慣勢力的束縛。而小生產則是封建殘餘賴以生存的土壤和條件，生產力不高度發展，小生產勢力就不易打破，要根除封建殘餘是十分困難的事。所以在建國後，對建迷信、買賣婚姻等在廣大農村還頗爲流行，在此基礎下，人民不但不能杜絕崇拜權威，更將個人崇拜推至一個更高峯，文革時的朝請示、晚滙報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四、階級鬥爭理論的擴大以至窒息了正常的民主言論——建國後，認爲消滅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就能把封建主義徹底打垮，而以後要解決的就是資產階級的問題了。此外更由於過份强調蘇聯變修的經驗和匈牙利事件的教訓及過份批評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僞性，所以民主與法制不但不健全，而且開始倒退，而民主制度很多方面漸漸流於形式，例

如人大代表不是由人民選舉，而是由領導圈定，人民對自己的政府沒有選舉權，當然更談不上監督權及罷免權，由於制度的不健全，以致在文革期間予野心家一個篡奪權力機會。此外更由於社會主義國家歷史不長，很多發展的道路仍在探索階段，在五三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很多時在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之新問題時，容易把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然看做階級鬥爭，又習慣沿用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羣衆運動鬥爭之舊方法，而導致階級鬥爭擴大化，這種行爲在文革中達到高潮。此外更由於文革後極左思潮泛濫，把一切發展經濟及要求人權平等、民主等種種要求，批判爲資產階級的奴隸哲學而大加批判，從而使我國活潑之社會風氣遭受重大之打擊，而民主化更陷入一片死寂。

五、整個官僚體制阻撓着改革的實行——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體制已逐漸脫離人民的監督而成爲一特權的階級，縱然共黨中有一定的開明改革份子充份了解到民主化的重要，但由於他們的生存始終是倚靠着整個黨組織的支持，所以根本不能作出太多突破性的改革，因這樣會牽動整個組織的利益及觸發很大的反抗，基於此，他們的改革是極其的有限，而當民間的行動超越其所訂的框框時，他們便會無情的加以鎮壓，這個分析便可能解釋到雖然在一九八一年三中全會後官方主動作出很多重大的改革，但是在差不多同一時期，他們却拘捕了國內知名的民運人士，繼之更發表了反自由化及限制文藝界言論的文章。總結而言，官方仍未能跳出施予式的由上而下改革的模式。

六、民間力量的脆弱——我們認爲自上而下的改革有一定的局限，而民間羣衆的力量正好彌補這方面的不足。然而民主運動人士雖是熱血的一羣，但是過份注意文字宣傳及出版，大大地限制了他們的活動範圍，而較少注意到現實社會特別是工農生活的情況。此局限使他們未能迅速與民間的工運、農運、學運等相配合，深切了解他們的實際狀況而反映他們的意見予中國政府，以製訂更適合國情的改革建議。

總結——以上的分析敘述了獨裁主義在中國的建立是有着深厚的社會基礎，在這裏，筆者希望指出政治的高度集中及有效不等於沒有監察。試舉美國爲例，總統的權力是十分集中的，但仍可受國會、司法機關、及民間團體所牽制，最有名是水門事件，總統因受輿論的攻擊而被迫下台，權力集中及有效運行並不等於無制約及無監察。

（五）幾點辨正與澄清

一、民主致亂、還是民主止亂

在鎮壓民主運動的呼聲中，中共領導人常批評民運人士是要求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安定團結、反對四化的實現，究竟民主運動是否會阻礙中國的經濟建設呢？從建國卅年的歷史中，中國曾經歷過數次大動亂，這些動亂都是獨裁及權力極端集中而無監察的結果，並非民主所致。例如一九六二年的經濟大混亂可導源於身爲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不肯接納實務派領袖們的意見；一九六七年的文化大革命乃源於黨內沒有民主制度化的途徑解決紛爭而爆發出這個大悲劇，四人幫後的種種經濟政策失敗亦可根源於官僚主義好高騖遠，不採納意見的思想作風。從這些活生活的例子可知，使中國大動亂的恰恰不是民主，而是沒有民主的獨裁制度，要戰勝歷史的局限，中國非要朝向民主化道路不可。

二、經濟與民主的關係

有一些知識份子在現象上指出比較運行成功的民主制度祇有在先進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才會出現，基於此他們認爲中國現時所應關注的應是經濟的發展而非任何形式的民主運動。本人認爲這是一個十分機械而在邏輯上犯錯誤的觀點，民主在先進國家出現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並不是所有發達的工業國家皆會出現民主，這例子亦可常見，例如蘇聯、東南亞的經濟强國如南韓、台灣、星加坡，甚至香港亦是一例。我同意民主意識及制度的確立是受制於整個社會基礎，而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所要求爭取的未必一定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是一個民主運作背後的原則，如人權、自由及監察政府等。

若從整體歷史的分析，民主制度的出現曾經歷過漫長的發展。在封建社會末期，社會上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因素，加上當時反對權威及全面思想控制之思想啓蒙如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思想、約翰·穆勒的自由主義、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及其後韋伯所論述的理性主義發展等一連串思想啓蒙運動，使西方走上資本主義發展及有限資產階級民主的道路。比較開放的制度並無改變資本主義社會殘酷剝削的本質，加上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經濟危機，進一步使工人無沒忍受而在十九世紀中期爆發了幾次波瀾壯闊的工人起義，雖然革命被殘酷的鎮壓下去，但是工會的權力亦已逐漸擴大，爲了調和社會上不同團體的利益冲突以保持整個社會的運行，政府還實行了較爲開明的民主制度。從這樣的分析可總結出，民主制度的確立絕非單源於經濟的發展，而是必須附以其他很多重要因素如思想啓蒙、教育的普及、民衆的

鬥爭等才能發展起來的，所以在現階級的中國，我們實應支持那些要求自由、法制、人權的民主運動。

（六）對中國實行民主化的建議

一、民主化的發展是基於多方面因素的配合，經濟的發展不單可使我國達到富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更可提供一豐厚的物質基礎及足夠的時間讓人民能行使公民的權利，基於此本人支持官方下放企業自主權，正確運用「發展經濟理論」的改革經濟方案，以祈能建立强大的祖國及爲民主化的發展作出多點努力。

二、教育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基礎，故一全面之大學及中學教育，應爲當今教育發展之去向。現時基於快速發展經濟的關係，加强考試，設立重點學校及重點班是過渡時期必需之措施。但長遠來說，大學教育的目的在於培育國家棟樑，現時國內大學學科分得太細，知識太單一、面太窄。知識太單一，是一個頗大之缺憾，當局應培養學生高闊之視野，廣泛的興趣及廣博之知識，官方應鼓勵在大學裏的學生活動，培養同學民主自治的精神及敏銳性，觀察力及分析力，這樣可爲我們建立一富强民主的祖國奠定一定的人力基礎。

三、爲貫徹憲法賦予人民民主的權利及培養參與國家大事之意識，打擊不學無術的幹部及調動民間所有的積極因素及採納人民意見，官方應鼓勵民間組織，自由組成代表其利益之工會、農會、婦女會、青年會等，以保證廣大人民的意見有途徑及有代表爲其傳達，提供更眞切的事實讓官方參考，這一切都會對中國的民主富强有幫助。

四、政府應廣泛推行地方基層民主化，主要步驟是改革各企業、事業單位的管理制度，官方不單應下放權力至企業以擴大其自主權，更需要貫徹人民參與管理，貫徹經濟民主的原則，讓羣衆了解自己實際有當家作主的權力，因此各廠內成立職工大會就成爲急不容緩的事件。此原則之落實，則會對調動一切積極的因素帶來極大之成效。

五、此外我們歡迎全國人大的選舉法、地方組織法以貫徹基層民主之精神，目前選舉法將地方人大代表，透過直接選舉的形式，擴大至縣一級，無異是確立了良好之開端，然而有些地方沒有理會選舉的要求，仍堅持由上而下指派代表：有的則搞籌額選舉或陪襯式差額選舉，令到新選舉法的精神無法落實。希望官方能積極注意這種問題及提議解決之方法。其次，羣衆對選舉的反應並不熱烈，做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可能很多，但解決的途徑，基本可朝兩個方向落實（一）加强羣衆教育，使他們認識選舉的重要性（二）使獲選的代表有明確的職權和

充份權力，使他們能夠發揮作爲人大代表的功能，一方面積極反映民意，替羣衆爭取利益，另一方面，代表人民監管政府。

六、筆者支持人大常委會的建議，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於人大之下，我們認爲中國軍隊是人民和國家的保護者，中國公民和軍人都應牢固樹立軍不干政的觀念，現役軍人不參政，這是確保社會穩定、人民安泰之必然政策，這也便於軍人能集中精力，潛心於發展現代化之軍事技術。

七、爲了諮詢多方面的意見以爲改革奠定更正確的理論基礎，人大應成立一個由中國共產黨、各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各團體及各專家組成的變法諮詢委員會，用一年的時間，集思廣益地展開討論，擬定一變法大綱，呈交人大討論，然後貫徹執行。

此外，國家應鼓勵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的研究，打破理論界的各式框框，不能因意識型態不同而打擊正常的學術研究。

八、我們支持人大常委會第廿三次會議中關於改革整個政府制度，精簡國家行政機構，置各黨派的活動於憲法之下，加强民主法制，消除幹部終身制及保證人民權利等種種措施，這些改革符合中國民主化的意願及顯出領導層改革之決心，希望官方能依從此改革的路向發展，制定更具體的法律以保證所有的改革得以被實際貫徹執行。

九、在一九八二年中國憲法修改草案中，訂定了很多乎合民主精神的原則，爲使憲法得以被貫徹執行，官方應制定詳盡子法，以貫徹憲法原則的精神，並希望在制訂子法的過程中，廣泛地諮詢人民的意見。

十、共產黨作爲一執政黨，是無可爭議的事實，本人亦認爲這是符合實際環境的需要，在此同時，人大應儘量加强其監察的權力，以對執政黨作出更有效的監督，在將來我國民主化過程有更大的發展時，中國應放棄一黨專政的局面而實行多黨制，使不同的政治團體能以自由民主的競選形式控制政府以推行其決策。

（七）結語

總結而言，民主是一個健全社會所必需的生活方式，民主運動是整個民主化中重要的一環的改革因素，也需要有官方由上而下的努力，互相配合，相輔相成，在這裏，本人希望對自從建國以來辦民主而犧牲的人士致以最大的敬意，因爲他們代表着我國的良知和希望。

（本文代表作者本人意見）

目　錄

三版編者前言……1
編者前言……3
於無聲處聽驚雷——香港學界參與中國民主運動的回顧……
……81－82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6
中國民主化的道路……81－82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16

第一部份　鳴放時期……1–14
譚天榮：　教條主義及其產生的歷史必然性……2
林希翎：　在北京大學五月二十三日的辯論會上的發言……4
　　在人民大學五月卅日的辯論會上的發言……8

第二部份　文化大革命時期……15–50
遇羅克：　出身論……17
楊曦光：　中國向何處去？……31

第三部份　「批林批孔」時期……51–155
李一哲：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53
陳爾晉：　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節錄）……83
徐水良：　關於理論問題的問題……125
　　談社會主義的分配問題……137
　　關於同一性和鬥爭性問題……146

第四部份　四・五運動……156–
韓志雄：　談談經濟管理民主與政治民主……
王軍濤：　試析左傾機會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

第五部份　「北京之春」及民刊運動、基層「人大」選舉……165—477

甲　部……166—233

魏京生：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167
續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176
再續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186
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192
二十世紀的巴斯底獄……197
在法庭上的辯護詞……205

路　林：信任危機的根源……212
發刊與停刊……215
到半步橋做客——我被傳訊的前前後後……223
致彭眞主任、江華院長、黃火青檢查長的一封公開信……228

乙　部……234—477

劉　青：也從周總理的遭遇，談體制改革的必要……235
獄中手記：沮喪的回顧與瞻望——我向社會法庭控告……237
附：各地民刊就劉青被捕發出的呼籲書……255

徐文立：當務之急……258
從周恩來晚年遭遇看徹底的社會變革的必要性……260
中國當代社會變革之淺探……262
不公正的判決——我們對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魏京生一案的看法……265
時局和我們的認識……271
四五論壇召集人徐文立答記者問……286
促進庚申變法的建議書……300
自然·社會·人（代序）……305
附：《四五論壇》發刊詞……307
《四五論壇》復刊詞……308

王希哲：黨的領導與民主監督……310

陳爾晉：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重印前言……319
答東方的來信……333
傅申奇：民主與社會主義
我爲什麼要當人民代表——致選民……348
答選民問……350
駁王柏華的講話……353
再談談王柏華……356
與選民談住房問題……358
訪南市區選舉委員會……361
致上海人大選舉辦公室的公開信……362
王申酉烈士永垂不朽!!……363
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態度……369
附：我們的兄弟傅申奇……370
可　求：事實的澄清……378
《責任》發刊詞……382
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全國人民公開信……383
王一飛：新階級、新社會……385
系　豐：就目前形勢致晏平仲的信……403
秦永敏：論無產階級專政的使命……423
也談增加工資與工資制度改革……433
朱建斌：中間形態及其發展趨勢……439
重學秋：給全國民刊、全國同胞、黨中央、
人大常委會的信……458
甸　森：我的態度和打算……461
民主選舉全過程……463
致全體同學書……469
長沙學生代表陶森的一封信……471
張京生：百分之四十的職工增加工資和工資制度改革……473
長沙《理想通信》致《生活》《浪花》
《人民之路》編輯部的信……476

附錄一： ……478—499
陳若曦：　中國民辦刊物及其他……479
陳鼓應：　海峽兩岸的民主運動（節錄）……486
劉大任：　知識份子的窄門（節錄）……489
魯凡之：　中國文化・民主運動・中體再造……490

附錄二： ……500—508
本書作者簡介……501
出版後記 ……509

第一部份　鳴放時期

自一九五三年下半年開始的社會主義過渡到了五六年基本上已成一個階段；工業方面，資本主義私人工商業全部變成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或公私合營的國家控制企業；至於農村，在毛澤東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的推動下，合作化的高潮於五六年初達到頂點，農村基本上成立了先進的高級合作社。這樣，中國完成了工農業的所謂社會改造，而這種改造，相對於老大哥蘇聯來說是順利得多的。當時的某些國家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被這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鼓動，認爲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全面勝利指日可待，提出了政治戰綫上和思想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號召，這種思想特別體現在毛澤東五七年二月的內部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認爲社會主義過渡經過生產資料所有制轉變後，還要經過肅清意識形態上的、思想的鬥爭才能鞏固。

針對着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封建主義、資產階級傳統，更加針對着四九年立國以來在共產黨內部、在國家官僚內部滋生出來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毛澤東提出了大鳴大放的建議，號召黨外人仕大膽批評，幫助共產黨整風，號召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互相監督，長期共存」，並提出「言者無罪，聽者足戒」等民主解放觀點。於是共產黨受到建國以來最嚴厲的批評。這個運動從五七年二月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發表後，四、五、六月間全國各地各階層出現了大鳴大放的空前高潮，當時猛烈抨擊共產黨和政府的有黨內人仕，有政府高層人仕、高級知識份子、民間人仕等，黨內及官方的代表人物有章伯鈞、羅隆基及陶鑄等，而民間的代表當首選北大學生譚天榮、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

鳴放遭到黨內勢力的頑強抵抗，而帶頭策動這場運動的毛澤東也發覺到鳴放的抨擊程度超越了他所容許的性質和範圍，於是五七年七月，毛澤東策動了向鳴放份子的反擊，鳴放運動向打擊「右派」方向轉移，很多鳴放初期響應號召站出來批評共產黨的各階層人仕被打成「右派」，被加上了一頂摘不掉的帽子。

譚天榮

教條主義及其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主義從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的一年）起，就開始鐵的必然性轉化爲自身的反面；與此相適應的是國際共產運動，形成相互滲透的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六十二年的絕對統治。

自從一九五三年以來，大陸不是人民民主專政，而是三個子的統治。從黨中央到全國各地都是官僚化的黨員的統治、專、獨裁、蹂躪人權。

認識了歷史必然性的戰士們和像樹葉一樣被蹂躪的人們，組成百萬大師，進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

頭可斷，血可流，自由意志不可屈！

我是本屆畢業生，但是在畢業前夕的今天，我還不知道自己將來要到那裏去；因爲我像每一個畢業生一樣，沒有選擇自己前途的權利。黨要我們服從分配，隨便把我們分配到自己不願去的地方，擔任自己不願做的工作，盲目的服從被認爲是優秀的青年。我常對自己說：爲了黨的利益，應該服從分配，犧牲自己的利益，踏上黨分配給我的崗位。可是另一種意識立刻强烈的抗議：爲什麼我們青年人在「解放」的今天，一定要扮演這樣的悲劇角色呢？忍受這種犧牲是毫無意義的，每一個人的才能和興趣是不同的。在我的意識裏不忍受這種曖昧不明的事。我有自己的意志和興趣，這也許就是我的錯誤吧！我要求讓我們青年人成爲像樣的人，不要像現在一樣，一個一個都是木偶。我要求讓我們成爲確定性格的人；因爲沒有確定性格，站穩立場就是一句空話。我求讓我們自由地討論自己感到興趣的問題和其他問題。

自從開始經濟建設以來，黨對青年的組織方面活動內容，漸漸落後於生活的需要。强迫命令多於說服教育；行政措施多於

年活動。許多幹部除了扣帽子以外，已經沒有別的本領了。現在「立場」這個術語，已經成爲大大小小的專制統治者理窮詞盡時，用來搪塞人口的萬能方箋。我不想在這裏宣傳教條，因爲教條已經是人民可恨可笑的對象。但我必須說明，無產階級立場不能是自封的。要眞正站穩立場，必須懂得一點道理：什麼是無產階級的全面利益和長遠利益。永遠堅持：沒有確定的性格；沒有對生活現實前後一致的見解；沒有邏輯思維的習慣，所謂「站穩立場」，不過是一句赤裸裸的廢話。同樣，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沒有辯證思維的能力，沒有無私純潔的心靈，所謂「階級分析」，不過是自欺欺人。可是現在却到處都是廢話和自欺欺人之談。連毛主席對中國社會階級的分析，也已經在黨的人代大會被否定了。

轉載自《民主接力棒》(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

林希翎

在北京大學五月二十三日的辯論會上的發言

我今天很激動，到北大吸到了新鮮空氣，而人大是教條主義的大蜂窩，官僚氣太重，北大到底是北大，繼承了五四的傳統。

胡風是不是反革命？這個問題還不能肯定，現在下此結論，未免過早。證明胡風集團是反革命的材料都是非常蒼白無力的、荒謬的！

我過去也寫過文章批判胡風，現在想起來眞是幼稚，很可恥。

胡風如果是反革命，那爲什麼他把自己的綱領提給黨中央呢？這是自找苦吃嗎？不管他的綱領正確與否，是不能採取鎭壓的手段的。爲什麼向黨中央提意見就是反革命呢？這就是斯大林主義的方法，這就是宗派主義！胡風當時批判的宗派主義，實際上還沒有現在揭露的現實生活中的百分之一！

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胡風提出要辦同仁雜誌，現在看來很正確，他批評庸俗社會學，要動搖機械論的統治是對的，因爲現在的文藝創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很嚴重。文藝是反映生活的，現在的生活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機械的單調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胡風反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說文藝要爲工農兵服務，這個講話是抗日時期發表的，現在情況變了，知識分子也成工農兵了，不適用了。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爲什麼不能反對呢？胡風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有不同的意見，現在百家爭鳴，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見嗎？劉紹棠就發表了一篇文章，不贊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胡風反對宗派主義，黨內是有宗派主義的，胡風觸犯了文藝界的首長周揚、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風分子中有個別如綠原、阿壠有歷史問題，但並不都是反

革命分子，例如謝韜就是個很好的教員，很早就搞革命運動。總之從三批材料來看，不能說胡風是反革命。胡風的問題假使發生在斯大林問題揭發後，或波匈事件後，提出整風的今天，就不會那樣處理。當時太粗暴了。胡風的綱領若在今天提出來，也不會說他是反革命。若是魯迅提出來，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說他們通信秘密，那個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說他們私人間的友誼是小集團，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說眞話，難怪有人說共產黨六親不認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圖推翻政權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風顯然不是這樣的。

今年四月，最高檢察院譚副檢察長到人民大學作報告時，有人問他胡風問題怎樣了，他說「現在偵查工作已經結束，但胡風很不虛心！不接受意見！」同志們，這說明什麼呢？根據譚副檢察長的話，胡風能算反革命嗎？兩年還不公佈胡風案件的下文，我看共產黨很爲難，沒法下臺，知道錯了又不肯認錯。估計毛主席可能有兩種心情：一、明知錯了，不承認；二、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級幹部中很多人還不通，現在若對胡風平反，是有困難的。聽說毛主席在一次講話中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有百分之八十的高級幹部不同意，當時有一些高級幹部還退席了。

胡風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然矛盾是會轉化的，如果逼上梁山的話。從赫魯曉夫在二十大所作的的秘密報告可以看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也是被逼上梁山的。我們知道列寧在的時候，季諾維也夫曾出賣過情報，而列寧仍讓他當中央委員，在革命勝利後斯大林消滅了他們的肉體，這是斯大林的專橫。

赫魯曉夫否認美國國務院發表的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說是美國間諜機關揑造的。這多麼笨，眞是撒下了彌天大謊。如果說是間諜搞的，那個間諜就是赫魯曉夫自己！

《斯大林時代》一書出版了，這本書很好，斯特朗是個眞正的社會主義者，他對蘇聯的情況很了解，但這本書只賣給十一級以上的幹部看。蘇聯說這本書是反動的，文滙報登出幾章，蘇聯看到以後還質問我們，這不是蘇聯干涉我國內政嗎？

我國也是肅反擴大化，我們的法制是不健全的。我曾經在區

法院實習過，知道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檢查肅反工作。我看到從法院、檢察院到公安局，都忙着修改案卷；起訴書錯了修改，沒有理由的補上理由。這一定是中央佈置的，但是這還叫人民代表去檢查什麼呢？

我很同意南斯拉夫關於個人崇拜是社會制度的產物的意見。人們罵鐵托、卡德爾是修正主義，可是論點蒼白無力！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所有社會現象都有社會歷史根源。斯大林問題絕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斯大林問題只會發生在蘇聯這種國家；因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一樣，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法國則不會。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爲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眞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眞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裏是不民主的。我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爲一個眞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

我知道有很多人願聽我的話，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講話，我要講下去。現在共產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很嚴重，我們不要以爲共產黨整風的辦法，採取改良主義的辦法，向人民讓點步就夠了。我經過研究認爲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產黨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當革命勝利了他們爬上了統治地位，就會產生思想上的局限性，就要鎭壓人民，採取愚民的政策，其實這是最笨的辦法。

北大是放了，但我對整風還是不大樂觀，因爲還有很多衞道者，他們想把先烈用鮮血換來的社會主義成果，作爲他們向上爬的臺階。聽說現在有風聲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巴，這是最愚蠢的！北大是放了，高級知識分子是放了，但廣大基層還沒有放。現在揭發的遠不及現實生活中的百分之一；別看報紙上天天登了很多問題，可是都是上層民主人士揭發的，這些人年紀大，很世故，他們講的材料很少，不夠我們研究的。我們青年長個腦袋是幹什麼的呢？難道是讓人家牽着鼻子走的嗎？我們要說話！

北大這樣做，是個良好的開端。現在，西北、武漢、南京等

地到處學生都動起來了，可就是互不通氣，報上不報導，這是封鎖新聞；而我們說錯了一句話，他們就可能鑽空子、抓小辮子，我們應該警惕呵！我們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處都有，大家要聯合起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到這一點小小的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人民羣衆不是阿斗，眞正要解決問題只有靠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羣衆行動起來。我這樣講，並不害怕，我的朋友經常對我說：小鬼，我們都要給你送牢飯了，雖是笑話，也有可能。他們不歡迎我，我就滾蛋，我既然到這裏來，就是冒着危險，坐牢也沒關係！

我們今天的鬥爭不是發發個人牢騷，對一切缺點不能用改良主義的辦法！我們的目的很明確，爲了建立眞正的社會主義，爲了過眞正的人民生活。

摘自人民大學出版之小册子
署名程海果

林希翎

在人民大學五月卅日的辯論會上的發言

社會制度問題，實際上是基礎與上層建築矛盾問題。

任何社會現象要從社會制度本身來看，這是一個基本原理。馬列主義教導我們研究任何現象，都必須從社會物質生活本身找答案，社會制度的概念定義是經典作家所能做的事，所以我是不能下定義的，但可提出看法（這看法是參考了鐵托的看法）：社會制度應分二部分即基礎和上層建築，我國的經濟基礎現在基本上是公有制，這是不可動搖的。從發展的觀點上看，它比私有制前進一步，所以有人提出定息二十年應該堅決反對，因爲這是私有制的繼續，取消定息的時機完全成熟，應該成爲公有制。

我國上層建築的某些部分不能適應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三害」的根本原因，這在於上層建築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適合公有制經濟基礎的緣故。目前我國哲學、文學、藝術各領域都表現教條主義非常厲害。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我想談一些具體的制度，如人事制度、等級制度、保密制度擴大化，特別是產生官僚主義的重要原因是官僚機構。我親身體會官僚機構的害處，像我的案件就是這個官僚機構的產物，直到現在不能解決。又如，北大法律系學生（按：指梁志華）的案件也是這樣。

人事制度：不合理現象、宗派主義反映在此明顯，並不是以德才衡量一個人，而是看資格，看是否是黨員、團員。許多不合理的現象，不僅要看現象本身，而且要看這些現象的總源者和產生這些現象的條件。有些人把不好的東西歸於舊社會，但是就是在新社會裏，青年提高也很少，青年希望求知，想聽報告、看材料，但有等級限制。爲什麼青年中存在虛榮、名利，和現存制度有關？有些黨員是爲了享受政權，而跑到黨內，不入黨就沒有出

路。有人叫我入團，說你不入黨入團，你的前途、婚姻、地位如何解決，我聽了很生氣，要這樣我一輩子也不入團。

等級制度：幹部發桌子、紙簍都分等級，等級制度已深入到各個方面。我有病要治，但要十三級才行。我憑什麼爬到十三級？也不願爬到十三級！有人勸我通過私人關係去看，我不願這樣做。

產生三害的原因是等級制度、人事制度與保密擴大化。這些小的制度（等級、人事、保密擴大化）組織了總的制度，具體制度本身產生了三害。這些制度和公有制是根本不適應的，是私有制的產物。

我國教條主義的統治在這些方面只是宣傳光明的一面。現在有些人還說誇大黑暗面，說王蒙是歪曲事實。有人說：「我們的現實生活是這樣的嗎？」這樣使單純的青年到了社會，看到這些問題會大吃一驚，甚至會苦着臉而消沉下去了，教條主義害人一點也不奇怪。

基礎改變但思想意識仍是以前的。三害和過去的封建性、買辦性、法西斯性有關，如宗派主義和封建性、法西斯性有聯繫；教條主義與買辦性有關，買辦是媚外崇美，對蘇聯的學習也是如此。當然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蘇友誼不可破，但把蘇聯東西亂搬就太教條主義。有人說：「人民大學是教條主義大蜂窩」，我看是「教條主義策源地、大本營」。蘇聯更是教條主義策源地。老師講話就像個打字機，蘇聯醫學就未超過中國的協和，組織療法害人不淺，無痛分娩法現在也不用了，這都是由於處在迷信的狀態。

軍隊學習蘇聯有很多壞處，本來軍隊是人民最愛戴的，但現在部隊改成軍銜制；軍官薪水大，還不要女同志，我反對這樣子學習蘇聯。等級制使官兵關係很不好，這些東西可以舉很多例子，現在部隊老戰士都很有意見。共產主義要根據民族特點，要有民族自尊心。

黨中央提出「鳴、放」受到很大阻力，主席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高級幹部就反對，現在也是很多人在應付，口是心非，國外也不支持，除了「波、南」。

我不贊成改良主義思想，資產階級思想還存在；封建思想、法西斯思想，甚至奴隸思想也出現了。要在鞏固基礎的條件下徹底改革政治制度，中央現在也認識到這點，如現在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相結合的根本制度。但這不是唯一方法，這不是根本解決。羣衆不一定需要他們來幹活，而是需要他們來辦好事，當然整風是良好的開端。

關於統治階級的局限性

統治階級都有共同的局限性，這是一個客觀規律，我研究很久，在以前不敢講，現在也還不成熟，提出大家討論。我說這是客觀規律，在社會上存在階級時，這個規律便起作用。

對現在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局限性如何理解？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規律是仍起作用的；當階級存在時仍起作用，不過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規律可以被人來利用，存在克服這個規律的可能性。但這可能性變成現實性是要有主觀能動性，在許多條件中政黨起決定性作用。

現在社會主義社會，工人階級與廣大人民利益是一致的，但也有人民內部矛盾，表現在統治與被統治之間（領導與被領導）。我認爲領導與被領導就有矛盾；統治與被統治的地位不同，看問題角度不同、利益也不同。企業的廠長和工人的矛盾是看問題不一樣，這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但發展下去，由量變到質變會爆發成對抗性。中國發生了小匈牙利事件（玉門罷工），要看到現實生活中這個規律在起作用。領導有一定的局限性。假如不加主觀能動性克服的話，問題就會發展。不同的地位產生看法不同；本來是被統治者，但一旦爬上統治（工人爬到廠長），說話口氣也不同了，一切也就變了。

以文藝界爲例：李希凡、藍翎從被統治下層爬到上層文壇後，照例變了樣，用了統治階級者的口氣批評別人。文藝界的最大問題是愚文人、宮廷文人掌握實權，中央開一點縫，就鑽。眼向上看，不向下看，一個眞正有良心的作家要反映人民的要求。王蒙還是反映矛盾，但還有缺點。像周揚同志是文藝官，文藝巨頭

，掌握權力，成天赴宴會、接待外賓，文藝界在這些人手中控制很嚴。領導說什麼是什麼，最高的領導很難從他們那裏了解眞實的情況。這些作家不反映眞實的生活，却反映奇怪的東西，反映上面的情況。這樣的作品怎能爲人民喜歡呢？

在青年報上有文章說小資產階級看問題有偏見，會發生匈牙利事件，害怕小資產階級片面地反對官僚主義。我看只要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都有偏見。主席沒有偏見還革不了命，赫魯曉夫的報告沒有偏見嗎？工人罷工沒有偏見嗎？工人最有偏見。工人對不合理的事情非常不滿。我國五億多小資產階級，五億人不反對官僚主義，什麼人反對官僚主義呢？五億小資產階級總比官僚主義好的多吧？五億人總是寶貴的，除開五億，剩下一億，這一億中眞正的產業工人沒有許多，工人和小資產階級有很多聯繫，這樣歸根到底只剩了領導者。這個論調等於不讓大家反官僚主義，我說：反官僚主義人人有責，甚至是反動的人。

關於「對現實不滿」

談一談對現實不滿的問題：對現實不滿，我認爲是一個好現象，應該鼓勵人們對現實不滿。滿足現實的哲學基礎是黑格爾靈魂的復活。黑格爾有絕對觀念。現在有些領導也成了黑格爾。

社會主義是最好最高最美好的社會。這個「最」字就是形而上學的，將來會有更好的社會。如果我生活在五百年以後的「X」社會，我也會不滿，社會是前進的，滿意現實社會就不會發展。猴子要滿意現實的話，那麼我們現在都不會變成人。對現實不滿是應該支持的，而現在有些先生唱一些廉價的讚美詩，成天和國民黨、資本主義比較，向後看不向前看。教員講課也是和國民黨、資本主義比較。

有人說不滿現實會失去人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我看這不對。當然我們現在歌頌是需要的，眞正的歌頌是好的。但不能要公式化的歌頌，吹牛的歌頌，這樣會敗壞人心，眞正害人不淺。要把現在有什麼問題老實的告訴人民。

報紙也是吹牛，許多事實不是眞實報導。匈牙利事件說（不

知是青年報還是人民日報）有幾個青年喝醉，糊塗去參加遊行，這都是撒謊不高明。

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存在，統治者是局限性的客觀規律也存在，因爲有公有制爲基礎，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沒有根本對抗，所以領導有可能認識這個規律，黨一系列的措施都可見黨認識了利用了這規律，克服這局限性，從黨過去、現在和將來準備實行的措施都說明了這一點。

這些問題如何辦？

要把眞實情況告訴人民，要徹底改革，要發動人民來討論。社會主義是人民的，不只是黨員的，應該讓全民盡情的提意見。現在的「鳴、放」只是上層，這是不行的，我看上面的是老頭子，不大膽，世故深，不敢說；爲了鞏固他現有的地位，不敢和共產黨鬧翻；要廣大羣衆討論提出意見，再綜合起來，這是理想的。

法制問題

以黨代政的問題存在，共產黨是執政黨，威信很大，實權都在共產黨手中。法律是形式主義，蘇聯憲法更虛假。蘇聯有法制組織，實際斯大林可以完全破壞法制。我們沒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審判員說了算。如肅反問題，是否擴大化，我感到是擴大了，主席說沒有，我不同意。蘇聯破壞法制是駭人聽聞的。中國當然是好得多了，殺了七十七萬人，這也不少，冤枉的人也有七十二萬，相當一個小國家。肅反的理論根據也是錯誤的——羅瑞卿報告都是受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建成後，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化這一錯誤理論的指導。

胡風問題：這個問題很棘手，因爲和主席有關係，是不是反革命誰也沒有肯定。是否和臺灣有關係？過去他對黨中央提出的意見書，和三批材料，都不是確切的根據。雖然我也寫了兩篇反胡風的文章，但現在看來有問題。

阿壟、綠原是反革命，但別人沒有材料，向黨中央提的意見書——郭沫若說是「反社會主義綱領」，實際上那些意見是對的，現在這些「鳴、放」都是從胡風處抄來的。如反對宗派主義，

反對庸俗社會學皆是。當然胡風有些論點我也不同意；其小嘍囉尤可恨，罵人罵黨中央這是不對的、下流的，但罵人也反革命嗎？胡風的建設性意見是正確的，文藝競賽是對的。

現在人們有懷疑，國家還沒做出結論。我覺得案子給檢察院處理是沒辦法的，他們只是死扣又不懂文藝。這個問題是錯誤的，這也是不奇怪的，因爲有斯大林上述錯誤理論作指導，起義的勇士舒蕪起了不光彩的作用。

三批材料中張中曉對毛主席的延安座談會的報告做了批判是否惹主席大怒了，冒犯了？主席的報告當時是起很大作用，現在也是對的。但有些東西不是科學的文藝理論，再加上那些個人崇拜者鼓吹，起了很大害處，爲什麼不能反映知識分子，限制在工農兵，別的不要？

文藝學習劉紹棠提出了他的看法，現在正在討論。

有編輯部人來我處約稿，我告訴他我的意見，我讓他下保證不同意主席的意見能否登出來，能登我便寫。

我眞怕像斯大林的理論一樣不叫人觸動。

現在看來胡風假如偵察當中沒有其他新的材料，只是提意見，這是好的呀。所以我同意趕快解決，這方面我向主席進一言（主席這裏是有錯的，但也沒有關係）。常委會決定對肅反大檢查。那些公安局、法院，就塗改過去的案件，怕人民代表檢查。很讓人氣憤，法院審判的結果都是黨委的批示，把批示也都撤下。《十五貫》的現象在這裏太多。你對領導有意見就是反領導，反領導就是反組織，反組織就是反黨，反黨則反人民，反人民則反革命，用這個公式來定罪的，這完全是斯大林的方法。

下層領導者也還是自覺與不自覺、完全與不完全的繼承過去統治作法，繼承了地主惡霸的作風。可惜中國沒有這樣的統計，究竟有多少人有錯誤呢？多少人被害呀？

匈牙利事件：我和鐵托同志的看法一樣，蘇聯第一次出兵，我不同意，這正是火上加油。第二次是沒有辦法，不是干涉不干涉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整個的社會主義陣營與世界和平。所以第二次出兵是對社會主義有利的，我是贊成的。

南斯拉夫的問題：我很感興趣，是社會主義的民主。蘇聯的

民主，在斯大林以前，基本上沒有確立，是抽象的東西，沒有產生。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事實，現在又否認，這是不高明的。說美國捏造是不對的，這些事實很明顯的表現在批判斯大林論文集與其他黨同志的意見中，報告是美國間諜偷出的，不過我國沒公佈而已。保密是需要的，對於國防國家機密給我們知道也無用，而現在的參考消息不讓看，這是不應該。我過去對斯大林的印象很好，二十大對斯大林的批判，我也很生氣，但到我看到這個秘密報告以後，才看穿了斯大林。對斯大林的評價，不能歸到個人崇拜，要從制度本身去找，斯大林之所以出在俄國，要從歷史條件看。蘇聯沒有典型的資本主義基礎，社會發展沒有按規律來，這和中國有共同之處，在一些封建制度上建立社會主義。許多錯誤大部分受封建之害，如「三害」就是這樣。

摘自人民大學出版之小冊子
署名程浩泉

第二部份　文化大革命時期

一般來說，文化大革命包括由六六年至七六年「四人幫」倒台整整十年，但在這十年間，亦有其階段的發展，譬如由文革開始到六九年初九大召開，基本是「紅衛兵」運動和動亂時期，後期林彪事件的發展及批林整風與文革剛開始這段時期是有頗大分別的。

文革在毛澤東的蓄意推動下而能夠發展爲一個波瀾壯大的全國性的羣衆運動，是有其社會基礎的。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工農業過渡並沒有帶來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官僚層的不斷擴大、新的精英份子階層的形成、官僚主義作風的日益嚴重……這些都是文革前夕中國社會確實存在的矛盾。而文革，就其原本精神來說，無論是從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本意或文革開始的意義，就是一場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滋生和發展的官僚主義或資本主義復辟傾向宣戰的羣衆性運動，所以，不能把紅衛兵運動和後期的羣衆運動單純地理解爲無政府主義的鬧事、發泄、或封建性盲從依

附。後來文革發展爲派系武鬥、奪槍奪政權，嚴重破壞了社會機體，使中國大陸幾乎癱瘓支解，經濟陷於停頓，社會極度動亂，最後甚至要出動軍隊維持局面，無數青年在武鬥中死去，這不能不算是個歷史大悲劇，同時也是歷史對這個「革命運動」的無情諷刺。

由於局勢的混亂，解放軍出面把持局面後，紅衛兵受到鎮壓，無數青年被下放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一些在文革早期極之活躍的紅衛兵頭頭不是由於抵抗被殺，便是被捕押禁。六八年左右，新式的政權機關「革命委員會」相繼在各地各級成立。

反官僚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在文革初期的紅衛兵組織中間是很普遍的，湖南長沙的「省無聯」便是這樣一個紅衛兵組織，他們的極左思想基本上可在楊曦光的「中國往何處去」中表現出來。另一篇在北京出現的較出名的文章是遇羅克的「出身論」，抨擊了文革之前和文革初都很盛行的血統學說。

遇羅克

出身論

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這個問題牽涉面很廣。如果說地富反壞右分子佔全國人口的5％，那麼他們的子女及其近親就要比這個數字多好幾倍。（還不算資本家、歷史不清白分子、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女，更沒有算上職員、富裕中農、中農附級的子女）。不難設想，非紅五類出身的青年是一個怎樣龐大的數字。由於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萬產業工人，所以眞正出身於血統無產階級家庭的並不多。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參軍，不能做機要工作。因此，具體到個別單位，他們（非紅五類）就佔了絕對優勢。

由於形「左」實右反動路綫的影响，他們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別是所謂黑七類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經成了準專政對像，他們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幾乎決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僅低人一等，甚至被剝奪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衞黨中央、保衞毛主席、參加紅衞兵的權利。這一時期，有多少無辜青年，死於非命，溺死於唯出身論的深淵之中，面對這樣嚴重的問題，任何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不能不正視，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靜和全面的折衷主義觀點，實際上是冷酷和虛僞。我們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起而捍衞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下面我們就從毛主席著作和社會實踐中尋找答案，分三個問題來闡述我們的觀點。

一、社會影響和家庭影響問題

先從一幅流毒極廣的對聯談起。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其本如此。」

辯論這幅對聯的過程，就是對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過程。因爲這樣辯論的最好結束，也無非他們不算是個混蛋而已。初期敢於正面反駁它的很少見。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實這幅對聯的上半聯是從封建社會的山大王竇爾敦那裏借來的。難道批判竇爾敦還需要多少勇氣嗎？還有人說這幅對聯起過好作用。是嗎？毛主席說，任何眞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它起沒起過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眞理——是否符合毛澤東思想。

這幅對聯不是眞理，是絕對的錯誤。

它的錯誤在於：認爲家庭影响超過了社會影响，看不到社會影响的決定性作用。說穿了，它只承認老子的影响，認爲老子超過了一切。

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响遠遠超過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從社會影响。

從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兩種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學校大門，老師的話比家長的話更有權威性，集體受教育比單獨受教育共鳴性更强，在校時間比在家時間更長，黨的雨露和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滋潤着這棵新生的幼芽，社會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領導的教導，報紙、書籍、文學、藝術的宣傳，習俗的薰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會給一個人以不可磨滅的影响，這些統稱社會影响。這都是家庭影响無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會影响的一部分。一個人家庭影响的好壞，不能機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動的媽媽，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於放任，有時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簡單生硬，效果也會適得其反。同樣，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寧就是例証。總之，一個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壞，是不能機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參考。

總的來說，我們的社會影响是好的。這是因爲：我們的社會制度是無比優越的，我們的黨是一貫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視年輕一代成長的；我們絕大多數人民是熱愛新社會的。當然，我們也

不能忽視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尖銳性，不能忽視我們還處在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之中。我們的文化教育制度正待徹底改革。有時社會影响又不全是好的。無論是甚麼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會上的壞影响，一般總要服從這種壞影响，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是只要引導得法，他很快就會拋掉舊東西，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所以，故意讓青年背上歷史包袱，故意讓青年背上家庭包袱，同屬於一種錯誤路綫，二者都是殘酷的。由於社會影响是無比强大的，但又不見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甚麼出身的青年放棄思想改造，都是錯誤的。對於改造思想來說，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沒有任何優越性。

家庭影响也罷，社會影响也罷，這都是外因。過多地强調影响，就是不承認主觀能動性的機械論的表現。人是能夠選擇自己的前進方向的。這是因爲眞理總是更强大，更有號召力。你眞的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比正確的嗎？你眞的相信毛澤東思想是戰無不勝的思想武器嗎？你眞的承認內因起決定作用嗎？那麼，你就不應該認爲老子的影响比甚麼比甚麼都强大。否則，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亂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了。

二、重在表現問題

如果你沒有理由駁倒社會影响大於家庭影响，也駁不倒現在社會的好影响是主流，也不得不贊同出身和家庭影响沒有必然的聯繫。那麼，我們可以一起來研究「重在表現」的幾個問題。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說「重在表現」是修正主義觀點。後來聽說這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才慌忙改口。可見他們對這項政策根本不理解。讓他們來解釋這項政策，就必然會任意歪曲。限於篇幅，這裏只檢查三種提法，看是否符合毛澤東思想。

1. 出身和成份定全不問

貌似公允的同志常對出身不好的青年這樣講：「一我們有成份論，二不唯成份論，三重在政治表現……」這是不看對像。

江青同志解釋過這句話。她說：這是對背叛本階級的個別份

子講的。江青同志的解釋是甚麼意思呢？舉例說，恩格斯本人是資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階級，成了共產主義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階級傑出的領袖。巴黎公社中也有一些本人是資產階級份子的委員，但他們是工人階級公社的代表。我國革命時期也有這樣的例証。我們能不能因爲他們成份不好而抹煞他們的歷史功蹟呢？不能！我們要重在政治表現。這就叫「不唯成份論。」我們認爲相反的情況也適用於這個公式。對成份是礦工，但背叛了無產階級，背叛了革命的份子，也要重在表現，也沒有一點可以輕恕他的罪惡的理由。小而言之，李鼎銘是地主份子，但他向邊區政府提出了「精兵簡政」的建議，毛主席贊揚說：「不管甚麼人……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這就是不以人害言，亦即不唯成份論的具體表現。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兒子的出身。如果說，在封建家庭是社會的分子，子承父業還是實在情況，那麼，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說法就不完全正確了。家庭的紐帶已經鬆馳了，年輕的一代已經屬於社會所有了。而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無產階級教育，準備爲無產階級事業服務或已經服務了，再把兒子、老子看作一碼事，那也太不「適乎潮流」了。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說，當時的知識分子屬於小資產階級範疇。在這裏並沒有分門別類，把哪一個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劃歸爲哪一範疇。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寫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又說：「我們的大學生，雖然還有許多人是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數例外，都是愛國的，都是擁護社會主義的……」這又是一個例証。

由此可知，同一個家庭的成員不見得就是同一個階級的成員，這一點連階級敵人都知道得清楚。例如，運動期間北京中級人民法院的一份判決書上寫道，一個反革命富農分子，因爲三個兒子檢舉了他，夜間持兇器砍死、砍傷了他們。又據一份傳單，市內某公社工廠書記——一個蛻化的變質份子，臨自殺前，親手殺斃了自己的孩子。他在遺囑中說，孩子長大也不會爲自己報仇的。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有一段對話是很耐人尋味的。甲（是個學生）：「你甚麼出身？」乙：「你呢？」甲：「我紅五類，我爸爸是工人。」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說唯成份論都沒有道理，那麼唯出身論又怎麼能夠存在？

有些人會引用毛主席的話反駁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眞理。地主、資本家他們長期在剝削階級地位中生活，他們的思想就無不打上剝削階級的烙印。因此，他們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須脫胎換骨地改造，這也就是我們「有成份論」的根據。但是對他們的子女，就不能這樣看了。特別是在新社會長大的青年，能說他們是在剝削階級地位中生活嗎？世界上哪有一種沒有剝削的剝削階級呢？沒有這樣的東西。給一個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會。今天的社會是一所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青年人的階級地位，要麼是準備做勞動者，要麼是已經成了勞動者。這時對他們還强調「成份」，那就是要把他們趕到敵對階階中去。

我們必須要划清出身和成份這二者之間不容混淆的界限。誰抹煞了這兩條界限，雖然樣子很「左」，但實際上就是抹煞了階級界限。

2. 出身和表現關係甚小

於是，公允派的同志不談成份了。他們說：「我們既看出身，也看表現（即政治表現）……」

這是「出身即成份論」的翻版。兩相比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沒多大差別。

出身是死的，表現是活的，用死標準和活標準同時衡量一個人，能得出同一個結論嗎？我們在本文第一個問題已經分析過：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個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現的一個因素，而且是一個次要的因素，社會影响才是表現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現根本沒有同一性。究竟一個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壞，只能從實踐中檢驗。這裏所說的實踐，就是一個人的政治表現。表現好

的，影响就好；表現不好的，影响就不好。這和出身毫無牽涉。

退一步說，我們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現不可，那麼請問：出身不好，表現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績？出身好，表現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飾人家的缺點？出身不好，表現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現好，是不是要誇大優點？難道這樣作是有道理的嗎？

「既看出身，也看表現」，實際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現」的泥坑裡去。出身多麼容易看，一翻檔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見面問對方：「你是什麼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眞是又簡單又省事。要看表現是何等麻煩，特別是對那些莫名其妙的懷疑派來說，絕不相信你平時的表現，也不相信你大風大浪中的表現，既懷疑你過去的表現，也懷疑你現在的表現，並準備懷疑你將來的表現，直懷疑你個死而後已，才給你蓋棺論定。終於連他們也懷疑膩了。何如看出身，兩秒鐘能解決大問題。再說，表現這種東西，對於某些人根本就沒有固定的準繩。愛奉承的人，認爲拍馬屁是最好的表現；愛虛僞的人，認爲客套是最好的表現；愛錯誤路綫的人，認爲出身不好的青年終日超經驗的懺悔是最好的表現。哪裡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子平常兒騎牆」三句話就解決問題了。

看一看毛主席怎樣教導我們吧，毛主席說：「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份子的最後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衆相結合。我們在這裡提出了一個標準，我認爲是唯一的標準。」這唯一的標準是出身嗎？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項條件，有出身這一條嗎？

十六條中的第五條是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綫，談到要依靠什麼人，團結什麼人，反對什麼人，有出身這個根據嗎？

革命左派的三個標準，有出身這個標準嗎？沒有！完全沒有！出身好壞與本人革命與否又有什麼關係？即使出身不好，一樣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對象。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賜的團結，不能夠只做人家的外圍。誰是中堅！娘胎裡決定不了。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樣

不承認。革命最堅決的人，就是那些表現最優秀的人。誰也不能說王杰的光輝程度就不及雷鋒。

談到怎樣看表現，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則寓言。他說千里馬常有，但認識千里馬的伯樂不常有。一般人相馬，總是根據母馬、外形、產地、價錢來判斷馬的好壞，偏忘記了讓馬跑一跑，試一試，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這樣就分不出哪一匹馬是千里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這樣嗎？他們只是着眼於出身啦，社會關係啦，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眞正可以做爲根據的表現。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馬，就連普通馬也要變成「狗崽子」了。

我們必須要擺對出身和表現的位置。衡量一個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標準，只有表現才是唯一的標準。你們眞的認爲出身好表現就好，儘可以表現上超過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現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這面大旗當虎皮，拿老子當商標，要人賣賬。我們說你表現不好，比如：頑固堅持反動路綫，不學不用毛主席著作等等就是出身於紅五類中的前三類（革幹、革軍、革烈），也一點沒有用處。

出身、社會關系這些東西只能算是參考。只要把一個青年的政治表現了解清楚了，它們就連參考的價值也沒有了。

3. 出身好壞和保險與否毫無關係

公允派的同志這回換了口氣：「黑五類子女同他們的家長當然不完全一樣子……」言外之意，和紅五類子女當然也不一樣了。爲什麼呢？因爲（這回功利主義這塊法寶來了），因爲：「他們不保險！」

可是，爲什麼不保險呢？「無論如何，他們受過壞影响！」外因決定論者這樣說。且不談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談家庭影响服從社會影响。那麼，是不是家庭影响壞一些，社會影响再好，表現也要壞一些呢？這絕不是代數和的關系，而是辯證的關系。毛主席說：「不破不立」，又說：「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如果不和自己頭腦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作鬥爭，無產階級思想又如何樹立得起來？我們常常形容一些只受過紅一色教育

而沒有經過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爲溫室裏的花朵。他們經不起風浪，容易爲壞人利用。不是這樣嗎？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出身頗令人羨慕的好漢們，後來不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綫，成了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了嗎？他們保險嗎？而領導無產階級偉大革命事業的偉大導師馬克思、列寧、毛主席出身都不好，這個事實也絕不是偶然的。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出身，在於思想改造。

「革幹子弟不想復辟，不會革老子的命。」家庭觀念極重的人這樣說。往往，復辟是在不自覺中進行的。運動中揭出來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凡是近幾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們保險了嗎？後來形「左」實右的工作隊或明文規定、或暗中推行歧視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時，選入革委會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結果大多當了工作隊的反動路綫的推銷員，他們保險了嗎？北京市中學紅衞兵某負責人，他竟有男女秘書各二人、司機一人，此外還有小汽車、摩托車、手表、照相機、錄音機等等，陳伯達同志稱之爲假紅衞兵。可見，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樣不能取消復辟的危險。古代有個女皇名叫武則天，她把大臣上官儀殺了，却把上官儀的女兒留做貼身秘書。有人爲她擔心。她說：「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悅誠服，這有什麼關係？」看看那些反動路綫的執行者，他們懼怕毛澤東思想，不貫徹黨的政策，又怎麼能相信革命的青年？可笑！他們連封建帝王的這點遠見也沒有，還自稱爲「無產階級戰士」呢！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絕不會在接班人的條件中寫上出身這一條的，因爲他的政策最正確，路綫最鮮明，在他領導下，青年也就最保險。否則，縱然如革命勝利後驅逐剝削階級的蘇聯，所有青年出身都不錯，也是不保的。

提倡保險論的人並不少，像樣的理由却沒有。難道這就是「階級觀點」嗎？不像！這是「階級偏見」，它和無產階級無緣，和小資產階級倒挺親近。這些人頭腦裏沒有樹立公字，私有意識濃厚，所以度己度人，沒有不變樣走形的，依照他們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共產主義就永遠不能成功，所以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依照他們

的觀點，父親怎樣，兒子就怎樣，不曉得人的思想是從實踐中產生的，所以他們不是唯物主義者。依照他們觀點，一個人只要爸爸媽媽好，這個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進行艱苦的思想改造思想鬥爭，所以他們不是革命者。他們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們稱自己是「自來紅」，殊不知，「自來紅」是一種餡子糟透了的月餅而已。

我們必須相信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廣大青年，應該首先相信那些表現好的青年。不能用遺傳學說來貶低一部份人抬高一部份人。那樣做，無非是一種拙劣的政治手段，絕沒有任何道理。我們不充許用資產階級的階級偏見代替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當然，任何一個有出息的青年都應該下定決心改造自己。這樣即使影响不好，也能變壞事爲好事，變阻力爲鞭策。如果沒有這種決心，那也就無所謂有好的政治表現，也就不堪設想了。

三、受害問題

有一位首長在一九六一年講過：「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間，不應該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不應該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這是怎麼造成的？

記得運動初期，受害問題首先由一些時髦人物提出來了。隨着大家都說自己受了修正主義集團的迫害。修正主義集團那麼反動，要是自己不但沒受迫害，反而得到寵愛，那還算是革命者嗎？於是譚力夫也說他受害了。經濟上受害嗎？困難時期他大吃荷蘭煉乳；政治上受害嗎？思想那麼反動還入了黨，哪一點像受過委屈的公子哥兒？新改組《北京日報》也大登紅五類出身青年的訴苦文章，說他們是前市委修正主義路綫的受害者。應該說，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爲什麼單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們看看他們受了哪些害。

一、「我們被拒於大學之外，大學爲剝削階級子女大開方便之門」；二、「大學裏出身好的青年功課不好，大受教授白眼」；三、「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幹部」；四、「……」。假使這就算迫害，那麼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報竟然這樣顛倒黑白，那也無怪乎它壽終正寢了。還是讓

事實說話吧！

回想修正主義集團當政之時，每年大學招收完畢，前高教部總發表公告：「本年優先取錄了大批工農子弟、革幹子弟。」不少大學幾乎完全不招收黑五類子女。大學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學校則以設立「工農革幹班」爲榮。難道這就是「爲剝削階級子女大開方便之門」了嗎？上了大學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優待。不少大學設立「貧協」一類組織，與團組織並列。這次運動開展以來，有禁止黑五類子女串連的，有用出身攻擊敢於寫大字報的同學的，有不許出身不好的青年參加各種戰鬥組織的，有借出身挑動羣衆鬥羣衆的……，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樣意外。可見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歷來就是常事。至於說紅五類出身的青年學不好功課，那純粹是對出身好的青年的污蔑。何以見得出身和學習一定成反比呢？中學也如是。根據北京市教育局印發的調查亂班的材料，其中有「搗亂」學生出身調查一項（注意：這裏的「搗亂」和造反沒關係，材料中指的是大攪男女關係，有偷盜行爲的），大都出身很好。有在亂班中別人都鬧他不鬧的，出身反而挺糟。問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別人鬧沒事，我一鬧就有事了。」言話不假，不用說中學，連小學也是如此。有位校長對青年教師說：「有兩個孩子同時說一句反動的話，出身好的是影響問題，出身不好的是本質問題。」不知道是不是前團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學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隊幹部全改選了。近幾年中學的團幹部、班幹部也都是從出身這個角度考慮的。一般教師也許是爲輿論左右，也許是發自肺腑，沒有不對出身好的青年（特別是革幹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況純然是例外。否則早扣你個「沒有階級觀點」的大帽子了。

工廠這種現像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幹部，幾乎無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連先進工作者候選名單上也有出身一欄。有的工廠還規定，出身不好的師傅不許帶徒工，不許操作精密機床。運動初期還有規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選舉權但沒有被選舉權」的。在總結各廠當權派罪狀的時候，所謂招降納叛（即曾經提拔過某個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術幹部），是十分要緊的一條。可想而知，以後的當權派要再敢這麼辦才怪呢！工廠

裏也組織了紅衛兵，出身限制很嚴。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說，只未見只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說。是誰把工人也分成兩派了呢？

農村中這樣的例子更多。修正主義代表人物搞過「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劃分了一下成份。表現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現一般的，是農業勞動者；表現好的，是中農。爲什麼表現好的就是中農呢？不能算貧下中農嗎？那麼，貧下中農子弟出現壞的是不是也要劃成地主、富農呢？表現是出身的結果呢，還是出身是表現的結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財會、保管等各種工作，也不能外調。沒有普及中學教育的農村，能夠上初中的，要教師、貧協、大隊長三結合進行推薦。當然，他們誰肯爲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鍋呢？大隊長介紹說：「這個娃出身好，又聽話，肯幹活，就是他吧！」這樣的，就上初中。

社會上的其他部份也如是。北京街道近兩年改選居民委員會，出身是一個首要條件；連街道辦事處印製的無職青年求業登記表上也有出身這一項。求業表上主要就有兩項，除去出身，還有一項是本人簡歷。自己填寫簡歷，又都是青年，自然情況差不多。用工單位來挑人，沒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不挑，單挑出身壞的，是什麼思想？所以，不被學校錄取而在街道求職的青年，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時候，他們才有被分配的把握。

「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類似的例子，只要是個克服了「階級偏見」的人，都能被我們舉得更多、更典型。那麼，誰是受害者呢？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有什麼區別呢？

「這正是對他們的考驗啊！」收起你的考驗吧！你把人家估計得和他們的家長差不多，想復辟、不保險、太落後，反過來又這樣高地要求人家，以爲他能經受得住這種超人的考驗。看其估計，審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記了馬克思的話嗎？「要求不幸者是完美無缺的」，那夠多麼不道德！

「他們的爸爸壓迫我們的爸爸，所以我們現在對他們不客氣！」何等狹隘的血統觀念！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父親破了產，兒

子只要宣佈放棄繼承權，就可以脫離關係。想不到今天父子關係竟緊密到這個地步了，「左」得多麼可愛啊！

算了！我們不再浪費筆墨駁斥這種毫無見地的議論了。讓我們研究一下產生這種新的種姓制度的根源吧！

這正是修正主義份子一手造成的；那麼，資產階級份子爲什麼要壓迫資產階級出身的子弟呢？這不奇怪嗎？我們說這一點也不奇怪。正因爲這些青年和他們不屬於同一個階級，所以他們才這樣做。而對於實現復辟陰謀，不論是無產階級出身的子弟，還是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子弟，在他們看來，是沒有區別的。或許那些溫室裏的花朵，那些不諳世面而又躺在「自來紅」包袱上的青年對他們更有利一些。特別是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號召以後，這些陰謀家便慌了手脚。當前矛頭指向誰呢？鬥爭的矛頭主要是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他們所包庇的牛鬼蛇神。爲了轉移鬥爭的方向，他們便偷換了概念，本來，父親的成份該是兒子的出身，現在，他們卻把父親的成份當成了兒子的成份。這樣，就在「階級鬥爭」的幌子下，不顧中央指示，一場大規模的迫害，通過有形無形的手段，便密鑼緊鼓地開場了。出身不好的青年便是他們的擋箭牌，而壓迫這些天生的「罪人」則成了他們的掛羊頭、賣狗肉、搗亂視聽的金字招牌！黨中央正確指出了他們推行形「左」實右路綫，這便是其中一個淵源。

他們幹這種勾當，利用的是社會上的舊習慣勢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眞幼稚，特別利用一些高幹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劃在一二三類，因爲革軍、革烈實際也就是革幹，而工農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類了），他們還利用部份中下層幹部的缺點和錯誤，有些幹部所以承認並且推行了這一套反動的政策，在理論上是無知的表現，他們分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論，什麼是小資產階級的唯出身論；在認識上是曖昧的表現，他們分辨不出青年的那些表現是本質的，那些表現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軟弱無力的表現，他們不會給青年人提供表現政治思想的機會，他們不會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當工具，打擊一些人，鼓勵一些人，以推進工作；在政治上是熱情衰退的表現，他們

不願做細緻的調查研究，滿足於用出身當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當頭的表現，他們不敢提拔眞正表現好的人，怕負責任。於是這些東西一起推波助瀾，形成了在我們社會制度下，在我們黨的身邊所絕對不能容忍的現像。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之形成了。而這又是先天的，是無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種族壓迫就是階級壓迫。反動的修正主義份子的這套做法，也正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復辟的前奏。我們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主要還是從右邊抹殺了階級路綫。因爲他們肆意包庇地富反壞右份子，包庇資產階級份子。他們把資產階級權威老爺拉入黨內，給某些五類份子厚祿高薪，和他們大講和平共處，反過來卻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份接班人，這不是一項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又是什麼？

工作隊當政時期，又以極「左」的面目抹殺了階級路綫。在對待出身問題上，與修正主義集團可以稱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將矛盾擴大化、公開化了。殘酷的「連根拔」，極盡侮辱之能事的所謂「辯論」，以及搜身、辱罵、拘留、毆打等嚴重侵犯人權行爲，破壞這一部份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種種手段，剝奪他們政治權利的種種措施，全都以「超毛澤東思想」的面目出現了。迫使這麼多人消沉了，都感到自己是無罪的罪人，低人一等，很見不得人。他們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運動。想革命而又沒有革命的本錢，想造反而又沒有造反的條件，窒殺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熱情！革命隊伍縮小了。這正中了反動路綫的下懷。客觀上起到了包庇鑽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動羣衆鬥羣衆的作用。有理由這樣講，如果不把以前受壓迫最深的這一大部份革命青年徹底解放出來，那麼，這次運動就決不會取得徹底勝利！

同志們，難道還能允許這種現像繼續存在下去嗎？我們不應當立刻起來徹底肅清這一切污泥濁水嗎？不應當塡平這人爲的鴻溝嗎？在反動勢力當政時期，受壓迫的青年不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對抗的工農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們呼籲：一切受反動勢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澤

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你們受資產階級壓迫最深，反抗應該更堅決。在批判他們的時候，你們最有發言權。那些冒牌受害實際上得寵的譚氏人物沒有發言權。依靠他們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們決不是局外人，你們是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別人恩賜，而革命者從來依靠的就是鬥爭！你們應該責無旁貸地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黨的階級路綫。既不容許修正主義集團從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許反動路綫從「左」面攻擊它。你們應該相信自己能夠勝任這一光榮任務！你們也不應該排斥那些沒受壓抑也沒有偏見的青年。你們可以團結他們，共同戰鬥，共同提高。同志們，我們要相信黨，我們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勝利必將屬於我們！

一切受壓抑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

原載《中學文革報》(一九六七年)
北京《四五論壇》第十三期重載

楊曦光

中國向何處去？

註：這是一份徵求意見稿，現在公開發表是否適宜？是否能代表「『極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樣進一步修改？請閱後把意見詳細寫在每頁右邊空白處，請於廿日前將本稿退還發行者。

省無聯一中紅造會網無319兵團「奪軍權」一兵　1968・1・1;

反擊二月逆流的鬪爭到七、八、九月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了「進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縛人們思想的傳統觀念都被拋到一邊去了，但是十月以來出現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義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結束」的階級妥協空氣，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裏了，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和學生，感覺敏銳，首當其衝，於是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爲問題，「極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爲着回答這一嚴肅的問題的。

要正確地回答這一問題，就必須認眞總結一九六七年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所創造的極其豐富的經驗教訓，主要是「一月風暴」和「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創造的具有巨大歷史意義的經驗。

一、科學的預見

當代的中國是世界矛盾的焦點，是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對於中國向何處去這一舉足輕重的重大課題，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毛澤東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預見，當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以雷霆萬鈞之力從東方興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氣吞山河的無產階級偉大胸懷向全世界宣告，全國的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是廿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

，正是這一句話宣告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羣衆中猛烈開展的正式開始，同時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勢」（紅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論）——即類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機構，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華人民公社」的名稱，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後結果，中國將向「中華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當時只發展到很低級的階段，這一歷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幾乎沒有一個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終極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這句話當作一句一般性的讚語而漸漸淡忘了。

文化革命還沒有正式開始時，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實際上已經把這種新的政治結構——「中華人民公社」的內容勾畫出來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寫當成空想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大家都認爲目前把五七指示作爲我們最近的奮鬪目標是不實際的，現在還只有知識青年還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爲實現五七指示而奮鬪，因爲他們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繪的那種不同於現在社會的新的社會才是他們得到解放的社會，但是知識青年中不少人也認爲不久的將來要實現五七指示描繪的那種社會是不實際的，與其說他們是爲實現五七而充滿信心地奮鬪，不如說他們大肆宣揚五七指示只不過是一種對現實不滿而進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學預見在人們腦子裏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這是和階級鬪爭還沒有發展到十分尖銳和高度階段這一事實相符合的。現今的中國由於新的生產力的發展，致使代表新的生產力的階級向代表阻碍歷史前進的生產關係的腐朽階級進行鬪爭，並必然導致社會大革命，新的社會必然在烈火中誕生。這種客觀規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學而不是空想的預見的堅實基礎，而人們現在還沒有認識到這種規律，那當然就會出現科學預見給人們留下了對美好將來的純粹空想的現象！人們認爲中國將和平過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繪的社會去。實際呢？「和平過渡」只不過是「和平演變」的別名，它只會使中國離五七指示描繪的「公社」越來越遠，離蘇聯現社會越來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派的權」就解決了怎

樣向公社過渡的現實途徑——必須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解決政權問題。否則，不談奪權問題，不談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而去空喊實現五七指示，那確實是「烏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命風暴

列寧曾有一句偉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眞正的革命，歸根結底，是階級變動。因此提高羣衆覺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騙羣衆的行爲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這些革命中發生了和正在發生怎樣的階級變動。」讓我們遵照着這一教導來分析一下一月革命中發生的階級變動，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羣衆的行爲。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個最大的現實就是百分之九十的高幹靠邊站了，當時從湖南來看，張平化、章伯森、華國鋒之流的權力小到零，從中央來看，財政部、廣播局等部門紛紛奪權，李先念、陳毅、譚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們的周恩來的權力也大大下降，當時的權力到誰手裏去了呢？到組織起來自己掌管城市、工業、商業、交通等等的（黨政財文大權）充滿着無限熱情的人民手裏去了。社論所號召的「人民羣衆自己起來掌管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自己管理城市、工業、交通、經濟」眞正實現了，一月革命風暴在一個短時期內由官僚們手中轉到了熱情澎湃的工人階級手中。社會忽然發現，沒有官僚自己不但不會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發展得更自由，更快。並不是像官僚們在革命前嚇唬工人們的那樣，「沒有我們，生產會崩潰，社會混亂得一塌糊塗，不可收拾」。實際上沒有了官僚，和官僚機構，生產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鐵道部垮了，運輸照常進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種工作照常進行，而且工人階級的生產熱情，主動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們在一月份後自己管理工廠的情景，眞是令人感動，工人第一次感覺到「不是國家管理我們，而是我們管理國家」。第一次感覺得是爲自己而生產，幹勁從來沒有這麼大，主人翁的責任感從來沒有這麼强，長沙紡織廠等地還創造了造反班等無數新鮮東西。

這就是一月革命中階級變動的眞實內容，這一個短暫時期內

實際部分地區不很徹底的實現了「中華人民公社」的內容，社會處在一種類似巴黎公社的「羣衆專政」的狀況。一月革命風暴告訴人們中國要向着一個沒有官僚的社會去，現在百分之九十的高幹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級，階級鬬爭發展的客觀規律使它們絕大部分，在一月份靠邊站了。百分之九十的高幹在一月革命風暴中靠邊站這決不是「羣衆」的過失，「羣衆是眞正的英雄」，爲惡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懲罰，「罰不當罪的極少」，羣衆揭發出來的事實和爆發的對他們的憤恨初步告訴人們，這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已經完全成爲阻碍歷史前進的一個腐朽的階級，他們與廣大人民的關係已經由領導和被領導變成統治和被統治、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關係變成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紅色」資本家階級的特權和高薪，是建築在廣大人民羣衆受壓抑和剝削的基礎上。要實現「中華人民公社」就必須推翻這個隔級。

一月革命風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領導下推翻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偉大嘗試。第一次無產階級政治大革命的綱領正是在這一偉大時刻被提出來了。毛主席指出：「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這就指出了文化革命不是一場罷官革命，掀人運動，不是單純的文化革命，而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聯繫一月革命風暴的事實，這個被推翻的階級就是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這些單位的奪權鬬爭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在這裏，不能改良主義，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過渡而是必須把它徹底打碎。「徹底打碎舊的剝削制度、修正主義制度、官僚主義機構」。第一次無產階級政治大革命的綱領是以不大具體的萌芽狀態在一月革命風暴的後期被社論提了出來，應推翻的腐化階級，應砸爛的舊的國家機器，甚至人們根本不敢異議的社會問題也被提了出來，這一偉大發展是一月革命風暴中無產階級表現出的勇敢和首創精神的必然結果。

一月革命中觸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針問題主要是合同工、臨時工這種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制度和修正主義的上山下鄉運動。

目前，「極左派」必須組織人好好總結研究一月革命風暴創造的極其豐富的事物，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會的雛形。

三、革命委員會

爲甚麼極力主張「公社」的毛澤東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對「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預見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須實現的政治機構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員會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進，必然要經歷「鬪爭——失敗——再鬪爭——再失敗——再鬪爭——直至勝利」這樣一個長過程。

爲甚麼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還只是第一次進行推翻强大的敵人的嘗試，革命人民對這場革命的認識還是何等膚淺啊！不僅沒有自覺的認識到要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構，觸動一些社會制度，而且連對敵人是一個階級都認識不清，罷官革命，揪人革命論統治着革命隊伍。羣衆的智慧發展，都還沒有達到可能實現社會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實歸根到底是由資本家階級拿去了（共產黨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觸動軍隊，中國既然形成了紅色資本家階級，軍隊當然不能脫離於這現實之外。而一月風暴還根本沒有觸動一切革命的要害問題——軍隊問題，可見革命還是何等的不深入，還是處在何等的低級階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與這種不高級的革命階段相適應的，也是處在一種很不成熟的階段。

在這種不可能徹底勝利的時候，要想立即奪取眞正的勝利，那是左傾冒險主義，遵照資本家階級把革命果實奪取過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級的階段的鬪爭中，鍛鍊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過革命的來潮和退潮，準備奪取最後勝利的力量，這才是正確的戰略方針（如今稱之爲戰略部署），否則，在羣衆沒有眞正認識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國實現「公社」的時候，建立「公社」就會變成徒有其名，而實際上是和現在革委會內容一樣，由資產階級篡權的假「公社」。

因此無產階級的偉大統帥毛澤東同志毫不猶豫地違背了幼稚的革命者關於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採取了正確的戰略方針（即戰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軍隊「支左」的號召。「支左」其實是毛主席進行軍隊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爲了避免直接開展軍隊四大將出現的軍內走資派向無產階級怠工破壞、抵制所造成的損失，就號召軍隊支左，表面上軍隊沒搞四大，實際上讓部隊參加了地方四大的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與其說是支左，還不如說是教育部隊，搞軍內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員會在全國各地逐步建立起來了。

三結合就是革委會的具體內容，三結合的提出，等於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們又重新扶起來，而三結合不可避免的會成爲軍隊和地方官僚起主導作用的資產階級篡權的政權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結合的革委會稱爲「臨時權力機構」，它只是一種過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後成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後結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會。毛主席八九月份總結一月革命和八月國內革命戰爭得出的「羣衆專政」的偉大理論，就證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後決不是官僚和陪襯的羣衆的三結合專政，而是「羣衆專政」。但是如前所述過渡形式是必須的。否認過渡形式是左傾空談主義。

四、二月逆流

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們等不及忙忙篡權了，他們一反常態，採取了最急切的殘酷鎮壓手段，這也從反面證明了一月革命中百分之九十高幹靠邊站這一「財產權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慘狀也證明了毛澤東同志「不能立即勝利」的預見的正確。

「紅色」資本家階級在二、三月幾乎佔了壓倒的優勢，財產（生產資料和權力）從革命人們手中被奪回到官僚們手中，早春二月是龍書金、劉子雲、章伯森、華國鋒以及全國的官僚和他們在中央的代理人權力無限大、那就是他們飛黃騰達的時機，而革命人民的權力下降到「零」，並大批被投入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公檢法控制下的監獄。

中國「紅色」資本家階級目前的總代表——周恩來，在二、三月的勝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圖在全國各地立即建立革委會，如果讓資產階級企圖實現，無產階級的退卻就會退入墳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會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發出了反擊的號令。從此偉大的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開始醞釀。

在反擊二月逆流的鬪爭中革命進入高級階段的重要標誌就是眞正開始觸及軍隊問題。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風暴時對軍隊問題想得很幼稚，認爲只要地方上走資派推翻了，部隊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結合鎭壓走資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實告訴人民，單純自上而下的命令並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圖貫徹到部隊中去，軍隊走資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資派的利益的一致，決定了它不可能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必須自下而上搞軍內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這一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改變官僚控制軍隊所造成的軍民對立狀況。

二月以來的鬪爭把軍隊的嚴重問題擺到了廣大羣衆面前（以前只擺在毛主席少數人面前），這就使依靠廣大人民羣衆的力量來解決這一問題逐漸具備了條件，科學地預見了在「公社」這一新社會中的軍事力量不同於現在的軍隊，二月以來的鬪爭使毛主席的這一思想逐漸掌握了羣衆。

五、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

一月底以來，造反派論述軍隊的文章可謂多矣，過去所發生的全國性大規模武鬪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戰爭這一新階段的開始又使論述軍隊問題的文章增加了「戰爭」、武裝奪取政權的色彩，這是無產階級實行徹底的社會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漸成熟的多麼可喜的現象。

這許多論述軍隊問題的文章由於當時的歷史的局限，因此還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但是這些文章是新事物，會被歷史證明是具有意義的事物。

恩格斯在談到空想社會主義時說得何等好啊！「讓著作界的小販們去一本正經地挑剔現在只能使人發笑的幻想吧，讓他們以自己的嚴謹的思維方式優越於這種瘋狂的念頭而自我陶醉吧。使

我們感到高興的倒是處處突破幻想的外壳而顯露出來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這些卻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

論述軍隊問題文章的精華有兩點：

（一）看到了現在軍隊和解放前的人民軍隊有了變化，解放前的軍隊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軍民關係像魚水一般，解放後由於革命對象從帝官封變成走資派，而這種走資派在軍隊內是當權者，因此一些部隊在革命中不但改變了解放前軍民血肉一般的關係，甚至變成鎮壓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須使軍隊來一個根本的變動，「極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語錄中爲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據，毛主席在同年一同發出軍隊住進營房後，脫離羣衆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戰勝武裝的紅色資本家階級，必須經過國內革命戰爭，八月份無產階級和紅色資本家階級的大規模武鬪和局部國內革命戰爭證實了他們在八月份的預見，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創造的經驗更是史無前例和豐富偉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歷史竟是按着「異端邪說」所預見的方向發展。不可想像的大規模搶槍事件隨着歷史發展的步伐合乎規律出現了，不同規模的軍隊直接參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軍隊直接打）的局部國內戰爭爆發了！人民在八月爆發出的創造精神和革命熱情更是使人感動之至。搶槍成爲「運動」所表現出的規模之大，革命戰爭的威武雄壯，在那一瞬間給人一個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城市在一個短時期內處在一種「武裝的羣衆專政」的狀況，大部份工業、商業、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權又從章伯森、華國鋒、龍書金、劉子雲之流手中轉到了武裝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從來沒有像八月那樣以創造世界歷史主人翁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小學生自動充當交通警衛工作，指揮車輛的英姿，湘江風雷、紅中會等羣衆組織直接控制部份財經大權的自豪，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羣衆組織的權力迅速增長的時候，官僚們的權力又降到了「零」，第二次短暫的不穩定的「財產和權力」再分配出現了，社會又一次實現偉大的「中華人民公社」的嘗試，人們

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工人、農民、學生都要學習軍事」的問題進行了解決的嘗試。一月革命是沒有這個嘗試的。軍隊在解放前就是一個把軍學、軍民、軍農、軍工兼起來的與羣衆關係極好的一個大學校，這點毛主席在民主革命勝利的前一刻就總結了，爲甚麼解放後十幾年又重新提出「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搞好軍民關係的問題呢？如前一節所述，是因解放後軍隊起了變化，不同程度地脫離了羣衆，因而這個問題自然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八月風暴偉大的創舉就是一個由革命人民自己組織的武裝力量的出現，這種力量成爲無產階級專政（專走資派的政）的事實力量。他們與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爲推翻「紅色」資本家階級而鬬爭的，而軍區這一官僚機構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嘆反而歡呼起來。不像以前那樣以爲沒有他就不行，這一事實又使無產階級能夠比較實際地預見中國的軍隊向何處去？預見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的武裝力量的情景，可以斷言，中國將是個一個軍就是民，民就是軍，軍民打成一片，軍隊擺脫官僚控制的社會去。如果說一月風暴提出了第一次無產階級政治大革命綱領的話，八月風暴就不但充實豐富了這個綱領，而且解決了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且靠武裝奪取政權，靠國內革命戰爭。

六、九月的轉折

正在人們歡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慚地談論着「徹底勝利」的時候，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看到了地平線上的新危險。讓我們來看看這種危險的內容吧！一方面，由於「二月鎮反」的露骨，所以「紅色」資本家階級失利的必然性連他們自己也敏銳地感覺到了，從五月份起，中國的「紅色」資本家們就改變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現了一般幹部「亮相」風。東北的宋任窮，湖南的章伯森，一個又一個的紅色資本家，過去騎在人民頭上的吸血鬼，忽然對奴隸的革命鬬爭表示出「熱情」，他們分別亮相支持砲轟軍區的革命羣衆，由於這時革命人民沒有把走資派當作一個階級去推翻，揪人革命論、罷官革命論仍舊統治着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認爲文化革命是清洗單個走資派，利用一部

份革命領導幹部（即官僚）去打擊另一部份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這一手就容易地騙取人民的信任，這就決定了資產階級篡奪八月風暴的勝利果實是必然的這一客觀規律。同時，二月以來由於資產階級的匆促鎮壓和無產階級的迅速反擊使向「公社」過渡的中途時期——革委會的專政實際上還沒有開始，而沒有一個過渡時期來讓騙取人民信任的「紅色」資本家來鎮壓人民，使人民在血的事實中認識到走資派是一個階級，因而接受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綱領、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那徹底的社會革命就不能實現。

另一方面，要實現五七指示實現軍隊變動的要求就要把野戰軍內的文化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讓野戰軍「支左」，實際上搞野戰軍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沒有開展野戰軍內的全面「支左」前，要求立即勝利是左傾盲動。

還有，農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問題。農村如果不來一個革命的風暴，那任何一種「奪權」都不可能眞正代表農民的利益。五七指示所描繪的工廠辦農場，農村辦工廠就預示着在新的公社中工農、城市差別要比現在小得多，而這種縮小就要發動農民運動，靠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這一歷史前進的火車頭來實現，在農民運動沒有起來時就要求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這也是空談。徹底勝利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馬列主義者的任務就是完整「徹底勝利」的叫喊的虛僞性。如果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有大權在手的話，就必須利用權力禁止人們叫嚷、煽動「立即推翻革委會建立公社」以「公社」這一光輝的名字被名不符其實的現象沾污。同時黨內軍內的資本主義官僚階級，在八、九月份開始大舉向中央文革怠工和進行破壞，他們故意製造軍隊的混亂造成經濟等方面的停滯。一個軍隊高幹向中央文革的公開狂妄叫囂，就是他們的八九月份的總方針，「中央文革還要不要解放軍，不要我們就打起被包回鄉去。」「中央文革把軍隊老幹部調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在這一系列情況下，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極大的發展，有很大的出路可以退卻而不至於退入墳墓時，同時又不可能立刻取得徹底勝利的情況下，爲了鞏固已得的成就，穩定資產階級，不致使他們狗急跳牆，英明的統帥毛澤

東同志又一次不顧性急的革命者要求勝利的幻想，在九月以後作了大幅度的退卻，資產階級篡權的政治形勢——革委會或革籌小組建立了，向公社過渡時期——革委會統治時期按照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眞正開始了。

這次退卻的幅度之大是空前的，九月份以來幹部政策無限放寬，實際上是向走資派的一個大幅度的讓步，讓他們上台，具體的突出表現就是對陳再道的處理，主席甚至說他學習得好，可以出來工作。

但是由於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這次退卻沒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卻所造成的「潰退」，資產階級這次不能像三月那樣幾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轟周恩來的革命力量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還成立了省無聯，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發展。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力量成長壯大的證明。

革委會中的資產階級要篡奪無產階級在八月份的勝利果實，由「羣衆專政」又重新變爲官僚主義統治，首先就須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工人階級手中的槍枝是使工人權力無限增大，對資產階級致命威脅，對工人掌握槍枝的恐懼心理。革命人民出自自發的對官僚們的篡奪勝利果實的仇恨，喊出響亮的革命口號：「交槍等於自殺」並形成了一個自發的全國的爲武裝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羣衆性「藏槍運動」。

八月的搶槍運動是偉大的，它不僅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空前而且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變成事實，文化革命前官僚們不敢把槍枝眞正交給人民，民兵不過是官僚控制武裝力量的一種裝飾物，它決不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武裝而是官僚手中馴服的工具。而搶槍運動，羣衆第一次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賜，而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從官僚手中奪取了槍枝，這是工人第一次掌握的「自己的」槍枝。毛主席「武裝左派」的令人興奮號召就是工人階級這一勇敢的高度集中，然而九五命令的下達又使「武裝左派」變成一紙空文，工人階級的武裝被解除了，官僚們又重新復辟。

七、無產階級在政治思想的啓蒙

一九六七年七一社論提出了黨的建設的問題。七八月份，在

激烈階級鬪爭中，極少數的「極左派」提出了「極左派應有自己的政黨」的要求。需要革命政黨的基層組織來實現毛澤東同志的共產黨的領導，以帶動人民推翻新生的資產階級，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務。就這樣由運動初期北京個別知識份子重建馬列主義小組的空想，第一次變成了戰鬪的無產階級實際的越來越强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

階級鬪爭幾個月以來進入了比較高級的階段，這個階段是一個甚麼樣的階段呢？這個階段，革命人民已經積累了兩次「財產權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綱領，在中國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資產階級，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還有八月風暴提出的逐步實現軍隊的革命變動。武裝奪取政權的方法，九月以後的反覆和較高級的鬪爭還告訴革命人民，爲甚麼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沒有取得徹底勝利，爲甚麼搞了這麼久革命勝利果實終究被資產階級官僚拿走了，到處是一片復舊的景象。資產階級又重新奪回了八月份喪失的財產和權力。一月革命、八月風暴中無產階級表現的勇敢首創精神幾乎被磨滅和吞沒，大規模逆流的出現告訴了人們，一切對資產階級官僚的幻想，對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須徹底拋棄，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必須實行。

但是革命委員會是「罷官革命」的產物，湖南罷了張平化、劉子雲的官，並沒有消除新的資產階級與人民大衆的尖銳對立，而是新的形勢使革籌小組和省無聯所代表的人民大衆的尖銳對立表現出來，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又出現了。徹底穩定的「財產權力分配」並沒有實現。罷官革命只不過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這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統治，透迤曲折變爲資產階級官僚和幾個脫襯的羣衆組織代表人物的另一種資產階級的統治，而革命委員會就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

光罷幾個人的官還是不能夠解決問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行不通，改良主義的結果——革委會或革籌小組，又實行新的資產階級專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龍江、山東、上海、貴

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或革籌小組的地方，就證明了或正在證明着這個教訓，中國不能向革委會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方向去，那是資本主義復辟。中國只能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華人民公社」的徹底革命的社會主義方向去。

要使人民懂得這眞理自己下決心來幹，而不是我們替人民下這個決心。「忽視反面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因爲「反資本鬪爭中的種種事件和變遷——而且失敗比勝利更甚——不能不使人們認識到他們的各種心愛的萬應靈丹毫不中用，並使他們更透徹地了解到工人階級解放的眞實條件。」（恩格斯）革命往往要實行各種改良主義的不徹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種萬應靈丹行不通時，革命人民才會下決心走那條最痛苦的破壞性最大但也是最徹底的眞正革命的路。革委會這一過渡時期的鬪爭必然會使人民大衆對心愛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萬應靈丹徹底拋掉幻想，毛主席說：「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去丟菩薩。」革命人民，不久的將來必然會用自己鐵的手腕，把自己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新生的紅色政權捏得粉碎。九月份以來的鬪爭的階段就是在這一點上教育着人民的新生的階段。

由於鬪爭實踐有了豐富的經驗和進入了高級階段，中國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成熟過程也進入了高級階段，新思潮（被敵人罵成「極左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廢除官僚機構」，「徹底砸爛國家機器」等等道理，以敵人眼中的「幽靈」的姿態在革命人民中徘徊，革命羣衆奪取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大革命的徹底勝利的政治思想武器，開始以新的狀態在「極左派」中出現。在中國進行新的社會革命的毛澤東思想，將逐步使羣衆從過去各種矛盾中醒過來，革命人民在實踐中逐步開始懂得爲甚麼要革命，革誰的命，怎樣革命，革命鬪爭開始由自發進入自覺，從必然進入自由。

九月以來的鬪爭的高級階段還出現了如火如荼的知識青年運動的高級階段和合同工、臨時工的新的鬪爭，這對於處於啓蒙階段的「模糊思想」來說，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它吸收了這一部

份堅決的革命力量對馬列主義毛澤東主義的自發強烈要求，對於中國社會矛盾的深刻的了解，填補了青年知識分子和學生中「新思潮」的對社會矛盾極不了解脫離實際的缺陷。

當革命人民由盲目進入政治思想上的啓蒙階段時，當毛澤東主義在羣衆中形成獨立的鮮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勢力開始逐漸變成事實，毛澤東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的組織和建立就被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毛澤東同志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在新的歷史中重新組織階級隊伍的建黨原則「黨組織應該是無產階級先進份子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羣衆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鬪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一領導人民大衆推翻今天的階級敵人新的紅色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毛澤東主義黨（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原則的提出，證明要完成第一次眞正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建設成五七指示所描繪的「公社」，原有的中國共產黨就必須來一個革命性的變動。而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預計不能徹底解決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這一問題，按現中央發佈的恢復、整頓、重建黨組織的規定所出現的政黨（如果能夠出現的話）必然是爲革委會中篡權的資產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九大的召開只不過是地方「革委會」這種過渡時期在中央的一種反映，這就決定了「九大」不可能徹底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核心是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向何處去的問題）。

當眞正的穩固的勝利逐漸成爲可能的時候，如下幾個問題就提到突出的地位來了。

一、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奪取眞正徹底的勝利，推翻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革委會的統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權的可能性就成爲革命能否迅速深入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不像在前一段是盲目的自發階段，不平衡性對於革命的發展起舉足輕重的作用那樣。

二、眞正要推翻新貴族的統治和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就必然要觸及到十七年怎麼評價的問題，這也就是從根本上教育人民爲甚麼要搞文化大革命、終極目的是甚麼的大課題。

三、眞正要使革命勝利，就是要解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

是我們的朋友，」這一「革命的首要問題」，就是要對發生了「階級大變動的新動態」的中國社會重新進行階級分析，以重新組織階級隊伍，團結朋友，打倒敵人。

這一系列新問題都由江青同志這個講話宣佈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新階段的開始，這個重要講話雖然講的是文藝界，但「文藝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導」，中國文藝界欣欣向榮、如火如荼的鬪爭就是中國革命將要走的方向，江青同志的講話實際上告訴我們，前一段革命不論揪鬪工作組批判反動路線或是反擊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搞文化革命中的問題，是搞庇護十七年的五十天的問題，是剛把資產階級護身符搞了一下，眞正的革命，搞十七年的革命基本上未開始，目前應該進入到觸到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的階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關係，重新組織階級隊伍（階級隊伍的先鋒就是革命政黨）的指示和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指示具體的指明了中國向何處去，湖南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要朝着把第一次眞正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方向，決不能朝着收場、資本主義復辟的方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二日講話當中總結了一年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大大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實際上指明了偉大的十一月十二日講話，十月二十四日指示是我們一九六八年全年進行革命鬪爭的唯一總方針。

對於江青同志偉大的十一月十二日講話中談到的三個問題，我們以後將另外具體闡述（第三個問題包括中國共產黨的重新組合問題）。

十月二十四日指示等於宣佈湖南成爲全國革命鬪爭的先鋒地區，而湖南省無聯的產生發展，就成爲九月以來無產階級成長壯大的突出代表。省無聯實際上是積累了一月革命風暴羣衆專政的形式——文攻武衛指揮部（民辦的）的經驗而產生的，它是一個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級的羣衆專政權力機構，它相當於蘇聯一月革命被資產階級篡奪時期的蘇維埃，而省革籌又相當於當時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省無聯與省革籌的對立，這就是新的「兩系政權並存」的局面，而實際權力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省革籌手裏。

省無聯是可以和蘇維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雛形。不管資產階級怎樣交替使用鎮壓和慫恿第三勢力活動的改良主義手法，省無聯這一眞正的新生紅色政權，必定會在大風大浪中不斷成長和壯大。

八、駁反動的「二次革命論」

目前對於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嚴肅問題的回答，在思想佔統治地位的是反動的「二次革命論」，人們的思想混亂到極點，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這個樣子，只能等待第二次革命了」。大革命失敗後，公開的軍閥割據變成「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的統治時期，爲了維護這種統治使它免於死亡，陳獨秀的反動的「二次革命」就應運而生了。「二次革命論」用政權表面上的變動欺騙人民說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掌了權，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了，只能等待社會主義革命了。這種反動的思潮當時不但在全國的思想界佔統治地位，甚至在共產黨內也有相當大的市場，但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帝官封與人民大衆的矛盾所規定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解決，所以儘管有貌似强大的二次革命風行一時，但是人民反帝反封建更加猛烈和深入進行，仍然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同樣，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務，是由引起這次革命的社會矛盾所規定的。這些社會矛盾所要規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綱領不實現，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結束。如前幾節所述，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衆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和尖銳化就決定了社會需要一個較徹底的變動，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會——「中華人民公社」，這也是就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綱領和終極目的。

目前，中國社會的這個基本矛盾是否解決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否達到了呢？

如前所述，政權形式表面上有了變動，由舊省委、舊軍區變成「革委會」或「革籌小組」，但是「新政權」仍然是舊官僚在

裏面起主要作用，舊省委與舊軍區與廣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軍內走資派與廣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沒有解決，新官僚資產階級與人民大衆的矛盾根本沒有解決，只是以省無聯和「新政權」的矛盾這種的表現形式出現。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必須實現的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必然實現的軍隊的變動，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會變動都沒有實現，當然這種「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命和八月風暴中都局部和暫時的實現過，但是，一月革命和八月風暴都基本上被資產階級篡奪了果實（勝利果實），社會改革終於流產，社會改變沒有鞏固和徹底的實現，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並沒有到，正如羣衆所說的一樣：「搞了半天還是老樣子」。

引起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基本社會矛盾，既然沒有解決，而是以新形式發展得越來越尖銳，因此雖然有貌似强大的反動的「二次革命論」統治着思想界，用政權形式的表面變動欺騙羣衆，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和猛烈地向前發展，仍然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篡權的資產階級想以二次革命論腐蝕革命人民的反抗，誰支持他們統治的陰謀必然破產，正如陳獨秀的「二次革命」救不了蔣家王朝的命一樣，也如强大的宗教思想的統治不可阻擋封建主義經濟基礎的瓦解和崩潰一樣，新思潮（極左思潮）雖然目前還不成熟和十分弱小，但是它打敗貌似强大的傳統觀念和腐朽僵化的二次革命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資產階級總是把他們統治的政權形式，描繪成爲全體人民服務的世界上完美無缺的東西，新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依附他們的小資產階級右派的猪狗們如今正是這樣抽掉「革委會」的臨時二字肉麻地吹捧，馬列主義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革委會鎮壓革命人民的本質，必須大力宣揚中華人民公社才是我們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這次文化革命必須實現的社會，必須大力宣揚革委會必然崩潰的趨勢。

反動的「二次革命論」表現爲形形色色的具體表現形式，有陳伯達同志早就批駁過的「新階段論」，「左派轉化論」，有露骨的還原論和收場論，還有盛行一時的文化革命第三年收場的謬

論等等，江青十一月十二日指示，林彪同志十月二十四日指示，就給反動的「二次革命論」迎頭痛擊。有些人指責我們想一步達到共產主義，想立即消滅階級和三大差別，說毛主席預見的巴黎公社的政權形式是空想，他們說，在共產主義實現之前，這一切都是不現實的。這些人是故意歪曲，我們決不是想立即消滅階級，消滅資產階級法權，消滅三大差別，這在共產主義實現之前，確實是不可能實現的。那只能作爲我們最高綱領，而不是最低綱領。我們的最低綱領是要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縮小三大差別，當然不可能消滅剝削階級。不可避免地在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以後，又會產生新的階級變動，正是那種新的階級變動又引起新的社會改革這樣推動歷史向前發展。

正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國的統治，而並不可能消滅新的剝削者產生的可能一樣。

這樣指責我們的人們無非是說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社會不可能發生新的飛躍，財產和權力不可能「再分配」，只能來點改變。健忘的先生，一月革命和八月風暴已經創造出的（儘管是暫時的和局部的）「財產和權力再分配」和整個社會質的飛躍，不是早就把你們散佈的灰色的取消主義論調撕得粉碎了嗎？

由於無產階級的幹部在政治上還沒有成熟起來，革命人民還沒有自然地產生具有眞正無產階級權威的幹部，因此所有的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聲討我們要把一切幹部靠邊站，說我們不要幹部，這是由於目前不少人對官僚還存在幻想的原因。他們沒有把一月革命，八月風暴的感性知識提高，他們還是以爲沒有官僚，社會將要「崩潰」。我們確實認爲百分之九十的高幹要靠邊站，最多只能作爲教育團結的對象。因爲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具有獨特的「自己的利益」的腐朽階級，他們與人民的關係，已從過去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變成剝削和被剝削、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他們大多數自覺或不自覺嚮往資本主義道路，保護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這個階級的統治已經完全阻碍歷史的發展，是不是可以不推翻這個階級而勸說他們放棄高薪等資產階級法權的既得利益，由走資本主義道路變爲走社會主義道路呢？無產階級確實一直在這方面努力，毛主席向資產階級一次又一次的大幅度退卻，

就是這種努力的集中表現，但是他們一次比一次瘋狂的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斷頭台，這一切都證明了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腐朽的階級會願意自動退出歷史舞台。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會中，這個階級將被推翻，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風暴出乎庸人預料的巨大的變動以鐵的事實證實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這個腐朽階級的鬪爭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眞正無產階級權威的幹部，他們是公社的一員，沒有特權，在經濟上與一般羣衆一樣的待遇，可以隨時根據羣衆的要求撤換。這些新的有權威的幹部還沒有出現。

但是必然隨着革命人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斷提高而自然產生，是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結果。

九、駁「左」傾一次革命論

革命隊伍一些幼稚的革命者提出文化革命沒有一次兩次之分，要一直搞到共產主義的思想就是這種「左」傾的一次革命論。有這種思想的人很少，他們的缺陷是政治水平不高，毛主席關於過渡時期，將分成不同的歷史階級的理論就是對他們的最好開導，革命還是分階段的，我們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階段革命論者。

「左」傾一次革命論者沒有提出第一次眞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因此，他實際是降低了我們現階段的任務，使革命人民能爲完成這一階段能實現的目標充滿信心地去鬪爭，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須糾正。中國向何處去，也決定着世界向何處去。

中國必然向「中華人民公社」的新社會去。

把革委會專政當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終目的，中國必然會走向蘇聯已經走的那條道路，人民又會回到資本主義的法西斯血腥統治下，革委會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

因爲今天的時代，是毛澤東主義的偉大旗幟的時代，是帝國主義走下坡路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上坡路、走向全世界勝利的偉大時代。今天的世界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世界。在這場具有空前偉大意義的偉大革命時期，在這一瀉千里的時代「必將在人類歷史上出現許多目前人們意料不到，但又完全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奇蹟。」（陳伯達，三月二十四日）

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人民的勝利和新官僚資產階級的滅亡，同樣是不可避免的。革委會被推翻，「中華人民公社」誕生這一震撼世界歷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節日必定到來。

「極左派」公社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我們公開宣佈：我們建立「中華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會的資產階級專政和修正主義制度才能達到。讓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在震撼世界的眞正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試看明日之中國，必是「公社」的天下！

毛澤東主義萬歲！

轉載自廣州《廣印紅旗》第五期（一九六八年三月）

第三部份　「批林批孔」時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等一伙竊乘三叉戟飛機叛逃蘇聯，在外蒙墜機身亡。曾經一度成爲偉大領袖接班人的林彪（連黨章也明文規定了）及其支持者立即遭受清算，旋即在全黨全國範圍內也開展了「批林整風」運動，林彪及其依附者成爲劉少奇後另一個作爲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批林整風」作爲一個對林彪這樣一個叛國身亡的「陰謀家」、「野心家」的批判運動，在官方的指道下，除了揭發、暴露林彪及其黨羽生前的生活作風、個人品質、陰謀行爲及無情地對其過往歷史所作所爲不分黑白混淆是非地鞭撻之外，便是千方百計地迫使它服從「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所以，林彪的「反革命陰謀」便成爲當時强調階級鬥爭等錯誤傾向的强而有力的藉口。在官方的擺弄下，「批林整風」根本不能起徹底地批判林彪及其思想體現的作用，不能扭轉林彪時期的過份强調階級鬥爭傾向及泛政治化成份。於是，「批林整風」只能是表面批林，而實質是貫徹林彪時期政策的運動。

然而，在文革激蕩中受到冲擊而開始反省思索的青年們卻不是單純站在官方的立場去回應「批林整風」的，在深刻的思索與體驗中，他們逐漸看清了要批的不僅是林彪和其體系本身，而要探究其賴以存在、橫行的制度本身及得以發展至禍國殃民的原因。廣州「李一哲」在街頭貼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登時猶如一枚炸彈在社會中爆開，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另外南京的徐水良、雲南的陳爾晉也深入、有見地地討論了批林及其引起之一連串問題。

但是，由於「李一哲」等觸及到當時政權存在的根本或提出了與官方迥異的意見和觀點，他們都遭受了無情的揪鬥，後期更被擲進牢獄。

李一哲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

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張貼序言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問題
（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
（三）關於林彪體系
（四）關於批林以來的形勢
（五）談反潮流
（六）對四屆人大的希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張貼序言

去年八月以後，人們以爲很快就會召開的四屆人大至今終於還沒有召開，但是我們獻給它的這篇文章，卻被認爲是我們的「體系」了。

我們在這篇文章裏初步批判了林彪體系，後來的文章繼續了批判，殊不料，我們的一些朋友卻把「體系」作爲一種嚇人的東西贈給了我們，也許我們在這一批判中涉及領域之廣闊，自我暴露之全面，眞的夠得上一個「體系」了。但是，這種體系——即使我們也可承認我們具有某種體系的話，也決不是異端於馬克思主義體系之外的東西，我們只不過是企圖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去對林彪體系影響、禍害所及的範圍作一番認眞的清理罷了。實際上我們還遠沒有做到這一點。

林彪體系的新暴露與我們一年前對它的評論沒有發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們驚奇的倒是在許多方面得到了證實。這次街頭

張貼的（第三稿）前五部分只作了少量修改，對於第六部分——即關於對人大的希望和對法制的建議，隨着一年來形勢發展，我們不滿意原來的寫法了，認爲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闡述，所以重新寫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簡略提及，有待發揮和新牽連進來的問題，我們想在這篇序言裏說一說。

*　　*　　*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嚇人，首先是我們討論的這個題目本身。

據說，稍微有一點馬列主義常識的人是不會討論甚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我們算是連一點馬列主義常識也沒有的，但是，我們卻知道六十年代以來世界上的幾件事情：一是多數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復辟了，一百多個黨大多數不信馬列了；二是在我們中國出現了曾經並且至今還爲許多人很不理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三是毛澤東同志總結了半個世紀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提出了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我們必須全文抄錄在這裏：「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鬬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鬬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鬬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鬬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於是，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制度是要改善的，它並非盡善盡美，它在那麼多國家打不過新資產階級，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和在中國必須進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實就是明證。無產階級必須在今後這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進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會主義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幾點，不算馬列主義常識。然而，我們卻可以據此斷言，社會主義各方面的問題，其中也包括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問題，完全可以而且應該討論的。「異端邪說」有甚麼可怕？眞

理是同謬誤作鬬爭中發展起來的。

列寧說得好：「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相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該在各個方面把這個科學向前推進。」（引自列寧全集第四卷一八七頁）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爲我們在一年以前的這篇文章裏根據嚴酷的階級鬬爭事實和基本路線的啓示，提出了新生的資產階級，新的資產階級佔有方式以及同他們作鬬爭的問題。

正當我們的文章對於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的闡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評的時候，一個處於享有各種特權的階層中的青年以賈寶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氣叛逆了出來。雖然鍾志民學生退伍的行動不過是李慶霖憤怒的呼喊，在特權階層中引起的微弱的回聲，但是在人民羣衆中這個回聲卻引起了連鎖般的震動了。這一叛逆行動嚇壞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齒痛恨，有人衷心歡迎。這些互不相同的反響，不正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階級關係的變動和新的階級矛盾狀況嗎？

新的資產階級佔有方式的本質就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條件下，「化公爲私」，當國家或事業的領導人將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實行再分配的時候，他便在實際上對這部分財產和權力實行了新的資產階級私人佔有。

這種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實行財產和權力再分配，主要表現兩個方面：

常見的是某些領導者將黨和人民給予的必要特殊照顧膨脹起來，變爲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地蔭及到家族、親友乃至實行特權的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經濟上實際的世襲地位，並且圍繞着他們的私利，改變事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實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扶植起一批特殊於人民利益並與人民利益相對立的「新貴」集團和勢力來。

更重要的是，他們爲了維護已得的特權和爭取更多的特權，他們必然要打擊堅持原則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鎮壓起來反對他們

特權的人民羣衆，非法地剝奪這些同志和羣衆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

這樣他們便完成了「人民公僕」向「人民的主人」的質的轉變，成爲我們稱之爲「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人們了。我們在本文裏提的「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基礎是從特權中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就是這個意思。

按照基本路線所警告我們的，在今後幾百年內，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產生，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承認不承認這個新生資產階級（以黨內走資派爲代表）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這點，乃是當前無產階級革命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分水嶺，是肯定或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題。你今天不承認，可以，因爲有錢守維、黃國忠們幫忙，還有蔣匪幫經常派人來。廿年不承認，也許可以，勉强維持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後又怎麼辦呢？總歸還是要承認的。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嚇人，第三，是我們斷言：「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沒有完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因爲它並沒有使人民羣衆牢牢掌握廣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這豈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嗎？這樣的斷言有甚麼根據呢？

當我們再次面對這篇文章的時候，廣東的革命羣衆運動又一次興起半年之久了，很有意思的是，作爲它的序幕和武漢幾乎一樣，撕大字報和貼大字報的鬬爭。

在外國人眼裏看來，中國是完全不應該有這樣的鬬爭的。當埃塞俄比亞皇宮前面出現貼在牆上用大字寫成的傳單時，西方通訊社毫不猶豫地把它稱之爲「中國式的大字報」。

可是，「中國式的大字報」在中國卻遭到了災難，前幾年不說，今年五月，廣州市委組織的「政治市容清掃隊」已經裝備好水龍頭和掃把，隨時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現的大字報清除乾淨。如果說他們終於沒有清除乾淨，這只是因爲前仆後繼的大字報的不斷湧現罷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還在繼續嗎？誰曾經宣佈過大字報使命的完結呢？毛主席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裏關於大字報「應當永遠使用下去」的那段論述不也是「最高指示」，應當「

堅決執行」「堅決照辦」的嗎？可是當被鎮壓下去的革命羣衆從地下爬起來，企圖繼續運用這個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線，並爲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而鬪爭的時候，他們卻首先要爲自己本來已有的民主權利本身作一番苦戰哩！正當廣州街頭貼——撕——貼大字報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十八號文件下來了，毛主席又一次地爲大字報表了態。在林彪路線淫威下，萬馬齊瘖幾年之後，大字報重新被宣佈爲合法，十八號文件的深遠意義，至今還沒有完全向人們展示出來，但人們要是看不到這一點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社會主義社會人民的權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而十八號文件正是爲這種人民的管理權和批評權開闢了一個廣闊的天地。即使人們對這場革命羣衆運動再次興起原來所抱的期望絕大部份沒有達到，他們獲得了十八號文件本身便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如果說，我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沒有完成任務」的結論爲時過早，我們是樂於承認的，因爲現在在大革命第八個年頭結束的時候，人民羣衆絕對的無條件的使用大字報這個廣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權利，畢竟由歷史性的十八號文件確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認文化大革命進入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說了話，也是沒有人承認的，這其中不是包含了複雜的內容嗎？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嚇人，第四是因爲我們提出了「林彪體系」，並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確立的事實。甚麼是「體系」？就是事物有聯屬關係的全體——全部系統。林彪體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論、綱領、路線、方針、政策、辦法、黨風、學風、文風、作風，在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領域對抗黨中央、毛主席，禍害人民、流毒全國的東西。六年前，林彪那一整套「體系」的確立，無疑破壞了甚至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與中國人民的矛盾激化到絕對不可調和的表現）以後，才開始顯著地逐步破壞、拋棄林彪那一套，歷史事實難道不是這樣麼？

我們不妨回憶一下林彪體系「鼎盛」時期的情景吧！

我們沒有忘記代替一切，獎懶罰勤的突出（空頭）政治，念經式的「天天讀」，越搞越虛僞的「講用」，越鬧越荒謬的「靈

魂深處爆發革命」，鼓勵政治投機的「表忠」，不倫不類的「忠字舞」，不勝煩瑣的忠孝禮儀——早祈禱、晚贖罪、集會、集隊、上下交接班、買賣東西、寫信、打電話，甚至吃飯等等，都塗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氣氛。總之，讓忠字佔領百分之百的時間，百分之百的空間，而這個「好」那個「好」的運動，則是「左！左！左！」的比賽，「最……最……最……」的競爭，不計其數「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實際上是假、惡、醜行徑的博覽，「一本萬利」的賭場。

我們也沒有忘記那損害工農羣衆基本利益的「公產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黨風，鼓吹「有用就是眞理」「立竿見影」的學風，提倡講假話的「新八股文風」，「小節無害」論所鼓勵的腐敗惡棍的作風，以及「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

我們更沒有忘記那些公式化的階級鬪爭「說教」、「渣滓洞」式的牛欄比之歷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屠殺——僅廣東一省被殺害的革命羣衆、幹部就近四萬人，被關、管、鬪的革命幹部、羣衆上百萬人。

然而，有人卻閉眼不承認林彪體系曾經確立的這個有八億人見證的事實，厚着面皮硬說「時時處處」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佔統治地位，這豈不是等於說，血腥的屠殺，長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線」決定的麼？

如果不曾有林彪體系的確立，爲甚麼落實政策的號召發出五年多，經過三十次申、五十次令，才落實到賀龍同志那裏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體系的確立，爲甚麼會發生「廬山大笑話」呢？

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發誓不讓被他們打下去的共產黨人再從地上爬起來。爲此，他們找到訣竅，就是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對他們危害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壞頭頭」、「五、一六」、「現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長期監禁、肆意虐待。到甚麼也打不成的時候，就把本來很清楚的問題，弄得似乎永遠也搞不清楚，以此藉口，長期掛着，等待時機，捲土重來，難道大量的事實不正是這樣麼？

林彪體系的產生，乃是中國社會的歷史條件決定的。

我們中國是直接從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脫胎進入到社會主義的，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使它的意識形態根深蒂固。不僅在舊民主主義時期，而且在新民主主義時期，都沒有給予摧毀性的打擊。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深中於群衆乃至於一般共產黨員的頭腦之中，難道不是這種情況才提供了林彪體系以風靡一時的條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麼？難道不是這種情況，使得林彪黨徒在其勢力所及之處，以鎮壓人民民主來宣告「全面勝利」的麼？

我們說林彪體系，我們同時還指出「天才史觀則是其理論綱領」即思想上的綱領。爲甚麼呢？幾百、幾千年出現了一個「天才」，無限崇拜「天才」，絕對忠於「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辦事，誰反對「天才」就打倒誰，這不是一條極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線麼？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任何一個問題「問一個爲甚麼」，「天才史觀」簡直取消了八億個大腦。

現在，人們看得很清楚了，他們從天才史觀出發，搞了那麼一套「體系」，這是一套現代的「禮」。他們就是拿了這一套「禮」來「治」黨、「治」國、「治」軍的，這就必然把我們的黨「治」成君臣父子黨，把我們的國家「治」成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的國家，把我們軍隊「治」成袁世凱北洋軍那樣的軍隊。可不是麼？林彪在北京有他的馮、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軍，那些「大將」、「督軍」除了沒有來得及帶兵打到北京以外，別的幾乎樣樣他們都幹出來了。

人們會問：既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完成其自身任務反而曾經確立了林彪體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有甚麼積極成果可言呢？

我們回答說：不！我們說林彪體系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得到了確立，但這並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絕對地被它所取代。我們說那時候似乎是出現了一種暫時的二元狀態（這是兩個司令部的存在決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確立了儒家的地位並沒有馬上停止了漢武帝的法家路線一樣。而且，在我們斷言林彪體系曾經確立了的同時，已經指出：「但這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方

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個新興的社會力量」。在這裏，我們想引用馬克思的一段耐人尋味的話：

「革命向前進展並爲自己開拓道路，不是由於它獲得了悲劇式的勝利反而由於它產生了一個團結和堅强的大革命，由於它產生了一個敵人，而主張變革的黨只有在和這個敵人鬪爭中，來發展成了眞正的革命黨」。（「1848~1850法蘭西階級鬪爭」）

這就不用我們囉嗦了。

在林彪體系統治十分嚴密，顯得似乎會永世長存的那些日子裏，忠於馬克思的共產黨人就是根據馬克思指示冷靜地觀察着這一歷史現象，知道它是暫時的，他們滿懷着必勝的信念進行着不屈的鬪爭。

現在我們看到了，從1968年以來，我們黨和林彪體系這個新式的敵人之間進行的這場空前激烈、複雜的鬪爭，對於黨內的今後的發展何等重要呵！沒有空前强大的敵人，就沒有空前的激烈鬪爭，就不會造成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會完成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空前艱巨的革命任務。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們涉及了林彪路線是右還是「左」的問題。

「九·一三」事件後，全黨、全國人民根據他們的切身經驗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這個「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們批了林彪「殘酷鬪爭、無情打擊」的宗派路線，批了「政治冲擊一切」，批了「公產主義」，批了「頂峯論」和「絕對論」，這一批，批到了林彪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頭上了。於是有人出來說，不許批了，「批了羣衆了」。

羣衆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鬪，沒有人出來說一句話，保護一下。現在突然有人說，不許批極「左」了，羣衆一下子有了保護了，眞是受寵若驚！這裏，我們倒確是很想和這些保護羣衆不挨批的理論家們討論討論。

理論家們問，「林彪路線的實質是『左』還是右呢？」這一問眞是荒唐得鄭重，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無論其表現形式是「左」是右，其實質都是右，因爲它們結果都必然導致革命的損失甚至

失敗。這裏是沒有「左」和右的區別的，難道我們的理論家們眞的連這點常識都沒有？

可是，歷史上那個黨內的機會主義者沒有表現過時「左」時右呢？

理論家們，林彪不是宣揚孔孟之道麼？怎麼說極「左」呢？可是從1960年到1971年的報紙和文件上，我們怎樣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副主席號召我們學習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們要使人們學董仲舒，也要人們將毛澤東思想當作宗教來禮拜哩！我們認識林彪的封建性，難道不正是以新的禮教原則——誰反對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誰來表現的麼？作爲劉少奇、周揚一類非常仇恨毛澤東思想的人的對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麼？

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鍋煮，越煮越糊塗。「五七一工程紀要」只能說明林彪集團是反革命匪幫，怎麼說明他在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

必須把反革命兩面派在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與他的反革命陰謀活動區別開來，斯大林對托洛茨基作過這樣的區別，毛主席對張國燾作過這樣的區別，爲甚麼對林彪卻可以不作這樣的區別呢？

這是明目張膽的偸換概念，混淆兩類矛盾，這本身就體現了林彪在黨內的形「左」實右路線。

現在我們看到了那些參與了「五七一」計劃陰謀，響應政變的死黨，以所謂的「路線錯誤」逍遙法外，而不少僅僅在某些方面執行了劉少奇、林彪在黨內貫澈的錯誤路線的好幹部卻繼續被當做敵人加以無情打擊。這樣的事實難道還不足以發人深省麼？

馬克思說：「如果說現象形態和事物的實質是直接合而爲一的，一切科學就都成爲多餘的了。」（資本論）

我們的理論家們，你們爲甚麼對林彪成爲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總頭子時期（1966～1971）推行的實右而形極左路線那個形左的問題諱莫如深呢？我們能舉出一百個、一千個現象形態來說明林彪的「左」，而你們能舉出多少林彪作爲機會主義路線總頭子時期在黨內表現的現象形態的右呢？

「假作眞時眞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紅樓夢」第一回

太虛幻境掛這幅對聯卻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哩！

「黑格爾在一處說過：一切巨大的世界歷史事實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以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以笑劇出現……」（馬克思「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

如果王明反對李立三的「左傾」是第一次的話，現在誰又高興來扮演第二次出現的王明呢？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們對「反復辟」、「反回潮」口號的評論。但是，我們去年在評論中所作的判斷已經被證實了。

甚麼時候發生了「復辟」，甚麼時候發生了「回潮」呢？今年以來某些大人物和權威性的文章（例如「評湘劇園丁之歌」）告訴我們，「復辟」和「回潮」發生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廣州日報」頭版頭條大吹特吹的市一醫院的那張所謂「反潮流」大字報裏甚至把一九七一年說成是「熱血沸騰」，「火紅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後便幾乎是進入了「復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爲甚麼林彪不垮台到處都是好好的「一片紅」了，「全面勝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復辟」了，那裏也是「回潮」了，年代也不火紅了，熱血也不沸騰了。這倒是咄咄怪事！

難道第十次路線鬪爭中，一九七一年秋的偉大勝利導致的直接結果，不是人民的進一步解放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相反的倒是爲「復辟」和「回潮」開闢了道路嗎？這是對第十次路線鬪爭的嘲弄。

毫無疑問，人民羣衆是反復辟的，但是他們親眼看到的鮮血淋淋的殺氣騰騰的復辟行動是開始於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並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爲接班人達到高潮。（這便是某些人「熱血沸騰」的東西）經過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決戰，隨着林彪垮台，這種復辟行動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來，從而開始人民羣衆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這種人民的反抗說成是「復辟」，因此，他們的「反復辟」，實際上是反反復辟。顯然，高呼「反復辟」的口號有兩種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內容。但是，「反復辟」這個口號的實際效果比我們原來預料

要好，因爲人民的革命不會對革命的口號容易發生懷疑的，他們一般沒有對一九七二年開始「復辟」、「回潮」這種提法發生大多數的敏感，於是，儘管魚龍混雜，糾纏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反復辟」畢竟還是成了人民羣衆向林彪及其黨人作鬪爭的旗幟了。

現在需要研究一下的是，爲甚麼那些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在林彪垮台後，在「禮崩樂壞」的形勢下要高喊「反復辟」「反回潮」呢？

很清楚，他們現在的地位，是隨着林彪的體系的確立而確立的，動搖了林彪的體系無疑是動搖了他們的地位。他們叫喊「反復辟」，乃是他們對一九六九年「全面勝利」的規定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的現實矛盾尖銳化的反映。

他們十分留戀林彪體系達到頂點時的那些「光榮的日子——成千上萬的人民人頭落地的日子」，他們在「全面勝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權……乃至驅打奴隸的鞭子，全都是閃着聖光的寶貝，不容許奴隸有一點褻瀆，那時候中國的社會是他們的「天堂」，天堂裏的社會關係絲毫不可改變，如果林彪不允許「右派勢力抬頭」，那麼他們也不允許。

因此，一九七二年後，當寶貝的聖光越來越暗淡，奴隸們的態度越來越放肆，「天堂」裏的社會關係越來越不穩，念「緊箍咒」也越來越不靈（「金箍」在「全面勝利」時套在奴隸們頭上）的時候，他們急了。於是，他們口中念念有詞，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寶，叫做「反復辟」！

在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看來，九屆二中全會後，特別是「九·一三」後，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們開歷史倒車，先是想開回七〇年八月以前，後來想開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現在無可奈何開到七四年三月以前。當然，他們是絕不甘心放棄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們卻指斥人民爲「復辟派」、「回潮派」。這裏，我們倒要問問他們：難道被林彪一伙破壞了的黨的、軍隊的、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不要恢復嗎？難道被林彪一伙破壞、拋棄了的「三大作風」，我軍的優良傳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要恢復嗎？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黨史、軍史要不

要恢復其本來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壓、抓、打、殺代替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與「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要不要恢復？被林彪一伙「從客觀到主觀」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文藝創作方針要不要恢復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擊一切」代替了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要不要恢復呢？被林彪一伙破壞踐踏了黨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政策、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上山下鄉政策，華僑政策、各項經濟政策……要不要恢復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觀壓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復呢？難道林彪一伙炮製的從中央到地方成千上萬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嗎？難道大批雖然犯過這樣或那樣錯誤但經過長期考驗證明是對黨忠誠的老幹部就不應該再使用了？鄧小平、趙紫陽這些同志根本就不應進入中央委員會是不是呢？即使給他們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羣衆」手裏，隨時準備給他們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看來，我們在這裏以老大不敬的態度提出一連串「挑釁性」問題本身就是「復辟」、「翻案」的證據，更不用說這整篇序言和本文以及「廣東怎麼辦？」、「星火燎原館的始末」……，還有甚麼「革命死了，革命萬歲！」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夠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資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於是他們哀嘆：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呵！

三年以來，中國人民確確實實看到了一些「彷彿是向陳舊東西的回答」（列寧）的東西，可是，那又有甚麼辦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規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規律）向前發展的，歷史車輪不可抗拒，它是不會照顧甚麼人的面子的。「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我們奉勸那些狂熱追隨林彪而至今還保有「高官厚祿」的大人物，不妨把這對聯徘徊吟咏，深入領略領略其中的意味吧！

那麼，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就沒有任何「回潮」呢？我們說存在着各種修正主義路線的各種表現，但決不能說是「回潮」。因爲「回潮」這種提法本身就是美化林彪體系確立的時期，把它說成是沒有修正主義的「無差別境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

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當然也決定教育路線和文藝路線。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線是反動的，他們的教育路線、文藝路線也不會是革命的。如果說張玉勤事件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表現，不如說是林彪路線在教育戰線的反映。難道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是以死人爲基本特徵的嗎？被林彪路線整死的人何止萬千，年過半百，久經風霜的老革命幹部尚且被逼死，何況十五歲的女孩子？黃帥的老師整黃帥的那一套，是從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那裏繼承來的，還是更多的從林彪路線那裏來的？後來，「黃帥」對革命同志王亞卓的不同意見那樣無限上綱，氣勢洶洶，把他罵成「復辟勢力」，又是從那裏來的呢？難道誰反對我就給人家扣個帽子然後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風是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嗎？

談到教育路線「反潮流」的問題，我們提到過張鐵生，張鐵生反的是甚麼潮流呢？據說是所謂「智育第一，分數掛帥」回潮的潮流。說實話我們從他的答卷除了能夠找到他向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妥協的證據外，是找不出挑戰的證據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頭政治冲擊一切」在教育戰線的表現的潮流，雖然這個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現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數掛帥」，但它還遠遠沒有形成潮流呢！於是張鐵生之所以成了幸運兒，不過是某些人爲了可以利用來作爲一九七二年後「復辟」「回潮」的活證據罷了。

我們的「體系」頗嚇住了一些人，第七還因爲我們對秦始皇不表尊敬態度。但現在看來這沒有甚麼可怕了。儒法鬬爭史的批判正在深入展開，對秦王朝封建的肯定已經開始變得有原則了起來。「文滙報」剛剛開展着很有意義的討論。毫無疑問，法家先驅者們對中國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所引起的歷史作用是偉大的。然而，奴隸制代替原始公社的建立又何嘗不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進步？歐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嗎？既然我們那樣無情地批判了資產階級——從克倫威爾到羅伯斯庇爾，從「百科全書派」到別、車，從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爲甚麼對地主階級的秦皇朝卻要看得那樣光明呢？恢復被儒家歪曲了的歷史本來面目，肯定秦始

皇和他建立的一統天下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這種肯定必須遵守嚴格的界限，以便以後對他進行無情的批判——這是我們這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脫胎出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仍然面臨着的反封建任務所決定的。

很可以令人感興趣的是，我們發現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們的報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與現在我們的報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存在着多麼巨大的矛盾啊！「一切反動派和機會主義頭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無論是吳晗筆下的海瑞還是田漢筆下的武則天那個不是法家呢？然而對他們的批判確確實實變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導火線。

我們認爲，今天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確實有了更多的歷史唯物主義精神，這是革命深入的結果。但是，既然吳晗說海瑞是「愛護人民的」，曾經遭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麼，現在又有人說，「法家是愛護人民的」，這豈不眞是一個嚇死人的「回潮」麼？海瑞無疑是個法家，而且是一個歷史上難得的少數民族出身的法家。現在有人從秦始皇到孫中山，羅列了一大堆「落實政策」的名單，可是爲甚麼對海瑞卻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實政策」，最近還要在報上臭罵幾句呢？這說明罵法家的人還是有的。何況我們對秦始皇還沒有罵哩！

我們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鬪爭，爲甚麼有人總要在「愛國」還是「賣國」這些歷史上很不嚴密的概念圈子裏打主意呢？他們到底想把火往那裏燒？爲甚麼不可以聯繫一下林彪一伙多年來無法無天，橫行殺人，搶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實際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尙且反對世卿世祿，反對任人唯親，反對枉法徇私，反對走後門，反對刑不上大夫，我們現代的革新派怎麼就不可以拿來聯繫一下這些實際呢？難道今天這等事還少麼？聯繫一下這些，對於獲得人民的擁護，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很有實際利益麼？不聯繫林彪禍害的實際，侈談儒法鬪爭史，於民何益？

在我們看來，既然封建的社會法西斯專制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反封建依然是我們繼續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那麼批林批孔問題除了應當研究我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社會大變

動時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線鬪爭寶貴的歷史經驗教訓以外，應當着重地批判經過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專制的思想體系。如果「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了徹底的反封建口號，那麼我們今天的批孔運動就應該是在思想政治戰線上徹底的實現反封建的任務了。我們不應當如某些人那樣，在批判地主階級保守派的同時，卻極力謳歌地主階級的所謂革新派，他們根本忘記了秦、漢以後的所謂儒法兩家都是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它們的鬪爭實質都是維護封建專制這一基本事實。而忘記了這一點，他們不也就忘記了我們今天應當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批孔的根本任務了麼？

我們的「體系」之所以嚇人，最後還因爲據說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餘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號是右派分子高呼過的。可是自從一九六六年以來，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羣衆所呼喊的右派呼喊過的口號難道還少麼？「砲轟黑省委」、「反迫害、反鎮壓」不是至今還使那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派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視爲「右派翻天」麼？李慶霖信件的「右派言論」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大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我們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爲甚麼「民主」「自由」的口號在一九五六年的布達佩斯曾經集合起來了反革命，而同樣的口號在一九七〇年的波羅的海南岸卻成了波蘭工人階級戰鬪的旗幟了呢？爲甚麼一九五五年蘇聯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國右派分子的反對，而一九六八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卻遭到了中國人民的抗議了呢！

批評我們的朋友完全沒有根據基本路線對六十年代以來國際和中國的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動作一番分析，他們不明白五十年代後期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是從舊社會包下來的資產階級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後，這個主要危險則是黨內走資派了。似乎同樣的口號，反對的卻是不同的內容。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是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後人民羣衆在民主的口號下反對的則是黨內走資派的資反線，特別是反對林彪所推行的那種面目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封建專制的社會法西斯路線，他們的目的則是爲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道理應當是不難懂得的。

*　　*　　*

關於重寫的第六部分，我們不打算多講了，留給人們評判吧。作爲對「四屆人大」的希望，無論它們能否得到充分的實現，重要的是，林彪體系的冰山正在溶化，思想開始解放，問題已經提出在願意研究社會主義的人們面前了。可以補充的一點是：我們希望參加「四屆人大」的代表（儘管我們不知道這些代表是怎樣選出來的），不要忘記了一九七一年廬山大笑話的沉痛教訓。

*　　*　　*

對我們這篇冗長的序言，如果讀者們竟能夠看得下去，不覺得索然無味，我們只能感到高興，現在再寫幾句就可以結束了。

我們是所謂「不畏虎」的年輕人，但也並非不知道虎的凶殘，甚至可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於咬不住，吞不下去的餘生者，臉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

顯然，我們讀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嚴酷現實的教育，懂得一點，說幾句坦率的話。我們在這裏，只不過是爲了對「全國人民——我們還總算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會」及其以後的革命發展表示我們的希望和信心，也是試一試違了報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會怎麼樣？也算是以身試「禮」吧！如果我們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論權威的特別關照，我們只能認爲是好事，必定會從他們那裏得到更多的教益，雖然我們並不怎樣期望他們。

然而，我們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頭讀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們給我們提出批評指正意見，特別希望街頭理論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學家、批評家、觀察家們不吝賜教。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同志公開討論這些問題。

我們深信：在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鮮血澆灌的土地上，應該是生長鮮花的時候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　編

正文

人們都在關心着四屆人大的召開，尤其關心着與每個中國人命運密切相關的國家法制。

人們爲甚麼這樣關心呢？二十多年來的革命動盪，發生了一些甚麼新的問題使得人們必須關心新的國家法制這個四屆人大的產兒呢？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問題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已經進行了兩次大鬪爭：一次是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與劉少奇集團的鬪爭，一次是與林彪集團的鬪爭。

鬪爭的實質是要解決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搞資產階級專政還是搞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過去的反右和社教運動也進行了這樣的鬪爭，所要解決的也是這個問題。那麼新的問題又是甚麼呢？

新的問題就是劉少奇集團特別是林彪集團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專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

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在現代中國的社會條件下，他們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而不可能與被打倒的老地主、老買辦們平分既得利益。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集團的反革命演變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復他們的貴族世襲就是證明。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黨全國人民警告了社會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他告訴我們，如果我們這樣的國家發生復辟，那就不只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他說：「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十年過去了，中國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難道不是林彪路線給人民帶來的禍害才幫助人們眞正開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嗎？

既然社會主義革命到今天的特點是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企圖是搞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那麼革命人民應當拿

起甚麼武器去反對他們呢？

（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

在對當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深刻研究中，毛主席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形式上說，實際是一個最廣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羣衆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對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武器。

從戰略的觀點來看，與其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首要任務是揭露和摧毀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不如說是爲了鍛鍊人民羣衆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還有甚麼能比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羣衆精神振奮，意氣風發的議論國家大事，批評錯誤路線更能成爲生產力解放的標誌呢？

上了憲法的人民羣衆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以及未上憲法的串連自由都在這場大革命中眞正實行起來，並得到了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支持，這是中國人民數千年來沒有過的，生氣勃勃的，這是革命的奇勳。

但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沒有完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因爲它並沒有使人民羣衆牢牢掌握住廣泛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武器。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會主義的法治「突然不靈了」，「政權就是鎮壓之權」靈了起來。在範圍廣大地區內，到處在抓人，到處在鎮壓，到處是寃獄。社會主義法制跑到那裏去了呢？據說，它沒有用了，因爲這是舊人大的憲法，而新人大還沒開，現在是無法無天了！

這是在我國進行的一場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演習，演習的總指揮是林彪。

「對廣大人民羣衆是保護還是鎮壓」？毛主席憤慨地發出了這樣的質問。

林彪爲甚麼要鎮壓人民的民主呢？他們不是還鼓吹過「天然合理」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麼？

把林彪體系當作正統的毛澤東思想來崇拜，這是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歷史錯誤。

林彪及其黨徒把人民的革命運動當作他實行篡權復辟的「借用力量」，於是對待「天才」的態度這個準則代替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準則。「共誅之」、「共討之」和「誰反對就打倒誰」的原則向法制挑戰，成了保衛對「天才」絕對崇拜的上方寶劍。當他的地位一經確立並由黨刊宣布以他的地位的確定作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標誌時，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這方面，他還有他的董仲舒哩！

甚麼「新秩序」？就是「最後勝利論」、「四大過時論」、「政權即鎮壓論」、「軍黨論」，總之，就是把我黨我軍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關係的社會法西斯論。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人民的大民主不能離開正確的路線；否則，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務，相反將會爲資產階級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羣衆獲得的只是新的枷鎖。

（三）關於林彪體系

甚麼是林彪體系？這是指林彪已成爲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總頭子的時期，他在黨內推行了那一整套對抗毛主席，流毒全黨、全國的東西。這就是哲學領域的唯意志論，歷史領域的天才史觀，政治領域的政權即鎮壓論，經濟領域的「公產」論和對外關係的大國沙文主義等等，天才史觀則是其綱領。

毛主席一開始就和林彪體系發生了矛盾，當林彪體系尚未確立時，毛主席給江青同志的信便是這一矛盾的表現，而林彪體系一旦確立，並使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面臨着巨大危險時，這個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銳起來。

如果我們不去懂得毛主席對林彪法西斯主義鎮壓人民民主的深惡痛絕，我們又怎麼能夠懂得毛主席爲甚麼在廬山提出了「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的問題呢？我們又怎麼能夠懂得廬山的大鬪爭所反映的整個中國社會的深刻危機呢？我們又怎麼能夠懂得廬山的大笑話所應當給予我們的教訓呢？

「路線鬪爭不可知」的說法和「路線鬪爭不過是中央內部的權力之爭」的說法之所以錯誤，是因爲它站在唯心史觀的基礎上，否認了一切錯誤路線，無論是「左」還是右的，給人民羣衆的利益所帶來的直接損害。人民羣衆爲了維護和爭取自身的利益，總是要以各種形式（甚至包括消極或「反動」的形式）去進行抵制和反抗。中央的鬪爭無非是社會鬪爭的集中表現罷了。

（四）關於批林以來的形勢

林彪體系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頂點，但這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動，即造成了一個新興的社會力量，他們是在這場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啓發下逐步地懂得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們。林彪垮台以來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漲，更形成了他們的羣衆基礎，他們大多數是林彪體系的受害者，他們對林彪體系有着切齒之恨，他們要求繼續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復社會主義法制。

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着歷史的外衣出場了，哲學家作了新的政治變革的前導，這個人是楊榮國。

當「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頸上的深痕尚未消癒，楊榮國和它的助手們甚至是在「牛隊」裏就開始了他們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這位白髮蒼蒼的教授是一個眞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揭破了「禮治」的秘密，「他們的意志就是法律」，楊榮國同志控訴說：「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壓迫和剝削奴隸，甚至加以屠殺，奴隸們只能絕對服從，不許反抗，這就是所謂『禮治』」。

楊榮國反覆地控訴「禮治」，反覆地控訴孔子殺少正卯，少正卯有甚麼罪？他無非是「聯絡人民自由集會結社，亂批評當局」罷了，這樣就該殺了麼?!

毛主席支持了楊榮國派要革命要民主的呼聲，給李慶霖那封到處謂之「反動告狀書」的覆信，是多麼大的鼓舞了人民羣衆啊！眞的，一九六八年以來，沒有見過人民羣衆「這樣的興高采烈」。「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這是把多少人民羣衆壓抑在心裏頭的對林彪法西斯主義的仇恨的呼聲喊出來啊！

但是，興奮很快就過去了，伴隨而來的是對李慶霖式的信件

大肆的封鎖、恐嚇和鎮壓，李慶霖的遭遇引起了廣大羣衆的同情和躭心。他們在說：「幸虧信讓毛主席收到了」，他們在想，是甚麼壓制着他們的民主權利呢？

林彪的垮台，並不等於他的體系的完結。林彪體系確立的過程造成了一個文人既得利益的勢力，他們害怕洶湧起來的人民羣衆。清算林彪體系的浪潮摧毀了他們既得利益的基礎，他們耍了一個詭辯，歪曲主席的思想，把林彪體系實質的極右說成是甚麼「右傾」，或者迴避林彪在成爲機會主義路線總頭子時期，他所推行的那一套對抗毛主席流毒全國的東西，用林彪那些見不得人的反動言論來掩蓋林彪見不得人的蠱惑言論。他們站在要求批判林彪體系的人民的反面，把一派熱氣騰騰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們罵人民羣衆是「復辟派」「回潮派」，他們打的旗號是「反復辟」「反回潮」，好像他們就是革命，動他們不得。

可笑的是他們也來批孔，他們千方百計地掩蓋被楊榮國揭發出來的「禮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禮治」說成是一種假仁假義。肯定焚書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們自以爲有了可乘之機，他們無原則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專制，非歷史主義地鼓吹要從肉體上消滅一切反對派，這實際上是在爲社會法西斯主義作輿論，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業。他們不敢觸及秦王朝面臨的兩個否定：即來自六國舊貴族的反動否定和來自大澤鄉農民的革命的否定。農民爲甚麼要反對秦王朝？秦滅六國時，農民「莫不虛心而仰上」，不都是擁護它的麼？因爲秦王朝終於損害了農民。人民羣衆爲甚麼要反對林彪體系？當年橫掃一切的紅衛兵運動不是高喊着林彪「誰反對就打倒誰」的口號去作英勇的戰鬪的麼？也因爲林彪體系終於損害了人民羣衆。幾千年來凡是損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終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這就叫做奴隸們創造歷史。

那些「既得利益者」罵所謂「復辟派」「回潮派」要復舊，是的，人民羣衆中也許有不少人在林彪體系面前產生了一種懷舊情緒，但這只是因爲當前林彪體系直接損害了他們，他們客觀上要求進步，主觀上卻不懂得進步而已。這幾乎是一個歷史規律。被毛主席稱爲天才的陳勝、吳廣，不都是自命扶蘇，自號楚王，在反革命復辟的旗號下，舉行了他們的革命起義麼？既然我們無

產者對這樣打着反革命旗號的農民起義都要給予他們以歷史上崇高的地位，爲甚麼今天廣大人民羣衆在批林鬪爭中有了一些錯誤的懷舊情緒，就非大興問罪之師不可呢？更何況否定之否定，「彷彿是向舊的事物的回復」，不也是列寧的辯證法麼？革命的道路要筆直而筆直是王明的形而上學，對革命作辯證的否定不是歷史的退步而是歷史的前進。

當然，如果眞正的反革命復辟派孔鮒之流可以混進從大澤鄉出發的革命隊伍，今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面臨的反攻倒算和辯證否定，便更可魚龍混雜。我們必須反對反攻倒算派，以捍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然而，當前批林的主要危險，是在「反復舊」的旗號下維護林彪體系的錯誤潮流。

總之，批林以來的形勢，縱橫觀之，鬪爭是激烈的，批林整風仍是首要任務。第十次路線鬪爭尚在繼續深入。也許在這種深入之中，它還孕育著第十一次路線鬪爭哩！

（五）談反潮流

「十大」廢除了林彪塞進「九大」的「共討之」的原則，而代之以反潮流的原則。這是「十大」的一個大功績。

然而，現在情況是一個口號響亮了，人人都來喊：反潮流！

今年（七三）年八月，不是有個張鐵生的也出來「反潮流」了麼？結果一沒有殺頭，二沒有坐牢，三也好像沒有老婆要離婚，反倒是扶搖直上，據說到甚麼學府深造「反潮流」的奧祕去了。可是，那些爲反對林彪體系作了眞正戰鬪的革命者，不少的情況是殺了頭的，頭還是殺了，坐了牢的，仍舊坐着，罷了官的，照樣罷着，他們那有那麼優哉游哉？「你們是爲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翻案」、「你們是『571』」，不對。林彪的「571」不過是企圖把受他的體系損害的人民羣衆，當作一種「借用力量」去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罷了。「借B 52打B 52」本身有何罪之有？甚至「571」自己也明白那些被損害的人民羣衆是毛主席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力量呢！

人民羣衆不是阿斗，他們深知所受的根源，它們攻擊的鋒芒是向着林彪體系，他們誰也沒有表現出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

策的憎恨，相反，他們憎恨那些歪曲和阻撓這個路線和政策的林彪及其體系的既得利益者。他們要求民主、要求社會主義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羣衆的革命權利和人身權利。「甚麼？你們要民主？你們是反動派！因爲你們是反動派，所以不能給你們民主。」他們振振有詞，喜歡引用毛主席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一段話。

但是反動派的頭上是沒有「反動派」三個字的。「只給人民以民主」，很對。可是，你們還爲林彪體系大喊大叫時，又給了反對這個體系的人民羣衆那怕一點民主沒有呢？給他們的只是殘酷的鬪爭和拘押呢！「不給反動派以民主」，應該這樣。但不要忘了林彪體系風糜一時，甚至廬山成百個中央委員跟着跑，不就是爲反動派服務的民主麼？這個民主不用給他也有，一他有權，二他有革命的旗號；你不給人民羣衆，他就沒有，一他沒權，二他有時也打不出革命的旗號。

歷史教訓我們，即使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派有時會被認爲是反動派而沒有民主，反動派有時會被認爲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出現了革命派遭到鎮壓，反動派青雲直上的反常局面。我們必須對誰是革命派，誰是假革命派，誰是反動派，誰是被打成的「反動派」作認眞的分析。分析的標準只能是看誰的社會實踐代表了廣大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對待所謂「天才」的態度。

世界上沒有超階級的民主。馬克思主義的大師們對階級的民主作過許多論述，他們是把整個的革命階級和反革命階級來加以對立的考察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人民內部的派別鬪爭所反映的階級鬪爭的經驗，把派別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願意研究新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面前，因爲反映這個階級鬪爭的雙方都應當有民主的權利。一派壓一派是不靈的。這種後遺症至今難道還少麼？於是，它使我們懂得，若不把革命隊伍內部現在可稱之爲「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間，過去那種壓制與被壓制，甚至鎮壓與被鎮壓的關係，改變成基於團結的批評與反批評的關係，階級的民主是不會存在的。人民民主專政將變成人民派別專政，這個專政派別若是「正確」，它不能團結廣大人民羣衆，它若是錯誤的，

便將是社會法西斯的開始。

王洪文同志報告號召人們發揚「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現在的情況，沒有「大人物」或中央報刊的認可和宣傳，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湧來之勢的潮流。古今往來，中國總會有人爲了說話而不怕殺頭的。魯迅自然是不怕殺頭的一個。但是魯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裏去發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們又能到那裏發表他們的文章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幽靈，時常在他們的身邊徘徊，他們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復革命大字報的權威。但是，林彪體系壓迫着他們，「忠」字化的森嚴禮儀在束縛着他們，鐐銬、鐵窗、皮鞭和子彈在等待着他們。

一九六八年以來的中國現實就這樣嚴酷地向人們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死」了麼？

（六）對四屆人大的希望

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權威的東西。曾經使全世界在它的面前目瞪口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所給予中國社會的深刻震動和它的深遠意義，必將影響我們今後的社會主義整個歷史階段。

即將召開的「四屆人大」，它將怎樣反映被人們稱之爲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呢？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那麼，它所要制定的國家根本大法——新憲法裏，它將怎樣表現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羣衆的意志呢？

現在人民羣衆在想些甚麼？要求甚麼呢？他們對「全國人民」的代表大會抱着怎樣的希望？

一、要法制，不要「禮制」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以「造資反線的反」「奪走資派的權」爲其基本內容的。但是可以說，鎮壓（人民民主）與反（資反線）鎮壓貫串了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後的多次運動，也總是要打擊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反的人們，簡直把他們非打下十八層地獄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羣衆運動鎮壓下去之後，林彪體系才得以確立，他們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進一九七〇年的「新憲法」（草案）中。

這個基本事實說明了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

我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脫胎進入社會主義的，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所形成的傳統，頑强地盤踞在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層建築各個領域。

劉少奇，特別是林彪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難道還不足以證明，反封建依然是我們繼續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嗎？

還有甚麼能比「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的原則更能成爲誰護林彪體系「禮治」的神聖支柱呢？名爲樹人，實爲樹己。如果林彪能夠名正言順地上台的話，豈不是誰反對林彪就打倒誰了（實際上他是已經實行了）嗎？而且任何一個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化身，他便從此成爲神聖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嚴的革命羣衆，便決不能成爲法律的保護的對象了！

如果我們不去反對這種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禮治原則，我們能把無產階級專政的「鎮壓敵人，保護人民」的法治眞正實行起來嗎？

這是一個極大的矛盾，一方面黨的一元化領導決不可動搖，一方面「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而這些走資派恰恰是他們把持的地方和部門的一元化領導的具體體現者。

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應當怎樣保護人民羣衆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對黨內走資派和錯誤路線鬪爭的權利呢？這是擺在「四屆人大」面前的一個大課題。

不用說黨的領導應當細心傾聽羣衆的意見，也不用說人民羣衆對黨的各級領導實行革命監督的權利，更不用說對走資派造反有理了，即使羣衆的意見是錯誤的，過火的，或者對黨的政策某些方面不理解而發生不滿，難道就可以「說不服就壓，壓不服就抓」麼？而且，香花與毒草、正確與錯誤、革命與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麼容易鑑別的，要有一個過程，要經歷時間的考驗，因此，我們不應當怕光明正大的反對派，界限是服從紀律不要搞陰謀詭計。

「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除了殺人、放火、流氓、盜竊等刑事犯和挑動武鬪、組織陰謀集團分子必須實行專政外，應當保護人民羣衆的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

二、限制特權

承認不承認中國正在出現一個如蘇聯那樣的特權階層（劉少奇、林彪等不過是他們政治上的代理人罷了），這是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題。

必須首先指出，我們的黨員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但是，這個特權階層是客觀存在的，是我國社會經濟條件下所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而產生的。

「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的現實從那裏來？對社會的產品肆意揮霍，高級的驚人享受，是從那裏來的？相當部分的高幹子弟理所當然有財產權力的變相世襲從那裏來的？新資產階級佔有方式和維護這種佔有方式的政治手段憑藉的又是甚麼呢？文藝、教育、「五·七幹校」、上山下鄉、吐故納新、上大學、培養接班人等等，幾乎每個被人們稱之爲「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爲特權顯聖的場所。難道我們不可以說蘇聯的演變是從蘇聯的高級幹部實行了高薪制而向資產階級專家看齊的麼？在我們中國，對據說爲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幹部實行某種特殊的照顧，即使是傳統所允許的，老百姓也沒有表示多大的異議的話，但是我們能夠輕視對政權的腐化作用和對新的社會關係帶來的影響麼？我們能夠對正在產生和形成的新貴族、新的資產階級熟視無睹嗎？

我們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我們承認我們社會現階段在存着種種差別，它並不是一個法令所能完全消滅的。但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自身發展的規律，不是要擴大這些差別而是消滅這這些差別，更不允許這些差別擴大爲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特權。特權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對立的。爲甚麼我們要那麼迴避對於特權的批判呢？爲甚麼要用所謂「好人」「壞人」的問題去偷換「走後門」反映在路線上的大是大非呢？

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限制特權的條文。

三、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

一九六九年的「新黨章」、一九七〇年的「新憲法」（草案），把林彪這樣一個法西斯魔王法定爲接班人的事實，使中國人民看到了一個極其可怕的陰影。同時，也給人民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我們應當怎樣保證我們黨和國家的政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呢？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應當怎樣才能「千千萬萬」地湧現出來呢？

使「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青年成了勇敢的闖將」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和廣大人民羣衆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滿宗教情緒的「活學活用」（即投機取巧）的「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毛主席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條，但林彪也提出了他的三條。在林彪體系得到了確定的那幾個年頭，幹部的選拔和培養，主要地是用了林彪的三條。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從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選的，還是在大風大浪中成長，在階級鬪爭中湧現的呢？這個問題直到如今理論和實際還是多麼矛盾啊？

「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人民給的。我們的幹部不應是做官當老爺，而是人民的勤務員。但是權力是最能腐蝕人的。一個人的地位改變了，是最能考驗他爲大多數人謀利呢，還是爲少數人謀利？能否保持爲人民服務的精神，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羣衆的革命監督。而羣衆運動是一個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豐富的源泉。

應當怎樣規定人民羣衆對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的革命監督權利呢？並且應當怎樣明白規定，當某些幹部（特別是中央機關的高級幹部）失去了廣大人民羣衆信任的時候，人民「可以隨時撤換他們」呢？

「四屆人大」應當回答這些問題。

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制裁反動派

我們的憲法、黨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寫上了人民的民主權利麼？是的，寫了，不但寫了，而且還規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擊報復」，「嚴禁逼、供、信」。可是事實上都是經常

不能保障，卻是經常「准」對革命幹部和羣衆實行法西斯專制，關的關、殺的殺，製造假案，甚至大興野蠻的肉刑就是「嚴禁」不了！

中國人民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根本任務，在正確路線指引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可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革命綱領，在反動派的手裏就變成爲對羣衆的革命意圖的諷刺，從而成爲不共戴天的敵人手中最厲害的殺人武器。

不懲辦一些堅持反革命路線、變無產階級專政爲法西斯專政、血腥鎮壓和屠殺革命羣衆的民憤極大的蔣匪幫，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是確立不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能鞏固的。必須對鎮壓人民者實行鎮壓。「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執法犯法，製造假案，公報私仇，私立專案，私設監獄，大興肉刑，草菅人命，罪惡極大的「大夫」們的條例。

五、落實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經提出「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落實（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經三年了，爲甚麼許多重要的黨的無產階級政策落實不了？

同時近年來，政策的多變，甚至「朝令夕改」（有認識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線鬪爭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層出不窮，造成了人們的思想混亂，甚至對黨懷疑。我們認爲「四屆人大」應重申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那些經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應長期實行的政策，並應通過法的適當形式體現出來。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對於那些嚴重破壞黨的政策的人應當嚴肅處理。

六、各盡所能按勞分配

一九六八年夏季以後，由於政治上的民主權利的壓制，特別是林彪的法西斯的組織路線，他們任人唯親和對逆己勢力採取懲罰主義的人事調動，搞大換班，使得「各盡所能」、「任人唯賢」的原則受到了破壞，人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受到了摧殘。

我們在看到特權膨脹的同時，同樣清楚地看到了工農勞動羣衆在所謂「公產主義」的口號下，他們許多合理的經濟利益遭到

了剝奪。工人多年沒有提高工資了，而且還取消了曾作爲他們工資一部份的合理獎金；而農民羣衆在無償的「忠」字糧，高徵購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運動中，遭到了更大的損害。這個林彪的極「左」路線所帶來的危險性，現在越來越充分地顯現出來了。

列寧不是歡呼「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爲「偉大的創舉」嗎？中國的勞動人民在革命戰爭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中，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湧現了無數富於自我犧牲精神大公無私的革命英雄麼？這正是極爲寶貴的人民羣衆的歷史主動性。但是，能不能由此而絕對化，認爲精神可以代替一切了，可以代替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了？顯然這是極其荒謬的，它必然受到歷史規律的懲罰，它也已經遭到了懲罰。

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反對了高工資、高獎金、高報酬，但是我們應當絕對地否定獎金的作用麼？一個比較積極、認眞負責、超額完成任務或者有所發明創造的工人，爲甚麼不可以比他的同級工資多得些適當的獎勵？一個業餘從事寫作或者對某一專業有新發現、新發明的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爲甚麼不可以得到適當的物質鼓勵呢？空頭政治的原則是獎懶罰勤的原則。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是調動和保護人民羣衆社會主義積極性的原則，而且認眞實行這個原則，也是整特權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呢！

「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條文。我們對「四屆人大」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們希望能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一個勝利的大會，開成一個反映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廣大人民羣衆統一意志和願望的大會。但是，毛主席在與林彪反黨集團激戰的關頭引吭高唱悲壯的國際歌，已經深深地震動了廣大人民羣衆。他們知道，新憲法的規定只是再次給了我們一個武器，要眞正實行還必須靠廣大人民自己的鬬爭。

一九五四年的憲法不是也規定過人民的民主權利麼？毛主席不是還多次說到：「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鞏固」麼？但是，一方面存在着林彪爲代表的鎭壓人民的反民主勢力，另一方面也由於人民羣衆自己對這個民主權利運用得太少

了（這是由於中國封建傳統的根深蒂固，也由於我國生產還比較落後，人民的文化水平還不高，因而比較缺乏民主精神的緣故），毛主席提出多年的「造成一個生動活潑政治局面」的目標，還遠遠沒有達到。

正如一個南方水鄉的客人來到沙漠中才覺得水的可惜一樣，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羣衆的民主權利也是在遭到剝奪的時候，才更感到民主權利的珍貴。盡管一九六八年把廣大人民羣衆（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羣衆）殘酷地鎮壓下去了，但是「現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動派只是一股逆流。」一個徹底摧垮林彪體系的羣衆運動在不久的將來必定會到來，他們必將重新恢復和發展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精神。

一九七三年 九 月十三日初稿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七 日定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起在廣州街頭張貼

陳爾晉

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節錄）

第六章　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崛起

一、共產黨的變化

1. 吸毒者

如上所述，共產黨的地位變了，共產黨由昔日國家的造反者，變成了今日國家的統治者。因而使自己從被政權迫害的對象、鎮壓的對象，變成了受政權保護的對象、腐蝕的對象。在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制改造的社會里，即在處於叉路口的社會主義社會里，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的公有制社會生產和權力極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方式，使執政的共產黨既擁有主宰社會的巨大勢力，也面臨被整個社會新舊邪惡勢力聯合起來內外進攻和腐蝕的危險。共產黨因爲固定化壟斷權力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和既得地位和既得利益，而使自己泡在了任命制、等級制、國家機關自治化以及對黨的神話混合而成的特效腐蝕劑中。這種情況勢必使處於這種地位、享受此種利益的“恐怕相當大一個多數”的人，“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而嚴重的問題是，糖彈與其說來自於敵人的陣綫，毋寧說主要來自於自己的營壘，與其說來自於別人的贈予，毋寧說來自於自己的需要。此種地位的變化埋伏着使一個窮苦而精悍的小伙子變成了一個雖擁有巨資而鴉片烟日漸滲入膏肓的人的危險。

2.. 敲門磚

入黨做官的毒霧包圍着黨。在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的公有制社會生產和權力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方式支配下，資本經失去了獨立存在的條件，它只有依附特權，通過特權才能增殖。或者說，資本的形態已經由貨幣資本轉化爲特權資本。在私有制社會裏資本就是能夠生出更多貨幣來的貨幣。而在公有制社會裏，資本却成了不需一文錢就能夠索取到很多貨幣的特權

。在政經一體高度組織的公有制社會生產中，壟斷政權就能壟斷一切的狀況，使社會上所有企圖吸血的臭蟲都想方設法要混進黨內來。因爲權力是共產黨固定化壟斷着的，不是黨員就不能當官，不能掌權。這些品質惡劣、手段卑鄙、貪圖祿位、一心想吸血的投機分子，把入黨當做了做官求榮、升官發財的敲門磚。他們高唱着對黨的讚歌，高舉擁護黨的雙手，迎合着當地黨組織的胃口，披上種種的合色外衣，大批地湧入了共產黨內，以至列寧曾經十分憤怒地斷然說道："我們應當說：現在，當黨取得勝利的時候，我們不需要新黨員。我們非常清楚，在日益瓦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定會有許多壞分子要混到黨內來。"（《列寧全集》□□）當冒着生命危險爲眞理爲光明而戰的艱難困苦的革命已經成爲過去，新的情況是以鞏固的地位長期穩定地執政的時候，黨遭到入黨做官的毒霧的包圍，原是不奇怪的。"野心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機混到執政黨裏來，這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列寧全集》29卷393頁），成問題的是"物以類聚，人以羣分"，"那些只想從執政黨黨員的地位撈到好處而不願肩負爲共產主義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列寧選集》四卷76頁）入黨後，又反過來按自己的志趣物色和發展"新同志"入黨，拉出去，打進來已經是阻止不了的了，而那些"眞正開明的、能於保証絲毫不信空言、絲毫不昧良心說話的分子"（列寧，《一九二三年論文集》）即眞正願爲共產主義忘我工作的先進分子却往往被排斥在黨的大門之外，這種狀況，却有使執政黨成爲藏垢納汚，集汚穢於一身，由量變引起質變的危險。

3. 癌細胞

"走資派"——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出現。事實上，上述來源於內外兩方面相互作用的危險已不是"可能發生"的，而是"現實存在"的事實了。共產黨內出現了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事，就是証明。其實，所謂走資派走的不是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走的修正主義的道路。只要看一看他們不准農民開墾小片生荒，不准工人私自生產計劃指標以外的產品，只要看一看他們如何"苦大仇深"地組織和發動羣衆鬥爭資本家的子女和

地富子女、孫子女的情況，尤其是只要看一看他們壓迫人、剝削人，謀取私利，化公爲私，貪污腐化，盜竊行賄，投機倒把的新手段，乃是靠特權，吃特權，和特權命相連，就知道他們走的不是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走的地地道道的修正主義道路。他們不是把公有制社會生產拉回以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爲標誌的資本主義社會去。恰恰相反，他們是力圖通過政治經濟一體化進一步把生產高度組織、高度集中起來，而領導權永遠霸佔在他們手中並世襲給他們的後代，把社會引向修正主義社會。這個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一開始就以前所未有的貪婪性和虛僞性而表現着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一切固有的特徵：他們自從嚐過一次人肉之後，就不願意再吃別的東西了。這個派別的出現和共產黨的上述兩個變化的相互作用，相輔相成，使這個派別數量發展的總趨勢不是減少而是每日每時都在有新的增多。這種情況已經嚴重的瓦解着執政的共產黨的戰鬥力和嚴重地改變着共產黨的政治素質。這是一個隱藏在執政的共產黨體內、代表着反動的生產關係、有朝一日要使其發生質變成爲修正主義法西斯黨的"癌細胞"。

二、勞動者的變化

1. 要當家做主

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確立，給勞動者帶來的第一個變化，就是使勞動者從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奴役下初步解放出來的同時也從傳統的剝削階級的奴化意識中初步獲得了解放。從前，無產階級勞動者除了自身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料就沒有勞動對象，而沒有勞動對象勞動者除了挨餓受凍以外不可能生產出任何物質產品來。正如馬克思所引用的維廉·配第的話："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資本論》第一卷57頁）這種情況，迫使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受僱於掌握着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資本家和地主。可見勞動者受資本家和地主的壓迫和剝削，首先是由於勞動者遭受到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奴役。而現在處於叉路口的社會主義社會却已將生產資料私有制變成了公有制，做爲公有制的兩種表現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已經成爲了國家經濟結構的基本形式。這樣，勞動者就從生產資料私

有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和這個解放相應的，是勞動者愈來愈普遍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想。千百年來剝削階級禁錮在勞動者頭腦裏的奴化意識第一次被打破。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大改變以及伴隨這一改變過程的急風暴雨的政治運動——土改、合作化、持續不斷的社會主義教育、四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等，使勞動者愈來愈認識到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中所處的當然主人翁的地位，愈來愈明白他們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所處的地位和所負担的責任。《國際歌》所表達的思想“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羣衆，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愈是深入勞動者的心靈，他們對救世主對神仙皇帝的迷信就愈是破滅，他們的主體意識就愈是得到確立，因而他們就愈是不安於他們對生產的組織和管理無權過問的地位，而發出了直接參加管理的要求；他們就愈是不安於他們只有被分工的分工而要求參予分工，他們就愈是不滿足於權力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這種生產關係而要求改變這種關係！勞動者要當家做主，要選舉和被選舉權。

2. 矛盾混合物

勞動力從商品性質轉化爲一身兼具主體、商品無條件絕對服從物性質的矛盾混合物——這就是勞動者的第二個變化。以前勞動者將自己的勞動力做爲商品出賣給資本家以換取工資維持生活。在那個時候勞動者在將自己的勞動力做爲商品出賣這一點上，在實踐上是這麼做的，在思想意識上也是這樣認爲的，不矛盾。而現在公有制的基礎在理論上，在黨的不斷宣傳的社會主義教育中，首先就否定了勞動力的商品性質，力圖使勞動者明白使用勞動力參加生產不是爲他人幹活而是爲自己幹活。要勞動者在思想上明確主人翁的責任和義務。但是勞動者主體意識的確立并不等於勞動者主體地位的眞正實現和鞏固。儘管在宣傳上、在法律上不存在什麼僱佣勞動，可是公有制本身的國家資本主義屬性發生作用，勞動力却還仍然具有商品的性質。工資制度就是勞動力做爲商品的表現，工人不上班就沒有工資。尤其重要的一點是勞動

者在生產組織中的地位。從前勞動者是在組織性較爲鬆懈的社會裏生活，勞動者出賣勞動力的所有權在勞動者，因而在那時勞動者“是自由勞動者”（《資本論》一卷782頁）而現在勞動者是在政治經濟一體高度組織化的公有制社會裏生活，勞動者已經不是作爲自由勞動者而是在組織中的勞動者。勞動力的所有權已經不屬於勞動者本身，而屬於政經一體化起來的組織，屬於社會。勞動者已經失去了獨立性和自由性。勞動者在什麼地方使用勞動力是由“組織”決定的。作爲一般勞動者的分工你得服從“組織”的安排，決不可能憑你今天想在這個地方就在這個地方，明天想到那個部門就到那個部門。沒有“組織”的分工，不經過“組織”的安排和允許，你就休想變換工作和遷徙工作地點。你生產什麼，到什麼地點去生產，在什麼時間內進行生產等等，無不服從握有權力體現着“組織”的上級領導的支配。可見，勞動者在生產組織中是處於無條件絕對服從的地位。勞動者在生產組織中的這種地位與其在思想上的主體意識和在分配上的商品性質是矛盾的。勞動者陷入了一身兼具主體、商品和無條件服從物的矛盾之中，這樣，處於交叉路口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作用於勞動者，使勞動的兩重性不但表現爲使用價值和價值，而且表現爲自主的勞動和被迫的勞動，勞動者成了矛盾混合物。這一點正是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所發生的全部問題的秘密所在，或者如馬克思所說：“事實上的一切了解全在這上面。”（《馬克思通信集》3卷165頁）“在事實上，這就是批評地理解問題的全部秘密。”（同上4卷7頁）

3. 在奴化勞動中日益消沉

勞動者本人不能隨便選擇場所使用勞動力的狀況更使勞動者產生了一種要發揮主人翁精神干預特定給自己勞動場所和生活環境的公共事務的要求。這種要求一方面因爲勞動者力圖尋找發揮自己思想意識上已形成了的主人翁精神的出路，另一方面因爲社會分工的固定化使這種特定給勞動者的勞動場所和生活環境與勞動者一輩子乃至子孫後代的利益都發生了緊密的、直接的關係。但是實踐證明，在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權力的生產關係，在

任命制、等級制、國家機關的自治化和對黨的神化的情況下，這種干預不但往往是徒勞的，而且往往給干預者帶來禍患，飽嘗權勢迫害的苦頭，勞動者無不自覺的感受到了極大的矛盾和不幸。消極的教訓必然冒了出來：各自隨□流混混過，如今越少管事越好，什麼當家做主，什麼創造性勞動，與我們毫無權力的勞動者，簡直隔得太遠了。勞動者在現實存在被支配下，在奴化勞動中日益消沉下去。這種變化對整個社會生產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列寧曾經明確指出："全人類的首要的生產力量是工人、勞動者。"（《關於用自由平等的口號欺騙人民》單行本35頁），任何時代生產力的發展，都首先取決於勞動的積極性是否充分的解放了出來。當着整個社會的勞動者社會主義積極性普通受到了壓制和摧殘，主人翁精神普遍遭到了打擊和扼殺，自主的勞動熱情普遍被泯滅和窒息的時候，社會生產力便受到了嚴重的破壞——這就是權力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成了公有制社會生產力桎梏的一個明證。

三、階級關係的變化

1. 境異時遷

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階段，階級關係基本上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階級關係。這種關係，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歷史文獻中，已經作了非常清楚明白的剖析。毛主席這篇文章，是我們認識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第一階段的階級關係，用以分辨這個時期和階段的眞正的敵友的利器。除了毛主席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的正確性以外，這主要是因爲有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第一階段社會存在的主要問題，革命的基本對象，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

但是，在經過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階段，當生產資料私有制變爲公有制以後，階級關係是否還是老樣子呢？除了喪心病狂，狠心狗肺，企圖混淆視聽的騙子以外，幾乎每個有思維能力的人都會回答：做爲基礎的所有制關係已經發生了變化，依附於所有制關係和生產方式階級關係，當然也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變化，并

且確實是發生了變化。

2. 階級關係變化的根子

階級是怎樣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爲，階級首先是"由於分工而分離開來。"（《馬恩選集》一卷38頁）"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馬恩選集》三卷321頁）

不錯，階級劃分是隨着私有制的出現而出現的。但是私有制怎樣產生的呢？原來，私有制的產生最初也是由於分工而引起的，生產力的發展使原始社會有了剩餘產品，當分工去管理這些剩餘的人在把管理職能變爲剝削職能，因而把屬於生產者大衆共有的剩餘產品竊爲己有的時候，私有制出現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兩個同義語，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馬恩選集》一卷37頁）可見，分工不僅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而且是私有制產生的前提，因而也就是社會分離出階級來的基礎。

是的，"問題從分配的觀點來看是最容易理解的。"（《馬恩選集》四卷482頁）從分工的觀點來看，對生產資料進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後的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是頗有些與原始共產主義後期的狀況相彷彿的。從分工的觀點來看，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階段對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改造，僅僅不過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方面改變了私有制，還遠遠未"就活動而言"方面取消了私有制，因而產生私有制的前提即階級分化的前提在處於叉路口的社會主義社會裏依然存在。階級關係的變化，是現存生產方式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從分工的觀點來看，叉路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起關鍵性作用的權力分工上所推行的制度——權力爲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是一個嚴重的致命的弊病：這個弊病就是導致階級關係發生新的兩極分化的根子。

3. 關於階級的定義

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一文中，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

）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他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列寧全集》28卷382頁）

4. 新的階級關係

1. 新的階級對立代替了舊的階級對立

高度組織起來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把浩如烟海的整個社會上的人，簡化成了兩種人：管理者和生產者。馬克思主義的目的是通過社會主義革命的完成，進一步使這種簡化同化，打破這兩種人的分界綫，從而“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馬恩選集》四卷332—3頁）

但是，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權力這種狀況及與此相應的固定化的社會分工，却使這種簡化又大爲複雜化了。這種複雜化使從資本主義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同樣“并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馬恩選集》一卷251頁）

（以下及第(2)、(3)、(4)、(5)、(6)、(7)、(8)諸節均略）

第七章　危　機

一、基本矛盾的不相同性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已經能夠清楚的看到，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和權力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之間的不相容性。這樣不相容性，突出地表現在共產黨、勞動者和階級關係這三個方面的大變化上，尤其是反映在官僚主義者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尖銳對

對立的階級鬥爭上。這種不相容性，迫使整個社會面臨如下抉擇

要麼砸爛權力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這個桎梏，保留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依靠人民大衆，經過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由此進一步調整一切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經濟成份，從而使公有制社會日益完善爲眞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加快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顯然，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革命的路綫。

要麼强化權力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關係，改變公有制社會生產的性質，依靠官僚主義者階級及其附庸，通過任命制等級制、國家機關自治化和神化黨這一套體制，進一步維護住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一切上層建築，由此改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從而使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生產成爲純粹的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制生產，完成向修正主義社會的演變。顯然，這是一條修正主義反革命的路綫。

何去何從，二者必居其一。生產方式內在的基本矛盾，使社會主義在叉路口徘徊。當此之時，差之一毫，失之千里。

二、改良主義行不通

1. 行不通的原因

既要維護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又不敢觸動權力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這個公有制社會生產力的桎梏，而在枝節問題上進行一些小改小革的這樣一條路綫，叫做改良主義路綫。然而，這是一條從一開始就注定行不通的路綫。原因很簡單，因爲正如上一節所說，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和權力被少數人强制固定化壟斷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們之間是不能相容的。改良主義路綫，不是打碎而是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裏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裏，用年輕人一定勝過老年人的進化論來冒充辯證法，代替階級論，以强調精神變物質强調得過了頭的唯意志論來冒充唯物論，代替存在決定意識，用形而上學的鬥爭方法代替了革命的辯證的鬥爭方法。改良主義對付修正主義的方法，不是强有力的治本的方法，而是一套隔靴搔癢、割韭菜、摘磨菇、打强心針、吃止痛片的治標方法。這套

方法不過是使總崩潰變爲逐步瓦解過程的方法。在頑固不化、盤根錯節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統治面前，在空前激烈和尖銳的階級鬥爭面前，改良主義的前途不是投降，就是毀滅。

2. 改良主義者

這種改良主義路綫，發源於統治集團中的左翼，立足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立場，受着現實的階級鬥爭的推動，反映着社會主義社會受現存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的作用在叉路口徬徨和徘徊，改良主義者大多是既得利益者，他們多少有別於統治集團中的頑固派，他們感覺到不變不行的壓力。但他們的所謂變，是在維持舊質穩定性，維持舊統治秩序目標下的細枝末葉的改良。他們也承認統治機器發生了毛病，甚至也可以承認是發生了大病。但是病根在那裏呢？他們要麼是眞的摸不準，要麼是摸準了不敢觸及。總之，他們的治病方法是捨本逐末，以標代本。受既得利益的局限和束縛，跳不出既得利益的圈子。試問頭痛醫脚、脚痛止疼，能醫得好病嗎？在急需動手術才能挽救生命的情況下，延緩手術就等於死亡，而僅僅依靠强心針是不能治愈重病的。在革命策略下的改良，我們并不排斥。有的時候，止痛和注射强心針是必要的。但是，治病只懂止痛和打强心針，乃是庸醫所爲。很多病人就壞在庸醫的手裏。在急劇的社會變革面前，以包醫天下的面目出現的改良主義者，就正是這樣的庸醫。他們不能超越常態，他們不敢打破常規，他們不知病根何在，他們只醫皮毛不醫根本，他們要切除“癌細胞”，但不懂“癌細胞”產生的根源和活動規律。改良主義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有如空想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他們所設計的“繼續革命”的藍圖，也好似傅立葉的法朗吉！此類改良主義者具有小資產階級的一切特徵。最大的一個特徵就是小生產的劣根性。一方面有革命的狂熱性，一方面思想容易右。他們患得患失，或爲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既得利益所局限，或對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既得利益流着三尺長的口水。他們能夠爲了現在犧牲過去，却不敢爲了將來犧牲眼前。他們所處的階級地位、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使他們不敢“將階級鬥爭進行到底”，不敢“爭取到最主要的東西”，“不敢作任何冒險”，他

們的鬥爭是“毫無策略”的“跪着造反”。他們不懂得在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把持下，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只能是一句空話。他們既脫離了人民羣衆，又遭到官僚主義者階級的仇恨，處境十分危險，一到決定關頭，官僚主義者定將把他們浸入血泊。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者贊成進行爭取改良的鬥爭，即爭取改善勞動者的狀況（雖然政權仍然落在統治者的手裏）的鬥爭。但同時馬克思主義者也最堅決地反對改良主義者。因爲他們用改良直接或間接地限制工人階級的意向和活動，改良主義是資產階級用來欺騙工人的，只要資本的統治還存在，儘管實行個別的改良，工人總還是僱傭奴隸。”（列寧：《反對修正主義》136頁）隨着改良主義路綫的毀滅，改良主義者必然發生分化，大部分會左轉站到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立場上來，也有一部分會淪爲逃兵，極少數則會右轉去做投降派，助官廳剿方臘。

3. 改良主義的客觀影響

主要在於他撕開了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面紗，并形成了“‘下面不願照舊生活而‘上面’也不能照舊統治”（《列寧全集》31卷66頁）的局面。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已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以致這種生產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潰可說是可以用手觸摸到了；只有採用同生產力的現在這個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生產力本身才能保存和往前發展”（《馬恩選集》三卷306—7頁）已經成了當務之急的時候，改良主義沒有能夠及時採用這一步驟，而是一方面强調勞動者的主人翁意識，因而也就等於否定特權的統治；一方面又强化官僚主義者階級“一元化領導”，因而也就等於强固勞動者的奴隸般無條件服從物的地位。這樣，就進一步將勞動者本身置於尖銳的矛盾之中，從而也能使整個社會生產置於異常混亂的狀態。其結果就是必然加速整個國民經濟陷入停頓和頻臨崩潰。恩格斯指出：“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現在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一定的時期就都要遭到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經濟發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動它沿着另一種方向走。

這第三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爲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種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馬恩選集》四卷483頁）改良主義者沒有找□所好，利用勞動者本身尚存的商品屬性，重新刺激勞動者的勞動熱情。這是修正主義上台已成現實威脅的原因之三。

無論革命策略下的改良，或是改良主義策略下的革命，由於沒有抓住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內在的基本矛盾，因此，對於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批判都是不徹底的，既未觸及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權力這個嚴重的致命的弊病，更未用切實可行的代替方法取代任命制、等級制、國家機關自治化和神化黨這一套滋生繁衍修正主義的溫床，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還遠遠未確立下來。這是修正主義上台已成現實威脅的原因之四。

使修正主義制度成爲現實存在的主要的階級基礎和階級力量——官僚主義者階級，其根基不但未被動搖，其體系反而在“加强一元化領導”的大紅傘下，盤根錯節地扎根在整個社會上。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對權力的依附性，使官僚主義者階級人數雖少，能量極大。官僚主義者階級握有重權，居高臨下，地位主動，這是修正主義上台已成現實的原因之五。

整個上層建築、政治結構，已成爲官僚主義者階級得心應手的專政工具，任命制、等級制、國家機關自治化、神化黨，實質都是爲修正主義服務，本能都是趨向修正主義的。這樣的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純粹是修正主義的作用。這是修正主義上台已成現實威脅的原因之六。

上層建築和政治結構，事實上早已迫使人民羣衆和政治分離，廣大人民羣衆無權無力無法有效地與聞和干預政治，甚至廣大共產黨員也無能與聞和干預政事的內幕，他們只有在事態發生後聽候通知的份，沒有在事變過程中表示意見的權力。與當權者相反的不同意見，既沒有公開表達和討論的條件，更沒有進行試驗的場所。龐大的暴力機器下面爆發騷亂的可能性小於權力中心的角逐可能形成的統治危機。權力的壟斷性，權力之爭的詭秘性，

黨內走修正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階級性，既造成了陰謀家大搞陰謀詭計的必然性，又形成了陰謀家大搞陰謀詭計的“合法”保障。這是修正主義上台已成現實威脅的原因之七。

赫魯曉夫的陰謀詭計和朱可夫的官僚軍事暴力相勾結，利用對黨的神化和整套國家機器的暴力，實行和平的反革命的武裝政變，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是使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一下子”異化成修正主義社會的最危險最主要的方式。這種方式總在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逝世前後尋找表現時機。使用這樣的方式和時機的條件業已日趨具備，修正主義很可能通過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宮廷政變“一下子”生出來。這是修正主義上台已成現實威脅的原因之八。等等。

——“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底，他八十二歲誕辰夜不能寢時所作的這一結論，最清楚不過地表明了修正主義上台的現實威脅！

4. 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的厄運

（1）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遠影響

我們在上面已經談過，由於種種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中國處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在毛主席爲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中國確實已經築起了反修防修的鐵壁銅墻。因此，即使修正主義由於上述原因得逞一時上了台，注定也是不能長治久安的。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就明確指出：“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更何況在經歷了整整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烈火的考驗和鍛煉之後，中國人民已經普遍煉出了識別修正主義的“火眼金睛”，已經通過自身的政治經驗和生活感受，認識到了新的階級關係的變化，提高了新的階級鬥爭的覺悟。中國人民對修正主義的警惕，對官僚主義者的憤懣，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培養起來的鬥爭精神、革命意志，是反修防修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和巨大的物質力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人們心靈的啓廸，不是修正主義可以輕易一□□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遠影響，也絕不是修正主義可以隨便擺脫的。毛主席關於反修防修繼續革命的論述，象緊箍一樣緊緊

地套在了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頭上……所有這一切，是蘇聯赫魯曉夫所沒有碰到過的，而這也是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所面臨的第一個致命的問題。

（2）十億人口强制性的生產和主動性的消費

第二，中國人口驟增猛漲，其數已近十億。日用消費，穿衣吃飯，就業居住問題是每日每時都面臨的大問題。要解決這個大問題，顯然只有依靠發展生產來解決。但在不是自由競爭而是高度依附權力的政經一體化壟斷生產的情況下，生產的發展又首先取決於政治的清明，取決於生產關係是否能充分調動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和解放勞動者的創造力。但是，同樣顯然的是，修正主義制度恰恰是扼殺絕大多數人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力的。廣大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力，是被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壟斷權力所專制和壓制住的，這怎麼能夠發展生產、解放生產力呢？縱然，官僚主義者——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可以用糖衣砒霜和帶血屠刀把生產暫時刺激起來一下，但是其效果肯定是有限的，其時間也肯定是短暫的，在官僚主義者——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把持下，物質刺激這一套，只能起惡化社會矛盾的作用，只能是修正主義的搾油機。這一套之所以被毛主席所否定，正是已爲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實踐所証明是不適宜中國社會主義生產的。況且，十年來對這一套的批判，已經使勞動者對其惡果的感受不是麻木的而是敏感的了。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在將勞動者的主權剝奪殆盡的同時，也將勞動者所應承担的責任取消了，官僚壟斷特權階級能夠把廣大勞動人民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力野蠻專横地壓制住，但是却不能阻擋廣大勞動人民對日用消費穿衣吃飯就業居住的需求。官僚壟斷特權階級能夠專制住廣大勞動人民對民主、自由的渴望，但是，却抑制不住他們本身對廣大勞動人民敲骨吸髓的堅搾的貪欲。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在中國的修正主義統治肯定是難得長久維持下去的，“因爲它甚至不能保証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爲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它來養活的地步。”（《馬恩選集》一卷263頁）十億人的生活問題及其尖銳的階級矛盾和鬥爭，這是蘇聯赫魯曉夫們所沒有承担過的巨大的壓力，也是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所面臨的又一個致命的

問題。

(3) 僵化的國內政治，箍緊必炸

第三，中國和蘇聯的社會結構不盡相同。蘇聯是一個半歐洲的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沒有中國嚴密，因此社會矛盾有一定的緩衝餘地。它有成文的法律，有一定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如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這一類持不同政見者還可以發表反對意見，舉行記者招待會等。對政治犯不採取屠殺的政策，教育制度也使人們多少有一點能夠憑自己的才智得到深造的可能，學術方面也不强求劃一，而是提供條件允許并鼓勵自由討論、發明創造等等。這些做法能夠使社會上具有才能的人們有一定的奔頭和出路，使這些人成了既得利益者，從而使革命運動缺乏敢於犧牲一切的傑出的領導人。在中國則不然，官僚主義者階級不是實行現代法制，而是實行封建專制，變化性靈活性很大的政策，還就應付臨時事件，憑官僚主義者階級的“一元化領導”的好惡喜怒執行政策，根本就沒有什麼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對所謂“反革命”或格殺勿論或施以重刑。教育制度和科學研究等都不器重人才，而是憑關係、看門閥。在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把持下，對社會的嚴密控制，使社會的矛盾衝突缺乏緩衝的餘地。千千萬萬優秀人物憤懣不平，渴望變革，被迫敢於鋌而走險，要從絕路上闖出生路來。蓄之愈久，其發必速，壓迫愈深，反抗愈强。同時，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在長時期强制性固定化壟斷權力的過程中，越來越僵化，越來越缺乏左右心民的道義力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領導集團的日益僵化，導致了整個社會內部的日益僵化，孕育着總崩潰的到來。這是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所面臨的又一個致命問題。

(4)面臨地方造反的現實威脅

第四，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佈滿了諸侯、藩鎮、軍閥割據混戰的記載。實行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而權力爲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方式，使中國社會形成了新的諸侯、新的藩鎮、新的軍閥雄踞之勢。如果說，在過去的時代裏，這種局勢曾是動亂的根源的話，那麼在反修防修的歷史任務已經明確，在毛主席已經發出了要地方監督中央，中央出了修正主義

地方可以造反的口號之下，這種局勢却有可能轉化成爲粉碎修正主義篡黨奪權陰謀詭計的積極因素。每塊政治、經濟、文化結構完整的地盤，都有可能變成一個現成的革命根據地。這是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所面臨的一個潛在的危險。

（5）在國際交往中承受着世界民主潮流的衝擊

第五，在生產關係阻碍了破壞了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下，即使修正主義通過出賣中國的資源和工業原料換來了大量外滙，但爲了保持政權，也要以相當部份花在消費上，投入再生產的資金是有限的。不但中國人不容許把中國重新淪爲半殖民地任憑官僚主義者階級出賣國家資源做工業國的附庸，而且國際競爭勢必把中國拋在後頭。這種狀況也必將影响和改變國內結構。當今的世界，民主是主流，反民主是逆流。人權運動已在蘇修及東歐一些國家的後院裏，逞現出風起雲湧之勢的前兆。隨着國際交往的擴大，人民的視野也在一天天開闊起來，隨着文化科學技術的普及，人民的耳目也越來越靈，思想也越來越發達。國際民主潮流勢必在世界上最不民主的地方，引起最强烈的反响。這是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所面臨的又一挑戰。

（6）人民決不會容忍下去

第六，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的厄運，最重要最本質的一個原因是修正主義路綫本身所具有的反動性和反人民性。修正主義路綫不是使又路口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得到趨向光明的解脫，而是使這個矛盾趨向黑暗的惡化。因而它不得不繼續接受這個基本矛盾的支配和更爲嚴峻的挑戰。它把公有制社會生產變成了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制生產，它用强力推行一條特權專制的路綫，利用勞動力還具有的商品屬性，鼓吹“土豆燒牛肉”的福利主義，以小恩小惠爲誘餌，蠱惑人心，“用暫時改善工人生活條件的方法來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馬恩選集》一卷385頁）從而實質上加固勞動者無條件絕對服從物的奴隸地位。也就是說，修正主義路綫恢復勞動力商品性質的活力，是爲了將勞動者的主體意識和主體地位，則決定性地要予以毀滅！修正主義路綫的反人民性和反動性，決定了它必然遭到具有反修防修意識的全體人民的自覺的反對和堅決的抵制，這是毫無疑問的。

(7)迴光返照不久長

總而言之，任何欺騙都是不能持久的。修正主義在今日中國所面臨的命運，絕對不是什麼幸運，而肯定是厄運。在今日中國，修正主義即使上了台，其統治也是不能長久的。它的“一下子”得逞於一時，不過是預示着它的必然頃刻瓦解。愚蠢昏昧的人迷信於眼前，智慧明達的人都着眼於未來。修正主義制度不過是整個剝削階級制度的迴光返照。在今日中國，其做法有如封建的社會主義，其前途也將有如封建的社會主義——“爲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着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馬恩選集》一卷274頁）還是毛主席那句話：“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代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決不會容忍的”！

三、(略)

四、生死關頭兩條路綫的殊死搏鬥

1. 勞動力性質是社會性質的標誌

作爲人的體力和腦力總和的勞動力，在任何社會裏都是生產的基本因素。沒有勞動力的參與，就沒有任何生產活動。同樣重要的是，勞動力性質的變化對社會性質的變化具有强烈的敏感的反映。資本主義將勞動力變爲商品，不將勞動力變爲商品，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和壓迫方式就不能存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體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當做商品出賣的基礎上的。”（馬克思：《資本論》一卷471頁）修正主義將勞動力的所有權從勞動者身上剝奪，使勞動力變爲官僚的無條件絕對服從物——奴隸，不將勞動力變爲官僚的無條件絕對服從物，修正主義的法西斯特權專制的超等奴役壓榨制度就不能建立起來，修正主義制度的生產就是奴隸制度的生產。在這種生產體系中，“奴隸的强制性勞動成了整個社會和上層建築所賴以建立的基礎。”（《馬恩選集》四卷164頁）共產主義將勞動力變爲主體，不將勞動力作爲主體解放出來，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宏圖就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共產主義“代替哪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

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恩選集》一卷273頁）

由此可見，勞動力性質是社會性質的標誌。掌握這一原理，對於認識社會主義時期路綫鬥爭的實質，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2. 圍繞着解放勞動力還是奴役勞動力而展開的兩條路綫鬥爭

（——關於社會主義的基本的經濟規律）

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力的矛盾混合物性質，充分表明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正如同社會主義在叉路口徘徊那樣，勞動力一直在自覺不自覺地尋找解脫自身矛盾的出路：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兩條政治路綫的鬥爭，就正是緊緊圍繞着這一點而展開的。究竟是把勞動力的矛盾混合物性質淨化爲主體性質，還是惡化爲奴隸性質？究竟是把社會引向眞正的完全的社會主義，從而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境界過渡，還是把社會推入修正主義的黑暗深淵？這就是兩條路綫鬥爭的實質。由於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舊有形式已經很難恢復，由於社會生產的高度組織化，勞動力也很難倒退到純粹商品性質的狀態。在這個時候，勞動力的本能是强烈要求確立自己的主體地位，擺脫矛盾混合物的處境。而統治階級——官僚主義者階級及其所掌握的上層建築却要根據其自身的利益和慣性，把勞動力完全淪爲官僚的奴隸以便於驅使。這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階級基礎。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一切以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爲依歸，不但在意識上，而且在生產上、分配上、社會上都切實地、而不是虛僞地確立和增强勞動力的主體地位，這就是堅決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和按勞分配的原則、不斷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解放勞動者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路綫。實行這條路綫，終將要取消勞動力的商品屬性，但是在社會主義階段雖限制却也仍承認勞動力的商品性質，而不是就否認它或擴大它。這條路綫，對勞動力的無條件絕對服從官僚的奴隸性質，則是決定性地要加於根本否定。這條路綫的革命性和人民性就在這裏。在這條路綫的指引下，社會主義的基本的經濟規律，就不但是只着眼於生產工具，“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方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

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單行本31頁）而且更重要的是着眼於掌握生產工具的生產力的首要因素勞動者的身上，用自由的熱情的勞動代替强制的被迫的勞動，用解放勞動者的方法解放生產力，努力使勞動者眞正成爲社會的主人、國家的主人、生產資料和生產活動的主人——即通過勞動者民主自治，用不斷實現更高的社會勞動組織，不斷採取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不斷發現，不斷採用新的科學技術生產手段，不斷加强國家計劃經濟和社會自治市場經濟的科學結合，不斷吸引勞動者參與政治完善按勞分配管理科學化的方法，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創造眞正爲人民、爲勞動者自己所有的雄厚的社會物質基礎。與此相反的，就是修正主義反革命的路綫修正主義路綫及其基本的經濟規律，我們在前面已經多所闡述，在此即不贅言。必須指出：勞動力的矛盾混合物性質，是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路綫和修正主義路綫的鬥爭的根源。只要勞動力這種矛盾混合物的性質存在一天，馬克思主義路綫和修正主義路綫的鬥爭，就不會有一刻的停頓。這種兩條路綫的鬥爭，將始終貫穿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

3. 不利於革命的鬥爭形式

但是，路綫鬥爭又集中表現在權力之爭上。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的特點，決定了權力之爭的重要意義：壟斷政權就能壟斷一切，誰掌握了權力誰就掌握了鬥爭的主動權。既然整個國家的軍、政、財、文大權都已統統高度集中於共產黨、爲共產黨所壟斷，既然早已排除了另外的政治組織通過合法的途徑與共產黨爭權的可能和存在的餘地，鬥爭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集中到執政的共產黨內來。共產主義事業、無產階級的發展，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在內部的鬥爭中實現的。（《馬恩全集》35卷380頁）共產黨在未取得政權之時已是如此，共產黨在長期固定化壟斷執政後更是如此。權力愈重，利害關係愈大，爭奪權力的鬥爭也就愈尖銳。馬克思主義路綫的階級力量在於以無產階級爲首的廣大勞動人民。修正主義路綫的階級力量在於當權的官僚主義者階級。但是，共產黨內的權力之爭不

是訴諸於人民的裁決，而是決定於其上層內部的傾軋。誠然，共產黨是一個有革命理論信念、推崇馬克思主義的黨，是一個具有革命遺傳的黨，特別是當黨的領袖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黨內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力量定會堅決抵制修正主義，抵制官僚主義者階級。但是，畢竟由於少數人長期强制性固定化壟斷權力，已使黨發生了變化，階級關係發生了變化。黨內當權人物置身在權力的特效腐蝕劑中，其中的一些人，已經被腐蝕蛻變成了官僚主義者。正是他們形成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這個官僚主義者階級養尊處優，不讀書、不勞動、不調查、不研究，高高在上，脫離人民，脫離實際，做官當老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恩選集》二卷 82 頁）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既得的特殊利益、特殊地位，使他們早已背叛了馬克思主義。這些官僚主義者奉權力爲偶像，迷信權力，崇拜權力，唯權力是從，他們的信仰就是權力，就是權力拜物教，他們是標準的權力至上主義者。他們的階級性無比貪婪、無比兇狠、無比陰險。他們的眼界毫無歷史感，近視而無遠見，昏昧而不能明察。爲了奪取權力，他們會不惜一切，任何卑鄙無耻的事都幹得出來，任何陰謀詭計都會使出來地去謀權、篡權、奪權，使權力之爭具有了極不平常的險詐性和殘酷性。正因爲黨內這種狀況，正因爲權力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的整個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本能趨向於搞修正主義，正因爲國民經濟陷入了停頓和瀕臨崩潰，正因爲修正主義上台有了可乘之機，正因爲剝奪了廣大勞動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力和條件，正因爲不同意見沒有公開發表、討論和試驗的餘地，正因爲量變的積累必然導致質變，等等，所以至使社會主義在叉路口邁出決定性的最後一步時，革命力量在黨內的權力鬥爭中肯定是處於劣勢的地位。鬥爭形式極其不利於革命。顯然，在這樣決定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不直接訴諸於人民，如果不立即果斷地訴諸於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社會主義的危機和修正主義的上台，都是在所難免的。

第八章　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歷史的必然趨勢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兩個階段

綜上所述，“這是兩種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經濟運動，另一方面是追求盡可能多的獨立性并且一經產生也就有了自己的運動的新的政治權力。總的說來，經濟運動會替自己開闢道路，但是它也必要經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且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即國家權力的以及和它同時產生的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馬恩選集》四卷□□頁）這種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作用和反作用，構成了生產方式的內在的基本矛盾，決定了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經歷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經濟基礎變更的階段，即對生產資料進行公有制改造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上層建築變革的階段，即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級。從時間上說，第一個階段在中國大約從一九五三——一九六三年，相當於互助合作化、公私合營運動到人民公社化及爲鞏固人民公社而鬥爭的這段時間；第二個階段在中國則是以對蘇聯論戰爲起點，以一九六六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爆發爲標誌展開來的。

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由來

反修防修實質上就是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運動進行到底，就是要堅持在社會主義革命第一階段勝利的基礎上繼續革命。無產階級只有從對私有制的部份勝利中解放出來，才能從私有制的全部鎖鏈中得到解放。在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後，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也必須加以改革。“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馬恩選集》二卷83頁）從這個意義上說，一九六六年爆發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不是個別人物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中國在一九五六年對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後的必然發展，是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已經或慢或快地發生了變革的開端，而不是結束。

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局限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偉大的歷史功績，我們在上面《中國處

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等節裏，已經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爲整個上層建築發生變革的開端，在具有“開端”的偉大意義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開端”的局限。

這種局限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其一是指導思想對社會主義革命第一階段所形成的新的生產方式內在的基本矛盾認識不清。雖然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已經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生產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但沒有就特殊性具體指明是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和什麼樣的上層建築、什麼樣的生產力和什麼樣的生產關係的矛盾。而這在當時是不能苛求的。其二是只在既成形式的框子內尋求改變，而沒有突破既成形式的框子去進行變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針對權力爲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這個上層建築最根本最主要最致命的弊病。或者說，只是針對了這個弊病的表像，而沒有針對這個弊病的病根；只針對“走資派”，而沒有針對產生“走資派”的根本的眞正的原因。一如從前，“以往的批判與其說是針對着事態發展本身，不如說是針對着所產生的惡果。”（《馬恩選集》三卷66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展開的“文藝革命”“衞生革命”“教育革命”“國家機關的改革”“上海一月風暴”以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等，統統是在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權力的支配下進行的。

這種局限，決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儘管顯示了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民主要求，儘管顯示了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影子（例如從舞合上驅逐帝王將相，工人階級登上上層建築等等），但畢竟還未能夠完成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任務。

這種局限，決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是反映了上層建築發生變革的意向和要求，而根本滿足不了這些要求，更爲嚴重的是，不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反而使這些“革命”“改革”“限制”等等，弊病橫生，造成了舊東西在新形式中復活的方便條件。例如“教育革命”在權力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的把持下，就以“推荐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而言，從打破剝削階級一統天下的正確的革命的願望出發，結果却淪落到了新的剝削階級——官僚

主義階級營私舞弊塞私人走後門的境地。在權力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的把持下，推薦和選拔的新形式，充滿了官僚主義者階級玩弄特權“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鷄”的舊貨色！又例如“衞生革命”，向改變城市大老爺衞生部的革命目標前進的步伐，結果却在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權力的領導下，踏入了城市大小老爺合伙營私舞弊服務部的泥沼，在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控制下，從“赤脚醫生”的人選，到治病發藥，不少合作醫療實爲“官醫”，而且變成了合法走私的“醫院商店”，帳目不公開，藥品囤積居奇，據爲己有，投機倒把，甚於奸商。如此等等。

在總問題沒有解決、總根子未曾觸動的情況下，一切改革都是虛話。陳舊的東西不但會力圖在新形式中復活，而且簡直是在新形式的軀壳裏找到了最適宜生存的條件。

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結論

但是，畢竟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本質是革命的，畢竟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千百萬人民羣衆曾經積極參與和投身的大規模的羣衆運動，畢竟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經歷了一系列反復、曲折和驚心動魄的鬥爭，深入持續達十年之久，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得以暴露了現有生產方式內在的基本矛盾，展現了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廣闊的前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對黨的神化，撕開了假社會主義的面紗，激化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有力地証明了馬克思的論斷：“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級，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馬恩選集》第二卷82—3頁）少數人對權力的强制性固定化壟斷，把私有制管理的專制形式膨脹爲極端專制的新的特權壓榨手段，强加於公有制社會生產，嚴重地阻碍了生產力的發展，以致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尖銳矛盾已經重申：“要不是每一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

馬恩選集》三卷332－3頁)公有制社會當務之急，就是要盡快改變在起關鍵性作用的權力分工方面的嚴重弊病，權力分工必須由絕大多數人即由整個勞動人民來左右。爲着謀取整個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必須首先爭取使每個社會勞動力都得到解放。“生產者的政治統治不能與他們的社會奴隸地位的永久不變狀態同時并存。”（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見《論巴黎公社》第56—7頁）尤其嚴重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毫不含糊地揭示了：應當打碎從前的官僚軍事機器，“舊政府權力的合理職能應從妄圖駕於社會之上的權力那裏奪取過來，交給社會負責的公僕。”（同上55頁）“再不應該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裏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裏。”（《馬恩選集》四卷392頁)再不應該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走資派手裏轉到跑資派手裏了！再不能把權力讓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下去了！這種壟斷，已經形成了更無人道的新的階級分化，已經形成了更貪婪、更狡詐、更毒辣的新的剝削階級，已經形成了更黑暗、更殘酷、更罪惡的新的剝削制度！“不消滅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種奴役制都不可能消滅。”（《馬恩選集》一卷15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結論是：社會主義革命第一階段生產力的發展形式，已經變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第二階段生產力的桎梏；要改變這樣的生產關係，要建立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必須打碎舊的官僚軍事機器和權力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的體制；必須打碎神化，把奴隸總管黨變成奴隸工具黨；必須“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鬥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論巴黎公社》136頁）必須健全法制、還我人權；刻不容緩的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必須積極進行！

五、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工作的完成

1. 一般準備

“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爲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馬恩選集》二卷83頁）

社會主義革命第一階段所確立的公有制社會生產，已爲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奠定了經濟基礎。

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社會生產，已爲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作好了組織準備。

權力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所造成的惡果和激化的矛盾，已爲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了革命的對像和動力。

生產的發展，科學技術教育的普及，已爲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了一定的必要的文化水平。

《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一百多年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十月革命以來近六十年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尤其是蘇聯變修的慘痛的教訓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反兩個方面的寶貴經驗，大大的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寶庫，爲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規律，爲發展無產階級專政及反修防修的理論，提供了充分的事實和有力的依據。

2. 主動因素

尤其重要的是所有這一切極大的提高了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確立，使無產階級從生產資料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這次解放使他們充滿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希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開展，則是使無產階級從思想的牢籠裏又獲得了解放。這次解放使他們堅定了必須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念，使他們逐步認清了科學社會主義和封建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等形形色色假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使他們逐步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鬥爭的重大的歷史意義，使他們對新的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具有了皮和肉的感覺。麻木中的痛苦不痛苦，感覺到的痛苦更痛苦。過去的痛苦只留下了疤痕，現實的痛苦却刺激着每一根神經。無產階級從喪失一切、固定化沒有一切中，認識到了他們更徹底地被剝奪，因而準備更徹底地剝奪剝奪者。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胸膛裏充滿了仇和恨的怒火！無產階級已經看清必須進行第二次更猛烈的血與火的清算的對象，已經不是從前的剝削，而是如今的剝削！無產階級已經不是從感性、不是從宣傳中得到啓發，而是從自

身的政治實踐經驗的感受中，更爲牢固地掌握了眞理："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都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馬恩選集》一卷385頁）

3. 所有現存社會制度都在鑽牛角尖

與此同時，整個世界形勢和國際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社會主義的苗頭在資本主義世界、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或半殖民地半封建主義的國家裏醞釀着破土而出的時候，社會主義革命却在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裏遭到了窒息和扼殺的命運。資本主義世界在炫耀其"民主、自由"的時候，却遭到了剩餘價值理論和人民革命的無情挑戰，修正主義國家在大談其"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時候，人權運動却揭露了它的殘酷和黑暗，暴露了它和人民尖銳對立的困境。在"社會主義到處都在勝利前進"的樂曲聲中，却聲聲聽得出修正主義鬼魂的哀嚎。整個世界的現存社會制度都在其自身內在的弊病支配下鑽牛角尖，走死胡同。因而整個世界都在渴望、都在等待新生命的出現，都在孕育着新生的生命。而戰爭的陰影，使這種渴望和等待變得更爲迫切，使這種孕育更加日益臨近分娩之期。中美關係的解凍固然在美國掀起了中國熱，可是在中國難道又沒有打開向外窺探的窗戶？當中國的驚人事件在世界面前接二連三出現的時候，中國人難道對美國總統尼克遜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辭職不感到有點什麼值得探討嗎？……

4. 被動因素

但是，這一切還不是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工作的全部完成。革命需要主動因素，同時，革命也需要被動因素，在"浮誇的空話同實際上的猶豫不決和束手無策相混雜，熱烈謀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陳規的頑固積習相混雜，整個社會表面上的協調同社會各個成份的嚴重的彼此背離相混雜"（《馬恩選集》一卷609頁）的局面下，無產階級只有從一系列探索的失敗中，才能認準解放

的唯一道路。“但是，在這些失敗中陷於滅亡的不是革命。陷於滅亡的是革命前的傳統的殘餘，即那些尚未發展到尖銳階級對立的地步的社會關係的產物。”（《馬恩選集》一卷 393 頁）陷於滅亡的是那些在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旗幟樹立起來以前，謀求出路的矛盾混合物所沒有擺脫的一些人物、幻想、觀念和方案。無產階級只有擺脫這一系列應當擺脫的東西，才能夠聚集到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旗幟下來。而無產階級要擺脫這種東西，只有通過實踐，只有通過一連串的失敗才能使它擺脫。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工作的完成，同樣并不是由於這個革命已經“獲得了直接的悲喜劇式的勝利，而是相反，由於它產生了一個團結而堅强的反革命，產生了一個敵人，而主張變革的政黨只是在和這個敵人的鬥爭中才發展成了眞正的政黨。”（《馬恩選集》一卷 393 頁）當着修正主義的放肆的欺騙宣傳和瘋狂的恐怖政策越來越使人民不堪忍受的時候，當着人民普遍認識到“如果一個政黨的全部本錢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馬恩選集》一卷 501 頁）的時候，當着修正主義上台對於執政的共產黨的廣大黨員都已不是什麼秘密的時候，當着既要打着紅旗就不得不受紅旗的緊箍限制而生產力更深地陷入矛盾之中不能得到解放的時候，當着統治集團內部許多成員也越來越厭煩，越來越不能接受“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見與反覆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8 頁）的專制體制的時候，當着重新分配政府要職的把戲使統治集團的內訌加劇的時候，當着革命的領導權已經由改良主義者手裏轉到馬克思主義者手裏的時候，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準備工作全面的完成了！

5. 必然的東西一定會成爲現實的東西

總而言之，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乃是社會主義現存生產方式決定的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乃是國家現代化建設及反修防修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必然發展。必然的東西一定會成爲現實的東西。“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來臨，像新的危機的來臨一樣

，是不可避免的。”（《馬恩選集》一卷488頁）任何企圖阻止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到來的行動，都是反動的行動，徒勞的行動。無論專橫的螳螂們花崗岩般頑固的頭腦有多麼大，不可一世的手臂有多麼粗，在歷史車輪面前，螳螂畢竟是螳螂！任何妄圖阻擋歷史車輪前進的螳螂，定將被歷史車輪無情的輾碎！這難道不是必然的嗎？“把革命的發生歸咎於少數煽動者的惡意的那種迷信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任何地方發生革命震動，總是有一種社會要求爲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這種要求得到滿足。這種要求也許還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覺到，因此還不能立即得到勝利；但是，如果企圖用暴力來壓制這種要求，那只能使它愈來愈强烈，直到最後把它的枷鎖打碎。”（《馬恩選集》一卷500-1頁）——恩格斯的這段話不是把這種必然性說得很明確了嗎!? 請記住：對於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表達出來的這種新的社會要求，這種歷史的必然性，如果企圖用暴力來壓制這種要求，那只能使它愈來愈强烈，直到最後把它的枷鎖打碎！事情正是這樣，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必然的東西一定會成爲現實的東西！

第十章　無產階級民主制度

一、(略)

二、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政黨

1. 兩黨制

爲了確保馬克思主義的成文憲法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使之成爲國家眞正的最高主宰，就必須使共產黨成爲忠實執行憲法的工具，而不能成爲任意玩弄和篡改憲法的老爺，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廢除共產黨一黨制，而確立共產黨的兩黨制。

在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兩黨的組織領導主要通過它們自己的出版物（書籍、報刊、雜誌等）來體現，兩黨的黨員不固定，用以打破黨派成見。你今天擁護甲黨的主張即可爲甲黨黨員，明天擁護乙黨的主張即可爲乙黨黨員，任何人不得非難。兩黨的常

設機構主要是報刊編輯部。經費由國家平等提供、監督使用，兩黨負有爲國家提出行政正職領導候選人供人民選擇的責任。政權由經過普選証明爲大多數擁護的黨來掌握。

在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下，任何不信仰、不遵守、不服從馬克思主義成文憲法的組織、黨派，都必須堅決取締。但是這種取締是由於馬克思主義顚撲不破的眞理得到了一個充分貫徹執行的合理環境而自我形成的。在陽光之下，螢火蟲沒有市場。

2. 兩黨制的好處

"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鬥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眞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醜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毛選》甲種352頁）兩黨制爲這種比較和鬥爭，提供了一個合理的形式。與執政黨相反的意見及不同的看法和主張，都有公開表達、討論和試驗的條件和場所，而成文憲法又使執政黨和在野黨的意見、看法和主張都統一在一個正確方向和基礎之上。在這樣的民主和法制下，讓謬誤得以公開暴露，而使謬誤失去了藏身之地，讓爭論由人民，由憲法，由理智來裁決，而不是訴諸於强權，從而使爭論確立眞理而不是導致謬誤。因而，兩黨制能夠使革命合法，使眞理受到尊重，使籠罩着一黨制權力之爭的罪惡的黑暗的無耻的陰謀詭計絕跡。兩黨制是監督政府行使職權，使當權人物不得濫用權力，使錯誤路綫能夠得到及時的和較爲順利的糾正的有效的方法，是防止執政的共產黨蛻變爲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奴隸總管老爺黨的一個有力的措施。

3. 兩黨制的歷史淵源

歷史雄辯的証明，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實行的資產階級兩黨制，是鞏固資產階級統治的極好的方法。美國尼克松水門事件已足夠發人深思，促人反省，是什麼使美國總統不能濫用職權，是什麼使資產階級的總統只能效忠於公職而不能違法循私，是什麼使權力很大的總統不能不辭職？不正是由於資產階級的民主和

法制嗎？不正是由於在這種民主和法制之下實行了兩黨制從而使資產階級的政黨只能作爲資產階級的工具而不能作爲資產階級的主宰的緣故嗎？更不用問日本爲什麼發展得這樣快，田中爲什麼也無獨有偶會步尼克松的後塵辭了職等等。資產階級兩黨制的形式，是歷史積累的結果，它能夠有效地動員整個統治階級的力量，使統治階級內部能互相制約、監督從而使公職人員難以擴大特權難以官僚化，因而對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緩和統治階級內部及其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促進國家機關的新陳代謝等等，是有利的。在這裏是形式幫助了內容，在另一方面是內容決定了形式。無產階級能夠將資產階級專政的軍隊、警察、監獄等等一套學來，爲什麼就不能把兩黨制也爲我所用呢？

4. 兩黨制的理論依據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都充分肯定了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作用，但是，也都沒有說過無產階級只能有一個政黨。世上沒有獨翅能飛的鳥，也沒有獨脚能跑的人和獸。關於無產階級也完全可以實行兩黨制的理論根據，我們還不必就拿一分爲二、對立統一、辯証法的原理來加以証明，也不必多做引述，只要指出這一點來就足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名的《共產黨宣言》中，明明白白地寫道："共產黨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馬恩選集》1卷264頁）這難道還不夠權威還不夠明白嗎？請回過頭去認眞研究一下第九章吧！

爲什麼無產階級就只能有一個政黨呢？爲什麼一定要"把一切都攪在一鍋稀里糊塗的粥裏"呢？須知"這鍋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每種成分正因爲是在一鍋裏，就會陷於更尖銳的對立之中……正因爲如此，最大的宗派主義者、爭論成性者和惡徒，"尤其是立意搞修正主義專門玩弄陰謀詭計的政治騙子，更能"在一定的機會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團結。在我們的一生中，任何人給我們造成的麻煩和搗的鬼，都不比這些大嚷團結的人更多。""不要讓'團結'的叫喊把自己弄糊塗了。"（均見《馬恩選集》四卷410頁）

至於如何對待從前曾經起過重大作用、作過巨大貢獻的黨，

馬克思所創立、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持的第一國際，曾經“奠定了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使工人做好向資本進行革命進攻的準備。”（《列寧全集》79卷74頁）但是，當“它的舊形式已經過時了”（《馬恩選集》四卷413頁）的時候，恩格斯却毫無纏綿之情地寫道：“舊國際就完全終結了，這很好。”（《馬恩選集》四卷412頁）對此，恩格斯還說：“任何政黨的領導都希望看到成功，這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些情況下，需要有勇氣爲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犧牲一時的成功。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政黨，它的最後的成功是絕對不成問題的，它在我們這一生中並且在我們眼前已獲得了如此巨大的發展，所以它決不是始終無條件地需要一時的成功的。以國際爲例，它在巴黎公社之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嚇得要死的資產者認爲它是個萬能的東西。國際本身的大批成員認爲，這樣的情形會永遠繼續下去。我們深深地知道，氣泡是一定要破滅的，什麼亂七八糟的人都鑽到國際裏來了。它裏面的宗派主義者已經有恃無恐，濫用國際，希望會容許他們去幹極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我們沒有容忍這種情況。我們很清楚，汽泡總有一天是要破滅的，所以我們盡力不使災禍拖延下去，而使國際純潔無瑕地從這個災禍中脫身出來。汽泡在海牙破滅了……不過，老黑格爾早就說過：一個政黨如果分裂了並且經得起這個分裂，這就証明自己是勝利的政黨。無產階級的運動必然要經過各種發展階段，在每一個階段上都有一部份人停留下來，不再前進。僅僅這一點就說明了，爲什麼“無產階級的團結一致”實際上到處都是在分成各種不同的黨派的情況下實現的。”（《馬恩選集》四卷410-412頁）

5：兩黨制的現實苗頭

其一是，在公有制未確立的好些地方，在同一國家未執政的共產黨旁邊——特別是自從中蘇論戰以來——出現了一個或幾個（馬列）共產黨組織。

其二是，在公有制確立以後的國家裏，在執政的共產黨內部，都發生了從上到下的派系鬥爭，並且這種紛爭只有越演越激化下去使黨面臨解體的迹象。中國共產黨內部近十年來的巨大分歧和殊死搏鬥，不但一直存在着兩個司令部，而且純粹從上到下就

存在着兩大派別，現實尖銳對立的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和自己現存的階級地位，注定了現存共產黨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分裂，與其讓宮廷黑幕內的陰謀詭計來殘殺爭奪，毀滅革命完成這種分裂。不如在大庭廣衆光天化日之下，光明磊落地申訴情由發表意見，由公民投票來判定是非，來決定誰該下野使革命合法化。

其三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羣衆基本上都分裂成了兩大派，這決不是偶然的，同樣是現實階級關係變化的必然反映。除了階級關係根源之外，兩派成見之深，反映了未經人民表決的自信，兩派武鬥，反映了缺乏能令人信服的解決爭端的民主制度的困惱。

其四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委員會的產生，除軍隊代表由上級機關調配外，幹部代表和羣衆代表均係兩派羣衆推薦。但是這種推薦仍是在一黨制的框子之下進行的，人選集注在是否黨員，家庭出身是否過得硬上。並且，它不是讓取得大多數人民擁護的代表結成責任領導班子，而是讓兩派對等的代表捏合在一起，互相扯皮，互相緊盯，做不成多少眞正爲人民服務的事情。（從而使政權仍然沒有獲得根本性的革命改造，離心離德，效率之低，成了難免之事，但是革委會由兩派羣衆推薦產生，畢竟是具有兩黨普選制迹象的一個表現。）

其五是，文化大革命中"五七"幹校的出現，更是無產階級兩黨制在現實生活中露出來的苗頭。這不單單是一個幹部隊伍臃腫龐大過剩的表現，而且簡直明明白白是共產黨幹部一部份在朝，一部分下野的狀況。不過這種在朝與下野，都不是由人民決定，而是由黨內的當權派決定的罷了。至於說到勞動鍛煉的問題，在一黨制下，這種下野鍛煉的方式，仍然遠遠脫離人民，不是到人民中與人民同甘共苦，而是遠離人民住進了特殊莊園，等等。

總而言之，"不從根本上開始革命，就不能完成革命。"（《馬恩選集》一卷15頁）無產階級兩黨制作爲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的一個組成部份，正如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一樣，一定會成爲現實的東西。無產階級完全有理由、有能力

掌握兩黨制，運用兩黨制。無產階級再也不能容忍任何政黨把自己的宗派利益，小集團利益，凌駕於整個公有制社會人民的利益之上了。無產階級只有從政黨的奴役下解放出來，才能解放全人類，而馬克思早就說過，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

三、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權力基礎

在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的成文憲法就是國家的最高領導的話，那麼，每個勞動者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人民民主共和普選制，則是整個國家權力的基礎。在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國家主權就是以無產階級爲首的全體勞動人民自身。一切權力機構的產生和法律的制定，以及當權人物的任免，都必須徵得勞動者大多數的同意和批准。

馬克思指出："工人們要求共和制，已不再把它當作舊的階級統治者制度的一種政治變形，而是把它當做消滅階級統治本身的革命手段。"（《法蘭西內戰》，見《論巴黎公社》198頁）

恩格斯指出："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馬恩選集》四卷169頁）"民主已經成了無產階級的原則，羣衆的原則。即使羣衆並不總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這個唯一正確的意義。但是他們全部認爲民主這個概念中包含着社會平等的要求，雖然這種要求還是糢糊的。"（《馬恩選集》二卷□□頁）"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馬恩選集》四卷508頁）"毫無疑義的是，我們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這種民主共和國甚至是運用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特殊形式。"（列寧《馬克思主義論國家》單行本12頁）等等。

顯而易見，既然生產資料所有權已經屬於公有制，那末權力也就理所當然地應該名符其實地屬於人民！一切權力歸人民——這就是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權力機構所必須信守的原則。

四——七、（略）

第十一章　無產階級專政

———四、（略）

五、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

1. 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階段

當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階段，即上層建築進行社會主義變革的階段到來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階段也就到了。

這一階段和上一階段相比，客觀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是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這個階段，舊的經濟基礎已經變質，無產階級已經運用政權的力量，加速完成和初步鞏固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改造。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確立，社會生產的發展，社會意識的進步，都使以私人佔有爲特徵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難以簡單重覆了，而被推翻的剝削者地主資本家的生命也隨着時間的推移按照自然規律大批走進墳墓　並將完全地走進墳墓去了。剝削者已經變了樣。產生剝削的根子也變了樣。無產階級的主要敵人由在外部變成了在內部並且是在內部的領導核心。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對象已經由舊的剝削階級變成了新型的剝削階級——官僚主義者階級或稱黨內走資派。

因此，這個階段已經到了必須把馬克思關於不斷革命的社會主義、反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把現代社會理想化、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一切階級差別……主要在於不斷採取新的勞動組織和生產方式、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全面地貫徹和落實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的直接的目的和任務，是奪取反修防修勝利，砸碎權力極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這種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桎梏，打倒特權奴役，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變革上層建築，建立和健全無產階級民主制度，把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本義全面地落實到基層，落實到社會的各個方面，高速度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爲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雄厚的物質基礎。

與這個階段相適應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

在無產階級專政由低級形式轉變爲高級形式的過程中，必然同樣要經歷一個過渡程序。這個過渡程序就是無產階級民主革命。

如果國家政權在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無產階級專政的初級形式有可能直接轉爲和平地和順利的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反之，如果國家政權已經落到修正主義者手裏的話，那麼，要完成無產階級專政從低級形式到高級形式的過渡，其間必然同樣要爆發一場比從資產階級手裏奪取政權更爲複雜、更爲血腥和殘酷的武裝奪權鬥爭，開展更高一級的暴力革命。

2. 無產階級專政高級形式的特點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我們在第十章裏，已經作了一個大概的勾劃，其原因在以前的各章裏也已經加以闡述，這裏僅就其和初級形式相比的特點簡單說一下。

I 法 制

鑒於發展了的情況，鑒於必須保護社會主義經濟，鑒於必須防止社會主義公有制演變成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制，鑒於社會主義必須不斷革命，鑒於消滅一切階級差別……主要不在於暴力而在於採取新的更高的生產方式，鑒於舊的剝削階級分子雖然逐漸死亡，但舊的剝削階級的影响和殘餘還存在，鑒於資產階級法權和小生產的存在，鑒於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存在，鑒於新型的剝削階級官僚主義者階級和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的不斷出現，鑒於決不能聽憑官僚一己的喜怒好惡顚倒是非爲所欲爲，鑒於對特權濫用暴力的情況應當消除，所以必須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整套成文法及其權威。馬克思主義法制的根本點在於使革命合法化，保護不斷革命，保護社會主義經濟，保護反對把任何現代社會理想化而不斷謀求採取新的更高的生產方式的革命行動。

II 民 主

鑒於必須消除任命制、等級制、國家機關自治化、神化黨所構成的容易滋生修正主義的上層建築的特殊腐蝕作用，鑒於權力

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的生產關係非變革不可，鑒於馬克思主義隨着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而得到的普及和有了更廣泛深入普及的基礎和條件，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階段，用無產階級的兩黨制代替了一黨制，從而使政黨變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黨，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特權老虎屁股黨，居於國家最高領導核心地位的是馬克思主義成文憲法，權力則來源於無產階級民主共和普選制，等等。無產階級民主的根本原則在於落實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使整個無產階級通過自己而不是通過老爺眞正地直接地當家作主，解放勞動者，解放生產力。

II 分權專政

鑒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階段，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第二階段革命的主要敵人不但產生於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權力的生產關係，而且，產生於集權專政的權力結構及其導致的特權對當權者的特效腐蝕性，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與其初級形式在權力結構上正相反，它不再是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權力的情況下以權治世，使立法、行政、司法主權歸於一身集權專政，而是在馬克思主義法制的統一下，以權治權，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離，分權專政。無產階級分權專政的根本目的在於消滅一切階級剝削，防止權力特殊化，防止國家權力機構按照慣性走向人民的反面官僚化，用以保障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的民主和自由。

IV 人權保障

鑒於無產階級民主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生命，鑒於對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基本人權的保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十分必要的和基本的條件，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無產階級民主的上層建築的建立，使無產階級專政高級形式下的公民，能夠眞正地、廣泛地、愈來愈充分地享有民主和自由，無產階級人權保障的根本方向在於確保勞動力徹底擺脫矛盾混合物地位，消除商品性質和奴隸性質，牢固地確立主體地位。

總之，一句話，無產階級民主制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全面體現着馬克思主義的法制、民主、分權專政、人權保障，這些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基本內容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高級形式的主要特點。

3. 斥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狂吠

Ⅰ—Ⅲ　（略）

Ⅳ　駁所謂"都是資產階級那一套"

什麼"法制、民主、分權專政、人權保障都是資產階級那一套"，對你們這一胡說最好的回答就是馬克思的這句話："新的歷史創舉通常遭到的命運就是被誤認爲是對舊的，甚至已經過時的社會生活方式的抄襲，只要它們稍微與這些形式有點相似。"（《論公社》55頁）告訴你們，正因爲無產階級的法制、民主、分權專政、人權保障和資產階級的法制、民主、分權專政、人權保障"形式有點相似"，所以才成其爲進步，才成其爲新的歷史創舉！因爲這樣正符合事物發展是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螺旋形上升的辯証規律，正符合恩格斯所說："按本性說是對抗的、包含着矛盾的過程，每個極端向它的反面的轉化，最後，作爲整個過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馬恩選集》三卷180頁），正符合列寧稱爲"從並存到因果性以及從聯繫和相互依存的一個形式到另一個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在高級階段上重覆低級階段的某些特徵、特性，等等，並且""彷彿是向舊東西的回復"的"辨証法的要素。"（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單行本159頁）不錯，是同樣稱爲"法制、民主、分權、人權"，但一個是資產階級的，另一個則是無產階級的；一個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另一個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內容已經根本不同了！正如同無階級專政的初級形式必然有些"好像"封建專制一樣，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級形式也必然有些"好像"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這是歷史的辯証法，必然如此，難道你能根據"國家"一詞的相同，就把所有國家都歸爲奴隸主階級國家一類嗎？難道你能夠把共產主義的光輝未來和原始共產主義混爲一談嗎？

V　（略）

六、危險的關頭和極好的時機

一百多年來，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遭到了資產階級及依附於它們的走修正主義分子的瘋狂的攻擊、謾罵和反對，然而他們並沒有能夠阻擋無產階級專政前進的步伐。

但是，現代修正主義者即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掌權執政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却輕而易舉地做了資產階級和老修正主義分子極力想做而始終做不到的事情。

他們打着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運用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的國家機器專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的政，他們用典型的社會法西斯專政，即資本主義者階級專政，冒充無產階級專政，沾辱無產階級專政，糟蹋無產階級專政，把無產階級專政歪曲得面目全非，醜化得聲名狼籍。

他們這種造法對內所造成的直接惡果，就是把社會主義的國家演變成了修正主義的國家。事實已經証明，絕大多數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質上都已演變成了社會法西斯專政的修正主義國家。在這些國家裏，不要說無產階級革命的初步勝利旋得旋失，并且無產階級革命本身也已慘遭欺騙和屠刀的扼殺了，不要說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毀滅了，而且無產階級本身已更爲悲慘地沉淪在極端殘酷和野蠻的恐怖專政之下了！

他們這種做法對外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一方面使目前資本主義世界裏的勞動人民在比較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時候，往往會發生錯覺，把修正主義制度當成了社會主義制度，把社會法西斯專政當成了無產階級專政，從而使資本主義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開展，遭到了極大的阻碍。另一方面，高度集中、高度壟斷、高度組織的政經一體化社會生產的巨大生產能力和巨大競爭能力，對遭受到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工業國的掠奪、壓迫和剝削的國家，必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修正主義制度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專政，又正好適合這些國家充滿個人主義的資產階級、小資階級政治活動家個的胃口，他們十分樂意效法打着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利用本國已經具備的革命

條件，通過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大搞國家資本主義，在即成生產方式的推演下，爲謀取自己身家世襲特權地位，而把社會引向修正主義的黑暗深淵。在實力競爭空前激烈、生產壟斷非常必要的當今世界，將有爲數不少的所謂發展中國家與其說是在朝着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不如說是在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制度向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專政即社會法西斯專政的修正主義制度發展。這樣的發展，其實質就是把“民族解放運動”推入了超等奴役壓榨制度的死胡同，夭折無產階級革命運動。

顯而易見，在這種情況下，修正主義確實已使社會主義重新落入了空想之中，確實已使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生死存亡的危險關頭。在這個意義上，以官僚主義者階級爲其階級基礎的現代修正主義的一切活動的歷史罪惡就在於有可能將整個人類社會推進極端黑暗的修正主義制度、社會法西斯專政的時代，而把眞正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眞正的無產階級專政推遲到遙遠的將來。

但是，正在這樣嚴重的危險關頭，毛主席作了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

同時，整個世界歷史也已經發展到這樣的階段，即正如我們在第八章第五節第三段所述，全世界所有現存社會制度都因其自身內在弊病的惡化而在鑽牛角尖。

資本主義制度陷在生產的社會化和私人佔有的不相容性這一基本矛盾中，深受不斷爆發的同期性經濟危機的困擾，在剩餘價值理論和人民革命的打擊下，風雨飄搖。

叉路口社會主義制度陷在政經一體化公有制社會生產和權力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壟斷這一基本矛盾中，眼看着官僚主義者階級一步步全面篡奪黨和國家的權力，面臨變修的危險。

修正主義制度陷在社會主義招牌下的高度社會化生產和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制這一基本矛盾中，深受嚴重的同期性政治危機、內部僵化和人權運動的衝擊和威脅，外强中乾，隨時都面臨突然事件的爆發，搖搖欲墜。

并且，在這些社會制度下，以無產階級爲一方，以形形色色的剝削階級爲另一方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已經全面展開。無

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和鬥爭，在資本主義世界正越來越尖銳；無產階級和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矛盾和鬥爭，在叉路口社會主義世界更是達到了空前尖銳激烈的地步；無產階級和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矛盾和鬥爭，在修正主義世界裏正日益白熱化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并且，奉行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與國家彼此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使整個世界在矛盾鬥爭衝突的漩渦之中打轉，不得解脫。特別是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更是醞釀着新的世界大戰，而這新的世界大戰又完全是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水平上的新型戰爭。從而導致了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人類正承担着從來沒有過的巨大壓力，等等。

這一切，爲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奪取全世界勝利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和時機。

但是，停留在從前形式和水平上，是不能利用這樣的條件和時機的。

唯有無產階級民主革命能夠充分利用這樣的條件和時機。

無產階級專政初級形式和高級形式的闡明，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要建立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度，定將在全世界所有國家和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只有掌握了敵人的一切，才有可能消滅一切敵人。

要徹底剝奪剝削者，必須連同剝奪者的剝奪手段也一起剝奪。

（下面文字模糊，從略）

一九七六年五月定稿

七九年六月由北京《四五論壇》油印出版，即該刊第十期

徐水良

關於理論問題的問題

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卡·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甲問：我們倆人都不是「理論隊伍」中的人，但我個人很想搞清理論問題。我有許多問題搞不清楚，這些問題中，許多又是羣衆普遍關心的問題，我想向您請教，請您解答，可以嗎？

乙答：我學得不好，我們共同討論吧。

甲問：目前有許多人，例如我們工廠的許多工人，都說：「學理論沒有用，理論行不通。」或者說：「大道理不解決問題。」因此，許多人對學理論抱着懷疑的、消極的態度。我也碰到過一些知識份子，他們有的也這麼說，這話對嗎？

乙答：消極懷疑的態度，是普遍的現象嗎？

甲：是的。

乙：與其它地方的情況差不多。這種思想的產生，是某種現實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但是如果說，我們過去的某些理論有錯誤，行不通，這是事實。然而，決不能由此得出懷疑、否定一切理論的謬論，說學理論沒有用，理論行不通。某種理論行不通，僅僅說明它有錯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分析它的錯誤，找出正確的、「行得通」的理論。許多工人和其它羣衆這樣說，也同時是由於這樣一種情況：即我們理論界的理論（也即「大道理」），講的一會事，基層組織做的又是一會事。上述兩種情況，都只是說明我們的理論和實踐存在一定的距離，而不是說明符合實際的正確理論沒有用、行不通。

人們對過去的某些理論已發生懷疑（「行不通」），受到他們信任的、行得通的理論又沒有看到，理論上的懷疑和消極態

度的產生，也是必然的。

甲：唔，你的講話太大膽了，不怕打成反革命嗎？我勸你以後無論如何小心一點，不過今天只我們兩人之間，你就坦率地談一談吧，我保證保密。你說我們過去的理論有錯誤，錯在哪裏呢？

乙：謝謝你好心的勸告，這種勸告，已經有無數人對我說過了。但是，虛僞不是無產階級的本色，眞理是不能用斧頭砍去的，迫使人民羣衆虛僞的某些社會現實，最後終會被憤怒的人民羣衆掃除。

甲：大道理上是這樣，不過是小心爲好，要注意策略。

乙：對，要注意策略。

至於我們過去理論上的錯誤，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存在一個唯心主義的理論體系。主要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

甲：請你說具體一點，舉幾個例子說吧。

乙：譬如唯天才論、唯接班人論的錯誤，把防止復辟的問題歸結爲走資派問題，從而歸結爲「領導班子」問題的錯誤，把黨內兩條路綫鬥爭說成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錯誤，以及目前的唯法權論的錯誤等等，所有這些錯誤，以及其它未說到的錯誤，形成一個系統的唯心主義的體系。我們理論界的理論，往往建立在有關唯心主義錯誤的基礎上，有唯心主義的框框中轉圈子。

甲：啊！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說，希望你說仔細一點。

乙：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夠完成。」我們理論界的錯誤，也是一個歷史過程，是一個反覆認識，逐步走向正確、完善的認識過程中的錯誤過程。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以前，我們就已經開展了一些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開始，我們與蘇修產生了全面的分歧。正是在這個鬥爭中，我們發現了蘇聯黨的變修、國家的變色。這也就教訓我們：必須採取有效的措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正是在尋找資本主義復辟的原因、採取相當措施的過程中，我們的理論界除了找到許多正確的東西外，同時

也產生了一系列的錯誤。

順便說一下，我們這裏的敘述，採用習慣的用語和敘述方法，而不是採用嚴格的科學的用語及敘述方法，當我們走完過去理論界的認識過程，找到正確的理論，再回頭來闡述分析時，再採用系統科學的敘述方法，這一點，請您注意。

甲：你的意思是說，這裏的敘述是粗糙的，可能包含許多習慣上的錯誤，是嗎？

乙：是的。

當時發現，蘇聯變修是在赫魯曉夫上台以後——我這裏是按照當時的習慣說法，事實上變修的一切早在斯大林時代就準備好了，所缺的只是最高領導權的轉變，並在轉變以後對現實社會發生反作用，把變修的過程進行到底。——並且發現赫魯曉夫在變修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於是我們理論界的許多人認爲，蘇聯變修是因爲赫魯曉夫上台，因此，防止變修的問題，就是解決接班人的問題。這種理論，在文化革命中經過林彪一類的宣傳，幾乎深入到全國每一個羣衆的心中，我本人，就曾經是這種理論的信徒。然而這種理論，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天才論，並且，必須以赤裸裸的天才論來作它的哲學基礎。因此，我也曾經在這種天才論中掙扎，在這種唯心的天才論、唯接班人論的神秘主義中，徒勞無益地掙扎而無法擺脫。

然而，物極必反，林彪的自我爆炸，却迅速把廣大羣衆從這種天才論、唯接班人論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當驚呆的羣衆清醒過來的時候，林彪一伙掛在他們面前、並一度使他們深信不疑的唯天才論、唯接班人論的美麗幻景，也就迅速地被炸成迷霧而逐漸消散了。雖然天才論、唯接班人論的繩索或多或少地還束縛着他們中的許多人，但是，妄圖繼承林彪衣鉢的新官僚恢復天才論、唯接班人論的一切企圖都只是徒勞無益，並進步造成廣大羣衆的反感。批林批孔運動中，這些新官僚們在浙江等地方大肆宣揚並實踐這種唯接班人理論，大搞這批以接班人自居的新官僚們的法西斯專政，而在我們的報刊上，他們借古諷今等辦法，例如把秦皇朝的覆滅說成是趙高復辟、是接班人問題等等胡說八道，來大造爲他們篡權復辟服務的唯接班人論的謬論。然而，這種

做法注定是要失敗的，它受到廣大羣衆的蔑視和反對。浙江人民羣衆的勝利和新官僚們的慘敗，就是唯物主義的偉大勝利，是天才論、接班人論的慘敗。浙江人民對浙江新官僚及其後台的刻骨仇視和反抗，就是全國人民對新官僚們必然會採取的態度。

甲：你們南京造反派的情況怎樣？

乙：「造反派」不是一個階級；更不是鐵板一塊，有無產階級的眞革命派，有新官僚們的假革命派，甚至還有打着「造反」旗號反對現政權的地痞流氓的「造反派」。南京革命派和革命羣衆沒有兩大派對立的問題，比較一致，工人階級的階級本能比較突出，因此新官僚及他們的唯接班人論的認識也比較膚淺，感情上也不那麼恨。

現在我們繼續往下說。

社會問題當然不是一個人的問題。同時，由於社教運動和文化革命初期揭示了許多「黨內走資派」問題，在唯接班人論產生以後不久，也就產生了把變修原因歸結爲「走資派」問題，歸結爲領導班子和領導者問題的理論，這也就成爲文化大革命中，甚至直到現在，我們的許多報刊的理論基礎。這種理論，不過是前一種理論即天才論、唯接班人論的進一步擴大和貫徹，同樣是唯心主義的。我們的理論界對毛主席的有關指示作了完全錯誤的理解和解釋，他們不知道「走資派」是從現實社會中產生的，是現實的社會中一定的社會關係即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關係的產物，雖然反過來「走資派」，更正確地說，修正主義特權貴族、特權階層、特權份子也在一定的條件下，作爲決定的因素到加入復辟的過程中去。但是，如果我們把這種關係完全顚倒過來，把現實的社會關係即目前還存在的資本主義關係造成走資派這個決定的過程抹去，那麼，就只剩下了走資派對現實社會的反作用的過程，不是走資派由現實社會關係產生，而是現實社會關係（即資本主義）由走資派產生，即資本主義復辟是由走資派造成的，這就是我們報刊上的唯心主義理論。經過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理論在實踐經驗中失敗，從而導致廣大羣衆的懷疑或否定，也是必然的。「走資派」一旦離開它的現實基礎，就變成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也就誰也搞不清它是個什麼玩

蠢兒。如果我們保存產生走資派、即修正主義特權貴族的現實的社會關係、特權關係，那麼，打倒的是老的走資派、舊貴族，產生的則是新的走資派、新貴族。正像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在保存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的情況下，打倒舊的資本家，換上一批新的人來代替，那麼，社會決不會因此而前進一步，只不過是以新的資本家代替了舊的資本家。我們的新官僚們極力堅持這種理論，又根據這種理論大談領導班子問題。其目的，也正是爲了在保存目前存在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關係、特權關係的條件下，大搞權力再分配，事實上是用新的特權官僚來代替多少還保留着革命傳統的老幹部，向老一輩革命家奪權，這樣做，是越換越壞，換得快也就修得快，如像目前許多事變所証明的那樣。歷史是無情的，它必將使這種理論在今後的實踐中進一步破產，徹底破產。

伴隨這場理論的，是林彪的「領導班子就是政權」，「念念不忘一個權字」，「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等資產階級政權觀。九屆二中全會以後，爲反對林彪的這些謬論，毛主席提出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綫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然而，我們的理論界，按照他們只知摘錄偉大導師的語句，而不知理解其精神實質的習慣，完全錯誤地歪曲了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大肆販賣「路綫是根本，領導是關鍵」之類的唯心主義謬論。事實上，我們目前的許多理論，正是建築在這種唯心主義的謬誤的基礎之上的，而許多實踐，也正是在這種唯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

甲：「路綫是根本，領導是關鍵」，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句話是不是正確，我只是把它當作自然而然的觀點加以引用。它的錯誤在哪裡呢？

乙：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承認什麼自然而然的理論和自然而然的觀點，一切理論，一切觀點，都必須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在理論上進行科學的分析。

任何具體的眞理都是相對的眞理，就是說，具有一定條件的眞理，越過了一定條件，眞理就可能變成謬誤。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綫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這僅僅是說，在客觀條件許可的情形之下，在革命的方向肯定之後，人

們（階級、派別、政黨等等）的革命行動成功與否，取決於其所採取的思想和政治路綫。因爲像我們下面將要說到的那樣，路綫本身是由客觀實際情況、由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決定的；而且，所謂決定一切的，也僅僅是說，它起着總體上的決定作用，因爲要取得革命上的勝利，不僅需要總體上的正確，路綫上的正確，而且需要具體的、局部的和部分的正確，即需要政策、策略的正確，並進而在具體做法上的正確。正像要贏得戰鬥的勝利，不僅需要戰略上的正確，而且需要戰術上的正確一樣。

這些道理，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說來是簡單明瞭的，以至略去對條件限制的說明；然而我們的理論界卻怎麼也看不到這種條件的限制以至把它變成唯心主義的東西。

一定的路綫，總是一定的客觀現實鬥爭的反映，正確的思想和政治路綫，當然還有經濟路綫，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反映。這就是說，一定的路綫是由一定的現實關係和一定的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決定的。而不是相反，不是由一定的路綫決定現實鬥爭，決定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當我們的理論界妄圖顛倒這種關係，把路綫說成是根本的東西，是決定現實關係、現實鬥爭和歷史發展的「根本」，把「反作用」當作「作用」的時候，當他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抹殺現實鬥爭決定路綫這一過程，擺脫路綫的現實基礎，即被稱爲“根本”這一東西的眞正根本的時候，他們也就把路綫變成了不可捉摸的，誰也搞不清楚的東西，沒有根據的空中樓閣，這種做法，除了走向抽象的神秘主義之外，別無它途。唯心主義必然導致神秘主義。……

甲：對，對。老百姓，例如我們工廠的工人說：「兩條路綫鬥爭，誰知道！」「那是大幹部的事。」報紙上說的「路綫鬥爭不可知」，實際上很有市場，這些都是神秘主義。

乙：是的，這是普遍的情況。這一方面是某些特權政治的反映，一方面又是「路綫根本論」所導致的神秘主義。「誰知道！」這也表達了羣衆對這兩個方面的强烈反感。

大家知道，按照唯物主義的觀點，物質世界是根本的東西，而精神則是物質的反映。然而唯心主義的哲學家把這顛倒過來，抹去物質決定映象即精神的過程，反過來把映象即精神當作最根

本的東西，把物質說成是精神的產物。我們的報刊一方面反對唯心主義的哲學家，一方面又重犯他們的錯誤，他們完全像唯心主義哲學家那樣行事，把現實鬥爭的反映、客觀歷史規律的反映即路綫問題，當作根本，當做決定現實鬥爭的「根本」。精神根本論即哲學唯心主義的畫皮早已剝去，而路綫根本論卻仍然披着它的僞裝，因此，我們必須揭露其唯心主義的眞面目。當然，完全可能的是，在我們的新官僚那裡，隱蔽的、經過打扮的唯心主義要比赤裸裸的唯心主義漂亮，虛僞的醜惡要比直率的醜惡高尚，因此，他們完全有理由咒罵後者而頌揚前者。

無論如何，要搞清路綫問題，必須首先搞清楚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搞清社會關係、社會制度的變革規律，以及這種關係的可能倒退，即所謂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而不是相反，不是搞清後者必須首先搞清前者。誰如果主張搞清後者，搞清資本主義復辟等等問題，必須首先搞清前者，搞清路綫問題，這不是主張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神秘主義，又是什麼呢？然而遺憾的是，我們的報刊所宣傳的，恰恰是這種唯心主義的認識路綫。當然，我們的報刊有時口頭上也承認路綫是從實際情況、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中來的，但是，許久以來，卻很少着重研究這種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研究現階段社會關係、社會制度應該怎樣變革的問題，除張春橋、姚文元兩篇很不像樣的東西（《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外，只是空談路綫問題，這種做法會把羣衆引向哪裡呢？

甲：引向目前那樣的思想混亂，引向「路綫鬥爭不可知」。

乙：是的，導向唯心主義，在實踐上導向復辟。正是看到了這種危險，毛主席發出了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指示，並且嚴肅地指出「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然而我們的理論界，又不自覺地（當然也不排除自覺的或半自覺的可能性），對抗毛主席指示，肆意地歪曲、反對和嘲弄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在法權問題上大作文章，鼓吹唯法權論的唯心主義謬論。對這個問題我想不多說了，你是不是看一下我們給《紅旗》雜誌的信件等資料？

甲：好。

乙：這就是我們的理論界到目前爲止的認識過程中錯誤的一面，認識上的錯誤的歷史發展過程，一個唯心主義的體系，這是由反修防修的實踐發展過程所決定的。

甲：對，這是一個唯心主義的理論體系。那麼，正確的理論是什麼呢？

乙：文化革命把大量的社會矛盾揭示在我們的面前，爲我們尋找正確的理論提供了客觀條件，而在主觀條件上，要得到正確的理論，首先要認識方法、認識路綫上正確。

這就是清除唯心主義的認識路綫，按照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綫，着重研究社會關係、社會制度的變革，研究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不是離開這個現實基礎，抽象地談論不可捉摸的「路綫」。

至於我們所主張的理論，你可以先看一下我們的《反對特權》一文，我們在那裏大致談了我們的觀點，它是否正確，歷史會做出結論來的。

甲：好，等我看了有關文章以後，再來提出問題。不過，有幾個羣衆普遍關心的問題，你能否先給以解釋？

乙：哪些問題？

甲：譬如說，我們國家是不是已經變修的問題，羣衆勁頭普遍低落的問題，社會風氣的問題，青少年犯罪率昇高的問題，開後門的問題等等。

乙：對第一個問題，我們國家是不是已經變修的問題，許多工農兵羣衆和基層幹部說，我們國家已經變修了，更多的人則嘴裏不說，心照不宣。這個結論可能太早了一點，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是由大量事實來說明的。沒有必要過早地作結論，除非形勢的發展、革命決策的需要迫切使我們迅速作出結論。否則，我們寧可等待局勢的進一步明朗化，而且，無論如何，毛主席、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還掌握着國家的最高領導權。

對後一個問題，開後門的問題，我們在《反對特權》等文章中已經大致地談過了。

至於羣衆勁頭的低落，社會風氣的問題，青少年犯罪率昇高的問題等等，實際上是一個問題，這一方面是羣衆失去了明確

的革命目標，至少是失去了下一步革命的前進方向的問題，另一方面當然也是對某些社會現實不滿的反映。

在政治上，人們對某些特權政治强烈不滿，既然政治變成少數大幹部的事，作爲普通羣衆，我們又何必去關心，在這種政治上，我們的關心又有什麼作用？搞得不好，觸犯了當官的，給個「反革命」帽子戴戴，「一輩子翻不了身」，這又有什麼好處？這就是普通羣衆的心情。同時，「路綫根本」論等既然不回答下一步的革命目標，相反把人們導致向唯心的神秘主義，人們又有什麼勁頭爲自己根本不明確的東西去奮鬥呢？既然我對路綫鬥爭感到不可捉摸，我又何必糊裏糊塗的去幹呢？犯個「路綫錯誤」或者「站錯隊」的錯誤，又有什麼必要呢？政治鬥爭不可知，政治鬥爭危險，政治鬥爭無關論等等思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有的同志認爲，人們的幹勁是靠「物質刺激」刺激出來的，這種看法是不對的，革命年代和五八年大躍進時羣衆的冲天幹勁是「物質刺激」來的嗎？不是。爲了搞清冲天幹勁的由來，我們可以研究一下大躍進時期羣衆幹勁的由來。

當時，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剛剛實現，廣大羣衆當家作主的思想相當强烈，他們對政府深信不疑，如果向老工人做一點調查，他們就會清楚地告訴你這種情況，並且與現在的情況作一番對比，這就是冲天幹勁的現實基礎。因此，當提出了××年超英美（這是正確的），尤其是×年實現共產主義的口號（這是虛假的）以後，羣衆的冲天幹勁就一下子迸發出來。但是後一個虛假的口號，開始作爲調動冲天幹勁的重要因素，後來也恰恰變成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羣衆勁頭相對低落的原因之一。冲天幹勁的過去，不僅因爲自然災害期間物質的困難，物質生活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也同樣可能產生冲天幹勁，如像紅軍時代的某些情況，爬雪山過草地時候的某些情況那樣。冲天幹勁的過去，更重要的是由於虛假口號的失敗，是對這個口號的失望。

因此，人們的革命幹勁，來源於爲一個明確的革命目標而奮鬥，這是任何物質刺激也調動不起來的。

去年，某些新官僚們到處許諾一次新的大躍進的來臨，這

種空頭支票，不過成爲人們的笑料，同時也不過是他們毫不嚴肅地信口開河胡言亂語這種習慣的繼續。除非這些新官僚們拿出他們藏在口袋裏的靈丹妙藥，治好羣衆的幹勁問題，否則，我們只能認爲他們是在胡說。

事實上，正像上面所說的，羣衆勁頭的低落，一是由於羣衆對某些現實情況的不滿，二是由於羣衆喪失了明確的革命目標。在生產上，文化革命前及五八年大躍進前後雖然有某些獎金、某些「物質刺激」的存在，但羣衆的幹勁仍然是由爲革命而工作這個信念來的。而現在呢？爲革命工作嗎？可是下一步的革命目標又是什麼呢？爲國家工作嗎？大量使他們不滿的現象又使他們懷疑，國家又是誰的國家呢？我又是爲誰賣命呢？誰又是國家（以及工廠）的主人呢？是我們工人，是我們自己嗎？可是，我又當了什麼家、作了什麼主呢？情況決不像某些現存特權制形式的辯護士所說的那樣，決不像他們爲了維護舊事物，採用抹殺矛盾、掩蓋矛盾、調和矛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爲這種舊的社會關係所作的美化那樣，「都是主人翁」。（「分工雖不同，都是主人翁」這句被如此稱頌的話，有多少馬克思主義？爲什麼我們的報刊如此熱衷於宣傳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盲言的信念已經喪失，對報刊宣傳的目標的盲目信任已經動搖，懷疑、失望和迷糊隨之而來，這就是現實的狀況。

甲：對，我們在工廠裏，平時工作時，大家還有一定的勁頭，但如果一談起開後門等現象，大家的勁頭就一點也沒有了。

乙：如果說，文化革命前的獎金還有一定的「刺激」作用的話，那麼，目前這一點微小的「刺激」就幾乎不起作用。

甲：有一段時間談論獎金，工人說，現在獎金沒有了，「反正吃大鍋飯，你有我也有，何必去賣勁，招來吃力不討好？獎金拿多了，還要同別人對立起來！」

乙：由於革命理想的喪失，政治上消沉，勁頭也就低落，人們也就從革命理想包括從關心政治轉向個人生活，人們的革命上進心，尤其是青年的革命上進心喪失，同時，許多特權現象，如非法的開後門現象等等社會現象，又作爲榜樣，上行下效，大大地敗壞着人們的道德，敗壞着社會風氣，毒化社會的空氣和人們

的思想。一種重要的東西即少數政府官僚的腐敗，導致了許多東西的腐敗。當然，這些腐敗又仍就更深地根源於目前還存在的「合法」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關係之中。這也就是社會風氣問題、青少年犯罪率昇高等等的根源。有的人把青少年問題同社會問題割開，把這個問題變成單純青少年教育問題，說什麼「要使紅旗飄萬代，重在教育下一代」，這是可笑的。

甲：那麼，怎樣解決羣衆的勁頭問題呢？

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辦法。有的老幹部、有的知識份子主張靠「物質刺激」來解決。然而，上面說了，在現在，少量的獎金根本不起「刺激」作用，除非他們採取厲害得多的、徹底得多的「刺激」，即從計時工資制這種不太嚴格的按勞分配回到嚴格的按勞分配即計件工資制。這在某種意義上似乎是後退，但在實際上是一種巨大的進步，現在實際存在的計時工資制是八級工資制，在某種意義上，它比計件工資制更不合理，因爲它帶着按勞分配以前的舊的封建的剝削制的分配關係和等級關係的殘餘。

這是第一種做法，第二種做法，就是某些新官僚們的做法，這就是施加政治壓力的做法：以抓階級鬥爭爲名，殺一儆百，對工人施加壓力，强迫他們拿出幹勁。然而這種做法，更只是非常有限的、暫時的作用，必將導致羣衆勁頭的新的更大的低落。

而革命者的做法，不在於這兩種似乎對立的做法中選擇一種，他們否定這兩種做法。他們認爲要調動羣衆的革命幹勁，唯一革命的辦法，就是使羣衆明確革命目標，就是要同那些引起羣衆不滿的特權現象作鬥爭，就是要發動羣衆使他們投入到消滅特權制形式的鬥爭中去，爲完成偉大的革命歷史使命而共同奮鬥。

甲：唔，時間不早了，但我很想聽聽你對教育革命的看法，因爲我有個朋友，很想進大學，但開不到後門，只好乾瞪眼。所以，我很關心教育革命的問題，你能再談談嗎？

乙：你們工廠的工人對目前大學教育中的一些問題，尤其是招生問題相當不滿吧？

甲：對，工人們甚至相當蔑視所謂的「工農兵學員」，說他們是開後門的貨色、當官的子女。

乙：這是一種普遍情緒，爲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舉個例子

，舉個張鐵生的例子簡單說一說吧。

甲：對，你就談談張鐵生問題，工人們對張鐵生很反感，張鐵生的信發表以後，我們組十幾個工人，討論了一次，百分之一百的人反對他，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聽到過一個工人支持他。

乙：對，我聽過許多工廠工人的看法，也沒有聽到過一個工人支持他，我是貧農子弟，也知道農民情況，張鐵生在知道有張鐵生這個人的貧下中農中，也是普遍不受歡迎的。

甲：工人們說：「這樣做，大家都去開後門好了，誰開到後門，誰就是政治好。」

乙：是的，宣傳張鐵生的客觀效果之一，就是鼓勵開後門，至少是爲開後門進一步提供方便，掃除業務問題、分數標準等等障碍，而不管我們的那些幼雅的「左派」朋友們的主觀願望是什麼。

不過，就張鐵生本人來說，完全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他之所以變成一個全國聞名的「反潮流」的「英雄」，完全是我們幼稚的「左派」們不顧廣大羣衆的反對，不顧一切地硬抬的結果。然而，當我們幼稚的「左派」們把他變成報刊上的「英雄」的時候，同時也就把他變成了全國人民心目中的渺小的小丑。

甲：那麼，這個樣板的階級意義是什麼呢？

乙：張鐵生問題，實際上不是張鐵生本人和這個樣板的問題，而是一個招生制度的問題。

我們的幼稚的「左派」們置身於同文化集團在某種程度上對立的政治集團，出於某種本集團的利益，他們剝奪知識份子的招生權，然而，當我們的幼稚的「左」派們大張旗鼓地吹噓他們剝奪知識份子的這種權利而把它交給工人、貧下中農的這種「恩德」時，工人和貧下中農報答他們的，却並不是五體投地的感恩，而是反感甚至仇恨。

知識份子的招生權是確確實實地被剝奪了，然而這種招生權又交給了誰呢？眞是交給了工人和貧下中農嗎？那麼，他們必定會熱情地加以歡迎，他們也必定會把本階級最優秀的代表推薦出來，送到學校中去，這當然是我們的「左」派朋友們的一件大的恩德，爲人民羣衆完成了一個未來的歷史使命。然而工農羣

衆又爲什麼反對呢？招生權究竟交給了誰呢？它又造成了一些什麼現象呢？凡是了解一點情況的人，都是明明白白的。工農群衆憤怒地說：「工農兵推薦？誰推薦了？」並且，許多「工農兵學員」恰恰是在違背工農群衆意志的情況下被送到學校去的。

甲：對，我們廠工人也這麼說，我們廠這幾年來有好幾個「學員」也正是在工人强烈反對的情況下送到學校去的。

乙：我們的「左」派朋友們閉眼不看這個事實。他們雖然大談教育是爲政治服務的，然而他們恰恰忘掉了教育問題不是單純的教育問題，而是社會問題。他們把教育問題與現實政治問題割裂開來，從他們頭腦中的理想教育狀態把招生權交給廣大工農兵，然而他們都不看一看，現實政治究竟允許把這個權力交給誰？當然，也有可能，我們的「左」派朋友們完全清楚這一點，但是他們有意識地要從招生制度上保證，把我們的教育變成修正主義特權和少數特權貴族的奴才。現在，招生權到了少數人手裏，這少數人行使的權力的標準又是什麼呢？他們的標準或者是個人私利，這就是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利用職權公開的和隱蔽的開後門，誰的後台硬，誰就上大學，有時是誰的禮物多，誰就上大學；或者是「聽話」還是「不聽話」，誰「聽話」，實際是誰奴性足，誰就上大學。這兩種標準，都是要從招生制度上保證，使我們的教育變成修正主義特權的奴才。而眞正按照無產階級標準招生的也有，但却成了少數的例外。我們的「左」派朋友們大約會頑强地抹殺這些事實。然而，他們愈是抹殺廣大群衆有目共睹的事實，愈是宣揚他們的功績和恩德，就愈是引起廣大羣衆的强烈不滿和反感。

如果說，工農羣衆的優秀代表、優秀子弟還可能寫過舊招生制度的欄栅，進入舊大學，那麼現在則加上了雙重的或者三重的欄栅，甚至關上了笨重的大鐵門，當我們的「左」派朋友們吹吹打打地歡慶摧毀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世襲領地的時候，廣大工農羣衆完全有理由敵視他們把這塊領地變成更凶惡的修正主義特權官僚的世襲領地，變成官僚和他們的子孫的領地，工農子女被更加徹底地剝奪了進大學的權利。

張鐵生問題的階級意義就在這裏，就在於他被變成了維護

這種招生制度的工具，這也正是它遭到廣大羣衆反對的原因。

當然，矛盾總是互相滲透的。資本主義的舊大學還違背資產階級和學校本身的意志，培養了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我們同樣有理由寄希望於現在的學校，而且我們的青年學生們也決不會甘心於做修正主義特權的奴才。

在教育中，最重要的方面，是教育的內容，即教學內容，在這方面及其它方面，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談吧！

甲：還有很多問題想問你，但時間不早了，希望下一次能討論更廣泛的問題，我想不管某些人怎樣反對，廣大羣衆將會支持你的觀點。

乙：好，以後有機會再談吧，今天是隨口漫談，談得相當淺，不對的地方，請批評指正。再見。

徐水良

談社會主義的分配問題

(現行分配制度的改革)

一、現在分配制度的弊病原因

建國以後，我們基本上學的是蘇聯式的、違背按勞分配基本原則的等級工資制；這種分配制度加上蘇聯式的管理制度，它的弊病，已是衆所周知的了。爲了對付這種分配的弊病，又在等級工資制的基礎上，搞了獎金制度，作爲對違背按勞分配原則的一種補償。但是，由於始終沒有對這種分配制度本身加以探討、加以改造，因此始終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文化革命中，又進一步否定了獎金制度，變成了等級工資制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技術高低、勞動量度、貢獻大小一律對待；而工資等級則以工作年限即工齡爲準，還把這種等級工資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冒充爲比按勞分配更先進的、甚至共產主義的分配關係，使得這種分配制度的弊病惡性發展，造成國民經濟更加嚴重的問題。

事實上，等級工資制決不是實行按勞分配原則的社會主義分配關係，它只是資本主義以前的等級制度的殘餘，是等級制度的殘餘在分配制度上的表現。不過，這種分配關係有時也在資本主義社會表現出來。這是因爲資本主義把這種過去的分配關係加以改造，使之成爲資本主義的現實分配方式之一。而以工齡爲主確定工資制度，過去被一些人稱爲“按貢獻大小”分配，當作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優越性之一。事實上，過去的勞動已付給報酬，當前的貢獻大小，只能按勞動者當前爲社會作出的勞動量大小（按社會平均勞動計算）來衡量，工齡只能作爲可考慮的照顧因素，而不是決定因素。按工齡確定等級，不過是封建社會講究資格、論資排輩（如做官資歷、“幾朝元老”之類）這種習慣的殘餘

。至於平均主義，它也決不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而主要是對封建等級制（此外也是對其它等級制，如奴隸制的等級制，及落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等級制），在分配方面的一種罪過懲罰。因此，等級工資制和平均主義，這兩者主要地都是封建等級制的產物，它們比普通的資本主義分配關係還要落後。因爲在一般情況下，除去剝削，資本家在僱佣勞動者之間，一般總是以勞動量大小爲原則進行分配的，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分配方式總比等級工資制及平均主義先進和優越。

正因爲有按勞動量大小進行分配這種假象，所以資產階級把"按勞分配"標榜爲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原則，資本主義的"權利"。這種假象能極好地掩蓋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事實上，在這裡，權利（即原則）與實踐是互相矛盾的，因爲分配的實踐遠不是"按勞分配"，而是剝削，這主要指的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而不是勞動者之間。社會主義並不創造按勞分配的原則，但却要創造按勞分配的實踐，使按勞分配的原則，即原先的"資產階級權利"，眞正貫徹到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去。這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等文章告訴我們的。

蘇聯式的分配制度沒有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並且這種分配制度落後於一般的資本主義分配制度，這就是造成各種分配弊病的原因，這就是除了管理體制以外，造成生產上許多重大問題的原因。從下面的分析中可以知道，這也是造成許多人說的生產上"國營不如集體、集體不如個體"的原因，它不是因爲生產資料所有制造成的。

二、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

社會主義的基本分配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

按勞分配的原則，本來是勞動者個人直接佔有生產資料，從而佔有自己的勞動產品，也因此而佔有自己勞動的凝結，那樣一種分配方式的產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清楚地描述了這種分配方式，怎樣在勞動者喪失了生產資料以後，爲資本主義的分配實踐即剝削所否定；而作爲原則，並作爲一種社會規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仍然作爲"資產階級權利"而存在，依然被標榜

爲資本主義的分配原則。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重新掌握生產資料，但這是以勞動者共同體的形式，而不足以個人形式掌握生產資料。這必然要導致剝削的消滅，這是一方面；然而，另一方面，社會產品尚未極大豐富，還不能實現按需要來分配社會產品，這時唯一的、只能重新按勞動量來分配社會產品，這又是對資本主義分配實踐的否定。

如前所述，在目前條件下，不是按勞分配的原則已經落後，甚至過時，而是現行的等級工資制尚未實現之。它仍然是必須努力爭取實現的。比現行分配關係先進的分配原則，只有經過按勞分配原則的實現，我們才能在以後向更高的分配關係前進。相反，用等級工資制和平均主義冒充共產主義，否定按勞分配，倒是完全反動的、倒退的。

當然，我們這裡只是說，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時期的基本分配原則，並不是說，社會主義時期一律不能存在其它分配原則。相反，我們必須認眞考慮以下兩條次要原則：

第一，必須照顧歷史遺留下來的因素。例如，某些高薪制的保留，重用專家，發展生產。在今後改革等級工資制時，也必須照顧等級工資制的遺留問題，以保証部份勞動者的生活水平不致因此降低，如此等等。

第二，必須考慮按需分配的發展方面，例如，某些公益事業、社會保險、社會福利事業、文化事業、公費醫療等等，並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逐步提高及擴大按需分配的部分。

恩格斯說，“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斷變革的。”並且指出社會主義分配關係也是一個歷史的變革過程，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這種變革，必須嚴格按照客觀規律辦事，違背客觀規律，就要受懲罰。而既然現行分配方式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是違背按勞分配原則的更落後的分配方式，那麼，目前及今後相當時間內的主要問題，就是改革現行分配方式，以嚴格實行按勞分配原則。

三、實現按勞分配具體方法的探討

在我國農村，目前實行的是按日評工記分，這種分配方式，

基本上體現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如果沒有這種分配方式，例如，像工業上那樣，實行等級工資制加平均主義，那麼，在林彪四人幫制造的十年動亂中，我國的農業早就崩潰了，這種分配方式使我國農業化工業所受損害小一些。所謂“大寨式”“評工記分”、“政治評分”等等，以及59年的大鍋飯，對農業生產所造成的嚴重損害就是証明。

當然，這種評工記分的分配方式，目前還是不完善的。還必須加以改造、進一步完善。我自幼在農村長大，深知改善評工記分方法，消除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等現象，以提高勞動效率，幾乎是全體農民的一致要求和强烈願望。實踐証明，根據我國農村目前的生產力水平，實行責任制、包產包工制、定額工分，及相應的分配方式更合適些。這些生產及分配方式，促進生產迅速發展，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歡迎，也完全說明它們是符合我國農業目前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是實行按勞分配的好形式。

目前分配關係中的主要問題，是在國營企事業中。在這裡，我僅僅探討性地提出一些設想和看法。

在國營企事業中，除公益、福利等部分外，分配主要以工資方式進行，另一部分在目前則以獎金方式進行。目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信用卡制度，爲以後普遍實行勞動卡制度創造了條件。但在我國目前條件下，實行勞動卡、勞動卷制度，顯然是不行的。並且，勞動卡仍然以工資制度爲基礎，不過是一種轉化形式。而工資制度，主要是計件工資制和計時工資制兩大類。

計件工資制是在量上嚴格地執行按勞動量分配的一種形式。過去，林彪、“四人幫”攻擊按勞分配，把等級工資制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冒充爲更先進的分配關係，他們自然要極力反對嚴格地按勞動量進行分配的計件工資制，把它講得一無是處。而事實上，既然等級工資制基礎上的平均主義是極端落後的東西，那麼，把等級工資制加平均主義改成計件工資制，便是分配關係的一個巨大進步。計件工資制是貫徹按勞分配的一種嚴格的好形式，有待我們去努力實現的按勞分配的嚴格形式。因此，我覺得，在一切可以實行計件工資制的地方，都應該實行計件工資制。既然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相反地去

攻擊嚴格執行按勞分配原則的計件工資制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呢？並且，過去和現在的實踐都說明，一旦實行計件工資制，與等級工資制及平均主義相比，勞動生產率都得到大幅度的迅速的增加，這就說明，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都証明計件工資制是適合目前社會生產力的一種先進的分配制度。

當然，把等級工資制改爲計件工資制時，必須照顧等級工資制的遺留問題，作爲過渡。可以在原工資基礎上搞計件工資，如補償原工資以後的產量，以後工資的增長（包括目前的獎金），都以計件爲準。計件標準，參照目前的工資標準制訂等等。

這裡困難的問題，是隨着技術改造、產量提高，每件產品勞動量即價值下降，計件標準的改變問題，以及整個社會的平衡問題，新產品的計件標準等等。但我相信，這些問題是能夠在實踐中解決的。科學的東西總是要花費氣力的，圖省事而搞平均主義，決不是科學的方法。而且，既然資本主義在剝削基礎上能解決這些問題，爲什麼社會主義却不能解決呢？

因此，總的說來，以計件工資制來實現按勞分配的原則，困難是較小的。困難較大的，是那些不能實行計件工資制而必須實行計時工資制的部門。現在我們來研究這個問題。

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量進行分配。在同樣的勞動條件下，勞動者之間在勞動量上的差別，主要取決於以下幾個因素：1.勞動能力；包括身體素質及技術高低，熟練程度等等；2.勞動態度；3.勞動時間，包括出勤率等等。頭兩個因素，確定的是勞動效率、單位時間的勞動量；與勞動時間相乘，就是勞動總量，可以按這些來確定勞動量的大小，從而確定工資。這當然是一個較複雜的工作，在不同單位、不同崗位，這三個因素所佔的比重也各不相同，而且也決不可能像計件工資制那樣嚴格地確定勞動量，從而嚴格地按勞動量大小來進行分配。

在目前等級工資制條件下，一些單位對這些因素來用評分方式（兼考慮其它必須考慮的因素，如安全生產等），來確定工資等級，這與過去按工齡確定工資等級相比，是前進了一步。但是，必須制定各等級分數標準，否則，達到一定分數，不管幾級工，一律升級，那麼，從理論上說來，高級工總是先升，因爲從理

論上說來，這些因素合起來，高級工應高於低級工。

當然，這只是一種特時的改良辦法。嚴格說來，唯一的、只能以勞動量爲標準領取報酬。而在大多情況下，勞動量的差別並沒有級差大，而在部分情況下，勞動量的差別又大於級差；尤其是，目前許多工廠的普遍情況，是許多低級工無論在技術上、勞動能力上、勞動量上，往往都超過中級工甚至高級工，這是因爲低級工往往年齡較輕，文化水平較高，接受能力强，技術上很快超過先進工廠的年齡較大、文化水平較低的老年工人，但工資却只能按工齡確定。同樣的勞動，甚至技術更高、勞動量更大的，却拿較低的工資。這種普遍情況，是由過去講資格、按工齡定級的方法遺留下來的一種很不合理的情況，這大大影响了青年工人以及全體工人學習技術的熱情，從而安於混日子、憑工齡來增加工資的心理。在實行計件工資制的部門，上述情況將一下子迅速地改變，但在現行等級工資制的條件下，即使在採用上述改良這種情況，尤其是由這種情況造成的心理習慣，也不可能有較快的改變，而且在大多情況下，工齡仍將是無形中主要考慮的決定因素。在這一方面，甚至農村中的評工記分方法，也要合理得多。在那裡，按勞分配的原則基本上得到貫徹，沒有賣資格、以老賣老賣年齡的事，而是基本上按勞動量評工記分。

作爲過渡，改變在計時工資制方面的等級工資制，同樣可以在保存現工資的條件下，按勞動量或決定勞動量大小的諸因素，來確定工資的增加問題，勞動量達不到現工資標準的，暫時保留，超過標準的，給予增加，至於怎樣實現按勞動量計算計時工資，及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與全社會的平衡問題等等，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探討。

當然，所有一切，都必須考慮照顧勞動者的困難、工齡、年齡差別、勞保、退休基金等等，但這些都不是確定工資的原則。

四、獎　金

獎金，本來並不是工資的一部份，並不屬於按勞分配的範疇，而往往是對有特殊貢獻的人的一種特別獎勵，以鼓勵人們作出類似貢獻。但在過去，由於等級工資制及平均主義造成的弊病，

蘇聯不得不强調物質利益問題，在工人中普遍使用獎金，從而把獎金變成按勞分配的一種補償形式，也即工資的補充部分。但事實說明，不從根本上解決按勞分配的問題，往往憑獎金是解決不了分配及生產勁頭等問題的。至於"四人幫"否定獎金，認爲道德說教，即他們的所謂"思想工作"，才能解決問題，更完全是一種胡說八道，是被馬克思、恩格斯早已無數次批判過了的一種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是這種唯心主義在分配問題上的表現（可惜以爲道德說教，"教育"能解決一切問題，而不是從社會存在中找原因，還時時在許多領域出現），而且，實踐使林彪、"四人幫"的謬論遭到了徹底的破產。

隨著按勞分配的眞正實現，獎金這種形式也將取消，它又將退爲往往是對作出特殊貢獻的人的一種特別獎勵，而不再成爲按勞分配的補償形式、工資的補充部分。但在按勞分配沒有實現以前，獎金作爲一種暫時的補救措施，仍然是必需的。

五、教育費用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知識是一種私有財產。知識的價值，平均說來，不過是教育費用，包括受教育者本人學習勞動的轉化形式。由私人支出的，超過普通勞動者平均教育費用的獎金，是要獲取利潤的。社會主義將根本改變這種情況。但是，既然在社會主義的一定時期，教育費用，包括本人的學習勞動，仍然不是完全由國家支付，價值規律仍然起著作用，那麼，就必須在這個問題上遵從價值規律。

這個問題，主要是對從事純技術勞動、腦力勞動的知識勞動者、工程技術人員及其它知識分子而言的。假設工人的平均教育水平爲高中畢業，並且畢業後參加工作，而另一部分人進入大學學習五年，成爲技術人員，略去學習費用等開支，在這期間技術人員比同期高中畢業工人少拿工資大約二千多元，假定技術人員工作年限平均爲二十五年，那麼，這二千多元平均分配於二十五年，技術人員每年比同期高中畢業工人應多收入八、九十元，此外加上二千多元利息，按現行年利計算，大約爲六、七十元，這就是知識分子平均工資水平（利用工作之外的業餘時間進行學習

、深造，達到一定知識水平的工人及知識分子，也應同等對待）。當然，一般說來，照顧歷史的及國際的因素，應高於這個工資標準。至於知識分子的內部分配，則應實行按勞動量大小進行分配的原則。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與工人之間的工資差別較大，並且平均教育水平越低、工資差別越大，這是因爲教育費用再加上了較高的利潤。但隨著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這種差別現在是小得多了。在達到平均高中畢業水平以上（指年青一代勞動者）的國家，大學文化的勞動者越來越進入普通勞動者的行列。我國的教育水平在世界上比較低，這種差別當然必須存在。只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把工人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到知識分子水平，才可能消滅差別。林彪“四人幫”違背價值規律，不是採取提高教育水平的方法，把兩者之間的差別拉平，這是一種倒退的反動措施

六、按勞分配會不會產生兩極分化

林彪“四人幫”攻擊實行按勞分配是制造兩極分化，這完全是一種污蔑。理論分析和歷史事實都証明：按勞分配本身並不產生兩極分化。事實上，無論在當前歐美資本義條件下，還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按勞動量領取工資，包括計件工資、計時工資、目前農村的評工記分等等，工資勞動者之間的工資差別，都比他們那個等級工資制加平均主義條件下，勞動者之間的工資差別小得多。兩極分化，決不是由工資產生的，而是由私人生產、私人經營，並進而把生產資料變成資本，變成剝削手段才產生的。工資如果不變成剝削他人的資本，就決不可能造成兩極分化，而只能造成勞動者生活上富裕及貧困程度的一定差別。相反，他們那個等級工資制造成的這種富裕程度的差別，倒是大得多。而且，隨著大生產的發展，勞動者的工資越來越不可能轉化成資本，而只能以小額存款、購買小額股票等形式，轉化爲他人，即金融資本家、財團公司等等的資本。

至於目前農業勞動者的家庭副業，或城市個體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別較大，這也不是由於工資及分配造成的，而是由於不同勞動條件下的私人經營造成的，但這並沒有構成剝削。在目前我

國農業生產力條件下，家庭副業等等是非常必須的，對我國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只要這些私人生產沒有轉化成爲重大的剝削他人的生產，就不應該取締。“四人幫”“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做法，在農業上制造了巨大的災難，不但沒有促進集體經濟的發展，相反割一次“尾巴”，就造成集體經濟和人民生活的一次倒退，這完全違背了客觀的經濟規律。

因此，只要社會主義眞正消滅了剝削制度，只要剝削制度沒有復活，只要不是由少數人或少數人的共同體掌握生產資料，担心按勞分配造成兩極分化，是完全沒有道理的。相反，按勞分配原則的實現，不但將大大促進生產的發展，而且將大大縮小等級工資制造成的貧富差別。因爲在正常狀況下，勞動者之間勞動量的差別，決沒有等級工資制之間的差別那樣大。

綜上所述，結論是明顯的。在目前生產力條件下，必須在個人分配的領域中盡可能全面嚴格地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必須創造出更多更好的按勞分配的分配方式。甚至在公共分配領域，如某些集體福利事業中，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考慮這一原則。

一九八〇年於寧

原載韶關《庶聲》一九八〇年七月

徐水良

關於同一性和鬥爭性問題

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核心。因爲唯物辯證法研究的是物質運動的普遍規律，而對立統一規律研究的是物質運動的每個點、每個"細胞"中包含的最普遍規律。搞清了運動的每個點、每個細胞，才能更好地搞清運動的各個環節（量變質變規律等等），各個"周期"（否定之否定規律等等），以及整體（如列寧說的認識過程由無數"圓圈"組成……等等）。

而就對立統一本身來說，從根本上就是要攪清相對、絕對、鬥爭、同一、普遍、特殊等等問題。"對立統一"顧名思義，就是講的"對立"（鬥爭）和"統一"（同一）問題。因此，搞清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問題，實質上就是搞清對立統一規律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本來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最近幾十年內，由於關於某些矛盾學說的權威著作，這個問題被搞得混亂不堪，從此，使對辯証法的研究，幾乎處於停滯狀態，並且搞亂了整個辯證法，許多已經被搞清了的問題，又重新被神秘化了。本來，要重新搞清同一和鬥爭這個問題，也並非難事，但由於許多年內流行的現代迷信，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從而使權威著作的錯誤成了人們和哲學家們的習慣，要搞清這個問題至今仍然並非易事。我本人，從六七年到七五年，花了七、八年時間，才擺脫現代迷信的束縛，終於搞清了這個問題。最近，報上有些文章已開始對這個問題開展討論，這是好事，但討論各方，仍然束縛於錯誤的框框，或者更確切地說，錯誤的習慣之中，並且又產生了一些新的錯誤，因此，本文簡要地談談這個問題。

一、概念

思想是概念的矛盾運動，概念是思想的基礎，是組成思想的原子或細胞。概念的混亂，必然造成思想的混亂。初級的概念，是在初級的形象思維及形象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初級形象的概括。概念是實際事物通過人的感覺、印象、表現、記憶、知覺等一系列過程，在人腦中抽象出來的。不過，我們這裡不來詳細說明這個過程，這裡只是說明，概念是從實際事物中抽象出來的。

至於許多更高一級的概念，如許多科學和哲學的概念，則是初級概念通過思維過程的進一步抽象的概括。科學上，許多概念和用語，往往是從日常生活中借用來的，尤其是在它們產生的最初階段更是這樣。哲學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哲學概念更加抽象，它往往刪去了日常概念的一切具體含義，而僅僅留下它的最抽象的含義。但無論如何，這種概念的抽象及借用的用語，必須與它的日常含義保持某種一致性，至少是傾向上的一致性，而不是完全相反，否則，就會造成人們思維的極大混亂。例如，物質、精神等等概念，正是用這種方法抽象出來的，它們既保持了日常含義，又揚棄了日常含義。這就是科學的抽象方法。否則，與日常含義，從而與客觀實際完全脫離，甚至完全相反，那就不是科學的抽象，而是唯心主義的任性和隨心所欲。當然，如果某些特殊人物一定要使自己使用的用語及其所反映的概念與日常含義相反，那麼，他們至少必須加以說明，才不致使周圍的人感到迷糊。否則，人們一定會把這種特殊人物當作神經病人。如果一個人使用的概念與日常含義一致，同時又要使它與之完全相反，那麼，他的思維必然會陷入不可擺脫的矛盾之中。

但是，遺憾的是，在同一性和鬥爭性問題上，情況恰恰正是這樣。這就使問題具有特別嚴重的性質，導致了整個唯物辯証法哲學思想的混亂。

二、對立統一規律的基本概念

很自然，同一、對立、統一、差異、矛盾、鬥爭、絕對、相對、普遍、特殊等等概念，同樣是從日常生活中借用來的。在日

常生活中，它們都具有確切的含義。因此，說"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倚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名詞都是一個意思"，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它們的含義是很不一樣的。我們只能說，如果略去這些概念的特殊含義，僅僅留下它最抽象的哲學傾向，那麼，它們說的都是矛盾的同一性，而這些概念本身，反映的是同一性的各個不同的側面。但是，我們決不能用一個側面來代替它的另一個側面。例如，我們不能用互相滲透來代替互相倚賴或互相合作。因此，它們本身，決不是"一個意思"。

過去在批判德波林的時候，說德波林認爲在事物開始的時候只有差異而並無矛盾，這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因爲"差異就是矛盾"。這樣，就算徹底把德波林駁倒了。我不了解德波林，因此，沒有發言權。但是，德波林這裡搬的是黑格爾的思想，用這樣簡單一句話，就駁倒了黑格爾經過長期研究提出的思想，這確實太簡單、太容易了。習慣於簡單抽象地思考問題，而不能具體思考問題的形而上學的大師，總是抓住簡單的抽象而否定複雜的具體的。但可惜，這裏未免有牛頭不對馬咀之嫌。黑格爾在這裡並沒有在最抽象的哲學含義上使用"矛盾"這個詞（以"矛盾"這個中文詞代表對立統一規律，這種抽象是後來才有的）。黑格爾在這裏是在日常或比較具體的哲學含義上使用這個詞的。而在具體含義上，這兩個詞的含義是不一樣的。"差異"表示差別、不同，而"矛盾"表示相反、對立，它們反映的恰恰是矛盾（這裏指的是對立統一）運動過程中兩個不同的階段。事實上，既然漢語"矛盾"這個詞的意思是"對立"、"相反"等等，因此，用"矛盾"來代替"對立統一"，並不完全確切，但因爲它們並不是相反的概念，並且現在又已經成爲人人懂得的概念，人們已把"矛盾"理解爲"對立統一"，因此我們仍然沿用這個詞。總之，我們決不能因爲使用了某些概念的抽象的哲學含義而完全否定它的具體的日常含義。許多年來，一些形而上學的現代迷信的崇拜者們，總是死記某些詞的哲學含義而反對它的日常含義。例如，死記"矛盾"這個詞通過上面提到的改造而具有的"對立統一"這種哲學含義，從而極力反對"沒有矛盾"等日常用

語。但不管他們怎樣努力，也不能把"沒有矛盾"的說法從漢語中抹去，老百姓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這個說法。對此，這些教義崇拜者們也許應該哀嘆"德波林流毒"的深遠吧！只知抽象地思考問題，而不能具體地思考問題，不可救藥的教義崇拜者，是永遠不能理解上述這一切道理的。

上面順便談了必須說明的一些次要問題。現在我們來講本題，來講同一性和鬥爭性問題。

某些權威著作說，同一、統一是特殊性、相對性，而對立、鬥爭則是普遍性、絕對性。而以後的人們，則不加思索地接受了這個荒謬的說法，這就使辨証法的基本概念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對立統一規律重新被神化而變得不可理解。至於那些接受這些概念，而又自以爲理解了對立統一規律的哲學家們，實際上只是滿足於自己的似是而非其實是根本不懂得對立統一規律。

在日常生活中，統一、一致、同一、相同、相等、共性、到處一樣、普遍、絕對等一類概念，雖然其中每個概念的具體含義各不一樣，但就其傾向性來說，都是一樣的，是某種範圍的同義詞，都是事物中包含的共同性的不同表現。事實上，幾乎每個頭腦健全的人，都已經習慣地按這種含義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這些概念，這是千百年來人類實踐的結果，是人類語言對客觀世界的反映。舉例說吧，世界上有各種各樣不同的人，有各種各樣不同階級的人，但他們都是人，這就是一種共同性，才使他們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都處於人類社會的範圍之內，或者換成哲學語言說，就是共處於人類社會的統一體中。相反的是另一類概念，如不同、差別、差異、鬥爭、對立、相反、相對、特殊等等，這些概念表達的正是差異性、鬥爭性的不同表現。我相信，理智正常的普通人，是不會向這些人類語言的正確常識挑戰的，但遺憾的是，當哲學家們在他們自己抽象的思想太空遨遊的時候，却往往忘掉人類最起碼的基本常識。

因此，把同一性說成是相對性、特殊性，把鬥爭性說成是絕對性、普遍性，這不僅是哲學上的錯誤，而且是違反人類日常語言常識的荒謬謬誤。

在漢語中，相對和對立是同義詞或近義詞，就空間上說來，

差異、對立、鬥爭等等，不僅不是普遍性，而且隨着相對立、或相比較的各方不同而完全不同，表現爲無數的特殊或個別；從時間上說，這種差別、對立、鬥爭又隨着時間的變化而不斷變化，表現爲完全的暫時性；只有它們的共性、共同性、同一性，才在一定範圍內不因時間、空間的不同而不同，在事物本身範圍內（或在事物的某一階段，在舊的統一瓦解之前），始終或到處一樣，始終或到處一致，始終或到處統一，表現爲絕對性、普遍性。因此，把同一性說成相對性、特殊性，把鬥爭性說成普遍性、絕對性，只是把上述簡單明瞭的東西變得混亂不堪，複雜而不可理解。

在馬克思那裡，同一和差異，統一和鬥爭，這些概念是非常明確的。他們的大量著作完全可以爲我們上述這一切作証，完全可以証明同一性是絕對性、普遍性，鬥爭性是相對性、特殊性，但因爲篇幅所限，我們這裏不作例証了。請讀者看一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恩選集第二卷86-114頁）及《資本論》第二卷。

三、對立統一規律的基本內容

當前報刊上的一些文章，對同一性和鬥爭性問題展開討論。但他們又往往不加思索地接受上面提到的錯誤概念，它們攪不清錯誤究竟在那裏。因此，它們在力圖弄清問題的時候，又往往使對立統一規律的某些基本內容“代人受過”，代替錯誤概念去接受批判，因此，我們這裏談一談對立統一規律的某些基本內容。

爲甚麼某些權威著作甚至會產生概念常識的錯誤呢？這是由於它們理論水平低，完全誤解了列寧的思想。

在《哲學筆記》中，列寧寫道：“對立的統一（一致、合一、同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列寧的這句話有沒有講錯呢？顯然，僅就列寧的這句話本身，當然可以作以下兩種理解：一、統一是相對性，鬥爭是絕對性；二、絕對的東西（統一、同一、普遍等等）也是相對的，只有相對的東西（鬥爭、差異、運動、特殊等等）的總和，才是絕對的。頭腦簡單的

形而上學者及教義崇拜者，總是簡單地作前一種理解，而當前報刊上的一些文章，又因爲模糊地感覺到了前者的錯誤，就又簡單地否定列寧統一是相對、鬥爭是絕對的說法。因爲他們根本想不到，這句話還可以有第二種理解。

那麼，列寧的本意究竟是那種思想呢？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列寧的各種著作，那麼，我們就可以肯定，對同一性和鬥爭性的概念，列寧是清楚的。並且，列寧在《哲學筆記》中的其他地方，也明確說過，絕對也是相對的，相對也是絕對的。雖然"哲學筆記"只是探索性的學習性筆記（並且也確實有一些錯誤），但列寧決不至於有第一種理解這樣產生概念的完全混亂的謬誤。因此，對這段話，只能作第二種理解。（雖然這段話表述得比較粗糙、含糊，而不同像第一種理解那樣表述得精確。但既然只是探索性筆記，那麼錯誤還是粗糙，都不能責備作者。）

"絕對的東西（統一、同一、普遍等等）也是相對的，相對的東西（鬥爭、差異、特殊、個別等等）的總和，才是絕對的。"這就是對立統一規律的最基本內容之一。

這是甚麼意思呢？舉例說明吧：一棵樹，在它生長期間，每天都在變化着，這就是差異運動；但是，它始終是同一棵的樹；始終是有"樹"的特性。這就是樹在生長期間的同一性、共性、普遍性、絕對性，這是它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保持的不變性，這種不變性、這種絕對的東西，也是相對的，它只是在這棵樹生長及存在的時間空間範圍內，才是絕對的。一但離開這個範圍，這種絕對性立刻就變成相對性。在這棵樹產生以前和消失以後，在它周圍的事物——泥土、雜草、空氣、大地等等中間，上述絕對性、普遍性，立刻就成了相對性、特殊性。

上面已經說到過，從各種互不相同的人中抽象出來的"人"的性質，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同一的。這是人類的共同性、共性、同一性、普遍性、絕對性。但是，在人類社會產生以前，人的性質並不存在，在人類社會之外，在自然界中，人的性質也同樣不存在。當然，人與自然之間同樣存在同一性、共性。但它們之間並不存在"人"的共性，與人類內部相比，它們之間的共性是更少，更一般。

對矛盾雙方說來，在一定條件下，一定範圍內似乎不變的矛盾雙方的統一性，終究是要瓦解的。只有矛盾相方每時每刻都在變化著的鬥爭性的總和，才構成矛盾運動的總體。

"但是，矛盾雙方及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間，都是存在、並且永遠存在同一性的呀！因此，同一性與鬥爭性的總和一樣，都是絕對的！"某些同志大約會這樣大叫起來。他們雖然反對那些把同一性說成相對性的人，但他們同樣又會抽象地思考問題，而不會具體地思考問題。是的，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存在同一性（在這裡，我們要順便說一下，請楊獻珍同志原諒。物質和精神，存在和思維是否存在同一性的問題，完全提得不正確。我們至多只能說，它們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具體的同一性。）但是，我們且不要忘記，當我們講着同一性的時候，我們總是指某種具體的同一性。如果我們徹底堅持抽象的同一性，那麼，世界上只存在一種同一性，即"物質"（從唯物論的角度看），或者"統一"（從辯証法的角度看），並且抽掉了它的一切內容，就成爲空無所有的同一性。當某些同志講著"物質"這個詞的時候，不是把它看成世界上無窮多樣的事物及其總和，而是以爲"物質"這個詞本身就是世界，因而，把"物質"當作標簽到處張貼。這些同志的"唯物主義"，不過是掛著"物質"招牌的唯心主義。任何具體的同一性也是相對的，只有無窮無盡的鬥爭性的總和才是絕對的。這種無窮多樣的東西是世界的本源呢？還是其中包含的共性（包括從中抽象出來的"物質""精神"等概念共性）是本源呢？這也正是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實質分歧（正是□□這一點，我們指出上述掛着"物質"招牌的唯心主義）。總的說來，不是同一性中包含著鬥爭性，而恰恰是鬥爭性、差異性中包含著同一性。具體來說，它們又往往是互相包含。

絕對的東西也是相對的。絕對的東西只有在自身範圍內才是絕對的，離開自身範圍，絕對的東西也就變成相對的。而只有相對的東西的總和，才是絕對的，才構成事物和世界的總體。這些觀點，也正是辯証法的宇宙觀和運動觀。

四、同一性的兩種含義

有一種說法是：同一性有兩種含義。第一是互相依賴、互爲條件，第二是互相轉化。把互相轉化作爲同一性，完全是神秘而不可理解。我相信，所有認眞思考過這個說法而又不敢否定的人，一定都會感到模糊費解。這是又一個完全的謬誤。

轉化、變化等等概念，在漢語中是同義詞（或者，轉化是變化的一種）。誠然，在轉化、變化過程中，在轉化前後的新舊事物中，包含著同一性、不變性，鷄蛋能轉化爲鷄，因爲它們都是由蛋白等物質組成的同一種高級生物的不同存在形態。石頭不能轉化爲鷄，因爲它們之間沒有這種同一性。但無論如何，轉化本身決不是同一性，而恰是非同一性，是變動性、不同性。

同一性當然是時間空間中的同一性，因此，我們當然可以說同一性有兩種意義。但這兩種含義只能是：第一，是事物及矛盾各方互相依賴、互相滲透、互爲條件、互相統一，以及差別中包含的互相等同等情況；第二，是在新舊事物中，包含着同一性、不變性。

五、運動的動力

某些哲學權威一方面宣稱：矛盾鬥爭是事物前進的動力，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因爲同一性也是事物前進的動力”；另一方面，他們又大搞極“左”的“鬥爭哲學”。相反，一些同志在批判極“左”的“鬥爭哲學”時，也同樣否定矛盾鬥爭是事物前進的動力這種說法，極力主張同一性也是事物前進的動力。所有這些，同樣都是出於對同一性和鬥爭性問題的無知。

事實上，矛盾鬥爭是事物前進的動力，這個說法完全正確，而說同一性也是事物前進的動力，則是一種胡說八道。

運動，正是事物在時間空間上的差異。正是差異、對立、鬥爭推動事物的前進。而同一性，則是規定事物的相對靜止狀態，以及規定事物在變動中保持的不變性，也即規定事物前進的一定方向。在自然界中，難道不正是水位差異促使水的流動，而相反是水位相同或同一促使水流動嗎？在社會中，難道不正是階級利益的差異造成了階級鬥爭，促進階級社會前進，相反是階級利益同一、等同促使階級鬥爭發展嗎？從總體上說來，就是這樣。

但是，具體說來，同一性在事物前進中不是沒有作用的，它可以對某些鬥爭起一定的限制作用，從而對另一些鬥爭起保証作用，使事物沿着一定方向前進。這裏說的只是，同一性本身，並不是運動的動力或原因。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一致性、共同性，使他們能夠共同反對封建階級、保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階級的團結，可以限制階級內部的鬥爭，不使鬥爭力量在內部鬥爭中消耗，從而保証與敵對階級的鬥爭向勝利方向發展。但它們都不是前進的根本原因。消極的東西只是在積極的東西的作用下才成爲積極的。非原因只是在原因作用下才成爲從生的第二級原因，正像正數只是與負數相乘才成爲正數一樣。

順便說一下，與這個問題相似，說世界的多樣是由於同一性，這簡直是信口胡言。多樣性是不同性，世界多樣性在於世界千差萬別的差異性。

六、對抗性矛盾問題

對抗性矛盾的問題，是過去的哲學研究中感到難以搞清的一個問題。

漢語中，“對立”與“對抗”是同義詞，兩者是相近的概念。雖然兩者程度略有不同，就對立程度說來，我們上面說到過的“差異”次於“矛盾”、次於“對立”，“對立”進於“對抗”，但它們都次於“鬥爭”。因此，說對抗與對立不同云云，是又一種神秘主義。

上面這樣說，有的同志也許會認爲，這樣，問題就很簡單了。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是人爲的差別，根本不存在。這就完全錯了。其實，我們上面只是反對概念使用上的神秘主義，而不是指客觀現實中是否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客觀世界中，確實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狀態。第一類，矛盾在自身範圍內解決；第二類，矛盾採取外部衝突的形式，在自身範圍以外解決。在自然界中，炸彈爆炸這一類突發性强烈矛盾，在人類社會中，敵對階級的暴力衝突等等的存在，是客觀事實。它們都屬於後一類矛盾。之所以把敵對階級的暴力衝突當作這一類矛盾，乃是因爲這種衝突，但作爲社會關係的階級矛盾，採取社會關係之

外的解決形式，即不把人作爲社會的人、作爲社會關係，而是採取暴力，把人作爲肉體、作爲物體消滅。這類矛盾的特點之一，是破裂代替統一。人們可以把這類矛盾作稱爲對抗性矛盾，爆炸性矛盾，破裂性矛盾，或採用其它更確切的名稱。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反對上面提到的概念使用上的神秘主義。

順便說，這兩類矛盾的劃分，也是相對的，也是對一定範圍而說的。

結　語

以上簡單地談了同一性和鬥爭性的幾個問題，還有其它許多問題（如學會具體地思考問題，同一性和鬥爭性問題的具體應用等等），因篇幅所限，這裏不談了。

搞清同一性和鬥爭性問題，非常重要，過去理論上和實踐上的許多重大錯誤，以及許多重大爭論，都是由於在哲學上不懂得同一和鬥爭，不懂得對立統一規律，以及只會抽象地思考問題所引起的。只有搞清了這個問題，才能搞清辯証法，也才能在社會科學領域取得較大的進步。這幾乎是全部理論問題及思想方法問題中的關鍵點。

一九八〇年十月中定稿

原載韶關《庶聲》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第四部份　四・五運動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時代已一去不返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清明節，天安門廣場前十多萬人的齊聲怒吼，震撼了「四人幫」專制主義的根基，不久，歷史作出了它公平的裁判，四人幫被推下了政治舞台，中國也從此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這日，北京市成千上萬人民懷着對剛逝世的周總理的敬愛，

絡繹不絕地來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表示他們的悼念，同時，也是對當時黑暗的統治的嚴重抗議。人們携着花圈，帶上黑紗，「花海人潮驅走了峭寒，革命浩氣冲破了重霾」，多少人在那裡慷慨陳詞，多少聲音在那裡奮力呐喊，人們無畏於法西斯封建劊子手的殘酷鎮壓，無懼於隨時被套上手銬腳鐐而身陷囹圄的危險，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見証下，留下了那壯烈激昂的詩篇和檄文，留下了那永留青史的鬥爭精神。「四·五」所表現出的，不僅是反對極權鎮壓和暴力，更是寶貴的民主精神，是人民的覺醒，在這樣的意義上，「四·五」是革命的，並對中國以後的發展，有不可估計的影響。

「四·五」的一聲驚雷，不但震撼了「四人幫」的封建統治，它的精神，推動了中國的民主運動。七八年尾的「北京之春」及後來漸有聲勢的民主運動，都是「四·五」革命精神的繼續，體現出「四·五」的要求民主的最寶貴品質。在天安門事件中頑頑强鬥爭而被捕的韓志雄、王軍濤等青年後來都成爲民主運動中的積極份子。王軍濤參加了民刊《北京之春》的編輯工作，而韓志雄也極力支持民主運動的發展。

韓志雄

談談經濟管理民主與政治民主

人民民主已成爲現在人們最關心的課題之一，也是當前迫不及待需要解決的大事。只有實現了眞正的人民民主，實現四個現代化才有保證。

十多年來，中國的人民羣衆與革命幹部飽嚐了沒有人民民主的苦頭。「四人幫」把人民民主扼殺了，對人民實行封建專制統治，賀龍、陳毅、陶鑄等一大批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被「四人幫」整死了，死得好慘。一大批普通的羣衆也被「四人幫」打成「反革命」，坐牢的坐牢，勞改的勞改，也不知有多少人死於非命。死得很冤也死得很慘，這都是由於沒有人民民主的結果。

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也一天不如一天，幾乎都要崩潰了，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困難，這也是由於沒有人民民主的結果。

快快實行人民民主吧！快快實現「四化」吧！這是全國人民長期夢寐與（以）求的心願，黨的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到四個現代化來是深得人心的，我堅決擁護黨的這一決定。

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但是要眞正做到這點，必須要有人民民主。在舊中國，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政治上受壓迫，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生產資料歸地主資本家所有，人民沒有掌握土地與工廠的權力，正因爲經濟上沒有權力才遭受壓迫與剝削，也才導致政治上受壓迫。因此，人民只有在經濟方面得到解放，政治上才能得到解放。

毛主席領導我們建立了新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工人和農民在經濟上解放了，政治上也解放了。但是，現在我們的經濟上的某些體制和機構還產生着大量的官僚主義，阻礙生產高速地發展，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由於經濟管理不是實行人民民主

這就導致了政治上的不民主。南斯拉夫在這方面已經在實踐中做到了，並且取得了成功，我們要向南斯拉夫學習，這樣工人們才有幹勁來努力實現「四化」。人民還不能來管理生產，許多單位的生產，只是由少數幾個人來管理，發施號令，憑長官意志辦事。

當然，實行經濟管理方面的人民民主，並不是取消黨的領導，而且要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才能眞正實現經濟管理方面的人民民主，也才能實現眞正的政治上的民主。

我們一定要爲實踐經濟管理和政治的人民民主而戰鬥。

原載《北京之春》第二期(一九七九年)

王軍濤

試析左傾機會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

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歷史性事件，結束了中華民族現代史上一個災難深重的時期。由于要引起痛苦、煩惱和悔恨，機智和善良的人們不願回顧這段往事。然而，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該簡單地遺棄、忘卻的。中國人民不應用許多含混、籠統的字眼迴避問題，而應該認眞地回顧總結這個時期，中華民族應該從過去的教訓中吸取養份，歷史唯物主義認爲：正如一個歷史性的倒退同樣不能歸罪于幾個人的作惡，這種歸罪只能使人民產生錯覺，以爲清除了幾個人就可以一勞永逸地結束這種災難和痛苦，從而使人們忘記從根本上尋找原因——從經濟基礎、政治路綫及社會條件中尋找原因，這種「忘記」會使歷史性悲劇在若干年後重新出現，而歷史會嘲諷地說：這個民族沒有記性！

中國人民應該認眞地總結十九年來的痛苦經歷，應該從中吸取有益的教訓——這是新的時期所不可缺少的，當我們冷靜地回顧總結過去時，一個問題怎麼也迴避不了，這就是階級鬥爭理論，它太突出，太顯眼了，確實可以這樣說，十年多來，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正是在這一理論的光輝照耀下「前進」的。

人們都還記得，當「左」傾機會主義者提出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理論時，整個中華民族曾是怎樣地歡呼、雀躍、興高采烈啊！人民慶祝自己的領導發現了這一理論，從而使蘇聯的悲劇不在中國重演，一旦重演蘇聯的悲劇，則是千百萬人頭落地，政治上極度專政，生產日益下降，經濟停滯不前，市場供應緊張，貨物奇缺，物價上漲，官霸橫行……。于是，中國人民眞誠地認爲，階級鬥爭理論是中國領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光輝發展，是中華民族的光榮與驕傲，然而，這一切是眞的嗎？理論與現實都

表明：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中國的左傾主義者錯了，而中國人民篤信了左傾主義。

階級鬥爭理論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人們很早就注意到這樣一個社會現象：人類社會總是劃分成幾個部份，這些不同的部份生活水平不同，社會地位也不同，對整個社會所起的作用不同，而且這些部份相互之間有矛盾和鬥爭，即階級鬥爭，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開始用階級鬥爭做爲解釋歷史和現實重大事件的鎖匙，並且指出，階級之間的鬥爭歸根結底是由不同的經濟利益決定的，這種學說把經濟關係中的冲突解釋爲社會階級鬥爭的原因，但還沒有闡明階級鬥爭產生的終極原因——人們經濟關係中的冲突又是怎樣產生的呢？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犀利武器，卡爾·馬克思成功地完成了這一學說。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可以由三步組成，第一、一定的生產力決定一定的生產關係，第二、一定的生產關係決定一定的社會結構（階級關係的總和），第三、用這種社會結構中不同的階級之間的鬥爭解釋和分析種種社會現象，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中，馬克思運用這一理論精辟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以鐵一般的邏輯力量宣告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列寧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不僅在《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等一系列著作中，研究了俄國社會，解決了俄國革命的重大問題，而且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文章中，詳細透徹地分析了國際範圍內資本主義的新現象，創立了列寧主義。

中國的左傾主義者在理論上忽視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第一步，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就沒有根據「一定的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係」這個原理，認眞地分析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產力狀況，而是直接從第二步出發去分析問題，即使在這一步也沒有扎扎實實地進行研究，因此，只是照搬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現成結論或者宣傳小册子水平的泛泛議論等，這樣的理論水平並沒有超出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水平，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原理出發。以便人們正確地把握階級鬥爭過程，判斷鬥爭發展方向，預測鬥爭結局，能動地造成使本階級獲得勝利的歷史條件（物

質力量及階級力量對比），制定出正確的路綫、方針、政策。而「忽略」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第一步，「忽略」生產力的發展對階級鬥爭過程的制約，影响，就會不顧客觀條件和規律，按照個人意志盲目行動致使革命遭受挫折。中國左傾主義的思想弱點，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有明顯的反映。

如果說，左傾主義者們在民主時期還能從「一定的生產關係產生經濟利益不同，彼此對抗的階級」出發的話，那麼，在社會主義時期，他們甚至連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這第二步也「忽略」了，乾脆直接用「階級鬥爭」觀點解釋社會現象，這就造成了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劃分根據沒有，劃分階級標準沒有，使得階級鬥爭變得令人令人捉摸不透，難以理解，這種理論上含混不清在實踐中造成巨大混亂，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曾出現多少荒唐可笑，滲透血淚的笑啊！反對一個人可以定爲資產階級，對一個學術有不同看法，可以定爲資產階級，語言上稍有不愼，哪怕是一字不妥，定爲資產階級，一個人的名字分兩行寫，也要定爲資產階級，甚至穿件花衣服、談戀愛都統統可以定爲資產階級。相反，「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倒是無產階級，而且是「最、最、最」可靠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種階級鬥爭理論連資產階級歷史學家都不如。

粉碎「四人幫」以後，有人提出：識別黨內資產階級的標準是三條原則，這當然要比毫無標準好一些，但是，必須指出，是否違背三條原則，只能是政治思想、政治作風、政治品質的特徵，還不能做爲劃分階級的客觀標準，上述提法還沒有擺脫左傾主義的束縛。

造成左傾主義者在階級鬥爭理論上的錯誤的階級根源，主要是小生產者或小農階級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蘇聯的成功，使不少中國知識份子由相信孔夫子轉信馬列，其中不少人深受小農經濟思想制約，並不懂得現代化生產和現代化社會，也就不可能深刻理解現代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不可能深刻理解現代無產階級革命思想，他們在革命中，用「骨頭」感觸事物，而不是用「頭腦」思考事物；用「感情」處理問題，而不是用理智處理問題，這也是當時中國落後的經濟狀況決定的。

一九五七年，左傾主義的階級鬥爭論首先提出不久，就開始轟轟烈烈的反「右」鬥爭，百多萬人被劃成「右派」。一九六二年由于路綫原因，一貫迷信「精神決定一切」的左傾主義者卻在這個問題上卻把「自然災害」當做救命的稻草。我國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遇到巨大困難，爲了對付黨內外的不滿情緒，左傾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進一步發展，膨脹。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有人把它稱爲「流氓無產階級大革命」）是左傾主義的鼎盛時期，左傾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成爲我黨路綫、方針、政策的核心內容，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這個理論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什麼呢？

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成千上萬的優秀共產黨被綁上斷頭台，他們之中不少人南征北戰幾十年，未曾死在敵人的槍彈下，而是死在受左傾主義欺騙的青年的棍棒下，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無數科學家、教育家、文藝家、勞動模範，慘遭迫害，那時，誰對中華民族貢獻大誰就挨整，幾十年民族的精華棟樑毀于一旦，在這種理論指導下，人民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互相攻打，兄弟姊妹互相殘殺，骨肉同胞互相踐踏，中華兒女做出了無謂的巨大犧牲。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生產下降，經濟倒退，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市場供應緊張，許多物品奇缺，物價悄悄上漲，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不前，有些地方竟出現賣兒賣女，逃荒要飯的慘痛情景，在這種理論指導下，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慘遭浩劫，文化專制極度猛行，文字獄駭人聽聞，中國人民精神文化享受貧乏到了極點，生活枯躁單調到了極點，在這種理論指導下，道德風氣敗壞，社會秩序混亂，一方面官場風氣腐化，官霸橫行，溜須拍馬，清客行賄虛僞浮夸，大刮「走後門」之風，另一方面，流氓小偷層出不窮，投機倒把，賣淫，賭博，吸毒又開始出現……夠了，十幾年來中華大地，滿目瘡痍，觸目驚心，慘不忍睹，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多少地怨聲載道，血淚成河。

一九六六年，當中國人民沿著左傾主義者指引的方向開始文化大革命時，他們認爲，這樣做中華民族就可以避免走蘇聯變修的道路，幾年後，中國就會趕上蘇聯，然而，十年過去了，我國

不僅沒有趕上蘇聯，反而差距越拉越大，我們甚至不如一些第三世界的國家的發展成功。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當年我們以咒罵的口吻的蘇聯所做的描述，都無情地應驗在自己身上，而蘇聯究竟怎樣，我們不知道。

一九四九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人民滿懷信心，朝氣蓬勃地站在五星紅旗下，他們堅信，中華民族過不了多久就會像巨人一樣站起來，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五年，中華民族眞的差點站起來，然而，左傾主義者的階級鬥爭理論使得她搖晃了幾下，又重新跌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吐著鮮血。

歷史就是這樣諷刺我們的，用現實諷刺理論，用效果諷刺動機，中華民族的十多年血淋淋的實踐宣言，左傾機會主義的理論——階級鬥爭理論破產了，人民在實踐中逐漸認識到這一點，且不說大量的人在政治的漩渦中看破「紅塵」，消極度日，以示無聲的抗議，那零星的反抗就在一九七六年四月滙成了波濤洶湧的怒潮，偉大的「四五」運動標誌著民族的覺醒！當一小撮人企圖在一九七六年再次煽動新的「階級鬥爭」時，人民不再受愚弄了，而是氣忿地將向「階級敵人」進攻的矛頭指向了「階級鬥爭」理論的鼓噪者——搬起石頭者，砸了自己的脚。

那麼，社會主義時期是否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呢？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對當代幾個典型的「社會主義國家」做系統考察研究，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極其重要而又沒解決的問題，筆者願與有志于中華民族振興的熱血青年對這個問題進行探索，本文僅從理論上或實踐兩個方面說明：即使社會主義時期存在階級，左傾機會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也是與馬列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的錯誤理論。

團十大中央候補委員、北京大學學生
王軍濤

原載《北京之春》第三期(一九七九年)

第五部份　「北京之春」及民刊運動、基層「人大」選舉

「四人幫」倒台後，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沒有很大的改變，七七、七八年所奉行的，還是文革後期那一套——最具體的表現便是在經濟上的「洋躍進」。

七八年底召開的三中全會糾正了始自反右時期的片面强調階級鬥爭的泛政治化傾向，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是當前的最基本任務的方向，明確了要把經濟建設放在第一位的方針。同時，以鄧小平爲首的中共領導人也明白到經濟發展，需要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把以往那種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作風引發到經濟建設中來，無疑是有助於更好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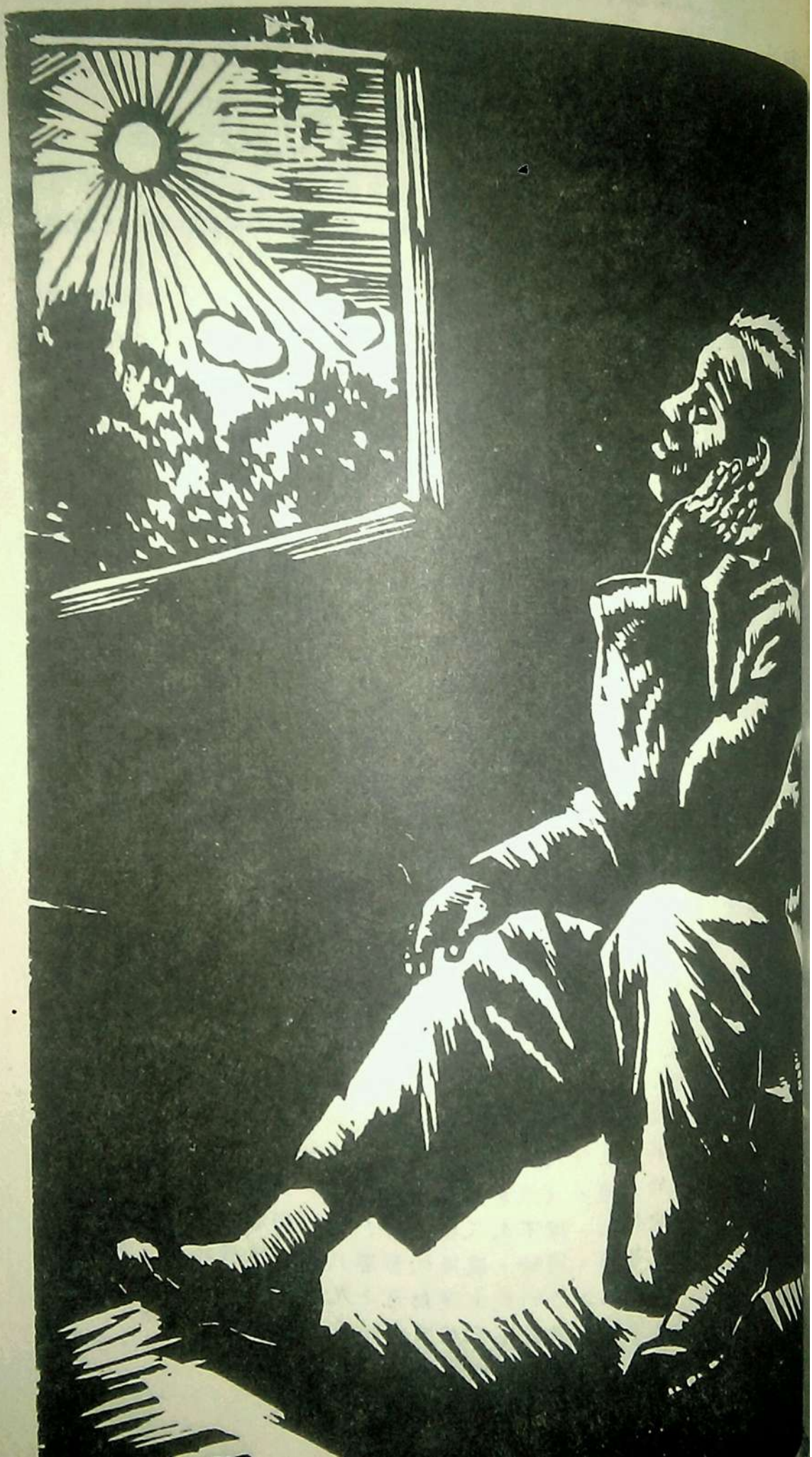
三中全會還提出了要發揚民主，解放思想，三中全會後，無論在經濟領域、學術界或文藝界都出現了比建國任何時期都開放的局面。黨中央對民主、思想解放的明文規定，對於這個被壓抑達二十多年的中國社會不由說是一服興奮劑，特別是對於經歷了文革的冲擊，而在一連串的政治變動中開始覺醒的青年們，三中全會對發揚民主的肯定對他們來說是極大的鼓勵。七九年初開始的民主運動便是這個政治環境的產品。

七八年末，全國各地不少在文革期間受政治迫害而得不到平反的人來到北京向國家領導人請願，這批上訪羣衆在北京的情況立即得到社會很大的關注，同時，北京市西單長安街的一片牆的大字報也引起人的注意，「民主牆」之名不脛而走。《北京之春》、《四．五論壇》、《探索》等民刊相繼在北京出現，上海、廣州、長沙、武漢等地也開始有人創辦民間刊物。

七九年初開始在幾個大城市流通、出賣的民刊基本上所分成兩派，一派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主張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發揚民主，民運中很大部份都屬於這派，同時分佈面也比較廣，譬如北京徐文立、劉青所主辦的《四．五論壇》、《北京之春》，廣州的王希哲，上海的《民主之聲》等都是這派的代表人物，而王希哲、徐文立更是整個民運中影響最大的表表者。另外一派是撇開馬克思主義，主張人權、民主的，以民刊《探索》爲代表，但由於較激烈的立場，《探索》很快便停刊，主編魏京生被捕之後，雖然後來曾復刊，但不久又被迫停刊，故影響力比同時期的《四．五論壇》等弱，同時，這派的影響只是局限在北京一地。

以民間刊物爲主力的民主運動自七九年初之後，曾有過比較蓬勃的時期，但後來終於不容於官方，在「破壞安定團結，妨礙經濟發展」等藉口下，不斷受到官方的壓力，八一年四月，全國性拘捕民運人仕使民主運動趨向沉寂。

甲部：



魏京生

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

序言

現在的報刊雜誌和電台中不再震耳欲聾地宣傳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了。一方面，因爲它是被打倒的「四人帮」的法寶，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爲人民羣衆實在聽膩味了，這一套再也不能拿來作欺騙人民的工具了。

歷史的規律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舊的既然已經去了，人們自然要拭目以待。老天不負有心人，他們終於等來了一個偉大的諾言，叫做「四個現代化」。英明領袖華主席和在有人心目中更英明偉大的鄧副主席終於擊敗了「四人帮」，使得天安門廣場上流血的偉大的人民，有了實現他們夢寐以求的民主與繁榮的可能性。

「四人帮」抓起來以後，人們就日日盼望有可能「復辟資本主義」的鄧副主席，作爲一面偉大的旗幟重新樹立起來。終於，鄧副主席重新回到了中央領導的崗位上，人們何等的激動，何等的興奮，何等的……。但遺憾的是：人們所厭惡的舊的政治制度沒有改變，人們所希望的民主與自由甚至連提也不被提起了，人民的生活狀況沒有什麼改變，「提高」的工資，遠遠趕不上物價的飛速上漲；聽說要「復辟資本主義」搞獎金制了，細打聽一下，原來是馬列主義的祖先們詛咒過的那種「最大限度剝削工人」的「無形的鞭子」。有消息證實不再〔搞〕「愚民政策」了，人民不能在「偉大舵手」的領導下、但仍可以在「英明領袖」的領導下去「趕上並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的英、美、日本和南斯拉夫（？）；「參加革命」不那麼時髦了，「上過大學」開始身價百倍，人民也不必任憑「階級鬥爭」的叫囂來磨厚他們耳朵裏的繭子了，「四個現代化」可以代表一切。當然還必須本着四·五學

社向我們傳達的中央精神，在統一領導下，加以指導或引導後，這整個美妙的圖景才能算是完成。

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畫餅充飢」，還有一個成語，叫做「望梅止渴」。在古代就能總結出這樣幽默的諷刺性經驗的人民，據說還在歷史長河中不斷發展、前進，以至到了今天。總不該有人會以爲他們也會做這種蠢事吧。

但是竟然就有人這樣認爲，但是竟然就有人在這樣做。

中國人民在幾十年內緊跟在「偉大舵手」後邊用「共產主義理想」做畫餅，就着「大躍進、三面紅旗」的止渴梅，勒緊了褲腰帶，勇往直前，三十年如一日地得到了一個經驗教訓：這三十年來大家都好像猴子撈月亮一樣，怎麼能不一場空呢？因此當鄧副主席提出「務實」的號召後，人民羣衆就以潮水般的呼聲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擁上了台，人們期待着他用「實事求是」的態度檢查過去，引導人們走向可以達到的未來。

但是有人告誡我們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一切的一切的基礎，甚至是談話的基礎，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誰否認這一點，有告示爲憑——就沒有好下場。而且「有人們」提請我們注意：中國人民是需要獨裁的，即使超過封建皇帝，那正說明他的偉大；中國人民不需要民主，除非它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否則一錢不值，信不信由你，有監獄爲憑——剛騰出來的。

但是有人給你留了出路：以四個現代化爲綱，安定團結地走吧，勇（？）作革命（？）的老黃牛，你們會達到你們的天堂——共產主義和四個現代化的繁榮。好心的「有人們」又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提示：如果你們想不開，就努力鑽研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吧！想不開是因爲你們不懂，不懂正說明了學問的高深嘛！你們不要不聽話，你們單位領導是不會答應的！等等，等等……。

我勸大家不要再相信「這一類政治騙子」了，我們明知要受人騙，還不如老老實實地信賴一下自己，文化革命的鍛鍊已使我們不那麼愚昧了。我們自己來研究一下自己該怎麼辦吧！

（一）爲什麼要民主？

幾世紀來人們談論這個題目已經多得很了。民主牆的諸公們也作過詳細的分析，說明民主比獨裁究竟好多少。

人民是歷史的主人，這是一個事實呢，還是一句空話？它既是事實，也是空話，說它是事實，是因爲沒有人民的力量，沒有人民的參預，任何歷史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偉大舵手」、「英明領袖」恐怕都不會存在，更不要說什麼創造歷史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新的中國人民就沒有新中國，而不是「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鄧副主席感謝毛主席救了他的命，這是可以諒解的，但他難道就不感謝那個把他推上台的「呼聲」嗎？他難道就應當對「呼聲」說：你們不應當說毛主席的壞話，因爲他救過我的命。從這件事上我們同時看出了，人民是歷史的主人成爲了一句空話，它之所以是空話，是人民不能按照他們大多數的願望來掌握自己的命運，他們的功勞被記在別人的帳簿上，他們的權利被編織成別人的皇冠，有這樣的主人嗎？倒不如說是好奴隸。在歷史上他們作爲主人創造了一切，在現實中他們作爲奴僕垂手拱立，以便讓像麪團中的酵母那樣不斷產生的領袖來「引導」他們。

他們應當有民主，如果他們向誰要民主，那他們只不過是要回本來就屬於他們自己的東西。如果誰不給他們民主，誰就是無恥的强盜，比搶走工人血汗錢的資本家更純粹的强盜。

但是現在人民有民主嗎？沒有。人民不想當家做主人嗎？當然想。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原因就在這兒。勝利後這個諾言到那兒去了呢？隨着人民民主專政的口號改爲無產階級專政，在人口幾千萬份之一的少數中實行的「民主」也取消了。代之以「偉大領袖」個人的獨裁，按照偉大領袖的教導在黨內發牢騷的彭德懷也被打倒在地。又一個新的諾言：因爲領袖是偉大的，所以迷信一個領袖比民主更會給人民帶來幸福，人民半被迫半自願地聽信了這個諾言直到今天，但他們更幸福了嗎？更繁榮了嗎？更富有了嗎？不可掩蓋的事實是他們更貧困了，更不幸了，更倒退了。爲什麼會這樣？這是他們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現在怎麼辦？這是他們第二個要考慮的問題。現在根本不需要評價毛澤東幾分功

勞、幾分錯誤，當初他提出這個說法只是爲他自己辯護，現在人民須要反省一下，沒有毛澤東的個人獨裁，中國是否也必然會落到今天這一個地步。是中國人笨，中國人懶，中國人不想過更富裕的生活，中國人天生不安份的嗎？正相反，那爲什麼？答案是顯明顯的，中國人不該走他們走過的這條路，他們爲什麼會走這條路？不正是那個自賣自誇的獨裁者引導他們走上的這條道路嗎？不想走就專政你，人民聽不到不同的情形，還以爲天下只有這是條可走的路呢。這不叫欺騙嗎？這裏邊也有幾分功勞嗎？

這是條什麼路？聽說叫「社會主義道路」。按馬克思主義的祖先們的定義，社會主義首先是人民羣衆，或叫無產階級大衆當家作主人，試問中國的工人們，農民們，你們除了每月發給你們糊口的一點點錢以外，你們作了誰的主？作了什麼的主？說來可憐，你們被人作了主，甚至婚姻也不例外。社會主義保障生產者除完成他的社會義務外，得到他的勞動成果，但你們的義務是有止境的嗎？你們得到的不正是「維持勞動力的生產所必須」的一點點可憐的薪水嗎？它保證社會的每一個公民都有受教育、發揮個人能力……等等許多權利，但我們在眼前的生活中一樣也看不到，看到的只有「無產階級專政」和「俄羅斯式獨裁的變種」——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獨裁。難道這樣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人民所需要的嗎？難道獨裁就等於人民的幸福嗎？這是人民所希望的那條馬克思描述過的社會主義道路嗎？顯然不是。那是什麼？說來可笑，倒有點像《宣言》裏說的封建社會主義，也就是披着社會主義外衣的封建君主制。聽說蘇俄已從社會封建主義升格爲社會帝國主義，中國人也必須走這條路嗎？

有人建議把過去的帳全算在封建社會主義的法西斯獨裁統治上，我是完全同意的，這裏邊不存在功過問題，順便說說，臭名昭著的德國法西斯的正名叫「國家社會主義」，他們也有一個獨裁暴君，他們也號召人民勒緊腰帶，他們也欺騙人民說：你們是偉大的民族。最主要的是：他們也扼殺那怕是最起碼的民主，這因爲他們清楚地認識到：民主是他們最可怕的、不可抗拒的敵人。在這個基礎上，斯大林和希特勒握手簽訂了《德蘇條約》；在這個基礎上，社會主義國家和國家社會主義舉杯瓜分了

這個基礎上，兩國人民遭受着奴役和貧困。我們也必須繼續遭受這樣的奴役和貧困嗎？如果我們不想民主是我們唯一的選擇，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想在經濟、科學、軍事等方面現代化，首先就必須使我們的人民現代化，使我們的社會制度現代化。

（二）第五個現代化——要什麼樣的民主

我想問問大家：我們要現代化幹什麼？在有人看來：紅樓夢那個時代不是滿好嗎？看看書，寫寫詩，還可以搞女人，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現在還加上看看外國電影，眞是神仙的日子。不錯，是神仙的日子，老百姓可是不能沾邊的，人民要的是人民有可能眞正享受到幸福的日子，最起碼也要不比人家外國的人民享受的更差，而所有老百姓都能夠享受到的富裕是社會普遍富裕，這種富裕只有隨着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才能夠達到，這一點是十分明白的，但最重要的一點被有些人給遺漏了，社會生產力提高後人民就能夠享受到富裕生活嗎？這裏邊還存在着支配權的問題，分配的問題，剝削的問題。

解放後的幾十年中人民勒緊腰帶，拚命的幹，也確實創造了許多的財富，這些財富都到哪〔兒〕去了？有人說：拿去餵肥了像越南這樣的較小型號的獨裁政權，有人說餵肥了林彪江青這樣的「新生資產階級份子」，這都對，總而言之，它沒有落到中國勞動人民的手裏，這些財富不是被大大小小的手中有權的「一類政治騙子」直接揮霍掉了，就是被他們賞賜給了越南、阿爾巴尼亞這類與他們志同道合的混蛋們。毛澤東臨死前爲了老婆向他要幾千塊錢還難受過，他把中國人民的血汗錢幾百億地扔了出去，誰發現他心疼過？而且這還是在中國人民勒着腰帶上街討飯來搞社會主義的時候。跑到民主牆來拍毛澤東馬屁的人，你們既然睜着眼睛爲什麼就看不到這些？恐怕是有意看不見這些吧？假如眞看不見，請諸位把寫大字報的功夫用來跑跑北京站、永定門，或在街上注意一下上訪的外地人，問問他們在外地要飯是否也算稀罕事，我想這些要飯的不一定也想把雪白的大米去支援什麼「第三世界的朋友們」吧！可是他們的意見重要嗎？可悲的是在我們這個人民共和國裏，只有那些吃飽了沒事，看書寫字過神仙日子的

人才有支配的權力，人民難道沒有最充分的理由把權力從這些老爺們手裏奪過來嗎？

什麼是民主？把權力交給勞動者全體來掌握，就是「眞正的民主」。勞動者不能掌握住國家權力嗎？南斯拉夫正在這條路上走，並給我們證明了，人民不需要大小的獨裁統治者，可以把事情辦得更好。

什麼是眞正的民主？人民按他們自己的意願選擇爲他們辦事的代理人，按照他們的意願和利益去辦事，這才談得上民主，並且他們必須有權力隨時撤換這些代理人，以避免這些代理人以他們的名義欺壓人民。這是可能的嗎？歐美各國人民就在享受着這種民主，他們可以按自己的願望把尼克松、戴高樂、田中等人趕下台，如果他們需要，還可以再讓他們上台，誰也干涉不了他們的民主權力。而中國人民即使談論一下已經死去的「偉大舵手」毛澤東、「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偉人」毛澤東，監獄的大門、各種預想不到的厄運就在等待着他們，對比之下，社會主義的民主集中制與資本主義的「剝削階級民主」眞是有天壤之別呀！

人民有了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無法無天了嗎？最近報刊上透露的一些情況不是說明正是由於沒有民主，大小獨裁統治者才得以無法無天嗎？怎樣維持民主的秩序，這是一個需要人民自己解決的內政問題，無需特權者老爺們替他們操心，老爺們操心的不是人民的民主，而是怎樣用這個藉口來取消人民民主的權利。內政問題當然不會一下子就解決，必須要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去解決，錯誤和缺點是難免的，但這是我們自己的事，總比受了老爺們的欺壓無處申冤要强千百倍，耽心民主會無法無天的人，正像辛亥革命後耽心人們沒有皇帝，會無法無天的人一樣，他們的結論都是：安心受壓迫吧，沒人壓迫你們，你們的脊梁會飛到天上去呢！

我要恭敬的奉告上述諸君：我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不要神仙和皇帝，不相信有什麼救世主，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我們不要作獨裁統治者擴張野心的現代化工具，我們要人民生活的現代化，人民的民主、自由與幸福，是我們實現現代化的唯一目的，沒有這第五個現代化，一切現代化不過是一個新的諾言。

我號召同志們：團結在民主的旗幟下，不要再相信獨裁者的「安定團結」，法西斯集團主義只能帶給我們災難，不要再對他們抱有幻想，民主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放棄民主權利，無異於重新給自己套上枷鎖。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吧！人類的歷史是我們創造的，讓一切自封的領袖和導師滾蛋，他們把人民手中最寶貴的權利騙走已好幾十年。

我堅定地相信；在人民自己的管理下，生產將更發達——因爲這是勞動者爲自己的利益而生產；生活將更加美好——因爲一切將以勞動者的生活爲目的；社會將更加合理——因爲社會的一切權力將以民主的方式歸於勞動者全體。

我並不以爲人民不費吹灰之力地從某救星手中得到這一切，我也並不認爲中國會嫌困難重重而放棄這個目標。只要人民認清了目標和障碍，他們會毫無猶豫地踩扁那些攔路的螳螂。

（三）向現代化進軍——實行民主

中國人民要現代化，首先必須實行民主，把中國的社會制度現代化。民主並不完全像列寧編造的那樣，僅僅是社會發達的結果，它不僅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達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也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這個發達階段以及更加發達的階段中得以存在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社會將停滯不前，經濟的增長也將遇到難以克服的障碍。因此，對於以往的歷史來說，民主的社會制度是一切發達——或叫現代化——的前提和先決條件，沒有這個先決條件和前提，不但進一步發展是不可能的，就連保持現有發展階段的成果也是很難做到的，我們偉大的祖國，三十年來的經歷，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人類的歷史爲什麼要走向發達——或叫現代化？是因爲人類需要發達的社會所能夠給予他們的全部現實結果，是因爲這一現實結果的社會效果所能最大限度地使他們達到追求幸福的頭一〔個〕目標，就是自由；民主是人類現在已知的最大限度可能達到的自由。民主成爲人類近代鬥爭的一個目標，不是十分顯而易見的嗎？

近代歷史上一切反動份子，爲什麼都在反民主的旗幟下團結

起來呢？是因爲民主給予了他們的敵人——人民大衆——以一切，而不給予他們——各種壓迫者——以反對人民的任何手段，最大的反動派就是最大的反民主主義者，這從德國、蘇聯以及「新中國」的歷史中可以看得很明白；最大的反民主主義者就是社會和平與繁榮的最大、最危險的敵人，這從德國、蘇聯以及中國的歷史中同樣可以看得十分明白。人民要求幸福、社會要求發展的鬥爭，就集中在對反民主主義者——獨裁法西斯主義者的鬥爭上，這也可以從德國、蘇聯以及中國的歷史上鮮明地看出來。民主反對專制的鬥爭取得勝利必然給社會的發展帶來最優條件和最大的速度，關於這一點，美國的歷史就是一個最鮮明、最有力的證據。

人民追求幸福、和平、繁榮的一切鬥爭，都只能以追求民主爲前提，人民反抗壓迫與剝削的一切鬥爭，也都只能以達到民主爲先決條件，以我們的全部力量投入到爲民主而鬥爭的戰鬥中吧！人民所能得到的一切，都是民主的，非民主的任何幻想都不是人民可能得到的，任何形式的獨裁和專制集體主義都是人民最直接、最危險的敵人。

敵人會讓我們實行民主嗎？當然不會，他們會不擇手段地阻止民主的進程，欺騙和蒙蔽人民的耳目，是他們可以採取的最有效的辦法。一切獨裁法西斯主義者都告訴人民：你們的現狀實際上是全世界最美好的。

民主眞的到了自然而然的地步了嗎？並不是，它的每一個微小的勝利都要化費巨大的代價，甚至要認識到這一點，都必須花費流血犧牲的代價。民主的敵人一貫都欺騙人民說：民主就是必然產生也必然消亡的，因此是不必花費力量去爭取的。

但是看看眞實的而不是「社會主義政府」的御用文人們編寫的歷史吧！眞實而有價值的民主每一個細節末枝，都浸潤着烈士們和暴君們的鮮血，向民主邁出的每一步，都必須抗拒反動勢力的全部打擊。民主之所以會克服這些障碍，正說明它對於人民的寶貴，等於他們的一切希望，因此這一潮流是不可阻擋的。中國人民從來沒有怕過什麼，他們只要認清了方向，暴君們的强大就不會再是不可戰勝的力量。

爲民主的鬥爭是中國人民的目標嗎？文化革命是他們第一次顯示自己的力量，一切反動勢力都在它面前瑟瑟發抖了。由於人民當時還沒有認清方向，民主的力量還不是鬥爭的主流，因此大多數鬥爭都被獨裁暴君們用收買、誘入迷途、挑撥離間、造謠中傷和武力鎮壓的方式扼殺了，由於當時人民還迷信各種獨裁野心家式的領袖，因此他們無意中又一次成爲暴君和潛在的暴君們的工具和犧牲品。

今天，十二年後的今天，人民終於認識到了目標的所在，認清了鬥爭的眞正方向，認出了他們眞正領袖——民主的旗幟。西單民主墻成爲他們向一切反動勢力所作鬥爭的第一個陣地。鬥爭一定會勝利——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人民一定會解放——這是具有新意義的口號。還會流血，還會犧牲，還會遭到更陰險的暗算。但是民主的旗幟不會再被反動勢力的妖霧遮住了。讓我們團結在這一偉大而眞實的旗幟下，爲謀求人民的安寧與幸福，爲謀求人民的權利與自由，向社會制度的現代化進軍吧！

筆者：　金生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　貼於：民主牆

轉載自北京《探索》創刊號（一九七九年一月）

魏京生

續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

序言

從前一篇《第五個現代化》貼在這裏後，周圍出現了一些頗表不滿的小紙片，其中竟有一人署名曰：「焦大」，這不禁使人聯想到「奴才」二字，而且這想像如旁觀者的評語一樣，也帶着「可憐的」標簽。中國現代語言中喜歡用「業餘」這個名稱，我們也暫且叫他作「業餘」奴才吧！

奴才的確有專業和業餘之分，譬如前年天安門廣場揮舞大棒代表「人民政府」毆打人民的分子，我們可稱之爲專業奴才，這些人不管願意與否，替主子辦事是他們的行業，更何況於其中還是有利可圖的呢！又譬如這面墻上的那位「焦大」，假如眞的背後沒人指使，豈不應該叫做業餘奴才嗎？這其中是否有好處，我們不敢肯定，其實又何必借用《紅樓夢》裏一個死心塌地的奴才的名姓呢？像第二機床廠某「青年工人」一樣貼上一張履歷表，不是免得主子會埋沒了你這個人了嗎？

當奴才有利可圖，是情有可原的，在《紅樓夢》式老爺統治的天下，竟有這些預備役的「業餘奴才」，不正是說明獨裁暴政不是受某個人因素的影響，而是因有雄厚的封建主義社會基礎，才得以堅如磐石的嗎？這不是一個可笑的問題，而是一個所有不希望中國落後以至滅亡的愛國者和不希望人民受苦難的人都應正視的問題。

在這個由老爺——奴才——業餘奴才統治的社會中，能實現「四個現代化」嗎？我國的情況提供給人一個嚴酷的事實，不可能！甚至連談論有時也不被允許，現在允許談論了，但這是上邊放寬了，恩賜了，你們難道不感激涕零嗎？如果你們還不感到涕零，就留神有人記下你們自行車的牌號，專業奴才並不都穿着有

標記的服裝。

我們青年不是「東亞病夫」，他們有足夠的勇氣貼，有足夠的勇氣看，有足夠的勇氣談論「諱禁」的各種看法，這是因爲他們雖然沒有把握住什麼是「眞理」，但以往的「眞理」在他們面前早已失去了信用，他們需要一條新的路子，以便可以達到一個新的生活，有人以爲拿舊的東西可以騙住頭腦簡單的中國青年們，你們錯了，他們頭腦並不簡單，即使你們封鎖了他們思考的材料，也不可能封鎖住他們思考的願望，他們透過你們設置的「竹幕」看到的一綫光亮，已經像鞭子一樣催着他們探索你們「眞理」的漏洞，探索通向新生活的道路——民主。即使你們還有能力再一次阻擋民主墻的進程，你們也不得不在探索者面前發抖了。

我在這裏聲明：我下邊的意見是貢獻給探索者的，並沒有準備讓老爺和各種牌號的奴才們來分享。

（一）極權主義與民主

歷代各種不同的獨裁統治者雖然使用各種不同的語言和方式，但都這樣教導他的子民們：因爲人類是社會的，所以社會的利益高於一切；因爲社會的利益是共同的，所以需要集中的管理或叫統治；因爲少數以至一個人的統治是最集中的，所以獨裁是最理想的方式。因此「人民民主獨裁」就等於「偉大舵手」的獨裁。因此「偉大舵手」的獨裁就是「人類歷史幾百年，中國歷史幾千年才出一個」的無比英明的救星。

從上述推論中我們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獨裁專制的傾向，它服務於哪些人，這也是大家可以十分容易看到的，這是獨裁者或稱極權主義的「眞理」，而不是人民的眞理，這是唯一的眞理嗎？或者說這是眞理嗎？這個問題必須從推理的第一步開始檢查。

人是具有社會性的，因爲他們都生活在一定的社會中，但是(A)社會是由不同的個人組成的，每一個人按其自然狀態來說，都是相對於其他所有個人而獨立存在。(B)人類的社會性正是由這許多不同的個人相互之間的共同性和共同利益組成的，社會的單元——個人——的不同，造成社會與社會之間的不同，因此人的社會性是依賴於個性而存在的，正如人類社會存在的前提是有

組成社會的個人存在。(C)所以我們必須承認，人的個性是先於人的社會性的人性組成因素，它與人的社會性分立而成爲人性的兩大類因素，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觀察到的人性之所以往往具有片面的現象，一方面是因爲具有個人的人性之間的天然差異，這種有差異的人性的總和就構成人類的本質。

人類的本質是隨着人的存在條件的變動而隨時變動的，影響人類內在本質變動的條件中，有變化迅速的，也有相對固定的，譬如人對吃的東西是固定的，但需要吃什麼，或說對食物的質量的需要則是隨時間地點和種種其它原因而變化的，人的個性是始終存在的，正如人的個體是始終存在同樣不容懷疑，但由個體組成的社會則是經常變化和沒有嚴格界限的，因此人的社會性也是變化和沒有嚴格界限的，這種社會性是始終存在的，但隨着社會成員的存在條件的變化而造成的組合方式的變化，使得相對固定存在的社會性具有相對變化的存在方式。極權主義和民主的區別不是個性和社會性的區別，而是社會性的兩類不同的存在方式，極權主義以壓抑個性作爲其存在的基本條件，因此它在本質上是奴役性的方式，民主以融合個性爲其存在的基本條件，因此它在本質上是合作性的方式。沒有人能找出一種極權主義統治方式不是壓抑個性因而奴役人民的，也沒有人能找出一種民主不是以融和它的大多數公民個性的需要爲其存在的基礎。極權主義以壓抑個性爲特徵，而民主以維護並融和個性爲特徵，說明極權主義和民主的區別是人類個體存在的兩種不同、完全相反的方式。也就是人們生活的兩種極不相同的條件，你喜歡自由的生活還是喜歡受奴役的生活呢？這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完全不須要問的問題，當然業餘奴才要除外嘍。

但是業餘奴才們提出來讓我們注意一下現實，不要光憑願望來選擇道路，因爲這是不可能實現的，果然如此嗎？那麼我們就來看看現實吧！

西方的「資產級階民主」使得人民可以通過選舉來表達他們的意志，並以這些意志決定國家的前途，即使他們的意志並不完全正確，但人民有權犯錯誤，也可以很快地改正，因此任何「資產階級政治家」都不敢在任何事情上無視公衆的輿論，否則人民

就叫他滾蛋，但任何「無產階級政治家」都可以決定或通過決議來決定用大棒强迫「無產階級大衆」服從他們的意志，即使他們一無是處，人民也只好眼看着他們升官、享樂、娶小老婆。

西方的人民可以盡量享受社會發達的一切成果，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盼望着像馬兒一樣幹了活就有草吃，並且總是要滿足於兵營式的緊張和嚴肅。

西方的勞動者可以用罷工、遊行，最近還發展到可以運用工人代表在董事會裏的半數表決權來安排他們的生活和工作，中國的工人、農民們除了只得滿足於「以維持勞動力的生產所最必須」的馬克思主義式工資外，還可以用不分男女服從領導安排的方式來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

西方的人民有許多的自由還不滿足，中國的人民，有許多的紀律，還有人要給增加。

西方的政府以維護公民的人權爲基礎之一，「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權是作少數統治者的順民。

夠了！像這樣的社會，法治又能治了誰呢？有法的是無法無天的老爺們，被治的是被奴役而又無權的老百姓。

夠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宣傳機器打斷了你；「在我們的社會裏，至少解決了吃飯的問題」。

果眞如此嗎？這個問題最好讓在所有大小城鎮沿街乞討的「社會主義黑暗面」來回答，讓處在沿街乞討的邊緣不小心就會落到這一步的千百萬工人、農民們來回答，拍毛澤東馬屁的人這回沒拍到恰到好處吧，這種馬屁是需要到不明眞象的外國人那兒去拍的，在中國沒有市場，他們以爲中國人都是猪狗，給點食就會搖尾巴，但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時餓死的二千萬(?)同胞們，即使應當是猪狗，難道也應當爲他們的被餓死搖尾巴嗎？

劉少奇說的倒是老實話，「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什麼人禍？從獨裁統治者那〔兒來〕的人禍，從馬列牌法西斯主義那兒來的人禍。來的什麼人禍？極權主義的人禍，按照少數人的想像拿幾億人的生命開玩笑的人禍。

「夠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追隨者們也在說，「但是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貧民窟嘛！」

這個問題可以由人們自己找答案，美國的貧民窟是否比北京崇文飯店後邊的工人住宅區更骯髒、破爛、擁擠。

「夠了！」從拍馬屁得了甜頭的人們說，「資本主義國家男女不平等呀！」

他們也許認爲，男女一樣受壓迫受剝削，一樣過猪狗不如的生活，一樣的拚死拚活給他們「增加社會主義積累」，就實現了平等吧。也難怪，他們的理論祖先就證明了平等的不可能存在。

「夠了！」業餘奴才們也按奈不住了，「資本主義國家有娼妓呀！」

這回倒要讓他們去請教一下自己人——公安局，在中國到底有多少暗娼，在蘇聯到底有多少暗娼，還有多少姑娘在隨時準備「伺候」首長們，有多少姑娘爲了不願「伺候」首長而被分配到遠方。這些我們沒有統計數字，不敢妄加評論。還是讓過往的外國人、讓那些被賺了外滙的人來評論吧。

這些就是無數先烈爲了它流血犧牲的理想社會嗎？這些就是千百萬勞動人民衷心盼望的社會主義嗎？這些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嗎？

這些只能說明理論上的疏忽和對錯誤道路的迷信，給人類歷史和人民生活帶來多大的災難。

（二）社會主義與民主

現在人們對社會主義一詞所下的定義有兩種：一種認爲它是最合理的社會，是向更加理想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持這種觀點的多半是受宣傳機器的灌輸、中毒太深的人。他們中毒應當完全的歸於馬克思和他的理論、實踐的後代；另一種認爲社會主義是現代極權主義的同義詞，因爲他們所看到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都是極權主義的，我的判斷是這兩種看法都不完全對。

第一種看法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一點：一切極權主義都可以對完美的將來的理想作爲它們在現實中施暴政的補償，以這種補償來麻醉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就像充飢的畫餅，在精神上滿足人們的欲望，來達到在現實中剝奪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

承認並奉行這種理想主義，是極權主義的實際支柱。社會主義運動早在馬克思以前就存在，那時它是與民主運動交織在一起的。把社會主義運動同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結合起來，使社會主義運動納入理想主義也就是極權主義的軌道，這一「科學」的功勞，的確應歸於馬克思。這種社會主義——極權社會主義——恰恰迎合了這樣一種人的需要，這種人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觀念還沒有擺脫封建社會關係的束縛，因而不能應適發達了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但他們也同一切人類一樣，具有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這種社會主義在指出現實的民主弊病時，作了這樣的注釋和許諾：因爲民主只能是對少數人有利的，所以就須要專政；因爲現實的民主是不能滿足你們對美好的要求的，所以必須求助於專政；因爲你們是不習慣於自己掌握命運的，所以就應該把它交托給專政；因爲你們即使費盡心機，現實中民主所能給予你們的滿足也是有限的，所以你們應當把力量投向爲「最美好的將來而鬥爭」，而這個最美好的將來，就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獨裁暴政。現代社會主義國家爲什麼都是從最落後的封建社會中直接成長起來，這是一個很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這種社會主義迄今爲止所奉行的都是一條把民主革命引向理想主義的路線，都是依靠封建文化傳統的慣性來對抗民主文化的幼蘗，都是以封建社會哲學的方式，迷信少數人的拯救與引導，因此它的必然趨勢就是達到極權主義——獨裁法西斯主義。這個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普遍的，甚至可以說〔是〕無一例外的。這種社會主義直接繼承了封建哲學的原理——德國古典哲學——也不是偶然的，從它的本質上看是必然的。因此如果繼續遵循這種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就無異於繼續支持極權主義——獨裁法西斯主義。

第二種看法只看到現代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就借此判斷了一切社會主義，而不從社會主義的全過程和實際含義來分析它，因此是一種狹隘的眼界。社會主義的本來含義是指在生產和生活社會化的基礎上，把應該屬於全人類的人類獲取物質生存手段的工具——生產資料——交由它的使用者和受益者管理。換句話說：人類的一切個人在屬於人類的經濟條件面前有同等享用的機會和同等使用的權利與義務。因此，社會主義就其本來含義是首先確

立個人生活的平等權利，這種權利只有通過社會自由的組織和結合的方式——民主政治，才有可能達到，因此它在本質上是傾向民主的，所有獨裁法西斯統治者靠社會主義上台後，都必須殘酷地清洗和整頓社會主義者隊伍中的民主傾向，而且在獨裁者上台後無一時不受到民主傾向從各方面發出的進攻，就是社會主義運動自然傾向於民主的一個證據。不過這種傾向在沒有破除對獨裁者的迷信的情況下，在沒有擺脫理想主義色彩而回到現實主義的情況下，它是不可能具有徹底打垮獨裁法西斯主義的力量的。

順便說，人民是具有兩重性的，在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和現代的社會主義社會，——獨裁壟斷資產階級社會裏，人民一方面以他們的勞動生產出一切財富，——消費的財富和繼續擴大生產的條件即資本——一方面無權控制他們的生產和分配，只能滿足於他們對立的資本，給予他們以最低限度的生存條件；在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裏，人民一方面以民主的方式控制着他們獲取物質生存手段的條件——生產資料，並以生產者的身份滿足社會需要，一方面以勞動者的身份參加到物質利益和精神的生活中，並以消費者的身份提出需要。人民即是由無數個人組成的，同時也是組成人民的每一個人，這是我對人民的理解。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是人民思想的兩個組成部份，在目前沒有個人獨立存在的餘地的社會制度中是沒有集體主義可談的，有的只是大小獨裁者們對個人主義和小集體主義。它們的本質是：以小集體主義反對人民個人主義，以獨裁個人主義淹沒人民集體主義思想。

（三）現代化生產與民主

一切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都告訴我們，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空談家們拿來騙人的玩意兒，專政才是人民可以獲得權利平等與生活自由的必經之路，但擺在我們面前的結果是：西方人民在「社會空談家」們的欺騙下，人權有保障，思想有自由，物質生活遠遠超過「社會主義的先進生產關係」；另一個結果是：東方的人在專政下喪失了一切人權的保障，只留有馬克思主義的自由，物質生活遠遠落後於遭到危機和通貨膨脹打擊的「受剝削、受壓迫」的工人農民們，而且比較起一百年前，五十年前，三十年

前來說，他們與許多生活在「資產階級民主」下的同志們的差距越來越大了。如果歷史可以超越，這些剛好可以拿來給一百年前問世的經典著作當註解。

民主究竟是一種脫離生產的少數人的空談，還是發達社會的政治方式和發達經濟的社會條件？這個問題馬克思的理論已不能解釋了，只要他的後代信徒不歪曲事實。至少對於我們這些除馬克思主義以外，過去很少接觸其它理論的人是一個需要重新考慮的問題。

從現代歷史所表現的現象上看，凡是民主政治上正軌的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就會加快，並以持續的快速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關於這一點，美國和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日本甚至克服了本國資源缺乏的困難而達到經濟發展高水平。

爲什麼會這樣呢？第一是民主政治所依賴的經濟基礎是自由企業制度，經濟管理的自由較之政府對經濟的嚴密控制，更加有利於經濟的發展，這一點在今天也已爲大多數人所公認。

第二是因爲在民主的方式下，勞動者控制分配的機會在不斷地擴大，在勞動與資本對分配的競爭中，由大多數人的意志決定政治權力的分配方式，較之由少數人的意志決定政治權力的分配，更加有利於勞動者，因爲勞動者總是大多數，又因爲政治權力的分配從較寬的範圍來看，總是決定或部份決定着經濟權力的分配，簡言之，勞動者在民主政治下所得的工資、福利等等由於工人組織的存在，已經不是馬克思式的工資，而是資本所可以償付的最高工資，如果按社會主義御用理論家所津津樂道的「六項扣除」的標準來衡量，資本主義企業裏的工人所得工資正是最低扣除情況下的工資，遺憾的是所有社會主義制度下（指現在）工人的工資倒是馬克思所謂的「維持勞動力的生產所得最必須的」一點點可憐的錢。

勞動者的高工資就等於消費水平的提高，消費水平的提高擴大了任何工農業所不能不重視的主要市場——國內市場，因此它反過來給予工農業擴大再生產的最優可能性，在這種基礎上，提高了水平的大生產必定在國外市場具有高水平的競爭力。因此民主的社會制度在現代化的條件下，無疑是給高水平的生產創造了

最好的條件。

第三是在民主的社會中，控制生產的機會對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因此最有效的生產方法必然在競爭中佔上風，也就是說，自由競爭給經濟發展利用各種科學的最新成果創造了最好的條件，同時競爭也是驗證科學成果是否造福於人類以及造福人類理想的試金石，而由少數官僚組成的機構代替競爭的制度，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達到這樣的效果的，甭說官僚制度本身就趨向昏庸化和腐敗。就是在最好的情況下，少數官僚的判斷無論如何也不如全體消費者的判斷更正確，因爲生產並不是人類生活的最終目的，生活本身才是人類生活的最終目的，生產僅僅是人類爲獲得生活所必須的手段，由需要這個手段的人的總和來判斷手段，總比極小一部份人要正確得多。因此由民主政治來選擇的具體經濟道路是比極權政治靠少數人選擇的經濟道路更正確。

第四是民主政治使得一切社會矛盾有得到公開鬥爭和解決的機會，並且總是隨時都有這種機會。因此把政治鬥爭和社會矛盾限制在一個固定的範圍內，不使它蔓延，以至影響到生產和生活。在現實中，我們看到民主社會的政治鬥爭和其它社會矛盾總是對社會造成最小的損害和影響，而極權主義由於其本性而不允許公開的政治鬥爭，它使用暴力壓制和消滅一切社會矛盾，而鬥爭和矛盾由於其社會根源的存在，總是會東山再起的，爲獲得鬥爭的權力，則只好運用陰謀和暴力的手段，這種陰謀和暴力的鬥爭，即使不大，也往往給社會帶來巨大的震動，給生產和生活帶來不容易彌補的損失。例如：「社會主義國家」的每一次最高人事變動都像地震一樣，給全國的生產和生活帶來巨大的損失，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至於低一些級別的鬥爭和沒有發展到你死我活的長期「勾心鬥角」給生活和生產帶來的不易統計的損失，與最高鬥爭結合起一起，就構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最嚴重的障礙。這也就是爲什麼較之民主國家高得多的社會積累，不能帶來生產的持續高速度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指出，民主是現代化生產高速度發展的社會條件，沒有這個條件，生活和生產的現代化都是不可能的，無論什麼偉大人物用什麼發誓，事實已證明都是不可能的。

人類社會和宇宙一樣，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極權主義的社會哲學基礎從古至今爲什麼都是一元的，這是需要探討者們詳細思索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一元是以獨裁爲中心的，也是只承認一種「最基本動力的」，宇宙是否一種最基本動力來推動才有了發展，人類是否因一種最基本動力來推動才有了發展，他們自己的言論也是互相矛盾的，不要再相信他們，大家來開動腦筋，來探索一下吧！要省力氣，在現在的情況下看來是不大可能的，除非你願意受騙。受騙者的自願是一切奴役的根本支柱。

筆者：　金聲

轉載自北京《探索》創刊號

魏京生

再續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

序　言

現在的人們在普遍談論着人權。而歷代統治者，即使宣稱他的制度是「民主」的，也絕不承認他的制度是尊重人權的，至多也只是說他對人權有不同於一般人的理解。爲什麼在過去這個不大被人注意的問題上，會產生如此鮮明的區別呢？這是我長期以來想得很多的問題，也是我想和大家一起來探討的問題。

（一）人權與民主

人權，顧名思義就是人的權利。人有什麼權利呢？人有生活下去並且生活得更好的權利。人爲什麼要有這樣的權利？這是因爲人沒有了這個權利就不能爲他的生活而鬥爭，就不能通過這個權利確立他個人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人在現實生活中總是有一定地位的，如果他沒有一個靠自己的力量和固有權利建立起來的獨立自主的地位，他就必然有一個依靠別人的力量和權利建立起來的依附性的地位，這樣一種地位，我們管他叫被奴役的地位。因此看來，喪失人權就是喪失了做人的權利，只能處於依附性的被人奴役的地位。換一個眼光來看，這個問題就成了要使別人依附於自己，要奴役別人、首先要剝奪他們的權利，這樣一種問題，是歷代壓迫者絞盡腦汁來完成的使命，也是歷代反抗者首先要爭取的權利。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這樣一個概念：民不聊生是造反的前提，也是政權不穩固的根本原因。如果把「民不聊生」僅僅解〔釋〕爲「沒飯吃」未免太狹隘了一些。水滸裏的好漢們並不是餓慌了才造反的！我相信太平天國起義之前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比大躍冶水時人民的生活總還是要高得多。爲什麼低水平的生活可以是政

治穩定的因素，而高水平的生活反而是政治不穩定的因素呢？爲什麼吃得飽、穿得暖的水滸英雄也要起來造反呢？關於這個問題，馬克思的「經濟決定一切」的理論似乎就不夠用了。現在很被人看不起的孔夫子的那句名言「苛政猛於虎」，似乎比現在還很時髦的「馬列主義」更容易叫人接受。

民不聊生和苛政指的是什麼呢？當然，沒飯吃，沒衣穿也是民不聊生和苛政很重要的一個結果，但却不是全部內容。民不聊生是指人們失去了生活下去的正常條件，苛政是指剝奪人們靠自己的能力獲得非依附性和不被奴役的地位的權利。細想起來，古代反對苛政的鬥爭和現代爭取人權的鬥爭在實質上是多麼的相似呀。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整個人類的歷史，不但包括人們向自然界爭取生活條件的鬥爭，也包括人們向他們的同類爭取生活條件的鬥爭。後一種鬥爭，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政治。

政治鬥爭的一種方式被人們所承認，獲得了固定存在的形勢，就是政治制度，人類的政治制度雖然是多種多樣的，但概括起來只有兩大類：(1)專制制度，如上一篇所說的奴役性的制度，它的基本特點是只承認少數人的特權，而不承認每一個人作爲人所應有的權利；(2)民主制度，是一種合作性的制度，它的基本特點是承認每一個人平等的作人的權利，在合作的基礎上解決社會問題。這兩種制度或說這兩種鬥爭構成了現代政治鬥爭的主流。這種鬥爭的一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直接圍繞人權問題展開的鬥爭。因爲隨着近代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類的生存條件已有了基本解決的可能，他們的生活條件問題——政治問題——就變得更明顯而且更尖銳了。水滸英雄式的鬥爭正是這種爭取作爲人的平等的權力的鬥爭。他們這種鬥爭，由於沒有認識到：人權是要不斷地爭取而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得到的，因而把目標集中在損害人權的人——貪官或皇帝身上，而沒有集中到鏟除損害人權的根源和條件——專制的社會制度上邊，所以中國的許多老百姓習慣於這樣一種觀念：政治鬥爭的結果只是統治者的換班。現在我們應該改變這種觀念。既然中國兩千年來的歷史告訴我們靠少數人的拯救是不能獲得個人幸福生活的；歐美許多國家的歷史也告訴我們：靠爭得民主的社會環境是爭取大多數人幸福的唯一可靠保障

，爲什麼我們還要把精力化費在少數人爭奪權利的鬥爭上呢？爲什麼我們還要把希望寄托在少數拯救者的身上呢？我們應當這樣認識問題：政治鬥爭的結果應當是擴大每一個人生活平等的權利。爲這一目的而鬥爭的政治派別我們就信任，因爲他們在爲我們而鬥爭；阻礙達到這一目的的派別或個人就是我們的敵人，因爲他們阻礙了我們獲得幸福生活的道路。

（二）平等與民主

正如馬克思指出過的：絕對的、完全的、最終的平等是不可能存在的。但結論却不應當是馬克思的結論：除了進入理想社會後使人們的每一種願望都得到滿足，爭取平等人權的鬥〔爭〕是沒有意義的。馬克思的這個結論下的太武斷而又巧妙，它使愛好思考的人瞠目結舌，又使陰險的野心家們有了欺騙落後國家人民的最便利條件。首先我們應當想一想，能滿足每一個人的每一種願望的時代是可能出現的嗎？是不可能的。因爲人的願望的增加總是會超過滿足他們願望的條件的增加。每當過去被認爲是想入非非的願望有了得到滿足的條件時，新的無法滿足的願望就會在這個基礎上產生，條件的增長永遠趕不上願望的增長。關於這一點，俄國詩人普希金在他的長詩《漁夫和金魚的故事》裏有過絕妙維肖的描述。既然靠神的力量，也就是靠想像的力量，條件的增長也趕不上願望的增長，那麼靠人的力量、靠現實的力量就能夠使條件的增長超過願望的增長嗎？我想這可以解答，用馬克思主義的通用語言來講，叫做「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

靠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的、最完整的、最全面的、最正確的……」的哲學所不能解決的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嗎？當然可以。平等權利的問題只能在現實鬥爭中得到解決，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不斷的得到解決，而不可能一下子得到一個最終的解決。幻想使一切問題一下子得到最終的解決，這正是德國哲學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習慣。

要解決它首先必須爭取不斷解決它的社會條件——民主。因爲民主以承認每一個人的生活權利爲基礎，所以它就給了每一個

人實現這些權利的平等機會。在民主的條件下，每一個人有了得到平等生活的可能性，如果他們得到的結果證明他們在實現平等權利的過程中既沒有被別人破壞，我們就認爲他〔們〕的平等權利從可能變爲了現實。這種結果按度量衡或類似的標準來衡量是不是相同，這與問題無關，實現了的是平等而不是平均。

可以設想沒有平等權利這一可能性就能得到現實的平等嗎？當然不可以。共產主義理想顯然是騙人的「畫餅」。可以設想在沒有平等權利的奴役性制度——專政的方式下能夠達到現實的平等嗎？更加不可以，這簡直是彌天大謊。在這種被欺騙被奴役的情況下，在不承認每一個人平等人權的專制政府的領導下，能夠實現人民生活的現代化嗎？當然不能。因此要人民生活的現代化就首先要社會制度的現代化——民主。有了民主，就有了實現平等人權的可能性和機會，就有了人民生活的活的現代化。正如蘇聯那樣發達的經濟首先成爲少數特權者侵害本國人民和外國人民幸福生活的有利工具，其次才把特權者們餘下的殘汁剩飯拿去養活給他們生產工具的人民，我們希望的現代化就是這樣可憐的被奴役的現代化嗎？不應該是。

（三）法治與民主

現在有人認爲：法治和專制是對立的，法治就是民主。其實不對，法是任何政治制度的固定部份。因爲這些部份被證明了是長期需要的，因此把它們明文寫出，作爲名義上不可更動的制度，依靠或完全依靠懲罰手段維持這些法律。作爲維持社會的主要手段的政治方法，叫做法治。民主政治可以運用這種方法，專制政治同樣可以運用這種方法。這要看法的內容是什麼，也就是說要看政治制度本身的性質是什麼。

法制古已有之，秦始皇運用它既沒有給人民帶來好處，也沒有實現民主政治，現代秦始皇運用它我看也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實際上歷史告訴我們：專制統治者加上法治就等於暴政。中國歷史再清楚不過的證明了這一點。你想要暴政的法治，也就是要「四人幫」式的法治重演嗎？我看肯定不要，因此孔夫子的「苛政猛於虎」和施仁政的教導幾千年來總是獲得人民的好評，秦始

皇式的暴政總是被人民所仇視。但孔子的「仁政」爲什麼總是沒有實現呢？這是因爲他和他的學生總幻想靠專制政治來實現人的平等權利。因此，他的學生不是口是心非地成爲暴君的幫兇，就是把反對暴政的鬥爭引到了歧途上，自己也成爲自己幻想的犧牲品。現在我們應當拋棄的孔教的糟粕，正是幻想專制暴君們可以拯救和關懷人民的施仁政的道路；他的人人生而具有平等權利的思想正是我們要吸收的精華。

「仁政」這一概念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正是作爲了「專政法治」的對立物而存在的。這一想法的錯誤在於把目的當做了手段。爭取人權應當作爲目的，這一目的現在證明是可以通過法治的手段來達到的，甚至可以說必須通過民主法〔治〕這一手段來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道路幾十年來已作了通過專制手段來達到人權平等的試驗，事實已不止一次的證明了這樣一個眞理：此路不通。而且事實證明了「大多數人的專政」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專政總是專政，各種權力的集中就決定它只能是少數人掌握的專政。保障每一個人平等權利的政治方式只能是民主的方式，民主制度作爲全體人民合作的權利方式，也只能依靠法治的手段來維持。現代民主的敵人要麼是用獨裁法西斯手段代替法治，要麼是用偷換法治內容的方法來取消民主。這兩種手法雖然不同，其本質都是取消了人民民主的權利。有時他們狡猾地用一種方法反對另一種已經臭不可聞的手段，例如「四人幫」就企圖用法治的手段來欺騙人民，好像他們要改變官僚專制的本質。其實他們的法治的本質也還是無法無天的獨裁專制。權力掌握在少數獨裁統治者手中只會用來治人民的，手中無權的人民怎麼能用獨裁統治者手中的權力治他們呢？

我們要法治。但我們要的是爲了實現平等人權的法治。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人民一定要擦亮眼睛、集中精力注意制定的是不是對我們有用的維持平等人權的民主法律。誰要想偷換內容誰就是我們的敵人。無論他過去有什麼功勞，只要他想利用這些功勞侵害人民的民主權利，他就是不可饒恕的騙子手。決不可以姑息他們，過去的姑息給人民帶來了慘痛教訓，是「人類歷史幾萬年，中國歷史幾千年才出現一次」的「前無古人」的教訓。當有

智慧的中華民族不應當再一次陷入這些無耻陰險的騙子手的手中，不應當再一次被奴役了。

金生

完稿 1979—1—17

轉載自北京《探索》第二期（一九七九年一月）

魏京生

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

中國社會制度的不民主，在過去三十年中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這已是當今人所共知的問題。面對這樣一個嚴重的事實，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是這樣兩種選擇：(1)如果要社會向前發展，如果要生活和生產都迅速地發達，就必須改革社會制度；(2)如果要延續毛澤東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民主可言，也實現不了人民生活和生產的現代化。現在的中國，正處在這樣一個沒有它選擇餘地的三叉路口。

中國向何處去？人民希望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環境中生活和生產？這從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的情緒上可以看得出來。人民的這種情緒□□，導致今天的民主運動的原因。這場民主運動的目的就是在否定毛澤東式獨裁專政的前提下，進行一場社會制度的改革，使中國能在民主的社會環境中走向生活和生產的發達。這個目的不是某些個人的目的，而是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誰看到這個趨勢，誰就站在了歷史潮流的前面；誰反對並阻礙達到這些目的，或用欺騙等方法把這場運動引入歧途，誰就是歷史的罪人；誰鎮壓這場眞正的人民運動，誰就是名符其實的劊子手。用不着待歷史的裁決，人民心中的法庭馬上就將判定他的罪行。這種判決是最嚴厲的、不可更改的判決。這個法庭的力量可能因爲暫時力量對比的懸殊，而不能馬上顯示出來，但歷史將證明它的力量是無敵的。不相信的人可以回憶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時的情形，看看當時被人民心中的法庭作出判決的人，即使是最有權力的，是否逃脫了制裁。

但是有沒有不怕這種制裁的人呢？當然有，而且還不少。許多當權者爲個人手中握有的權力所陶醉，常常會忘記這一點，還

有那些搞個人獨裁的野心家出於他們卑鄙的目的，也會利用人民的輕信而無視這一點。例如鄧小平副主席在三月十六日對中央各部委領導幹部的講話中，就企圖利用過去人民對他的信任來反對民主運動。他把各種罪名加給民主運動，企圖把華、鄧政治體系無力挽救中國經濟和生產的責任强加給民主運動，再一次拿人民作他們政策失敗的替罪羊。

鄧小平值不值得人民信任呢？我們認爲：任何政治領導人作爲個人都不應獲得人民的無條件信任。假如他實行的是對人民有利的政策，他領導人民走的是通向和平和繁榮的道路，我們就應當信任他。我們信任的是他的政策和他要走的道路。假如他實行的是損害人民利益的政策、他要走的是獨裁和反人民的道路，人民就應當反對他。同樣，人民反對的是他損害人民利益和侵害人民正當權利的政策和反人民的道路。按照民主的原則，任何權威也必須在人民的反對面前低頭。

但是鄧小平不低頭。在人民普遍要求追究過去三十年中國落後的原因，並追究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的形勢下，他先是跳出來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繼而在三月十六日的講話中，不但頑固地堅持這句話，還公然把毛澤東捧爲中華民族的旗幟，說毛澤東的缺點錯誤是微不足道的。

他是怕追究毛澤東的錯誤，追究到他這個過去的同伙身上呢，還是準備繼續毛澤東式的獨裁社會主義政治呢？如果是前一個問題，其實他完全不必怕，人民的寬容足夠原諒他過去的錯誤，只要他今後能領導國家走向民主與繁榮。如果是後一個問題，那麼我們決不應該原諒他，無論他過去表現出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人，只要他的目的是繼續毛澤東式的獨裁，結果他也只能走上破壞國民經濟、侵害人民利益的道路上去。任何人如果原諒這樣的罪人就等於間接對人民犯罪。

鄧小平要民主嗎？不要。他不願去了解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他不願讓人民收回被野心家集團篡奪的權力。對於人民自發展開的爭奪民主權利的運動，他都說有人借此鬧事，是破壞了正常秩序，要採取鎮壓。對於批評錯誤政策的人，對於要求社會向前發展的人採取這種手段，說明他們對人民運動十分害怕。

我們不禁要問：你所理解的民主是什麼內容？如果人民連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言論自由都沒有，哪裏還談得上什麼民主？如果你所說的民主是允許別人批評當政者的民主，那麼這種民主和毛澤東用作獨裁政治遮羞布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到底還有什麼區別？

人民因爲要申冤、要訴苦、要民主而集會，人民因爲反飢餓、反獨裁而遊行。這正說明他們沒有民主，生活得不到保障。難道人民處於無權的地位任人擺佈，生活得不到最起碼的保障，這能叫做「正常的秩序」嗎？如果這種「正常的秩序」就是保障獨裁野心家的隨意侵害人民利益的秩序，那麼保障這種秩序對野心家有好處還是對人民有好處？這不是十分明顯的嗎？我們認爲，正常的秩序並不等於整齊劃一，尤其在政治上，有各種各樣意見的存在才成其爲正常現象；沒有不同意見、沒有多種樣的言論、沒有代表各種不同的人的意見的各種刊物的存在，正說明了政治上獨裁的存在。因此正是這整齊劃一，才應該被叫做「不正常秩序」。用一些社會現象——如有少數刑事犯罪分子借機搗亂——做爲消除人民發表意見權利的借（藉）口，正是新老獨裁法西斯主義者所慣用的手法：大家可以回憶一下天安門廣場事件時，四人幫不正是借（藉）口有人燒汽車，而放肆地鎮壓人民的革命運動嗎？鄧小平今天也找出了類似的借（藉）口，他是不是要用更狡猾的手法來進行同性質的鎮壓呢？人民千萬要提高警剔，不要再輕信任何不受人民監督與約束的統治者。

人民必須警剔鄧小平蛻化爲獨裁者。鄧小平在七五年復職後似乎表現出不遵循毛澤東的獨裁專制，要以人民利益爲重，所以人民羣衆便熱烈地期望着他能把這種政策實行下去，並且願以鮮血來支持他（如天安門廣場事件）。人民支持的是他本人嗎？並不是。如果除去他願爲人民爭取利益這一點，他本人沒有任何值得人民擁護的地方。如今他要放棄維護民主的面具，對人民民主運動採取鎮壓，準備徹底地站在民主的反面，堅決維護獨裁政治，他也就不再值得人民信任與擁護。因爲他的行爲已表明他要搞的不是民主，他所擁護的也不再是人民的利益，他正在走的是一條騙取人民信任後實行獨裁的道路。

中國的歷史無數次地說明這樣一個道理，搞獨裁的人只有在騙取了人民的信任後，才能爲所欲爲。如古語所講：得人心者得天下。又由於他們的利益必與人民衝突，所以他們也就必然將鎮壓的矛頭指向那些爲人民自己的利益而鬥爭的人。所以，關鍵不在於誰得了天下，而在於人民不應該讓誰從他們手中奪得天下。人民應當把這個天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就是民主。受他們委托來管理政府的人，受他們委托來行使權力的人，必須是受他們約束，並向他們負責的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只有人民選舉出來，受政府選舉委托和約束，並受人民監督、向人民負責的這些機構和個人，才有使用行政權的合法性。

我們想請問煽動抓人的政府大員們：你們使用手中的權力是否合法？我們也想請問華主席和鄧副主席：你們佔據總理的職位是否合法？我們更想了解一下：以副總理和副主席身份，而不是以法院和人民代議機構的名義宣佈抓人，這種行爲是否合法？我們進一步要問：按照中國的那條法律，「壞人」這個名詞就構成犯罪？到底什麼標準算是壞人？要以誰的看法爲標準？這幾個最簡單的問題不明確，在中國就沒有法治可言。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對任何人的信任都必須有一個限度。任何想換取人民無限信任的個人，無一例外地都是野心家。重要的問題在於選擇什麼樣的人寄予信任，更重要的在於如何監督這些人執行多數人的意願。我們不能輕信任何人會自願地爲他人利益服務，我們更不能輕信任何人會爲他人利益而損害自己的利益。我們只能相信那些在我們監督下向我們負責的代理人。而且這些代理人必須是受我們委托而不是强加給我們的。他們是否有權使用政府權力，首先應當以他們是否侵害了或準備侵害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爲轉移。任何不願受民選機構監督的人，任何準備侵犯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的人，無一例外都只是人民的敵人。我們認爲這樣的人，才是符合人民心目中標準的壞人。

人民想要把政府及其領導人改造成爲人民的僕人，首先應當牢牢掌握住委托和監督的權力，選舉和罷免的權利和程序必須得到保障。只有在不摻假的人民普選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產生爲選民利益服務的政府和領導人。如果政府和領導人是眞正受人民委

托並受人民監督的，那麼這種環境也可以改造領導人的野心病和自大狂。不要責怪領導人容易頭腦發熱，不眞心實意爲百姓謀福利，也不要責怪人民愚昧，不敢爲自己的利益而反抗。這一切都是因爲沒有一個使聰明的人民監督相對賢明的官員的社會制度。因此我們認爲：進行社會制度的改革，使中國的政治走向民主，是解決當前中國各種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的前提。領導只有在受被領導人委托時，才能獲得被領導者自願的合作，才能發揮被領導者的積極性；被領導者只有在能夠充分發表他們的意見時，才能幫助領導者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發揮大家的智慧。只有在合作和羣策羣力的前提下，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最優工作效率，達到最理想的效果。這是中國目前可以走得通的唯一一條道路。雖然在目前中國的條件下，是一條困難最大的道路。

北京《探索》號外(一九七九年)

魏京生

二十世紀的巴斯底獄

——秦城一號監獄（附：功德林的功德）

秦城一號監獄

如果你乘車在北京郊區昌平縣的公路上行駛，你很快便會發現一處風景如畫的療養區。這就是有名的溫泉——小湯山療養院。傳說慈禧太后當年常到這兒來沐浴。

假如你再繼續驅車向北，幾分鐘後，便會看見路旁有一塊如桌面大的木牌。木牌上面用各種文字寫着：「外國人禁止通行」。不明白內情的人，會以爲這兒是「軍事禁區」，不以爲然地撇撇嘴走開了。可是，熟知內情的人，一到這兒，馬上就會產生陰森恐怖的感覺。因爲再往前走一段路程，就是中共著名的高級政治監獄——秦城一號了。

可是，你如果向附近的農民打聽，或者是到地圖上去查找，在這個地理位置上，並沒有「秦城」這個地名。這個地圖上沒有的名字，原來是見不得陽光的中共高級政治監獄的代號。對於這座嚴密看守着的龐大的建築羣，附近的農民幾乎是一無所知。在這一帶，只流傳着一個模模糊糊的傳說：從前，日本人曾經在這裏修建過一個監獄。

在昌平北邊，有一條僻靜但質量很好的瀝青公路，一直通到秦城監獄的大門口。大門和傳達室表面上看去都很普通，與一般的機關沒有甚麼兩樣。一個陌生人來到這兒，決不會產生任何恐怖或奇怪的聯想。大門打開後，你就可以看到一堵隱壁。這堵隱壁與普通隱壁不同之處，就在於它大到任何人從門外都無法偶然地看到它背後的「風景」。正對着大門，隱壁上刻有一段「毛澤東論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

繞過隱壁，是一座樓房，樓房的後面才是秦城監獄的核心部

分。三米高的圍牆上安裝着蜘蛛網般的鐵蒺藜和電網，大鐵門鐵銹斑斑，陰森恐怖。三十年來，有多少個反對毛澤東獨裁政策的人，自進了這座鐵門以後，就沒有再出來。有些僥倖獲釋的人，他們才走出這扇鐵門，可是，由於經受不了外界的突然刺激，反而因此而喪命了。所以，一九七五年釋放政治犯時，改用了先住一段時間醫院的辦法，借以緩衝一下過於强烈的刺激。因此，有人戲稱這扇鐵門是「無神論者進的地獄之門」。

鐵門外有兩道崗，東西兩邊都有值班室。假如你獲准到這座地獄裏來參觀，那麼你走的地獄之路，便是一條丁字形的瀝青路。路的北頭比南頭高，但坡度不大。路的東西兩面，都是規格、顏色相同的許多院子。西半邊的院子裏多栽有果樹，東半邊的院子是一排新蓋的樓房。這些樓房是因文革後高級政治犯的急劇增加而新添的「現代化」設備之一。

秦城監獄嚴格地與外界隔絕。除了專門的看守人員外，對普通警察也是保密的。看守監獄的士兵經過嚴格的挑選與訓練，並且受到年齡的限制。囚徒們反映說，在秦城監獄幾乎看不見超過二十歲的士兵，而且一批一批很頻繁地換人。犯人的伙食分爲四等，名義上是一月四十元、二十五元、十五元、八元（均爲人民幣）。劉少奇的老婆王光美，吃的就是頭等伙食。可是，實際上由於普遍存在着貪污和尅扣，無論那一等級的犯人都吃不到規定數量的伙食費。而且，秦城監獄還經常以餓肚子來懲罰犯人。讓犯人餓幾頓肚子之後，再給他一碗漂滿油花的凉麵條，算是對幾頓沒吃飯的「補償」。但犯人吃下這碗麵條之後，十個有九個會腹瀉和噁心嘔吐，於是又會幾頓吃不下飯。像這樣的折磨，在秦城監獄算是最輕最人道的懲罰。

囚禁一律是單身的。長三米寬一米多一點的囚室內，有一張破木板床和一套單薄的被褥，一個馬桶和水盆。一年只有一身黑色的冬裝和夏裝。因爲發冬裝後立即將夏裝收回，加上發服裝的部門工作拖拉，致使許多囚犯到炎熱的五月份仍然穿着棉衣。每個囚室的門上有一個裝有玻璃門的小窗洞，門由外面開，作爲監視犯人及送飯的通道。普通的犯人在獄方認爲「態度老實」的情況下，可以從事一些無償的勞動，如編織草繩、草帽等，藉以活

動一下身體，免得四肢僵化。給獄方留下不好印象的犯人，就施以各種懲罰，包括停止一切活動，如放風、室內走動等。有時長達半年不放風。例如前「中國人民志願軍副總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解方，在關了半年以後給他放風時，已經不能再站起來走路了。

放風地區也是隔離的。每一個放風區約一百平方米左右，像南方的水田一樣排列着。犯人們長年在這一小塊地方繞圈走或跑，把草坪都踏出了一圈深深的印痕。兩排放風區之間有一道高牆，持槍的士兵踱步監視着每一個放風區。

在秦城監獄，犯人睡覺也有規定的姿勢。監獄管理人員規定犯人睡覺臉必須朝着門。如果犯人睡着時偶爾翻了身，衞兵馬上就來叫醒你，直到你恢復了臉朝門的姿勢爲止。有一個西藏人被關了十多年，由於長期按這規定的姿勢睡，結果一邊的耳朵被壓得紅腫、麻木、潰爛。犯人的衞生條件極差。從來不發肥皂。獄方規定犯人可以洗澡，但無論冬夏，每人每月只能洗一次。半年一次的體格檢查，也只有少數人能享受到。

單從生活折磨看，秦城監獄就足夠扼殺一個人的意志了。可是，這裏面還有許多慘無人道的刑罰，在等着他們呢。譬如在審訊時，用科學儀器刺激犯人的頭部，使犯人頭痛難忍。當你渾身是汗、滿地打滾時，才停下來讓你休息一會兒再繼續，如是反覆，直到你承認罪名爲止。另一種刑罰，是用强光不分晝夜地照射，光線强到使人發瘋。王光美在秦城監獄吃窩窩頭喝菜湯的時候，也被長期這種方法折磨到精神失常的地步。除了這些，最普通的折磨方法，便是拳打脚踢。一般是把囚犯叫出來，一羣人圍着犯人打，打得他頭破血流，喘不過氣來爲止。更毒辣的手段是，給犯人服用大量的，足以使人喪失意志、失去控制的藥物。這些藥物，有時是以犯人精神失常爲藉口强制服用的。有時則把犯人送到醫院去「治療」。犯人接受這種「治療」之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會產生禁不住的自言自語，甚至在吃飯時也不能停止。當然，這些話是會被全部錄音的，以便做下一次審訊的材料。像這樣的「治療區」，在「復興醫院」、「三〇一醫院」。「安定醫院」都有，正式的名稱叫「高幹病區」。德勝門外安定醫

院的特殊病區叫做「五區」。有人在探望親屬時，曾看到一個矮個子的中年人，臉上一副傻呆的表情，垂着長滿傷疤的頭，一直向前走着。如果衞兵不拉他一下，他會一直撞到牆上去也不知道拐彎。

這些慘無人道的殘酷刑罰，當然也會遭到犯人的反抗。有些犯人因不堪忍受而千方百計自殺，有些犯人就以絕食來表示抗議。例如前西藏的頭頭班禪喇嘛囚禁於此時，就曾絕食，並聲言不想活了，向獄卒大叫大喊：「抬着我的屍體去見中央吧！」對待反抗的囚犯，看守們是絕對不會退讓的。一般是等犯人絕食數天後，就拉他出來拳打脚踢一頓，或者是給犯人穿「和平衣」。「和平衣」是一種充氣的橡皮緊身衣，肩特窄，胸特緊，袖子聯成一條，褲腿併在一起。穿上它，一打足氣人就逼得喘不過氣來了。自殺也好，絕食反抗也好，便不得不停止，所以叫做「和平衣」。對付絕食的囚犯，還用撬撬壞牙齒來灌麵湯。如果仍然無效，才叫醫生來打葡萄糖和輸液。

凡是投入秦城監獄的人，從不向外面公佈。無論家屬還是親友，都無法知道其生死。犯人被關進去後只稱代號，連看守人員都不知其姓名和原來的身份。在獄中，犯人不許與任何人交談。只有在審訊時，才有說話的機會，有一個幹部被關十年後，當審訊時見有人叫他的名字，他竟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了。許多長期囚禁的犯人，在釋放後的一兩年內，仍不能很熟練地說話。囚犯在囚禁中，總是要思念自己的家人和親友的。於是，獄方爲了套取口供，除了用酷刑，還來軟的一手。編造一些假消息，來引誘犯人上當。如「你的妻子已經改嫁了」，「你兒子雖然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但政府並沒有把他判罪，只是送到農場去勞動」，「你女兒長得很漂亮，聽說許多年輕人都到你家去」，「你的孩子得了急病，國家正在給他治療」……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據說，更有甚者，對有些特別重要的犯人，還特地選擇與其妻子長得很相像的女人來引誘他，套取口供。秦城監獄就是這樣，用盡了各種卑鄙的伎倆，來榨取這些已無生還希望的囚犯的最後一點剩餘價值。

秦城監獄這個地方過去之所以不爲人所知，是因爲七十年代

以前，幾乎沒有人從這兒活着放出來過。直到文革期間，關到這裏面來的高幹多了，一九七五年「右傾翻案風」，一些老幹部從這裏被放出來，才漸漸洩漏了消息。彭眞、薄一波等許多人，就是從這裏面出來的。李立三的蘇聯妻子李莎，文革時期以「蘇聯特務」的罪名囚入秦城監獄，關了八年後才「釋放」，被公安部押送到山西運城去勞動改造，由公社派兩名女知青監視她。李莎年紀已大，連生活都要靠別人照顧了。她再三要求回北京與女兒同住，一直不獲批准。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才獲准來京與其女兒團聚。又如西藏最早的共產主義組織——「東藏民主青年同盟」——的組織者，因其四十年代曾與蘇共、印共有過聯繫，就被以「裏通外國」的莫須有罪名，在秦城關押了十八年後，才於一九七八年初「獲釋」，送到四川一個小縣城去管制，連出門看病，也要統戰部派人「照顧」。

秦城一號就是這樣一座黑暗的人間地獄！然而，這是一座共產黨人自己建造起來，又用來囚禁和折磨自己的「同志」和「戰友」的監獄，這眞是對共產黨一個絕妙的自我暴露和諷刺！

筆者：金生

功德林的「功德」

提起功德林，熟悉北京的人都會知道這所座落於德勝門外的古老監獄。功德林是一座設計奇巧、建築美觀的古代建築。據傳功德林是清朝的一個工匠，按照八卦圖形而設計建造的。這位建築大師爲清廷建成了這座囚禁人民的牢獄之後，便立刻在這裏葬送了他自己的生命。他成了第一個享受他自己設計建造的功德林的「功德」的人。

功德林在文革前原名爲北京市第二監獄，現在叫功德林一號。功德林中的一部分，現在已經成爲北京市收容站。在這個美其名目的收容站內，分爲一所、二所和三所。一所爲公安局拘留所，並承擔着拘留和遣送的任務。囚在一所中的犯人，一律過着完全監獄化的生活。犯人絕大部分是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找黨中央申冤的上訪人員。二所和三所是收容流落街頭的災民和難民性質的人的，他們較一所的人好一些，有着行動的自由。

在這個收容站裏，男女老幼都有。有年過花甲的老人，也有

隨着父母吃奶的嬰兒。因爲這些人分別住在不同的通道裏，所以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至於一所的犯人和被判刑的犯人的情形，外人更是難以知道的了。

一位曾經在一所被監禁，後來又被遣送的人告訴我們，這個名爲收容站的監獄，關押着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上訪者。他們都是因爲在地方上受到各種冤枉，專程到北京來向黨中央申冤告狀的。有的是因爲衣食無着，活不下去，特地到北京來上訪的。但是，他們沒有得到應有的解決，反而被抓起來了。他們被關押，被遣送，受盡了凌辱和折磨。

一被抓進這個收容站，首先是要被搜身，脫光了衣服逐件檢查。如果稍有不服，輕則挨罵，重則挨打。十幾個人住一間拘留室，每間拘留室才八平方米左右。低矮、寒冷、潮濕、腥臭的小房間裏，吃、喝、拉屎、睡都在裏面。所以，一踏進這屋子，如同進了永久無人打掃的茅房。白天，犯人輪流打飯。每人一天可以分得兩個或熟或生或變質的玉米窩窩頭，及一碗不乾不淨的菜湯。晚上，兩人合蓋一條非常髒、幾乎是長年不洗又長滿虱子的破棉被，睡在光光的、高低不平地板上。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生病死人是常有的事。一九七八年初，三所的一個孩子因病無人照料，死在自己的舖位上。等到醫生前來「搶救」時，發現這個孩子的鼻孔裏都叮滿了又肥又大的虱子。

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剛從功德林被釋放出來的上訪者、蘭州鐵路局的工人袁國如，給我們談了他近期在功德林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過去，袁國如因爲揭發他們單位的領導幹部的錯誤，被領導懷恨而受陷害。結果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而被判處監禁二年。後來才宣佈無罪釋放。由於他被害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而在釋放出獄後，領導上又不向他賠禮道歉和徹底平反，因此他才上訪「中央」。「鐵道部」信訪部門不但不給予解決，反而還把他多次送進收容站關押和遣送。袁國如說：「鐵道部信訪處長關少良勾結蘭州鐵路局的陳守義，先後把我收進功德林五十六次，蘭州市收容站六十四次。他們每收容我一次，都要給我安上許多捏造出來的罪名。如：闖中南海、闖人民大會堂、無理取鬧、攔截外國人的汽車、向外國人要錢、闖外國大使館等等

。似乎我眞的犯下了彌天大罪似的。在被關押期間，我受盡了慘無人道的刑罰。他們曾用火棍燙我，電刑吊打我五個小時之久，把我打昏死過去多次。但是，我從不屈服，我曾砸壞手銬三副。正如他們所說的：想不到袁國如的頭這樣難剃。」

袁國如此次被收容，與傅月華（在北京參與農民反饑餓、反迫害的示威而被拘留）、夏玉英等一同關在二所。他們都是沒有定罪和判決的公民，可是，在待遇上，他們還不如已經判了刑的犯人。因爲他們一沒有確切的出獄日期，二沒有人身自由，三沒有家屬探監，四沒有通訊的自由。袁國如告訴我們說，這所監獄還不如豬圈，如庫房大的小房子，吃住全在裏面。在洋灰地上睡覺，冰得徹骨。他說有一個北京大學的教員，已經在裏面拘留了十年，尚未判罪。呂光輝也被關了五年。在拘留所裏，一件衣服只能換一個窩窩頭或一包香煙。被關押者如果稍有不滿，就被毒打。甚至，有的人只因說了一句窩窩頭不熟，就要被毒打一頓。被打傷了的人，還不給予治療。有一個討飯的小孩，因多領了一個窩窩頭，就被監管人員從三號房間一直打到十七號房間的門口，直到那孩子被打得昏死在地，他們方才罷休。還有一位從外地來北京的上訪婦女，因向獄警索要一條頭巾，獄警不肯給還，她在氣憤之下罵了一句「土匪」，就被民警毒打至昏迷。一位從內蒙來的上訪者，他寫的上訪材料（申訴書）被民警沒收了。他去索回，民警不肯發還給他。他又氣又急，把玻璃打破了一塊，當即被吊打了三個多小時。被無罪收容的夏玉英，在被關押的十五天裏，有一次也被綑打了三個小時。大家都知道的傅月華，被關押後，他們軟硬兼施、逼供，但始終沒有達到目的。因此每次傅月華都被打得遍體鱗傷，抬回拘留室來。面對這種法西斯暴行，傅月華以絕食進行抗議。可是，警察們却用爐棍撬開傅月華的嘴，往裏灌飯。後來，在灌飯也無濟於事的情況下，他們才給傅月華打葡萄糖。以上這一些事實，都是在打倒四人幫以後的今天發生的。公安部門的這一系列暴行，和四人幫時期又有甚麼區別？北京公安十三處七科張科長，在全體被收容的人面前還公開說：「因爲你們鬧事，所以才來鎭壓一下。你們都是各單位報告我們，才被捉進來的。抓錯了由各單位負責，我們不負責任。」

張科長甚至還威脅說：「我們有五個中隊一千個民警，是靠抓人吃飯的。我們聽上頭的命令，完不成任務不行。報紙上說要民主，他們是靠宣傳吃飯的。我們與他們是兩股道上跑的火車。」那位姓常的隊長也說：「不怕你們不服氣，你們不服氣，我就拘留你們，鎮壓你們，牛頭不爛加把柴嘛，沒有甚麼了不起！」

許多被拘留者尚未被捕時，公安人員（便衣警察）往往都是以欺騙的辦法，把來京上訪的人騙進了收容站。他們用「請你來談談，以便中央好解決你的問題」，或者是「在外面鬧給外國人看見影響不好，有問題可以直接向我們反映」等等藉口，把上訪人員騙進了牢獄，然後再來慢慢地炮製你，折磨你。

諸如此類慘無人道的黑幕，不勝枚舉。公民到北京來上訪有甚麼罪？犯了甚麼法？打倒了四人幫，制訂了許多新的政策，規定了許多條例，並宣傳說保證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辦」。可是，在功德林裏，不要說法律，就是連最起碼的人道主義也沒有！功德林的監獄和收容站，不知道屈死了多少無辜的人。功德林的「功德」，完全是建立在白骨堆上面的罪惡。那些禍國殃民的眞正罪人，甚麼時候才會受到懲罰？功德林啊功德林，你甚麼時候才能眞正爲人民立下功德？

筆者：良藥（據聞即路林採訪，姚××整理）

轉載自北京《探索》第三期(一九七九年)

魏京生

在法庭上的辯護詞

北京市檢察院分院起訴書所提到的罪狀，我認爲是不能成立的。我編印刊物和寫大字報是根據憲法第四十五條：公民有言論、通信、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我們編印刊物的目的是爲了探索中國，使中國走向繁榮富强的道路。我們認爲只有自由的、無約束的實事求是的探討，才有可能達到這一目的。公安局和檢察院把我們基於上述原則而進行的活動說成是反革命活動，這是我們所不能夠接受的。下面是我對起訴書所羅列的罪狀的具體意見。

第一，起訴書上說向外國人送給我國軍事情報犯反革命罪。按我的記憶，就刑法和舊的懲治反革命條例（法官：魏京生稍微慢些）都是這樣講的：向敵人提供情報算作叛國罪。檢察員認爲我與英法等國記者談話中有叛國行爲，是否把英法兩國記者當作了敵人呢？我想提醒檢察員，在華國鋒接見西歐四國記者時，曾經明確地把各國記者叫做朋友們。憲法規定公民有保守國家機密的義務，起訴書却把這一明確的概念變成了軍事情報模糊的概念。如衆所周知，現在各國情報大部分都是從公開的渠道，例如報紙、電台消息等，經過分析得到的。檢察員是否也認爲報紙電台也犯了罪？可見，軍事情況是一個過於廣泛的概念。公民有保守機密的義務，它的前提是公民必須要知道需要他保守的是什麼機密，也就是說，這種機密必須事先就向他明確標明了是國家機密或軍事機密，他才負有保守它的義務。這才是法律意義上的機密或軍事機密。我從未被告知或需要我保守的機密；在中越戰鬥爆

發後，也未接觸過任何標明爲機密的東西。所以根本談不上向誰供給了法律意義上的機密。我與友好國家記者和外交官談話，不可能不談到國內各方面的情況（審判長：慢些），我認爲這是通過記者和外交官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和相互了解，是增進各國勞動人民相互支援的基礎。在中越戰爭爆發後，這場戰爭就成爲國內外人民共同關心的一件大事，所以在這期間，我與外國記者和外交官談話，也就不可能不談到這一方面的情況。

（法官：魏京生，慢些。）

我談到的消息是否是政府不願意透露出去的消息，我是無法知道的。作爲一個普通百姓，我的消息來源是小道消息，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文件。我的消息是否與標明爲機密的文件有巧合的地方，我也無法知道，因爲我沒有看到過政府的機密文件，但我談到的消息是不會給前綫局勢帶來有害影响。這是我事先就估計到的。例如我談到前綫總指揮的姓名，誰聽說過有不公佈指揮員的姓名而打了勝仗？誰又聽說過因爲對方知道了指揮員的姓名而打了敗仗了呢？都沒有。那麼談論前綫總指揮的姓名，怎麼會給前綫局勢帶來不利呢？自古至今也沒聽說過指揮員的姓名會成爲該爭勝負的一個因素。這個道理站不住脚。當然檢察員可以說，按我國的習慣，這算軍事機密，但是在四人幫時代，有閉關鎖國的習慣，隨便什麼事都算機密，隨便和外國人談幾句話都會被認爲裏通外國的。檢察員是打算讓公民遵守四人幫時代的習慣呢還是遵守法律？公安局曾經說過，說我應該遵守保守機密守則，我不知道這個守則是什麼，我只知道它本身也是保密的，因此它不是公開頒佈出來要求公民遵守的法律。它只能作爲內部規定。公民有遵守憲法和法律的義務，沒有遵守他所不知道的內部規定的義務。綜上所述，第一、我沒有抱背叛祖國的目的；第二、我也沒向敵人提供什麼；第三、我提供給朋友的，也絕不是國家機密或軍事機密。所以檢察員控告的叛國罪是不能成立的。如果檢察員認爲我與外國人談話的內容是政府不希望我談出的東西，因而屬於一種錯誤，這我完全可以接受，並且在今後按照政府的合理要求，來保守政府認爲需要保守的機密，因爲這是每個公民的義務。但是我也希望政府能夠更明確地規定公民應該保守機密的範圍

，不要使公民無所適從，因爲四人幫時代的習慣肯定是無效的，如果仍沿用四人幫時代的標準以及習慣，就會使公民無所措手足，直接妨碍了中國人民與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並且爲司法工作帶來混亂，這對於國家對於人民來說都沒有好處。

第二，起訴書說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並把我的文章《第五個代化——民主及其它》等叫做反動文章，將我們的刊物《探索》叫做反動刊物，既然如此，我們首先就應該弄清楚什麼叫革命，什麼叫反革命？由於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義和愚民政策的多年影響，現在有人是這樣看的：按現在當權的領導的意志辦就是革命，反對現在當權者意志的就是反革命。這種對革命概念的庸俗化，我是不能同意的。革命是指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並站在歷史潮流的前面，對一切舊的、保守的、阻碍歷史發展的事物進行鬥爭這樣一種行爲。革命是新事物與舊事物的鬥爭。把當權者的意志掛上永久革命的標簽，消滅一切不同的思想和理論，「有權就是眞理」，這種對革命概念的庸俗化，正是過去二十多年四人幫鎭壓革命者和人民的最有效工具之一。

下面我談第二個問題，是「反革命」一詞的適當應用範圍。嚴格來講，反革命一詞，是從歷史角度出發觀察問題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在政治領域裏沒有一成不變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於革命的潮流不同，各有差異，反革命這一概念的對象就有所不同。如果以某一時期的某一概念爲準則，結果只能是張冠李戴，即使在革命時期，由於人民認識水平的限制，對反革命這一概念的理解也會很不相同。用這種不斷變化的政治概念做爲定罪標準，就如同使用隨風飄揚的柳絮做測量高度標準一樣，是不可能達到準確的目的。這是我們過去三十年來寃、假、錯案之大量發生的原因，也是四人幫在違背民意的情況下上台的原因之一。把流行的政治概念做爲法律的標準，它的必然結果就是反革命觀點，是要受騙的。

第三，一個需要弄清楚的問題是當前革命的潮流和我的文章的關係。當前的歷史潮流是民主的潮流，是反對封建法西斯獨裁專制的潮流，因爲中國的社會發展到今天，它對中國人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不進行社會制度的改革，不鏟除獨裁法西斯專制的

社會根源，不徹底實行民主，不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中國的社會就不能前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也不可能在我國實現。因此民主的潮流是當代革命的潮流，反對民主的人和事，站在民主潮流對立面的專制主義保守派，就是現在的反革命。我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它》等文章的中心議題，就是沒有民主就沒有四個現代化，沒有第五個現代化——民主，一切現代化都不過是一個新的謊言。這樣的中心議題，怎麼是反革命呢？反對它的人和事却恰恰應當被歸入反革命的範疇。當然文章中的論據和論點並不一定都是正確的，它們應當接受歷史實踐的考驗，也應當接受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只有這樣，才能更加正確。但論據和論點即使不完全正確，也不妨碍中心議題的革命性，這是十分簡單明白的道理。起訴書中說誹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比江湖騙子的膏藥更高級一些的膏藥，按我的理解，誹謗應該是指把不存在的罪名憑空加在別人頭上。「膏藥」根本不是罪名，檢察員用斷章取義的方法引用的這半句話，根本就構不成誹謗罪。我在文章中攻擊的馬克思主義，絕不是一百多年前的馬克思主義，而是林彪四人幫一類政治騙子的那種馬克思主義。我不認爲世界上有始終不變的事物，我也不認爲世界上有絕對正確的理論。任何思想理論都是相對的，它存在的環境，具有相對的眞理性和相對的荒謬性，即使在此時此地相對正確的理論，在他時他地就可能是相對荒謬的。任何理論本身都同時具有可能的眞理性和可能的荒謬性，荒謬的。任何理論本身都同時具有可能眞理性和可能的荒謬性，馬克思主義當然也不例外。馬克思主義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已先後改變爲許多不同的流派，如考茨基主義、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歐洲共產主義等。許多這些理論，都遵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或部分基本原理，對馬克思主義的體系進行某些部分的修改或修正。因此，它們都可以叫做馬克思主義，但都不是原來的馬克思主義體系。原始馬克思主義有相當數量的部分理論核心，是對完美社會的描寫，這種理想境界並非馬克思主義所獨有的。他是當時歐洲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對於自由、平等、財產公有、社會公正的一種普遍願望。馬克思主義主張普遍民主及與權力集中的專政相結合的方式來達到這一

理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最顯著的特點。經過一百多年實踐，我們看到，按權力集中專政的方式組成的政府，例如蘇聯、越南、粉碎四人幫以前的中國，無一例外都墮落成爲一種少數領導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實行專政的法西斯政府，而且在這些政府中掌權的那些法西斯獨裁者們早已不是把無產階級專政作爲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工具，恰恰相反，他們無一例外地把共產主義理想作爲加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替少數統治者專政的工具。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和歷史上的許多宗教一樣，在它的第二代第三代以後，它的革命實質便被抽去，它的學說的理想部分被統治者利用來做爲奴役人民的借口和蒙蔽勞動人民的工具。它的性質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正是以理想作爲奴役的借口和蒙蔽的工具的主義，我們把它叫作理想主義，也有人叫它作信仰主義，四人幫封建法西斯獨裁專政是它發展的頂峯，這種利用美好理想搞現代迷信的信仰方式，這種蒙蔽欺騙人民的法西斯主義，難道不是現代的騙術嗎？難道不是比江湖騙子的膏藥更高明一些的膏藥嗎？需要指出的是，我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過程做出的這些結論，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這可以通過進一步的理論探討來解決，我歡迎任何人對它提出批評，但無論結論正確與否，根據言論出版自由的原則進行理論探索和把思想結果與他人交流，這不構成犯罪。對任何歷史上存在過和現實中存在着的思想理論，我們都是應該批判地對待它，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治學態度。那麼爲什麼就不能夠批判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呢？那些不准批判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人，正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爲宗教來信仰的。任何人都有權信仰和遵循他認爲是正確的理論，但是他不應當將他所信仰的理論用具有法律效力的規定方式强加給別人，否則，他就干涉了別人的自由。

第四，起訴書說打着所謂言論自由、要民主要人權的旗號，煽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首先我要指出，言論自由絕不是什麼所謂的，而是憲法明白規定每一個公民都應該享有的權利。檢察員用這樣的口吻談論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不但說明檢察員在進行思考中抱有偏見，而且說明檢察員忘記了他的保護公民民主權利的責任。他把公民的民主權利當作嘲笑的，

對象。對檢察員用斷章取義的方法羅列的罪狀，我覺得沒有逐條反駁的必要，我只想指出檢察員的疏忽：有一條罪狀是這樣說的話：「披着社會主義外衣的封建君主制。」難道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不是披着社會主義的外衣的封建君主制嗎？還有這樣一句話：「不要做獨裁統治者擴張野心的現代化工具，」它的後半句我記得是：「我們要人民生活的現代化。」難道檢察員要做獨裁統治者擴張野心的現代化工具，而不願意要人民生活現代化嗎？我想檢察員不會是這樣的。我也不願意相信檢察員不准許我批評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主義。然而上面引證能說明什麼呢？我不願意妄加評論，我只知道它不能說明我推翻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也不能說明我破壞了人民民主事業。我們的刊物《探索》在編輯過程中從未參與任何陰謀組織或暴力組織的活動，《探索》雜誌是公開出售的理論探討性刊物，它從未把推翻政權作爲自己的目的，也不可能去從事推翻政權的活動。它自認爲是人民民主事業的一部份，也不可能去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當有人問到我們是否準備參加武裝鬥爭或者進行推翻政府的活動時，我曾經給予明確的回答，我認爲武裝鬥爭不是造就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方式，我認爲合法的宣傳和民主運動是造就民主政治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方式。推翻政權並不等於造就民主政治，民主的政治制度只有獲得多數人理解的情況下，通過對舊的政治制度的改革來逐漸地實現。這個觀點是我們刊物的根本宗旨之一，楊光、路林、趙南、劉青等人可以就這一點作證，他們曾經聽見過我說起過。檢察員控告我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更加與事實不符合的。檢察員自稱對我的文章進行了審查，那麼他應該看到，續《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它》一文中專門有一章「社會主義與民主」，談到我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我與檢察員多次的談話也談到了這個問題，檢察員不能說他不知道。當然檢察員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我認爲的社會主義制度可能有很大的區別。我認爲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多種多樣的，並非千篇一律。根據它們之間的明顯區別，我把社會主義制度分爲兩大類：第一類是蘇聯模式的專制社會主義，以權力集中在少數當權者手中爲特徵。第二類是民主的社會主義，以權力歸集於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的全體人民爲特徵。我

國絕大多數人民的願望都是要實行這種民主的社會主義。我們探索的目的，也是爲了尋求達到這樣社會制度的道路。我參加到民主運動中來，也正是爲了在我國實現這種民主的社會主義。我認爲不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不確立人民的民主權力，沒有民主的政治制度作保障，我國的經濟現代化是不可能達到的。民主的政治制度是我國全面現代化的先決條件，這就是我的文章《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它》的標題的來歷，也是文章闡述的中心思想。檢察員也許不同意這種理論，但是他們不同意的社會主義理論並不等於就是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第五，檢察員用斷章取義的方法羅列的罪狀，我看沒有逐條反駁的必要，我只想指出兩點：第一，憲法賦予公民批評領導人的權力，是因爲領導人是人不是神，他們只有在人民的批評監督下才可以少犯錯誤，才可以避免變爲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才可以眞正使人民放心。第二，要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改革，就必須依靠全國人民，用批評和討論的方法，找出現有制度的缺陷，否則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地進行。所以看到不合理的人和事物去進行批評，這是每一個公民固有的權利，也是他不可推卸的責任，是任何人任何機構也無權干涉的主權。批評不可能那樣美妙動聽，也不可能全都正確，如果强求批評的詞句，要求批評必須完全正確，否則就要治罪，就等於不准許批評，等於不准許改革，也就等於把領導者擺上神化的地位。難道我們還要重新走四人幫搞現代化迷信的老路嗎？當然批評必須是根據事實的，並且不允許進行人身攻擊和謾罵，這是我們刊物的根本原則之一，有《探索》雜誌的發刊聲明可以作證。如果檢察員認爲我在這方面做的不夠，我願意接受檢察員和任何人提出的批評，以上就是我的辯護。

北京《四五論壇》根據錄音整理

原載《四五論壇》增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路　林

信任危機的根源

最近，某些關心當今青年思想動態的人士向我們提出了這樣幾個問題：你們這些青年在想些甚麼？爲甚麼不信仰眞理？……。這個情況也正如今年九月廿日「工人日報」上邢賁思所說的：「現在，在一部分青年同志身上存在着所謂『信任危機』。甚麼叫『信任危機』呢？就是一部分青年同志看來、現在似乎沒有甚麼可以相信的東西。他們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共產主義的光輝前景都不信任。」

首先，我認爲這種提法就不科學。甚麼是眞理？馬克思主義是眞理嗎？馬克思主義也可能是眞理，但是，看一看在馬克思主義指揮下，中國社會的現實及給中國絕大部分青年所帶來的「幸福生活」，就應該明白爲甚麼會產生這種危機了。也許有人會說，「四人幫」垮台前搞的那些不是眞正的馬克思主義。那麼，「四人幫」垮台後搞的是馬克思主義吧？從官方的態度來看，是貨眞價實的馬克思主義。那麼請看：就憑毛澤東的一句話：「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就當了十億中國人民的領袖。我們……從實質上講，毛澤東這種作法本身，就把自己視爲開國元勳的皇帝，把×××打天下掙扎的財產××在晚年的時候，把這筆遺產賜給自己信得過的功臣。這種封建世襲式的馬克思主義合理嗎？當然，有人會說這是歷史的需要，是……等等。但是不管怎樣找借口，也不能說明這樣做就對、就合理。

我這樣講並不是說華國鋒不當主席了，中國的一切問題就解決了。我是想說明，這樣做不合理，不能取信於民，那麼人民自然就對你不感興趣，也無法叫中國的青年再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信仰。

其次，還比如說，「選舉法是最基本的先決的法律。對於人民共和國來說，沒有一個全民投票通過的選舉法，這個機構在法律上便不能代表人民。因爲人民並沒有委托和授權它制定法律。」「它制定的法律只是體現着本屆人大機構（或集團）的意志，或是體現着決定這個機構成員的領導者們的意志，而不是體現人民的意志。」比如說，人民羣衆對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產生出來的七個法律條文並不很感興趣。具體原因就是它說的和做的有天地之差，是一紙空文。例如，社會主義國家不應該有思想犯，憲法上明文規定公民有思想、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而事實是到處抓思想犯，至今還關押在北京第一監獄的魏京生、任畹町、傅月華、楊光、陳旅、張文合等，不都是很好的說明嗎？這種自食其言的做法叫中國的青年對你中國共產黨怎麼信任呢？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可以暢所欲言，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就要「以言治罪」，這又怎麼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

還有，青年們爲甚麼對共產主義的光輝前景不相信？其實，這是很好回答的。共產主義實際上是一種理想主義，也就是說它可以想像而又不能實現，說穿了它也是一種宗教，甚至比宗教還有過之而無不及（西方的宗教是建立在荒誕的念經磕頭之上的，而這種宗教是建立在所謂「科學理論」之上的。）宗教總是向人民宣傳，現在受點苦沒關係，等到共產主義時就「按需分配」了，就平等了，就幸福了。總之，對於窮人來說，都起到了一個「畫餅充飢」、「望梅止渴」的作用。對於宗教，我可以信，也可以不信；在中國，對於共產主義必須要信，不信就是大逆不道，就要被視爲異端。接踵而來的就是挨批、挨整、甚至被置於死地。直到今天，這種情況並沒有多大改變。

那麼是不是說，我們甚麼也不相信，世界上也沒有眞理了？不是的。當然，有許多青年對政治、信仰、主義不感興趣，官方對此非常着急。我認爲，這是好現象。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並沒有給他們帶來甚麼幸福，他們就不去信仰它，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們已經不再盲目地崇拜某個偶像，强迫他們崇拜某個偶像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那麼，甚麼是眞理呢？我們應

該相信哪些東西呢？依我看被實踐證明了的是正確的理論就是眞理。（當然，眞理還有它的時間和範圍的限制。）具體地說，不管你是哪一黨、哪一派，你能使本國人民過（以下大概有七八個字看不清楚——編者）擁護你、尊敬你也可以說信仰你。你今天這樣做了，我們今天就信仰你；但你明天不爲人民謀幸福了，或者反過來壓迫人民，我就不信仰你了，接着就反對你、打倒你，然後再尋找一條能使人民走向幸福的道路。

昨天說明不了今天，今天也代替不了明天。無論哪一黨哪一派，如果想××××××××，最好自己先要成爲一個「眞佛」，因老百姓是不見眞佛不燒香的。

最後談一個問題。邢賁思講：「現在，在一部分青年同志身上存在着所謂『信任危機』。」據我看，不只是一部分吧，如果只是一部分，怎麼稱得上是危機呢？最好還是暗訪一下，掌握確切的百分比，不要違心地講話。

一九七九年九月

原載北京《探索》第五期

路　林

發刊與停刊

七月十六日，北京市公安局七處二科劉××給我們「探索」下了結論：「你們進行的一系列活動，都是反革命的活動。」

這樣一來，攻擊謾罵我們的那些「專業」或「業餘」的奴才們便十分得意，似乎又取得了一次「偉大的勝利」，得意之餘，定我們反革命活動的罪狀，以便將來廣泛深入地開展其革命大批判。比如說：我們這些「反革命分子」是怎樣聚集在一起的；我們的目的、綱領是什麼；我們具體進行了那些反革命活動等等。另外，同情、支持我們的人們也一定急於想知道我們這些情況，他們替我們担憂，不知我們觸犯了哪些「王法」，遭這樣的罪受。還有要了解我們的廣大羣衆，也一定想知道一九八〇年以後的反革命分子都是一些什麼樣的人。

爲了能給上述第一種的「革命」提供方便，使第二種人免除某些担憂，同時也使第三種人開闊眼界，我現將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公佈於衆。

我們是怎樣組織起來的

七八年十一月份，西單民主牆「一一·二五民主討論會」開展起來後，發生了兩次從西單至英雄紀念碑的上萬人的遊行和數次幾千人的民主討論會。這是中國三十年來一次最深刻的羣衆自發的民主運動，而遊行和討論會又把這剛剛興起的運動推向了一個高峯。十一月底，鄧小平同志講了話，提出了毛澤東的問題留給後代人去評等等令人費解、難解，甚至引起人們反對的東西。當時我是持反對態度的，我對別人講：當代人能很清楚地了解我們現在的事情還不如後代人能很清楚地了解我們現在的事情嗎？

如果現代的事情總是挪到後代去解決，並且挪得越遠解決的越好，那麼我們現在應該解決的就是乾隆康熙年間或是秦始皇時代的問題了。

牢騷歸牢騷，現實歸現實，自鄧小平同志講話後，民主牆蕭條了，人們的思想情緒萎靡不振，大有「三而竭」沮喪景象。

然而，這種景象被結束了。十二月五日，民主牆西頭貼出了一篇題爲「第五個現代化」的文章，吸引了衆多的觀衆，招致了無數條批語。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鮮明响亮的口號：沒有民主化就沒有四個現代化，我讀後欣喜若狂，深深地爲他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和遠見卓識的洞察力吸引住了。在文章的末尾，作者還留下了聯繫地址，作爲聽取不同意見用。我和楊光等人，都是依據這個地址同作者取得了聯繫。這個作者就是我們「探索」的主編——魏京生。

我和楊光等人與魏京生見面後，大家各抒己見，對當前國內國際形勢和許多重大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除對「沒有民主化就沒有四個現代化」這個問題沒有疑義外，大家還提出了許多有疑義的問題。比如，我提出：中國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是假馬克思主義在作怪呢？還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靈了呢？魏京生認爲，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弊病。他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等方面列舉了大量的事實來說明他的觀點。例如，馬克思給資本主義所下的定義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到了這個階段就要走向崩潰，就要絕對貧困化；資本家給予工人的那些工資僅僅能夠維持生存（這個現象現在恰恰出現在中國），……。楊說：「我對馬克思主義沒有認眞研究過，所以我不能急於承認或崇拜某一種主義。我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弄懂了它，然後再來評論它的好壞。」儘管我們當時不能確定是哪一種原因使中國走到了這一步，但立志獻身改革中國這種貧窮落後面貌的決心是一致的。通過多次的討論，我看出，魏京生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哲學等等社會科學理論是有一定研究的。

最後，我們一致認爲，爲了追究出中國社會落後的眞正原因，我們只有一邊研究一邊討論，並把研究的結果拿給更多的人討

論，拿到社會中檢驗，才能得出正確的答案。

爲了達到解決這個問題的目的，又鑒於當時社會上已經出現了「四·五論壇」、「今天」、「沃土」等民辦刊物，我們決定自己也辦一份刊物。由於我們的目的是探討性質的，許多問題都有待在研究討論的實踐中解決，因此，由魏京生提議將刊物名稱取爲——「探索」。

我們辦刊是怎樣確定的

每一份報刊都有它的宗旨。我們這份簡單的刊物也不例外。

首先，我們確定了我們的目的：在最迅速地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使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使人民所處的社會環境在可能的階段內達到最合理。

然後，我們確定了我們的指導方針。我們認爲，既然我們現在不能確定中國落後的原因是假馬克思主義的緣故，還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靈了這一點，那麼，我們就不以馬克思主義爲我們的指導方針。我們以憲法去賦予我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爲根本方針，「力求以中國和世界歷史與現實爲探討的基礎，既不承認某種理論是絕對正確的；也不認爲某些人是絕對正確的。」一切理論——包括現有的和即將出現的，都是本刊討論的對象，也都可以成爲分析探討的工具。另外，我們還認爲，要追究中國社會落後的原因，只有佔絕大多數，現在無權和生活困苦的百姓來發言，才能追究出落後的原因和擺脫落後的辦法。因此，我們願意使這個刊物成爲受苦受難的百姓代言人之一。

三期刊物的發行情況

一月八日，我們出版了「探索」第一期。由於篇幅和時間的這些關係，這一期只刊登了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續第五個現代化」和「就鄧小平副總理一月五日答美國記者問而問」三篇文章。我們發行了一百五十份，在民主牆出售了一部分，在天安門廣場出售了一部分。

「就鄧小平副總理一月五日答美國記者問而問」一文是怎麼一回事呢？一月五日，鄧小平副總理對美國記者說，中國不存在人權問題，因此我們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了十個問題，並以這十

個問題組成了這篇文章。其中，有幾個問題是這樣提的：在「四人幫」橫行時期，中國是存在着「一些」損害民主的事，還是到處泛濫着踐踏摧殘民主自由的駭人災禍？今天的中國，「充分發揚民主」的政策，已經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切切實實的貫徹執行？所謂「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揚民主的原則和政策與美國提出的整個人權問題到底有哪些不同之處？如果允許中國公民也能享受美國公民現已享受到的所有個人權力，對中國人民的利益會有哪些危害？

一月二十九日，我們出版了第二期，發行了二百五十份，在民主牆前一搶而光。在這一期中，有一篇較重要的「探索」編輯部的文章，由魏京生執筆，題目是「民主的限度」，是駁北京市委元月二十幾日的一個會議精神的。

一月下旬，北京市委向下傳達了一個會議精神，說從去年十一月底，鄧副主席講話後，大字報少了。現在又多起來了。接着指責說：當前發展的趨勢很不好，「有失國體」、「串聯鬧事」，並且「有敵人混入」，除了要加强教育外，還要用敵我態度來解決它。

對這個會議精神，我們在這篇文章中據理一一進行了駁斥。比如會議精神講：上訪人員請願遊行是有壞人混入，是無理取鬧，喊出的「反飢餓、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權」的口號是蠱惑人心……我們對此反駁道：上訪人員來北京有罪嗎？他們在這個冰成冰的季節，有的拖兒帶女，不遠千里來到北京告狀。有些是求親借友，變賣了全部家當，懷着最後一線希望來北京告狀。他們的境遇可以說是悲慘到了極點。每一個還有良心的中國人，每一個還不失爲正直的中國人都會同情他們。他們許多人或說絕大多數人的希望都會在此破滅，因爲北京並不會眞正解決他們的冤屈，會把他們送到農場勞動，賺夠了路費就遣回原處（見中共七八年五十八號等文件）。了解到現政府給他們準備的結果，稍有一點良心和一點正直心的中國人，難道不替他們痛心，不應當給他們些力所能及的幫助嗎？可是他們現在又被打上了新的罪名：北京市委的老爺們想利用北京有些市民愚蠢的地方主義，挑撥他們攻擊外地上訪人。更可惡的是他們企圖利用這種攻擊抓起一些

反對當前民主運動的妖風。他們用參加請願爲名逮捕了北京女工人傅月華。這種卑劣的行徑與「四人幫」何異!?我們要求政府立即釋放被非法逮捕的女青年傅月華。有幾十年革命傳統的北京市人民決不可以上他們的當。決不可以把矛頭指向無辜可憐的陷入絕境的這些同胞……。

另外，在一月二十九日這一天，北京六個民辦刊物組織在西單民主牆下聯合召開了批駁上述那個市委會議精神的民主討論會。討論會開得非常成功，我們的行動得到了北京市廣大人民羣衆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北京市委後來不得不把那個會議精神收回去了。

說到這裏，有些「老實人」會說：你們這樣做不是有意與政府作對嗎？其實，我們並非有意與政府抗衡，只是認爲在中國大地上剛剛生長起來的民主幼芽，不應當遭到無辜的扼殺而已。並且，華國鋒同志也講：思想再解放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大一點。我們上述的做法不能說沒有受到華國鋒同志這些指示的深刻「啓發」。如果華國鋒同志說：思想再禁錮一點，辦法再少一點，步子再小一點，我們也不會這麼膽大妄爲地說話了。

在這期中，魏京生又寫了「再續第五個現代化」，楊光寫了「看！何處是中國人自己的思維」，我寫了「北京街頭賣孩子」諸篇文章。

三月十一日，我們發行了「探索」第三期，在西單民主牆出售了八百份，這一期內容比較多，其中有兩篇是暴露性文章：一篇是魏京生寫的「廿世紀的巴士底獄——秦城一號」，一篇是艮藥寫的「功德林的功德」，這兩篇章都以鐵一般的事實，揭露了慘無人道的法西斯主義還在中國許多地方推行着。在「功德林的功德」這篇文章中，作者揭露了這個收容所至今對待犯人還施用火棍燙、電刑、吊打等刑法。大家都知道的傅月華被關押後，他們軟硬兼施逼供，始終沒達到目的，有一次因而被打得遍體鱗傷抬回室內。面對這種法西斯暴行，傅月華以絕食進行抗議，可是警察們用火棍撬開傅月華的嘴，往裏灌飯。後來，在灌飯也無濟於事的情況下，他們就給傅月華扎針，打葡萄糖。當犯人向看守頭——公安局十三處七科張科長提出抗議時說：「我們的報紙都

宣傳憲法、宣傳法制，你們聽不聽呢？」張科長氣急敗壞地罵道：「你們反了！我們五個中隊有一千多警察，是靠壞人吃飯的。報上宣傳是宣傳，他們是靠宣傳吃飯的！我們是兩股道上的羊……」其實仔細一想，張科長的話是對的，因爲毛澤東早就教導過中國的司法人員：專政不是仁慈的東西。

另外，在這第三期中，還有一個叫于義的遼寧人投來的一首詩，叫「皇宮遙對主席堂」，有人看後感到痛快，有人看後感到害怕。爲什麼有人害怕呢？因爲中國人最講忌諱。過去皇帝死了，全國老百姓要穿國服，凡是紅的東西都不能出現，正如候寶林和郭啓如老先生說的那樣！紅鼻頭的人出門也要把鼻子染藍了，那麼何況罵皇帝更是欺君之罪，冒天下之大不韙。

四月份，這個投稿人在鎮壓民主運動的浪潮中被捕了。

社論是怎麼發表的

三月十六日，鄧小平同志對中央各部老幹部講話後，我們認爲，他的一些講法是錯誤的，起碼是不負責任的。比如他說：某某是壞人，要抓起來，毛澤東的錯誤是微不足道的，有些地方出現了混亂都是這場羣衆自發的民主運動帶來的等等。對此，我們表不表態度呢？當時存在着三個大問題：

1. 如果對鄧小平同志進行批評，許多羣衆會不理解，甚至反對。

2. 黨內的「凡是派」和那些搞極左思潮的人會乘機利用這一點造謠惑衆，以此向黨內那些主張改革，主張政治民主的同志施加壓力。

3. 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安全也要受到危險。

對這三個問題我們怎麼看呢？

在以前，我們對鄧小平同志是非常尊敬的，他的三起三落，使我們對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我們熱烈地盼望他站出來領導我們國家從獨裁走向民主，從困苦走向幸福。但是，對於通向民主幸福道路上的障礙物，我們決不會讓它繼續呆在路上磕絆人民的腳，不管這障礙物是有人故意設下的，還是無意丟下的。如果我們對我們認爲是錯誤的東西不說話，留下了隱患，造成惡果，

就是我們對人民的犯罪。

最後一期——呼籲是怎麼發出的

魏京生三月二十九日被捕後，三月三十一日，我和楊光共同起草了一個傳單——「探索」向世界向中國公民宣告。我們認爲，北京市公安局逮捕魏京生，是「四人幫」法西斯的垂死掙扎。

首先，他們是以「反革命宣傳鼓動罪」逮捕魏京生的。他們這種大搞「以言治罪」製造「思想犯」的行徑，就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行爲，所以我們在傳單的最後說道：「『探索』將與中國人民一道探索消滅現有法西斯之刀！」

再看一看逮捕魏京生的經過，大家知道，逮捕人要經過檢查院的批准，檢查院在什麼地方呢？我打聽了多日，才知道檢查院和公安局是一家——公安局也行使檢查權。難怪有些票證（傳票、逮捕證）開得那麼順利，那麼快。

下面再看一看這個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司法人員都是一些什麼樣的人。

四月二十二日晚，到我們家搜查的負責人叫馬大年，他是四·五英雄韓志雄的提審員，主管魏京生一案的負責人叫張文裕，在迫害四·五英雄中，他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大肆污蔑四·五運動，大罵四·五英雄和當前這場民主運動（詳細情況見「到半步橋做客」），半步橋這個地方，從組織上，從思想上實行的都是「四人幫」在世的那一套。

三月三十一日，我們發出了那份傳單後，爲了躲避追捕，離開了北京。自此，「探索」就停刊了。

大家請注意，刑法是七月七日公佈的，而公安局劉××給我們下的定論是七月十六日，就是說，按照新刑法，凡是像我們這樣辦刊物，貼大字報的活動，都是反革命的活動。是誰指使他給我們下這樣的定論我不知道，但在這同一次談話中，他有持無恐，並兇狠地對我講道：在民主牆貼大字報和辦刊的人，到時候一定跑不了。（見「到半步橋做客」）。

以上，就是「探索」一系列「反革命」活動的簡單介紹。

攻擊民主牆的「專家」或「業餘」的奴才們，聽完我的介紹

，是得意地發狂呢？還是歇斯底里地發瘋呢？最好再表演一番，否則向主子報功領賞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

原載北京《探索》第四期

路　林

到半步橋做客

——我被傳訊的前前後後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從外地回到北京。晚上十一點鐘，我來到廠裏取我的東西。不料背後伸出兩隻笨拙的手來抓我的胳膊。我迅速地打掉了那兩隻笨拙的手，回頭一看，一個四十幾歲的人，臉上最明顯的特徵是兩排黃黃的大牙，看上去像是自出生以來就沒刷過一回，兩只大的賊眼珠深深地陷了進去，像是被挖掉了一樣可怕。他就是我們廠的武裝保衞科長——李國金。他的本領很大，在女孩子面前滋着牙嘻皮笑臉數小時，還能喋喋不休，但是在我面前凶狠得使那兩只眼珠都要突出來。隨後我看到便衣警察已經把車間的大門堵住了。據說便衣警察已經等候我多日，前門後門，白天黑夜都有人監視。待我看了傳票後，他們就像接送「貴賓」一樣，把我擁進了本茨轎車裏，這是平生第一次坐本茨車，穩穩地，速度很快，噪音很小。

我走後，另一伙人到我家去搜查，領頭的叫馬大年——四五英雄韓志雄的提審員。馬大年他們眞不辭辛苦，點亮了一個五百W的電燈泡，並派人爬到房頂的透氣孔裏邊搜查，出來時跟土賊一樣，但甚麼也沒找到。其實這種搜查方法還是很文明的。他們搜查任畹町家的時候，連牆壁都挖開了。

當時，街道的那些一貫積極的分子們，可謂重開了眼界，因爲他們又有好幾年沒陪着警察們一起抄家了。

深夜三點多鐘他們離開了被他們弄得非常狼藉的屋子，抄走了我的九個筆記本和衆多的刊物與手稿，還有八千張白片頁紙。

第二天，又來了十個便衣警察，五個藏在屋裏，五個藏在外面，如果發現有人找我，立即抓住。我走後，家裏還剩下五口人

每人出門都有便衣陪着。連我姐姐上廁所也由女便衣跟着進去。

「美國是靠戰爭發財的」

當我光臨半步橋44號的時候，感到他們的「迎賓」準備工作做得還是不錯的。汽車喇叭一响，兩道自動的大門緩緩地向牆壁裏面退去。穿過「K」字監禁樓，來到二科×××審訊室。我一說起這個審訊室，許多四·五英雄都非常熟悉。這個審訊室的第一主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據說叫張文裕，是北京市的十大名審之一。四·五運動期間抓到這裏面的人，都由他負責。這次我們的案件又由他主管。經過兩天的審訊，我也不得不認爲他和一般的提審員不同。一般的提審員都施用「一蒙、二唬、三咋唬」的那套看家本領，一旦不靈，就沒咒念了。而他不是這樣。他用「場臉」同我聊天。聊甚麼呢？聊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爲甚麼窮，美國爲甚麼富，美國的民主是怎麼一回事，中國的民主是怎麼一回事，……。先聽一聽他說美國是怎麼富起來的。

他說：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沒受甚麼損失，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都遭受了很大損失，美國却從中發了橫財，後來美國侵略朝鮮、越南，欺負世界上許多小國家，掠奪走了這些國家的大量財產，……美國是靠戰爭發財的。我們國家能像它那樣做嗎?!

「在美國，當選議員和總統都是按財產的多少來決定的，……。他們那種民主是爲資產階級服務的，是假民主。只有我們國家的民主才是絕大多數人的民主，……。」

對於這些高論，我不吭不哈（因爲我非常睏），而他端着個茶杯，在我面前一邊晃，一邊繼續滔滔不絕地高談闊論。待會兒，他見我沒反應了，認爲從理論上擊敗了我，便趕忙用眼睛示意了一下那個只具有看家本領的劉提審員繼續對我審訊。

一蒙、二唬、三咋唬

劉：你說，在你們印刷時，是誰給你拍電影來着？

我：沒有人給我們拍電影。

劉：你不老實。你看看！膠卷都在這裏，還不承認（說着，劉拿出一個牛皮紙袋子，裏面鼓鼓的，不知裝了些甚麼）。

我：你拿過來我看看。

劉：你不用看！魏京生都說了，你還隱瞞。你想對抗嗎？

我：你可以把魏京生叫來問一問嗎？

劉：你別不老實，黨的政策你是知道的，這個問題暫時先擱着，你好好考慮，一時有顧慮沒關係，等想通了再談。

我一看，這不純粹是咋唬嗎？事前甚麼都不知道，抓來再找罪證。魏京生不就是這樣被抓走的嗎？這就是今年一月二十五日「逮捕拘留條例」公佈後的執行情況。更使人不能容忍的是誘供。

七月二十四日，劉××帶人到了魏京生的女朋友家裏。劉××裝出一副笑得不自然的臉對魏的女朋友說：魏講了，他有一件東西存放在這裏，他叫我們來取。由於魏京生的女朋友沒有說假話的習慣，於是就承認了是有一件東西存放在這裏，但她要劉×拿着魏的字條來取，由於她一再堅持，劉××無奈只好答應明天再來。這時，跟隨劉××來的書記員，已經把談話記錄寫好了，拿到她每前簽字，魏的女朋友不知其中的詭計，就隨手簽了自己的姓名。

第二天上午十點多鐘，劉××又來了，拿來一張魏京生的字條，上面寫着：我那件東西是放在她家裏。下面落款日期是七月二十五日，大家請注意，這張字條是魏京生今天寫的，也就是說昨天他還沒承認那件東西放在他女朋友家裏。今天，劉××拿着魏京生女朋友簽了名的談話記錄，逼着他承認的。且不說這件東西是否能構成他們的所謂罪證，單說這種卑劣的手段，亦足以使人對目前中國執法者的公正有了一個深刻的認識了。

當魏的女朋友發現日期不對，自己上了當的時候，就罵劉××他們卑鄙，說假話……但這又有甚麼用呢！

「四、五」英雄都是說成的英雄」

兩天過去了，他們看看從我身上再找不到魏京生甚麼罪證，就拖着疲倦的身子，眨一眨帶有血絲的眼睛，結束了審訊。對我

的結論是，不懂馬列，受騙上當。然後進行釋放前教育，這項工作由那個名審張文裕來担任。

張：我們沒打你吧？

我：唔。

張：我們的態度怎麼樣？

我：還可以。

張：就是嗎。外邊人都說我們公安局打人、不講理，你看是這麼回事嗎？

我：無言。

張：報上說我們打韓志雄，皮帶都抽斷了。根本沒這回事。那時我負責這項工作，我敢保證，根本沒打他們。

我：無言。

張：你對「四・五」的那些英雄怎麼看呢？

我：你怎麼看呢？

張：我看，都不是甚麼英雄，而是後來說成的英雄。抓進來跟狗熊一樣，過幾天報上就宣傳他們不怕死，怎麼堅持眞理。像那個王應斌，明明是看黃色小說「曼娜的回憶」，他自己也承認了，報上却說他看的是「安娜・卡列尼娜」，好像我們都是不學無術。還有那個王雷，你認識吧？

我：認識。

張：放出去後，沒當上個黨委委員，現在又跑到民主牆那兒晃去了。有些人總是想借着運動晃一晃，賭一賭。

你出去後，不要對別人講我剛才對你說的事情，但可以講我們怎樣對待你的（意思是公安局沒打人），以後有甚麼情況要滙報，打電話給我們。

「到時候一個也跑不了！」

七月十六日，我又到了半步橋44號，詢問魏京生、楊光一事。

……

劉：上次寬大了你，現在爲甚麼又橫起來了？

你上次就騙了我們。抓你的那天夜裏，楊光就在你家裏睡覺

，並且冒充你弟弟，你就沒說。放出你後，你和楊光見過面，又不向我們滙報，……。我們放了你眞是瞎了眼！

我：如果你覺得寬大了我，可以再給我抓回來。

劉：你以爲不可能嗎？告訴你，最近從××地方搜來的你發表的手稿，也夠反動的！

我：甚麼叫反動？刑法上沒有這個詞兒。

劉：違反「四項原則」就不行！我可以告訴你，你們進行的一系列活動，都是反革命的活動。

我：辦刊物本身也算反革命活動嗎？

劉：對了。

我：那現在還貼大字報和辦刊物的呢？

劉：你不用管他們！到時候一個也跑不了。

……。

你不要受騙上當。我知道最近民主牆又熱呼起來了。你又受了他們的影響。我告訴你，過幾天就公審魏京生，到那時你就明白了。（談話的其他部分見「致彭眞主任、江華院長、黃火青檢查長的一封公開信」）

自從那次談話後，我決定把這些事情公佈於衆，使更多的人知道現在我國的司法機構裏還存在着一些甚麼樣的人，對我國明年實行的新刑法有多大好處，……。並且，我也一直等待着再次到半步橋「做客」，或者是「住店」，或者幹脆在那裏「定居」。

一九七九年九月

原載北京《探索》第四期

路　林

致彭眞主任、江華院長黃火青檢查長的一封公開信

彭眞主任、江華院長、黃火青檢查長：

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宣傳鼓動罪逮捕了民辦刊物「探索」主要成員之一——魏京生。五月二十二日又以同一罪名逮捕了另一成員——楊光。另外還逮捕了「人權同盟」的主要成員——任畹町、陳旅等人。同一時期，其它一些城市也分別拘留、逮捕了一些在這次運動中的積極參加者。他們大多數是青年工人和學生。

我原是「探索」成員之一，自去年十一月參加這場運動，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晚，被北京市公安局「請」到半步橋四十四號教育了二天。後來，又多次受到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傳訊（未出示傳票）。

自魏京生等人被捕到新刑法、訴訟法公佈以來，已有幾個月了。幾個月來的事實已經證明：魏京生等人是無罪的。如果說他們有罪，就只能是以言論思想定罪。因此，我找到有關部門過問這件事。

七月十一日下午，我來到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庭：

我：老羅同志在嗎？（主管魏京生一案的人）

法院：他開會去了。最近一個時期不要找他，他很忙。

我：我有重要事情。

法院：那麼就談一談吧。

我：我們的案結了嗎？

法院：沒有。

我：根據新的刑法，我認爲魏京生、楊光是無罪的，你們應該立即釋放。

法院：我們正在審理。

我：如果你們不放，就請你們把理由講出來，根據新刑法，他們哪一點能構成犯罪？

法院：我們沒說他犯罪，我們正在審理。

我：法院受理案子是一個月，最遲一個半月，可是我們的案子已經三個月了。

法院：你說的那是新法。

我：那麼舊法多長時間呢？

法院：這個不能告訴你，這只有我們司法人員能知道。

我：你們不是想把這個案子拖到年底呢？

法院：我們沒有這個意思。我說過，我們正在審理，也許過些日子就結案了。

七月十六日上午，我到了半步橋四十四號。市公安局七處（預審處）二科劉××（主管魏京生、楊光一案小組成員之一，也審訊過我），接待了我。

……。

我：根據新的刑法，我認爲魏京生、楊光是無罪的。

劉：你想替他們翻案嗎？告訴你！根據新刑法他們也是有罪的，也還算反革命。

我：你說說，根據新法，他們哪一點有罪。新法規定：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爲目的行爲才算反革命。並且，要有具體的實際的行動。而我們不過是向社會說出了我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

劉：你們進行的是反革命的宣傳鼓動！宣傳鼓動就是行動。

我：我問你，思想可不可以定罪？

劉：看甚麼思想了，你們那種思想就有罪。

我：你能否具體說出來，我們刊物上哪些言論可以構成反革命罪。

劉：你以爲沒有嗎？魏京生被捕後，你們散發了一個傳單，最後說「消滅現存法西斯」，就憑這一句話，就可以定反革命罪。

我：我們認爲，你們胡亂捕人，就是法西斯行爲。

劉：甚麼！我們是法西斯？我們代表誰？我們代表無產階級專政機關。你們指的是誰？你們指的是整個無產階級專政。（在這裏，劉以爲無產階級專政機關可以代表整個無產階級專政。）

我：你認爲，現在在咱們國家裏就沒有違反政策的事情了？倘若張志新罵殺害她的劊子手是法西斯，你也以爲他是在罵無產階級專政了嗎？

劉：你不要扯到張志新那裏去，現在是以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領導下。

我：在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就沒有違反政策的事情了嗎？

劉：你不服嗎？你再去貼！你再去貼！

魏京生在去年十一月寫了「第五個現代化」這篇頗有影響的文章，貼在民主牆上。在這篇文章裏，他大膽地提出了「沒有民主化就沒有四個現代化」這個旗幟鮮明的口號。後來，他又寫了「續第五個現代化」、「再續第五個現代化」、「廿世紀的巴士的獄——秦城一號」等文章。在他被捕前夕，他爲我編輯部寫了「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這篇社論。我們的災禍也就從這篇文章開始引起的。這篇社論的主要內容，是對鄧小平同志三月十六日在人民大會堂對各部委幹部會上的講話提出了批評。比如鄧小平同志說，某某人是壞人，要抓起來。我們提出批評說：「抓人是法院一類部門的事情，其他任何個人不管他職位多高，都無權下令抓人。」按照中國的哪一條法律「壞人」這個詞就構成犯罪？到底甚麼標準算壞人？要以誰的看法爲標準？這幾個最簡單的問題不明確，在中國就沒有法制可言。在文章的結尾我們講到：「進行社會制度的改革，使中國的政治走向民主，是解決當前各種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的前提。領導只有在受被領導者委托時，才能獲得被領導者自願的合作，才能發揮被領導者的積極性，被領導者只有充分發表他們的意見時，才能幫助領導者分析問題，發揮羣衆的智慧。只有在合作和羣策羣力的前提下，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最優工作效率、達到最理想的效果。這是中國目前可以走得通的唯一一條道路，雖然在目前中國的條件下是一條困難最大的道路。」

五屆二中全會上，華國鋒同志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在實行四個現代化的同時，必須實行政治民主化」；也就是說：沒有政治民主化，就沒有四個現代化。另外，在這次會議上，還制定了各地人民政府選舉法，要求各級領導必須由羣衆投票選舉產生。這些符合人民利益的重大措施的出現，進一步證明了魏京生的主要觀點是正確的，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當然，在他的文章中，不免有一些過激的言詞，比如對毛澤東的看法，對鄧小平同志的批評。但是，作爲一個青年，一個對「四人幫」法西斯專政懷着無比仇恨，對建立民主法制無限渴望的青年，對我們國家中出現的種種弊病直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並給予揭露抨擊，言詞難免有過激之處，政府應該看到在這次運動中，絕大多數向政府和黨、國家領導人提意見的同志，都是對中國人民懷着無限的熱愛，對祖國實現「四化」滿懷熱忱，對官僚主義無比憤慨，他們按照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光明磊落地對許多重大的社會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政府應該鼓勵他們，引導他們，同他們談心，而不應該阻撓壓制。阻撓壓制只能帶來相反的作用。遺憾的是，有人偏偏抓住他們言詞中過激之處，大動干戈，要把他們致於死地。現在新刑法公佈了，辦事有了依據，定罪有了準繩，實現「四化」這個新刑法定要起重大作用。但是，有了法是否能夠很好地依法辦事呢？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外國評述中國刑法時說，中國的刑法定的不錯，就看實行的怎樣了。我認爲當前處理魏京生等人一案是檢驗新刑法能否在我國實行的試金石。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公安局抓了魏京生，等於給全國樹了一個榜樣。繼北京市委三月卅一日發出那份通告後，全國各省市都發出了所謂維持社會秩序的通告，到處抓人，拆毀民主牆，扼殺這場運動，有的省市連「賭博」、「跳大神」、「找聖水」一類事情也扣在這場民主運動上。對於這些事情，當時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至今這些反響還很大，因此我認爲，能否處理好這個案件是爲新刑法的實行打開一個甚麼局面的問題，也是一個是否能贏得黨心、民心的重大問題。

下面我想談一談，就是魏京生等人爲甚麼遭此厄運：

我認爲這和黨內三月份出現的那股極左思潮有直接關係。有，

的報刊講三月份黨內出現了一股極左思潮，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右傾思潮，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方針，否定四項原則。我認爲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三月份黨內那股極左思潮是甚麼東西大家都很清楚。那是「四人幫」的殘渣餘孽在作垂死掙扎。另外，還有那些風派、震派、溜派人物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嚇唬別人。他們以「四項原則」爲護身符，借口有「害羣之馬」否定「四項原則」來摧毀二十幾年來在中國大地上剛剛恢復起來的政治民主的幼芽。然而，他們眞的是要堅持「四項原則」嗎？否！其實他們連「四項原則」本身都不懂，比如甚麼叫社會主義道路？哪些國家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哪些年走過的道路叫社會主義道路？哪些事情算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他們對這些問題根本沒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別人一提到資本主義就指責別人是在搞資本主義，掄起大棒打人，甚麼「民主只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事情」等等，他們這些論調根本說不服人，反而給人們思想上帶來了極大混亂。因爲他們是借無產階級的宣傳機器代表着黨和政府向全國人民講的話，所以此害非淺。魏京生等人被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所以我認爲，魏京生等人是這次黨內極左思潮的犧牲品。

現在這種極左思潮並未肅清，這些人還在，他們還掌握着一部分權力。「四·五」運動的時候，他們大打出手，給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時候，他們竭力阻撓，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他們興風作浪，今年五月，他們施展「左」道之術，進行垂死掙扎。不清除這種「左」道之術不鏟除，新刑法的實行就會受到阻撓和破壞，張志新式的慘案就還會不斷發生。

在此，我想起一件哭笑不得的事情，助您們對我們的事情多了解一些。您們大概知道，四月一日以後，許多單位傳達了北京市委關於逮捕魏京生的文件，文件中沒有說他批評鄧小平同志，而是說他向外國提供越戰情報，並向外國人索取情報費二十元錢。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今年年初，我們在民主牆認識了一些外國記者，他們相買不到我們的刊物，就要求徵訂我們的刊物。我們彼此商量後決定，每年刊物爲廿元錢。後來就有記者訂了我們的刊物每份廿元錢，北京市委說成是向外國提供越戰情報的情報費，並發下文件向

衆傳達，豈不使人罵我們這些「賣國賊」太不值錢了嗎？

其實，抓人的無非是想叫羣衆認爲我們是壞人，掩蓋他們要抓人捕人的行徑罷了。

彭眞主任、江華院長、黃火青檢查長，

最後我有幾點要求，希望您們能夠給予幫助解決：

（一）督促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釋放魏京生等人。

（二）如果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也認爲根據新法魏京生等人也犯有反革命罪，希望您們能過問此案的審理。

（三）希望您們指示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使此案盡快地進行公開審判，向全市人民公佈魏京生等人的罪行，包括犯有出賣情報一事。

祝您們爲中國的法制做出貢獻！

北京電子顯示儀器廠

路　林

一九七九年七月廿九日貼於民主牆

轉載自北京〈探索〉第四期

乙　部：

劉　青

也從周總理的遭遇，談體制改革的必要

元月嚴寒，天冷地凍，一個引起中國人民沉痛和懷念的日子就要來臨了。三年前的一月八日，長空哀號，大地悲鳴，中華民族最傑出的兒子之一，最傑出的英雄之一，人民衷心愛戴的周總理，巨星隕落了……

周總理剛直不阿，廉潔奉公，平易近人，勤儉克己，"富貴不淫"的優良品德，是中國民族道德的典範，是人民無限愛戴和懷念周總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周總理的才能超羣，智勇兼備，運策自如，風度富有魅力，令他的死敵蔣介石也不得不讚嘆不已，爲共產黨內有這樣的能人而驚嘆失色。

然而，遺憾的是，人民中有如此傑出的英雄，國家有如此卓越的領導人，却並未使中國高速度發展，中國人民仍在貧困中煎熬。豈但如此，即使是總理本人，也在某些時期處於進退維谷，甚至危若累卵的險境。前有六七年對總理提出的"打倒""整材料"，後有再後的不許人民羣衆悼念，含沙射影的惡毒攻擊；暗有林彪、"四人幫"的排擠、貶壓、陷害，明有十萬人大會上的突然襲擊。總理在這樣的陰風妖霧中，也不得不作過檢查，搖過"紅寶書"，投過"完全一致"的票；總理最希望實現四個現代化，却只能眼睜睜的看着四個現代化在搖籃中呻吟；總理最仇視邪惡，却只能任憑林彪、"四人幫"羣魔將黑白混淆；總理最熱愛人民，却無法領導人民將貧困摔掉，無法讓"假案"、"冤案"的廣大受害者獲得公道；總理連自己的老同志、老朋友也未能保全好。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精華呵，產生了，却未能將自己的理想實現，卓越的才能是在與羣醜的撕纏中消耗掉的。

爲什麼會如此？難道是人民需要？難道是國家需要？否！然

而，事實却存在了，產生的原因只能在中國的體制上找尋，也只有在中國的體制上才能找到。只有體制改革了，弊病的基礎被清除了，如此違背全國絕大多數人意願的事才不會繼續發生。

有一種論調：現在中國的幾位最高領導人是好的，人民在他們的領導下，恢復“光明的十七年”的那一套，好好抓生產，一切都會好起來。

事實說明，這種論調是錯誤的：中國從來都有一些“青天大人”。但只有一些“青天大人”是遠遠不夠的，如果體制有着巨大弊病的話。文化革命前，我們就有很多好的領導人，如周恩來、鄧小平，但並不能阻止林彪、“四人幫”的產生、掌權，現在有了幾位好的領導人，恢復到“光明的十七年”，就能避免林彪、“四人幫”一類的東西產生了嗎？林彪、“四人幫”是由舊的體制滋生出來的！

同胞們，在我們面前有天堂之路和地獄之門，做出抉擇吧！

在這裡：

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

任何猶豫都貽害無窮。

原載北京《四五論壇》第三期（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

劉　青

獄中手記

沮喪的回顧與瞻望——我向社會法庭控告……

(節錄)

前　言

公民們，你們熱愛民主嗎？希望它組成我們社會生活的基調嗎？如果是，就應該首先知道點主民的歷史，使我們能夠把握民主。

大概距今一百年，法國有個軍人，上尉弗萊德斯，（注）他是猶太人，被政府爲了自己的某種需要，誣告爲間諜，逮捕入獄。

法國的著名作家、議員愛米爾·左拉，從弗萊德斯上尉的親屬處知道了冤情，他不顧當時法國社會形勢的兇險，民主還未能從憲法裏走到社會生活實際中來，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挺身而出，振臂高呼，爲弗萊德斯鳴不平。他給當時的法國總統寫了一封長信，在社會上公開發表。此信共分十二段落，每一段均是以「我控訴」開始，因而此信之被稱爲「我控訴」。此信比左拉文庫中其它瑰寶絲毫不差。左拉因此遭迫害，在友人的幫助下，逃亡英國。但他始終沒有停止爲弗萊德斯冤案的奔走活動。法國整個社會也行動起來，站在弗萊德斯一邊。社會齊心努力了十二年，弗萊德斯冤案得以平反，他又重獲自由。人民獲得了什麼呢？人民由於長期的齊心努力，向政府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和要民主的願望，也通過努力增加了信心，從而使民主獲得了保障，爲法國奠定了牢固的民主制度的基礎。

這只是一個民主例子，但它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它告訴我們民主制度不可能由上帝恩賜，要靠社會本身的努力。只有通過奮鬥得來的東西才是可靠的。因爲你不僅在物質上得到了它，你還在精神上得到了它。

對於一個冤案，社會應該過問。對於一個半冤不冤的案子，社會是否應該過問呢？我認爲也應該過問。倘若我們的良心可以看到部份冤情存在而無動於衷，那麼離一切與己無關的事都無動於衷也就不遠了。

魏京生案件就是一個有部分冤錯的案件。

從根本上講，社會每個公民手中都握有一張選票，是要民主還是不要民主，就看我們如何運用自己手中的選票。我們如果對違反民主法制的行爲不投出自己的反對票，我們就是在吞食自己的民主權利以「饅飽」眼前的虛假安全感；我們如果看到民主和法制在孤軍奮戰，而不投出自己的支持票，我們就只配「享受」不民主，也就是專制了。

我要說，公民們，握緊你手中的選票，不要猶豫，做出抉擇，你捍衞的是自己的權益。

劉 青

八一年元旦

注：因爲是早年看的書，手邊又沒有資料，因此名字和事實可能略有出入。但時間緊迫，又不容我慢慢尋找，只得不怕貽笑大方了。（編者按：應爲德萊弗斯(Dreyfus)。劉青加注，是怕記錯了。）

二十八、從歷史回顧看中國的悲劇

人是環境和歷史的產物。讓我們首先回顧一下環境和歷史吧。

解放前，按毛主席的說法，中國是一個只有地主文化的國家。這裏，文代的內涵不是精神和物質財富的總和，似應理解爲以文字知識爲內容的知識和精神意志。我的看法是與之相近的，即解放前的中國，只有宗法制家長式的文化。這種文化培育出來的心理素質，具有矛盾相反的特徵。一方面是專橫拔扈以自己爲中心，唯自己意志是從，順者昌、逆者亡；一方面是安順、忍讓、沒有意志，總認爲只求一口飯吃，別人還能不讓咱活了。因此，

在中國有因爲無法活下去而爆發的戰爭，沒有因爲思想、信仰、制度而發生的戰爭。（春秋戰國雖是奴隸制、封建制之爭，然已二千餘年，對中國近期心理素質的影響不大，故略去不談）。這其實就是說，中國沒有發生過因爲思想精神上的分歧達於不可調和的程度而爆發的戰爭。因而，中國人民也就缺少反思精神。中國歷來吹捧宗法制、天子皇帝制的儒教爲思想主體，輔之以玄而又玄的佛教和無爲清超厭棄紅塵的黃老道教，並將這種思想意識的的統治方式蒙上一層原始家長制的溫情脈脈面紗。正如黑格爾所評論的，中國是一個普遍意志的國家，即只有天子國家意志的國家，而沒有一般百姓人民的意志。也可以說中國是一個主體意志的國家，即只有社會上佔主人地位的集團才有意志的國家。人民或者受這種意志的影響，接受這種意志，或根本沒有意志。

這種思想狀況和心理素質，在解放後並沒有發生什麼根本性的變化。共產黨將主人的稱謂給了人民，但却沒有允許，自然更談不上啓導人民像主人一樣的進行思維，產生自己的意志，而是將自己的全部意志給了社會。人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主人地位，也沒有認識到不可轉讓的主人權力之重要，只是對幫助他們提高社會地位和改善經濟狀況的黨感恩戴德。建國之後，爲了鞏固政權，進行了一系列的肅反、三反、五反等運動。後來，又進行了一系列的違反憲法精神的運動。這些運動的涉及面之大，觸動之深，人數之衆，讓本就不善於思索的老百姓莫名其妙，而又着實畏威。文革前，人民對共產黨的感情，是感恩畏威。出於感恩，一切都盲目服從、追隨，在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面前，不進行思維，沒有自己的意志，從不問一聲爲什麼，只是盲目服從、追隨，以至鬧出了像「反右」、「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懾於畏威，對黨的任何決定，社會的任何現象，不敢懷疑、不敢反對，在「大躍進」所造成的堆積如山的餓殍面前，人民不敢懷疑，自然更不敢說大躍進是錯誤的，不符合生產規律的；在被投入監獄壓到社會之下的幾十萬右派面前，人民熱烈擁護黨的「引蛇出洞」英明政策。人民中的絕大多數，文化是很低的，面對錯綜複雜的問題，無法進行思維，只知一味感恩畏威；知識份子，在反右後的社會環境中，看見人民熱烈擁護黨的政策，對

自己也產生了懷疑，就是多少還敢懷疑點的人，也因爲知識份子已快成爲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代名詞了，豈敢胡言亂語；各民主黨派和政治團體，一直是處於「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不景氣之中，每日裏「一致通過，完全擁護」還心悸肉驚，唯恐不慎，又那有閒暇顧及其它。於是，中國共產黨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上（台灣除外）成了唯一的權力，也就是自由的權力，也就是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想如何運動便可以如何運動的權力。在這塊土地上，不存在對共產黨運用權力時的校正力、約束力，更沒有反對力。因爲中國是高度集權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實際決策人只有政治局的幾個人，甚至只是一個人，所以這不受約束的自由運動的權力便落在了幾個人甚至一個人的手裏。

這種情況是極不正常（對民主制而言）而且極端有害的。舉一個不十分準確的例子吧。一輛擁有巨大質量、儲有巨大能量、能夠飛快高速行駛的汽車，却沒有手閘汽閘變速器等制動設備和變速設備，不論駕駛汽車的司機技術多麼高明，甚至以電子計算機控制，讓汽車行駛在繁華的鬧市，能夠不闖禍嗎？能夠避免車毀人亡之災嗎？以某種意義說，社會也是如此。我國的社會就是一輛質量巨大、能量巨大、能夠靈活高速行駛的汽車，遺憾的是，共產黨這個駕駛員總嫌手閘、汽閘、限速器、變速器等「阻礙」速度的設備礙手礙腳、多餘，而超過事實地自信駕駛技術，將它們拆除了。結果，就導致我們這輛「汽車」無法避免地、橫衝直撞地向災難駛去。世界在幾千年的血淚史之後，從獨裁、專制、集權、民主等「統治技巧」中，所以選中民主，就是因爲民主給社會配備了制動設備和變速設備，能夠避免司機將汽車帶上車毀人亡之途。

我國這輛「汽車」，在三十年的行駛中雖然還未車毀人亡，但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不能隨時變速停車，也已經幾瀕險境，大傷元氣了。現在，如果再不裝置制動設備和變速設備，車毀人亡是必然的，而且爲時不會很遠。

人們可能會說，這一點，已經被認識到了。現在，我國正在恢復發揚民主、健全法制加强法治，進行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的社會改革，也開始注意和各民主黨派搞協商等等。這些，就是

「汽車」裝置了制動和變速設備，可以保證車速隨意調整，避開危險，駛向目標。

我不同意這種觀點。所謂恢復發揚民主，健全法制和加强法治等等，文革之前也有過類似的口號。然而事實說明，只要社會只有一個權力中心，不允許任何其它意志存在，這些提倡都來自此權力中心，則所提倡的口號之內涵，就是按照權力中心的理解確定的，對權力中心並不具有任何實際的約束作用。當權力中心認爲所提倡的口號阻礙權力的行使之時，就可能直接將這些口號本身取消。進行經濟結構的改革和政治結構的改革，當然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是，這種改革如只在一個權力的指揮下進行，沒有給其他意志留有地位，則等於沒有給改革提供向合理方向發展的保障。也就是說改革沒有實現的基礎。

至於開始聽取民主黨派的意見，就國家大事與他們進行磋商，在目前更是不值一提的謊言，是無誠意徹底改革而對社會的搪塞行爲。且不說在歷次運動中早成驚弓之鳥的各民主黨派是否敢於坐下來，就各種國家大事提出自己的主張、看法，對共產黨的領導方案進行認眞負責的磋商，或贊同、或反對、或不投支持票，就算各民主黨派還有勇氣，敢於認眞負責的說話，不怕觸犯「龍顏」；他們還有能力辦到這一點嗎？大家都知道，各民主黨派是解放前組建的，是解放前矛盾的產物，解放後，基本處於組織上和理論上的停滯狀態，甚至可以稱爲自然消亡狀態。建國已經三十餘年，社會矛盾早已發生變化，而民主黨派們是過着「與世無爭」的日子，離社會矛盾的激烈漩渦遠遠的，快成爲與世隔絕的隱士了，根本不了解矛盾，不了解社會，他們還能代表誰？就是他們銳意進取，現在立志來了解社會，他們還能做到嗎？解放後，各民主黨派沒有「吐故納新」，原有的人，歲數小者，已五六十歲，大者，早過古稀之年，他們還能有精力和敏銳的觀察力來了解社會嗎？各民主黨派的人，大多是有知識或一技之長的人，解放前生活小康，解放後也「康小」，每個人都盡力在自己的四周築起有形或無形的墻，將自己置在其中，他們又如何能夠改變生活習慣和心理素質而了解社會呢？他們只能「完全擁護，一致通過」，無法擔負起「變速器和制動器」的任務。目前政協中

的各民主黨派，只是我國爲了表現自己是一個民主制國家的政治裝飾品，在政治生活中不具有任何實際意義。

二十九、這一代青年的歷史使命

歷史在前進，矛盾在變化，舊的矛盾已經解決、消失，新的矛盾在產生、發展。從時間上說，解放已經三十餘年，從環境上說，解放前後是兩個本質不同的環境，怎麼能夠在研究解決今天的矛盾時，却搬請昨天的「歷史人物」來討論、研究制訂方案呢？這是眞心要解決今天的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嗎？要解決今天的矛盾、問題，就不應找只會「完全擁護，一致通過」的老好人，而要找確實有點「桀驁不馴」敢說敢言，處於社會中站在矛盾前沿，且代表了矛盾幾方中的一方之人物。

今天，不是解放前的革命戰爭年代，也不是初建國時黨威望極高，並必須採取一定的鎭壓手段來維護政權的年代，今天是舊的矛盾已經消滅，新的矛盾在不斷產生發展的年代。今天，不應該也不能夠再以對待從前矛盾的手段來領導、來鎭壓以期解決新的矛盾。共產黨應該能從昨天的一貫正確、說一不二、人民絕對擁護和共產黨是當然的絕對的領導之位置上走下來，走到社會中來，聽聽今天人民的內心話，學會和今天的人民說話，而不是凡不如意即叱之爲「反動、反革命」，和人民認眞研究討論，而不是按照自己頭腦中的模式，高高在上閉門爲人民設計「美好幸福的遠景藍圖」。總之，共產黨今天要做的事，不是急於遵循自己的思路去領導，而是學會如何和人民說話，如何和社會說話，從說話中了解問題，從而制訂領導方式和設計中國的藍圖。如果僅會抱着頭腦中的幾個概念生搬硬套，進行推理演譯，而缺乏走到社會中來的勇氣和毫無架子地聽取社會各方面的認識的領導作風和膽量，是不能適應今日之社會的。

走到社會中來，絕不是搞點「同吃、同住、同勞動」等形式主義的東西，也不是找些勞模當人民代表，實則只是投票機器，也不是弄些七老八十的民主黨派搞搞政治協商。走到社會中來，首先是不能用老概念、老眼光對待當今社會的各種矛盾、各種思想、各種代表人物，將這新的事物和人劃分到舊的認識中去，其

次是要有和他們的代表人物一起坐下來商量、研究、解決問題的領導作風、氣魄和膽量，不能將他們看成異類、洪水猛獸，必欲「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那種將新的觀點新的問題和一切不符合自己頭腦中的概念的東西通叱之爲「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反革命宣傳」的年代應該結束了。其實，我國如能早點實行眞正的言論自由，也就是允許「異類」言論存在，是可以保持清醒些的頭腦，避免掉一些錯誤和縮小損失的，避免掉許多讓我們今天十分痛心疾首的悲劇，許多民族精華也可以在各行各業大顯身手，而不是飲恨黃泉。

今天，和歷史上的任何一個複雜時期一樣，眞正了解社會的弊病，大聲疾呼解決弊病的，是站在社會前沿的人，是處於矛盾鬥爭中的人，是深深體察人民的願望、需求、疾苦的人，是本人就是這些願望、需求、疾苦組成部分的人，尤其是這部分人中的青年人。是誰湧身摧毀「四人幫」基礎的「四·五」運動？是誰在社會上廣泛傳播「四人幫」的醜行使全國人民一起厭棄憎惡他們？是誰首先指出「四·五」的意義不是報紙所宣傳的那樣，而是人民對體制中的痼疾和黨的領導作風不滿的爆發？是誰大聲疾呼中國需要的不是恢復到十七年，因爲十七年是十年浩劫之母，中國需要的是反對官僚、限制特權、完善民主法制、嚴格法治、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和經濟體制的改革。主要是當代的青年人，是被稱爲「迷惘的一代」「徬徨的一代」的青年人，是身受十年之害在睜眼看世界時爲自己祖國母親羞愧的青年人，是被貧困和無休止的政治口號搞得生活失去了光彩的青年人，是被剝奪了發展機會和失去了生活興趣的青年人……

必須承認，目前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矛盾盾焦點，就是這些青年人所反映的問題。要解決政治矛盾，就必須客觀對待這些問題。再也不要自欺欺人的搞什麼「各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和勞模代表們的「完全擁護一致通過」式的民主了，這些老好人只會說好聽的話，黨的領袖們愛聽的話，而要眞正解決問題，就必須有勇氣有膽量聽不好聽的話，不愛聽的話。

西單民主牆，就是集中反映這一代青年們的思想的一塊自由陣地。在這裏，沒有阿諛奉承，沒有瞻前顧後，最少忌諱，有的

是一顆顆急於解決國家、民族命運的年青的心。當然，這裏的言論觀點有好有壞，有的好中有壞，有的壞中有好。但總的一點大致一樣，即都是不滿於中國的生產發展和政治現狀，要提出自己的觀點認識來，也就是說，都是出於民族和國家的興旺發達這樣一個總的目標，出於時代的緊迫感和歷史的社會的責任感。黨和國家有自己的路綫、政策，各個人又有自己的看法觀點，你說你的好，他認爲自己的也不錯，本不妨比較討論一下。因而，民主牆前最少顧忌的一部分青年，結合成各種觀點的小民刊、小團體。我們就是這樣一些人。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呢？是反映社會各種人各方面的願望、需求、疾苦，並爲達到願望、滿足需求、解除疾苦而進行長期的宣傳、鬥爭；是要講出我們對民族、國家的認識看法，我們對某些東西的支持或反對，我們自己的觀點、見解；是要成爲國家、政府、黨的一面鏡子，照出國家、政府、黨在路綫、政策、領導方式等方面的不足之處，促之改變，使之不形成尾大不掉，難以收拾的局面；是要成爲社會的「變速器、制動器」，在社會面臨重大危險，譬如「大躍進」「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危險時，看到了林江等人物時，能夠動員人民羣衆，對之進行抵制。總之，是爲了悲劇不再重演，是爲了當權力引導社會踏上「危險旅途」時，社會不是無可奈何毫無辦法。這是在我們今天一黨執政的情況下，歷史賦與當代青年的使命。

三十、駁對民運青年的各種責難

然而，宣傳機構對我們這些人，百般責難，多方非議。爲了釋人們心中疑竇，我有必要擇其要者剖析一二。

1.不要黨的領導，顛覆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沒有反對黨的領導。但是，我們不同意將黨的領導絕對化和絕對化。首先，領導的意思是什麼呢？是帶引、率導、指導的意思。黨的領導，就是黨對國家事物的帶引、率導、指導，主要是指用黨的理論思想來帶引、率導、指導國家、政府制定政方針，使國家、政府沿着黨指引的方向，即社會主義方向。。然而，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首先是將黨的領導庸俗化了，

爲只有黨委出頭露面幹實際工作才叫黨的領導。其實，那不過是將原來的行政班子撇開，另組了一個名叫「黨委」的行政班子罷了。其次，是將黨的領導絕對化了，認爲人們的思想都需符合黨的認識、黨的理論，要堅持這個原則那個原則，只要有點什麼新的觀點，不符合或突破了舊的概念，就叫不要黨的領導。我認爲，只要是支持共產黨爲執政黨的人，也就是主客觀都不是在攆共產黨下台的人，都是贊成黨的領導之人。從這個角度說，我們並非不要黨的領導之人。

想顛覆、推翻我國制度的人有沒有？應該說有，甚至可以肯定說有。「林子大了鳥多，什麼鳥都有。」一個十億人口的國家，還能缺少某一類型的人嗎？不要說中國，恐怕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也都有這種人。然而，這種人數的多少，他們實現自己企圖的客觀條件如何，則是一個決定因素。在人數極少，根本不存在客觀條件之時，他們不過是秋蟲的幾聲悲鳴。拿此幾聲悲鳴大作文章的，或者是神經不正常自己嚇唬自己，或者是像林彪「四人幫」一樣的製造神話，爲了搞陰謀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或者造出這種神話是想嚇住老百姓，爲了使他們乖乖聽話便於管理。在目前的中國，社會上就根本不存在顛覆、推翻我國制度的力量，危言聳聽者的目的，不外乎上面列舉的幾種。

至於「民主運動」，更沒有此目的，我們要的是完善改革目前的體制，而不是推翻我國的制度走其它的路，民主牆的主體是沒有這種企圖的。除了因爲共產黨的主觀意願是好的，是想領導好、治理好我們的國家，使民族興旺發達，從前的領導也取得了很大成績，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是事實也是現實的，是深入人心並爲人民所接受的種種因素不談，任何一個肯於客觀看待世界的人在懷有這種陰謀企圖時，都會發現他面對無法超越的障礙。第一，共產黨是有三千七百萬黨員的大黨，是中國唯一有力量的黨，絕對掌握着國家和政府權力，有完整的理論，這種理論已經家喻戶曉，成爲人們心理因素的組成部份，任何其它的政治團體和政治力量，在如此强大的黨面前，都輕得幾乎等於零，根本不可能有力量推翻。第二，任何一個有社會責任心的人都會承認，中國不允許大亂。而要顛覆、推翻，必然要通過社會大亂。別的不說

，僅吃飯一項，就不允許大亂。人口十億，土地面積十五億，每人平均口糧六百斤略多些，如遇大亂，糧食銳減，任何國家、世界都無力救助中國，那時死於飢饉之人，將以萬計，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一幅地獄圖。因此，只要是出於想使民族、國家興旺的人，斷不會希望以這樣的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的。爲了其它目的而希望鋌而走險者，得不到社會的支持，勢孤力單，翻不起多大浪花。在這種情況下一股勁大喊顚覆推翻，實則有意編織聳人聽聞的神話。

當然，我不排除事物發展的可能性。社會的發展方向是社會各政治力量的合力。各個力量並不是一個恒量，而是在不斷發生變化的。倘若還堅持黨無所不包的領導就是不允許不容忍黨外的理論觀點，搞精神貧乏的思想一律，「無產階級專政」說白了，就是專黨的領袖們不滿意的那類人的政，生產力不能合理高速發展，生活不能改善適應世界的發展頻率，對社會上的各種觀點不能客觀分析而首先將其置於敵人的位置，堅持過去的領導方式而不能順應時代的潮流，即在新的矛盾面前產生新的領導方式，社會矛盾就必然激化，那時，社會產生大亂就並非是沒有可能性了，而是現實性的問題了，譬如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可以收拾殘局，並不在於幾個人的英明，而是社會的巨大心理慣性，使社會不致翻車，而現在這種心理慣性的因素，已經消失了。

我們，民主牆的主體，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鋒，對當前社會的看法是應該改革，不欣賞不贊成「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因而，我們希望的是矛盾能夠消彌，能夠順利解決。要解決矛盾，必須正視矛盾，而不是迴避矛盾，或者以高壓將矛盾壓到內部去，使表面暫時看不見。「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共產黨是當局者，又因爲歷史上的勝利，而產生了極端自信自負的心理，很多問題不可能看清楚看全面。各「民主黨派」早已失去對事物的敏銳觀察能力，又缺乏直言不諱的勇氣，這個旁觀者對當局者，不是一個可以提供「諍言」的伙伴。只會舉手的勞模們和如此產生的各級人民代表，在政治上是喪失視力的盲人，他們只會順着黨（上級）牽引的路走。歷史將「鏡子」和「諍友」這種責任和榮譽給了當代敢言敢爲的青年人，這也是當代青年人不容推諉

的歷史責任和社會義務。

2.別有用心

說我們是「別有用心」的人，比說我們是不要黨的領導，顛覆、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要聰明得多，也狡猾得多。報紙上有一段儘是「反革命」「反社會主義」「顛覆、推翻」等字眼，着實嚇人。但是，總是喊這些嚇人的字眼，却舉不出具體的人具體的事，就難免不靈了。譬如有個寓言，說個放羊的孩子，在放羊時總喊叫：「狼來了！」於是，鄉親們各持器械，前來打狼。但是撲空幾次之後，人們便不再相信孩子的謊話了，而孩子也自食謊話的惡果了。報紙也是如此，總喊叫「顛覆、推翻」却舉不出實例，就難以讓人相信了。最後的結果，恐怕也不會比那個孩子更妙吧。從七八年十一月民主運動興起，至今已經二年多了，報紙還沒法舉出一起搞民主運動的人中有顛覆、推翻我國制度的行爲。就是魏京生，也只是思想上、言論上反對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還沒有轉化爲行動上的反對，也就是他仍在言論自由的範疇，而沒有構成顛覆、推翻的反革命行爲。因此，報紙上也實在不適再高喊那些嚇人的字眼了。於是，一些聰明些的人，便放棄了那些實有威懾力量的字眼，另用了一個內容含混不清，使用者也不知所云，但在中國詞語中屬於貶義的詞：「別有用心的人」。

其實，由於中國社會長期政治生活的狀況，此詞在人民心目中的作用，就像條件反射一樣，首先還是歸入「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反動」等一類概念中去。這恐怕也正是使用此類概念不明確的人的主要用意。但是，我在前面批駁過這類概念了，此處不再囉嗦。

「別有用心的人」在人民的心目中，還容易形成這樣的形象，即這些人是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要將水搞渾，爲了「鬧而優則仕」，獲得個人的利益。在參加民主運動的人中，應該說有這類人，但不是主體，只是微乎其微極少數。大多數的人，是要眞正的可靠的有保障的安定團結的，是希望實行眞正的民主法治，是希望民族興旺發達的。而且，大多數的人也不是毫無政治頭腦的糊塗蟲，他們不會看不出民主運動並不是已往的「奉旨革命」，也不是文革時期可以「鬧而優則仕」的年代，今天投

身「民主運動」，離「班房」要比「紗帽」近得多。

就是眞有紗帽，我們這些人會要嗎？有人會要，有人不要，而不要的將是大多數，因爲參加這次民主運動的大多數人，不是出於義憤、恩怨、私心，而是出於對歷史的認識，承擔歷史的任務。而要完成任務，就不能接受「招安」，成爲接受官方任務、工作而缺乏直言不諱精神的人。我在前面曾提到，某個有官方身份，並對我明確表示了他是受某個重要國家領導人的委托前來的人，曾經向我暗示去團中央工作的事。接到這種暗示的人，就我所知，有好幾個。而且，我還知道我們無一例外地表示了謝絕的態度。我們沒有將「民主過動」當作投機冒險的場所。而且，我們中的許多人，也並不是沒有其它較好前途的機會，我們的許多朋友，就都考取了研究生。我們之中的相當一部份人放棄了這種機會，並不是因爲沒有能力，而是認爲民主運動更需要自己，自己可以幹得成績更大。就是在監獄和自由之間，我們也沒有放棄自己的看法來獲得自由。在八零年一月十八日的提審中，白髮提審員的話說得很明白，我如果按照他的「指點」承認錯誤，就可以「爲人民服務」，「幹出成績來」，——自然可以像楊光于義似的得到「殊遇」了。否則意味着什麼，我也知道。我對白髮提審員的點撥並沒有考慮，但我總認爲放棄做人的資格去換取那點自由，代價太大。關在獄中的其他人，我猜想也有類似的情況。和我同住過的難友們，曾經誠懇地對我說，在他們十幾年所見的各類政治案中，民主運動中進來的人最堅定和最樂觀。

然而，我們也並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超出三情外不在五行中的神仙，也不是毫無私心專爲他人活着的共產主義英雄，我們有七情六欲，有自己的私心和願望。我們希望自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人、公民，有自己的頭腦和不可轉讓的權利，有自己的價值觀和成爲有價值的人，能幹出點成績，不是一個毫無價值無足輕重的人。以我們《四五論壇》爲例，我們的願望是想通過長時間的努力，將刊物辦得有影響有誠實的美譽，獲得社會的信任，在中華民族的重要時刻和重要問題上，能盡一分力量。我們願意通過汗水獲得勞動的結晶和稱贊；我們願意成爲有成績的人，而不是有權勢的人；我們願意成爲有價值的人，而不是有金錢的人。

有些人將我們說成是出於個人的遭遇和恩怨，有着「四人幫」的影響或就是爲「四人幫」翻案招魂，毫無目的和毫不負責，唯恐天下不亂等，而參加民主運動的。稍對我們有點了解的人，就不會相信此類謊言，實在不值一駁，我就不多談了。

3.你們是極少數，一小撮。

有一種言論，時常見之報紙，說我們是極少數，一小撮，廣大羣衆不歡迎，有我們的自由就沒有廣大人民的自由了等等。我們是極少數，一小撮嗎？我不認爲是。

在我國，藉口人多、不可能等等原因，從來沒有一次充分讓人民自由表達自己願望、需求、疾苦等的機會，從來沒有一次讓人民自由的表達支持什麼反對什麼的機會，從來沒有讓人民直接投票通過憲法或選出直接的代表。人民的代表，是在人民不了解或極少了解的情況下產生的。因爲讓他們當代表的不是人民，所以他們不需要向人民負責，反映人民的願望、需求、疾苦。在我國，人民的代表實際沒有產生過。在歷史上，共產黨一向自詡是人民的代表，而且也曾獲得人民眞心的贊同。這樣，官方沿襲下來，順理成章地當了人民的天然代表。於是，官方時時事事以人民代表自居，張口代表人民，閉口人民代表，對凡不如意者，皆叱之爲極少數，一小撮，廣大人民不贊成等等。其實，官方的許多事是不代表人民的甚至是爲人民所反對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林彪掌權說自己代表人民，「四人幫」掌權也是代表人民，結果，一倒台，則成了人民的敵人。人民被剝奪了說某些自誇者並不代表自己的權力，這樣就形成了誰掌權誰就代表人民的局面。而代表們所幹之事，人民也是有不贊成的，譬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我看不應該將代表人民、代表大多數變成掌權者的同文語。眞正代表人民、代表大多數，不能是自封的，而需要通過實踐，由一張張選票舉上去。

說我們的思想觀點代表的是大多數或少數，都是無法在目前判斷的，因爲沒有機會讓許多人了解，更沒有通過實踐讓選票說話。不錯，我們在遊行的人數上，都是不多的，不要說與全國人數比，就是與北京人數比，也是極少數。但是，能夠由此斷定我們的觀點是只代表極少數嗎？我看不能這麼說。「四·五」運動

在天安門廣場最多人數時也不過一、二十萬人，與北京的八百萬人相比，無疑是少數，難道能夠因此斷定「四·五」運動只是極少數人的運動嗎？伊朗扣押美國人質，紐約只有一、二百名大學生舉行了化裝抗議遊行，難道能夠因此斷定美國人民不反對伊朗扣押人質的行爲嗎？在「四·五」之後傳達的有關撤消鄧小平內外一切職務的兩項決定，全國有上億人舉行了「熱烈擁護」的遊行，難道能夠因此斷言這次遊行表達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心願嗎？在從前舉行過的「要古巴不要美國佬」，聲援伊拉克、柬埔寨、越南等的聲勢浩大的遊行中，全國有相當可觀的人數參加了，難道能夠因此說這些都是人民的自覺行動而不是在走形式嗎？在遊行者中，起碼有一半人在遊行之前還不知道世界上有這些國家，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說不清楚自己爲什麼要聲援這些國家。所以，在沒有用選票舉出多數派之前，是誰也無權說自己是多數派的，自己的觀點認識就是人民的觀點認識，不能借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給自己臉上貼金。國家說的話，代表國家；政府說的話，代表政府；個人或團體說的話，代表個人或團體。如果要找出其中誰的觀點認識代表全國絕大多數人，就必須讓全國人民有表現意願的機會，讓全國人民自由投票。

選票沒有話說之前，就封自己爲人民的代表，代表了絕大多數人，未免有點沽名釣譽，當考慮到說話者手中握着權力時，又顯得以勢壓人。這是很不好的。不僅自封爲絕大多數的代表，並進而剝奪不同於自己的、被自己稱爲絕少數人的說話權，則不僅是不好，而且是違憲了。憲法沒有說只允許絕大多數人的代表發言，不允許極少數人的代表發言。毛澤東說：「眞理往往在少數人手裏。」新生事物新的規律總是首先被極少數人發現的，不可能在某一天同時被絕大多數人發現，不讓極少數人說話，就是不允許科學發展。從局部看，沒有一個國家的任何一次遊行、集會、演說的參加者能佔本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相比之下都是少數，如果以「有了你們少數人的自由，就沒有絕大多數人的自由」爲借口，豈不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理直氣壯理所當然地不允許遊行、集會、演說了嗎？

我們再也不應允許任何一級權力機構先自封爲人民代表，然

後就來剝奪「少數人」實則是人民的發言權的作法了。林江就是這麼幹的，就是如此逼迫社會只能說他們的「革命話」，而不許言其它的。今天，我們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些「人民的代表」給人民造成的痛苦、損失了。社會主義的民主再也不應允許某些人借「大、公、代表人民」的名義，消滅少數人的觀點、少數人的存在——實際亦是消滅了人民的存在——，這是以民主的名義對民主進行的犯罪行爲。倘若我們的國家一定要將社會主義民主這個概念解釋爲只有絕大多數人表達意志的權利，沒有少數人表達意志的權利，並將自己封爲絕大多數人的代表，因而實際上成爲只有官方表達意志的權力，我就看不出來人民爲何要選擇要支持這種民主，而不選擇西方的民主。做爲個人，我願在此鄭重聲明，倘若社會主義的民主只是這種樣子，我寧願要西方的民主而不要這種社會主義的民主，即使爲此受剝削我也心甘情願。因爲，「吃飯是爲活着，活着不是爲了吃飯。」而此種社會主義民主，將廣大人民置於「吃飯只是爲了活着，活着就是爲了吃飯」的地位了。林江統治時期就是如此。這是剝奪了人的最基本權利。思維、表達意志、能動地改善環境，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但是，我草草翻過幾本馬列著作，就我的理解——倘若我對文字的理解沒有錯——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比資本主義的强於百萬倍，社會主義並不以「大、公、代表人民」等名義消滅個人的存在，反而要給每個人表達思想、提供方便和機會，使社會活躍，生氣勃勃，不斷產生新觀點、新規律，社會在認識到正確之後，能夠很快接納有益的，社會總是執行大多數人的意志。因此，我們這一代青年的任務，就不是放棄社會主義，而是完善社會主義，和那些非社會主義的、强加給社會的意志進行鬥爭。

4.國家大事有黨、國家領導人去管，小老百姓何必多管閒事。

這是一種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的思想，也是人民羣衆在政治生活中感到無權無奈的沉重歎息。

國家大事是與個人無關嗎？老百姓應該少管閒事嗎？我們的認識是相反的。如果一個人觀察事物的能力遠不能超出自己居住的小房，深不能透過事物的表象，就很容易將不直接立刻損傷自己的事物看成與己無關之事。但是，我們只要能將眼睛看到歷史

和世界上，就可以發現，國家之事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切身利害。

日本工人的生活爲什麼能比中國工人的生活高幾十倍，這就是因爲日本有一個能激發生產力的經濟結構，有一個適應生產力的政治結構。我國如果也能有一個激發生產力的經濟結構，適應生產力的政治結構，幾十年後，我國人民的生活也可以比現在高幾十倍。反之，我國如果不能很快產生適應生產的政治結構、激發生產力的經濟結構，幾十年後，我國人民的生活就會提高很少，甚至不會有什麼提高。遠的不說，眼前也有現成的例子。林江時期，人民連獎金都沒有，任何貢獻和付出的超定額勞動，都沒有報酬，而在大躍進時期，我國國民總產值顯著下降，全國人民陷於半飢餓的境地，餓死了許多人。這些是舉不勝舉的，難道還能說國家大事與自己無關，是管閒事嗎？

在文化大革命中，幾乎每一家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遭受了一定的損失，留有創傷，如果我們不關心政治，不剷除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因素、歷史因素、社會因素，歷史就並非是不可能重覆的，這難道不是與每個人都有很大的利害關係嗎？

而且，過問政治，參與政治，能稱爲是閒事嗎？國家、政府、黨每日每時都在管理我們，幾乎沒有任何不管之事，從思維方式，階級立場，道德觀念到物質生產、分配、生活方式等，無所不包，甚至小到一些日常瑣事，如過節要怎麼過，穿衣要穿什麼樣式，頭髮如何留，結婚要怎樣等等等等，舉不勝舉。而我們，掛着主人名義的我們，議論管理的好壞、是否合理應該，或是不贊成某些管理，也算是閒事嗎？如果這樣，我們豈不是成了只管幹活，只許被指揮，只配被教導的主人了嗎？所以，爲了能有點主人的架子，我們也應對國家能大家「指指劃劃」，對管理領導的好壞能發表見解，並態度鮮明地表示或贊同、或支持、或反對。

三十一、功過自有歷史評價

我的信要托人帶出監獄，時間不允許我再寫了，因此，我不再具體剖析「極端個人主義者」「無政府主義」「絕對自由主義」「持不同政見」等問題了。我在此只說這些概念對民主墻的主體是不恰當的。我們從來沒有贊成不要政府、不要法律、爲所欲

爲的行爲，我們從來是遵重法律，那怕是我們認爲不合理的法律，我們也遵守，絲毫不違犯。我們所要的，是憲法明文賦予我們的權利，也就是遊行、結社、集會、出版、罷工、言論等權利，我們不能讓這些權利躺在憲法裏，而要讓它確實掌握在我們的手裏，怎樣能因此給我們戴許多帽子呢？

我們的言論和做法，不一定都是好的、有益的，其中難免有錯的，有的引起不太好的後果。但是，我們的目的是無可非議的，我們不觸犯法律，只行使公民的權利，這是無可指責的。我們只能按照自己的認識幹，功過自有歷史評價。列寧說：「誰能肯定，那一拳是必要的呢？」在幹一個事業時，誰又能事先斷定那一步是正確的，必須走的？我們只能判定大方向是不錯的就可以了。因爲民主運動出了個魏京生和其它一點事，而全盤否定，是不客觀的、不公正的。如果人們因爲共產黨內出了林江等人物，幹了「大躍進」「反右」「文化大革命」等錯誤，而全盤否定共產黨，共產黨會認爲這種否定是正確的嗎？

三十二、結束語

當我回顧歷史，我看見長長的陰影，裏邊有遇羅克、張志新、馬棉珍、史雲鋒……他們所說過的話和所做過的事，並不比我多，然而，他們被剝奪了生的權利，而我僅僅是被「仁慈」地勞教三年。我內心有一絲酸痛的冷嘲，歷史是前進了，英雄們的血沒有白流……

當我瞻望未來，我看見民族背着歷史的重負，受着各種利害關係組成的羅網的纏糾，保守力量在拚死向後拖曳，感到歷史還需要遇羅克、張志新他們。我的心很沉重。我知道，推動歷史前進的燃料就是生命和鮮血，然而，我仍感到沮喪、沮喪……

最後，我對北京市公安局和司法界說幾句。我這封信是向社會法庭控告你們的，你們如覺得我所說的有與事實不符之處，或屬誣告，你們可以運用你們的權力，我隨時準備到公開審判的法庭上，爲我的權益和人民的民主權利辯護。當然，法庭應該是眞正公開的。——或者，像你們已經做過的一樣，不訴之法律，只運用權力，反正是落入你們網中的小鳥，只得聽憑擺佈。

還可以告訴你們一點，我訴之社會法庭而不尋找等待清官，並不是我相信中國沒有清官，而是因爲我就是費盡千辛萬苦，苦熬多年之後，找到了剛正不阿的清官，問題得以澄清，你們也仍然可以趾高氣揚，你們最多只需寫一份檢查，而你們却是狠狠地將我「教訓」了好幾年。你們的橫蠻卑劣不應不受任何懲處，而我相信，社會法庭將給你們最公正的判言。

附：

各地民刊就劉青被捕發出的呼籲書

尊敬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尊敬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尊敬的全國人大常委法制委員會：
尊敬的全國最高人民檢察院：

關於北京原《四五論壇》召集人劉青同志被拘留至今、仍不予釋放一事，我們全體同志在此提出强烈呼籲：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北京原《四五論壇》編輯部在當時的北京西單民主場前，發售公開審理魏京生一案的法庭公審錄音記錄稿（上午部分）。在發售過程中，發生了公安人員抓走羣衆事件。原《四五論壇》編輯部召集人劉青同志於當天下午事發後，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信訪處，爲被抓走的羣衆的問題進行交涉。交涉未妥，劉青同志亦被北京市公安局信訪處拘留。劉青同志家人當時得到當局的回復是「行政拘留」。但到行政拘留期限仍不見劉青同志獲釋，至今，劉青同志被拘留已達半年。

劉青同志被無理拘留一事，使全國投身民主運動的同志們及廣大人民羣衆深感關注。

我們認爲，劉青同志代表該編輯部組織發售法庭公開審理魏京生的錄音記錄的做法，並沒有超出五屆人大的頒佈的法律限度。法庭在審理魏京生案件明確爲公開審判的法律形式，從這個定義上，整個審理過程，包括其中的審訊程序、公訴、答辨、申訴以及裁定等都是作爲在公開情況下進行的全部內容，任何公民均有參與旁聽及知詢審判全部內容的權利和義務，亦即等於新華社有公開報導審判過程的權利和義務一樣。而所發售的錄音記錄稿

並沒有超出其審判範圍之外，所以，劉青同志的發售記錄稿及記錄稿本身都是完全合乎法律權利的。而劉青同志因此被拘留，甚至遠超出當時當局定爲「行政拘留」的期限（法定「加重處罰不得超過十五日」）。我們不能不認爲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劉青同志，至今仍不予釋放的做法，是違反了法律的行爲。這樣明顯地踐踏了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行爲，大大地打擊了廣大人民羣衆對我國能否走上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道路的信心，完全違背了建國三十周年，葉劍英委員長關於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講話精神，尤其是與今年四月十六日五屆人大常委第十四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實施刑事訴訟法規劃問題的決議」相抵觸。

作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幷以決心健全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爲現行重大政策，任何各級政府部門，尤其是司法機關，自身首先嚴格遵從法律、維護法制，是使黨和政府的這一重大政策能否在全國貫徹落實的第一個保障，亦是使黨的領導能否得到全國人民支持和擁護的重要保証。人民一方面喜悅地看到黨和政府在決定肅清「四人幫」法西斯專制統治的流毒、大力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問題上作出重大的決策，爲建設「四化」鋪平道路，另一方面却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門和機關看到仍然出現頑固阻撓黨的政策落實、粗暴地踐踏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現象，使人民不禁對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那些粗暴踐踏法制的行爲，正是嚴重地破壞了「四化」建設、破壞了安定團結政治局面的「四人幫」行爲。我們希望黨和政府迅速敦促這些有關部門對自己的錯誤立即予以糾正。

我們强烈呼籲北京市公安局立即釋放劉青同志！

同時，在此我們向全國人民呼籲：爲健全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共同作出不懈的努力！

爲維護我國神聖的公民權利和憲法的尊嚴共同作出不懈的努力！

原北京《四五論壇》編輯部　　原長沙《民　聲》編輯部
青　島《海　浪　花》編輯部　　原長沙《春　雷》編輯部
武　漢《鐘　　聲》編輯部　　廣東韶關《庶聲》編輯部
杭　州《四五》雜誌編輯部　　廣州《人民之路》編輯部

長　沙《理想通訊》編輯部　　廣　州《浪　花》編輯部
長　沙《共和報》編輯部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一日

原是一張傳單，在北京街頭派發

徐文立

當務之急

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這個時期的當務之急，是經過徹底的社會變革，實現四個現代化。不變不强，小變小强，大變才能眞富强。小改小革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一時的運動、指示和文件只管暫時管不了長遠。這已被建國二十九年的實踐所証明。

因此，從「人心思治」發展成的「人心思變」已經成爲我國政治生活中最顯著的特徵之一。

那麼，應當怎變呢？

徹底的社會變革必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雙管齊下，同時下手。以生產關係的變革爲基礎，同時進行相應的上層建築的變革。儘管，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但目前我們要特別注重的是，經濟是政治的基礎這一條馬列主義的原理。毛澤東同志在全國革命勝利的前夕，曾特別告誡全黨：「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脚，我們就會要失敗。」

這些告誡對于我們這一代關切祖國命運的年青人，仍然是多麼有益的啊！

變革的方針應是堅決、徹底、愼重、穩妥。

凡是變革中不得不涉及對偉大導師毛澤東同志和近卅年建國經驗和教訓進行正確評價的時候，即歷史地、辯証地、唯物地評價的時候，更要極穩妥，極愼重，以防「四人幫」的餘孽借口搗亂，在全國人民中間引起不允許的思想混亂。因爲我國要在本世

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並打算加快這種步伐，就不但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而且需要一個安定團結的國內環境。在這方面，現在一些民間的有識之士，已經以極大的勇氣和智慧爲全國人民作出了很好的典範，是令人可敬可佩的。君不見：神州大地藏龍卧虎，中華民族人才輩出。

中國人民要進步，可愛的祖國要富强，這是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的歷史潮流。今天的偉大變革是偉大四五民主運動的繼續和發展。

日益成熟的中國人民在偉大的四五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力量、勇敢、智慧和獻身精神，都將更加激勵全國人民去爭取人民的民主，人民的自由，人民的文化，人民的科學，爭取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中國。這種美好願望和理想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夠實現。

偉大的四五精神、光照千秋、世代留芳！

偉大的四五民主運動萬歲！

原載北京《四五論壇》創刊號(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徐文立

從周恩來晚年遭遇看徹底的社會變革的必要性

用盡人世間最崇高、最美好的言詞，也表達不盡人民對敬愛的周總理的崇敬之情。

周恩來的高尚品格如同他生前最喜愛的馬蹄蓮、百合花一樣，氣質高雅，潔白無瑕。他在長期革命生涯中形成的超人精力、智慧和才能，有口皆碑，舉世公認。年復一年、日復一日，人們一次再次地無限深情地仰慕他、追悼他，靜思神往。在回憶、思考中，人們又情不自禁地要問：

周恩來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政協主席，日理萬機，掌管全國，德高望重，風靡天下；位不可謂不高，權不可謂不大，可是——

爲什麼像周恩來這樣偉大的人物，也無法在四害橫行的日子裡，力挽狂瀾，救四化於旦夕，挽國民經濟於崩潰之邊緣；

爲什麼像周恩來這樣偉大的人物，也無法在四害橫行的日子裡，救元師以生存，拯副總理於非命；

爲什麼像周恩來這樣偉大的人物，也無法在四害橫行的日子裡，幸免陷害毒手，含恨而悲壯地死去。

……

這嚴峻的歷史事實引人們沉思！讓人們震醒！

周恩來的悲壯之死，導致出了一場震驚中外的"四五運動"。偉大的運動給中國青年和中國人民上了一堂最生動最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課。她告訴人們：

在古老而封建的國土上，不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怎麼可能有眞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不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階段，怎

麼談得上社會主義的高速度發展的國民經濟。

在生產關係中不注入民主的精神，相反，任憑小農思想佔上風的人長期把持各級領導崗位，任憑家長作風盛行，長官意志猖獗，怎麼能不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怎麼能有現代化的大生產，怎麼能建成現代化的國家。

在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這上下兩院始終行同虛設，只是起着橡皮圖章的作用，特別是廣大人民羣衆沒有起碼的民主權利的國家裡，怎能及時糾正舵手的偏航，怎能有效制止野心家、陰謀家的篡政奪權，怎能徹底免除官僚主義滋生，怎能防止忠良受誣，黎民遭殃！

中國的青年，中國的人民不願再看到偉大的周恩來晚年的遭遇在中國重演。

這就是這堂政治經濟學課的中心內容：徹底的社會變革。（論略）

讓我們尊重客觀的經濟規律，迅猛地發展生產力，提高整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科學文化水平，讓人民自己去冲破舊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外壳。與此同時，讓我們高舉民主的旗幟，經過人民自己的鬥爭，促成徹底的、深刻的、穩步的社會革命，改革上層建築，即改革國家體制；改革經濟基礎，即改革生產關係；向現代化中國推進，以告慰周恩來同志的忠魂，這就是我們在周恩來逝世三周年的紀念。

周恩來同志永垂不朽！

原載北京《四五論壇》第三期（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

徐文立

中國當代社會變革之淺探

中國社會經歷了幾千年的興衰沉浮，現在第一次眞正起步向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挺進了。這種起步可以追溯到康有爲、梁啟超發起的“戊戌變法”。九十年前，即一八八八年，康有爲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言變法事，希圖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可惜，這良好的願望至今在我國沒有眞正實現。一個現代化的中國的實現，是我國先進人物和億萬人民夢寐以求的，也是世界進步人類對中國人民的殷切希望。

今天，提出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受到舉國上下的一致贊同，這是現實，是毫無疑問的。

可是在如何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道路上却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政治主張，甚至存在着根本對立的政治主張。

我們認爲，國內外現代化國家的發展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進行徹底的社會變革，才有可能實現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的運動，準確的提法，應該叫作變革運動。倡導民主、健全法制都不過是爲變革而必須的手段和條件，問題的實質是變革。

那麼，變革什麼呢？從經濟上說，它是變革我國二十九年來，那些違背客觀的經濟規律的經濟政策。即把競爭、算帳、科學管理和科學技術，這些發展生產力的基本要素，貫徹到我國經濟生產的各個環節中去；工業生產的專業化協作，農業生產的全部機械化，農、副、工的方向，農村的逐步城市化，從根本上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通過加强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路綫、方針、政策的領導，走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向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過渡，最大限度地克服和防止兩極分化，克服和防止人

爲地擴大三大差別，克服和防止大量的農民破產、工人失業的現象，以及破產農民湧向城市的現象的出現；引進外國資本、科學技術和廉價的機械設備；……

從政治上說，確立四權分立的體制，即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黨權四權分立；眞正實現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作爲我國政治生活中，最高權力機構的地位；中國共產黨逐步得到改革，還黨的本來面目，結束黨代替一切的現狀；健全和完備法制，使之成爲社會穩定、經濟持續繁榮的基石；取消終身幹部制，代之以選擧制；修改憲法，保障人民眞正有權監督和管理自己的國家，成爲國家的主人；國家武裝力量逐步實現以職業軍人爲主體的建制，聽命於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儘管這次社會變革的深刻性、徹底性，都將超過中國社會所經歷過的歷次革命運動，可是它畢竟只是在經濟上補工業革命的課，在政治上補民主革命的課。所以，它完全可能在沒有全國範圍內的激烈的對抗（或準對抗）的情況下，完成這場社會變革。當然不可否認這場社會變革會在局部範圍內，短暫的時間內，發生某些對抗和準對抗的情況。更不可否認，當現代化的社會在它孕育的過程中，在她漸進地產生的過程中，就如同一個新生兒在孕育直至分娩過程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陣痛、汚穢和流血。但變革畢竟是和平地進行着。當然，也只有完成了當今的變革運動，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消除現在的陣痛和流血，除清汚穢。

和平地完成變革的可能性如次：

1. 全國人民包括大多數可能成爲阻力的某些既得利益者，都强烈希望自己的國家繁榮昌盛起來。全國人民都會在變革中很快感受到給自身帶來的巨大好處。再鑒於，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已經使全國人民不希望在變革中出現極端民主化、無政府主義和全面內戰，開始學會正確使用民主這個手段，開始認識健全法制的必要，特別希望在既安定團結，又生動活潑的政治環境中，完成變革，實現現代化。這種意志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2. 久經考驗的老一輩的革命家和立志改革的務實的經濟專家，已經經過黨的三中全會成爲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核心力量。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是久經考驗的黨，有光榮的鬥爭歷史，在中

國人民中間享有崇高的不可動搖的威望，經過自身的和全國人民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民主的健全、使命的明確、結構上的變化，是一定能領導全國人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現在任何人妄想建立一個新的政黨來替代它，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完全錯誤的。當然，這又不等於要把中國這個本來是一個多元化的國家硬統成一個一元化的國家。

3. 全世界的進步人類和除蘇聯以外的主要的經濟大國，以及台灣同胞都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使得任何政治勢力和任何個人想把必要的社會變革，現代化的進程，再次變成一場空前的浩劫，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都是不可能的。

4. 隨着客觀經濟規律起着巨大的根本性的作用，隨着體制變革的循序漸進，一切想成爲抗拒變革的勢力，都是寡不敵衆的，自然要被人民和歷史所淘汰的。儘管這批勢力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由於改革派在中共中央佔據主導地位，中國人民要求民主的願望越來越强烈的情況下，對他們所產生的壓力必然越來越大的，他們的反抗是無力的、局部、暫時的。

一切立志於社會變革的同志們，拋棄那些陳腐了的理論，追求眞理，探索正確的道路吧。

原載北京《四五論壇》第四期(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徐文立

不公正的判決

——我們對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魏京生一案的看法

魏京生、傅月華二案終於開庭審理了，這是我國司法部門決心以法理案的可喜的一步。

但是，十分遺憾，魏京生案的開庭審理是在既不事先通告，當日也無公告的情況下進行的。大家都知道，自從人大五屆二次會議頒佈新刑法以來，我國司法工作就進入了新刑法的試行階段，恢復了開庭審理，事先公告等形式。可是，這些對民刊「探索」主編魏京生一案的審理却出了例外，同案的當事人路林未能出庭，各民辦刊物的記者也沒有被「組織」在旁聽席內。難道怕他們像洪水猛獸一樣干擾法庭審理的正常進行嗎？這顯然是荒唐的。高爾基的名著「母親」的讀者都會記得，書中對於當時法庭審判的描述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中描寫工人對不允許親屬以外的人旁聽提出抗議，足以使人感到與我們這裏有選擇地組織旁聽，甚至親屬都不得入庭的作法形成有趣的對照，社會主義國家公開審判的情況本來就很少，人們從生活中和文學作品中對資本主義法庭却並非毫無了解。我們的據說比資產階級法庭公正千百倍的法庭怎麼連知情人都竟也不能到場呢？當各民刊記者聞訊趕到現場，爲甚麼也被傳達室的「無可奉告」拒之門外呢？這不能不說是咄咄怪事！以至於，逼得他們不得不公佈根據記錄整理的「開庭審判」的全部材料。

我國報業史上曾記載過一次清末時期轟動中外的蘇報案，那次審理雖致鄒容於死（鄒直罵清帝，被判二年，憂死於牢），也

還沒有把知情人和民刊記者拒之門外。「中法」此次開庭竟然如此疏忽，不能不說是一大漏洞。

言歸正傳。我們認爲，魏京生一案還未經法庭正式審理，被告已被剃成光頭，最後判決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不可謂不「嚴正」，但不公正。所以，我們不得不說幾句話。

可是，有人警告在先，又使人不得不怯步矣！因爲，公然爲他（指魏）辯解，「就難免有」跟魏京生抱有相同目的「之嫌」。看來，難怪魏京生不找律師或找不到辯護律師了。

好在警告之前還有這麼幾句：「我國憲法保障廣大人民的民主權利，人民有權對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評，人民政府歡迎廣大人民的批評，而且勇於進行自我批評。」就是嘛！如果任何一級法庭對被告人的判決都不容許任何人爲他辯解，那麼，哪裏還有甚麼社會主義監督社會公僕這一說呢?!

還好在，我們是在去年十二月底就被「金生」（即魏京生）說成是傳達中央精神的人。（見金生「第五個現代化」。其實「當務之急」一文發表在前，鄧副主席講話披露在後，我們草芥小民如何事先知道！）

更好在，因爲我們三月中旬曾就形勢的看法私下與「探索」發生過爭論，三月二十八日又發表了一篇與「探索」三月二十五日文章商榷的文章，不想魏京生三月二十九日就被捕了，因而在不少青年那兒，我們是投石下井者。

好了，又擺了這麼多題外的話，總該心安理得地談正題了吧？嘖！無奈想說點心裏話就得這麼囉嚕！譬如，十月十八日發表在民主牆上的「對『法律』的宣判」的作者就必須再三强調與魏京生從不相識——怕「株連」啊！

現僅就「人民日報」披露的魏案的情況，評述如下：

一、我們認爲魏京生犯有洩露軍事情況的錯誤，並不構成向外國人提供絕密軍事情報的罪行。

1．沒有充分的法律依據能證明，魏京生向外國人洩露的軍事情況屬於絕密軍事情報。如果戰事已發四天，有關指揮人員、士兵數量、傷亡人數，還算絕密軍事情報，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嗎？請法官不要怒視，當今的世界是電子——衛星——計算機的時代。若僞稱這些軍事情況爲絕密軍事情報，是聳人聽聞。法律判決是不能靠鼓動感情爲依據的。

同時，人們還注意到，法庭並未證實，魏洩露的軍事情況是否屬實。

2．沒有證據證明魏京生是「竊取，刺探」這些情報的罪犯，魏是一個工人，雖是司、局級幹部的子弟，但父子倆均不在軍事機關供職，沒有竊取，只是聽說。那麼，聽誰說的呢？誰說的誰應該首先承當法律責任。聽說的能稱刺探嗎？顯然不能。

3．「供給情報」構成犯罪。經過法庭解釋，是間接供給了敵人。但法庭並沒有提供證據，說明此外國人將此情報給我們的敵人，據說倒是這位外國人將此情報的錄音供給了我們的人。因而，魏京生並沒有構成向敵人「間接供給」情報的實際罪行。事實上，有罪的是這位「刺探」情報的外國人。

4．從報導中可以看到，這位神秘的外國人故意不讓魏把軍事情況寫在紙上，而要魏口述，便於他錄音。這位外國人何許人也!?這些疑點，難道不值得每個正直的中國人，對這位神秘的外國人的身份、動機追查一下嗎??難道不值得一些幼稚的年青人提高必要的警惕嗎？

可是法庭不但不追究那位神秘的外國人的罪責，甚至不敢提及那位神秘的外國人的姓名、國籍，這樣一個刺探我國軍事情報的外國人，該當何罪?!

可是「旁聽記」在行文上把「缺錢」的對話（「缺錢」是民辦刊物只得到憲法保障，而得不到物質保障的普遍的實際情況）緊緊地接着有關自衛反擊戰況的談話後面，企圖給人一種魏是用「情報」換取「經費」的印象。可惜法庭並沒有提供這方面的證據。「旁聽記」的作者這種滑頭耍的並不好。

儘管如此，魏京生把軍事情況擅自透露給外國人是完全錯誤的，據我們所知，他這種做法的原因在於，他反對我國在中越邊境上的自衛反擊戰，即主要是出於政治原因。

我們認爲魏京生等人，不加分析地，籠統地反對中越邊界自衛反擊戰是錯誤的。如果，不諱言地說，中越邊界自衛反擊戰是

有救援波爾布特政權的目的，但主要的是爲了保證我國邊境的安寧和人民的正常生活、支援柬埔寨人民反對越南侵略的正義鬥爭、制止越南成爲「亞洲的古巴」，因而是正義的。儘管如此，我們也不同意無條件地支援波爾布特政權。波爾布特之流取得政權後，成百萬的屠殺無辜的人民羣衆——難道是資產階級和親屬或應該屠殺嗎？——和幾十萬華僑，是「四人幫」式的人物，比「四人幫」還「四人幫」，難道我們就因爲他們頂着共產黨的招牌就支援它嗎?!要是這樣盲目，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不是也不應該反對嗎?!

然而越軍大舉侵柬，用刺刀建立起一個傀儡政權，使局勢起了根本性的變化，應該看到，這是國際公正輿論的一致看法。所以在我國邊界也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在柬埔寨民族危亡之際，波爾布特倘能爲維護民族利益而戰，爲人民利益而戰，我們不應該放棄自己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

對此問題，魏京生完全可以保留自己的不同政見，但不應該隨意向外國人洩露軍事情況，以致犯下洩露軍事情況的錯誤。

二、我們認爲魏京生在「探索」上發表的許多觀點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是違背我國現行憲法的，但基本上又屬於思想認識上的問題。

1．由魏京生主編的「探索」簡單地把「四人幫」封建專制主義當成科學社會主義來批，把體制的弊病造成的官僚、特權當成社會主義制度固有的問題來反。

「探索」所採取的這種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態度是十分輕率的，不負責任的。

但是，違憲不等於犯法。尤其特別值得我們深思的是，魏京生等人都是黨的幹部的子弟，都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青年工人，爲甚麼會對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的根本原則抱有如此對立的態度呢？

難道不是因爲我國卅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並沒有帶來高速度發展的生產力嗎？

難道不是因爲林彪「四人幫」那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假社會主義給人們所帶來的錯覺嗎？

難道不是因爲我國社會中至今還大量存在着官僚特權的事實嗎？

難道不是因爲這些年來，並沒有對青年進行令人信服的思想教育嗎?(況且，二十多歲的年青人對於五十年代初的「保守國家機密暫行條例」和「懲治反革命條例」知之甚少。也不知道，明年一月一日新刑法生效後，那些五十年代，人們知之甚少的法規、條例還具有法律效力嗎?!)

據我們所知，原「探索」的成員，包括魏京生，僅僅五個人，他們所從事的編印、出售、散發、張貼的「探索」，不過是他們思想活動的一種延長。應當指出，對於一個徹底的思想家來說，只要認爲某種社會制度不合理，就會認爲應當改革它或推翻它，但只要沒有着手組織起義，訴諸武力，只是組織罷工、遊行都不能構成犯法行爲。了解一點國際共運史的人，都應該懂得這一點，所以對「探索」也應該謹愼對待，如果因言治罪，至少同「探索」是一樣的輕率。

再者，僅僅只是一種錯誤認識的延長，並不構成以反革命爲目的的行爲，就要治重罪，那麼，近來我國思想界新聞界法律界的人士所共同呼籲，人大五屆二次會議也再次確認的取消「思想犯」思想言論不能治罪的原則還有沒有法律效力?!

如果對思想認識有錯誤的魏京生就要判十五年的話，那麼，罪大惡極的「四人幫」不應該判一千五百年嗎？別的罪惡且不提，僅僅「四五事件一案」他們操縱指揮陷害鄧小平同志，殘酷血腥地鎮壓無數革命青年，判個死刑也不過份！（天安門事件中到底有沒有人被打死，至今是個謎，難道眞要成爲燭光斧影，千古之謎嗎？）

巴基斯坦前總理布托，僅僅因爲謀殺案就判了絞刑，可惜對「四人幫」還沒有正式開庭審判，人們就已經知道，不判死刑了，其實待司法部門獨立審判，夠死罪的就判死罪，人大常委會再提出政治犯可以赦免死刑，不更好一點嗎？

相比之下，法庭對於作爲民刊「探索」的主編魏京生如此嚴正，顯然已遠遠超出了他的案件本身所原有的意義。……

綜上所述，依據魏京生一案的事實，與已知「四人幫」不判死刑相較，判十五年是大大的重判了。這種判決是不公正的。其實，判個教育釋放也就足矣了！以上意見僅供同志們批評，北京市司法部門參考。

同志們：

中國人民再不是愚不可及的了，

中國青年是覺悟的，希望就在他們身上。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寫
十月廿三日轉貼於民主牆

轉載自北京《四五論壇》增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徐文立

時局和我們的認識

近來，局勢在變化，社會的各種因素在發生複雜的相互作用。

人們還記得，不久前有一股「左」的潮流，那時有人曾放出「五胡亂華」的空氣。結果，這股潮流在鬥爭中敗下陣去。現在，人民民主運動再次面臨極其困難的局面，而且我們是處在更不利的地位上。

同時，「人民日報」接連發表了白樺同志的講話和郭羅基同志的文章，又標誌着民主潮流發展的趨勢。自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被提出來，藝術家們走過了二十多年的曲折路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們的筆才能夠比較自由地觸及生活。令人高興的是，有的同志從曲折的經歷中得到更多一點的啓示，他們大聲疾呼：藝術與政治在目前環境中客觀存在的密切聯繫，沒有政治領域裏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不行的。由此，人們自然地希望看到我國的政治家們表現出他們應有的洞察力和風度。

社會固然複雜，不過只要冷靜下來，只要講道理，就可以認識事物的內在的、客觀的聯繫，就可以進行分析。

我們依靠人民的理智和判斷。

眞理是不可抗拒的。我們只服從眞理。

一、無政府主義，還是無產階級民主主義？

我們認爲，官僚主義是我們社會的嚴重的、致命的威脅，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障礙。

因此，我們的同志走到了一起，研究社會的現狀，探索它的發展規律，並把我們的見解直率地告訴人民，與人民一起站在官

僚主義的對面。我們知道，普列漢諾夫這樣講過：

「如果說害怕正規眞理的思想家不好，那麼看到眞理而害怕把他所看到的告訴世界的那種人就更壞。而最壞的莫過於那些因考慮到某種實際利益而隱藏自己的哲學信念的人。」

然而，據說我們搞的是無政府主義。

甚麼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有兩個著名的代表人物，一個是法國人蒲魯東，一個是俄國人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基本觀點，是反對一切國家，認爲國家是社會弊病的主要禍根。同時，它反對工人階級參加政治，也反對工人國家。巴枯寧宣稱，馬克思主義者要建立的國家，「是由眞正的或冒牌的學者所組成的一個新的人數很少的貴族階級非常專制地管理人民羣衆」。這種管理「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難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它儘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將是實實在在的專政」。他主張「自由的或者無政府狀態，即工人羣衆自下而上的自由組織，」方式是少數人搞密謀活動，在適當的時機一舉消滅國家。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無政府主義者這樣把事情本末倒置，它認爲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結果之一，「將是稱爲國家的政治組織逐步消亡和最後消失」，然而，「由於無產階級在爲摧毀舊社會而鬥爭的時期，還是在舊社會的基礎上進行活動的，因此，還使自己的運動採取多少同舊社會相適應的政治形式，……它還要使用一些在它獲得解放以後將會失去意義的手段」（「馬恩選集」三～□□□）。恩格斯强調指出，「工人羣衆決不會讓人叫自己相信：他們國內的公共的事情並不同時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他們按本性來說是有政治頭腦的；任何要他們放棄政治的人都終究會被他們所唾棄。」（同上，四～四〇一）

馬克思主義者同無政府主義者爭論的另一點也同樣重要。巴枯寧認爲，馬克思主義者的心願和目的，「是從經濟上和政治上教育人民，」而馬克思則憤怒地認爲這是歪曲，認爲這只是「咖啡館裏的政客」的想法。馬克思對待巴黎公社的態度清楚地表明，甚麼是馬克思的革命家的氣度，甚麼是政客的品行。對此，列寧作過深刻的說明：「馬克思觀察世界歷史，是從正在創造歷史、但無法事先絕對準確地估計勝利機會的那些人們的觀點出發的

，而不是從瞎說『本來容易預察到……本來就用不着拿起……』等等的庸俗知識分子的觀點出發的。」

中國的事情是複雜的，靠文章、講話和呼籲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辦好中國的事情，首先必須發揮勞動者的政治本能。那種把社會分工固定下來，領導人壟斷政治事務，勞動者埋頭生產，正是把事情搞得一團糟的癥結所在。應該看到，四人幫一類官僚新貴們大肆批判所謂「埋頭拉車」，把政治教條硬套在生產上以代替客觀的經濟規律，既壓制了勞動者的政治本能，也搞亂了生產過程，弄得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對於自己的專業倒像是「外行」，要由官僚們來指點怎樣操作，怎樣種田和怎樣設計、寫作，簡直荒謬到極點。因此，切不可抓住表面現象大做文章，走向另一個極端，以爲勞動者還是不搞政治爲好，從而使官僚頑症愈益惡化。

無產階級民主主義比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處於更高的階段上。馬克思在「資本論」裏講過，勞動者只管自己的事情是手工業智慧的頂峯。資本主義方式就已經是這樣「頂峯」的否定。無政府主義則從一開始就是破產的手工業者思想意識，不僅不懂社會主義民主，也反對工人參與政治。我們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也過早地中斷了，無產階級民主處於嚴重的先天不足的的狀態。因此，人民民主運動本身與無政府主義是根本對立的，同時，它也堅決反對那種從手工業者或小農經濟的立場來看待人民民主，抓住個別無組織、無紀律行爲的發生就亂扣「無政府主義」帽子的錯誤態度——這種態度本身，倒是眞的帶有幾分無政府主義者反對工人參與政治的味道。

人民民主運動正在探索自己的道路。隨着它的健康、深入的發展，與它混雜在一起的其它行爲將被排除。

二、安定團結的局面與階級鬥爭的形勢

粉碎四人幫，特別是粉碎他們的幫派體系以後，國內安定下來了，黨和政府與人民之間也接近起來，初步形成了安定團結的局面，全世界都看到了這一點。

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華國鋒同志代表政府宣佈，在我國

，不僅地主階級、富農階級，而且資本家階級，都已經消滅，階級鬥爭已經不是我國社會目前的主要矛盾。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客觀實際的，說出了在人民中普遍存在的良好願望，對安定團結局面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不過，人們從來也不可能達到絕對眞理的境界，我們也從來不認爲領導同志的認識就是社會意識水平的極限。應當看到，目前官方對於我國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狀況的理論說明還只是剛剛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同時也還伴隨着根深蒂固的爲領導人的觀點作注解、做說明的習慣做法。相反「中國青年報」十一月三日評論員文章暗示說，辦民刊的同志們才是「僅僅看到某些表面現象，就把一時的感想當作高明的理論，匆匆拿到社會上去張揚」。這種互相指責倒是十分有意思，那麼，我們就來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它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生產關係的產物，對於階級的分析，不可以離開這個根本立場。

一九四九年，我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三十年來，工人在總人口中佔的比重由不到１％增長到約佔10％，同時，資本家階級由於失去了生產資料，已經逐步消亡，不再作爲一個階級而存在。

階級狀況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然而，我國社會尚未脫離與階級的存在相聯繫的那個生產發展的歷史階段，更確切地說，這個脫離過程還只是剛剛開始，因爲它不是由生產資料的佔有狀況，而是由生產發展水平所最後決定的。我國農業人口比重很大，勞動生產率很低，工業勞動生產力也不高，爲完成任務而加班加點的現象相當普遍。這種客觀存在使一切按照書本來規定階級狀況的企圖成爲美麗的空話。

恩格斯指出，「當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餘，因而勞動還佔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爲階級。在這個完全委身於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於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反杜林論」）。

不錯，這也是從書本上來的，但是它反映着客觀存在的經濟必然性，是我國千千萬萬的勞動者所經歷的、豐富的社會生活現象的本質所在。它與一般習慣地從公有制到認爲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社會，進而決不承認會產生階級的僵化的流俗見解完全不同。在它面前，人們不應該把眼光避開，而對於懂得一點理論的人來說，就不能不考慮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普列漢諾的那些話——向社會隱瞞自己已經得到的見解應當受到嚴厲的譴責。

資本家階級不存在了，一個特殊的階級與其他各種勞動者階級相對立而存在的合理性或必然性却尚未消失。社會分工的規律在以一種新的形勢發揮作用。於是，直接或間接地掌握全部生產資料的黨和國家工作人員、管理人員，他們中間發生着官僚主義傾向，他們中間的官僚主義者正在組織成爲階層和階級。順便指出，這是國際性的現象，表現着作用形式不同却本質相同的經濟必然性，尤其在以蘇聯體制爲模式建立起來的國家中表現得最爲明顯。憤怒出詩人，調查得眞知。人們可以再三地讀一讀劉賓雁同志的「人妖之間」。如果認爲，問題只是在於江青、聶元梓、王守信之類的壞女人，王洪文、陳阿大、張鐵生之流的壞男人，不是太天眞了嗎？

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形成和存在狀況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們的探討還是膚淺的、初步的，然而已經達到的程度使我們確信，官僚主義是目前社會所患的嚴重病症，它是一種社會力量，只能以社會的力量才能對它進行有力的鬥爭。

民刊，在目前基本上只是思想理論領域中的力量，它很少，以它的力量向官僚主義發動進攻還遠遠不可能。換句話說，對於我們社會的致命威脅——官僚主義，民刊只是它的潛在威脅。不過，民刊對於官僚主義的認識所達到的水平，特別是他們直言不諱地把這種認識向社會公佈出來，使它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它們本身的實際力量。另一方面，民刊基於自己的認識，不僅對官僚們屬於社會之上的習慣——這是習慣，所以不時地在這裏或那裏表現出來，並反過來使對它的反抗變成羣衆不大容易接受的舉動一異常敏感，而且急於取得社會上一部分最積極、最敏感的進步力量（不限於青年！）的理解和支持，它們的活動不能不具有相當

的政治性質。這種情況，既不是由民刊本身是否喜歡所決定的，也不是由國家領導人是否厭惡所能改變的，它是社會本身矛盾衝突的直接體現。況且，普通公民們在我們的社會裏只有少得可憐的一點知情權，民刊在行動中很大程度上不能充分了解整個局勢，不能避免盲目性。當他們被迫對壓力做出反應的時候，它們對官僚主義的憎惡心理和它們本身的弱點和片面性、局限性交織在一起而表現出來。佛·梅林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每次打人從不怎麼猶豫，但每次挨打也從不叫苦。」我們的民刊目前在輿論力量、行動經驗上都遠遠不如這兩位老人，更確切地說，我們的每一次招架和還手都實際構成我們對本身生存的嚴峻考驗。可以自慰的是，叫苦對於我們來說還是陌生的。

如果說，我們擾亂了安定團結的局面，違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那麼，我們怎麼辦才好呢？我們了解到，現在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程度比大躍進時期嚴重得多，但調整的行動却比三年調整時期緩慢得多，需要的產品往往供不應求，不對路的產品却大量積壓，並且還在計劃內繼續生產，造成實際上的通貨膨脹，以致於在經濟壓力下不得不以降低一部分勞動者的生活水平爲代價而提高物價……另一方面，大批的技術力量學非所用，大批的人才不得發揮，人民的實際利益問題能夠解決的得不到解決……青島的孫本同志的話激起我們强烈的共鳴：

「有人可以先天下之樂而樂，我們却連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三、在歷史提供的機會面前

在社會內部矛盾的沉重壓力下，三年多以前，終於有了一次以天安門事件爲代表的大規模的爆發。四人幫被粉碎以後，社會表面出現了一些生氣，有些人不再沉默了。

可是，馬上又有些人認爲這些不甘於沉默的人們走得太遠了。某些人在民主牆上憤怒地批語：不理你們就是了！言外之意，只要理會起來可以把這些宣傳「異端」的人們一掃而光之勢。

的確，我們這些人本來就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人們應該注意的是，對於歷史開不得玩笑。

一九五六年十月，波蘭和匈牙利先後出現了反對官僚專制統治的羣衆運動。在匈牙利，事情升級爲起義，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寫下了特殊的一頁。起義後不到一個月，十一月二十日，取代拉科西——格羅而上台的現領導人卡達爾發表談話，認爲：「....裴多菲俱樂部的作家、匈牙利共產黨員、記者、學生和青年們，成千的工人、農民以及由於揑造的指控而被逮捕的老戰士們都站在最前列來反對拉科西的專制和冒險政策。我們由於你們在武裝鬥爭中的良好表現而感到驕傲。在這次起義中你們表現了眞正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對於社會主義的忠誠。」十一月一日，我國政府也發表聲明，注意到波、匈人民所提出的加强民主、獨立和平等以及提高人民物質福利的要求。顯然，後來人們把匈牙利起義說成是反革命事件，我國一九七六年發生四五運動時又稱爲「中國的匈牙利事件」，都不是偶然的。

一九六八年，又有著名的「布拉格之春」。當時，要求改革的人們在「兩千字」宣言中指出，不應幻想那些改革思想是因爲包含眞理才得到傳播的。「舊領導的軟弱無力，却是這些思想能夠佔上風的決定性因素。在經過了二十年沒有受到任何人反對的統治之後，這個領導顯然必定是疲蹋不堪了。那個制度的基礎和意識形態中所包含的全部缺點，顯然已經完全熟透了。因此，讓我們不要過高地估計作家們和學生們所提出的批評的重要意義。經濟是社會變革的根源，……並不是眞理壓倒一切，而是別的東西都已耗盡，剩下的就只有眞理了。沒有舉國歡慶的理由，只能說有了一綫新的希望。」對於一般正直的知識分子來說，「眞理誠然是一個崇高的字眼，然而更是一樁崇高的業績。」（黑格爾語）他們的文字中出現如此深沉的筆調，顯然是意味深長的。

蘇軍入侵前二十天，七月三十一日，布拉格「記者報」的評論指出，「我們引進了清算官僚階級（一個由斯大林式社會主義引進國際舞台的階級）的絕對權力的幽靈。客觀地說，這是每個國家都要達到的一個歷史階段。但是，即使官僚們還沒有發展到成爲一個階級的地步，在涉及運用權力的方面，官僚政治仍會表現出它的種種特點。它會採取預防性措施以保衞自己，它將拼命這樣做，直至滅亡。」「我們正在接近這一點，可能我們正在朝

着打破這個幾乎是世襲的階級的權力壟斷這一方向前進，而這個階級和它在外國的同樣階級却在共同腐化和共同利益方面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以上這些就是我們的罪狀。可是我們並沒有危及社會主義。恰恰相反，我們危及的是官僚政治，而這種官僚政治却正在全世界範圍內緩慢而又穩當地幹着埋葬社會主義的勾當。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實在很難希望官僚政治給予我們兄弟般的合作和同情。」最後的這個判斷很快地就被蘇聯軍隊用刺刀和坦克證實了。

與波、匈兩國相比，捷克斯洛伐克人以他們的比較充分的思想材料和以杜布切克爲首的中央改革派的決心顯示出自己的特點。不過，爲甚麼他們的動作在時間上遠遠落後於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呢？

有一種相當頑固的意識，把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提倡改革稱之爲「修正主義」，或者是「右傾」。這是非常荒唐的。連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資產階級人物愛·塔波爾斯基也看出了其中的奧妙。他寫道：「組成修正主義者隊伍的是一些對共產主義作出過長期和傑出貢獻的人。而且，具有思想熱情和犧牲精神的正是他們而不是教訓他們的新斯大林主義者，而這種思想熱情和犧牲精神是早期的共產主義信徒所特有的。當時信仰卡爾·馬克思的學說意味着遭受貧困和苦難，而不是享受今天那些有着清白人士檔案的正統共產黨人的總經理轉椅。」他認爲「眞正熱誠的修正主義者，都是那些願意赤手空拳和强大的敵人搏鬥，以便爲被出賣的信仰報仇雪恨和恢復一種有創見的信仰的純潔性的那些人，在捷克斯洛伐克比在鐵幕後面的其他大多數地方都要稀少。……同波蘭人及匈牙利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眞正的共產黨人大都沒有站到這場混戰的反對派立場上。他們肯定沒有像波、匈修正主義者那樣帶頭衝鋒陷陣。乍一看來，人們也許會誤爲這是對主義的忠誠，但這實際上却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主義運動內容貧乏和思想停滯的徵象。一個從捷克斯洛伐克逃亡出來的學生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只有在宗教信仰熱誠的地方，宗教改革才能成功：假如信仰宗教不過是一種走走形式的老習慣，就談不上甚麼改革。同樣，只有在共產黨人本身對共產主義抱批判

的態度，把它當做一個活生生的綱領看待的地方，共產主義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然而，我們對捷克人能夠說甚麼呢？我們的生產力很落後，封建意識和官僚習慣根深蒂固。經歷了二十多年曲折的道路，特別是文革期間的大動盪、大衝突，我國社會內部矛盾迫使人們去認識它的存在狀況，從中尋求出路。粉碎四人幫以後，要民主、反專制成爲社會中從上到下的不可遏制的潮流。我國領導人大多親身受過左傾路綫迫害之苦，廣大人民對於具有濃厚封建性的官僚主義更是深惡痛絕。這樣，徹底的改革就成爲可能的，而且我國的大國地位使我們處於某種比波匈捷南各國更優越的地位。

這是歷史爲人們提供的一個難得的機會。這是我國千百萬人在迫害與反抗的對立中以鮮血和生命的代價換來的機會。放棄這個機會，不僅可惜，簡直是罪過。

事情當然很不簡單。林彪、四人幫不是從天而降的怪物。「母親」中的青年革命者巴威爾在法庭上這樣講：

「我必須聲明，在我們看來，專制制度並不是束縛我們國家的唯一鎖鏈，它只是我們必須從人民身上最先打掉的第一條鎖鏈……。」

我國人民掙脫了國民黨專制制度的鎖鏈以後僅僅十七年，一條新的專制鎖鏈就又鑄成了。白樺同志大聲問道：

「『四人幫』當道這一段歷史長達十年比抗日戰爭還要長，這一段歷史如此之奇特，我們還不應該思索一下爲甚麼嗎？」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內容是土地改革，從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農民的軍隊把國民黨趕到了一羣海島上。此後，逐步形成的林彪、四人幫的專制統治又被新的政治力量推翻了，然而，這個革命行動是在經濟瀕於崩潰的基礎上發生的。如果沒有生產方式的改革做爲它的經濟內容，即不僅改革經濟管理體制，而且，更重要的是適應生產力的性質，在恢復經濟、調整比例的基礎上探索使官僚專制成爲不可能的經濟體制，並與之相應地逐步使社會主義政治民主發展成熟起來，就無法保證不會再次出現災難性的浩劫。

誠然，我國再也經不起政治動亂了，舉國上下一致要求安定

團結。然而，被人們視爲「害羣之馬」的「少數人活動」的人民民主運動，非但不會動亂，相反，它發展起來足以成爲安定團結的有力因素。今天的人民民主運動，是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的繼續，也是社會主義民主在其中緩慢生長的過程。這就是民主運在國內外產生巨大影響的內在原因。

也許，我們本來用不着進行獨立的社會活動，本來應該在本單位的會議上講話，本來可以在官方報紙上發表文章……呵，那麼多好！可是，在一個本來患有嚴重的官僚主義病症的，具有嚴密組織的社會裏，能夠承担與官僚傾向作鬥爭的責任的主要是以自由結社方式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陳平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在單一農業經濟結構的基礎上，我國「社會體制不是一種網絡結構而是一種垂直系統。因之雖然政權極不穩定，但是經濟結構和社會體制却極穩定。外來資本主義也極難動搖中國傳統的經濟結構。」共產黨組織最初也是以自由結社爲組織方式，然而它也無法抗拒經濟結構以及蘇聯黨的巨大影響，逐步形成了另外的組織方式，而且在脫離了戰爭和地下狀態以後也沒有多大改變。所以，我國解放以後，社會體制仍以垂直系統爲特徵，似乎它是不可逆轉的。不過事物發展的辯證法是更不可抗拒的。現在，社會生產的經濟結構及其經濟體制的改革都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生產現代化的趨勢正在成爲新的不可逆轉的力量，現代文明迅速地進入我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在這種形勢下，以青年工人爲主體的民刊組織應運而生，難道是甚麼不可理解的事情嗎？「本來可以……」，是的，我們有功夫的時候想一想本來可以如何當然未嘗不可；面對已經出現的事物，我們的興趣是在於研究爲甚麼會出現和將會怎麼樣，並且，我們已經投身於運動，懂得自由結社對於社會的意義，我們將走下去，走到底。

我們非常重視中國共產黨人對於人民民主運動、對於社會體制的垂直系統和網絡結構的態度和行動。共產黨人都聲明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思想，那麼，就應該眞正懂得這個思想。本刊第十四期刊登的石樺生同志的文章指出，中國共產黨對待人民民主運動，正在重覆當年在美國的德國社會主義者的錯誤。在此，可以進一步指出，作爲執政黨這種錯誤所造成的惡劣後果將比那些德

國人更爲嚴重。

人民本身對於人民民主運動的態度和行動往往是間接地，然而是最終地起決定作用的。我們大都是一些年輕人，不大聰明，讀書大概遠遠不足「幾百本」，也不怎麼能幹。爲了民族的興旺發達，爲了祖國的繁榮昌盛，我們開始了以刊物宣傳爲主要內容的事業，以吸引更多的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一起爲祖國服務——對於個人，歷史總不是十分公正的；當我們看到許多刻苦努力，有獨立見解的同志天各一方，不得伸展自己的抱負，更感到迫切需要改革。

實際運動常常使人想起高爾基筆下的「母親」，她理解自己的孩子們，她知道，「他們希望有另一種生活，眞理和正義的生活。」爲此，「他們爲自己選定一條走向十字架的道路。」當然，這位母親還無法完全擺脫舊意識的影響，請聽，她是這樣說的：

「要是人們都不爲我主耶穌的榮耀去赴死，也就不會有我主耶穌了……。」

四、我們是出版商嗎？

事情往往在表面上看起來很奇怪：來自兩個完全不同方面的批評都認爲我們「右傾」……有人認爲，我們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背離了四項基本原則，擾亂了安定團結，違背了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甚至乾脆就是四人幫的餘孽等等，等等。

又有人認爲，我們已經從四五運動的旗幟下後退了，不如去搞改良，去學個冒死進諫的忠臣，因爲我們似乎已經成了「出版商」了。

老實說，後一種批評使我們很不安。我們的同志讀到這種批評時都感覺到一種嚴肅的歷史責任和明顯的推動力量。我們理解這種批評的含義，並爲我們民族有這樣的熱血青年而感到振奮。不過，我們不能完全同意這種批評。

我們是革命者，我們憎惡官僚主義，不過用不着總是把激烈的語言拿來顯示自己的革命。批判的世界觀是這樣一種東西，它的最無情的打擊可以用看上去相當溫和的形式，如巴羅所說，馬

克思「愈是深入所研究的這些關係的本質，他就愈能放棄指責和痛罵，並把宣傳他的思想轉爲談他所發現的那些事物的相互關係。」況且，眞正的革命者都知道，革命者的出現與革命時期的到來是有區別的。

社會在革命時期將解決平時發展漸漸積累起來的許多矛盾，各個社會階級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也將最顯著地表現出來。馬克思主義者稱這樣的時期爲「人類社會歷史中最有生氣、最重要、最本質、最具有決定性的關頭。」在舊制度下，革命形勢的形成意味着社會進入一種下層被統治羣衆不願意按老樣子生活下去，上層統治者也無法照舊施行統治的狀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表面上看起來，現在叫做社會主義革命，並且似是而非的是，多年來政治運動接連不斷。不過，確切地說，三十年來我們一直處在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其中充滿了曲折，同時在表面潮流的下面也深藏着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經濟傾向。既要革命，就要對革命形勢怎樣形成有清醒的估計。

新民主主義中斷以後，社會無法經過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走了一條更曲折的路。計劃方法同落後的生產力相結合，官僚集團壟斷了經濟的傾向逐漸增長，造成最初是隱蔽的、爾後公開化表面化的矛盾衝突，終於釀成了文革期間的全面內戰。社會各種力量互相鬥爭——它們的階級意識的水平不同，因而構成了複雜的場面。各勞動者階級由於其經濟政治地位的軟弱，基本上處於被動狀態，而一批官僚新貴以最具有封建專制性質的形式——這表明了矛盾的發展程度——實行了控制。但是這種控制本身非常虛弱，已經無法掩蓋社會矛盾的尖銳對抗性質。於是，革命臨近了。就在這時，身居雲南的陳爾晉同志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本能感覺到了這一點，他以他的著作熱情地迎接革命。在一九七六年前夕看來，即將來臨的革命不能不具有外部對抗的性質，因此，陳爾晉同志以嚴肅的態度考察了以武力推翻官僚新貴統治的問題。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成爲即將來臨的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具有對抗性的一次預演。人民用呼喊和鮮血宣告了舊階段的結束和新階段的開始。幸運的是，十月六日華國鋒、葉劍英等同志

的一次革命行動，中國避免了已經指日可待的全國大對抗、大流血的局面。

我們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從不同角度考察我們所經歷的發展過程，愈加使我們珍視目前的這個歷史性的機會，在社會主義關係的基礎上，社會革命將不再具有對抗性質，而在社會主義關係尚未成熟以前，就像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感覺到的那樣，對抗的局面總是潛在地存在的，歷史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誰也不會知道它會有多麼長。因此，人民的利益要求我們：一方面要積極行動，主動地進行探索和實踐，使人民盡可能地把機會掌握在自己手裏，另一方面，又要謹愼從事，注意把握目前社會中革命形勢的特徵，不拒絕實行改良。

我們還在準備革命，經濟的恢復需要時間，人民需要再認識，才能再實踐。在這個時候，最可貴的是安下心來做一點實際工作。

「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韓非子語）

「你要了解革命是甚麼嗎？稱它爲進步就是；你要了解進步是甚麼嗎？管它叫明天就是。明天一往直前地做它的工作，並且從今天起它已經開始做了。」（「悲慘世界」）

五、人民民主運動與警察

我們在活動中，同警察打交道恐怕是最多的了。據我們所知，公安部門對我們的關注恐怕也很可以說是最熱心者之一。在此，對所有這些與我們形影不離的公安工作同志，也要講幾句。

我們這些人大都是工人、學生，大都是年輕人。我們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在工作之餘，我們聚在一起探討社會問題，尋求眞理，力圖站得高些，看得遠些。

這並不是說，我們是甚麼英雄豪傑，而是說，對生活的不滿已經成爲現代人類發展的突出特徵，生產的社會性正在通過人們的獨立社會活動表現出來。

那麼，警察同志們爲甚麼不跳出自己的工作範圍的狹小圈子，用自己的而不是警察的眼光看一看社會呢？我們相信，已有不

少警察同志正在這樣做；我們希望更多的人能這樣做。

警察要爲公衆的安全服務，維持社會的秩序，不過社會在發展，在不同的階段上，會有不同的社會秩序。過去，人們在專制下生活，政治不安分分子很少，犯罪現象却在增多。現在社會呈現了生氣，雖然犯罪現象不會一下子消失（或者在一定時間內還會增多），突出的變化是出現了大批過去不多見的非官方組織的社會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撇開公安部門作爲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同樣存在官僚傾向不論，對於舊秩序的習慣也足以使警察們對新的社會活動產生本能的敵意，特別是當這種活動還剛剛開始，人們還在嘗試實行新的社會秩序，還在摸索，因而會有許多缺點、錯誤伴隨着個別敵意活動一起發生的時候，動用鎮銬的理由就似乎更爲充足。應當看到，這就是思想僵化在這個領域裏的具體體現。

在專制統治下，警察佔領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把公民及其團體的活動都置於自己勢力的控制之中，成爲專制制度的國家屬於社會之上的突出表現。警察和其他武裝力量對天安門運動的鎮壓，是執政黨內一個派系與全社會爲敵、摧毀社會主義民主的暴行，警察本身也深爲這種警察專制所害。一些社會勢力本能地或預先地把人民民主運動看作是潛在的或直接的敵人，是我們這個社會帶有某種警察色彩。一些警察則走得更遠——據我們所知，有些人並不把四五運動放在眼裏，繼續與人民民主運動作對。

我們堅決反對這種在歷史面前的不嚴肅的態度。誠然，社會主義民主在成長的過程中，不能不在這些社會的警察色彩的作用下曲折地前進，有時顯得軟弱，有時甚至被這些色彩所壓倒，但是，它畢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民意識到，並且理解了。時間證明，社會主義民主的生命力更强一些。要知道，眞理的探索者是多麼不願意與鎮銬打交道，他們的精力與他們的事業相比是多麼不夠，但是，大概還沒有甚麼探索者是害怕鎮銬的。

六、結束語

嚴峻的現實擺在我們面前，我們正視這個現實，依據對它的

分析，規定自己的行動。我們的言論、行動都是公開的，希望得到監督和批評。

在法制的範圍內，我們對生存有十分的把握。超出法制的範圍，人民民主還非常軟弱，無力制止對它的干涉。我們對人民，對前途抱着希望。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原載北京《四五論壇》第十五期
以《四五論壇》編輯部名義發表

徐文立

四五論壇召集人徐文立答記者問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日下午原《四五論壇》召集人徐文立與法國《世界報》記者雅各布先生的談話記錄：

余：歡迎雅各布先生來到我這裏。「世界報」在世界上是一家很有聲譽的報紙，記者先生能夠來到我這樣一個工人家裏來訪問，我很高興。我是中國一個普通的電工。或者說準確點，是個電燈匠。有些記者先生來訪問我之後，做了一些不太準確的報導，說我是個電器技師，或者是信號技師，不，我是個普通的電工。我們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强調工人農民是國家的主人。但非常奇怪的是，有些人對外國朋友到我這些普通工人家裏來訪問，以爲是大逆不道。中國要向現代化國家前進，必須同各國人民進行友好往來。作爲國家主人的工人和農民不能同外國人來往，還叫什麼主人？更可笑的是，現在參加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活躍份子，被某些人稱爲"外國反動勢力的代理人"。據我所知，這些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積極份子，多是熱誠的愛國者。他們其中有些人，是有條件出國的，但他們沒有走這條路。他們不想脫離開自己的祖國，而到外國去求學或找工作。他們是熱誠的愛國主義者。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振興這個國家。這場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絕不像「巴爾的摩太陽報」的帕克斯先生所說的那樣。這場民主運動裏沒有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外交官、記者等介入進來。也絕不像他所說的，有一些什麼商人、經紀人介入這場民主運動。這場民主運動主要是一場政治運動，不是搞經濟的。那些商人向我們做什麼買賣呀？我們沒有什麼買賣好做！我們有的是思想、是雜誌。所以，帕克斯先生所提供

的那個神話一般的東西是不值得一駁的。多年來，我們已不太使用“國際反動勢力”這一提法了。自從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就不提這個提法了。可是最近又提出來了。這顯然不是指的蘇聯，因爲我們稱蘇聯是霸權主義。那麼，是指誰呢？指卡特先生？是指戈德華特先生？還是指法國的德斯坦先生？還是指英國的撒切爾夫人？還是指英、美、法駐華使節和記者先生們？我們攪不清楚。所以，我們很難接受這一美妙的稱呼——說我們是“外國反動勢力的代理人”。如果不是出於一種政治需要，很難解釋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和魯迅先生都曾經被人罵過是拿盧布的。魯迅先生和中國共產黨當時就嚴厲地駁斥了這一點。但是沒想到，現在有些人怎麼又把這種稱呼加到我們年青一代的頭上？現在，就我們所觀察到的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情況看，倒是有那麼一些“親蘇份子”（找不到更合適的字眼，暫時給他們扣一頂帽子吧！當然，扣帽子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他們最典型不過的理論，就是提出來蘇聯現在對內政策都是正確的，只是對外政策不好。因爲他們沒法說蘇聯對外政策好。這次蘇聯公開入侵阿富汗，恐怕是給這種人的當頭一棒。如果對內是社會主義政策，怎麼會導致了對外的侵略政策呢？看來我們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有一些人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都不要了。打個比方，比如說一個人心是黑的，五臟都是壞的，但他却非常健康，這不是矛盾嗎？蘇聯是這種情況嗎？顯然不是，我們這些年輕人在經濟上是進行了一些政策，在這方面是有進步的。儘管這些都是在內政、外交遭到不斷失敗而被迫進行的改革，但我們還是肯定這一點的。因爲這種改革對蘇聯社會向現代化前進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他們却沒有改變對內實行“技術官僚”加“政治官僚”的統治。正是這種統治導致了對外的侵略活動。因爲國內人民沒有力量阻止這種對外的侵略活動。就我們知道的，美國在越南打仗時，國內的反戰情緒是很大的，對美國政府決定對戰爭的政策是起作用的。但蘇聯人民就沒有這種力量能表達出這一點，因爲蘇聯國內“技術官僚”加“政治官僚”對人民的統治和

壓制是非常厲害的。斯大林後期把技術提上來，進行了一次幹部隊伍的更新。但對於政治體制，却不允許進行一些改革，所以，現在蘇聯可以肆無忌憚地、在國內不可能顯示出任何反對力量的情況下對國外進行侵略。這樣很難說它在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政策。因爲不論哪一種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所主張的社會主義，還是現在"歐洲共產主義"理論家們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恐怕都是不可以對外攪侵略的。所以有一些被我稱之爲"親蘇份子"的人，他們所製造的所謂"蘇聯的對內政策是正確的"說法，只不過是想給自己在國內不允許人民有民主自由的權利的作法製造一些錯誤的理論罷了。或者等於說，我們對外政策不學蘇聯，而對內政策還是可以把蘇聯那一套政策全部搬來的。六十年代以前我們的這套體制基本上是從蘇聯學來的，我們可以在國內學他們的樣子。但是，誰能夠保證要像蘇聯那樣攪國內政策，將來强大起來就不會對外攪侵略呢？中國人民對蘇聯的國內政策是不滿意的。希望我們的高級領導同志在制定國內政策的時候，要考慮到中國人民的這種强烈願望。中國人民不但反對蘇聯對國外攪侵略，同時也反對他們在國內的不民主和獨裁。現在，我們從報紙上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共產黨要進行重要的組織建設，很强調要用中、青年一代替老一代。這點在報紙上看得很明顯了。看來中國的幹部很快就要進行這種更新。但是在進行這樣的一場工作當中，特別希望要考慮到全國人民的意願。不但要反對蘇聯的對外侵略政策，同時也要反對蘇聯對內政策中那些不民主的政策。我想談的問題就是這些。下面請雅各布先生提問題。

雅：好。下面有幾個問題。

徐：因爲我事先並不知道這些問題，所以我們隨便談。

雅：你是個電工，對不對？

徐：對。

雅：今年多大歲數？

徐：今年三十七歲。

雅：結了婚嗎？

：哈哈……孩子都七歲了。

：你是哪裏人？你的父母都是幹什麼的？是不是工人？他們是哪裏人？

：我是安徽人。我的老鄉裏有許多不“光彩”的人。像陳獨秀。最近被判刑的魏京生也是。我的父親是個醫生。祖父是一個一般的職員。我父親的祖父是清朝官僚，是個壞蛋。我小時聽說，他屠殺過太平天國起義軍。他是反人民的，是個武官，死在戰場上了。當時還隆重地紀念他，做了個假頭，眞頭沒有了，讓人家殺了。我的父親一九五二年去世，死於抗美援朝後期反細菌戰中。外電報導有不準的地方，有的說我四十幾歲，有的說我三十二歲。

：你是不是當過紅衛兵？

：沒有。我當過解放軍。我比較主張自學的道路。所以一九六三年高中畢業後，我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我當時可以上大學，我在學校裏功課是不錯的。

：請你談談當前中國民主運動的情況。

：自從魏京生被判刑和西單民主牆被移到月壇，目前可以說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已進入低潮。很多人對民主運動喪失了信心，覺得自己一片赤誠爲了國家，但却經常受到壓抑。從這種情況也可以看出，用壓制的方法對待社會主義民主運動，其社會效果並不好，容易失去民心的。現在看來，民刊大量減少；但也出了一些新的，像安陽的「新時代」、保定的「潮」、上海的「未名」。就是說，有些人低落下去了，而有些人又在興起。但是關心這場運動的人，却比直接參加這場運動的人要多得多，他們雖然不公開地讚揚和談論這些事情了，但從內心裏是深深感到這場運動是一股歷史的潮流，是不可遏制的，是不能用强力壓下去的。所以，準確點說，目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是從公開的變成了潛在的。

：是地下了？

：不！不是地下，是潛在。“潛在”同“地下”不同，它不是秘密的。就是說，不能公開表態，但把它放在心裏。現在，我們又看到這麼一種情況，就是有更多的人在利用合法手段

用國家辦的刊物倡導民主。這是個新的迹象。最近我國各地創辦了大量的新刊物，它們的作者都是知識份子和黨內的一些人。他們寫的文章和我們的思想是非常相通的。

雅：參加民主運動的人，現在坐牢的有多少人？還沒有判處的有多少人？

徐：就我所知，還有三個人：任畹町、陳旅，他倆是"人權同盟"的；還有「四五論壇」的劉青，但他們沒有說逮捕，只說是"行政拘留"，目前仍然如此。

雅：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嗎？

徐：不知道。劉青被行政拘留最重也不得超過十五天。

雅：你們一點消息也沒有嗎？

徐：只是最近給他送一些衣服。

雅：送到什麼地方？

徐：送到派出所。

雅：官方是不是常有人來看你們辦刊物的情況，比如怎麼印刷？

徐：有過一次。但那次看來也不是受到什麼上級的指示。也許他們認爲不用自己來，也會掌握情況的。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

雅：聽說一月十六日鄧小平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報告，說憲法要進行一些修改，主要是關於寫大字報的事。你們聽說到沒有？

徐：鄧小平的報告，我不可能直接聽到。但也聽說了一些。要取消"四大"，不僅僅是大字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當年毛澤東倡導的。依我看，不要去公開地取消，也不要去公開地提倡，比較明智。

雅：但實際上他們要取消？

徐：看來是這個意思。要取消的意思不是這次報告才透露出來的，而是早就有。

雅：你們是不是認爲你們這些年青人跟蘇聯的那些執不同政見者不一樣？如果是，有什麼不一樣？你們對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是怎樣的？你們現在怎樣評價毛澤東主席？

徐：這個問題是我經常喜歡談的一個問題，也是我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我們一再說過，我們和蘇聯的執不同政見者不太相同

。但我們在講這個話的時候冒了一個很大的風險。冒了一個什麼風險呢？就是我們對蘇聯執不同政見運動的情況不太了解，我們只是從我們的一些參考材料上知道一點兒。我看我們的不同恐怕有這樣幾點吧：中國的這場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活動份子，是以馬克思主義原理爲指導思想的，他們都以反對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共產主義理想爲自己的理想。他們在現階段希望自己的國家建立起一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這一點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和中國共產黨的理想和理論基礎是共同的。另外，參加這場民主運動的成員，是以青年工人和一些青年知識份子爲主；而蘇聯的執不同政見者則是以一些知名的知識份子爲主要人物。如果說中國這場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希望的是建立一個更人道的社會主義，那麼，在這個意義上說，可能與蘇聯的執不同政見者和"歐洲共產主義"思想家們的某些想法有相通的地方。所以總括來看，我們這些中國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參加者，非常不喜歡外國記者先生稱我們爲執不同政見者。可以說我們有某些不同意見，但我們的基本理論和主張同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是沒有多大原則上的區別的。在中國，無論是在輿論中，還是在長期造成的一種印象中，似乎執不同政見就等於敵人。所以我們曾經開玩笑地說過，許多記者先生和學者先生們對中國這場民主運動很同情，但不要幫倒忙。如果報導的不準確，對它判斷的不準確，就會給這場運動帶來巨大的壓力。例如美國「時代周刊」的那位先生和劉青的一次談話，他的一篇報導，我看了一下，現在看來不甚準確。劉青有一句話，原話是這樣的：他認爲社會主義制度還是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的。但這位先生却在後面又加了一句，劉青講現在北京的社會主義是冒牌的社會主義。這樣，我們的領導人非常惱怒。這樣，就對劉青非常不利。我們查對了一下原紀錄，有筆記的，劉青根本沒有講過我們是冒牌社會主義的話。可是現在，北京市公安局就拿這句話作爲了一個「證據」。所以報導上的某些不準確或失誤，確實會給我們帶來不利。這是你們在你們那種政治環境裏覺得不好理解的問題。你們或許會覺得這無所謂

，講錯了有什麼關係？但是我們與你們不同。我們的國家從一個人治的社會將要進入一個法治社會，還需要有一個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遺留下很多人治的痕跡。現在，雖然已經說不可以因言治罪了，但是在一些人的思想當中，却仍然認爲言論還是可以治罪的。所以說，說什麼和沒說什麼，是大不一樣的。所以，講話要審愼，中國歷來就是一個愼言之邦。

雅：你們怎樣評價毛澤東主席？

徐：「四五論壇」內部對毛澤東的看法，意見不完全一致。對這點，我們不要求整齊劃一。我個人的看法，認爲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但是他犯過錯誤，而且這些錯誤是很嚴重的。這不奇怪。因爲，他生活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環境裏，他本人又是出身於農民家庭，這些局限性必然會給他帶來很大的影響。現在，人們對他有一些不公平的評價，其中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組成，應該說很多人是農民，這種共同的局限性，對毛澤東的影響同樣不能忽視。例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不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主張，而是當時黨內普遍的一種要求。儘管這樣，毛澤東仍然不失爲一個偉大的人物。

雅：現在看報紙，有這麼一種理論，很多人說一直到中共八大，毛澤東沒犯過錯誤，只在八大後才開始犯較大的錯誤。你們是不是和報紙上的意見一致？

徐：從政治運動來看，我個人也感覺到是這樣。但毛澤東自己思想裏所潛在的許多東西，並不是八大以後才有的，而是八大以前就有了。比如在他的哲學思想裏，一九三七年寫的「矛盾論」，一九四二年寫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已反映出他的一些哲學思想，比較强調矛盾的鬥爭這一方面，而對矛盾的互相依存，相互的滲透，他不太注意。比如說，你的思想很正確，我的思想很錯誤，但常常是這錯誤思想當中有許多東西對你是有促進作用的，沒有我錯誤的東西對你的影響和滲透，你的正確就不會太經常的。比如我們常常譴責資本主義社會，但資本主義社會當中却也有一些合理的

科學的東西，它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過程、必然階段。對這些，我們就不應該只是一味强調鬥爭，而是應該吸收那些科學的合理的東西，摒除那些反科學的不合理的東西，也就是哲學上的揚棄。

雅：你認爲，在社會、經濟、政治三方面，是哪一方面最阻碍民主在中國的實行？

徐：我看起根本作用的是經濟方面。因爲政治上的民主，很重要的一個特色將會表現爲在政治上允許競爭。比如，我說我爲人民服務，我能代表人民，你說你能夠代表人民，那麼，在相互都想要代表人民的這些人之間，就應該允許去競爭。政治民主將要以這種形態來表現。政治民主絕不會不要代表，它需要有代表的。但是，如果沒有經濟上的競爭，就不可能造成一個政治上的競爭，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是起根本作用的。

雅：爲了實行政治民主，要在經濟方面有競爭，是不是像我們資本主義國家的競爭那樣？

徐：這種競爭和你們那種競爭有些不太一樣。你們在自由競爭階段的初期，不需要受國家統一計劃的制約。中國未來社會經濟上允許的競爭，也是要受整個國家統一計劃的制約。社會主義經濟也應該有競爭的，不然，經濟上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經濟上是上不去的。

雅：中國現在有八億農民，他們大部分都不識字，你認爲這對民主是不是一個很大的阻碍？

徐：有它阻碍的一方面，但也應該看到中國農民有一種自發的民主要求，並且是很强烈的。據我看到的中國農民，他們對土地的自主權就很注意。我是說，他們對土地應該種什麼，應該怎樣種，收獲如何分配，是非常願意由自己來做主的。所以中國農村的改革，幾次想把自主權往上升，自主權越來越提高，從農民能夠自主，上升到生產隊自主，再上升到大隊自主，又上升到公社自主，而對這種自主權的無限提高，農民是反對的。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現在也認識了這一點，給了農民一些更多的自主權。這是農民對二十多年來對農

民不民主的農業政策的一種反抗而取得的。所以說，中國農民常蘊藏着一種自發的民主要求。當然，他們的文化水平很低，精神享受很低，限制了他們對民主要求的程度是有局限性的。但隨着他們今後文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他們對民主的要求也必然會愈來愈强烈起來。

雅：中國的政治制度接近於蘇聯的政治制度，你認爲這是不是對民主運動的一個很大的限制和阻碍？

徐：是這樣的。中國建國以後建立的這套政治體制，學了蘇聯的很多東西。這對中國的民主運動是一個很沉重的包袱，也是一個巨大的障碍。所以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要想前進，非常困難。我們認爲，要在中國實現一個比較科學的社會主義、美滿的社會主義制度，恐怕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所以我們這些人，只是給這場運動墊了一點舖路的石子。舖路是需要石子的，誰都不願當石子是不行的。

雅：在現在的中國，截至一九八〇年初，侵犯人權最重要的是在哪一方面？

徐：中國對人權問題是非常敏感的一個國家，以至於鄧小平副總理到美國去訪問的時候，不願意談論這個問題。現在來看，進入八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對人權的保障，最能夠被接受的一個提法，是對公民權的保障吧！應該說，這方面比四人幫時期好多了。

雅：公民權和人權一樣嗎？還是不一樣？

徐：我認爲沒有什麼不一樣。但我們國家最能接受的則是公民權的提法。因爲我們有些人認爲人權這張牌，好像是掌握在卡特先生手裏。其實我們爲什麼不可以把這張牌拿過來呢？也可以拿過來嘛！我們有時候也可以打打這張牌嘛！有什麼不可以呢？但有些人就是忌諱這種提法，認爲一提人權，似乎就等於說中國沒有人權。剛才我講到了，在公民權的保障上，應該說現在比四人幫時期好多了。但是最嚴重的侵犯中國公民權的問題是什麼呢？似乎現在有些人在製造這麼一種理論，中國人現在只要好好幹活，現代化就來了；現代化來了，你就有公民權了；而國家的事情，人民不需要去過問，或無權

去過問。那麼，人民的權利怎麼體現呢？連僅僅剩下的這點知情權都要被取消了。看來就要把中國人變成像卓別林在「摩登時代」裏那樣的只知道幹活的人。那麼，人的大腦——這個最聰明的機器還幹什麼用呢？聽說中國自從對外開放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通過合法手續離境到外國去了好幾千人，這就很能說明問題。當人不能夠自由地進行大腦活動的時候，作爲知識份子，他就感到是一種壓力。中國人的頭腦是很聰明的，很有智慧的，如果把十億人太腦的智慧都充份發揮出來，總比只許幾個人或少數人動腦子，對國家更有利。如果這樣，就不愁中國的現代化不實現，就不會推遲又推遲。所以我看，如果說中國還存在着一種侵犯中國人民權利的最大問題，就是某些人不允許思想。這種比肉體上侵犯還要嚴重得多。據我所知，目前中國農村在肉體上侵犯公民權利的事情還是有的，生產隊的一個書記或隊長就可以隨便打人。最近，我們的一個農村讀者，寄給他的刊物，大隊就給他拆了。按我國新刑法的明文規定，私拆公民的郵件是違法行爲。但一個大隊幹部書記，他就敢這樣做，而且還在大會上譴責這個年青的農民跟北京的什麼"反動組織"聯繫。黨中央和政府都沒有說我們是反動組織，他一個生產大隊的書記就敢這樣說。所以歸納起來看，最大的侵犯公民權利是不允許人們思想。而在肉體上的侵犯，現在還沒有絕迹。但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認爲不是卡特先生所能解決得了的，還是要依靠中國人民自己來解決。

：現在報紙上發表了很多有關幹部特權問題的文章，你認爲，這是不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會不會達到這樣一個目的，就是能夠限制住幹部的特權？

：中國某些幹部的特權問題，恐怕是中國能夠實現四個現代化，包括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化的一個巨大障碍。它限制着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也限制着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過程。我感覺到中國黨的領導同志是認識到了這一點的。從報紙上看，中央領導同志是想解決這個問題的，也確實想限制這些特權，但不依靠人民的力量是不行的，決不是一些規定所能解決了

的。我舉一個例子，最近的規定當中提到，公家的小汽車，家屬不能夠隨便使用，但我認識一些司機，他們說："我怎麼敢跟我那個首長要錢去呢？"所以，這個規定究竟能有多大的約束力，人們是有一些懷疑的。現在有一種理論，對產生這種特權的根源，不是從我們的政治體制中去找，而是認爲我們這個政治體制是非常完美的，好得很，不需要改革；認爲類似四人幫的問題，都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跟我們這個政治體制沒有關係。這就好像一個母親生下來一個弱孩子而她却不承認這孩子是她生的。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出了四人幫，總要說是舊社會帶來的，可笑得很嘛！「北京日報」一月十八日第三版上題爲「析時弊」這篇文章就表明了這種觀點。「北京日報」現在對你們公開了，所以我才這樣講，不公開我不能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三十年了，這篇文章還說四人幫是舊社會帶來的，我們也常常批評勃列日涅夫，而蘇聯也建國六十年了，勃列日涅夫是哪裏帶來的呢？所以說，中國某些幹部的特權問題，是從哪兒生產的呢？不能否認有舊社會的影響，但跟現在的政治體制是不無關係的。我們的幹部不採取選舉，不能隨時更新，而且下了台就沒有出路，就可能掃地去，所以他就非常注重手中的權力，他就會充份利用當時掌握的權利爲自己謀利。所以解決特權的問題，光靠報紙上宣傳和作一般性的規定，是解決不了多大問題的；要從根本上解決，就得依靠人民的力量，依靠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就是說，幹部應該是可以不斷更新的，是應該受人民監督的，他下了台之後是應該有出路的，是有很好前途的。比如說，我不能當幹部了，可以去當教授，像基辛格博士那樣。加拿大總理克拉克先生，就很注意這個問題，他上台後就宣佈自己的內閣不能攪特權。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定，就是他的閣員離開內閣之後，三年之內不准代表任何公司同他曾任職的部作買賣。克拉克先生今年三十五歲，作爲一個年輕的國家總理，他爲什麼能夠想到這些呢？就因爲有反對黨在那裏監督着他，他害怕。我們的幹部呢，只能升，不能降，或者是降了就沒有出路，所以他就

把權力抱得很死。對這些問題，現在我們看得出來是在限制，但目前所採取的辦法我們認爲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幹部的特權如果繼續下去，將會同人民產生巨大的衝突。拿住房來說，現在中國有八口人、五口人、甚至十口人住我這樣一間房的，有的男女孩子都很大了，也住在一起。我是一個電工，我經常給人家裝電燈，我看到不少這種情況。但我們現在專爲司長建的樓，一個單元七、八十平方米，建築得非常漂亮；而他們的人口可能都少，因爲他們的孩子都長大了。

雅：有很多報紙最近講了一些信念危機的問題，你認爲這種信念危機實際上有沒有？如果有，它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徐：我看不要去否認它，否認也否認不了的。不但在年輕人當中，人民中間普遍都有這種情緒。這個危機是存在的。依我看，這不是壞事情，而是好事情。因爲本來是有危機嘛，人們認識到它了，想辦法去解決它，那麼，就可以從危機中解脫出來。西方世界不是經常從經濟危機中解脫出來嗎？當然，我們這種危機和西方出現的那種經濟危機不太一樣。現實社會當中很重要的一個危機，在於不太相信四個現代化能夠在本世紀末實現。這種情緒比較普遍。根本的原因在於我們過去所倡導的一些東西沒有能夠眞正實現。比如說，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在經濟建設上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難。蘇聯本來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居然變得對外攪侵略。談到蘇聯，我還想補充一句，蘇聯既然對外攪侵略，那麼它對內不攪掠奪可以嗎？它不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它拿哪裏的錢去打別人？它拿幾千億美元給古巴、給越南，它在國內不壓迫人民，行嗎？據我所知，只莫斯科及其周圍幾個大城市人民生活好一點兒，到邊遠的農村就不行。各位先生都可能去過蘇聯，是不是這種情況？

雅：他們買了一些機器到農村去，所以現在農民的生活好一點兒了。現在的農村已經不使用人力了。

徐：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蘇聯農村的現代化程度，包括人民生活的現代化程度，絕不會同軍事現代化的程度相稱。再看越

南的情況，我們過去也稱它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它居然變得把本國人民大量地驅趕到海上去。我們譴責資本主義社會的不人道，難道社會主義這個樣子就叫人道嗎？這是侵略過法國的希特勒才幹得出來的。另外，中國的情況，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應該說政治、經濟左右搖擺，不穩定。但人們通過「參考消息」、電影、電視和一些書籍，看到了外部世界。這樣，他們能對我們這個社會主義所出現的一些情況不發生一些疑問嗎？我們講，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最正確的理論，社會主義制度是最好的制度，但居然出現了這樣一系列問題，人民不能不產生懷疑。所以人們的信任危機，是從事實當中來的，它的根源就在這兒：事實。有了這樣一些事實，你讓人們不懷疑，是不可能的。人們要考慮問題，是不是我們這個體制當中還存在着哪些毛病？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不是還有些不完備的地方？有需要發展的地方？比如歐洲的一些共產主義者就遇到了這個問題。他如果把斯大林那套都搬到西歐去，我想西歐人民恐怕都不接受，所以，他就根據他本國的情況，進行了一些必要的改變，所以現在就出現了一個“歐洲共產主義”理論。恐怕當時也是信任危機吧。它如果沒有這樣一些改變，意大利共產黨也不可能在意大利有這樣大的發展。所以信任危機，不要把它看得全是壞事情。事實不那麼美好，非得讓人們那麼信任？我相信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黨，經過這幾十年的反覆（一時發展得好，一時發展得不好），能夠吸取教訓，以後攪得更好。那麼，這個信任危機就消失了。

雅：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道德的危機，舉個例子，比如走後門現在越來越多，你認爲不認爲這個道德危機是在這個信任危機裏邊？還是與這個無關？

徐：也是有關係的，道德危機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應該危機了，另一種情況是屬於不應該危機的。像走後門這種“道德”，讓人們感覺到一種不信任，應該危機了。我們過去倡導我們的幹部應該廉潔，最爲人民服務，但你的走後門這些事情，就讓人民產生了懷疑：你究竟是不是爲人民服務？有些

"道德"應該危機了，像論資排輩，年青人絕對不能超過老年人，這些道德觀我看都應該危機了。有些道德觀是對的，比如反對走後門，反對特權，這些道德觀念就不應該危機。但是，想讓它不危機的辦法，還在於消滅產生這些危機的原因。

雅：像走後門，你認爲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徐：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有特權。（一個盛行比權力大小，而不比能力大小的社會，難以避免不勞而獲。）

雅：你認爲現在比"四人幫"時代，特權多了還是少了？

徐：少了，但是數量好像增加了。就是說，能加享有特權的人比那時多了。那時只是"四人幫"和依附於他們的那個小圈圈享有特權，他們那個特權是現在的幹部不能比的，就是說享受特權的質量不同，他們那個時候非常壞。但現在，享受特權的人，數量多了。

雅：好，沒有問題了，眞是感謝你。

徐：不應該感謝我。應該謝謝你們。我們希望能夠通過你們的準確的報導，能使得我們這些中國人的思想，參加中國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人們的想法，讓全世界的人民有更多的了解。

雅：對我們這次採訪，你希望不希望用中文發表？如果用中文是不是全部發表？

徐：這都沒有關係，但是有一個要求，就是發表的時候，一定要忠實於我的原話。

（一夫整理）

原載北京《學習通訊》第四期（一九八〇年十月）

徐文立

促進庚申變法的建議書

中國社會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非變法不得進步的歷史關頭。因此人們稱中國歷史上這次以中共改革派勢力佔主導地位爲主要標誌的變法爲「庚申變法」。

一九七八年底在全國範圍內蓬勃開展起來的以青年工人爲主體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人大、政協五屆三次會議前後的民主浪潮，當前全國各高校以民主競選爲中心的學生運動，都雄辯地說明了中國青年一代和中國人民變法圖新、變法圖强、變法救中國的迫切要求是不可阻擋的。

中國是非變不可了。固守不變只有絕路一條。不大變也只有絕路一條。

那麼，現在問題的關鍵在哪裏呢？很顯然就在於這次變法運動到底應該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還是二者的結合。

當前的中國政治形態明確地告訴我們：自下而上的變法是不可能的。因爲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不想動盪，也經不起動盪了。

中國變法的歷史經驗也明確地告訴我們：自上而下的變法是行不通的。因爲僅靠上層的變革力量難以抗拒舊體制官僚主義的反抗。

看來只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變法才是切實可行的道路。

中國的事情再不能由少數人來包辦了。應該還政於民，由全國人民來辦。舉國一致，同心同德，變法圖强。

爲此，我不避粗陋提出以下變法條陳，以供中共中央、人大、政協、國務院和全國人民參攷。

一、廢止目前在全國範圍進行的區縣級的不民主普選。推遲召開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推遲召開第六屆人大和政協。

民主普選的關鍵一環在於候選人的篩選權是否掌握在廣大選民手中。而當前的普選中，這應該由選民直接掌握的篩選權被剝奪了。由於選舉法的不科學不嚴密，中國社會缺乏民主的傳統，缺乏民主普選的經驗，特別是反民主勢力的破壞和搗亂，造成了多數地區的正式候選人並未向選民表示是否願意代表人民；也未與選民見面，接受意見、詢問和委托（這些完全可能在業餘時間進行）；也未向選民提出自己的政治抱負，而只是由各級選舉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包辦代替了。而且許多正當的民主競選受到壓抑。這是僞民主，不是眞民主。選民應當享有不可予讓、也非恩賜的完全自由的選舉權，必須反對變相的强迫命令和片面追求投票率的虛僞選舉。

確認民主競選是促進社會進步的科學手段。

通過眞正的民主選舉，徹底廢除從封建社會繼承來的金字塔式的、只向上級負責而不必向人民負責的、等級授權的舊體制。逐步建立起公民通過選舉、監督、罷免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向選民負責，並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來監督各級行政機關的金字塔式的新體制，實現人民眞正當家作主的社會民主制度。

二、立即着手成立由中共中央書記處、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包括中國國民黨在內的各黨派、各團體和各類專家組成的變法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獨立行使職權。在該委員會主持下，用半年時間在全國報刊雜誌上開展集思廣議的變法大討論，然後概括大多數人的意見，擬定變法大綱，交經過眞正普選產生的第六屆人大和政協審議通過，貫澈執行。

變法大綱中特別要記取粉碎「四人幫」之後四年來政策不斷左右搖擺的教訓，公佈切實可能達到的公民生活逐年有所提高的生活指標，以實現清廉可信的政治。

三、變法大綱沒有交付實施之前一律按舊章辦理，不得有違。

四、放棄獨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眞正實行信仰自由的原則，正確地介紹和繼承一切人類文明的進步思想，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兼收並蓄，爲我所用。讓馬克思主義從僵繹式的經院哲學中解放出來。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科學也要發展，科學不怕競爭。

中國共產黨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爲指導思想，並不妨礙其他政黨和派別各自的信仰和崇尚。在追求眞理的道路上，眞正實實行少數服從多數、多數也不壓迫少數的民主原則。

五、以實現全面的現代化的口號代替四個現代化的口號。

六、建議中國共產黨進行非運動式的黨員的重新登記。實行以黨員交納黨費爲本黨主要財政來源的制度，以減少國庫的開支，減輕人民負擔。變法後將和各民主黨派、各民主團體一樣按黨員的數目享有對等的補貼，並向全國人民公開。

中國共產黨是有光榮傳統的政黨，在當今中國政治舞台上仍是唯一可能指導這場變法革新的執政黨，她的政治質量對於變法的成功與失敗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因此，黨員重新登記的建議望能愼重聽取。

七、歷史的帳不算或少算，包括國共兩黨的帳。歷史的帳讓歷史學家和後代人去清理。

八、我國在當前歷史階段，確立四權分立的政治制度。恢復國家主席領導國務院、統率武裝力量體制，連選連任最多不得超過兩任。

「四權分立」是中國共產黨享有指導權，人大和政協享有立法權，國家機關享有行政權，法院享有完全獨立的司法權。

九、逐步廢止中央集權制，實現中央統一領導、地方區域自治的聯邦制。台灣省作爲特區處理，以圖台灣問題和平解決。

十、中國軍隊是國家和人民的保衞者。中國公民和軍人都應牢固樹立軍不干政的觀念，違者處以嚴刑。現役軍人不參政，國防部長用文職人員擔任，這是確保社會穩定、人民安泰的必需之策，這也便於職業軍人集中精力，潛心於發展現代化的軍事科學和戰略戰術。

十一、改革當前的徵兵制度，逐步變義務兵役制爲志願兵或職業軍人相結合的制度。健全全民皆兵的民兵制度。加强現代軍事科學的研究和教育，提高軍隊質量，壓縮數量。

十二、繼續壓縮軍費開支，大大增加人才資源的投資，並將壓縮的一部分軍備的開支用於補助農村軍屬和用於提高中下層軍人的生活。

十三、召開以修訂憲法爲主要內容的第六屆人大和政協，制定主權在民的新憲法。同時制定保護現代化政體的辦法，如新聞出版法、結社組黨法、罷工法、遊行法……等等法案。

十四、立即釋放魏京生、任畹町、劉青等一類思想犯；重新審理以往的政治犯；重新修訂刑法中含混不清的反革命罪的有關條欵；廢止公安部門可能行使司法權的治安管理條例；眞正實行公民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示威、遊行、罷工等權利。

一切變法革新的着眼點在於解放人，尊重人的價值、人的權利。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因此必須廢棄我國社會一直沿用的網狀結構的控制式，代之以倫理道德教育爲主，法治威嚴爲輔的威懾式。廢除各行政單位控制個人的檔案制，代之以國家設立檔案局、個人自持身份證的護照制。設立職業介紹所，廢除統一分配的就業方法，代之以招聘、報考、擇優，訂立長期和短期合同，失業予以補貼的就業方法。逐步放寬戶籍控制，代之以遷徙自由。

十五、除中央直屬的國家機關，各企事業單位一律由職工代表大會任命的管理委員會行使管理權，實施獨立核算，自負盈虧，交納稅金，自由競爭的原則。文化教育單位可享受一定的財政補貼，逐步實行普遍教育免費制。各企業單位除完成國家計劃規定的指標，有權決定自己的供、產、銷。職工的工資除不得低於國家統一標準的規定外，各單位的工資、獎金、福利待遇，各單位有權自行決定。

在大幅度提高工資之後，實行公民交納所得稅的制度。變無形扣除爲有形扣除。眞正實行多勞多得、能者多貢獻的原則，以使每個公民知道自己的社會價值，珍視自己的民主權利。

因競爭不力，破產倒閉的單位的資財、人員一律由各級人民政府會同原單位職工代表大會按有關法案妥善處理。

十六、農村的問題根本上是一個土地問題。應立即着手制定一個土地法規，以結束目前農村在土地問題上的混亂局面。

在農村的村、鄉應普遍建立村、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之成爲農村的最高權力機構。代表應由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組成（家庭勞力多者、家庭勞力少者、農村幹部、知識份子、軍烈屬、五保戶、退休退職人員……），設立常設機構行使對村、鄉的管理權。

十七、按照中國現代歷史所劃分的各個時期，分別授予各類退職幹部、榮復軍人和其他有功人員以榮譽證書，憑證享受國家統一規定的各種物質待遇。

十八、已婚婦女試行四小時工作制，以便於她們料理家務，教育後代。

十九、教育是現代社會之基礎。我國的教育制度必須改革。

除了逐步實行普通教育免費制，還應鼓勵半工半讀接受高等教育和試行獎學金制度。成人教育、職業教育和社會性的文化教育，娛樂場所、體育設施都應列入各單位和各級人民政府規劃。

二十、壓縮各級人大、政協的名額。各級代表應脫產爲社會服務。各級人大、政協應設立常設機構和各類事業委員會，經常聽取公民的意見，與人民保持血肉的聯繫。

國家是大家的家，民主是大家的事。人人都以爲無所作爲，這個民族必無作爲。人人都以爲有所作爲，這個民族必定大有作爲。

有發奮圖强的青年一代和全國人民，中華民族是大有希望的。

徐文立

自然•社會•人(代序)

地球沒有毀滅之前，人總是永恆的主題。討論這一主題，古往今來，延綿不絕。

如今人們又重新燃起了討論這一永恆主題的熱情，這是因爲：當今世界的人被扭曲了，資本醜化了廣義的“西方人”，權力異化了廣義的“東方人”。當今“東方”更有甚者，許多空洞的凶非生命又非物質的原則概念至高無上，有生命的人却淪爲可悲的螺絲釘，成了原則與概念的附屬物。年青的新生代渴望還人的本來面目，希望做一個人，做一個眞正的人。

因而年青的“反叛者”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了更接近自然人生活環境的非洲，這種思潮在敏感的音樂、繪畫、舞蹈領域裡表現的尤爲突出。在他們看來，淳樸的“原始”比庸俗的“文明更珍貴。

世上的人只有好、壞之分，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別。國王是人，乞丐也是人；領袖是人，百姓也是人。在無垠的宇宙中他們都是人。

人有兩類屬性，一是天生的自然屬性，二是後天的社會屬性。在階級社會中，社會屬性主要的表現爲階級屬性罷了。

生產力的發展，物質的豐富，教育的深化才有可能改造人的社會屬性，文明、和睦、友愛和大同才能得以實現。

青年之中的深邃者不過更自覺地肩起歷史的重担，主動地去改造異化人的環境。環境爲人，而不是人爲環境；同樣的道理，制度爲人，而不是人爲制度。人是上帝，人是主宰。當然又不能不受條件的局限。

然而，只有每個人都能得到充分自由發展的社會環境，才能

有生產力的高速發展，物質的極大豐富，教育的日益深化。

物質的人，能力有差異，品格有好壞。差異的競爭要保護，相互的利益要協調，社會的秩序要管理。應該允許"亂說"，而不能允許"亂動"。意見上可以千差萬別，不能相互强加；實行時只能通過必要的程序，少數服從多數，同時保護少數；全體人通過代表會議監督社會的管理者。這就是民主的眞義。

自然界給了有理智會勞動的人類以生命，人類應當感謝感謝宇宙之母，和平友愛地生活在無垠的宇宙的懷抱之中。

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養育了勤勞、智慧的黃帝子孫、龍的傳人，讓我們中國人和平統一地生活在一起。

自由、平等、博愛不是屬於一部人的，是屬於全體人類的。全體人類，共同享有吧！

轉載自北京《人》（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

附：

《四五論壇》發刊詞

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除台灣省外，現在還沒有一張非官方報紙。

對立面的互相依存，又互相鬥爭，即對立統一規律，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規律。這就是《四五論壇》發刊和存在的理論基礎。

言論的眞正自由，最近期的成果是一些文學藝術的不朽之作的誕生，很可惜建國二十九年來還沒有一部，或沒見發表一部；最長遠的成果是社會的持繼穩定和繁榮。

《四五論壇》的宗旨，就是爲在我國造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盡一點微薄的力量。安定團結不是一潭死水，不是不讓人民講話，□□不是不讓人民講眞話。人人有話敢講，任何污穢就沒有藏身之地，人民的意志必然決定社會的命運，這才是眞正的人民民主。一言以蔽之，《四五論壇》就是要行使憲法賦予人民監督和管理國家的權力，使憲法由一紙條文變爲我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那些習慣於一種調子統一天下的同志，也應該慢慢地習慣於在多元化的鬥爭、比較中，抉擇出一條最科學的通往進步和光明的捷徑，盡早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才符合世界進步的潮流。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毛澤東同志說過：「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一個民主、自由、繁榮富强的中國就在前面。

原載北京《四五論壇》創刊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附：

《四五論壇》復刊詞

《四五論壇》復刊了，同胞們、同志們，我們又見面了。

二年前，基於中國歷史造成的必然現實，這個現實就是在上不能照老一套統治，在下已不願照老一套生活，人們選擇了地處西單的一段磚牆，藉用大字報與民刊，喊出了自己心底的聲音：要改革、要民主，否則四化無望、國家民族無望。從那時起至現在兩年多的時間過去了。勞動者的乞食袋已經被接過去作爲旗幟在揮舞，但他們中一些人臀部上的舊時代的印記却屢屢被人們發現。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又有什麼變化呢？民主牆被封閉；民辦刊物橫遭查禁；熱血青年備受迫害；劉青等人被捕了，范熊熊等人自殺了。請問：用什麼說明我國人民比「四人幫」統治時期更有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更有當家作主的權利？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如何兌現？人民無權，改革靠誰來幹？民主何由體現？

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還等待進一步探討，馬克思主義新發展的序幕已經拉開。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排斥中國人民投身於這個實踐，進行切實的探討，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一百年前恩格斯在《共產主義信條草案》中就明確指出：「實現財產公有的第一個條件是通過建立民主的國家制度達到無產階級的政治解放。」雖說我國早已實現了公有制，可是上述恩格斯所指出的實現公有制的「第一個基本條件」我們有沒有感受到呢？事實証明了任何虛設的民主並不能使勞動者所處的社會地位有重大的改善，事實証明了局部形式的改革只能使官僚們稍事收斂而沒有實質的變化。「爲民主而戰」——是《四五論壇》的宗旨，我們刊物的口號是「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聲音、自己的刊物……」。我們將站在人民民主的立場上，反對任何形式

和範圍的專制，我們要團結全國人民，爲在我國創建一個民主的社會環境而奮鬥。爲此目的我們願意貢獻我們的一切。

中國人民團結起來，行動起來，開展無產階級民主運動，爭取切實的民主權利，使自己眞正成爲國家主人，爲創建一個自由、民主、公正的社會而奮鬥。

原載北京《四五論壇》第十八期(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大概是楊靖所寫

王希哲

黨的領導與民主監督

(一) 毛澤東同志的人民監督共產黨的思想

多年來，從古至今，我國思想界和理論界都未能夠發揮毛澤東同志的人民監督共產黨的思想。

近四十年前，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毛澤東同志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說到：

「共產黨是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願旨。」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同志在他的名著《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裏，又一次闡發了這一個思想，他說：

「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爲甚麼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爲一個黨同一個人一

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羣衆。」

現在，大家都在說，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但是，怎樣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却是一個應當討論清楚的問題。李洪林同志最近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談論這個問題，但是，他仍然只是談黨的領導本身的方式和方法，沒有談黨的領導與人民監督的關係。而只談黨的領導不談人民監督，就像只談集中不談民主一樣是片面的。共產黨領導人民與人民監督共產黨，這是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兩個方面。人民沒有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了解社會發展規律的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就有陷於盲目、迷失前進方向的危險，共產黨特別是在社會生產力狀況低下的國家中執政的共產黨，失去了人民的監督與控制，就有變爲騎在人民頭上，欺壓人民的官僚黨、法西斯黨的危險。

（二）人民監督共產黨的理論根據

毛澤東同志的這一思想是以哪裏來的呢？是從馬克思、列寧多次闡述過的巴黎公社原則來的。巴黎公社原則，即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社會公職人員與人民的關係是公僕與主人的關係的原則，都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

恩格斯說：「工人階級爲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鋤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他們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應當以宣佈他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範他們。」

但是，人們一般總是把人民監督和可以隨時撤換自己的代表理解爲對某些社會公職人員的權利，例如幹部張三或幹部李四，他們劣迹昭著，人民便有權批評他們，甚至有權要求撤換他們（雖然連這部份權利至今也沒有眞正實行）。但是，人們從來沒有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這一最光輝的思想理解爲對於共產黨本身的權利。

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執政後的共產黨是社會的公僕，因此，共產黨已經在整體上以一個法人的資格成爲了人民的代表。既然如此，人民當然應當宣佈，爲了不允許共產黨從人民的代表

者變爲人民的壓迫者，從人民的公僕變爲人民的主人，共產黨必須永遠處於人民的監督之下。一方面，人民應當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另一方面人民可以隨時批評共產黨。甚至在這樣的情況下，當人民發現共產黨已經從一個爲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的政黨變成一個爲特殊的階層謀取私利的政黨或被這個特殊的階層所把持的政黨時，人民便有權撤換這個已經不是眞正的共產黨的「共產黨」。

如果我們是一個徹底的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原則即巴黎公社原則的擁護者，我們就應當敢於在理論上提出這樣的問題。

（三）人民不能監督共產黨在實踐中的危害

人民不能監督共產黨在實踐中的危害大家是已經看得很清楚的了。

如果人民能夠監督共產黨，難道可以發生一九五七年反右擴大化的錯誤嗎？

如果人民能夠監督共產黨，難道可以發生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在餓死了成千上萬的農民情況下還要來反右傾和罷爲民請命的彭德懷同志的官的事情嗎？

如果人民能夠監督共產黨，難道可從發生以鎭壓天安門前革命運動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樣的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事情嗎？

最近以來，人們都經常以張志新事件爲例來分析我們國家沒有民主與法制的危害，這當然是非常好的，因爲張志新事件確實太典型了。盧之超同志的《冷靜下來的思考》與郭羅基同志的《誰之罪》這兩篇文章給我國思想界的巨大震動是顯而易見的。但是，至今人們還沒有以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決議爲例來分析我們國家民主與法制的危害，而就把我們國家制度中存在問題暴露的深刻性來說，天安門事件是遠遠超過了張志新事件的。

共產黨失去了人民的監督，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成爲了至高

無上的絕對權威，結果怎樣呢？結果是一旦黨中央犯了錯誤，便沒有人能夠制約它了。

天安門革命運動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但是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決議卻違背了人民的意志、壓迫了人民的意志。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公僕違背了主人的意志，人民就應當起來行使他們的罷免的權利了。但是，人民能不能行使這樣的權利呢？不能，因爲人民沒有這種能夠使自己行使這種權利的組織。從蘇聯學來的我們國家的這種體制從來沒有設立也從來沒有想到過需要建立起這樣一種由人民來監督和制約共產黨的組織。

有人會說：爲甚麼需要建立起這樣一種由人民來監督和制約共產黨的組織呢？共產黨難道不能自己監督自己嗎？我們應該相信黨內眞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力量總是能夠戰勝那些反人民的反動力量的。

是的，我也相信事情必然會如此。但是這中間將給人民帶來多麼巨大的痛苦啊！從四人幫的崛起到他們覆滅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大家已經看到了。事情也已經過去了。但是，我們還可以再看看現在的越南。越南和我國一樣，實行的都是蘇聯式的執政的共產黨不受人民任何制約的國家體制。現在大家已經看到了越南人民正在經受着一場空前的、毀滅性的民族災難。爲甚麼呢？因爲以黎筍爲代表的反人民的反動勢力把持了越南共產黨，而且前我們所知道的以黃文歡同志爲代表的忠於人民的革命力量在他們的黨內甚至全無立足之地。

話劇《於無聲處》的歐陽平在劇末胸有成竹地走進監獄，他知道天空中很快就會響起一聲霹靂，四人幫就要在這聲霹靂中垮台，這是因爲劇本的作者宗福先把他後來才知道的事情告訴了歐陽平。現在，我們越南的歐陽平又怎能夠指望宗福先把湄公河上甚麼時候也響一聲霹靂告訴他呢？

而且事實上，當執政的共產黨違背了人民的意志使人民享受災難的時候，如果人民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共產黨內代表他們的革命力量起來爲他們扭轉乾坤，使他們得救，那麼「人民當家做主」又表現在哪裏呢？人民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又表現在哪裏呢？

（四）甚麼理論阻礙了人民監督共產黨

共產黨凌駕於社會之上，對社會施行絕對的行政領導，它不但負責立法也負責司法，除了它自身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監督自己之外，它不受任何其它社會機構的監察，這樣一個國家體制是從蘇聯起始的，它根據的是斯大林的這樣一種理論：

「在我們蘇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我們的蘇維埃組織和其他羣衆組織，沒有黨的指示，就不會決定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這一個事實應當認爲是黨的領導作用的最高表現。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專政』，是它的黨即無產階級的主要領導力量的專政。」

而斯大林的這個理論又是根據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一句話：

「在我國，任何國家機關未經黨中央指示，都不得解決任何重大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

列寧說，這就是當時蘇聯「領袖、政黨、階級、羣衆之間的互相關係。」

斯大林的這個理論，于光遠同志認爲是「更成問題」的（見《百科知識》雜誌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３８頁），但是對於列寧的這句話，于光遠同志似乎並沒有否定，只是認爲斯大林誤解了列寧的話。但實際上列寧的這句話也是值得研究的，因爲它是與列寧本人在十月革命前夕寫的《國家與革命》中依據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闡述的巴黎公社原則思想相違背的。注1

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這樣說：

「工人在奪得政權之後，就會把舊的官僚機構打碎，把它徹底推翻摧毀，完全粉碎，而且仍然由這些工人和職員組織的新機關來代替它：爲了防止這些人變成官僚，就會立即（注意「立即」！）採取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分析過的辦法：１．不但實行選舉制度，而且隨時可以撤換；２．薪金不得高於工人的工資；3.立即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的人暫時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爲官僚。」

既然如此，這怎麼能夠與「在我國，任何國家機關未經黨中

央指示，都不得解決任何重大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相協調呢？如果「任何國家機關未經黨中央指示，都不得解決任何重大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那麼黨中央犯了錯誤怎麼辦呢？黨中央違背了人民意志又怎麼辦呢？只能毫無辦法！

任仲夷同志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在總結張志新事件的教訓時說到：「最根本的是必須防止林彪、四人幫一類的陰謀家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一旦這樣的人物上了台，甚麼黨章、憲法統統等於廢紙，」「我們原來的黨章、憲法也是很好的，但林彪、四人幫得勢之後，統統不宣而廢，毫無作用。所以，光是把法律寫得很嚴密、很好還是不行。」

但任仲夷同志拿出甚麼辦法來解決這一問題呢？他認爲：「更重要的是，必須採取措施，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但是，剛剛過去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恰恰是爲了領導權掌握在「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而混戰了十年麼？難道林彪和四人幫不也大聲地宣佈他們是「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麼？當然，誰是眞的「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一個客觀的標準，這就是看誰能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這些只能由人民自己來判斷的。問題在於，在作出了這種判斷之後，人民可能用怎樣的手段來行使自己作爲主人的權利。這個問題其實毛澤東同志也早就提出來了，他曾多次問過別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就是說，他也在考慮如果黨中央違背了或壓迫了人民的意志，人民用甚麼手段來行使自己的權利。他是讚許許世友同志「帶兵」打到北京這樣一種辦法的，就是說，在他看來，一旦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壓迫人民，「人民除了選用暴力手段之外，便別無它法了。」但是，爲甚麼一定要使用暴力呢？爲甚麼不可以設想一下建立這樣一種國家制度，在這種程度下，人民可以以合法的手段有效地監督着和制約着黨中央呢？這種國家制度難道不更適應社會主義公有制這樣一種經濟基礎嗎？當隨着時代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人們已經爲自己創造出高度的物質文明的今天，甚至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人們都已經愈來

愈趨向於不是使用暴力而是使用和平手段來解決階級之間的矛盾，爲甚麼我們社會主義中國不可以建立起這樣一種人民民主的法制體系來解決「中央出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這樣的問題呢？而這難道不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無產階級實現其階級專政的唯一方法麼？

從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到列寧的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行使專政到斯大林的黨的領袖專政（雖然斯大林口頭上並沒有承認這一點）到毛澤東同志的「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專政，這條道路是走不通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六十多年來的實踐已證明了它的弊端無窮，我們必須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立場上來（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爲建立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而努力。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內部關係應當是這樣的：

它的人民民主機構的權威，高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權威，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領導着全國人民，全國人民的民主機構監督着制約着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

現在的問題是，由於六十多年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大多數都是沿襲蘇聯式的國家體制，於是就頑固地給了人們這樣一種印象，似乎社會主義國家就應該是這個樣子，換個樣子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這是荒謬的。難道社會主義國家竟有一種先驗的模式嗎？難道我們把長期穿在身上的不合身的衣服脫去，我們就不成爲我們自己了嗎？

（五）怎樣改革

我們國家的經濟體制已經面臨着巨大的變革，與之相適應的，我們國家的政治體制也必不可免地面臨着巨大的變革。

我們看到我們國家的經濟構成，正在又一次向多種經濟成份發展，這是大有利於我國四個現代化的進程的。但是，這些新的經濟關係必將要求在政治上實行怎樣的變革呢？

我們先看個體所有制經濟：

農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城鎮的個體服務業長期處於實際上的不合法狀態，極大地束縛了這類經濟的積極性的發展。因此，它們今天一旦合法，它們必將要求這個能夠使它們得到保障的

法律具有權威性和穩定性，以利於它的發展。

我們再看看集體所有制經濟：

農村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隊爲基礎的經濟與城市集體所有制企業雖然合法，但長期以來不能得到法律的切實保障。農村生產隊的所有權與自主權經常被侵佔，城市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積累經常被併吞。這些事實，僅以報紙上最近透露出來的來看，已是十分驚人的了。因此，這些經濟成份同樣必將要求能夠使它們得到保障的法律具有權威性和穩定性，以利於它的發展。

我們再來看看國家所有制經濟：

這裏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最劇烈的場所。國家所有制經濟正在向擴大企業的自主權的方向發展，實際上是向大的集體所有制經濟發展，這是對我國生產力的巨大解放。過去維繫計劃與生產、生產與流通、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係的行政紐帶正在瓦解，經濟合同正在成爲維繫這些生產關係的最有生命力的手。

在制定國家憲法、法律、政策和計劃時，共產黨中央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提出自己的要求提案。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羣衆根本利益的政黨，是「了解無產階級運動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的政黨，她的提案，當然體現着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羣衆長遠利益和目前利益的結合。因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當然樂意接受共產黨中央的這些提案，從而制定出新的憲法、法律、政策和計劃。於是，共產黨就是這樣實現着她對於全國人民的領導。

當然，共產黨中央的提案也可能被否決，它一般屬於這樣兩種情況。

（一）共產黨中央的提案是正確的、確是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但大多數人民還沒有覺悟到自己的利益。

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同志多次地說過，爲了不犯脫離羣衆的冒險主義，黨就不應該强迫羣衆接受自己的意見，而要以自己的積極工作去啓發羣衆的覺悟，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從而接受自己的意見。而且，當人民否決了共產黨的正確提案，通過了錯誤提案，從而在實踐中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失後，他們也必將回過頭來，心悅誠服地接受共產黨的提案。

（二）共產黨中央的提案是不正確的，是違背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

在這樣的條件下，人民否決共產黨中央的提案，就完全是一種行使他們主人權利的天經地義了！當共產黨中央的錯誤提案一再被否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一再接受其它民主黨派或其它無產階級政黨注2的提案時，共產黨內的思想鬥爭和路綫鬥爭必將激化，那些眞正代表全黨大多數黨員的意志因此也必定代表全國大多數人民意志的黨的新的領袖人物，必將取代舊的已不能代表全黨意志的領袖人物（前提是黨的生活眞正民主化），組織新的黨中央並提出新的提案。

當共產黨中央的提案未被通過，由共產黨組閣的國務院便在行政工作中施行這一提案，人民有權要求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共產黨中央提出起訴。

現在，可以作一點結論：

共產黨怎樣實現她對於全國人民的領導呢？是通過她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正確政策和她的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特別是她的在國務院中及在各級政府中担負各種社會公職的幹部的卓越工作，去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擁護，從而實現這種領導的。

人民怎樣實現她對於共產黨的監督呢？

除了經常的廣泛批評之外，人民是通過法律的程序這一組織手段來實現她的監督的。

這樣，以爲人民謀利益爲根本宗旨，以向人民負責爲最高原則的共產黨，作爲人民的公僕的共產黨就眞正可靠地置於人民的監督和制約之下，無論它的最高領導人是不是「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能使共產黨從人民的公僕變爲人民的主人了！

原載北京《四五論壇》第十五期(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注1：爲甚麼有這樣的違背，我在另一篇文章《爲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而努力》一文中作了些探討，這裏不多說。

注2：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以爲在無產階級執政了的國家裡只允許共產黨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存在，他們在《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中，正確地闡明了共產黨與其它工人政黨的關係。

東爾晉

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
重印前言

一、全世界正注視着中國

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在本世紀末到底能不能實現四個現代化？共產主義是可以實現的理想，還是一場導致災難的夢魘？這不僅是中國人民正切身感受到並認眞思索着的問題，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正密切關注着的問題。

由於中國共產黨堅韌不拔的努力，歷史已經把這三個問題緊緊地有機地聯結在一起，構成了一個艱巨的任務，交給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

二、需要作出重大突破

能不能完成這個歷史任務，首先取決於我們的思想能不能徹底解放、取決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有沒有勇氣在理論和實踐上來一個重大的突破，或者叫做突破性的重大發展。

因爲歷史畢竟已經又來到了這樣一個關頭："在每一次社會全盤改造的前夜，社會科學的結論總是：'不是戰鬥，就是死亡；不是血戰，就是毀滅。'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馬恩選集》一卷161 頁）此刻，正像當年列寧必須突破社會主義不可能首先在一國取得勝利的祖宗之法，正像當年毛澤東同志必須顚倒十月革命先城後鄉的武裝奪權之路，那樣，我們也必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毅然再次進行"歷史中進步是現存事物的否定"。（《馬恩選集》三卷534 頁）敢不敢進行這樣的否定，要不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在這種時候，一個民族只能在二者之中選擇其一：'非此即彼!'而且問題的提出，總是和一切時代玩弄政治的庸人所願作的完全不同。"（同上534--535頁）

我們當然必須堅定不移、毫不含糊地爭取進步，選擇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而“爲了使社會主義變爲科學，就必須首先把它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馬恩選集》三卷59頁）

三、“轉移”必然是一場偉大的革命

那麼，我國當前的現實是什麼樣的呢？

對此，在正文中提及的，這裡就不重覆了。我在這裡所要着重講的是：實現“轉移”的過程，實質上必然就是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的過程，或者說，不把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轉移”就不能實現。

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黨工作的着重點應該從一九七九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定，是一個意義深遠的決定。同時也正如三中全會公報所指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毫無疑問，這場革命的性質正是無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不僅必然是一場廣泛的、深刻的革命，甚至將會是一場異常急劇的革命！誰如果對此認識不足，甚或誤以爲“轉移”只不過是簡單的轉軌定向、簡單的工作方法的改變，誰就要在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爲轉移的迅猛變革面前瞠目結舌不知所措。“轉移”只有在改變了舊的即已經成了生產力桎梏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轉移”的實現，必將導致新的生產關係、新的社會生產組織、新的經濟結構的確立，因而也就必然導致新的上層建築、新的國家體制的建立，這難道還看不清楚嗎？

四、理論問題突出出來

三中全會閉幕到現在已經將近半年了。黨和國家在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糾正冤、假、錯案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在前進中也不可忽視地碰到了一系列問題。從强調按經濟規律辦事到重提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從大上馬到大調整；從大力引進到强調“挖潛”；從强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到

强調繼續解放思想同堅持四項原則是一致的……等等。這等等，一切都充份地說明了實現新時期工作重點的轉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充分地暴露了我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却原來是如此的不夠，充分地證明了必然性的不可抗拒。在現實錯綜複雜的矛盾面前，在積重難返問題成山的社會沉疴面前，理論的貧乏導致了實踐上的盲目、搖擺與混亂——這已經成了有目共睹的事實。

實踐雄辯地證明了三中全會公報關於黨在理論戰綫上的任務的規定以及緊接着三中全會之後召開的中央宣傳工作會議關於理論工作必須走在實踐前面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是極其正確的，解放思想是深有見地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戰略部署。

同時，實踐還給了我們一個更爲深刻的啓示：當前理論工作必須找緊集注到一系列根本性問題的探討上來。我們不但要認識個別的規律，尤其必須認識基本的規律，必須正確地把握住社會主義生產、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只有抓住了最基本最本質的東西，只有把握住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我們的認識、我們的實踐才有可能一通百通。

五、寶貴的財富

先進理論的問世，不但有了上述這種社會需要爲背景，而且有下述這樣的現實爲依托：已經由迭經正反兩個方面的遭遇，吸取了兩個方面經驗教訓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形成了黨的集體領導的核心。

人民的覺醒是歷史的必然，這不用說了。而黨的希望、黨的成熟、黨的新生則集注在現在活着並執掌着權力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身上。他們投身革命的環境與黨成了執政黨、尤其是成了長期執政黨以後的環境大不一樣，他們懷有救國救民的初衷和抱負；他們不是在官僚制度上孵化出來的新貴，而是在血雨腥風中鬥爭過來的一代戰士；他們的經歷、他們的遭遇，已使他們不是文革前的他們了，文革鍛鍊了他們、增强了他們的人民性；他們不但了解現存制度的優點，而且對現存制度的嚴重毛病，也有了親身痛切的感受；他們已經感覺到、已經認識到社會主義牌號下的封建專制是如此的不合理、是如此的需要加以根除，他

們甚至表明了要爲人民的利益、要爲堅持眞理而不惜犧牲自己的決心（例如胡耀邦同志在檢查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而且重要的是，他們的確在身體力行用他們的實踐表明着他們的實行變革的願望和決心……他們在擺脫了林彪、"四人幫"的摧殘和壓抑之後所煥發出來的這種革命性，他們所處的地位和他們所能發揮的作用，給中國提供了和平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和現實性。他們現在最需要的是理論上的支持。而這種理論上的有力支持，又決不可能得自於脫離實際高高在上的經院學者，也不可能得自於明哲保身的"俊傑"，而注定只能得自於人民，只能得自於那些無私無畏、敢講眞話、眞正和人民羣衆共着憂患、眞正在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事業忠心耿耿的人們。

六、機不可失

在這種情況下，廣大工農兵理論工作者，一切平民理論家應當積極投身到這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之中，爲支持黨中央探求到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而勇於獻計獻策。專業理論工作者更應當像胡喬木、周揚、于光遠等同志那樣，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先鋒，重視對基礎理論、對一系列根本問題的研究和發現，追本溯源，進行創造性的工作，當好黨的參謀。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現在理論工作者多流一粒汗珠，將來就多了一分不發生大流血的可能。十月革命以來的歷史已經不可否認地證明了，在權力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這樣一種"公有制"生產方式下，權力地位對執政者具有極其巨大的腐蝕作用，處在這種腐蝕作用中執政的共產黨的革命性，往往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很快蛻化發生變質走向反面的可能。因此，我們必須極其珍視吸取了正反兩方面深刻的經驗教訓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掌政的這樣一種政治條件，以强烈的緊迫感和責任心加倍努力地工作。也許，我這樣看待問題是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但是，如果實踐證明了我在這一點上確實錯了的話，國際國內的人民大衆，不是也就可以一睹廬山眞面目了嗎？

現在有必要在這裡提醒的，倒是這樣一個問題：切不可諱疾忌醫、切不可以那種"在我死後那怕洪水滔天"的態度，把問題

遺留給後人去解決。如果不立足於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只是希圖眼前十年、二十年的“安定團結”，偏安於一時，從而必將導致十年、二十年後（甚至不等十年、二十年過後）的大流血大災難的話，那我們這一代人就要成爲歷史的罪人、子孫後代的罪人，遺臭千古！

人民正迫切地渴望着黨、渴望着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高瞻遠矚、發揚三中全會精神，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七、重印本文的原因

正是本着這樣至誠的信念，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境下，我專程來到北京，欲將我在一九七六年上半年即已寫成的，並經這幾年實踐檢驗的本文呈遞黨中央參考。但是，我到京後竟“投刺無門”！我所奔過的黨的學術機關、報刊編輯部，使我嚐到的是閉門羹，他們連看都不看，談何上達？使我深深感到面對這種狀況，即使傳達上去了，在文牘主義的汪洋大海中，像我這樣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幾年前油印出來字迹已經如此陳舊不清的文章，也難保不被投入廢紙簍石沉大海的命運！而時間又是這樣的寶貴，這樣的緊迫！在我欲獻獻不進，欲罷罷不了、窮困交迫徘徊於北京街頭的情況下，我在民主牆上讀到了《四五論壇》的文章。我贊許他們擁護黨中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現狀有一個客觀估價的立場。於是，我就去請求他們幫助我將本文上達給黨中央。《論壇》的同志們毅然決然決定翻印本文，他們爲國爲民的獻身精神使我深爲感動。爲了保證本文能上達到黨中央手中，並引起中央負責同志及我國理論戰綫的同志們對這一系列迫在眉睫、急待解決的根本性理論問題，給予非常必要的關切和進行深入的研究，我只好違背了自己想經中央審查並指導修改後再重印的意願，不得已只好遵照一九七六年原稿的面貌重印本文，於茲訴諸黨和人民，以作理論戰綫、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引玉之磚。

八、本文寫作緣起及遭遇簡述

我長期生活於社會最底層，在三大革命運動中，在黨的教導和勞動人民的薰陶下成長起來。一九七四年，是我國政治、經濟

、思想文化戰綫矛盾鬥爭極其尖銳複雜的一年。面對世界大勢，面對我國當時政治、經濟、思想狀況，我夜不能寐，憂心如焚，的確是急白了少年頭！對祖國命運的關切，社會實踐中提出的一系列問題，促使我努力學習馬列對照現實，力求獲得一個根本的、可靠的科學答案。經過大量的調查、分析、研究、認識再認識，我强烈地預感到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即將來臨，形成了本文的主題思想。但當時懾於"四人幫"文字獄的淫威，我沒有就把想法形成文字。

一九七五年初，傳達了毛澤東同志關於要弄清楚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指示。我那時已獲得的想法正好吻合了這一指示，我感到十分激動。响應毛澤東同志要弄清楚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號召，這是促使我終於下決心寫作本文的動機之一。

不久，發表了張春橋、姚文元的文章，他們的觀點與我當時已獲得的結論，完全處於對立狀況。我深深明白他們的謬論必將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實踐帶來更大的混亂，他們霸佔輿論陣地信口雌黃的惡劣行徑，使我不禁感到非常的憤怒！爲澄清"四人幫"在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等一系列理論問題上所造成的混亂，這就是促使我終於下決心寫作本文動機之二。

接着，傳來了王洪文回上海，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全面貫徹毛澤東同志三項指示的消息。我相信像鄧小平同志這樣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與醉心於建立封建王朝的"四人幫"是完全不同的！他們是有可能採納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建議的。這使我感到異常振奮。出於支持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弄清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謀求一個長期安定團結的局面，這是促使我終於下決心把本文寫出來的又一個動機。

就這樣，我懷着"蠹蟲皋爲患，大厦須翻新。篤信眞馬列，何惜頭與軀！"的決心，在極其艱險困難，完全是獨學無友、缺乏指導與切磋的狀況下，利用業餘時間，花了巨大的勞動，於一九七五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五月，完成了本文的寫作。七月，清謄完畢。五月、七月兩次給毛澤東同志寄信欲呈遞本文，均聯系不上。旋即以"馬東伍"的筆名，將本文第一次油印出來，準備

徵求理論學術界的意見。後因考慮到當時"四人幫"在思想上組織上均有一定潛力，爲避免被"四人幫"利用破壞當時國家迫切需要穩定的局面，故未作任何擴散。七七年秋冬，修訂復寫出數份，於七八年初用"殉道者"的筆名投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廣州中山大學等地，希望作爲給五屆人大的獻禮，能傳達到黨中央負責同志的手中。但是，正如想不到在"四人幫"猖獗時公開反對"四人幫"的一些人反而在"四人幫"被粉碎以後被逮捕（例如廣州的李正天等）甚至被判處死刑（例如山西的張珉、趙風岐等）一樣，我也竟因本文於一九七八年四月被拘留審查，身心受盡摧殘。直至今年三月，才在三中全會公報的光輝照耀下，獲釋出獄。

九、請讀者注意到寫作本文時的局限性

"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麼程度。"（《馬恩選集》三卷562頁）本文是歷史的產物、時代的產物，它的應運而生不過是歷史發展必然性的表現，是不足爲奇的。如果本文對於加速我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促進早日和平統一祖國、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完成國際共運反修防修的歷史任務、解除人類正面臨的新的世界戰爭的威脅，確實多少會有一點幫助的話，那麼，首先應歸功於人民，歸功於黨。同時，由於不可超越的歷史條件的局限，尤其是由於我個人馬克思主義水平的局限，生活閱歷、社會地位與視野的局限，等等，本文錯誤在所難免。我懇切地希望讀者同志們給予指正，以便我糾正本文所存在的錯誤。此次重印時，對我認爲此時不宜發表或認爲未經黨的批准我不能擅自拿出來的地方，都已略去。對此，請讀者給予諒解。

十、關於政治經濟學部分請讀者留意的地方

1. 關於現存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問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分析正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認識之上的。不把握住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就把握不住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及其內在規律。恩格斯指出："馬克思的第二

個重要發現，就是徹底弄清楚了資本和勞動的關係，
就是揭露了在現代社會內，在現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
工人的剝削是怎樣進行的。”（《馬恩選集》三卷42頁
的問題是：必須搞清楚特權和勞動的關係，必須搞清
主義事業形成了致命危害的官僚主義產生的根本原因
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也許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哥德巴赫猜想”吧？
理論工作者對這個問題一定能給予足夠的重視。今天，
應當批判那種把社會的一切成績和進步都歸因於個人
歷史的觀點，而且還應當批評那種把社會的一切罪惡
歸因於個人的是壞蛋支配歷史、造成歷史的觀點，在
踐上回到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來。要治病就須找準
膏肓往往皆因諱疾忌醫諉過於替罪羊。只有正確地認
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才談得上解決矛盾、解放生產力
現代化建設的步伐。

2. 關於現代修正主義的確切含義。長期以來，未依據歷史的
的發展，對現代修正主義這一概念作出確切的科學的及時的總結
和概括。對現代修正主義的認識，要麼停留在對老修正主義的概
念上，要麼集注在一些非本質的社會現象上，尤其嚴重的是甚至
往往把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把進步（例如把南斯拉夫）當成了
所謂現代修正主義。由於對現代修正主義這一概念就缺乏明晰的
正確的認識，以至像林彪、“四人幫”這樣的人能夠打着反修防
修的旗號大搞修正主義，以至像林彪、“四人幫”這樣的人能夠
輕而易舉地給黨內反對派扣上“修正主義”的帽子置於死地：順
我者就是馬克思主義，逆我者就是“修正主義”，這樣一種沒有
正確的是非標準，只有利於陰謀家大搞陰謀詭計的混亂狀況應當
結束了。

3. 關於勞動力性質。人的因素，勞動力，是構成社會、進
行社會生產活動的基本因素。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却忽略忽視
了對人、對作爲族類存在的人，對單個的人的研究。天天講發展
生產，講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調動人的因素、社會主義積極性
，可是，對現存社會勞動力的性質却沒有一個正確的科學的

主義實事求是的認識！生產不上去的根本原因何在？路綫鬥爭的實質何在？怎樣才能做到把勞動者的積極性眞正調動起來？社會主義的基本的經濟規律究竟是什麼？……等等，倘要對這一系列問題獲得正確的答案，都必須追本溯源，認識人，認識現存社會單個的人的因素、勞動力的性質。

4. 請注意到本文闡述的社會主義基本規律與斯太林提出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不同之點。

5. 請充分留心分工、固定化社會分工、强制性固定化壟斷的權力分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等等。

……

在政治經濟學領域裡，現在需要提請人們重視的是，"經濟科學的任務在於：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標誌，並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 （《馬恩選集》三卷189頁）

十一、關於科學社會主義部分請讀者留意的地方

首先，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儘管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曾經作了一些原則的規定，但是，畢竟由於歷史條件的局限，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同志也都囿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階段來談這個問題。準確地、全面地、科學地弄清楚這個問題，已經成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實踐乃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急待解決的迫切任務。這個問題也許可以說是科學社會主義在當代的"哥德巴赫猜想"吧？毛澤東同志在晚年已經覺察到了這個問題，提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的任務。但是，他已沒有能力來完成這個任務了。而張春橋之流則在這個問題上進一步製造了混亂。在這個問題上，本文與張春橋都同樣以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文中首次使用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時的那句話爲立論的基礎，但是，却推導出了截然不同、針鋒相對的結論！請讀者注意到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特點。注意到把無產階級專政主要當作暴力、否定無產階級民主與法制的這

種偏見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嚴重危害。請注意到無產階級專政兩個階段兩種形式的區別及其必然的聯系和必然的發展。請注意到無產階級專政在當今世界正面臨的危險的關頭與極好的時機。……等等。

其次，關於兩黨制的問題。　　這裡提的兩黨制，是共產黨的兩黨制、無產階級的兩黨制，是馬克思主義成文憲法及與此相應的法律體制之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之上的兩黨制，是無產階級專政高級形式的必然的、必須的政黨制度。歷史一定會發展到這一步，正如同資產階級的政黨制度也不是一下子就成熟起來，而是隨着資本主義制度的完善而完善起來那樣（例如美國一七七六年立國，一七九二年成立民主黨，而一八五四年才成立了共和黨形成了今天的局面）。只不過資產階級要摸索幾十年才獲得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最好形式，而無產階級却可以在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指引下，借鑒歷史並把握住自身運動的規律，加快歷史的進程，在較短期間裡找到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最好形式。社會主義道路究竟行得通行不通、共產主義到底能不能實現？正是取決於在無產階級專政形式問題上、在關於黨的領導這個問題上，能不能取得重大的突破。本文在指出無產階級專政高級形式必然採用兩黨制分權專政的同時，也明確肯定了無產階級專政初級形式必須實行一黨制集權專政。至於什麼時候實行這種由低級向高級的轉變，這一方面取決於經濟運動、歷史進程的支配作用，另一方面實現和平轉變則有待於執政的共產黨的自覺。只要這個黨的領導權沒有落入修正主義的手中，只要這個黨是眞誠地忠實於共產主義的理想，尊重唯物論、尊重辯證法，具有實事求是、爲人民爲眞理獻身的精神，只要這個黨再也忍受不了一黨制集權專制勢必導致的黨內災難性的無休無止的自相殘殺……就有可能明智地、和平地實行這種轉變，從而爲堅持社會主義、高速度發展生產提供政治上的可靠保障。有人以爲從資產階級的兩黨制或多黨制進到無產階級的一黨制，而一黨制是走向政黨消亡的必由之路。但十分遺憾的是——姑且撇開經濟上政治上思想意識形態上的諸多因素不論——歷史的發展決不可能是直綫型的，而恰恰往往是好像實行自我封閉、好像是回復到舊東西去的螺旋型的上

升的運動。因此，從資產階級的兩黨制或多黨制到無產階級的一黨制，再從無產階級的一黨制發展到無產階級的兩黨制或多黨制，才是政黨消亡的眞正的必由之路。對這個問題，歷史必然會作出公允的回答。在這裡應當指出的是：沒有無產階級的政治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的眞正的政治民主。我們必須看清楚：一黨制不可能消亡政黨而只能强化政黨，尤其是在權力被少數人强制性固定化壟斷的公有制生產方式之下，堅持一黨制所消亡的不是政黨政治，而是必然無聲無色地消滅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共產黨，代替它的必然是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老虎屁股黨，是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壓榨整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特權政黨政治。此管見所及，不過立此存照，僅供參考。

十二、關於本文原計劃內未完成的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屬於狹義政治經濟學範疇的原寫作提綱中的第十二章：《現代化生產和計劃經濟的兩重性與管理科學化問題》。這是一個較大的題目。我原想在這裡對當今世界的現代化生產狀況作一個扼要的鳥瞰，並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生產與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現代化生產應有的區別何在。由此又考察計劃經濟的兩重性。在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以現代化科學技術手段和適應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生產關係爲基礎的科學的精密的計劃指導下，經濟定能獲得高速度發展。反之，在否定或把握不住客觀經濟規律的狀況下，在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官僚主義上層建築的支配下，在缺乏科學態度、缺乏現代化科學技術手段進行計算的這樣一種前提下，所謂計劃工作却有可能對社會生產、自然資源、社會經濟產生災難性的破壞作用，造成嚴重的比例失調、嚴重的產供銷脫節、嚴重的浪費！再由此研究管理科學化問題，根據本文屬於廣義政治經濟學範疇部分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基本的經濟規律，就無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如何發揚政治民主，不斷實現更高的勞動組織、不斷採取新的生產方式、運用價值規律、科學地實施按勞分配的原則、實現經濟民主、高效率地發揮生產者的積極性、創造性、責任心，加强統計、監督預測、計劃經濟與市場

經制的科學結合等等問題，提出一系列設想、提出一部適合我國目前現實狀況、切實可行的經濟法規，使社會主義生產實現管理科學化……因此，這樣一個題目就勢必涉及整個生產、交換、分配、流通、消費等一系列很廣泛、很具體的問題、數字，篇幅就勢必很長。這樣，就有可能冲淡本文所要論證的主要問題，這是最後未把這一部分拿出來而準備就此單獨行文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要寫好這樣一個題目，就需要獲得大量的國內外生產狀況的第一手資料和可靠的統計數字，需要洞悉我國三十年來計劃工作的眞實面貌，特別需要掌握五八年大躍進年代的一些眞實數字，等等。而這些數字和資料是我在那樣的偏僻山野沒有黨和國家關懷和指導的環境和條件下，根本得不到的。因此儘管我本人認識到這一題目在現實的迫切的重大的運用價值，但是却未能在七六年上半年前完成它。

第二個未完成的部分是本文第四篇哲學部分。也許，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哥德巴赫猜想”正是破壞“科學是圓圈的圓圈”這個謎吧？我在寫作本文時，頗有一點不自量力地打算來攻克這個問題或爲攻克這一問題起一點承先啓後的作用。我强烈地感到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已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素材，或者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對二十世紀以來突飛猛進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成就，給予及時的認眞的總結和概括，繼續提煉出有助於人類更有效地改造主客觀世界的銳利武器。就拿物理學來說，從愛恩斯坦相對論的創立到最近理論物理規範場論的研究；從控制論到電子計算機器人；從盧瑟福發現原子核和電子到現在關於“夸克”爲什麼被幽禁的探討……從宏觀世界到微觀世界都有許多新的發現。又如生物學，從分子生物學到神經生物學；從物種起源到雙螺旋結構……等等，等等。在這一切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的革命性突破的時代，能夠從事哲學研究的人們該是多麼的幸運，眞是其樂融融！如果說，前一階段科學的發展是以不斷派生新的學科爲特點的話，那麼，新的科學突破及其發展的特點，則將是趨向綜合，趨向在更高一級的階段上進一步完成如恩格斯所說的那種“本質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學，關於過程，關於這些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關於把這些自然過程

結合爲一個偉大整體的聯系的科學。”（《馬恩選集》四卷241頁）如果說以往的科學研究在歷史條件的制約下，不能不比較集注在物質運動的一般形態上的話，那麼，今後的科學研究則也將在歷史條件的促成下，日益深入於物質的高級的特殊的運動形態。在這種趨勢之下，注重研究綜合，研究滲透，研究發生、發展、異化過程，研究物質運動高級的特殊的形態的《揚棄論》，不是正逢時宜、正是時代需要的嗎？但是，要完成這一工作，更是需要多麼艱苦的努力，更是需要多麼廣泛的深入的涉獵和探索，更是需要多麼集注的精力和充分的時間、資料，等等。然而，我這些年來的遭遇，家庭的窘困，本職工作的繁瑣，這些都姑且不說了，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七七年初，竟因履行本職工作而橫遭所謂“民兵小分隊”無理透頂、野蠻至極的毒打以至數月臥床不起！七八年初報考研究生竟因本論文被關押！獄中請求給予寫作條件，得到的回答竟是在整個關押期間聽不到一聲廣播、看不到一張報紙！竟是遍體的鱗傷，雙臂一道又一道入肉三分的繩索印！……

十三、中國大有希望

曾經以四大發明大大推動了人類文明與進步的中國，有着極其巨大的潛在力量。只要黨的三中全會公報得到落實，只要眞正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起來，一個思想解放、百花爭艷、飛躍發展的時代必將到來。請看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盛況，中國人才何乏？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使中國又一次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端倪。可惜長期的封建專制與中國資產階級的脆弱性等因素，又使這一端倪未能得到發揚光大，數千年來，在小生產基礎上，儒家的“禮治”，法家的“刑威”，共同支撐着封建專制對中華民族的奴役，形成了中國在世界史上最漫長的封建統治、最惡劣的專制積習，以至在現代中國還有林彪、“四人幫”之流醉心於建立他們社會主義招牌下的封建王朝。這種建立在小生產基礎上的頑固的封建專制的惡劣影响，一經與現存生產方式本身內在的嚴重弊病相結合，便造成了這樣一種相當危險的狀況：在消費這一點上，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赫赫十億之衆的國家；而在生產上，

在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創造精神和責任心、積極性這一點上，中國却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國家！這種尖銳的矛盾能避免經濟不發生危機、能使政權得以長治久安嗎？更不要去說人民的幸福，國家的繁榮昌盛、現代化，共產主義的光輝未來了。好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場漫天大火，把這一切暴露得如此之清楚！如果說，南斯拉夫共產黨人以他們的睿智使南斯拉夫免遭了如中國式文化大革命這種痛苦和磨難，就得到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發展的話，那麼，有如不死之鳥在劫後餘災中獲得新生一樣，中國將從文化大革命的痛苦和磨難之中找到根除自身弊病的途徑。如果說，中國沒有像南斯拉夫那樣對原有幹部隊伍進行過更新，並且由於十年文化大革命對教育的冲擊等原因，以致做成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感到"中層板結"、技術力量跟不上現代化建設需要的話，那麼，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却有可能卓有成效地動員全民族煥發出冲天的幹勁和神奇的智慧。如果說，南斯拉夫是通過一條漸進性的道路，從"經濟民主"到"政治民主"再到"經濟民主"而進入完全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話，那麼，中國則將通過一條飛躍性的道路，直接訴諸於"政治民主"以開拓"經濟民主"，從而爲人類踏出一條進入完全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捷徑！中國是沉睡得太久了，但是他一旦醒來定能頂天立地！中國是被禁錮得太死了，但是他一旦冲缺了禁錮的堤壩也就定能奔騰澎湃！聽吧，驚醒睡夢的沉鐘已經撞響，看吧，缺堤的浪頭已經迸出——黨的三中全會公佈就是那醒世的沉鐘，就是那疏導的浪頭！

希望就在這裡。

陳爾晉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於首都

七九年六月由北京《四五論壇》與正文一同油印出版，即該刊第十期

陳爾晉

答東方的來信

東方同志：

讀你的來信，覺得你是個有獨到見解的同志，與通文交流，感到高興。對待理論問題的直率和嚴肅，是我們這些人的共性。這裡僅就你信中對陳爾晉書的幾點不同認識，提出疑議，與你商榷。

一、「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的觀點是否正確反映了客觀存在這一關鍵問題，如搞不清楚，將直接影响對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基本理論的認識。陳爾晉同志的全部理論正是建立在「叉口路社會主義社會」內在運動即：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考察、分析、研究上的。作者恰恰不是沿襲了舊的傳統意識錯覺（東方來信）才把掛着社會主義招牌的這一歷史時期，用「叉路口社會主義社會」準確地反映出來的。我認爲，由于中國無產階級的不成熟，所以中國革命的實質不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小資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此問題我準備專題寫文章探討）因此，今天的當權政治集團，代表是封建的小農經濟的生產關係，而決不是社會主義大工業生產關係（我在《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文有系統說明，這裡就不多口了）但如果否定它具有馬克思稱之爲「多少帶點社會主義的措施」的屬性，就不僅否定了它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而且也是不符合客觀存在的。這不是唯物主義的判斷。當年馬克思稱洪秀全的農民革命思想爲東方農民社會主義，這決不是說他們能眞正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而是用「農民」這個定語，準確地反映出封建式的農民幻想和具有要求生產資料社會化合理因素的二重性。這裡所不同的只是馬克思「農民社會主義」是基于反映農民階級性而提出的。陳爾晉「叉路口

社會主義社會」是基于反映歷史發展階段性而提出的。共產黨革命畢竟比洪秀全革命進了一大步。從總的歷史發展趨勢來看，支配其歷史發展方向只有一個，但歷史唯物主義並不直觀地、簡單地把歷史運動看做一個永恆的、不變的直綫，而是充份地認識每一歷史發展階段的曲折性、錯綜性（有時變態畸形）。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紛紛走向歧路。恰恰說明了這問題。把這種暫短、複雜的歷史發展階段，用「叉路口」反映出來，不是更在于認識矛盾、解決矛盾嗎？而你提出的「中間階段」並不能科學地反映出這特殊歷史時期的本質。因爲任何一種事物的發展，都要經過「中間階段」，它只反映普遍性，並不反映特殊性。既然科學是靠概念反映的，那麼含混的概念就會導致推理（邏輯上）的混亂。那麼，這種「叉路口」時期導致趨向兩條道路的內在決定因素是什麼呢？那就是它自身生產方式上的基本矛盾。簡單地說即生產資料公有制改造完成以後，政治領導權和經濟領導權也隨之合二爲一了，進而完成了權力集中、壟斷，這時私人專權的事實就不可避免。這就形成了公有制和私有權的一場拔賽，要麼公有制被私有權改變性質走向以蘇聯爲代表的修正主義死胡同，要麼公有制的形式不能容納權力被私人佔有的內容，產生新的共權革命，趨向社會主義社會這條光明大路（中國正要走上這條路），陳爾晉同志恰恰不是簡單地羅列現象，而是深入地探索了這個社會的內在政、經結構，才用「叉路口」科學地將它反映出來的。

二、如何處理「修正主義制度」。我認爲你對「修正主義」這一概念的理解與陳爾晉同志的本意不同。我們不應將「修正」和「修正主義」這一概念混淆。人們總是在不斷地修正中前進的。「修正」本身的辭義沒有政治色彩，也沒有錯誤，你指出理論可以修正，規律不能修正，是從詞義這一概念出發的，但修正主義就不同了，它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一種思潮，而且又能轉化爲有生命力的政治敵對力量，它不但具有擾亂歷史正常發展的反作用，又能育子傳孫。僅僅把「修正主義」看成完全「盲目的、不自覺的，受規律的支配，是自然的過程」（東方的來信）是對修正主義的低估。實際上各種修正主義，往往是反客觀規律而動

，從主觀出發，干擾社會歷史的正常發展。以蘇聯爲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正是這樣。今天的修正主義，已不同于歷史上的修正主義的地位了。它可以借助于對權力的佔有，訴諸于威力統治社會。所以在今天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必須對修正主義的反作用重新認識，只有當我們充份認識修正主義是否發生了質的變化，才能探討「修正主義」這一概念是否過時。不要認爲毛澤東同志提出過「修正主義」而且他已不在了，就認爲「修正主義」是過時的論調。這種因人而移、因事而移的觀點，是極其庸俗的小市民心理的反映。我認爲無產階級從自在走向自爲，進爾代表了新生產關係走上歷史舞台，直至人類社會的最後終結，都統稱爲共產主義運動。（這一運動不會止息的），直至人類走向最後復歸的「肯定」做爲高級物質的人。「否定」領導權的毛澤東本人，由于所處階級、地位、時代的局限性，只能推行一條從維護自己統治角度出發，從清算毛澤東的戰友及其路線爲目的小資產階級的左傾改良路線。運動一開始之所以得以迅猛發展，正是它應合了人民反官僚主義的願望。但它不可能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維護自己的統治。這就是後期他們不能與人民一道進行徹底的革命，而逐步走向孤立、危機境地的原因所在。事實上每一次歷史上的統治階級的改良，無論是商鞅變法還是王安石變法，乃至近代史上的戊戌變法，儘管也具有歷史上的進步意義，但都從變法變到自己頭上而告失敗。不管毛澤東本人健不健在，由于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既受到官僚主義的仇視，又失去廣大勞動羣衆的支持，這場小資產階級的左傾改良是注定要失敗的。我認爲無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的眞正生母應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改造（第一階段），而文化大革命不過是新生命誕生的陣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獨創性地冲擊了千百年來的官僚制度，敲响了官僚制度最終滅亡的喪鐘。它的歷史功績是不容抹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雖以小資產階級的左傾改良的失敗而告終，但却孕育了徹底的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開始。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伴隨着文化大革命的急風暴雨而誕生了、成長了、壯大了，新的革命的高潮必將到來。讓我們携起手來，爲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做出貢獻。

以上所述，信口開河，不倫不類，敬請批評指正。

敬禮！

魯基

原載青島《理論旅》第二期

傅申奇

民主與社會主義

我學習的黃金時代，正好是共和國最黑暗的時期。教育不復存在，自學也困難重重，除了教育制度的崩潰以及社會輿論的影响之外，書籍的貧乏是最主要的原因。當時，新型的聖經——語錄，俯拾皆是，可是要找一本像樣的社學科學書籍却十分困難。當然，"內部參考"書還是有的，然而對像我那樣當時算"黑四類子弟的人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於連"可望"也談不上。儘管如此，馬列的原著還是充足的，通過對馬列原著的自學，我畢竟還是得出了一點自己的看法，我很想把這些想法整理出來，獻給我們的同代人，但苦於沒有時間。

一九七八年，我在上海第四師範學習，暑假裏用了幾天功夫，作了初步整理，寫成這篇文章，算是關於社會發展進程的一份提綱，本想待有機會作進一步的發揮和詳盡的論證。但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下旬，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以後，我全力以赴地投入了運動。一年多來，一直忙於應付煩瑣的日常事務和廣泛的接觸，幾乎沒有任何時間，可以用來作冷靜的理論思考。所以，發揮和詳盡論證是無從談起的。

現在，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處於相對平靜的時期，思想理論的重要性已經突出地表現出來了。每一個從事社會前進運動的人，似乎都應該在研究了現在已經能得到材料，以更廣闊視野客觀地審視我們祖國的現實情況之後，再發表自己的看法。可是這需要很長時間。再說，即使得出全新的看法，這看法與過去的看法也會有某種聯系，因而把過去的看法發表出來，既作爲自己進一步研究的起點，也作爲與朋友們進行討論的一個話題，依舊是有必要的。

因此，我將提綱性的文章照原樣發表出來，希望與朋友們共同討論，從而引向深入。但願我在不長的時間裏，能夠否定自己原有的看法；或者進一步完善這些看法。是爲序。

傅申奇

一九七八年元月於上海

每一位有大腦的同時代人，都在關注或正在關心這樣一個問題：民主與社會主義。

我們也想對這個問題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

也許有些讀者會指責我們是瞎扯胡話，但我們想預告他們：一般地說，人們都喜歡以熟悉他們本質上不大熟悉的東西自炫，不問合適與否，總喜歡隨時隨地表示他們這種虛構的熟悉；爲什麼我們就不該有這個缺點呢？而如果我們已經有了這個缺點，那爲什麼不讓它暴露出來呢？還是讓它暴露出來吧！

(一)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援引了摩爾根的一段話作爲結束："自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財富的增長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處是如此廣泛，爲所有者的利益而對它進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這種財富對人民說來，變成了一種無法控制的力量。……社會的瓦解，即將成爲以財富爲唯一目的那個歷程的終結；因爲這一歷程包含着自我消滅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方向努力。這將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復活。"

通過這段話，恩格斯表達了他和馬克思共有的一個信念：世界正在走向、並且必然走向一個更高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意味着階級差別的消失；意味着民主（通常意義上的民主）的消滅；意味着原始共產主義在更高形式的復活；意味着人類的徹底解放；意味着自由世界的最終確立。

我們可以把這個階段稱之爲"社會共和國"或"自由共和國"

它們都是共產主義的同義詞），但更確切的稱呼應該用恩格斯所用過的一個名詞——自由王國。

自由這個概念在馬克思那裡，同樣在我們這裡始終“就在於把國家由一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一個完全從屬於社會的機關”。

在自由王國裡，政治國家已經消亡，因爲作爲政治國家的基礎——階級已經消滅。但社會機關却不會因之而消滅。如果說人類的自由王國和人類的原始共產主義有什麼不同的話，那麼，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在於：自由王國有一個精密的、甚至是龐大的社會管理機關。而原始社會裡則沒有這樣一個機關，其主要的原因是，自由王國是包括整個世界的聯合體，而原始共產主義則僅僅存在於民族或部落內部。

但是，自由王國裡的社會機關已不再是社會的主人了；已不再是以社會利益的名義維護少數人利益的機構了；已不再是統治和壓迫人民的機器了；已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政治國家了。一句話，已不再是與人們對立的、獨立於人們的異己力量了。

社會機關從屬於社會，而不是凌駕於社會之上，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這是自由王國區別於它的史前社會的一個特殊標誌。

我們知道，社會活動的凝固化，使“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爲一種統治我們的、不受我們控制的、與我們願望背道而馳的、並且把我們的打算化爲烏有的物質力量。這是過去歷史（當然包括自由王國到來以前的整個歷史階段——申奇註）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見馬恩選集第一卷第38頁）這就是說，公共利益歷來以國家的姿勢採取了一種和實際利益（不論是單個的還是共同的）脫離的獨立形式，也就是採取了一種虛幻的共同體形式。

與此截然不同，自由王國揚棄了虛幻的共同體形式，填平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鴻溝，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融洽地組合成了一個東西。“由人民起作用的社會原因……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長的程度上達到他們預期的結果。”（見馬恩選集第□卷第□頁）自由王國，“在所有的人實行合理分工的條件下，不僅進行大規模生產以充份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

實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份的閒暇時間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交際方式等等——中間承受一切眞正有價值的東西。"（見馬恩選集第二卷第479 頁）。在那裡，在那個聯合體裡"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也是社會自由發展的條件。而社會機關則成了共同利益的體現物，它本身不具有特殊的利益。

毫無疑問，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自由王國在地上建立起來，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確信自由王國必然會在地上建立起來。因爲這樣一幅美好世界的藍圖，不是出自他們對永恒正義的乞求，也不是出自他們對絕對平等的渴望。恰恰相反這幅藍圖是他們依據充分的歷史和當時現實的知識作出的科學預期。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這個預期以來，時間已過去了一個多世紀，世界的面貌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在人類生產的領域裡，已向無人化進軍了；在科學技術領域，也超出地球而向星際發展了。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出的科學預期不僅沒有因此而顯得陳舊、顯得過時，反而更顯示了它的正確性和生命力。在當今世界上，從美利堅合衆國到蘇維埃聯邦，從好望角到亞馬遜平原，世界每一個角落裡的所有努力，要麼無意識地在爲未來世界舖平道路，要麼就是成了促使未來社會早日來臨的直接行動。世界的未來無非有三種可能：或者衰落，或者停滯，或者向自由王國邁進。衰落不屬於當代世界，因爲我們的世界產生了防止衰落的階級——無產階級。羅馬帝國的厄運不會降臨到我們所置身於其中的世界；停滯也不屬於世界，工業和科學的日新月異打破了一切因循守舊的幻夢。工業和科學所造成的滾滾浪潮，必將沖擊一切與世隔絕的死湖，並把它們捲進奔湧的洪流。除此以外，有哪一個人還能夠指出其他的歷史趨勢呢？

自由王國的到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不是不需要條件的。自由王國"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首先必須創造新社會的物質條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們擺脫這命運。"（見馬恩選集第□卷第 □ 頁）。自由王國是屬於人的，而不是屬於羊的。因此它的到來不依賴彌西亞或耶

和華，而取決於工業和科學的發展，以及與這種發展相適應的、人"使自己作爲個性的個人確立下來"的歷史運動。因此，人類的前進運動，必須經過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民主共和國階段。因爲唯有民主共和國，才能爲自由王國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

自由王國意味着民主的消滅，而民主的消滅是以民主的高度發展爲前提的；是以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而造成的社會階級差別的消滅爲前提的。一句話，是以社會主義爲前提的。社會主義在我們這裡具有兩層意思：其一是生產資料的國家佔有；其二是國家的人民佔有，即人民通過民主的組織佔有國家本身。社會主義還不是自由王國。因爲社會主義可以在民族國家的範圍內實現，而自由共和國却只能是世界性的。社會主義是民主共和國和社會共和國之間的中介，它是民主共和國的最高形式，同時又是社會共和國的最初形式。當社會主義遍立於世界上的時候，人類走進自由王國的大門便洞開了。

(二)

向未來發展，即向自由王國發展，必須經過社會主義，而走向社會主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就是民主共和國的道路。借用列寧的話來說："誰想不經過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會主義，他就必然會得出一種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謬的反動結論。"

這裡所說的民主，就是通常意義上的民主，而說的民主共和國，就是與專制政權相對立的政治國家。

什麼是專制國家呢？專制國家就是採用暴力維持的，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在這一點上，古代的東方專制制度、拜占庭帝國和現代的法西斯德國、蘇維埃俄國是毫無區別的，他們都是極其可惡的專制制度。

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爲人"(馬克思語)，使世界不成其爲人的世界。所以哪裡專制制度的原則佔優勢，哪裡的人就佔少數；哪裡的專制制度的原則是天經地義的，哪裡就根本沒有人了。

專制制度阻礙一切社會的自由活動，它不允許它所統治的地

區內出現任何自發的獨立組織，它只允許一個重要組織，即它所指揮的民政性和軍事性的統治機器。這是專制制度的生活準則，這不僅是沙皇的，而且也是法西斯和布爾什維克的專制制度的生活準則。

在專制制度裏，最高首領或幾個寡頭成了僅存的政治人物，他們過問一切，決定一切。在這種國度裡，龐大的官僚機構中的官僚們，通常總患着一種呆小病，他們和一般小民一樣，不敢越雷池半步，一切行動只聽從上頭的指令，也只等待當局賜予一切幸福。

一方面，是臣民們的麻漠"墨守成規"，以及營私舞弊，貪污盜竊；另一方面，是金字塔頂端的人們左右一切，在這種情況下，金字塔頂端的人們即使百倍勤勞也無法提高效率。因爲一切重要的事務，都要等他們批准，一切立法和創例都必須得到他們的明確指示，才能訂立和發佈。瓶口畢竟太狹窄了一點，而生活之水却是那樣豐盛。

獨裁者們利用全能的官僚制度使自己成了具有無限權力的獨斷統治者，從而可以不依靠人民羣衆。但是獨裁者們，實際上也日益墮落成爲這部機器的俘虜。滿足這部機器的需要，使官僚們保持精力充沛，效率高而廉潔，必然越來越成爲獨裁者們需要操心的事情。

所以，專制制度的一般特徵就是愚蠢和停滯。

在當代世界上，依然存在着專制制度，儘管這些專制制度在許多方面的效果是史無前例的，但它們同樣面臨着這一制度所固有的弊端和不可迴避的難題。

很明顯，現代專制制度，都是在工業不發達從而無產階級軟弱無能的歷史條件下；或者在工業雖然發達，但工人階級的力量由於特殊的事變而突然喪失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在前一種情況下，由於軍事官僚國家機器的强大以及工業無產階級、城市市民在政治上的高度無能，也由於歷史傳統的慣性作用，專制制度可能堅持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然而，就如飛魚能夠在空中堅持一些時候，不過它們不久就得跳回水裡去一樣，隨着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繼續活躍和高漲，專制制度也將失去存在基礎，並最終

被民主、自由運動的浪頭拋進歷史的垃圾箱裡去。在後一種情況下，專制制度注定只是一種插曲，而且只是一段多所犧牲、飽經痛苦的插曲，只是一段在任何方面都不能代替民主共和國的插曲，它決不會比民主共和國做出更多的成就。

恩格斯在談到國家政權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時說到："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現在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一定的時期就都要遭到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經濟發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動它沿着另一種方向走，這第三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爲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損害，並能引起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費。"（見馬恩選集第四卷第483 頁）

專制制度一般總是更傾向於對經濟發展起第二種或第三種作用，所以從長遠來說，現代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裡的民主前進是阻止不住的。只要大工業繼續發展，以無產階級爲主要成份的民主力量的上升就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國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國，在我們時代的歷史條件下日益成爲一種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性，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最後決定性鬥爭，只能在其中進行到底的國家形式——這種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正式講什麼財產差別了，更不正式講什麼家閥門第了。"

(三)

民主制度並不排除階級鬥爭，也不排除經濟上、政治上有力量的階級統治另一些階級，用格·瓦·普列漢諾夫的話來說，它"消滅的只是上層階級的政治特權"。在民主制度下，那種憑借出身門閥、財產等第是就自然地獲得政治特權的古老現象消聲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所有的公民，不管出身於什麼家庭、什麼等級、什麼地區、也不管有着怎樣的膚色，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樣一種狀況。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最有政治權力的人，最有影響的人，最有財產的人，也要受到法律的約束。民主制度爲階級

鬥爭的充分展開提供了廣闊的戰場。

民主制度是通過具有獨立自主力量的政黨、出版物、議會（包括議會任命的政府）這三個器官來反映和表現出來的。同時，也是依靠這三個器官得以繼續存在下去。在這三個器官中，具有獨立自主力量的政黨，這一器官的存在是有決定意義的。凡是在沒有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具有獨立自主力量的政黨存在的地方，民主就不會是充份的。在那裡，議會往往就成了一黨專政的遮羞布，而出版物則成了那個唯一的黨的應聲蟲。所以，不同政黨的存在，是民主制度的先決條件。

不言而喻，在民主制度的不成熟階段，政黨總是維護特定階級或階層的利益的。因而，各政黨之間的鬥爭也就在不同程度上表現了社會階級之間的鬥爭。但是，民主制度越是發達，政黨的這種階級屬性就越是消退。從而，不同階級利益的鬥爭也就日益讓位於各種社會政治方案之間的爭論。到了社會主義，政黨的階級屬性就徹底消失了，政黨也就成了活動性很大的羣衆性組織，階級利益的鬥爭完全被政治方案、方法的討論和爭論取代了。

可以肯定，民主生活的初期，人民羣衆還不會正確行使民主權力，而面對着民主權利不知道怎麼辦，在這種情況下，議會裡的政黨鬥爭就往往會成爲個別政治家搶佔國家秣糟的私人紛爭。可是，只要人民逐步懂得了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政黨就將確切地成爲一定階級利益的代表，私人紛爭就會退居一個很次要的位置。

人民羣衆如何學會正確地進行使民主權利呢？這樣一種生活能力不單單就是知識問題，它並不與所掌握的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知識有着直接的邏輯關係。因此，它不是可以通過某種專門學習就獲得的。民主生活的能力，只有借助發達的交往形式——自由結社—而形成的社會生活環境，以及充份報導實際生活的出版物所展開的那種更爲廣大的社會生活環境，才能培養起來。

所以，自由結社和充份獨立的出版物是使民主制從低級變爲高級的酵酶，其中出版物是特別重要的。卡爾·馬克思曾經對矯造原作的出版物所造成的社會弊端作過精僻的論述：

經過檢查的出版物起敗壞道德的作用。"最大的罪惡——僞

善——是同它分不開的；從它這一根本劣點派生出它的其他一切毫無德行的缺陷，派生出它的最醜惡的（就是從美學觀點看來也是這樣）劣點——消極性。政府只聽見自己的聲音，它也知道它聽見的只是自己的聲音；但是它却欺騙自己，似乎聽見的是人民的聲音，而且要求人民擁護這種自我欺騙。至於人民本身，他們不是在政治生活上有時陷入迷信，有時又什麼都不信，就是完全離開國家生活，變成一羣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見馬恩選集第□卷第□頁）

獨立的出版物，除了起到培養羣衆的民主生活能力的作用之外，還起着與這個作用幾乎是聯系在一起的異常重要的作用，對社會監督防止政治腐化。就這方面而言，獨立出版物所起的作用比恐怖主義的專制政府用以對待不忠誠的國家公職人員的那一切手段還更爲有效。

總之，自主的出版物“是一種能夠美化可愛的生活習慣的美妙東西，是使人愉快的最好東西 。” （見馬恩全集第□卷第□頁），是實現社會主義的不可缺少的武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政黨、議會、出版物是人民、確切地說是特定時期的人民中最强有力的階級和政治集團，統治國家監督國家機器的有效器官，是徹底的民主共和國的象徵，是民主共和國走向它的最高形式——社會主義的可靠保證。

(四)

有些社會主義者，自以爲很激進。他們對民主制度嗤之以鼻，而根本不去研究民主制對無產階級實現其社會地位的上升所具有的意義；也不去探討民主制在人類走向徹底解放的道路上的作用，他們用僵化的眼光看待民主制，一味强調說：民主共和制是“形式的”或“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剝削者對勞動羣衆的專政” 。

然而，他們是不能堅持到底的，他們實際上也不能否認民主的必要性，他們只是把它變形爲更高級的或更新型的民主（即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他們希望“用窮人的民主代替富人的民主”，使“假民主變爲眞民主” 。這種新的、眞的、窮人

的民主有些什麼內容呢？它是通過什麼形式表現出來的呢？它是在什麼意義上是更高級的呢？對於這些問題，他們只能箴口不言了。因爲，他們除了想到這幾個迷人的字眼之外，還沒有想到其他東西。

由此可以看到，批評民主制的人們除了提出所謂更好的、更抽象的同時也是更難於捉摸的民主制以外，提不出任何其他政治制度來對抗"形式的"可以捉摸的民主制。最爲有趣的是，他們居然否認他們所謂的"高級"的民主必須經過它的低級階段，就像否認壯年人必須經過青年人時代一樣。他們認定新型的民主是可以無條件地由一幫布朗基們，用他們的劍締造出來的。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那些由布朗基們或邦納羅蒂們締結出來的新型民主，從來沒有達到，也不可能達到那些空想家們的意境。"窮人"的"眞"的民主還沒有出世，就戳死在眞的謊言和眞的刺刀之下了。新的民主實際上成了最新的、最赤裸裸的、最無恥的、最可惡的專制。原因很簡單。因爲，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它取決於工人階級的成熟程度，而不是取決於布朗基們的成熟程度。

新的專制也許可以說是源於無產者和窮人的，但它決不是無產者和窮人的統治。正如從法國恐怖政權裡產生出來的，由拿破崙一世手下一批將軍進行的統治不能算是巴黎小市民的統治一樣。歷史的潮流已經指明：所謂"眞"的民主，毫無疑問地或早或遲地將被所謂"假"的民主取而代之，眞是：眞作假時假亦眞。

爲了避免誤解，我們再一指出，民主共和國不排除階級的存在，也不排除一個階級的統治，即不排除一個階級的專政。民主共和國究竟在實質上是哪一個階級的專政，這完全是依階級力量的强弱變化爲轉移的。當資產階級還是最强大的階級而無產階級還軟弱無力的時候，共和國就是資產階級專政的，一旦無產階級倔起，它們的利益成了佔統治地位利益，共和國就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但是，無論是哪一個階級的專政，在民主制度下，都是通過法律的形式來實現的。這些專政不是圍繞着個別政治家的認識和意志旋轉的，而是以整個階級的利益爲轉移的。

我們還必須消除一種思想上的模糊觀念，有些人認爲：只有

在階級消滅以後，才可能有完全的民主。所以，在階級消滅以前就不可能提出完全民主的要求，這種觀念是十分荒謬的。事實上，在階級消滅以前，完全的民主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必須的。因爲完全的民主，正是消滅階級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正是消滅階級依靠的基礎。

提出這種說法的人，是把民主的國家體制同自由混淆起來了，民主制不論可以帶來多麼廣泛的民主權利，它還是不能提供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自由，只有通過消滅階級才可能實現。

(五)

所有國家都將經過民主共和國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各個國家在這個進程中，所經歷的具體歷程却不必是完全一樣。舉目觀察一下世界，我們可以發現正在發生的大致有三種不同的歷程：一種是：人民先通過民主制度佔有國家，然後民主國家再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另一種是：國家以革命的名義先佔有生產資料，然後人民通過民主運動建立民主制，最後佔有國家；還有一種是：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並駕齊驅，穿插而行，民主化使國有化加快速度，而國有化也促成民主制的進一步完善。

這三種過程是有區別的，但是他們都導向同一個邏輯結果——社會主義。

每一個特定的國家究竟通過哪一個具體歷程走向社會主義，完全是以不同的歷史傳統和特殊的歷史環境爲轉移的。

這些不同的歷程，在本質上都意味着無產階級的上升，意味着民主的上升，預示着社會主義的來臨。

因此，我們充滿信心地認爲：如果說，在中世紀基督教社會裡，條條道路都通向羅馬，那麼在今天，無產階級的條條道路都通向民主社會主義。

讓將來要來的來吧！反正將來是屬於我們的！

申奇　一九七八年七月

轉載自廣州《學友通訊》第四期

傅申奇

我爲什麼要當人民代表——致選民

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人，居然想當人民代表，這頗有點聳人聽聞。有人指責說：這是荒誕不經的蠢行；有人評論道：這是滑稽透頂的鬧劇；亦有人認爲：這種努力雖好，但總有奇思怪想之嫌。我不想捲入爭論的漩渦，只打算表白一下，我究竟爲什麼要當人民代表。

人民代表是榮譽的花冠，是官的一種，這種觀念根深蒂固；將這頂花冠授予所謂有資歷的人，這種做法，在我國也因襲成爲習慣。然而我卻認爲：這種觀念及做法是褻瀆人民代表這一種神聖概念之內涵的。

在我看來：人民代表是社會主義共和政體中，公民權力與義務的象徵。人民通過自己的代表，行使監督執政黨——共產黨及各政府機關的政策與工作的權利，通過由代表所表達的普遍願望與要求，來影響這些政策和工作。與此同時，公民也就承擔了對於社會的義務。

所以，人民代表首先必須願意了解人民的普遍願望和意志，其次又絕對必須有勇氣表達這些願望和意志。

我堅定地認爲：那些高踞人民之上，只願理解自己而不願意了解人民的，那些把人民代表當作升官階梯的人，沒有資格當人民代表。同樣，那些在事實面前閉起眼睛，誠恐誠惶，唯唯諾諾，一味歌功頌德的人，那些出賣良心與靈魂以換取一己之利的人，也沒有資格當人民代表。

我既有了解人民意願的熱心，也不缺乏表達這種意願的勇氣，因此，我要當人民代表。

這畢竟有點「出風頭」的味道，可是應該知道這是「爲民出

風頭」，作爲人民的一份子，我何樂而不爲也?!!

我想順便指出：從底層產生人民代表，在目前，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現實的，讓我援引一樁事實爲證：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生徐政宇，係「上海青年經濟研究會」會員，(我也是該會會員）在上海縣進行試點選舉時，毛遂自薦，幾過幾番周折，已經正式當選爲上海縣人民代表，此事《解放日報》作過報道。

如果有人不習慣聽別人說話，只顧自己吹毛求疵，那麼我只能重複佛羅倫薩大詩人但丁的話：

走自己的路，讓人家去說罷！

上海動力機廠第八組選民傅申奇

一九八零年五月六日

原是傅申奇的選舉簡報第六號

傅申奇

答選民問

問：你曾報道說，廠內個別領導打電話到公安局去，遭到回絕，但現在廠方領導表示否定，說你造謠，並且某車間支部書記講，王柏華就這個問題找你談過話，你十分驚慌，岔開話題，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情：

答：我從參加選舉至今，從未與王柏華直接接觸和談話，所以，驚慌、岔開話題之類的話實屬謠言。另外，我所報道的事情，純屬事實，有根據，有來路，有證人，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擔保。如果我僞造了事實，就犯了誣陷罪，廠領導完全可以對我提出起訴，我將在法庭上證實這一事實。請選民們想一想，廠裏個別領導對我有說不出的難過，就難在捉不到我的把柄，如果我眞的公開造了他們的謠，他們會就此干休嗎？

問：據說，你向選民許諾，誰投你一票，你就給他住宅，此事確否？

答：這要麼是惡意中傷，要麼是誤會。我無論在傳單裏，我在公開和私下的談話裏，都沒有表達過半點這樣的意思。我只是說：如果我當選人民代表，我將爲迅速解決城市居民的住宅問題特別是婚齡青年的住宅問題，大聲疾呼！所謂大聲疾呼，就是向有關方面和部門呼籲，要求他們重視這個問題，積極設方想法，而我也將盡自己的能力，積極提出建設性的建議，這是朗若白晝的。我要向有誤會的選民鄭重地說：人民代表沒有直接分配房子的權力，不必對此抱有幻想。但是，我將爲從根本解決住宅問題，盡自己的努力，這卻是毫無疑問的。過幾天我與大家談談住宅問題，並希望聽到大家的意見。

問：有人一本正經地繼續在宣傳說你在社會上搞了反動刊物

《民主之聲》，你準備作何解釋？

答：對此，我想再重複一遍我在五月二十日說過的話：「有人放風聲說我所積極參予編輯的民刊《民主之聲》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果眞如此嗎？否，就我所知，還沒有一個正式文件明確指出《民主之聲》具有這樣的性質。退一步說，即使有這樣的文件，也不能說明問題，因爲做這種結論的人，很可能自己就根本搞不清什麼是社會主義，也不懂得什麼叫做眞正的反黨，這些人往往就是那種把張志新的行爲當作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選民們，要警惕呀！有多少無辜的人們曾被『反黨、反社會主義』這頂玄妙莫測的帽子壓得粉身碎骨呵！

「請容我再用政□上的反證法來說說這個問題，如果《民主之聲》的確像有人說的那樣，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那麼作爲這個刊物的主要負責人的我，就是反革命份子，就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絕不會有選民資格。而現在，經過審查後，我已被確認有選民資格，所以……就不屑我多費筆墨了。

「當然，正像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一樣，《民主之聲》所登載的文章當中，會有不夠科學、不全面、不妥當，甚至於是錯誤的提法和觀點，但這和《民主之聲》是反動的這一概念完全是兩碼事，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看來，最好的辦法是把五期《民主之聲》，一期副刊，□號《民□□》交給選民，讓選民自己來判斷。然而事情不能如願得償。一方面，我沒有時間和精力做這件事，另外，有關方面是否願意看到這樣的局面呢？也是一個問題。」

在此我想補充說，如果個別領導繼續散佈《民主之聲》是反動的這一類話，我將把《民主之聲》中的重要文章，印發給選民。

問：這兩天又開了一些黨團員，班組長骨幹會議，會上有領導介紹了你在社會上的情況，對此，你是怎樣理解的？

答：我公開宣傳我自己，作爲選舉領導小組，或其他有關領導，當然也有權力將他們所了解的我的情況，向選民作眞實的介紹。但是，這樣的介紹，應該是針對全體選民的，而不應僅僅局

限於黨團員、班組骨幹這個小範圍，因爲按照行政系統，在這小範圍裏作介紹，客觀上就有一種下達指示的□局，就我的理解，這是不妥當的，不公正的，甚至是違反的，我希望有關領導，改變這種做法。

問：如果正式候選人的名單上沒有你的名字，（下缺）

答：選舉法第卅四條規定：選舉人可以撇開正式候選人，□□選其他任何選民。

但必須注意：

(1)名字不能寫錯，並要按規定畫上符號；

(2)不能□過規定名額數，我廠有二個代表名額，所以選舉三人或三人以上的選票爲廢票，選舉二人或一人的選票均有效。

傅申奇

駁王柏華的講話

作爲黨委負責人之一的王柏華，居然在調資升級動員會上，用了那麼長的時間大談特談選舉問題，而口吻是那樣的惡劣，材料又是那樣的虛僞，這不能不說是我廠民主選舉過程中的趣聞，這不能不使人得出結論：王柏華的目的在於利用調資升級給選民造成一種心理上的恐慌，企圖使選民感覺到：投我的票彷彿就是投反革命份子的票，工調升級就要成問題。但是王柏華是徒勞的，因爲事實勝於雄辯。

讓大家來看一看事實。

一、振興社與鄧小平同志的講話

我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發起組織振興社，振興社的兩條宗旨是：

(1)繁榮和振興社會主義文藝。

(2)促進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振興社的成員全部都是青年，多數在團，還有團幹部，我們以振興社的名義在人民廣場張貼了三張大字報：

(1)《公告上海公民書》

(2)《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3)《結社啓事》

全部內容無半點「反動」可言，之後，振興社解散，不復存在，振興社就會有了我的筆名的性質。

鄧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卅一日的講話中說：上海的民主討論會（即振興社）……，鄧小平的講話，是依據了錯誤的滙報而作的，在此之後發出的市委辦公室文件，糾正了這一錯誤，並

且我在我廠正式向羣衆傳達鄧小平同志的講話之前，就曾向黨支部書記吳富强同志反映了這一情況，指出了這一錯誤，希望他轉達上去，這一切難道王柏華一無所知嗎？民主討論人的主要負責人，於去年四月十八日被逮捕，而我——振興社的發起人——至今還是共青團員，按月繳納團費，具有選民資格，這其中的原因難道王柏華心裏不明白嗎？

很清楚，王柏華知道事情的眞相，但他企圖利用廣大選民對鄧小平同志的尊敬，利用鄧小平同志根據錯誤滙報而作的講話，來故意歪曲事實，混淆視聽，以達到在我臉上抹黑的目的，以達到用轉彎抹角的威脅，妨害選民自由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目的。

王柏華用的手段是卑鄙可耻的，而用的材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這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居心不良的人；一個造謠惑衆的人；我們的黨竟然還會長期容忍這樣的人，以黨的化身、代表的身份，到處造謠撞騙，破壞黨的尊嚴嗎？

二、我的傳訊與《民主之聲》第三期被查封。

任何人，無論是黨幹部和一般羣衆，只要與某事件有關都可以被傳訊，被傳訊者，本身不一定就犯了罪，這是常識，王柏華應該是懂這一點的。

去年八月廿三日，我被傳訊，原因是需要了解被逮捕的十三個人的情況，市局方面順便將在我家裏的《民主之聲》扣押審查，不管市局的眞正目的是不是針對《民主之聲》的，但他們在口頭上再三聲明，他們對我的傳訊不是爲了《民主之聲》。之後，北京《四五論壇》幫助摘要翻印了《民主之聲》第三期，發行全國，而我們在上海繼續出版了《民主之聲》第四期，第五期，直到十二月底，由於種種原因自動暫停出刊。

可見，《民主之聲》不是被取締的，是主動暫停的，《解放日報》四月十日的文章，也只是說，這是一個「自發」刊物，而沒有冠上「反動」二字，這一切王柏華也是一清二楚的，但他仍然壞心惡意地播弄事實，其目的還是一個：抹黑我的□用欺騙妨害選民自由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讓我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談談這二個問題。

假定王柏華講的全部是事實，我早就被開除出團或受到法律制裁了，絕不會有選民資格，再不會讓我的名字出現在由選舉委員會蓋章的代表候選人名單上。而如果選舉委員會對我的情況不清楚，那麼王柏華對我是了解的。

選舉法第卅五條規定「對於公佈的選民名單有不同意見的可以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申訴」，具有徹底嚴肅的無產階級黨性的王柏華爲什麼不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申訴呢？

結論只有一個：根據王柏華所了解的情況，我的選民資格是不成問題的，當我剛開始使用被選舉權的時候，他又掉以輕心，總以爲翻不起大浪，只是到後來，當他明確感覺到，我有可能得到較高票數，因此要打亂由他一手操縱的選舉程序的時候，才匆匆忙忙，赤膊上陣，用他的話來說：採用一切手段（包括最卑鄙的手段），信口雌黃，歪曲事實，對我進行惡毒的攻擊和誹謗，欲置我於死地而後快。

可以說，王柏華是費盡心機，盡了最大努力，但是到頭來他必將以徹底的失敗而告終。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選民，比王柏華高明，他們是懂得實是求是的。

眞所謂：「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作爲丑角的滑稽演員——王柏華，究竟準備怎樣表演下去，就請大家拭目以待，也許大家還有機會欣賞他的拙劣透頂的演技。

至於其他的問題，由於今天篇幅有限，來日再談。

選舉簡報第八號

傅申奇

再談談王柏華

王柏華同一切傲慢的官僚主義者一樣，把自己估計得過高，他以爲讀過一些八股，能寫幾篇經文，憑着一套花言巧語便可蒙騙一班人，再加上他現在大權在握，眞所謂有才有勢，才勢雙全，有當代英雄之氣概。所以他深信，沒人敢對他側目相待。

在五·二一全廠大會上，王柏華丟掉鵝毛扇，親自出馬，搖唇鼓舌，大放厥詞，把種種誣陷不實之詞强加在我的頭上。萬萬沒想到，我——一個普通的公民，居然當場給他一擊，使他下不了臺，第二天又撰文嚴厲加以駁斥，素來以勇士自滿的王柏華，竟連一個招架的姿勢也擺不像樣，更不用說什麼□□□進行「堅決鬥爭」了。

王柏華做夢也沒想過，他自以爲得意的□□會在傾刻之間就被一掃而光，煙消雲散，猶如泄了氣的皮球，招人可憐；他花了幾天絞盡腦汁，搜索枯腸，終於拚凑起來的□□，會在五分鐘之內，被駁得體無全膚，就像一塊千孔萬洞，斑□□□的遮羞布那樣，惹人發笑。

王柏華啞然失聲，大概不會再發他的高超議論了，那怕還有□聲，我想那基本上也是低於20赫芝的次聲波了。

王柏華之所以發不出響聲，原因有二：也許他自認爲太高貴了，不值得與我這樣的平民論長道短，因此，躲進他的小樓成他的自鳴清高、孤芳自賞的一統去了，或者□□□□□，□實是不出聲息了。

不管怎樣，爲王柏華長遠計，我有一句話相奉告：

你王柏華既然是一個根底不深，隨風飄蕩，講究實惠的市儈，何必去冒與法律開玩笑的危險？倘若有一天法律眞板起它嚴肅

的面孔，挪動它的小指頭壓斷了你的脊樑骨，那就太划不來了，那時再叫嗚呼哀哉也來不及了。

此話雖不大好聽，然而忠言逆耳利於行麼？

話說到這裏，該向王柏華先生道別了，免得他再傷心費神，通宵失眠。

別了，滑稽演員王柏華先生。

祝願你：福星高照，官路通達，踩在同僚和部下們的□□上越昇越高，並且永遠不要停下來，否則有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茅坑裏——去的危險，那就臭不堪聞了!!!

八〇、五、廿五

選舉簡報第九號

傅申奇

與選民談住房問題

問：你在第一張傳單裏曾說：如果你當選人民代表，將爲迅速解決城市居民（特別是婚齡青年）的住宅問題，大聲疾呼！想來你對住房問題有所了解，希望你談談，譬如說，三十年來的城市住房情況怎樣？

答：我特別熱衷於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的學習，對許多具體的問題關心得比較少，再加上最近很長一個階段時間的緊張，接觸這方面的材料不多，所以談得不全面是很自然的，請多原諒。

就我所知，城市居民的住房由解放初期的每人平均四點五平方米的居住面積，降到了一九七八年的三點六平方米。一九七八年全國一百八十二個城市的統一數字告訴我們，缺房戶達六百八十九萬一千戶，佔居住總戶數的百分之三十八點六。

上海的情況也是這樣。解放初期，全市住房的建築面積爲二千三百五十九萬平方米，平均每人的居住面積是三點八九平方米，雖然國家從一九五二年始至一九七八年止，共新建住宅一千七百五十萬平方米，但是每人的居住水平實際提高有限。目前每人的居住面積爲四點二平方米，僅比解放初增長零點三一。據統計，現在全市的住戶困難戶有六萬五千戶之多，並且已登記結婚而沒有住房的青年人數急速增加。

問：住房問題如此嚴重的原因是什麼呢？

答：在我看來，最主要是經濟計劃部門沒有弄清楚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對這個問題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往往把這個問題放在一個很次要的地位，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無計劃。建國以來在住宅建築方面，既沒有長遠計劃

；也無年度計劃，住房建築部門，往往是「做一天和尚撞一日鐘」，過一天算一天，建多少房屋就算多少。

二、投資不足。建國以來每年的住宅投資額是十二億九千萬元，佔同期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五點八。具體一點的數字是：一九六〇年4.1%，一九六五年5.5%，一九七〇年2.6%，一九七五年5.9%，如果把這些數字與西方國家相比較，差距很大，例如法國，住宅建築投資平均每年佔基建投資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當然除上原因之外，還有客觀原因，這就是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

還有一些其他原因，例如原來住房改變用途也多，就上海來說，竟達四百三十萬平方米。

問：怎樣才能迅速解決住房問題呢？

答：首先，必須使每一個抓經濟建設的同志眞正搞清楚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水平。人不是爲了生產而活着，恰恰相反生產是爲了滿足人們日益增大的需要，這是毫無疑問的，只有確立了這樣的思想，住房問題才有了迅速解決的先決條件。

有了這個前提，關鍵就在於投資了。

從上海的情況來看，目前，六萬五千戶困難戶，以每戶四口需十六平方米計算，需一百多萬平方米的住房，再加上拆除舊房及新婚戶需要的住房，大約連續數年每年建造三百萬平方米左右的住房，就可以大致解決住房問題。

但是，如果以每平方米一百五十元的造價計算，則上海市政府每年要在市房建設方面投資四億五千萬元，這對政府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幾乎不堪忍受的壓力。

顯然，從政府的財政收入中撥出這筆款項是有困難的，所以必須解放思想，廢除老習慣，廣開門路，挖掘社會潛力，從多方面來籌措這筆款項。

問：究竟怎樣籌措這筆款項呢？

答：籌措住房建設投資的根本方法是使住房商品化，一旦住房商品化了，就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資金：

A）從現在起，將新造的住房作價出售給各個企業和事業單位，可以直接得到一大筆又轉向投資的資金，各單位可以將住房出租給最急需的困難戶、結婚戶（本單位範圍內，租金可稍高一點）。

B）同時，將新造住房直接向結婚戶、困難戶、拆遷戶開放，只要支付房屋成本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就獲得房屋的使用權（或者按抽簽的方法分配房屋，或者將不同地段的住房分別規定不同的價格），剩下未付的款項，可以在十年之內分期付款，一旦成本全部付清，就獲得該房屋的所有權，從付清成本之日起，向國家繳付地稅價。

馬上需要房屋使用權者，應一次付清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成本費用，對幾年以後需要住房者，可以立即按時間長短，辦理預訂房屋定期存款手續。由此，能夠籌措到一筆可觀的款項。

C）也將現有住房作價出售，對有支付能力的人，要求一次付清，對一般市民，每月從工資中扣除若干，由此也可以得到相當一筆資金。

D）此外，從今開始，盡可能壓縮房屋的大修費用，能夠不大修的房屋盡量不大修。據我觀察，一般的所謂大修，既不能改善居住條件，也不能擴大居住面積，甚至對於房屋的使用壽命也不見得有多大的積極意義，而用去的人力物力卻很可觀。如將這部份資金滙攏起來轉用於新住宅的投資，將這些人力集中起來，進行新住宅的建設，其效果就會很明顯。

假如這幾方面所籌措的資金仍不夠投資所需數字，其差額應□□由政府投資來加以補足，□□我估計，假如這幾方面工作做得好，則負擔不會太大。

傅申奇

訪南市區選舉委員會

五月廿三日下午四時零五分，我走訪了南市區選舉委員會，委員會的周同志接待了我，交談了一小時又十分。

我向委員會遞送了我的每一號傳單，並口頭介紹了我所了解的我廠選舉過程中發生的情況，當我講到廠裏有部份選民，因爲怕影響工調不敢講眞話時，周同志插話說：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廠裏領導如果用工調來壓制人是犯錯誤的。

我要求委員會派人到廠裏走走，不僅聽幹部說，也要聽羣衆說，而且要直察，不要專人陪同。我說，我一直對廠裏個別領導採取諒解態度，至今還是這樣，我只要上級領導出面干涉，糾正個別領導的錯誤做法，事實也的確如此，如果我不採取諒解態度，我早就到法院控告他們了。我還表示，假如我的傳單和講話當中有什麼錯誤的地方，我願意向全廠選民公開承認錯誤並迅速改正之，但我希望個別領導也這樣做。最後我還表示：如果我通過正常渠道得不到公正和合理的話，我將運用我可能運用的，向社會各界呼籲，以求得到公正和合理。周同志邊談邊作了紀錄，最後答應調查核實，並於星期二打電話與我聯系再詳細談。

順便提一下：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三點，我打電話到市人大常委會選舉辦公室，要求面談，辦公室×同志說，□□已由區選舉委員會辦理，如對區裏的解決方法不滿，再告市裏不晚。

欲知上級領導究竟持何態度，請諸位選民稍等數日，自有分曉。

原是傅申奇的選舉通知第一號

傅申奇

公開信

上海市人大常務委員會選舉辦公室：

我們南市區第一選區（上海動力機廠）昨天進行無記名投票，選舉人民代表。我作爲非正式代表候選人，獲得636票贊成票（不過半數），僅次於正式候選人之一孫文周（779票過半數），由此可見，在一系列的民主討論協商過程中，我選區的民意沒有充分表達出來。

選舉法第三十八條規定「獲得過半數選票的代表候選人名額少於應選代表名額時，對不足的名額，另外選舉。」

我選區應選名額是二名，而現在過半數代表候選人僅一名，所以應「另行選舉」。

鑒於我廠個別領導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我採取了壓制態度；

鑒於區選舉委員會某成員，在我選區選民小組長會議上公開造了我的謠，從而用威脅，欺騙等手段破壞了我選區的選舉，妨害了我選區「選民自由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我對即將進行的一次選舉不敢抱十分信任的態度，所以我籲請你們立即對我選區加以關注，對即將進行的另一次選舉進行監督，以免再出現違法行爲。

此致

敬禮！

上海動力機廠非正式代表候選人

傅申奇

八〇、六、二

選舉通知第二號

傅申奇

王申酉烈士永垂不朽!!

紀念民主運動的先驅者
我的老師——戰友——王申酉
一九八〇年九·一　　傅申奇

一、

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是民主運動的先驅、我的老師和戰友——王申酉烈士遇難三週年的日子，我多麼想說點什麼來表達我的悲痛心情；我又多麼想寫點什麼來寄托我對他的哀思、叙述他留給我不多的但十分可貴的回憶。我未能如願以償，但我做了他肯定會希望我做的事情，就在這一天我在廠裏散發了傳單，投入南市區第一選區的選舉活動，爭當人民代表，我用我的實際活動在紀念着他。

今天我終於有了一點時間，便信手寫下這些難忘的往事，抒發三年來一直都積在我心裏的悲哀，以此來表達我對他的紀念。

我認識王申酉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那時正值轟轟烈烈的天安門廣場的羣衆運動被刺刀和棍棒血腥地鎮壓下去之際。烏雲籠罩着陳舊而到處散發着霉味的「共和國」，「紅色恐怖」施逞着不可一世的淫威，可謂甚囂塵上。迷霧中，人們不是消沉得不可救藥，便是麻木的令人髮指。但是地火在地底下運行，眞理之火是淹沒不了的，所以也不缺乏在沉默中等待、在迷霧中探索、在黑暗中奮鬥的人，王申酉便是其中很出色的一位。

王申酉生活在一個勞動者的家庭，他父親是閘北區委的工作人員，他家的親戚朋友當中有不少是黨員、幹部。他天資聰穎，酷愛學習，還在他剛考入華東師大的時候（十八歲）他就開始了

獨立思考。在大學裏，他除了出色地學習各門學科之外，幾乎每天都在寫他的永遠寫不完的日記，在日記裏他寫下了大量中肯但往往是十分激動的語言，他針貶時事，無情鞭撻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對國際國內的各種政策發表很有見地的議論。他的一篇日記都常就是一篇雖然粗糙但却是完整的論文，他的日記顯示了他青年時代的才華。不過那個時候他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還不熟悉馬克思，但他已經是一個本能的革命者，他批判着現實，面向着未來。

「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了。他記日記的出奇熱忱，觸動了以搞「階級鬥爭」爲職業的鷹犬們敏感的嗅覺，於是乎在一次團幹部與他促膝談心、希望他爭取入團的時候，他的箱子被偷偷地打開，日記被拍了照。羅織罪名的活動悄悄地展開了。

不久，文革爆發。對於他的打擊暫時就告停止。起先他沒有積極參加運動，稍後，他搜集了關於常溪平的材料，寫了一篇有聲有色的文章，一時成了常溪平問題的專家；後來他參加了新師大公社機關刊物的編輯工作，在此期間他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特別是經典著作家們關於巴黎公社的論述，因此他對毛澤東後期的思想和實踐作了理想化的理解，把文革看成是實現巴黎公社原則的一次偉大嘗試，所以他在理論上爲文革進行辯護，他最系統、最完整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跟着毛主席在大風大浪裏奮勇前進》（全國許多大學圖書館也許還保存着這篇文章）。

歷史就是那樣的冷酷，當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暴發戶大權在握的時候，秩序就成了第一需要，衝鋒陷陣的紅衛兵運動被無情地粉粹了，其中的積極份子就像被用舊了的工具一樣，只落得一個命運—被拋棄。隨着第二次炮打張春橋的失敗，師大紅革會及反復辟協會的頭頭們，便被當作反革命份子，又是批、又是鬥。王申酉也被陷進了挨整的行列，「運動員們」根據「四清」時就搜集的材料，試圖把他打成反革命份子，爲他辦了「日記展覽會」，甚至專爲他開了全市的拉綫廣播批鬥會，但一直定不了案。

以後的幾年中，他一忽兒被隔離審查，一忽兒送到農場勞動，一會兒被關進公安局審訊，一會兒又送回學校監督改造，始終

沒有安排工作。然而王申酉並沒有屈服於命運，就在這漂移不定的日子裏，他鍛鍊身體、學習外語、研究馬克思主義，脫胎換骨成長爲一個自覺的革命家，成了馬克思的優秀學生。他寫下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僅《資本論》一書的讀書筆記就有一百萬字之多。

二、

這時我與他相遇了。記得那是五月六日的傍晚，我拿着凱恩斯的名著《利息理論與貨幣通論》來到黃浦區圖書館，借了一本修昔底德的《伯羅奔瓦撒戰爭史》坐下閱讀，他坐在我的對面，用敏銳而深沉的眼光掃視了我放在桌上的書，然後將目光停留在我年輕而單純的臉上，他似乎覺得有趣，於是微笑對着我說了話，接着我移動了一下位置坐到他旁邊輕聲攀談起來，片刻我們竟成了摯友。

此後，我們每隔一二天便在一起看書、散步及討論種種問題。我們的看法驚人地相似。不過他的見解總是更爲系統、深刻和有根有據。在人民廣場、在人民公園、在上海市圖書館，我們渡過了一個又一個有意義的夜晚。

他認爲：馬克思的理論儘管不是盡善盡美的絕對眞理，但畢竟是系統的、完整的科學理論，並且就當時所見還沒有一種理論可以整個地超越於它。他特別推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把它看作是分析及理解社會（包括當時社會）的科學方法。他對根源於權力意志的社會飛躍理論及實踐抱着批判態度。他毫不懷疑，馬克思主義被那幫大吹大擂的馬克思後裔們宗教化、庸俗化了，它的革命本質被褻瀆、被閹割了。毛澤東晚年那些充滿動力辭令與華麗且神秘色采的說教和實踐，在他看來只不過是對於骨子裏的封建主義的拙劣的掩飾。他認爲，中國並沒有成熟的工人階級，因而中國共產黨並不純粹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毋寧說它主要地是革命知識份子領導下的農民政黨；由此可以推論，這個黨領導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政權易位的農民革命，所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漸漸演變爲帶有東方專制主義一切特徵的新專制主義社會。他曾十分激動地說過：毛澤東不過是帶着軍帽的農民，他對毛澤東頭上那頂馬克思主義者的桂冠表示懷疑，至少不承認他是一位卓越的馬克思

主義經典著作家。所以他提倡要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批判所謂毛澤東思想，他着手組織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決心重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而進行不懈的努力。從國際共運的角度着眼，他認爲：從斯大林時代開始，國際共運就存在着封建社會主義思想體系與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對立與鬥爭，而毛澤東與斯大林一樣是封建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代表人物。當時他覺得，蘇聯在否定斯大林以後出現的一系列改革是科學社會主義佔主導地位的表現。因此他肯定了鄧小平同志當時所沒有徹底表達的思想和政策，把他看作是科學社會主義體系的重要代表人物，儘管當時文革派或稱少壯派（現在都可以歸在四人幫等派系這一名目之下）張牙舞爪、盛氣凌人，但他却斷然預言了他們必然要滅亡的命運。他滿懷信心地相信：隨着文革派的垮台，必定是以鄧小平同志爲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者的時代，也就是盡可能吸取蘇聯改革的成功經驗在我國進行改革的時代。他給予「四五運動」以高度的評價，矇矓地感覺到，它是中國新的政治運動的先聲，他的揣測，由於這種政治運動，中國政治也許會出現不同於蘇聯的許多新特徵。

由於我手上沒有他的系統文章，而只能依據我們之間的談話，所以我對他當時的思想的描述只能是粗糙的、片段的，也許還有不確切的地方。好在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留下了一篇系統的文章，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這篇文章與世人見面的日子不是太遠了，到那時請大家來公斷我的介紹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確的。

我所提的那篇文章，是他給他的女朋友的一封長信，也就是作爲判處死刑依據的那篇文章。說起那篇文章，我與他在最後階段相處的情景，就浮現在我眼前。

他有過不止一個女友，由於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地是因爲政治上的原因，而不能維持下去。也許是七六年七月下旬，有人給他介紹了一位女友，她確實是一位不尋常的女性，她有獨立的見解，甚至會和王申酉一道，對拉赫美托夫的性格和生活大加讚賞。所以通過僅有的幾次接觸，他們便產生了眞誠的愛情；但是她對於前途有點悲觀，信心不足，王申酉爲了使她更加振作起來，便寫下了一封長信。

九月二日我在市圖書館碰到他，他正忙於寫作，臨別時我握着他的手說：現在也許是黎明前的黑暗，請他份外小心，並約好九月十日在南市區圖書館見面。

然而這一別竟成了永訣。由於毛澤東的去世，圖書館關門大吉，我沒有見到他，三天後我到他家去，他母親說他出去了，並說他不會回來了，我下意識地感到出了問題，我推斷，由於毛澤東的去世，像他那種所謂有歷史問題的人就被監視起來了，他的信落到了有關方面手裏，從而被逮捕了，不過我當時相信，他還是會回來的。

三、

不久，「四人幫」垮台了，我歡欣鼓舞，從心底裏歡呼這一歷史性的轉變。我指望不久便能重見我的老師和戰友，我積極行動起來參加對於封建社會主義體系的批判。還在七六年十一月，我就向《紅旗》發出了題爲《從「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看左傾機會主義者的眞面目》的文章。

可是封建社會主義勢力並沒有輕易地退出歷史舞台，他們仍然佔據着很大的地盤，還對人民舉着嗜血的屠刀。

對於王申酉的問題，當時市委存在着不同意見，但當時市委的某大人物大筆一揮，批了「此人不殺對不起毛主席」，便將王申酉置於死地了。

七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四人幫」垮台半年以後，案例討論稿上出現了王申酉的名字，有「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字樣。我顫抖的手拿着鉛印的胡言亂語，心中悲憤交加。一封信再加上某大人物的一句話，竟將一個人置於死地，這在法律史上難道不是最血腥的一頁麼？我默默無言，我不能改變這悲劇的局面，但我堅信，這樣的時代終將要結束，也一定要結束。

每當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有點徬徨和動搖的時候，我就似乎聽到他在堅定地誦讀在他每一本常用的書和材料的扉頁上都寫着的馬克思名言：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夠爲人類作出貢獻的職業，我們就不會爲它的重負所壓倒，因爲我們是在爲全人類而工作，我們的幸福屬於千萬人，我們的事業並不煊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而面對

着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我能不振奮嗎？

目前，也許市委和有關方面在重新討論王申酉的問題，也許還有人繼續對他橫加指責，不願推翻壓在他頭上的莫須有的罪名。但是，我相信：每一個正直的人，只要看過王申酉最後一篇文章，都會承認，他是一位有才華的青年，一個堅定的革命者，一位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一位卓越的民主戰士。如果權貴們不肯承認這一點，歷史終究會承認這一點。

我不認爲王申酉的看法會一成不變，倘若在今天，他肯定會提出更多有價值的思想，可惜他已經沒有這樣的可能了。對我來說，要緊的是繼續前走，既做他想做而沒有做的事，也做他沒有想到做而現在需要做的事情。

瞻望實現民主制度的前景，尚有「路漫漫其修遠兮」之感。如果在前進的路上還需要新的血及新的犧牲，就請從我開始吧！

四月二十八日，王申酉爲了馬克思主義的眞理，爲了社會進步和人民的幸福，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時年三十二歲。不用懷疑，即使在死神的面前，王申酉也沒有背棄眞理，低下高貴的頭，他是滿懷着對未來的憧憬而走完了生命的路。他死了，他的肉體消失了，但他又活着，他的精神及氣質，活在我和每一個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上。

四、

在過去的三年當中，王申酉的音容笑貌時時浮現在我的眼前，他彷彿每天與我在一起學習、探討及戰鬥，他和藹可親的儀態、刻苦學習的精神、認眞踏實的工作作風、爲眞理獻身的氣節，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貫徹在我的行動中。

傅申奇

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態度

——《責任》編輯部

民刊被稱之爲「細菌」和「傳染病」，被說成是無政府主義的產物，所以取消民刊已成爲付諸實行的××之一，而「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罪」、「破壞安定團結罪」、「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彷彿成了新的刑律，這一切是在撇開「政協」和「人大」的情況下做的，這難道不是中共某些領導人以中央的名義推行的赤裸裸的無憲法主義的惡劣行徑嗎？

我們認爲：祇能用法律的手段解決民刊問題，所以政府必須立即頒佈《出版法》或《暫行條例》，然後由各地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對於各個刊物的「合法」與「非法」問題作出裁決。

對於那些無視法律的專制主義手段和方法，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機關刊——《責任》編輯部，將堅定地舉起民主與法治的旗幟，不惜作出犧牲，進行殊死的抵制。

我們相信《責任》將成爲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爭取民主與法制的一面旗幟，一日不達民主與法制之境，一日便有《責任》之存在，它會在一些人的手中倒下去，但又會在另一些人的手中樹起來。可以斷言：在我們這個重要的歷史時代，需要能承担歷史「責任」的人，也決不會缺少這樣的人。

現《責任》編輯部將頂住一切不正常的壓力，繼續出版《責任》（半月刊）和「《責任》理論增刊」（季刊）。另外不定期出版《號外》，同時立即組織「民協」、「各團體」及廣大民主戰士上京交涉代表團，上京與中央和政府領導人直接進行公開的交涉。

傅申奇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

附：傅氏兄妹

家庭災難——社會探討

我們的兄弟傅申奇

傅申奇投入民主運動已二年了，他以全部精力獻身於民主運動，先後組籌了「振興社」及刊物《民主之聲》。最近又參與承辦了中華全國民刊協會《責任》的編輯工作，對社會上存在的弊病，尤其是對官僚主義予以嚴厲的抨擊，意在不斷改革，健全民主制度。

申奇排行老二，他從小艱苦樸素，嚴於律已，作風正派，少年時期就敢於探討，敢於進取，敢於同不合理的現象作鬥爭，是個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他刻苦攻讀馬列著作，研究社會科學理論，堅信共產主義必定勝利，用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來對待現實，探討當今社會，他認爲社會主義是一場運動；現在的社會既然不是完美的，因此就必須不斷革命，使之完善。社會主義必須是民主的，人道的；民主制度當然要比專制制度來得科學，合理；……這就是他的觀點，也就是他的出發點。

申奇之所以走上這條通常被人們理解爲「危險」的路，置身家性命而不顧，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礎的，其中與我們家庭的災難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在這個家庭裏，我們有着無憂無慮的孩童時代，也有着青少年痛苦的記憶，我們曾無比信賴過現代宗教迷信，我們又面對徬徨、現實、徘徊、眞理、正義、正直的含義究竟是什麼。他終於在偉人們的著作中從很活生生的社會生活中找到了答案——科學社會主義。他的觀點是堅定的，他會實現他的誓言：「我們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爲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申奇於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出生在一個清貧的民警家裏，這個家連一張像樣的床和桌子都沒有，更談不上有什麼財富，然而

這個家庭是美好的、好睦的。母親是個沒有文化的農村出身的孤兒，樸心地是個極善良的人。解放後，她在掃盲學校裏讀完初小，又在里巷裏積極工作，她滿足新社會爲她帶來的一切、衷心熱愛新社會。「說老實話，做個誠實和正直的人。」這是母親的教誨——也是我們處世的座右銘。我們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社會主義好」這首歌是我們最喜愛的歌曲之一，記得我們還輪唱、合唱以此爲樂過。當然這都是父母賦予我們的原始感情。

黃金般的童年在安定的年代裏無憂無慮地逝去，申奇十二歲那年，那時他是五年級學生，正直的父親由於向個別黨員指出不正之風，受到打擊報復，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建國十六年後，他竟成了地主。申奇可憐的妹妹才七歲，我們都生長在城市，連農村都從來未去過一次，含糊的概念硬要我們接受，無情的鞭韃逼着我們承受。這天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母親感情是複雜的，「對黨並無敵意，爲什麼會這樣？」她悲痛欲絕，委屈地痛苦，她當時是□□幹部，盡管她以前積極，也只能「嫁鷄隨鷄」了，可憐的妹妹和我兄弟也在哭泣中進入夢鄉。這天父親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後來我們又被父母的哭泣聲驚醒，這樣一家人用辛酸的淚水渡過漫漫長夜，然而，這僅僅是悲劇的序幕。

六月份暴風驟雨般的大革命開始了，它席捲全國，無數善良、正直的人們，數以萬計的家庭被摧殘。作爲地主家庭的我們，處境難熬是不言而喻的，的確，在我們童年、少年時代，父親一直嚴格要求我們，並要我們「好好學習，聽黨和毛主席的話，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他在我們的心目中是慈祥的、善良的、崇高的，然而嚴酷的現實又使我們感到必須與父親劃清界線（可悲的時代），開始我們都以革命姿態對待階級敵人——父親，儘管我們眞心眞意地站在革命人民一邊堅決鬥爭，可是不久我們還是成了狗崽子、混蛋，社會的壓力，是如此多樣化地向我們襲來，但歧見並沒有使申奇消沉下去，他決心把「反動老子」批臭鬥垮，以表示他的立場堅定。其實在那個年代裏，黑七類份子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幸者，他們不但在學校裏受到極大打擊，社會上的壓力也是極大的，有的地方乾脆就叫我們狗崽子，我們是無法表白的，顯然申奇的做法是徒勞的。我們恨這個家，更恨父親，可是

又有誰知道，這個家在消亡的邊緣掙扎，父親本人更是在逆境中求生存。

記得那年八月一個夜晚，我家被搜了，當然作爲財物是一無所有的，當時靠父親的微薄工資把全家養活就不容易了，結果只搜了父親的日記、信件和幾元公債券、一頂警察大蓋帽，作爲罪證。申奇的立場是鮮明的，當時找了那些頭頭：「父親雖然沒有田地，可是帶了一腦子的反動思想，我要和他劃清界線。」（那時他才是12歲的小學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父親爲抄毛主席的《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新罪行，被罰跪、鬥爭，但他不服，因爲他認爲「既然叫改造，又不讓人接觸毛澤東思想，這顯然是沒有道理的」，然而該單位送他去徐滙分局扣留，我們和申奇都有說不出的滋味。

由於父親的性格倔强，又拒不認罪，鬥爭也就越來越頻繁，經常通宵達旦，夜以繼日，但是申奇都沒有對文革不滿、對黨不滿。

在一次鬥爭會上，造反派氣勢洶洶地到我家來揪母親，妹妹吓得直哭，看着他們把慈愛的母親連拖帶拉地推下樓，把母親的頭髮也揪掉許多，說她是地主婆。母親有什麼罪？她一生多苦，今天還遭凌辱，這給我們的感情帶來了莫大的打擊。難道在舊社會受苦的人在新社會同樣過不去，這究竟是爲什麼？爲此母親要以死來表白自己，這個家瀕臨家破人亡，全家在痛苦中渡日，最後母親爲了她的孩子們苟生下來。

六九年對申奇來說是他立志爲人類奮鬥而努力學習的開端，這年由於父親的問題，他的哥哥被牽連，只能到邊疆去插隊落戶，朝夕相處的兄弟要離別了，弟弟完全理解他哥哥的不幸，直到臨上火車時還要一同去，但無情的火車把他們拆散了，從此弟弟他獨立思考，沒有在蔑視的眼光下匍匐，反而精神振奮地對生活寄予無限希望，他決心從事藝術——繪畫，一開始進展就相當快，他到處尋找同行共同探討，他把僅有的零用錢都用在繪畫上，不久他畫油畫了，他創作很多。影響很深的是《魯迅和青年在一起》，使人們彷彿看到魯迅先生到今仍在啓蒙新的一代在不斷追求理想，向不合理的一切挑戰。

七三年，申奇在家庭又一次倍受屈辱的情況下，醒悟到這決不是個家庭問題，是社會不公正必然產生的現象。他決定停止他的藝術生涯，開始了社會科學的研究，從此不斷向縱深發展。事實就是這樣，家庭的壓力卻成了申奇學習研究的動力。那件事是這樣的：七二年底房屋拆遷人員乘人之危，用恐嚇、威脅、欺騙手段把我家遷到舊房子裏，而他們卻利用特權搞三調住進了新公房，母親和我們都受到了極大的侮辱。雖然他們是毫無道理的捉弄，我們卻只能忍氣吞聲，申奇甚至被斥得流淚回家，當父親指出他們欺上瞞下，他們非但不改正，反而串通單位，□□狠狠鬥父親，在這個社會爲什麼爲什麼正直的人會如此下場，而那些弄虛作假的人卻如此神通廣大，爲所欲爲，甚至飛黃騰達，這究竟怎麼解釋呢？這僅僅是一個家一個人的問題嗎？申奇和他的小伙伴，通過小伙伴的家庭，通過社會上一系列怪現象而了解；他友愛地問這是爲什麼？爲什麼？他決心從馬、列、恩、斯、毛的著作中要求全面的答案。時年十九歲，他沒有徘徊，抓緊生命的每一秒鐘，認眞讀書，在上海圖書館、黃浦區圖書館、虹口區圖書館……留下了他發奮讀書的足跡，爲了多看一點書，通常是在那裡吃個麵飽就解決了晚餐，無論何時地，一有空他就捧着書。一段時間後，他變得沉默寡言，母親眞担心他成了書呆子，他說：「媽媽，你不是希望我做個正直的人，一個好人嗎？我只有努力學習，才能做好事。」王申酉烈士就是那一段時間他在黃浦區圖書館認識的，他們共同探討、研究。青年一代之所以有希望，就是因爲他們有獻身精神、追求眞理的信念，他們認爲只有社會改革才能使每個人、每個家得到解放。今天的事實也表明了社會改革後解脫了無數人和他們的家庭的不幸，挽救了一代青年。中華民族的振興必將在不斷的改革中得以持續。用馬克思主義的一句話來概括:「無產者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他刻苦選讀了哲學、經濟學包括古典的名著，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他更是認眞攻讀，諸如亞當·斯密、李嘉圖、黑格爾、費爾巴哈、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傅立葉等人的名著作，他還通讀了世界通史，他酷愛這些書籍，不久他的書籍滿屋皆是。

七三年底，申奇對他哥哥說了驚人的話。他認爲知識青年到

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必要性是不科學的，作爲前進中的社會這是倒退。先進的國家應當農村逐步城市化，而長期在農村無限期接受再教育的青年，只是整天怨天尤人。儘管這些話是有其道理的，當時卻是大逆不道的，是冒着極大的風險，然而他回答是：「在攀登科學高峯的道路上，是沒有平坦的道路可走的。」

七四年三月他寫下《生命的宣言》，發誓要爲人類最偉大的共產主義獻身。他在這篇近萬言的文章中認爲社會的前進是必然的，他要實踐高爾基所說的「最光榮最偉大的職務就是在世界上做一個人。」他文章的結尾，這樣寫到：

對於爲必然性開闢道路的人，災難會降臨到他的一生，我自己本也知道這樣的事情，然已我的命運卻早已註定。

告訴我，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沒有犧牲而自由居然會得勝在戰場？爲了全人類的徹底解放，我甘願□□，我知道我能夠也願意做到這樣，我清楚地知道，在達到理想境界的征途中沒有平坦的康莊大道。可走，只有在那崎嶇險路上勇於攀登，敢於奮鬥的人才可能達到目的。

奮鬥的艱辛啊！筋骨俱傷，

奮鬥的悲傷啊！心肺欲摧，

奮鬥的快樂啊！冲破桎梏迎來明天，

生命的奮鬥是徹底的，奮鬥的生命是壯麗的，

最後引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來結束我的宣言：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當怎樣渡過呢？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渡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爲而羞耻，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就可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爲人類解放而鬥爭。

一九七四年三月

這年夏天，他用汗水精心爲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車爾尼雪夫斯基、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普列漢諾夫作了二幅油畫，這是他迄今爲止最後一次繪畫，從此再也沒有摸過他心愛的畫筆，現在看來他對這二位先驅者的崇敬心情是發自肺腑的。

同年七月他在《生日留念》中明確他從事社會科學堅定的信念：

今年的生日表明我已經存在二十個年頭，童稚的幼稚，少年的魯莽，心血來潮的熱情，徒然的傷感，也將隨着這個日子成爲過去。過去的生命已經死去，就讓它死去吧！我不要它復活，讓它自己埋葬自己，並爲自己痛苦吧。眞正富有生氣，精力充沛的歲月從這裡開始。

往昔在矇矓中消失，未來在驚醒中誕生。

我未來的生命已獻給科學，主要的是社會科學。從事科學的研究是我們的工作，爲科學的眞理而鬥爭是我義不容辭的職責，我既不需要充滿虛無飄渺的幻想，唐．吉訶德式的騎士熱情，也不能給內心充滿矛盾、行動猶疑不決的哈姆雷特的性格留下任何餘地。

赫爾岑說：「科學不是可以不勞而獲的」——誠然在科學上除了汗流滿面是沒有其他致獲的方法，熱情也罷。以整個身心去尋求也罷，都不能代替勞動。「我需要的是誠實而艱苦的勞動，對我來說，事情不是在於把某種思辨的原則從外部注入世界，而在於從世界中找出這些原則，並從世界中加以證明，同時特別注意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最終的絕對的、神聖的、一成不變的東西，除了發生和消亡，無止境的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麼都不存在，對於世界上的認識本身也不過是這一過程在思維着的頭腦中正確或不正確、全面或不全面的反映而已，而所謂科學只不過是對於這一過程正確反映的學說（即然過程是不斷發展的，科學的認識也是隨之而發展）因此科學決不是說：「跪在這裏，□□這一切，我會把我珍□的眞理給予你，你只要卑躬屈膝地服從我，就能得到它。」

自然在這裏，個人的命運是難以預測的，但是費爾巴哈的話成了我的信念，「凡是已經着手的事，務必全始全終，無論結局將你引到何處，幸福或不幸，天堂或地獄，幸福是僥來之物，竟功則必盡其職。」我雖然因此可能失去個人的幸福，減少或喪失自己的存在，然而我所抱的念頭正如別林

斯基說的那樣：「即使我自己生活不下去，也叫別人以後能生活得更好些。」或用魯迅的話來說：「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爲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爲的是能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鬥。」

既不要畏懼侮辱，也不要希求褒冠，讚美和誹謗都平心靜氣地容忍，我決不想成爲那種不能經久與世隔絕，既沒受過鍛鍊，又不能發聲息——從來不衝擊去和敵人照面，卻在一場爭取那不朽花環的艱苦競賽中偷偷溜跑了的英雄。

我將能夠這樣驕傲地宣稱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我成爲內心自由的人，眞正的靈魂是不會死的。

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

申奇就是這樣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礎（那時國家的情況大家都是清楚的），他爲的是改革社會，使之前進。

七五年鄧小平重新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他滿腔熱血地期待祖國民族振興起來，但好景不長，七六年一月八日，總理逝世後形勢急劇變化，鄧小平也隨之消聲匿跡了，以後他在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幫」後寫下了充滿信心的詩句：

滿江紅

——回顧與前瞻

寰內中國
痛失英豪肆魔虐
猙獰露
幾聲喧囂
幾下跳躍
刀劍鏗鏘雨花台
鮮血盈灌長安谷。
正危難
英雄從天落，
鬼蜮除。

昔大師
指宏圖

留遺務
夙願飛彩虹
必爭須臾
海內工農竟踴躍
天涯志士創新運
環全球神州拂赤纛
滿天舞。

申奇與全國人民一樣對未來充滿希望與信心，可悲的是他的老師和戰友王申酉在「四人幫」粉碎半年之後仍沒有倖免，七七年四月廿七日他在充滿勝利的希望中倒在血泊裏，這對申奇的刺激太大了。之後的幾個月裏，他經常在夢中呼喚王申酉的名字，睡夢中驚醒，眼裏殘留着淚水。他——一個正直的青年繼承烈士的遺志的決心更堅定了，他堅信歷史的巨輪總是向前的。聰明的人站在它的前頭，而愚蠢的人被它拖着走，因此他認爲決不能再重演這樣的悲劇，爲民主制度的奠定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就這樣我們的好兄弟（好哥哥），他頭也不回地朝着他自己覺得應該走的路走下去了。

這——就是我們兄妹對傅申奇的認識。

傅申平
傅申桃
傅一玲

81.5.26.

鑒於五月上旬市公安局一位不願講明他姓名的人首次接待我們，根據中央九號文件精神要我們滙報對傅申奇的認識（九號文件我們所在單位還未傳達），爲此我們兄妹三人將我們看法呈上。

何　求

事實的澄清

從七八年下半年開始的民主運動到現在已一年多了，在壯闊的民主運動中蓬勃誕生的民辦刊物也一年多了，時間雖短，其間却經歷過多麼艱巨的道路，經受過多少嚴酷的壓力，但却一直頑强地戰鬥着，這裡面就雄辨地証明了廣大人民羣衆普遍要求民主、憎恨官僚壓制、要求改革社會現狀的强烈願望。特別是年青的一代，他們逐步認識到祖國與民族賦予他們的偉大任務，旺盛的生命力推動着他們向人類進步的道路上前進，然而，現實的鬥爭中不會輕易讓他們得到寬恕，也無需抱有什麼幻想，我們可以看到目前民主運動處於受嚴重打擊的情況下，全國各地都會一樣，毫不例外，廣東的民主運動亦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四月四日廣東省黨機關報≪南方日報≫登出省長習仲勛同志爲≪廣東青年≫第五期寫的≪光榮屬於獻身四化的青年≫一文中，明顯地針對民辦刊物打出這樣一個嚴重的信號，他是這樣說：

"他們打着「爭民主」、「爭人權」的旗號，實質上是攪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前一段時間，這些人熱衷於寫大字報，自發出版刊物；直到現在，仍有極個別人在那裡攪秘密串連，甚至和海外進行秘密勾結，肆意違反國家有關出版的法令的規定，繼續印刷和散發刊物，蠱惑人心地散佈一些錯誤乃至反動的言論。很明顯，他們這樣做，離開四個堅持的軌道，損害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干擾、破壞四個現代化的建設，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在黨和人民的對立面上去了。"

在廣州的廣大熱心民主運動的讀者們都很清楚在≪人民之聲≫告示該刊休刊後，仍繼續出刊的民刊有≪人民之路≫≪生活≫和一份中山大學學生辦的≪紅豆≫，且不論的是指的哪一份民刊

而言，在這裡編輯都認爲有必要向大衆說清楚他提及的一些問題。

《人民之路》自去年九月份從《人民之聲》分出成一新刊物後，根據雙月發行，到今個月已出第四期，就前段時間的《人民之聲》也好，後來的《人民之路》也好，出版發行都是公開的，并沒以秘密形式發行過，每期均向出版局及有關國家機關寄送，在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省委指示省團委對《人民之聲》編輯人員劉國凱通知不准公開發售後，也同時間向我們傳達了這個通知，我們考慮當時具體條件的需要，接受了他們的意見，取消了公開發售，但當時明確地申明了我們堅持辦刊的態度。强調指出五二年的出版管理條例中註册登記的一款已完全不符合現社會條件，（即覓舖保兩家）是和憲法規定的出版自由條文相矛盾，而無法實施履行的條例。和現實相違背的法律條例，我們能夠承認它是正確的法令嗎？人們能夠接受違背現實的法令嗎？這是我們明白提出過不能接受的。省團委對我們曾說，出版局或許會通融一下，而出版局給我們明確的答覆是：他們無權修改法令！而有關新的出版法只聽見上頭的許願，卻遲遲不見頒佈出來。這就明擺着完全堵塞民辦刊物得以合法註册登記的唯一可能性。儘管如此，我們接受省委的意見不再公開售賣，以不影响社會治安和安定團結的情況下繼續出版刊物。舊的出版法的這一條款（且不論其他本身已不符合二、三十年後的今天的社會具體情況，是違背了基本法律精神的法令，亦即是對現社會不成其爲法的"法"。所以，我們絕不是違反國家有關出版的法令的規定下出版刊物，而是在未有符合現社會新的條件的有關出版法令之前的這種不健全的狀態下，只有用原始的方式去履行憲法已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出版刊物。至於我們今後是否違反國家的有關出版法令，還有待新的出版法來証明。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本就是我們投身民主運動的努力目標，我們從沒有聲稱也絕不會做不服從法令的行爲，我們的刊物完全可以証明這一點。

其二、熱切關心國家和民族的青年，共同投身民主運動的同志們，他們之間的思想接近，而建立的正常通信及交往，以及至相互關心和支持，是完全合法的社會關係，是正常履行人身基本

權利的正當行爲，根本不是所說什麼的“攪秘密串連”，且不說憲法規定的“通信自由”本就包含有私人保有秘密的權利，而我們之間的通信來往亦是光明正大的，儘管，我們不時發現有信件受到秘密檢查及監視的迹象。“秘密串連”這頂帽子是“四人帮”慣用的，亦是那個恐怖年代流傳下來的一句慣用語，現在這樣强烈的反映出來，使我們感到十分遺憾。

其三、自去年國內民主運動蓬勃開展以來，地處沿海的廣州，給鄰近港澳帶來了很大的震動，特別是對於過去一直受四人帮思想路綫左右的香港學生會中的國粹派隨着四人帮的垮台而瓦解，使大部分積極關心祖國的香港學生對祖國的政治出路感到迷惘不解，自覺感到祖國今後是否取得眞正偉大的發展，對自身能否擺脫殖民統治求得眞正出路是不可分割的，他們欣慰地發覺祖國的民主運動給他們帶來了新的希望。去年八月，香港大學很快組織了“國事討論營”的學生團體回廣州接觸教育界、民主界人士了解祖國的變化，發現民主運動在社會上的强烈表現形式在民主牆和民辦刊物，自後，香港各大學裡熱心關心祖國的學生紛紛主動上來和各民辦刊物及投身民主運動的同志取得聯系，進行相互交流思想，共同研究和探討祖國現在新的政治道路、討論民主運動。特別是同時給我們帶來了廣闊豐富的世界見識和國際共產主義的新發展，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在各國運動中的新情況，這種非常有益的思想交流，給民主運動帶來了很大的帮助。除了學生，還有個別熱心的青年工人和教師等，都表示了對祖國民主運動的關心。我們見到香港同胞這樣關心祖國感到十分高興，更使我們覺得在殖民地生活中的同胞們，再不像以往那樣由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將大家的思想認識隔閡開來。過去，他們對祖國的了解和反殖民統治的行動，只是在四人帮暗中左右的學生會國粹派影响下團團轉，分不清眞相和正確的路綫，至使，受文革動亂影响爆發出的香港反英抗暴運動給他們帶來慘痛的教訓。這一切，迫使他們要求親身回到祖國大陸，求取深刻的了解、正確的認識和祖國同胞的支持。同樣作爲一個中國公民，雖然“僑居”於外，而關心和支持祖國的民主運動，是他們本身的義務和權利，他們和民刊的聯系交往也是合理合法的。

到現在爲止，我們接待過的有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醫學院、浸信會大學、大專聯會等學生及個別工人、教師們的訪問并建立正當的交往。當然，我們并不可能查辨出，也不排除會接觸到有某種政治背景的、黨派的以至克格勃等的人。但我們聲明堅持的原則是，對任何來訪的香港同胞以至國外的客人，在不超出民主運動的範圍內，拒不接受任何指令、任務及有任何附加條件的幫助的原則下進行正當的交往，所以，我們堅持維護國家利益，維護民主運動和他們發展往來，在這個前提下，我們還鼓勵他們以學生團體、社會團體回來關心、了解和幫助祖國的民主運動。在四月四日上午省團委召開的座談會上，我們重申了上述的態度，並向省團委提出建議，在他們安排的下一個理論討論會上正式邀請接受香港學生一同參加。在會上我們當面向省團委幹部及中大、華工的學生代表、海運局團組織代表贈送了《人民之路》第四期。

關於我們辦刊的宗旨，本在第一期的告讀者中申明，在刊物中亦不斷闡明；我們在堅持四個原則、特別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指導下，努力爲廣大人民羣衆提供這個民主的發言園地。我們不否認刊物存在有錯誤，並鼓勵和歡迎大家對我們提出坦率的批評。至於指責我們爲言論的反動，謹希望指出我們刊物上具體的文章、具體的觀點，以示於衆，讓大家批判，允許我們一同對分歧的理論觀點申述大家的思想認識。這裡就是能很好地在廣大羣衆中體現出雙百方針的貫徹落實的地方。

最後，我們堅信，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一定會眞正得到健全和發展，儘管這條道路是多麼艱難曲折和要付出多大的犧牲，受過文革洗禮的新一代，一定會堅定勇敢地在偉大的黨的領導下，爲祖國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爲祖國的四化作出不懈的努力。

廣州《人民之路》編輯部

四月五日

原載《人民之路》

何　求

《責任》發刊詞

有人在大聲地向我們宣告：

俯首聽令吧，我們將爲你們創造幸福的生活。

有人在絮絮地給我們暗示：

乖乖服從吧，我們將賜你們美妙的前途。

我們的回答是：不！

既然未來是我們的，爲什麼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前途，創造自己的生活，而要別人來擺佈我們的雙手，操縱我們的大腦？！

歷史的責任感在激動着我們。

我們將無畏地負起這歷史的

——**責任**

原載《責任》創刊號

何求

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全國人民公開信

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成立了。

此事的意義與影響，不是我們自己所能評價的。

但當局某些人士把它誣爲非法組織，這是我們必須加以澄清，以正視聽、以明法理的。

衆所周知，現行的憲法第四十五條明確規定：「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

中華全國民協會的成立，正是運用「結社自由」這一憲法賦予每一公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

「不對，你們違反了五二年頒佈的『社會團體登記法』，所以是非法的。」有人會這樣說。

也許五二年所頒佈的「社會團體登記法」是符合當時的社會條件與民心民意的。但我們認爲現在它明顯地與上述憲法條文相抵觸。

「社會團體登記法」（五二年）條文原意規定，團體成立需先行通過申請籌備，經批准後，才能提出要求成立的申請。

與憲法相對照，我們便可清楚看出：一個羣衆團體的成立，先要將其意圖動機呈政府部門同意方得進行籌備，經籌備後，又得再度經批准同意，方得成立。似這樣重重申報，何謂「結社自由」？只要有關部門認爲其意圖不合，不但不能籌備，連想想都成問題。如此，「結社自由」僅是一句空話而已。因此，五二年「社團登記法」顯然是與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的相抵觸的，是完全不適應現行倡行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要求的，因此在遵行憲法的前提下，我們認爲不能再遵守與憲法相衝突的法律條文。

憲法明確規定的「結社自由」，我們的理解是：每一公民

都享有與其他公民結成各種形式的聯合體，在不危害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和不侵害到他人的範圍內，任何人無權干涉，就如每一公民都有權約請其他的公民一起去進行一項活動一樣（且不論時間的長短）。當然，國家需要對建立的社團加强引導，及爲了限制其不致超越上述原則範圍，給以應當的管理，進行登記，但這種登記應是在結社之後，而不是之前。如果在結社之前，那麼結社就是一種需要得到某種權力批准的行動，「自由」就無從談起了。就如每一個公民享有言論、通信等自由，如果政府又規定他們發表一個言論、寫出一封信件之前，需要先得到某個權力部門的准許才可進行，那就無異於取消了「言論、通信自由」一樣。

正確的做法是：公民有權自由結合組成各種形式的社團，這些社團組成後必須對自己的行爲負法律的責任與道義的責任，因此，它應該向政府有關部門進行登記，以求得政府、民衆和法律的監督。同時，也使自己獲得憲法所賦予的權利。

爲此，我們提請人大常委會審議批准我們的申請，使我們盡早能得到政府的協助。當然，如果協會的行動有違憲法，是必受到法律的追究的。

我們同時提請人大常委會盡早做好制定新的社團登記法的工作。

中華全國民刊協會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原載《責任》創刊號

王一飛

新階級、新社會

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們關於資本主義已達到它的頂峯，正在迅速地腐朽、衰亡下去：世界革命因爲無產階級“愈來愈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而即將猛烈爆發、取得使資產階級滅亡的偉大勝利的預言未能實現；

由於一個多世紀來，在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們所預言無產階級革命將首先勝利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裡，革命並未勝利；相反，資產階級更强大、穩定了，無產階級也日益“資產階級化了”；而在他們不曾想到的、資本主義很不發達的、正在與封建主義作殊死鬥爭的國度裡，無產階級革命却連續取得了勝利；

由於事實還明確地告訴我們：在那些無產階級革命取得了勝利的國家裡，無產階級及其勞動階級並未因此而獲得眞正的解放，而是把自己重又置於了官僚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之下；

……

因此，全世界都理所當然地注視着馬克思主義的命運，懷疑着共產主義的眞實性。當年在歐洲上空徘徊的那個引人注目的幽靈，已不再爲人們所熱烈歡迎了。迷惘、困惑重重地向着人們迎頭撲來。

世界向何處去？

人類難道已經走入不可自拔的絕境了嗎？

繼資本主義神話破滅後，又一個希望破滅了。人類陷入了巨大的信仰危機之中。

正是在這樣的時刻，一個新生的偉大的階級，被歷史長河的波濤推了出來，它昂首挺立，以其宏亮的吶喊向全世界宣告：人類大同的曙光，已閃現在東方的地平綫上了，讓我們伸出雙手，

去迎接它的光輝的照耀吧。

歷史的啓示

回顧一下過去的歷史，並不是浪費時間的多餘之事。

那麼，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呢？

且不論自然條件如何地促使着猿的進化，有決定意義的是當猿開始使用第一個簡陋而粗笨的工具後，它便成了我們難看而又值得自豪的祖先——人。石器時代：由於生產力的極其低下，我們的遍體長毛的祖先過着原始共產主義的生活。隨着生產和勞動實踐的發展，弓箭、陶器和青銅器出現了。人類便由此首先發生了令人痛心而又歡欣的分裂——產生了階級以至國家——進入了奴隸社會。接着，鐵的發現與鐵器的普遍使用，使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提高。於是奴隸社會解體。取代它的，是封建社會，而隨著紡機、蒸氣機的發明與應用，引起了產業革命的風暴。在這翻天覆地的風暴面前，無論是封建主階級還是農民階級，都不可抗拒地退出了歷史舞台。世界一躍而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我們現在仍面臨的强大的、有天然國際聯盟的資產階級和它的對立面——無產階級。

歷史雄辯地証明了馬克思早在一百二十年前所作的結論：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竪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合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①

但是，既然馬克思如此準確地從人類歷史的發展中科學地總結、抽象出這唯一正確的社會發展規律，爲什麼他的關於無產階

的革命的學說却未能取得預期的偉大的勝利，資產階級也未和他
所料的那樣腐朽、衰亡下去呢？

在這裡，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們，還是他們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明顯地至少犯了如下兩個錯誤：

一、先讓我們來看看馬克思、恩格斯的兩大論証吧。

"爲了有可能壓迫一個階級，就必須保証這個階級至少有能夠維持它的奴隸般的生存條件。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扎到公社社員的地位，小資產者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扎到資產者的地位。現代的工人却相反，他們並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愈來愈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產增長得還要快。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資產階級再不能做社會的統治階級了，再不能把自己階級的生存條件當做支配一切的規律强加於社會了。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爲它甚至不能保証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爲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它來養活的地步。社會再不能在它統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說，它的存在不再同社會相容了。"②

"隨着產業革命的發展，隨着擠掉手工勞動的新機器的不斷發明，大工業就把工資愈壓愈低，把它降低到上述的那種最低額（即使工人能夠維持他們的工作能力並使工人階級不致於死光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引者注），因而無產階級的處境也就愈來愈不堪忍受了。這樣，一方面由於無產階級不滿情緒的增長，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力量的壯大，產業革命便孕育着一個由無產階級來進行的社會革命。"③

通過這兩段引文，再對照一下現實，我們便可看到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們是如何地把一時的現象當做了本質，因而得出了不正確的結論。

在產業革命完成後的幾十年裡，資本主義作爲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剛剛確立起來。因此，它就如一個小孩一樣，必然地有着許多幼稚的和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也就是說，人們並不是能夠一下子就完全適應生產力的大突破而引起的深刻的社會變革的。不斷地調整整個生產關係以適應生產力的急劇發展，需要一個過程，需要時間。在那時，一方面由於驟然興起的大工業造成了

整個封建制度的解體給本身造成了幾乎無限的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由於大工業提供的强大的競爭能力，使海內外市場和廉價原材料來源的幾乎無限的擴大，刺激着大工業陷入了盲目而無限止的發展中。有利的條件與環境使"工資愈壓愈低，把它降到上述的那種最低額"成爲了可能。"無產階級的處境也愈來愈不堪忍受了。""他們並不是隨着工業的進步而上昇，而是愈來愈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在這樣的情況下，剛剛失去了所有的財產而落入這非人的境遇的無產階級，不言而喻地要進行改善自身生存條件的鬥爭。同時，由於大工業的制約，由於資本家的聯合和教育，使得這種鬥爭日益迅速地和鮮明地以整個階級衝突的形式表現出來。

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們正是目睹了這樣一個——由於人們（各個階級）的主觀意識未能跟得上客觀形勢的迅速發展而不可避免地產生錯誤的——時期，便武斷地認定：資本主義的全部合理性均到此爲止了，因此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請注意它將導致的結局）來臨了。不容否認，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敏銳地捕捉到了資本主義取得統治地位後的第一個發展階段的現象與某些內存因素。因此，爲無產階級自覺地用鬥爭來爭取改善自己的地位和處境提供了相應幫助和支持。遺憾的是，他們把這一鬥爭的作用和範圍誇大了（他們的後來者爲了繼承這一關鍵性的錯誤眞是費盡了心思，絞盡了腦汁），以至認爲這個鬥爭將摧毀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消滅資產階級和自己，創造出新的生產關係和社會形態來提高生產力。這裡，馬克思主義創立者們由於他們所處時代的局限性，不可能看到近……世紀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史。而這一發展史明確告訴我們：無論是自由資本主義時代，還是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儘管出現了一系列十分可怕、主要表現爲經濟上的危機，但只要這危機並未危及到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整體——的生存時，它就是對整個生產方式實行最具權威的調整的槓桿，就是促進生產進一步發展而使資產階級統治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生存條件進一步改善的形式。

二、一定生產力的發展階段所造成的相應的社會力量，是不

可能突破他們的社會意識去創建一個與他們賴以生存的那個社會互不相容的新社會的。只有當新的生產力已出現，在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的參加與領導下，新社會的建立才可能和必然的。這是已經由人類發展的歷史所証明了的不言而喻的事實了。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問題，不幸的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却錯誤地認爲這一規律只適用於農民階級和奴隸階級，對無產階級却不適用——農民階級或奴隸階級的鬥爭，由於缺乏先進生產力所造成的先進階級的領導，最多只能震憾和動搖封建主階級或奴隸主階級的統治，或成爲改朝換代工具，却不能最終消滅它，建立起新的社會。而無產階級却可以神通廣大地消滅資產階級和自己，埋葬它所以誕生和生存的資本主義。

……這兩個錯誤，馬克思主義便使自己的無產階級將……（還有專政）帶領世界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一百年來的現實面前碰了壁，陷入了今天這種蒼白無力的……。

但是我們沒有任何權力去苛責我們的老前輩。相反，我們還得証明馬克思，正是他們給了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糾正這些錯誤的問題：

"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爲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的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爲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的衝突中去解釋。無論那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④

令人不解的是，生活在現時的大大小小的馬克思主義者，竟能無視馬克思當年未能看到的明確的現實。資本主義之"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並未"發揮出來"，"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亦並未"成熟"。他們死死抱著上述的那些錯誤不放，從而使自己越來越走進理論和實踐的死胡同，同時也使馬克思主義走上了絕路，失去了生命力。這是不可饒恕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或者乾脆說，這是一個從馬克思

本人就開始了的從理論到實踐的極左的錯誤。

現實的告誡

猛烈的經濟危機，這一在有利的歷史條件下由自由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造成的後果，每隔若干年，便要以恐怖的形式與內容危及資本家們的和工人羣衆的生存。而工人羣衆的求生存的鬥爭又往往給資產階級造成嚴重的政治危機。於是，在這雙重的危機威脅下，生存的本能迫使着資產階級在痛苦中尋求出路。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劇烈的自由競爭使他們自相殘殺，壟斷資本出現了。市場與原材料（包括廉價勞動力）的不足，使他們發動戰爭，帝國主義形成了。然而，矛盾並未因殘酷和暴力得到解決，相反，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日益壯大的勝利，使每一個具體的資本家或他們的每一具體的國家的市場日見萎縮，原材料的來源日見緊張。同時，工人們（由於生產力的許可）也日益提高了他們政治的經濟的要求。在這艱辛的生存鬥爭之中，資產階級總是被迫着進行這樣的選擇：或者退後一步，委曲一下自己的資產階級錢袋，以求得眼下的生存及以後的發展；或者“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我們今天再清楚不過地看到，精明强幹的而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本能地選擇了第一條路。於是，它生存下來了。也就是說，它終於認識到——不管通過何種途徑——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及產品的極大豐實，使消費必然地逐步向全民發展。換言之，則只有社會全體成員不斷提高的消費能力，才能使得這些極大地發展了的生產和增加了的商品轉變成利潤與資本。就在這樣不斷地加深認識，由物質的精神的兩方面不斷進行生產關係的調整以適應生產力的過程中，資本主義雖然曲折地、終還是不可戰勝地發展、壯大了，資產階級也更强大了。而現代化工人的生存條件也隨着工業的進步而上升了。

且慢！當代無數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會一起向我大叫起來：無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在你的眼裏怎麼無影無踪啦？”反動！

尊敬的“馬克思主義者”們，討論儘可進行、帽子倒是不必預先準備的。

首先，如果你們願意遵從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話，
那麼請你們注意，如果只是由於人們思想的純潔和道德的高尚，
要可超越生產力所許可的範圍，去創造新的無階級的社會，原始
共產主義的人們會發生階級分化便成爲不可理解的了。可悲的是
，現在，世界上自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人
們，都在虔誠地祈禱着上帝，保証他們的統治者都是純潔高尚的
聖徒，這樣便可帶領他們共同去升入理想的天堂而永遠擺脫地獄
的陰影了。事實是多麼無情地粉碎了人們善良的幻夢啊！而造成
這種新的宗教式的“社會主義崇拜”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對
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了多麼無情的嘲諷
和否定啊！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國家”
的來龍去脈吧。

先看看“無產階級革命”的實在意義。

一、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創立者所斷言無產階級革命的時
代，恰恰是資產階級處於蓬勃上升的階段，而無產階級迫切地需
要團結起來爭取自身的生存權力和改善自身的生存條件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無產階級只是、也只能是爭取生存權力和改善生存
條件，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進行着消滅資本主義、創造新社會的
鬥爭）。因此，“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只是、也只能是到此爲
止罷了。

二、無產階級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着不能掌握生產
資料。無產階級，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它是由於大工
業的勃起，而被剝奪了任何生產資料，除了自身的勞動力之外一
無所有的人組成的階級。它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只是在受僱於生
產資料的所有者——資產階級之時。那麼，我們便看到，如果它
——無產階級——通過政治革命，在一天之內宣佈佔有了生產資
料，它便同時宣告了自己作爲無產階級的滅亡。而就在宣告自己
滅亡的同時，它還必須宣告自己和資產階級同時享有了生產資料
，同時成爲了資產者。於是階級便消除了。不言而喻，即使資產
階級會心甘情願地剝奪，無產階級也決沒有這樣的胸懷與氣魄來
如此優待原來的敵對階級。但如果無產階級奪得了生產資料的所
有權，又不願與被剝奪者同享，它就不得不（不是口頭的，而是在

實際上）宣佈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階級爲無產階級，而它的那些上了台的代表人物，或本來就是資產階級，或立即轉變爲資產階級。於是資產階級的本性迫使他們一定要把大多數人重新推回到無產階級之中去。就這樣，改朝換代完成了，社會現實依然故我。似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何以創建新社會而埋葬資本主義呢。

然而，“無產階級革命”不但存在，還勝利地建立了一連串的“社會主義國家”呢。

如此，那就讓我們來研究一下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吧。

於是，我們必須回到那炮火紛飛的年月去，資本主義發展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猶如一個身强力壯、血氣方剛的小伙子，充滿了活動和冒險精神。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劇烈的自由競爭，必然地導致了壟斷資本的出現。而資本的日益集中，加上生產工具的日見更新，使得由於市場和原材料的不足而引起的爭鬥日趨激化，以至終於成爲全面流血的冲擊——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炮聲隆隆、硝烟瀰漫、資本主義列强在爲爭奪利益而拚命撕打着。於是，已經被現代資本主義弄得支離破碎，同時又被本國的封建勢力壓迫得無法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便開始在這戰爭做成的空隙裏，由新興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領導着農民階級，憧憬着馬克思主義勾畫出的美好前景，利用資本主義列强之間的矛盾，順應着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英勇地給封建勢力以致命的一擊。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了，“社會主義國家”也就建立起來了。

我們知道，早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前，在封建社會裏就存在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了。而社會主義呢？它的生產關係，在各個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前，是只存在於革命者頭腦中的。只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才逐步建立起來的。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形成與確立是歷史過程的產物，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現行的“社會主義”却只是生產力在資本主義這一發展階段上，人爲地用意識形態、社會形態的改變來實現的。“社會主義”不是歷史進程的產物，不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是人類精神世界的一種偉大創造（如同創造了上帝一樣）。正由於它不是一定生產力發展階段而產生的

生產關係，因此，這種生產關係便是不受生產力的約束而可以由人們隨心所欲地決定了。它於是以實際上比當今資本主義落後的生產力，强迫着去適應口頭上比資本主義先進的生產關係，形成了一種無法解釋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這樣，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即"社會主義者"們，隨着"苦行僧"的日見減少，"社會主義"的威望也日益下降了。於是，它不得不變成控制着政權的新的宗教了。於是，它不得不對人民實行專政了。

"社會主義"制度就是這樣違背了它的實現所需要的經濟基礎造成的世界性條件而被創造出來了。爲了繼續取得無產階級的幫助與支持，以鞏固其內部的對封建主義的勝利和對抗外部先進資本主義的强大壓力，取得生存的可能，自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們，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給理想中的、即馬克思主義理論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施行了巧妙的整容手術，從而人爲地推導出一個"過渡階段"來，企圖超越生產力的發展階段而建立起新的生產關係和社會形態。於是，他們便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因而也就消滅了階級和國家的）社會中，保持並日益加强了階級對立所必備的一切手段與形式：國家、軍隊、法庭、監獄、官吏、政黨、商品、貨幣、壓迫、剝削、僱佣勞動……這樣，他們自己陷入了無法自圓其說而又非要自圓其說的困境。我們看到了先進的"社會主義"無法抵禦（更不待說勝戰）垂死腐朽的資本主義，先進的"計劃經濟"無法超越落後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等咄咄怪事。讓人們如何去解釋這種不合情理的怪現象呢？很明顯，只有兩種可能：不是我們的理論和實踐產生了錯誤，把先進與落後弄顛倒了，就是歷史違背了社會發展規律，而故意來使我們正確的理論和實踐遭到無端的奚落、難堪。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似乎是寧願選擇第二個答案，以便人爲地去"矯正"歷史的潮流的。而當我們正確地選擇了第一個答案時，我們便使自己走出了如今的困境，清楚地看到這樣一個事實：無產階級由於生產地位和生活地位的低下，缺乏着教育，因而眼光短淺、胸懷狹隘、能力不足，所以它既不能代替資產階級實現"對人的統治"，更無力承担起"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

。⑤而在封建殘餘勢力還很强大的國家裏，"無產階級革命"取得的勝利，只能是把資產階級的另一支隊伍——官僚階級捧上統治者的寶座，而自己則恭恭敬敬地向它頂禮膜拜。不必諱言，通過"革命"，他們——無產階級——的生存條件改善了；但同樣不可諱言的是，它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並未改變，他們仍然是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統治者們在大聲地宣佈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產者才是社會的主人的同時，又公然地用着政治專制（即取消民主）和愚民政策的方法，把生產資料的支配佔有權和產品的分配權又收回到了自己手中。就這樣，不管這些可尊敬的人們有着多麼地高尚、善良，他們必然地、自覺不自覺地要完成這一決定性的轉變：社會公僕向社會主人的轉變，從而毫不留情地"沒收了"生產者（在他們的社會主義宣言裏的"社會的主人"）理應享受的一切政治的和經濟的權力，把這些可憐的"主人"們重新推回了奴僕的地位：如前所述，無產階級一旦掌握了國家政權、佔有了生產資料，便使自己成爲了資產階級。在這時，如果這個蛻變爲資產階級了的官僚統治集團出於高尚的意識，還要堅持爲無產階級利益而奮鬥的話，它就可憐地成爲失去了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而這種空中樓閣是無法存在的。因此，所有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就都只能用權力來進行連續不斷的意識形態的鬥爭、强行改造經濟基礎。而這種對經濟基礎的强行改造，恰恰是對人民的生活本能與願望的壓抑，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碍。聰明的統治者們就這樣爲自己釀就了連續不斷的政治危機——"資本主義復辟"。同時，我們如果稍微注意一下便不難發現，這些自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們，在他們的理論裏，反覆强調的是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而從來不敢正面接觸生產方式中生產力這個最活躍最革命因素對生產關係的制約。在他們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裏，就永遠只有先進的生產關係去改造、提高落後的生產力這一任務，而一旦有人竟敢提出要改革生產關係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的時候，"倒退"、"復辟"、"反動"等等帽子就會舖天蓋地而來，使這些"狗胆包天"之人立即喪失一切政治的經濟的權力，甚至生存的權力。而且，我們還看到，當"社會主義國家"的統治者不得已

絕承認階級消滅了的時候，他們却是無論如何也不敢承認專政的結束和國家機器的失效（盡管借口對外的需要），否則，他們偉大的、最優越的"社會主義"就連一分鐘也生存不下去了。無情的辯証法就是這樣無情地替我們解答了這些問題。於是，自稱是整個社會的代表的"社會主義"統治者們，當他們宣佈了以社會名義佔有生產資料以後，並沒有（也不可能）使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在任何領域裏成爲多餘的事而自行停下來；相反，它逐步地加强國家政權對各個領域的干預，特別是加强對人的統治⑥，便成爲理所當然了。由此可見，當民主制度還未確立，當生產者由於人爲的或自身的能力的限制，並不能在實際上有效地任免那些具體掌握生產資料的權力者，決定自己的產品分配的時候，所謂生產資料公有制就只是一句騙人的鬼話罷了。哪怕是在最美好的"社會主義國家"裏，私有制並未消除，工人們仍然是在出賣着自己的勞動力，因爲他們與生產資料的結合仍決定於生產資料所有者對他們的僱佣。實質上的僱佣勞動並未改變，只是比赤裸裸的金錢交易多加了一層大慈大悲的遮蓋布，而在這塊頗能迷人一時遮蓋布背後，任何卑鄙、無恥、凶殘的勾當都可以幹出來的（例如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而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

如果我們把西方資本主義稱爲金錢資本主義，我們便應把東方的"社會主義"稱爲權力資本主義了。

權力資本主義歷史地出現，說明了封建主義在世界範圍的解體和不甘滅亡，說明了資本主義在同樣範圍內的勝利。也許它一一權力資本主義——曾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原則的某些條款，在某個範圍或某個時間裏得以顯現，但那只是歐文的實驗的若干倍的擴大和巴黎公社的嘗試在時間上的若干倍的延長罷了。

權力資本主義透過馬克思主義，清楚地看到了一些金錢資本主義的弊病，並得以借鑒而少走一些發展中的彎路，因此它有着漂亮迷人的理論。但由於生產力的低下，使它一方面帶着封建主義遺傳病，一方面又患上了對金錢資本主義的恐懼症（害怕被吞沒）。因此，即使它願意，它也不可能實行和實現這些漂亮的理

論，反而要在實踐上表現出比金錢資本主義更大的落後性與野蠻性。

正如金錢資本主義主要地由資本的轉移而造成經濟危機來刺激它的成熟，權力資本主義則主要地由權力的轉移而造成的政治危機來刺激它的成熟。而它們的成熟程度，都同樣地要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程度來証明。一旦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得以完成，資本主義便達到了它的頂峯而開始走向衰亡。

近幾十年來的歷史表明：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苦於它的生產力的低下，因此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都在逐步走向破產而被迫向西方資本主義靠攏。同時歷史還証明：資本主義正在使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使它在全世界繼續奪得更全面更深刻的勝利。而正是這種"靠攏"和"勝利"，使資本主義佔有方式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弄到了由國家出面已經無能爲力而必須用更大範圍的力量來干預的地步，國家正在成爲□□甚至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東西了。這樣，我們便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原則上來了。

"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裏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着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⑦很清楚，資本主義——不管是金錢資本主義還是權力資本主義——社會已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個階級對抗的社會，它必然地要爲人類的大同——共產主義——社會準備好勝利的物質條件（注意：這個條件是由生產力的發展來準備好的，而不是由某種宗教的或法律的規定來完成的），而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都在爲着它的實現進行着不懈的努力——不管前者與後者主觀意識的出發點有多麼大的區別。

歷史的進程，雖然會因受到人們主觀意識的侵擾而產生曲折，但終究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爲了生存而進行的不懈努力，恰恰走向了它們願望的反面，它們創造

了消滅自己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力量。

新世界的使者

從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已經看到，任何社會形態的根本的質的轉換，是不會，也不可能由原來社會形態裡的舊有的力量來實現的，而必須由生產力的發展所造就的新的社會力量的參加與領導，才能得以實現。

今天，任何明眼人都可以看到：由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敵對階級的共同努力（前面已經說過，無論前者與後者的主觀意識出發點有多麼大的區別），社會生產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發展，特別是以電子計算機爲標誌，使世界性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電子時代。在這個時代裡，人類創造的財富將綽綽有餘地滿足自身的需求——如果不進行由於集團、階級、政黨同國家之間的私利與偏見的勾起了戰爭，如果能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長。而且，隨着電子時代的到來，使集團、階級、政黨、國家之間的利益日趨一致：界綫正在消失。

共產主義的物質條件已經準備好了。

同時，我們又看到：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都沒有能力與魄力領導世界進入共產主義，因爲他們都只代表着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舊有力量——儘管是敵對的。而幾十年來社會生產力和分工的迅速發展，已將它的當之無愧的代表急劇地推到了前台，這就是肩負着引導世界性進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王國——共產主義——的偉大使者：智識階級。

一切以人類歷史和智慧的結晶——科學文化知識作爲勞動手段來創造（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的人們，屬於智識階級。

自然科學的專門家、文明生產的組織管理人員，組成了智識階級的中堅。

正如封建地主階級曾生存在奴隸社會、無產階級在封建社會留下過它的腳印一樣，智識階級並不是一個早上或晚上突然地從地下冒出來的。它作爲人類歷史和智慧的總代表，作爲人類希求的必然歸宿，並爲了鍛煉出完成自己所肩負的歷史使命的能力與魄力，它經歷了漫長而苦難的歲月。在那樣的歲月中，它遭受到各個階級、各種社會力量的壓迫、排擠和打擊：政治的專制、宗

教的禁錮、愚昧的踐踏、野蠻的摧殘。它掙扎着、奮鬥着、吶喊着。因爲敵對力量的强大集中和自己力量的弱小分散，爲了生存，它不得不依靠着各式各樣的政治上的權勢或經濟上的資本，或二者的結合體，成爲它們的附屬。但它並未放棄過自己的志向。它不辭勞苦、不怕流血犧牲地追索、吸取、總結、發現着自然界的奧秘和社會前進的規律。他用着這無聲但是强有力的武器，向它的强大的敵人——專制、壓迫、迷信、愚昧、野蠻、自私、保守……——宣戰。在爲全人類造福之時，爲自己開闢着前進的道路。

隨着歷史的演進，隨着自然科學的成果和社會前進的規律日益發現、普及與極大的發展提高，隨着科學這一最先進的生產力（社會科學的眞理正是在它之上建立起堅實的基礎並發出具大的反作用力）在全世界的光輝勝利，民主取代專制、科學否決迷信、文明戰勝野蠻、愚昧讓位於智慧已成爲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而在漫長且苦難的歲月的搏鬥中，在歷史上留下了淋漓的鮮血和冤屈的生命、同時也留下了堅實的腳印和輝煌的戰績後的今天，它——智識階級——無論數量上和質量上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它已取得了它特定的社會生產地位（這是任何力量也改變不了的）。終於，它壯大了、成熟了。終於，它成爲了一支不容忽視（豈止如此）的獨立的□□力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而它一經登上這個舞台，就必然地和堅決地要求□□與它所代表的生產力同樣靈活的作用——領導作用。它要用自己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改造世界。

在制約人類的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的物質生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我們清楚地感到：現今世界已經進入了電子時代，但是資產階級仍是頑固地用資本或權力來□□生產資料，從而決定生產什麼、怎樣生產、產品如何分配。他們是生產資料和無產階級的主人，却在資本和權力面前失去了人格，淪爲了奴隸。無產階級却是被生產資料所佔有，因生產資料來決定它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但沒有絲毫的分配權。他們是資本和權力的奴隸，是活的生產工具。而在現代的生產中，它們——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越來越被排擠到無足輕重甚至是多餘

的地位。而智識階級則是掌握着最先進的生產力的階級，它在生產中愈來愈佔有着主導地位。他們用科學和眞理來逐步地從資本和權力中奪取生產資料的（國際）佔有權。即是現在要由他們運用科學和眞理，而不是由資產階級級運用資本和權力來決定生產什麼、怎樣生產、產量如何分配等等。不管資本或權力的所有者是如何地不樂意，他們是出於生存的需要讓出或被剝奪這種支配權的，而將這種支配權雙手奉獻給智識階級。這種情況愈是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程度高的國家就愈是明顯、普遍。同時，科技的發展已使過去的活與動積累成相應的物化勞動。於是智識階級由此取代了無產階級進入直接生產的領域。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逐步消失了。階級的界綫也因此逐步趨於消失。

智識階級是唯一的共產主義者。因爲它唯一的財產，正是全人類智慧的結晶——科學文化知識，而歷史的前進是決不會允許科學文化知識成爲私有的。確實，它曾由於教育、實驗設備、工具、傳播媒介的不發達而成爲某些集團、階級、國家私有。但在電子時代的今天，它已成爲了第一件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完全意義上的公有財產了。由這種公有制培育出來的嶄新的階級，便成了私有制的大敵了。

智識階級本身，便是一切愚昧、野蠻、落後、迷信、保守……的不共戴天的敵人。它正是在與它們作鬥爭中才得以誕生、成長並成熟。

智識階級爲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必然地强烈要求着民主、自由、平等。任何形式的專制、壟斷、壓迫和剝削都會使它窒息、死亡，因此也必然地要遭到它的特殊抗爭。

智識階級毫不猶豫地要砸碎一切束縛人性的枷鎖。它要最徹底地解放個性。非如此，它就不能使自己得到完全的發展與最終的解放。這時，它就使愛情完全脫離了自私的物慾的控制、發射出樸素而純潔的光芒。

智識階級沒有任何的偏見與私利。它信奉和追求的，是它迫切希望應用來爲全人類造福的科學和眞理。而這信奉與追求、應用、正是它的强盛的、不可戰勝的生命和力量所在。

正如科學和眞理沒有國界，也正如現代生產力和發展正在消

滅國界一樣，智識階級在它的世界裏沒有國家的概念，有的只是：全人類以至整個宇宙。

智識階級由於它的社會生產地位所確立的生活地位，使它無法忍受人類被貧困所侵擾，而努力創造着使他們擺脫貧困的富裕、舒適。同時，在它的生活中，已閃現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光輝。

智識階級在它爲生存而進行的——內部的和外界的——鬥爭中，已把勞動從僅僅是令人厭煩的謀生手段，日益變成帶着愉快的忘我精神而自願進行的一種人生樂趣。同樣的原因，使它獲得了正眞的人品，高尙的道德和寬闊的胸懷——自覺地和唯一地尊重、服從科學和眞理。

綜上所述、智識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高思想境界與道德規範的體現者。因此，在世界進入電子時代的今天，它必然地、當之無愧地取得了世界革命，即共產主義革命的領導地位。它是在社會進步中由於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大和智慧的提高而從各階級中分離出來的先進分子所組成的一個全新的階級。它只是爲了全人類的利益而誕生，爲了消滅階級而成長起來的。因此，它缺少着各個階級的弱點而兼有着比各個階級更高更完全的優點，這就使它具備了戰勝與消滅各個階級的優越條件和强大力量。

智識階級把一切現存國家和政權中壓迫、阻碍、危及科學和眞理的一切內在的和外現的形式和內容，特別是以它自己的勞動成果和基礎來日益威脅着人類生存的最野蠻行爲——戰爭——視爲自己的首要敵人和對立物，並竭盡全力要摧毀和消滅它們。

智識階級由於本身的生存所需，使它要把自己的勞動所生產的財富直接交給全人類。從而，它就無情地剝奪了資產階級（包括官僚階級）憑以竊奪權力的東西——資本與資歷。它明確地，並以它存在以來的全部歷史宣告：資本與資歷不應、也不能再成爲掌握社會權力的委任狀了，權力只屬於它唯一的主義——科學和眞理。在這種時刻到來時，權力的含義就完全失去了其政治上的意義，於是"對人的統治"便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

就如堅定不移地要剝奪資產階級手中的社會權力一樣，智識階級同樣堅定不移地要剝奪由於資產階級所造成的一切勞動階級的貧困、愚昧、落後，從而它便消除了壓迫和剝削得以生存的基礎。

面對着智識階級大踏步地走上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不同的階級和政治勢力有着不同的態度。

正如奴隸主階級和封建主階級都不肯自行退出歷史舞台一樣，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同樣地不會自動放棄它們的社會領導地位和現存權力的，它們將用其傳統的法寶——壟斷、專制、强權、利誘甚至戰——來抵抗智識階級解放全人類的鬥爭。但這不過只能促使智識階級更迅速、牢固地團結起來，更堅定、頑强地從整個階級力量來粉碎它們有力但是無效的抵抗。智識階級當然看到：抵抗的，只不過是資產階級中那些利慾薰心、權迷心竅以至在電子時代的今天竟然可悲地無視現實的那一部分人，大量的有識之士或遲或早正在順應着歷史的潮流，加入它的隊伍並爲之奮鬥的。

無產階級及一切勞動階級，它們是高舉着雙手歡迎智識階級□□它們的消滅的。因爲這只會使它們失去貧困、愚昧、落後所組成加在它們身心上的沉重枷鎖，而代之以享受人類所能夠和應該享受的豐富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包括勞動本身，從而使自己成智識階級的成員——眞正與動物界脫離了的人。當然，在接受被消滅的過程中，由於它們長期養成的性格與習慣，會使它們產生一些痛苦與惶亂，甚至對抗(如果它們愚蠢到竟要用打擊或消滅智識階級來保存自己可憐的生存，那麼，它們正是在毀滅着自己的光明與前途。例如中國近二十餘年的歷史)，但這與它們的歡迎相比畢竟是微小的。它們是智識階級解放全人類的希望所在。

而智識階級在這兩方面的鬥爭中，將取得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勝利：把全人類都迅速地——不管他們是自願地還是被迫地——收到自己的隊伍中，從而使一切階級及其附屬或派生物統統歸於消亡，同時也宣告自己——作爲階級——的滅亡，世界便統一在"人"這一光榮稱號之下了。

一切妄圖違抗智識階級意願的個人、集團、階級、政黨、國家，就如同違抗科學和眞理一樣，只有毀滅這一道路。當然，還

有一條道路，那就是：投降歸附。

如果說青銅器時代人類的分裂是社會的一大進步，那麼在電子時代的今天，再堅持這種分裂，便是對歷史的最大反動，對人類的最大犯罪了。

到了結束人類分裂的時候了。人類盼望已久的共產主義——無論是東方的世外桃園，還是西方的烏托邦——將由智識階級的團結奮鬥在更高的程度上實現。而智識階級是不會放棄它的天職、辜負人類的期望的，它有能力，有魄力，更重要的是有着科學和眞理的毫無保留的支持，有着全人類嚮往結束其自然屬性的生存鬥爭、享受日益美滿的生活的共同願望爲後盾，使它勝利地完成這一偉大的歷史任務。

當整個不斷壯大的智識階級團結得像一個人，向它的一切敵人發動進攻之時，共產主義便如同壯麗的朝霞，展現在我們每一個人面前了。

全世界智識者，聯合起來！

一九八〇年六月一日

以「珍師」筆名發表

原載廣州《學友通訊》第七期

註：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二卷82－83頁

② 同上書第一卷 263 頁

③ 同上書第一卷 216 頁

④ 同上書第二卷83頁

⑤ 同上書第三卷 320 頁

⑥ 參閱⑤

⑦ 同④

⑧ 同⑤ ⑥

孫豐

就目前形勢致晏平仲的信

關於晏平仲介紹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邑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史記《管晏列傳》

有些青年同志可能不知晏平仲是何人，他是戰國時齊國的宰相，著名的政治經濟家，五短身材，著有《晏氏春秋》。根據目前中國政治形勢，我們不敢像以前那樣直稱，只好隱於其中。即是這樣還恐犯汚辱人格罪呢！唉，在我國眞像詩人白樺說的那樣，「我的兒子將來準要坐牢，因爲他不會說謊。」我這樣稱呼一位領導同志，決不是不恭，而是尊重。當然，如果我對他沒有意見，也就不寫這信了，寫就意味着批評！我是要依社會主人的身份來批評和監督社會的那些高級公僕的，這就是信的背景。

這封信與當前的形勢不能匹敵

當前中國政治上又進入第二次收縮時期，風聲甚緊，到處捕人，民刊與民主墻大有被絞殺之勢。某超級省及其書記有講話，有紀要，某報有評論。其措辭之嚴酷、嚇人乃前所未有；其毫無半點研究科學之態度、探討眞理之願望，只有公僕對主人的喝斥。在此時，我寫了這信，不是我不害怕，害怕是眞害怕，因爲我雖口頭上說鐵窗石壁心不跳，但卻從心裡恐懼警察、牢房。可我多長了一個腦袋，一張嘴，一雙手，腦袋思考則不止，嘴便要說，手亦要寫，愛科學愛眞理的願望壓倒了恐懼的心理，只好聽天由命了。

我與所有尊重科學的人一樣承認：科學必將戰勝謬誤，但是我還承認科學家的肉體與機械力相比，一定化爲齏粉。我熱愛生命，熱愛生活，請不要使我發抖；我還熱愛眞、善、美！爲了眞、善、美，不得不寫下面的信。

晏平仲同志：

你好？基於目前中國政治、經濟及秩序的總形勢；鑒於您爲這些形勢而採取的政策、策略；鑒於某幾件震驚中外的大事的出現，以及您的政策實施之後的效果與及反响，我以一個社會主人的身份對您這位最高公僕提出批評的意見。當然我的意見可能有錯誤，正像您也在犯錯誤一樣。

一、華國鋒同志和您是有功於中國的

華國鋒同志也許不是一位最有學問的人，不是學者，但歷來學者中沒有統帥，因爲學識一直旦體化就成爲技術了。華國鋒同志最沉着，最善於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下安步當車，又敏感而不露於外；他富於眼光、勇氣、胆量，這些氣質鑄成了他的果斷。這使他能夠在別人不敢下決心時敢於下決心，他又謙虛愼重。他做爲統帥在我們這個時代是無愧的。華國鋒同志這些氣質再搭配上您這樣一位精力充沛、誠實、熱情、決不藏頭露尾的表裡一致的實幹家、組織家，應該說是令人鼓舞的。歷史注意到由華國鋒、葉劍英同志完成的粉碎『四人帮』集團的任務這一劃時代的壯舉。中國的歷史發展到一九七六年，已經告一段落，它絕不會再那樣存在下去了，如果不是由華國鋒也許由另外的人來完成這一任務，如果不是宮廷式的也將由其他式的，總之，變是歷史趨勢。華國鋒同志果斷的行動比可能的其他方式都避免了大的動蕩，甚至軍閥割據，避免了人民的流血，所以人民是感謝領袖們的。在您協助華國鋒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後，無論是在制度性改革上還是經濟基礎的具體工作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發展。特別是從去年展開「實踐是檢驗眞理標準」以來，禁區不斷被冲破、思想不斷解放，中國人開始出現做人的新局面。這是華國鋒同志和您的最偉大的功績。如果中國有朝一日出現了大的飛躍，那這個飛躍的開始正

是從這裡發起的，這已是歷史所承認的了。

三年裡最大的功績是把神恢復到人的面目，把人民的不歸自己支配的嘴還給了人民，整個社會承認了幾次重大的歷史錯誤。中國人千人一面、異口同聲的自欺欺人時代的徹底瓦解，中國人醒了，要做人了。

二、從歷史錯誤看今天

聽說，各大城市秩序混亂，犯罪率猛增，這是前進中的一個矛盾，應該着手克服。但是，在爲克服這一矛盾而採取的政策卻有南轅北轍之趨勢。我們從某大省的報導和省支委書記的講話中嗅出了五七年反右派的味道。在今天重新評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時雖說只承認犯了擴大化的錯誤，從改變的範圍和內容來看其實是全錯了，從法律的角度來講，是法外之法，是搞的思想罪。就算是只犯了「擴大化」的錯誤吧，終歸是錯了吧？試問在某大省講話的那位書記，請問團中央及《青年報》你們當時犯沒犯擴大化的錯誤？今春，報導團中央改正錯劃右派的消息上說97名右派，錯劃的94名，在當時的團中央負責人錯劃97.9%的右派時，不是他也滿口盡是站得住的「理由」嗎？當時的報紙不是也自認正確嗎？還有前不久平反的北大校長馬寅初先生，人家的正確預見唯們黨的某些負責人不懂就整人家，他們當時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整人家整錯了，並且也找了許多「馬列主義」的詞句啊！那麼今天，某省及其書記的報導、演講，《青年報》十一月三日的評論員文章難道就絕不犯五七年反右派的錯誤?!今天，某省報導及講話看起來眞是冠冕堂皇，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其實，他（他們）在五七年打人家右派時也是這樣，自己覺着滿肚子是理，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一個人犯了重罪，最長的有期徒刑才十五年，沒有犯罪的右派的摘帽卻要二十一年，法律上沒有的專政比憲法都利害啊！這一點，那位省委書記意識到了嗎？有些人總覺得自己平反了幾個右派就成了正確路綫的代表了，他卻不善於回憶自己打了多少右派，整了多少好人。我不明白，爲什麼許多領導同志不能從自己的嚴重的歷史錯誤中看待自己今日對世界的認識仍然可能犯錯誤呢?!

人爲什麼犯了錯誤？主要有二點，一是自私，二是不懂而又裝懂。關於不懂，毛澤東同志非常忠誠地承認了「我黨眞懂馬列的不多」，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吹牛，都是因爲不懂而又受虛榮心支配去充能，對五七年、五八年的事現在是懂了，所以也承認了，可是，又有什麼証據能証明《青年報》評論、某省報導、某省書記講話不是錯誤的呢？

三、晏平仲同志本人對民主牆的幾次講話

去冬，當民主牆剛剛出現之際，新華社公開報導了您對《華盛頓郵報》社記者談的話：「民主牆是個好東西，人民有自由，但有的提法我不同意，毛主席比三七開强得多。彭德懷四六開，我也四六開。」您還說過：「寫大字報是公民的權利嘛，那是寫在憲法上的……」您還說過：「英國的海德爾廣場怎麼能與我們的民主牆相比，你們是資產階級民主，我們是無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民主要比資產階級民主廣泛的多，我們要有千萬個海德爾廣場……」（以上均是大意，無原文）在您講這些話時，可能魏京生的《探索》、任畹町的「人權同盟」已經存在，您當時並未認爲他們犯法，至少是容忍了他們。如果當時中央認爲他們觀點有錯，應像《四五論壇》在三月間批評《探索》那樣及時地批評，不應等着他們越演越烈，最後變成罪犯。今年三月，您說了「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不管這個提法是否合乎科學，但您終歸還是以一種研究科學的態度講出來的。《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所發表的社論也終歸還承認青年們在牆上探討社會問題是積極的、合法的，但在不久之前您卻講：「他們並不能代表多數人民，」「他們打着毛主席的旗幟，其實是假的。」而《青年報》則說：「大字報畢竟不是討論問題和□解人民內部矛盾的場所……，」又說「眞理過了頭就是謬誤」這樣荒唐可笑的口號，還要繩之依法……而某省縣書記會的報導則更爲武斷專橫，沒有一點嚴肅的、認眞的科學態度，竟然把憲法的好幾條內容列爲鬧事、搗亂。在實踐上，也出現了天津可以不按手續就抓人，北京11月10號也是違憲捕人。誰也不否定有少數人的文章是具有反動性的，但民主牆上絕大多數文章是嚴肅的，而且是極有價值的。您

不應該因爲出了魏京生就連憲法上規定下的條款也要批判，即是牆上的全部文章都錯了，也不應以此來踐踏憲法上的條文啊！何況，民主牆正是您用自己的影、講話鼓勵出來的。國家出現了某些動蕩、不安定的現像，您就去克服它。並且要從這些現象中啓發出自己政策脫離客觀規律的啓示，難道社會的不安定不應去找社會政策及其制定者而去找百姓？任何社會的壞現象都是領導者思考的不週、政策的脫節所造成，怎麼可以把這些强加於民主運動與民主牆呢？無論是當成科學學問來研究還是當成現實問題來解決都是違背規律的。

四、關於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

某特大省委書記講話，多處違背唯物辯證法，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原理上都解釋不通，令人啼笑皆非，該省委書記提出的許多觀點概念都是連他自己也含混不清。這些論點、概念原本是科學上的一些學術問題，必須首先做出站得住腳的解釋之後，才可下結論。但這位書記卻像父親待小孩子們一樣武斷地下達許多反科學的命令。現用學術討論的方式提以下看法：

1. 關於資產階級自由化：

什麼叫資產階級的民主或自由？這是需要作出科學解釋的。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資產階級這個概念必須具有資產，那麼這個階級的民主也就是資產的民主，它承認生產資料的個人佔有，並以這種佔有方式形成資本家對工人勞動剩餘價值的佔有。這個階級的民主則主要以財產爲基礎，儘管它承認天賦人權，實際上沒有資本的無產者，只有出賣自己的權利，無產者從來沒有與有產者平等過。這個民主所導致的只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對以出賣勞動爲生存的工人階級的剝削爲依據的。今天在我國興起的這場民主運動其主流並沒有反映出資產佔有的剝削性質，他們沒有在政治上，也沒有在學術上提出把公有制改爲私有制，沒有歌頌剝削，所以他們決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我們可以看出，中央是打算用不取締的辦法取締民間刊物和民主牆，而我們一旦嘗試了言論權利的人民又不捨得放棄這份權利。許多人在反特權時沒有按中央的調子，只限制在反小特權，至多反一反中特權的界限上

，而是直指大特權，而民刊對社會科學的討論也沒有接受官長的約束，他們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毫無顧忌地對我們社會存在的問題做了大胆的剖析，這種剖析不僅損害了小特權、中特權的私利，也損害了大特權的利益，損害了高級領導人們的「尊嚴」。你們便把這種對自己尊嚴的損害，本能地理解爲資產階級的民主，或自由化。又因爲誰也找不出「資產」的表現來，所以就把一些社會犯罪現象强拉在民主運動之列，隨意地歪曲和誹謗。這是因爲許多老幹部雖然革命一輩子，但實在還不懂馬列主義的起碼常識，雖然他們在口頭上也講民主，講主人與公僕，但他們卻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當成馬克思主義的化身，總是不自覺地把違背自己意志的言行看成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這位書記還不懂得民主與集中的關係，他根本不曉得集中本身正是民主的最高表現形式，集中是民主的繼續，是民主的淘篩結果，而是機械地把兩者對立起來，把民主當成羣衆的事，把集中當成自己的事，這種思想的必然結果則是把民主只當成一種形式，當成裝飾，從來不賦與它內容，就必然把不同意自己觀點，不接受自己意志的人當成反對集中來看待。他們根本不了解民主和集中都不是目的，而只有科學才是目的，民主的目的正是充份集中大家的認識以求得出科學之結果，以這意義上講來，只有反對科學的行爲才是反對集中的行爲。

2.關於民主屬於「上層建築」的解釋之探討

該省委書記有這樣一段話：「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它建立在一定基礎之上，是爲經濟基礎服務的。民主權利的實現要受經濟、交通等物質條件的制約……」從科學或學術的觀點講來，民主不僅是上層建築，它更屬於實在的內容，民主能夠促進經濟基礎的發展，但不夠解釋爲「服務」。請問：經濟基礎爲什麼服務？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宗旨是一切都是爲了人類活得更合理，他決不是爲了要人只處在爲「他的學說」服務這一原則上的。民主實際是人們相處的一種關係，做爲哲學、社會關係當然屬於上層建築，但人們親身享受到的這種關係本身並非空虛的、抽象的，這是每一個人都能感覺出來的。有民主與無民主的人們生存決不會是一樣的，張志新能被割斷喉管這是實際的、是不能容忍的社

會現實，所以民主又是實際的、具體的，屬於物質基礎之內的。這位省委書記企圖用上層建築這一抽象概念來否定民主與反對人生存的實在支配性，要人們去坐等物質條件的豐富所決定的民主出現之後再去要民主，才去要做人的尊嚴，好像現在國家貧窮就應該不給民主，就應該多多的出現張志新事件，他竟然在這裏對憲法上的公民選舉、罷免權也給予否定。他這些話的錯誤，他顛倒了人與世界的關係，所以就搞不清中國貧窮的原因正在於不民主，如果你們早一點知道民主，採納馬寅初的意見，中國不是可以少二至三億人嗎？你們不打或少打點右派知識份子，能這樣貧乏嗎？明明白白三十年沒有摘掉窮帽子正在於不民主，今天，這位特大省委書記却異想天開地要求人民放棄民主，要他用不民主去創造出一個物質豐富的、客觀的環境。明明今年許多學者和領袖人物一再論證了沒有民主則不可能有現代化，他卻提出了先現代化後民主的錯誤理論。

3.「不去維護各級黨委的威信」提法錯了

威信偏於因果的範疇，它是有因造成的。馬克思主義的因果關係是先物質、後精神，人類對任何事物的評價不是憑主觀臆斷的，而是這個事物自身的屬性的必然結果。血是紅的，墨是黑的；香油受人歡喜，人類的氣味令人厭惡，這都不是人强加於它們的，而是這些物質本身具有的性質。一個歷史人物的香臭與地位不是後人加給他的，而是他用自己的行爲去鑄成的。一個人，一個黨，一級組織的威信只能靠自己去闖，不能靠別人去維護。二年來《人民日報》和各官方刊報發表的文章中抨擊黨的組織的太多了：白樺、秦牧、郭羅基、劉賓雁、張弦、金河、盧新華、還有好幾塊相聲、劇本，最近的電影劇本《在社會的檔案裏》都非常尖銳地揭露了黨內權貴的墮落。難道像白俊峯、劉德才、王爲羣、蘇華、王小平的父親、花花太歲的爸爸……這些黨內的大官們也要去維護他們的威信嗎？這位書記的這段話與邢柴平、邢伯平的母親的話其實是同一類形，在哲學上解釋不同，在實際生活中也做不到。《人民日報》11月13日發表的白樺同志在文代會講話中說：「近些年出現不少有才能的青年人，他們的作品大部份沒有發表的園地或者只能在自發刊物上發表。他們的作品儘管還

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已顯示出他們的才華。文學界很少有人去接近他們，認爲他們的思想可怕。他們的思想不是生下來就可怕的，而是可怕的歷史造成的。」其實我們的詩人後面這段話正是在批評這位大人物，與他的維護威信的唯心主義觀點不是成鮮明對比嗎？其實詩人的如此尖銳地發言也是對晏平仲同志的誠懇批評！

4. 關於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

中國是當今世界的窮國，這是官方早已承認的事實了，爲了實現現代化，各所屬人民都在研究阻撓產生力發展的主要阻力，探求當前中國的主要矛盾。這本來是學術民主，是大好事，各種意見同時出現，各家流派同時並存，這正是雙百方針的正常現像。可是某省把有人提出官僚主義是當前社會主要矛盾這一學術論點粗暴地進行了攻擊和恐嚇。對於一個科學論點，尊重科學的人是引用論據去反復加以證明，使自己的論點成立。持不同意見也完全可以從不同角度，引用另外的論據來推翻它。也只有這樣，才是研究問題，討論學問的態度，可是某省委書記會議不是這樣，他們根本不是研究問題，不是學術的態度，而是不分析、不論證，把持有這種觀點的公民說成別有用心，說成衝擊現代化。這是何等專橫！我認爲，不能把官僚主義統統當成敵我矛盾，承認某些官僚主義只是認識問題，這是對的。但是，官僚主義確實是中國的主要矛盾。這是全國人民異口同聲的回答，林彪「四人幫」還不是因爲中國官僚主義的嚴重發展而應運而生？並又在官僚主義惡性膨脹中篡奪大權的嗎？反右派不是官僚主義還能是「民僚」主義？吹牛之風不是官們能是民們？不是比彭德懷更大的官難道是民們迫害了他？黑龍江賓縣的那個楊政委、縣委、書記們、省裏的、部裏的那些官僚們爲王守信大開綠燈不是官僚？白俊峯浮誇打人，劉德才營建私宅，公安部長因元宵而捕人，王小平仗父權違法亂紀，邢氏兄弟成爲花花太歲還不是有其父撐腰？河北省軍區顧問强佔民宅……，這不是官僚主義？即是北京「一一一〇案件」也是宋振明官僚主義所致，在李本東一次犯罪後，這位部長如若不以權毀法，不是三年徒刑，就可以少死二條人命嗎？還有進口設備無計劃進了以後多年不用，風吹雨淋；出國考察不

派實際操作的，而派幹部親屬；體制改革越改越亂；精簡機構越減越多；吃大鍋飯；佔茅坑不拉屎；發獎金、評工資，要嘛平均，要嘛近我者親；張勁夫在人大上講動輒上百萬、上千萬乃至上億元的浪費……這一切問題，其中有嚴重的犯了罪，有輕微的小錯誤，但難道這不統統是官僚主義的結果嗎？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所闡明的：在任何情況下，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都是與其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個關係是什麼呢？還不就是社會的主宰者們不能把人與人、人與物調節到最合理的關係中？——也就是官僚主義所致嗎？人們反對官僚主義，在於反掉官僚們不合乎客觀世界的認識，決非要否掉社會必須的官吏，不僅在中國，即是全世界，也不僅是今天，即是過去的全部歷史及今後，社會的主要矛盾都只能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矛盾，而不適應生產力的生產關係則正是官僚主義的結果。

5. 幾家報紙踐踏了神聖的憲法.

什麼是法？法是以一定的方式來調整人們間社會關係的約制性因素，它是國家性條例。法是集中地代表了社會統治階級的意志。

什麼是憲法？憲法則是一個國家根本性的最有概括意義的大法、母法。

一個國家的憲法一經確立，它就具有嚴格的效律性，它不以人的意志來左右，只依自己一絲不可變動的內容爲準則，它既不往裏拉，也不向外推。無論什麼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踐踏它。這一點葉劍英委員長和華國鋒總理反復强調過，不論職位高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彭眞同志在司法會議上回答幹部的「法大，還是權大」的問話時，他肯定地回答「法大」。任何一個公民、團體、黨政機關、報刊只有守法的義務，也有討論法律和建議改法的權利，但是，在法律沒有修改之前，任何人不得違犯、篡改、攻擊、歪曲，我想這是最起碼的準則和常識了。

在《憲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第四十五條中這樣寫道：「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的權利。」然而，《中國青年報》11月3日評論員文章卻說：「街頭大字報到底不

是鄭重地深入地研究問題的方式，也不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11月5日四川的部份縣委書記會上則說：「……還是搞『四人幫』那一套，拉山頭、搞串連、圍攻、遊行、煽風點火，製造輿論……」13日的《解放日報》評論員文章則說：「……這些人往往以爭『人權』爲自居，動不動貼大字報、製大幅標語、散發傳單，私自發刊物……」還有某幾位大人物信口開河的演講。這都是違憲的，都是與以上引證的那段憲法相抵觸的，不管自覺不自覺，這些報紙與講話都犯了法。憲法與法律一經形成，不論有多少人以法律的某些條款的爲幌子從事了犯法的勾當，都沒有理由借此來誹謗和踐踏憲法的條文。誰觸犯了刑律誰應受制裁，決不能用此來蠻橫地汚蔑法律。言論、結社、出版、遊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怎麼幾家報紙、幾個領導人就可以因爲幾個害羣之馬指責公民們遊行、出版、大字報是煽風點火、鬧事、搗亂、破壞四化呢？即使是憲法錯了，你準備修改，在沒修改之前，你們也沒有權利汚辱它、踐踏它、誹謗它啊！我們被你們這些公僕們稱爲社會主人，社會主人按照你們親手製定、親口宣讀的憲法與法律去從事正常的社會活動，竟然都受到威脅，還要警告，要鎮壓——還要那部法律幹什麼用呢？

無論是一個領導人或是一家黨報，你提出一個論點之後，你必須給以證明，一一地加以檢驗。尤其事關國運民運的大問題，你必須舉出若干個有代表性的過得硬的例子來加以證明。而別人也完全有權提出相反的論據來推翻你們的論據、駁倒你們的論點。也只有當別人的論據從各個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檢驗，你的論點仍舊沒有被推翻時，才證明它的成立、它是科學呀！一個人在偶然的時機中當了官、或者成了大官就可以隨心所欲，時而說要法制，時而又攻擊憲法，就可以用自己的話代替憲法嗎？即使當眞有人用憲法賦於的權力來搗亂，你也要用充份說理的態度，用科學去證明他們的反科學，而決不應該以人民老爺的勢態、奴隸般地喝呼進行科學研究的公民。

6. 不要制造法律上沒有的帽子

雖然有些領導人曾經反對過「四人幫」，但在他們重新工作之後却不自覺的承襲了「四人幫」亂打棍子、亂扣帽子的伎倆。

我們上面指出的報刊、及某幾位超級公民的講話就是新棍子、新帽子的代表。在法律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具體的罪款，任何罪名都有實際的犯罪內容：如反革命罪、盜竊罪、放毒罪等。現在報紙上却無視法律，又創造出「造反派」一項比反革命帽子更壓人的帽子。文化革命是一個歷史時代，既然有了這個時代，就會有這個時代屬性的人，文化革命這個時代是毛澤東同志創造的，「造反派」也是他倡導出來的。不錯，有許多人犯了罪，但不能因爲有一些罪犯就統統槍斃這個時代的人。單從字面上看「造反派」三字並無反動性，其反動者決不是這個派而是這個派中的某些人。打、砸、搶犯就是打、砸、搶犯，不能說他是「造反犯」，王守信是貪污犯，不能說她是「造反犯」。憲法、法律沒有「造反」的罪款，不應該在法律之外開設特殊罪名。何況任何人生下來都沒有造反，首先有了違反社會的環境，然後才出現了「造反」的人，無犯罪的造反派是不容侵犯的公民，決不應該任意地污辱他們；再說「造反派」是事情的果，打擊迫害才是事情的因。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歷史十年的文化革命是一場浩劫，這場浩劫開始時首先是各級黨委追隨「四人幫」大打「小三家村」，大揪黑店、黑黨而開始的，劉少奇同志是寃枉的，但他派工作隊到處整羣衆，也記在了社會的檔案裏啊！沒有犯罪的造反派是百分之百的國家公民，應享受公民的全部權利。這是無可非議的。請不要再把批評者指爲「造反派」，「好漢」。人民是十分反感報紙胡說的。還是尊重一下法律吧。

五、白樺的講話香，×××的講話臭：

《光明日報》的討論紀要好，××省的討論紀要糟：最近，反正兩面的文章同時出現，它們接受了人民的檢驗，它們誰對、誰錯就在這無情的檢驗中得出結論，如同第×期的《經濟研究》發表的□□□□□□同志的文章《……》不是也受到兩位大人物的誹謗和攻擊嗎？兩位大人物自己不一定是經濟專家，對於自己不懂或不甚懂的東西應該去請教，應不恥下問，對於一個純學術問題硬要拉到政治上去，這與你們親手粉碎的「四人幫」有什麼不同？結果《光明日報》用無可論證的科學論證把你們頂你

回去，你們的權再大，也壓不垮科學證明了的眞理，今天當《××××報》的評論一廣播（我們聽到的是一片斥罵），某超級省委、市報的文章一出現，公民們的臉上立刻出現了一層陰影，人們的心又凉了，但是《光明日報》發表的《不能用專政的手段來對待精神問題》一發表，人們立刻爭相傳閱，在《光明日報》針對某大省關於官僚主義不是主要矛盾的報導之後，發表的《深入批判封建主義，徹底肅清封建流毒》的討論，形成多麼鮮明的對比！前者受到的是斥罵，後者受到的是讚許。最近《人民日報》發表了白樺同志的文化會講話，第二天又發表了郭羅基同志的《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文章，使廣大讀者歡呼雀躍。白樺同志熱情地讚揚了青年們的工作，同情自發刊物，某幾家大報把寫發刊物說成搗亂，怎麼能不使人憤慨?! 同是《人民日報》對同一件事情發出了絕對相反的態度，這叫人怎麼去相信報紙？自己就打着自己的耳光，它又怎能安定團結？

六、全國人民無不反對收縮政策

自發刊物是堅決反對收縮的，這是不須要說明了，彭冲同志從今年春節在上海取收縮壓制政策以來，叫他自己說說，他究竟取得了那些看得見的成就？他消滅了上海的民主牆，但沒有得到一個安定的環境。相反，北京雖然抓了魏京生等人，但由於北京的特殊地位使牆存在下來，牆在，民主之士就在，民主空氣就不可能不比上海活躍。壓並沒有把上海壓太平，民主牆和民主運動也沒有使北京大亂，相反，北京的社會秩序一直比上海好得多。爲什麼呢？因爲北京有一條表達矛盾的渠道和場所，矛盾一旦能及時地表達出來，它的膨脹系數就相應降低；矛盾得不到及時的排泄，積壓的結果只能是動蕩。這兩地的現實可以說是對收縮有力驗證吧！

再一點，於去年秋華國鋒同志爲首的黨中央爲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後，天安門的許多英雄就組成了新的民主隊伍，韓志雄曾是《北京之春》的撰搞者，孫正一、王占山都是《北京之春》的工作人員，現在是四五英雄們變了，還是官方變了？兩者必具其一。人們看到的事實是在粉碎「四人幫」後幾次重要會議上，包括

「十一大」都還是按「天安門事件」的原定性質，只是在再也壓不過的一九七八年十月才被動的予以平反，根據邏輯推理的原理，現在變了的還只能是官方。「四五」運動的革命性已經確認，「四七」決議錯了吧？堅持了二年的這一「四七」決議精神是錯上加錯；平反只是糾錯，這裏已有三個點可供推理，證明今天變了立場的仍舊是官方，而「四五」立場卻沒有任何已知可供推理。

知識界也表示了旗幟鮮明的立場。白樺同志說青年們思想可怕，他們的思想不是生下來就可怕的，而是可怕的歷史造成的。難道這不是對某大省、某大市那些攻擊青年運動的尖銳而公正的批評嗎？白樺同志批評您晏平同志的政策：「當允許你放的時候就潛伏着收的危機；當你放的時候，就爲自己挨打、掙一頂帽子、坐牢準備了條件。」在宣判魏京生時《光明日報》發表了《不能用專政的辦法對待精神問題》；在新華社發表某大省討論講話之後，出了白樺、郭羅基的文章，難道這不可能證明學者們的心心情嗎？還不能看出人心之向背嗎？

七、收縮政策的目的

任何人做事都有一個目的，也有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後果。收縮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爲全國各地都出現了不安定的因素：秩序又向混亂方面發展，工業上不去，生活資料緊張，三年大治而效微……爲了創造一個安定的環境便於發展經濟，所以更大大收縮一下。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收縮的目的是爲了安定。但是，在貫徹收縮政策之後所達到的效果恰恰相反，特別是上海。壓了一年了，不僅不安定，反而更亂。這一事實不就不引起人們對收縮政策是否合乎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是否合乎經濟的發展規律產生了質疑。

八、不安定因素的原因

說中國社會不安定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是以民主牆爲標誌的社會改革派，其二是大量增長的青少年犯罪造成的社會秩序混亂。無論兩種現象中的那一種都是中國經濟規律上的必然結果、

中國發展的必然結果。

假如那幾家攻擊民主運動的報紙和官員眞的承認他們自己所說的「民主屬於上層建築」的話，那末，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我們可以認爲在中國興起的這場屬於上層建築的民主運動是當前中國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你們不是常說，有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麼樣的上層建築嗎？因此，中國的民主墻、中國的大字報、遊行、示威、自發刊物都是中國經濟基礎所必然產生出來的。因此，《四五論壇》、《沃土》、《今天》、《北京之春》決不是這些刊物的組織者、諸如徐庶、呂樸、王占山、王軍濤、李嘉華、劉念春們創造出來的，而是中國共產黨以它和它的經濟創造出來的。現在你們不到自己的政策中、到經濟基礎中探求自發刊物產生的根源，尋求解決的辦法，却企圖到刊物自身中去探求它產生和存在的根源，這不是顚倒了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嗎？自稱爲馬列的人竟連這樣一點常識也不懂。以上是我的反證，下面是從正面進行的討論。

小農的中國經濟決定了近三代人的精神。在歷史還未提議徹底消滅小農經濟的時候我們以並非自然成熟的全民集體性質代替了小農經濟，但是，由小農經濟所決定的人的精神面貌還十分頑强地十分普遍地統治着中國，即是共產黨的官員們、甚至領袖人物也不例外。這樣這種小農經濟的精神與現代大工業、農業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這些矛盾就是中國三十年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的根源。新的生產關係下創造出一代全新的人，他們從未成熟起就是由現在這種經濟關係做爲客觀物質世界來形成他們的認識的，具有這種新思想的一代人與小生產時代的人又發生了尖銳的衝突。這兩種衝突交錯出現，不斷加劇，各自都頑抗地表現自己。這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出現、所以發展成爲一空前的浩劫、所以出現天安門事件的內在條件。從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五八年的大躍進運動和浮誇，五九年的反右傾、六十年代初期的災害、到中期的文化革命，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因小農的經濟基礎所造就的一代人與社會主義經濟所造就的另一代人之間的矛盾，是代表了先進生產關係的思想與落後生產關係思想的矛盾——說到底是先進的生產力（指人）與落後的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只要

這個矛盾不解決，中國就不可能出現安定的局面。

在「四人幫」被從歷史舞台趕下之後，中國人一度處在極大的熱情之中，社會秩序也出現過一年的起色。這主要在於四人幫剛剛垮台，人們對新的政體還處在認識階段，人們把希望寄托於新政體的改革上面，而新政體也確在七七、七八兩年內大膽地進行了一些改革，這些改革迎合了歷史進程的程序，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所以出現了一九七八年全國心情高漲的局面，以三中全會達到了高潮，但是，在三中全會之後三個多月，華鄧維新運動就顯出搖擺性，甚至出現了大幅度的倒退。這種退倒政策大大地挫傷了人民羣衆內心煥發出來的愛國熱情。像白樺、劉賓雁、郭羅基這樣一些深負衆望的名士都公開表示他們的失望。可以想見人民羣衆情緒的實際狀況了。人的地位、環境、知識的不同當然使人的覺悟不同，許多有志之士根據我國經濟的現實，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發現了中國歷史的未來，這些人與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當年一樣，他們不甘心家國愚昧下去，他們的良心迫使他們與一切反科學或違背歷史規律的傾向去抗爭。理論刊物《四五論壇》發表的許多篇理論文章引起了社會普遍地重視，即使一些哲學、經濟學的老前輩也爲之驚嘆。他們的新思想破土而出，給許多有良心的中國人帶來了希望——這種希望就是爲某些大人物指責爲反對安定、團結、指控爲鬧事的代表了未來的那些思想正如同宗教法庭不知道地球是圓的一樣。

另一不安定的因素就是越來越猖狂的社會犯罪現像，我們承認這是一種破壞因素，但我們決不能愚笨到像某些人那樣到社會犯罪本身中去探求答案，我們只把它看作一種現像，一種結果，一種入門的嚮導，我們只有這樣才可能揭出它潛在的本質。我們已經說過，它是經濟狀況的必然結果，再一點就是政策的反覆所造成的必然結果。當收縮政策之後，人們憑着多年實際生活的經驗，意識到變革的渺茫，一度出現的熱情被澆滅了。人們對未來失去了信念，感到努力和不努力、守法和不守法都是一個樣，都是暗淡的前途，有理性的人，去從事實踐社會活動，沒有理性的人就只有墮落下去。因此，我們可以認爲許多年青人犯法仍舊是

政治經濟所造成的。

要創造安定團結的局面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盡快使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要求。任何打擊、鎮壓的結果總是與願望相反的。

在毛澤東同志的壓力下，您晏平仲同志也說過擁護文化大革命、永不翻案的話嘛，可是，壓力一去，您不是還是您嗎？您爲什麼就不想一想：用壓力去壓垮民主墻、壓垮自發刊物還不是同您永不翻案一樣可笑嘛！一有機會，它們還是要出來的。

九、對安定的理解

求安定，必須首先對安定這二個字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釋。安定的直解只能是不動、平靜，作爲社會用詞，安定是指平靜穩定、靜止。如果從科學的角度來分析，安定就是合理、嚴秘、恰當。如果一個木工要制造一個方凳，那末，這方凳上的每一部件的尺寸都必須按照設計要求，每一個卯眼的位置、尺寸不僅要合乎設計，且一定要與榫頭相一致，只有這樣，才能組織起來——也就是說達到安定的水平。倘若卯眼太小，你就是用刹子刹斷了木頭，它也結合不起來；倘若卯大榫小，它就根本就結合不住；倘若是錯了尺寸，就形不成直角，結合起來也不成形狀，並且很快就解體了。從這一意義上講來，安定只不過是事情的結果，要想取得安定之泉，必須有其符合它要求的各種必須條件。所以，我們可以說安定的本質是科學。

求安定的本質也就是求科學性。

我們前面的論述，足以證明我們求安之術不合乎安定的要求，隔開了科學，它又到那兒去找安定呢？

十、愛是社會關係最牢固的結合劑，是安定的基礎之一

恨的目的是爲了愛，決不是爲了恨；懲罰的目的仍舊是爲了愛。陳涉爲什麼要揭竿而起？因爲他失去了被愛和愛人的可能性，他爲了愛人，也爲了被人愛，所以才去消滅那些絞殺愛的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也是基於無產階級失去了愛和被愛的可能性才提出無產階級革命的。階級鬥爭所能證明的只是一小部份人剝奪，

另一部份人的愛，另一部份的人爲了能去愛人，也被人所愛，才去從事鬥爭的。馬克思曾經批判過資產階級騙人的仁愛思想，但他還給社會的是無產階級的最博大的愛。

中國共產黨在爲中國傳佈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不得不首先消滅那些人們愛的關係的阻撓者，人們恨的關係的製造者（儘管這是經濟運動的必然規律所決定的），而這個過程太長久了，長久到使恨成了一種習慣，成爲社會的一種偏見，所以當它在完成了這一任務之後仍舊沒有及時地轉到愛的立場上來，到把仇恨視爲法寶，其結果是一：害民，二：坑國，三：坑自己。人們在經受了十年的磨難之後，滿懷希望的期待着把仇恨的政策轉到愛的政策上來，但是，文件上的轉變並沒有把社會上所有人都帶到愛的隊伍裏去。絕大多數官員仍舊在貫徹恨的政策，放縱自己及自己的親近者、苛責甚至損害別人依舊是社會最流行的行爲。社會的主宰者不是滿懷熱情地把人們拉在一起，使之得到安穩，還硬要把不讚成自己的人視爲敵對者，有權的人在衆人面前還硬要盡情炫耀自己，那麼，有力的人也只好以力服人，有技的人也只好以技取利，能偷的人也只有以偷爲能……倘若社會不認眞考慮用愛去代替恨，還要人們互相監視，還要以憲兵來維持秩序的話，安定則是不可能的。

十一、與晏平仲同志說說心裏話：

晏平仲同志，你是中國的一個有歷史影響的人物。你自己說過要四、六開，那就請您自己說說，您那六分功績是什麼？四分缺點又是什麼？其實您自己在講這個「四、六開」時自己也無準備，你自己並沒有對自己做出科學的估計，您所以那樣說只是附合形勢，表示自己謙虛、自己不像別一個人那樣糊塗罷了。倘若眞有人用科學的根據來證明您的那四分缺點，肯定您是接受不了的。坦白地說，您不是沒有錯誤的。我認爲您最大的長處是實事求是、坦白誠實、永不枯竭的精力和干脆、負責的作風，你不愧爲中國一個傑出的組織家，但您不是思想家，不是哲學家。因此你許多言論是經不起科學的檢驗，也不合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唯物主義的辯證關係。請您想一想，爲什麼在一九七五、

七六、七七、七八、九年裏您有那樣廣大範圍的威望，人們用青天來表達對您的愛，可是現在這一切沒有了，難道人民變了嗎？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這都是說不過去的。就以西單民主牆來說，您的講話是多麼矛盾，您是正在用自己的矛去刺自己的盾啊，你批評別人是各取所需的適應主義態度，可您個人關於民主牆絕對相反的講話又做何解釋？現在流傳着您的一些講話，我雖不知它的眞僞，但從報紙的調子來看那是可信的。在您批評年輕人時，您不曾想過撫心自問嗎？比如有一次《參考消息》上報導您的小孩兒到機場爲您送行一事，您可曾想過嗎？這就是一個錯誤，一個小孩子他不應坐在轎車裏去爲您送行，您的孩兒也只是中國一個普通的兒童，他不能因爲坐在您家就高人一等。顯然，您和您手下的助手們並沒有認識到這就是特權，就是錯誤。可在您們看待人民、看待民主牆時，眼睛就瞪起來了，有時針眼大的事您可能看的比象還大。毛澤東同志不是神，可在他晚年他就覺悟不到這一點，您看到了他的這一錯誤，可是您是否打算自己也接受這一教訓呢？您三年來的活動是可以證明您並沒有意識到自己也可能犯神的錯誤。毛澤東同志的言論，可能從整體上來講有不合辯證法的，但他的話在多數情況下就本身意義來講還是成立的，證明了他是一個思想家，尊敬的晏平仲同志，您做報告的話當然也是成立的，可您許多不合乎講稿的話往往自身就經不起邏輯的推敲啊！

您在聽到了您的助手們的添枝加葉的滙報之後，也許會發火吧？那我的命可以休矣。倘著您肚子裏眞能撐開船的話，請您還是冷靜地想一想：您與我到底有什麼兩樣？有頭、有臉、有五官，能吃、能喝、能看、能聽、能思考，只不過您比我早下生了四十年，趕上時代的需要，成就了一番事業，除此之外那裏有什麼不同？當年您去法國留學、組織革命團體，您率領一個方面軍，是爲的什麼？您還不是覺得當時的社會壓抑了您們，您們看的比別人這些正確些，所以您們就出來吶喊疾呼。那今天還不是一樣嗎？您以爲您們就不可能阻擋歷史的前進嗎？這個觀點是站不住的，時代的發展是沒有止境的，處在時代中的人又沒有一個人是神。請看看恩格斯在獲得馬克思死訊時怎樣說的吧，他並沒有因

爲馬克思的豐功偉績而不承認他晚年觀點上的保守性。人須要糧食、水分、氣氧是不斷的，不能因爲吸進去的是氧氣，呼出來的就不可能是二氧化碳。社會發展中的新陳代謝也是沒有止境的。

您是以反浮誇而馳名的，可是您是否從理性上認識到「眞理遠在眞實之中呢？」我認爲您至少沒有徹底認識這一樸素的眞理。您在「十一大」上高呼說實話，可最近您反對青年們說實話，比如「XXX案件」，人們有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正確還是錯誤，但不少人反對這是肯定的，這就是實話。如果認爲他們的觀點錯誤，可以反駁、批判，可以爭論。但您不是這樣，意然在《人民日報》上登出：「爲他辯護就是與他有同樣目的。」這句話其實是說人家都是反革命分子了，這裏還有什麼眞實可言？其實，您和您的助手們非常清楚，反對這個判決的人數是多數，不單是自發刊物，普通的百姓也反對，知識界更反對。就連《人民日報》怕也不見得擁護吧，要不怎麼能把白樺、郭羅基的文章登出來？要不是對判決持不同意見，《光明日報》怎麼能發表，《不能用專政的辦法對待精神問題》？問題的實質是每一個人心裏都清楚的，可是，您爲了當前的需要，就忘記了您是以反對撒慌而聞名的，竟用權力和宣傳逼着人們再度去講假話。

從您和您的幾位最得力的助手們的講話中看出，您對青年人的行動是感到茫然的，其實，我們對您們也感到茫然。事情就是這樣，一旦情緒對立了起來，相互間就越是不肯罷休，越是容易光去看對方的錯誤。中國和美國就是例子，現在中美解凍了，回過頭再去看一看原先矛盾的焦點，有時自己也會啞然失笑的。當我們從一個方向來看一件東西時，它是一個樣、當你另換一個地方，再看同一東西，它可就是另一個樣了。民主墻也是這樣，當您需要人們冲決凍僵的大地時，你左看，他左順眼，右看，它右順眼；當它的存在不僅證明了歷史，證明了別人的錯誤，而且它竟然也證明了今天，證明了自己也有錯誤時，再去看，則怎麼看也覺別扭，變了的不一定是墻，還可能是自己的立場觀點。

晏平仲同志：

假使現在有人出高價收買您的立場，您賣不賣呢？這個高價就是送給您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您把您目前討厭民主的立場變

變，可不可以？我推斷，您是不幹的。因爲我在親生的經歷中發現幹部們不愛從利與害的關係上考慮政策，而是從激動的感情上制定政策。這便是您們這一代人與我們這一代人的區別。爲什麼會有這個區別呢？因爲我們這一代人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他們製造的那個客觀世界製造出來的，而您們是晚清和軍閥混戰的那個世界製造出來的。當前中國的新興思想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而是你們親手製造的那個模子鑄出來的，雖然您們親手造下了這個模子，但鑄造您們的那個模子却是上一個時代，您們在粉碎那個模子的同時也不自覺地被那一個模子所薰陶，不可以避免地要在您們自己的生命長河中發生矛盾。

您不理解年青人嗎？那末，請想一想，您爲什麼穿布衣吧，因爲天冷嘛！您不去怪責天氣，反怪穿棉衣的人不講儀表，如果您把屋子裏裝上暖氣、生上爐火，那誰還能穿棉衣呢？如果您抓緊自己那個隊伍，把貪官污吏統統鬥垮，把一切壞事統統改好，誰還去寫什麼大字報呢？道理是簡單的，付諸實現卻是困難的。

我建議您不要再激化矛盾了，對刑事罪犯一定要抓，要懲辦，但必須從今天起就改革教育，改革只要奴性、不要科學的宣傳方針。對那些從事思想運動的人（如我之輩）則敞開大門，叫他們說去，爭去，只要是思想而不是行動，儘可不去管他。如果今春您不抓魏京生去，其實他的市場並不大，不少人發表了反對他的文章。照春天的路走下去，他會因沒有市場而自行垮台的，他現在香起來了，完全是抓他的結果。如果判決不是這樣嚴，判個教育釋放，社會秩序也早就又趨於隱定了。整天强調安定團結，可就不知道怎樣去安定法。

安定的條件是科學，是合理，凡是合乎科學的事與人都應該受到尊重，您報上公開承認民刊頭腦也是敏銳的，分析問題也是深刻的，難道因爲它是自發性就失去了內容上的科學性？就影響了安定？

平仲同志：

全國人都在看着您，爲民計、爲國計、爲黨計，請您三思。

我的文章可能有錯，我接受批評！

我希望我能繼續做爲公民而存在！

致敬

孫豐　1979、11、25

原載青島《海浪花》第四期

黎永敏

論無產階級專政的使命

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使命是什麼？它從何時開始到何時結束？這兩個問題（可以說是一個問題）在目前的我國不僅具有巨大的理論價值，而且有迫切的現實意義。

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中說：「無產階級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以後，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創造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基礎上得出了更進一步、更鮮確的結論，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以前者變爲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

自從列寧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來，世界還有不少自稱信奉馬列主義的政黨取得政權，實施「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國勝利，以後，也同樣通過無產階級專政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爲什麼「政治上的過渡時期」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呢？

自從人類分化爲階級社會以來就有了國家，「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列寧選集》第四卷49頁）即在一具體國家的本質，就在於是什麼階級作爲統治階級掌握着它，在無產階級專政以前的國家裏，掌握政權的始終是一小撮，一個特定的剝削階級，這些國家無論在形勢有多大的分別，無論它們掌握在什麼階級手裏時，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爲基礎的剝削階級統治。正因此，在以往人類歷史上，生產力的變化引起生產方式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改變，從而使整個

社會經濟結構改變，並導致整個社會形態發生變化時，其在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全部經濟基礎之基石方面的改動無非是從這一部份人手上輔移到那一部份人手上，從這一階級轉移到那一階級的手上。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制的變更中一直延續着生產資料私有制這一本質上的共同點。正因爲上述轉述過程的前後有着這一共同點，所以這些轉變可以在社會變革或社會革命前期可能產生，開始進行（當然只有在社會變革或社會革命之後才能完成）。但是，從資本主義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所有制（必須懂得：這裏所說的共產主義所有制即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轉變則與以往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轉變根本不同，它不是從一部份人手上轉移到另一部份人手上，並且也不是從一個階級手手上轉移到另一個階級的手上，而是將全部生產資料和土地的所所有權完全轉移到賴以維持其生存和發展的全體人民手中來。因此，這種轉變是不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發地開始進行的，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用無產階級專政來剝奪剝奪者，把從剝奪者手中奪來的生產資料和土地變爲共產主義低階段的公有制。同時，通過教育和組織工作，使各種的私有者經濟也逐步轉化爲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只能這樣，才有可能完成這種轉變。不能設想這種轉變——包括轉變的前提社會革命——有可能在資產階級所設法律約束下完成，因爲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制體系是建立在以資本主義所有制爲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制度及保衛這個社會經濟結構，使這種社會經濟結構制度化而建立的這種法制體系的目的就是爲了保護資本主義所有制，爲了保衛資本主義制度。爲此，要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要把私有制度變爲公有制，就不能不依靠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歷史使命也正在於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形形式式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成爲共產主義低級階級——社會主義的公有制，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使命的科學認識。

爲了完成所有制的轉變這一重大歷史使命，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必須繼續存在一定的時間，因爲它必須使社會主義的經濟結構能夠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得以形成和完善，並在這種經濟結構基礎

上形成適應它並能保護它的上層建築和法制體系，這種上層建築和法制的體系的建立，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使命的完結。到這時，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讓位於受社會主義法制體系的約束的人民民主政權了。

在這裏，我們必須弄清楚專政與政權的區別、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政權的區別。

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對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了科學的定義：

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選集》第三卷623頁）。

由此可見，專政是政權的特殊形態，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政權——科學地說——人民民主政權的特殊形態。

這一點也證明了：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主義法制體系之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使命就告完結，因爲社會主義時代的人民民主政權是必須受社會主義法制約束，必須依靠憲法和法律來對形形色色的違法份子實行制裁以維持其統治的政權。當然，這種「維持」是爲了放棄維持的過渡性手段，這種政權是與以往任何時候的政權都絕然不同的，它不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而是代表全體人民利益對違法份子進行鎮壓時，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半國家」或「非國家的國家」，是走向消亡的特殊的「國家機器」，是「國家機器」從社會領導機構變爲純粹的社會管理機構過程中的特殊化形態。

無論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它們的專政和它們的政權都是有區別的，前面說了，專政是政權的特殊形態，在剝削階級統治的時代，在階級鬥爭的表現形式相對而言比較和緩、階級衝突規模相對而言比較小一些。在剝削階級統治相對而言比較穩固的時期，它們都寧願——而且必須採取基於該時代經濟結構基礎上形成的法制體系（這種法制體系在各個時代的表現形式各不相同，並且只有在資本主義時代才能以完整的形態出現）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剝削階級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採取專

政的形式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其原因在於他們憑借爲該時代經濟基礎服務的法制體系就足以維持他們的統治了，並且還因爲這是發展生產力的需要，當剝削階級統治比較地穩固的時候，這時整個社會各階級必然對於按照社會分工需要而有條不紊地（當然是相對的，對於剝削階級是被迫的）進行工作的狀態中，這時候如果統治階級不是借助他們的法制，而是直接憑借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暴力來維持統治的話，必然會破壞他們自己統治的穩定性，因此，而必致使這種統治動搖。

但是，一旦到了動亂時期，「例如古代奴隸的起義和大騷亂，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國家的實質是奴隸主專政」（《列寧選集》第三卷622頁）這就證明，剝削階級政權的本質就是他們的專政，但這種專政的實質只是在動蕩時期才直接暴露出來。因此，這種專政又只是剝削階級政權的特殊形態。

當生產力的發展使另一種生產方式產生，使另一階級在生產資料所有權方面的要求越來越大，並且生產力的發展導致實現由這一階段代表的新的生產關係，只有在這一生產關係下生產力才能得到解放時，社會變革或社會革命就到來了（例如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和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而在這時，舊的統治階級雖然企圖採用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大規模鎮壓來維持自己的統治，但還是不得不被代表先進生產關係的階級用不受任何法律約束，（有時採用的是傳統許可的範圍內逐步實行改革的方法），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方法——即革命的專政——來維持和鞏固自己的統治，直到建立起適合於自己的統治需要，同時也適合於生產力發展新的生產關係，亦即適合於這一先進階級所代表的新的所有制爲基礎的生產關係和經濟結構的法制體系之後，這種專政才能爲法制所代替，雖然這種依靠法制來進行統治的政權在它受到被人民推翻的威脅時同樣會冒出「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專政的猙獰面目。

「由此可知，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裏，專政是剝削階級□統治，因爲鞏固其統治，或統治受到威脅時必維持其統治的正常秩序時「採用的暫時的特別手段：而政權則是其發展生產力，使統治階級得以享受他們的政治特權和政濟利益的一般形式。

無產階級專政所以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政治時間的過渡時期，前面說了，其歷史使命就是把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各種小生產經濟改造成爲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社會主義的公有制。這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完成所有制的改造工作。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種種社會弊病、社會罪惡的根源到底問□?儘管它相對於封建社會來說已經前進了一大步，儘管他使生產力像變魔術似的飛躍發展起來，並因此可以用「博愛、平等、自由、民主」的字眼來爲自己裝璜打扮，但是它却無法掩盖自己□□了，□□社會的共同本質，生產資料私有制這一事實。

無產階級並不反對資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爲人民爭取的一系列歷史進步，特別是民主政治方面的進步，但必須堅決揭露這種民主政治的極大虛僞性，即打著民主的提子來掩蓋其罪惡的淵藪—生產資料私有制，揭露這種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的歸□毫無民主可言（而這又恰恰是最需要民主的地方）的基礎之上的事實，正因此無產階級即要繼承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合理方面，同時，又必須用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來爭得生產資料方面的民主，——推翻資本主義私有制政權，打碎資產階級爲維持自己的所有制而建立的國家機器，以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爲此，在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連同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之後，要想鞏固自己的統治，就必須依靠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建方所社會、新制度而採用的不受任何法律——有時甚至是爲自己爲現實需要而制定的臨時法律——約束，直接憑借暴力來維持的政權。當然，隨著所有制的改造進程，適合於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法制體系將逐步建立和完善，這進程中，專政也就逐步讓位於法治。在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的基礎上建立起相對完善的社會主義法制的體系之後，專政的使命就告完結。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一種政治上的過渡時期，就是在這種意義上進行過渡。

爲建立新的生產關係而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直接憑借暴力進行統治，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與以往一切專政所擁有的共同點，由於它本身的存在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未能確立，和鞏固社會主

義法制體系的未能在自己的經濟基礎上產生和完善化爲基礎，故整個社會本身也就必然還沒有進入那種能使整個社會按照生產需要有條不紊地進行工作，從而使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的相對穩定狀況，因此，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本身不僅不是保證生產力迅速發展的最好形式，而且還是生產力不能發展的象徵，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與以往的第二個共同點。

無產階級專政在以往一切專政的最根本區別在於以往的一切專政以確立某個階級的統治爲目的，而無產階級專政的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產階級社會的過渡。

下面，再來研究過渡時期的起止。

目前，普遍流行的觀點是抓住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的專政是以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間的政治上的過渡時期和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級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產階級社會的過渡，這二句著名論斷，以及過渡時期就是社會主義時期，認爲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都是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即不符合馬克思和列寧闡述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也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

馬克思認爲公有制的建立就是階級的消滅，就是進入了共產主義，即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如果認爲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後來完全用「社會主義」這一術語代替了「共產主義的低級」和「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因而造成了人們將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與社會主義時期等同看待的誤解，也是錯誤的，因爲這對於稍仔細一點地讀過《哥達綱領批判》和《國家與革命》等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人來說是完全不可能的，何況那些以「馬列主義理論家」自居的一些「同志們」！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專門解釋道：「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爲社會主義）」(見單行本第80頁)，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馬克思和列寧在使用這些術語時，之所以偶有不同，其原因在於以科學的角度看：「通常稱爲社會主義」的階段，一方面以本質上說，從所有制上說，它已經進入「共產主義」了，另一方

面，從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又還帶著資本主義的痕跡。

革命導師們把握住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其本質上的共同點—生產資料共有制，因此儘管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有巨大差別，一個按勞分配，一個按需分配，而且社會主義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還殘餘著許多資本主義社會的痕跡，但社會主義從本質上來說已經是進了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或第一階段），而且社會主義是靠自身的不斷革命來長入共產主義的，反過來，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或第一階段）其實從本質上來說與高級共產主義是相同的，但它却又與高級共產主義有巨大差別，因爲資產階級法權除了在所有制範圍之內，（即使所有制方面內還有這種痕跡），幾乎在一切方面都還存在着，在這方面來說還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列寧《國家與革命》單行本84頁），因此，這還不是共產主義，還只能叫做社會主義。

以上，是否是我們强加給馬克思列寧的呢？是否我們也在斷章摘句，玩弄文字遊戲呢？而且，人們會說：「馬克思指的是過渡到無產階級社會呀?! 」。

爲此，我們有必要澄清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學說的科學觀點。

其實，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社會也同樣指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完成之後的社會主義時期。因爲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看來，階級的劃分是以人們對生產資料的關係爲依據的，並且是以劃分的當時人們對生產資料的關係爲依據的，雖然在所有制的改造完成以後的一段歷史時間內，失去生產資料的剝削階級還妄想奪回他們失去的天堂，但社會主義社會是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他們被奪了私有權後，作爲階級也就不存在了。並且，他們將不得不在後來的生活中成爲自食其力的新人。至於用犯罪份子的行爲和政治態度來說明資產階級的存在，是不值一駁的，因爲這種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同樣存在，同樣是來自一個社會的各個階層，更不能證明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時期還存在這個命題。（至於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實現之後，是否還會產生新的階級，是否會因爲相互關係和分配關係的原因使公有制成爲官僚主義者階級所有制—例如蘇聯那樣—的極好外殼，這在

馬克思和列寧生活的時代還未提到實際生活中來，我們當然也不能要求馬克思和列寧超越歷史條件的這個問題做出解答），正因此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看來，公有制的建立就是階級的消滅，而且這個理論被斯大林正確地結合實際來完成了，□□□蘇聯新憲法產生的時候斯大林宣佈剝削階級被消滅，□□□□從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進行階級劃分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得出的正確結論，順便說一句，斯大林晚年提出「矛盾論」處理得不好，也可能轉化成對抗性的這一看法也是正確的，因爲他通過新憲法之後，幾十年時間的觀察，從蘇聯社會狀況的發展和變化中看發生新的階級分化的可能性。

還是讓我們引□□□馬克思在前述論斷的同一文中—《哥達綱領批判》中論述前述「共產主義」即是「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就是階級的消滅這兩個重要命題吧。

「我們這裏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着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各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

「所以，在這裏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是資產階級的法權，……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爲每個人都像其他人一樣只是勞動者……。個

「但是這些弊病，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在它經過長久的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裏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哥達綱領批判》單行本第14頁）。

這難道還不足以證明馬克思所說的「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共產主義就是□□「平等的權利仍然是資產階級法權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社會主義時期」嗎？這難道還不足以證明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間的政治過渡時期——無產

階級專政只能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麼？

不信，請再看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文中更清楚的論述吧（單行本第84頁）：「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爲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法權』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份地取消，只是在已經實現的經濟變革的範圍內，也就是在對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爲公有財產。在這範圍內，也只有在這個範圍內，『資產階級法權』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些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會各個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按等量勞動領取等量產品』這個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但是，這還不是共產主義，還沒有消除對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實上是不等量的）勞動給予等量產品的『資產階級法權』。……

「國家正在消亡，因爲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麼階級可以鎮壓了。」

「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爲還要保衞容許在事實上存在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就必須有完全的共產主義。」

還要怎樣才能證明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就是指□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的時期□還要怎樣才算馬克思和列寧認爲「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治□的過渡時期」只是指從用暴力革命推翻資產主義制度並確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爲基礎的社會形態，並在此之上形成社會主義法制體系這之間的歷史時期呢？還要怎樣才能證明馬克思和列寧認爲公有制的建立就是階級的消滅？

至於公有制建立以後是否還會發出新的階級分化蘇聯之類的國家在保留公有制的形式不怎樣將它變爲官僚主義者階級所有制，及□國是否已產生官僚主義者階級等問題是非常複雜的理論問題，不在本題的研究範圍之內故暫不提以後再專題探討。

從上述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始終認爲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使命就是無產階級在通過暴力革命奪取了政權之後，

用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專政方法來維持和鞏固自己的統治運用這種專政的統治方法完成將資產階級所有制和形形式式的小生產經濟改造□□□□□□□□——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偉大歷史任務，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除此以外別無其他。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這一理論是科學的正確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同時，我們通過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對這一理論進行研究認爲這種專政還必須維持到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形成的、並能保護和發展以這種所有制爲基石的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建立起來的時候，只有到這種時候——不是到這種時候，無產階級專政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讓位於受社會主義法制約束的人民民主政權，由這種時候（下文字跡不清，從略）……的社會管理機構的任務，從而使人類社會進入高級共產主義階段。

正因此，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就是階級的消滅指責爲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熄滅論」的說法本身是違反馬克思主義違反客觀規律的。

認爲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貫串於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也是違反馬克思主義、違反客觀規律的，把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治的過渡時期」與社會主義這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等同看待便是違反馬克思主義、違反客觀規律的。

原載武漢《鐘聲》創刊號

秦永敏

也談增加工資與工資制度改革

——與張京生同志商榷

長沙民刊《共和報》張京生同志，在《40%的職工增加工資和工資制度改革》一文中，提出了改革工資制度的一些看法，並提出了給職工增加工資的建議。

對於張的文章，我有很多不同看法。主要是對於他提出的給職工增加工資的方法，我完全不能同意，因爲他提出的方法與現行的方法從根本上說毫無二致。

他提出增加工資的方案是「不論每次增加工資的總額是多少，國家根據全國職工每人每次平均增加多少工資，來規定每個企業增加工資的總額。」然後，每一個企業根據「每個職工的勞動和技術水平決定多少人增加工資和增加多少工資」，「對於勞動和技術水平在六十分、七十分、八十分、九十分以上者，如果增加工資的總額少，那麼分別相應地增加工資0.5元，1元，2元，3元；如果增加工資的總額多，那麼分別相應地增加工資1元，2元，3元，4元，其它類推。」

可惜，我們沒有看到張京生同志關於工資制度改革本身的看法，也不知道他所說的類推是否要一直類推到改革後的工資制度上去，但就他提出的這種辦法本身，也是夠糟糕的了。

張認爲，採用上述方法將可達到「實行嚴格的按勞分配」和調動絕大多數人的積極性目的。

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這種方法與現行工資制度和晉級方法完全一樣，如果認爲國家現行的工資制度不能實現「嚴格意義上的按勞分配」，不可能調動絕大多數人的積極性，那麼這種方法收到的效果也必然如此。

本文不打算一一指出張文與現行工資制度和晉級方法的謬誤

之處，而着重於從自己的觀點□□工資制度的改革方向和代替晉級的方法。

僅從字面上講，按勞分配就是按等量勞動給予等量產品的政策。馬克思提出這種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時，是以社會主義不存在商品生產，而直接是產品生產爲前題的，所以，在馬克思看來，可以直接按勞動時間付以報酬或按每個勞動者爲社會提供的產品量計算報酬。

現在，我們國家和一切現存社會主義國家爲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只能採取商品生產形式進行生產，因此，分配形式上也不能直接以社會的名義分配產品，而是用貨幣以工資形式支付給勞動者作爲報酬，讓人們自己去購買生活資料。

顯然，雖然兩種生產方式有不同，卻同樣可以實行本質上一致的分配方法。這個方法就是按勞分配。什麼是按勞分配呢？如何實行嚴格的按勞分配呢？唯一的辦法只能是：按每個勞動者提供的生產品數量進行計算，給予他相應的報酬，這個報酬就是扣除他爲社會基金而進行勞動之外的全部生產品的價值。每個勞動者的能力是不一樣的，並且，在不同部門工作的同等勞動力創造的價值也不一樣。因此，爲了精確計算每一個勞動者應得的報酬，唯一的辦法是根據該勞動者的勞動創造的價值來進行分配，捨此法外，別無他法。這是極簡單的，也是唯一的科學的按勞分配方法，這種方法不僅能精確地、正確地計算每一種部門的任何勞動者的應取之酬，而且能促使每一個勞動者爲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努力地忘我勞動，都會自願地鑽研業務學習技術，自覺地採用最經濟合稱的方法，力圖以最少量的勞動和最短的勞動時間來創造最大量的產品，以使自己獲得較多的物質生活資料，同時，國家由於在他超額的勞動成果中收取累進的扣除，用於擴大生產和建立社會福利基金，因此，勞動者所取得的成果越大，他本人直接獲得的生活資料就越多，社會獲得的物質財富也就越多，於是，公私兩便，大爲有利。公從私來，私賴公存，整個社會隨着每個具體勞動者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在目前國家統一的八級工資制下，國家在勞動者創造財富之前，根本不考慮勞動者創造價值的情況，更不考慮每個勞動者的

勞動效果，更不考慮各行各業、各個勞動者創造價值的情況，實行了長期固定的勞動報酬，因此，即使在有獎金有定額這種形式的情況下，也不可使勞動者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因為就是對於勞動報酬來說，他們也沒有任何主動權。特別可惡的是，四人幫在本質上共同點的人認為通過提高思想覺悟的辦法來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這些人根本不懂得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人們物質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每個階級的社會意識由它的社會地位決定，因此，勞動者處在按級取酬的地位要求，就必然要反過來按酬付勞，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事實上，能按酬付勞還是他們的理想狀況，我們不是看到大批的七八級工做的活不比一二級工多，技術不比四五級工人高呀的現象麼？在這種情況下，怎樣不能實現按勞分配呢？怎麼能調動職業的生產積極性呢？又怎麼可能使生產力快速發展呢？

必須實行按每個勞動者提供的生產價值來計算他的報酬的方法來正確地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這不在於什麼喜不喜歡、願不願意，只在於它能使生產力最迅速發展，使人們的生活水平最迅速的提高。當然，在用這種方法時，會遇到很多困難和問題：例如，在集體性的複雜勞動中每個人的產值是無法完全精確的確定的，但必須注意，這種方法只是一個原則，它並不拒絕在集體勞動中以技術標準、勞動程度、責任狀況、工作現狀來衡量，在這種場合下，問題就在於用這一集體創造的產值來決定它的總分配數額，然後，再進一步按具體情況擬定分配方案。又如同等勞力在不同部門工作創造的價值必然不一樣，勞動者身體狀況、勞動強度高低、運用的生產工具的先進與落後也不一樣，必然使他們獲得的報酬產生很大差距，會使勞動者貧富不均，然而，在這種條件下，每一個人，每一個企業都必然下最大的努力去進行競爭，另外，其它經濟規律的連作用必然會調劑各部門之間價值的差距，因此，事實上，差距並不會像人們想像的那麼大，加上社會主義公有制保證了任何人都不能無端佔有別人的勞動，因而一定的差距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是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前進的動力，況且，正如七九年12期《紅旗雜誌》上林子力同志說的"政治經濟學從來只知道合理、必要、無可避免，而不知道什

麼慈悲、溫情、正義、理想，以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生產關係爲對象的政治經濟學也毫不例外。」

至於國家採用適當方式保證勞動者最低生活水平，當然是社會主義制度理想的責任，但是如果犧牲按勞分配來保證生活水平的平均，就在實質上背離了社會主義原則，必然墮入小資產階級的貧勞社會主義——窮過渡的泥坑中去。因此，對於不敢保證最低生活水平的勞動者，不應當是靠拉平分配來搭救他們，而應由社會福利部門用發展救濟金的辦法來保證他們的基本生活。

至於調整工資本身的問題，我認爲國家的調資方案不過是國家作爲□□於社會之上的導□力量，恩賜給人民更多一點物質生活資料等；然而物質生活資料是「人民創造的」，人民不僅應該消費它，而且應該有支配生活資料的權力。這是題外話不多說了。由國家決定給多少職工增加多少工資的方法，由於沒法將分配與生產聯系起來，加上這種增加工資的方法本身將打擊不能增長工資的職工的積極性，因此，事實上它不能起多少好作用，此外，從一般現像來看，它將增加國家的支出；張京生同志提出的方法與國家的現行方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故若付諸實行，結果也同樣如此。

在我看來，國家給40％職工增加工資的作法大可不必，只消訂出這樣一個標準，全國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和工資增長問題就會自然而然地解決，並且，它能使國家的財富與勞動者的工資同時迅猛增漲。其方法是：全國職工按以往他們單位、他們行業歷史上最高的人平年產值爲領取基本工資（原有工資）的標準綫，少於此最高產值的拿基本工資或稱打折扣，如果一個勞動者在一年內創造的價值超過此標準就按一定比例分紅，如創造的□產值指標超過原標準30％，拿雙工資，其餘按此類推，那麼每一個勞動者將爲了自己的直接物質利益必然要用最大的努力最好的方法來進行生產，這樣，就可以在不降低任何勞動者工資的情況下使所有的勞動者積極工作；因爲，多勞多得以此爲起點變成現實了，人們這才願意「多勞」。必須聲明，上述辦法指的是方向，具體數據是無關緊要的，規定標準綫也不是所有的單位都必須是歷史最高年產值，而應視各單位的具體情況而定。此外，還順便解釋

幾個問題，一、這種方法是否能使生產力迅速發展？我認爲，這是不容置疑的，因爲，我國現在幾乎一切勞動部門的勞動工資都低於實際創造的產值幾倍、幾十倍，比如，以前一個工人每天產值爲50元，工資爲2元，那麼，當現在他創造了25元產值時，他自己雖獲得了4元工資，卻爲國家多創造了（35－4）——（5(－2）=23元的純利潤，採用這種方法可以保證在勞動者增加一元收入的基礎上國家可以增加幾十元幾百元的收入。使國家獲得超額利潤，勞動者也迅速提高收入水平，這是何樂不爲？這恐怕正是劉少奇當年說的所謂「資本家剝削越多越光榮」的理論根據，所不同的則是，資本家換成了以社會名義佔有生產資料的國家，因爲無論如何它使社會總財富和勞動者的收入同時大大增加了。另一個問題是，實行這種政策之後是否可能使所有勞動者都達到甚至超過以前創造的最高產值呢？在我看來，這對於絕大部份生產部門及絕大部份勞動者來說是十分輕易的事務。雖然不能在此列舉具體的數據來□□論證此點，但一方面我自己是工人，從樂觀中深知此點。二方面根據我聽過的所有工廠、聽說的所有情況來看，也普遍有這種現實可能性，其原因①幾乎任何企業都常常長期停工；②即使在開工之時期內，工人也統統沒有□□點；③幾乎所有的工人幹起活來都沒有認眞地講求效率、質量和注意節約；④普遍地因按級取酬制度而按酬付勞，沒有積極性、責任心。因此，當前述方法一旦實行，每個職工不得不拼命努力工作時，立即將使勞動生產效猛增，這使人們立即會開展「最佳化」運動，又給生產率向前推進一大步。再加上爲了提高生產率，工人普遍投入技術革新中去，這樣，又可收到效果，可使生產的裝備水平不斷提高，因而大大超過了以往的最高生產水平量是毫無疑問的。

顯然，只有生產部門、運輸部門、商業部門這些與產值打交道的方面才有採取這種方法的可能性，但在其它社會公職上的人員却不能用此方法了，不過，毫無疑問，同樣□□□□不以爲他們能制定比目前國家推行的好得多的辦法來制定工資標準，此外，以生產部門勞動者的自發浮動工資爲借鑒標準，制定社會公職人員的工資水平並經常按企業工資增長速度調整工資當然是絕對

必要的，至於具體的方法，當然有待研究。

正如我在《廢除壟斷價格》一文中所說的那樣，在政經一體化的中國，必然牽一髮而動全身，只有在政府的改革整個經濟體制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攪好快完成工資改革任務。

綜上所述，國家統一的八級工資制不僅不能體現，而且政府違背按勞分配原則，張京生同志的文章提出的改革增加工資方法與國家現行工資制度並無二致，因此也是不足取的。只有實行按勞動者創造的財富本身來衡計量報酬的政策，才是工資改革的唯一出路。

80. 5. 6. 夜11：40

原載武漢《鐘聲》第四期

朱建斌

中間形態及其發展趨勢

社會形態的變遷是由社會本身的力量——生產力的力量這發展所來決定的。按照經典作家們的論述，人類社會形態是沿着一條直綫去進步的，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包括低級階段，社會主義社會）。

然而，出乎經典作家劃分的五種形態之外，當今世界卻存在着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蘇聯、中國、越南、朝鮮、古巴、阿爾巴尼亞及東歐等國。

在這些國家中既存在着一些社會主義因素，又存在着很多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成份。所以，我將這種特殊形態定爲「中間形態」。即介入社會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三者中間的社會。

就「中間形態」國家的目前狀況來看，各國發展的不平衡現象要愈來愈明顯。其中東歐國家已經開始變異——向新形態過渡，「中間形態」的基本特徵正在東歐國家逐漸消失。只有中國由於種種原因，還完整地保留着「中間形態」的原貌。因此，本文將以中國爲例進行分析考察。

一、「中間形態」

首先，中國現在社會的性質是否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樣屬於「中間形態」？這一問題關係到本篇立論的基本前提能否成立。

爲了弄清這一問題，我們不妨運用一下反証方法，即把中國現有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封建主義社會作一個大致的比較。

根據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論述來看，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或低級階段，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私有制，因爲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是由社會全體成員共同佔有的。由於沒有私有制，因而也沒有依據私有制爲基礎的商品生產。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是產品生產，即不是爲交易買賣而進行的生產而是爲滿足社會全體成員需求的生產；由於不存在私有制，因而也就不存在基於所有制上的階級（當然由於生產力尚不發達，還保留着分工意義上的階級）。沒有階級，自然就不存在國家，因爲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

可見，存在着國家和商品生產就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國既然存在着國家和商品生產，那麼，中國就不是社會主義社會。

由於它（中國）存在着國家和商品生產，便使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徵有吻合之處；

生產資料不屬於社會全體成員，僅僅爲少數人佔有支配權利。

由於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脫離，使勞動力淪爲了一種特……（缺文若干字）；

商品生產在社會生產中佔有統治地位，但是它又和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有很多不同之處，譬如——

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可以直接歸結到某個人的□體佔有，而中國卻無法歸結到個人；

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可以自由出賣，但中國卻不能；

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就整體而言）是一種無計劃的自由競爭的生產，而中國社會的商品生產卻是一種有計劃的國家控制生產；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價值規律是直接通過市場交換實現的，而中國生產中的價值規律卻是在計劃控制分配下間接實現的。

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築——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是一種多元化的分權自治體制和多元化的自由競爭形式。但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國家機器與意識型態卻是一種一元化的集權專制體制和一元化的强制宣傳形式。

中央集權專制體制是中國社會國家機器的一個基本特徵，這

一點也是封建社會國家機器的一個基本特徵。一定的上層建築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的。既然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和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存在相同的特徵，那末，可以推出，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中必然存在着和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相同的成份。

經濟基礎是生產關係的總和。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主要表現爲大封建土地所有制即皇室官僚地主階級佔有土地，以服役性的條件交給農民進行生產並對農民實行超經濟的强制（人身依附），無須費力，我們也可以在中國社會經濟基礎中找到和上述形式相同的成份。這就是國家佔有全部社會生產資料（包括土地），壟斷社會勞動量的勞動力進行□□和對勞動者實行超經濟的强制。

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由社會的生產方式決定的。封建社會生產方式有兩個基本特徵：

自然經濟的農業生產佔統治地位，市場經濟不發達，整個社會生產保持在簡單的商品生產水平；

整個生產力局限在笨重的體力勞動（包括畜力）和簡單的手工業生產工具水準。

封建社會生產方式的這兩個基本特徵，我們也可以在中國目前的生產方式中部份地找到：

在中國目前的農業生產中，自然經濟依然佔統治地位。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稅（勞役地租、實物地租、貨幣地租三種形式）外，整個生產商品基本上用來滿足自己的需要。農業集體生產不過是一種簡單協作的放大個體經濟；

在中國的農業生產和一部分工業生產中，生產力依然停留在笨重的體力勞動和簡單生產工具水準。

但是，中國社會的生產力畢竟和封建社會生產方式有着巨大的差異：

它擁有第一次工業革命水平的大工業機器生產。農業生產在社會生產中並不佔統治地位，僅僅是一部份；

在農業生產中已經具有一些機械成份和化學成份。生產工具已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農業中的相當一部分已經從自然經濟中脫離出來向商品經濟

潛移默化（這一趨勢的標誌就是國營農業企業在農業經濟中比例的日益增大）。

通過以上的反證和比較，我們完全可以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社會和性質既不屬於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屬於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社會；但又兼有三種成份，是處於三者之間的「中間形態」。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判斷一種社會形態的性質和劃分一種社會形態的標準，只能依據社會本身的生產方式、即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方式。因爲「社會發展史首先是生產的發展史」，「社會的生產方式怎樣，社會本身基本上也就怎樣。」既然如此，中國社會的「中間形態」性質也必然是一種「中間生產方式」決定的。以下，便是我對中國社會的生產方式作一基本考察。

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兩個子系統組成的一個完整系統。爲了把問題簡化，我們可以把考察展開到兩個子系統的具體分析：

生產力。生產力是以生產工具爲主的被用於生產的勞動資料和從事物質生產的勞動者兩大要素的結合。

從第一要素生產工具來看，中國社會的生產工具（迄今爲止）是一個水平參差不齊的多成份的混合體。它既擁有大機器工具，又留有中世紀的簡單手工工具以及畜口工具。從另一要素——勞動者來看，它有一定科技文化水準生產技能的人只佔極少數，大部分人只具備原始體力勞動的簡單勞動技能。因此，這兩個要素中不同水平的成份使得它們之間的結合呈現爲三種不同水平的形式：大機器手工業；手工業制造業；簡單協作（主要是農業）。

很明顯，中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比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要高，但比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水平又要低一些。和兩者比較，屬於「中間」水平。

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是生產中形成的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它包括三個方面：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係。或如馬克思說的，是互相交換其活動；完全以它們爲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其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最根本的。決定的方面，則是生產關係的本質

和基礎。

中國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是國家所有制和集團體所有制，但實際上掌握、支配生產資料的卻是各級政權的領導（包括企業領導）。名義上兩種不同的所有制實際上都是受政權「一元化」的支配控制。因此，中國社會的生產資料是被政權佔有。誰掌握了政權，誰就有了生產資料。由於政權是不能由個人掌握的，必須是一個階級或一個集團。所以，無論任何人在政權中處於何等位置，都不能直接單個佔有生產資料。這種所有制的實質是一個集團或階級憑借政權的力量以社會的名義聯合壟斷佔有生產資料，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相比，它不過是放大了倍數而已。

由此產生了資本所有者（幹部集團）和□官僚出賣者（工農及其他勞動者），同時也表現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前者可以任意支配後者的勞動力並佔有後者的剩餘價值。由於前者只有政權的力量，所以對後者能夠進行超經濟的强制（人身依附）。

勞動者創造的全部社會財富被掌握政權的集團以國家積累的名義合法佔有，除了維持再生產的費用和支付勞動者維持生存的消費（以工資形式）外，其餘的全部用來維持自身的生存，即國家機器的一切政治，軍事，外交費用，和掌握這個機器的人——幹部集團的直接的物質生活費用。這種幹部集團中物質生活消費的分配是根據政治權力的級別進行的。因爲權力的級別決定其能夠支配資本的多寡和大小。這種支配也實際上是一種間接佔有。這種分配形式是名義工資和實際工資（即通過各種手段以各種名目將集團共同佔有的社會財富轉化爲個人直接物質消費），因此，幹部實際工資的多少和幹部政治權力成正比。

通過以上的三個方面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的生產關係是一種以放大了的私有制爲基礎的生產關係，是它帶有封建生產關係中的超經濟强制體制，又帶有高於資本主義私有制水平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圖景——國家壟斷生產資料這種成份，和三者比較，是一種立于「中間」水平的生產關係。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總和就是生產方式。正是中間水平的生產力和中間水平的生產關係構成了「中間生產方式」。正是「中間生產方式」決定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中間形態」。

十分顯然，僅憑上述簡略考察和一般地描述，對於我們完整地認識「中間形態」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在下面的「中間形態」的基本特徵作一個詳細分析。

1.「中間形態」是交雜着商品經濟、自然經濟、計划經濟三種成份的社會形態。

2.「中間形態」中商品生產仍佔統治地位，但由於全部社會資本是被掌握政權的一家集團獨佔，沒有資本之間的競爭，因而形成了國家壟斷下的有計劃商品生產。

3.由於整個社會資本被一家獨佔，從而杜絕了勞動力商品的自由出賣，迫使勞動者服從固定分工的强制勞動和勞動力商品只能在最低級限價格（維持勞動者生存的最低消費水準）。

4.「中間形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掌握權力的集團憑借政治權力，另佔有社會生產資料的放大性私有制。這種佔有形式就是政經一體化體制，即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合爲一體、相輔相成的體制。這種體制的相應產物就是超經濟的强制（勞動者對於政權集團的依附）。

5.政經一體化體制是「中間形態」的經濟基礎或生產關係總和。所謂的兩種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從資本到利潤都是受到這種政經一體化體制壟斷控制佔有的。

6.政經一體化體制中掌握資本的集團—幹部階層的經濟利潤分配是按照權力級別進行分配的。因而就產生了一種特殊的資本形態—權力；權力成了資本的承繼形式。這種權力資本可以增值物化、流通。

7.官僚主義和長官意志是政經一體制的必然產物。這一必然產物決定了政經一體化下生產管理的非科學狀態。

8.由於社會資本被一家壟斷，壓抑了生產發展的原動力—自由競爭—使社會生產只有計劃經濟的縱間聯系，沒有市場的橫間聯系，造成社會生產供需脫節、產銷脫節和停滯不前。

9.「中間形態」的社會生產是一種間接的消費生產。因爲生產是由掌握政權的集團指揮的。任何一種生產的目的都是生產指揮的目的。而掌握政權的集團指揮生產的直接目的是爲了維護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統治地位。資本家的生產目的是爲了追求利潤

，「中間形態」政權集團生產的目的是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它之所以不需追求利潤是因爲整個社會總資本已經爲它所有。只要它保持着佔有社會資本這一地位，它就能夠自然地佔有整個社會資本產生的總利潤。因此，「政治工作」是「中間形態」經濟工作的生命綫，國民經濟軍事化（社會中的相當一部分財富被用於浪費性的軍事生產）則是它的必然產物。

10「中間形態」社會生產中工業資本再積累，主要是通過工業對農業的剝削—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完成的。國家政權對生產價格實行壟斷固定，用超經濟的強制保持穩定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將這種剪刀差作爲工業資本的總積累。

11「中間形態」的放大性生產資料私有制一方面使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脫離，另一方面也使生產資料佔有集團中的個人同直接佔有資本脫離。因此，資本的充分利用（擴大生產、經濟發展、資金流通、提高技術、改正工具等）和他們的物質利益沒有直接的連繫。所以，他們便對生產管理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從而造成大量的社會財富浪費。

12由「中間形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了它的分配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生產中的分配—剩餘價值的勞資分配。即像資本家那樣根據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多少從中拿出一部分來分配給勞動者，用於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由於這樣□割斷了在勞動者已經和生產資料脫離的情況下同生產□□□着的最後一絲聯繫，使生產者的物質利益和生產的發展提高毫無關聯。加上這種所有制對勞動力的壟斷造成的勞動力無須競爭的「鐵飯碗」，使勞動者□失了生產的積極性（主要是勞動力之間的競爭）。因此決定了勞動率不能提高，生產始終不能維持在略高於簡單再生產的水平。

13「中間形態」資本集團的原始資本積累是憑借政權强力對一切原有的私有者（包括小和有者）的剝削完成的。因此，掌握這個政權的集團就變成了佔有社會總資本的階級。這個階級的相對價值——個別成員可變，即個別官僚的政治破產。但絕對值—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和統治不變。

14「中間形態」的經濟基礎——政治一體化是在上層建築（

主要是政權）的反作用下形成的。經濟上的壟斷是在政治上壟斷的基礎上產生的。反過來經濟上的壟斷又鞏固了政治上的壟斷。這兩種壟斷的結合就是政經一體化體制。正因爲此，「中間形態」的社會危機總是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交叉，而且相互作用。只要發生政治危機，就必然爆發經濟危機。有時政治危機以經濟危機的形式出現，有時經濟危機以政治危機的形式出現。有時交叉錯織、難分難解。

15「中間形態」中生產部門之間的經濟聯繫是不通過市場交換完成，而是在官僚壟斷的强制計劃分配下間接完成。由於國家政權壟斷固定價格壓抑了部門生產之間的聯繫和相互作用，使得價值規律不能起到調節、推動生產發展的作用，只能分別在計劃經濟的格局內間接實現。在這種壓制下，生產部門的有計劃按比例增長實際上是脫離生產社會需求的官僚長官意志。它嚴重地阻碍着生產的發展，必然產生「一□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

16這種官僚壟斷經濟的基石就是割斷各生產部門的市場聯繫，因此它在各方面盡量把各個生產部門强制在自然經濟的水平上：這種現象在農業中表現尤其突出。爲了達到這一點，它憑借壟斷的力量，嚴格地控制着工農業之間的直接交換以及原料、勞動力。它不僅對勞動者實行超經濟的强制，而且也對各生產部門實行超經濟的控制。一切經濟部門都必須服從中央集權計劃分配。

17由於沒有競爭，使得社會生產各部門的生產技術不能提高，先進技術不能有效地利用於生產，使得整個生產力於停滯不前。

18由以上原因的總和導致了整個社會生產的病態現象——一方面商品生產佔統治地位，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卻處於服從地位。

綜上這些，就是中國社會這個「中間形態」的整體特徵和表現。按照一般歷史理論來看，「中間形態」這一多種絕然不同成份組合在一起的社會，簡直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非歷史現象。然而，它的存在又畢竟是一種事實。黑格爾曾提出一個最爲偉大的問題——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那末，這種奇異的「中間形態」的產生有什麼合理性呢？

二、歷史基礎

「中間形態」的產生是有其合理性的，這種合理性就是其歷史必然性。

縱觀世界「中間形態」的國家，一個共同的歷史基點就是這些國家都是封建社會已經崩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尚未確立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中間形態」的另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所有這些國家「中間形態」的確立都不是經濟發展自然形成的，而是階級鬥爭中取得了勝利的階級根據自己的意志憑借上層建築（主要是國家政權）的反作用力產生的。「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着這一鬥爭的形成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鬥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馬恩選集》第四卷477頁）

上述兩點都可由蘇聯、中國的歷史充份証明。

十月革命前的俄國也是一個生產落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尚未確立的國家。但是在爆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候，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和國際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使得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無產階級有可能取得政權。這裏就出了矛盾：一方面是俄國當時生產力還很落後（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比較），沒有具備進入社會主義的經濟水平；另一方面已經接受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布爾什維克又完全有力量取得政權。面對這個矛盾，出現兩種意見：

一種以第二國際的領袖和孟什維克爲代表。他們以爲俄國還不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經濟前題」（這一觀點的依據是歷史唯物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所以工人階級不應當奪取政權，而應當讓資產階級平安地渡過當時的政治危機，發展一段時期的資本主義後才有可能開始社會主義革命。

但這一觀點遭到了布爾什維克的否決。列寧不僅否決了上述觀點，而且修正了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全世界主要資

本主義國家同時爆發時才可以獲得勝利的理論，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一國或數國首先獲得勝利」，他以爲「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爲前提的。」「我們爲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我們爲什麼不能首先在我國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究竟在哪些書上看到，說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這類變化呢？」（參閱列寧《論我國革命》一文）

結果很清楚，列寧的主張得到了實施。布爾什維克的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但是現實情況却使列寧改變了直接向社會主義過度的觀點。他親自制定了，爲在俄國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他以爲「眞正革命民主國家下面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必然會是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因爲社會主義無非是從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向前邁進的一步。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入口，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從這一級就上升到叫做社會主義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級。」（《列寧選集》第四卷510頁）

很可惜，列寧死早了一些，他沒有完成他的計劃。僅僅提出了一個「新經濟政策」，這不過是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一小步。

歷史像一個倔强的硬漢。即使是最偉大的人傑、最善良的願望它也不肯遷就半分。結果，蘇聯并沒有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却進入了一種非驢非馬的「中間形態」社會。這究竟是蘇聯當時沒有沿着列寧規劃的藍圖——由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度，還是那種規劃的藍圖本身就是現在的這種「中間形態」，這個問題，讀者可以下文分析材料中得出自己的結論。

早在一八七一年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就明確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爲「奴役他們的政治工具不能當成解放他們的

政治工具來使用。」（《馬思選集》二卷434頁）所以，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第一個條件是改造傳統的國家工作機器，把它作爲階級統治的工具消滅掉。」（同上）

可是，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後，却并沒有像馬克思所要求的那樣「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而是簡單地運用了舊的國家機器。他們以爲把資產階級從舊國家機器的主人位置上打下來，而使自己上升到這個位置就可以完成無產階級解放。難怪巴枯寧懷疑到「上升爲統治階層的無產階級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整個無產階級都將成爲統治者嗎？德國人大約有4000萬，難邊4000萬人全都成爲政府成員嗎？」（《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

是的，無產階級并沒有全部成爲統治者，僅僅是一小部份人上升到了這種位置；這并沒有改造舊國家和器的本質——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統治。

之所以如此，是因爲他們忘記了「任何一次眞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巴黎公社的三原則：即「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它」，「對一切公職人員毫無例外地實行全面選舉制并可以隨時撤換」，「把他們的薪金減低到普通工人工資的水平」。儘管列寧早已（1917・8）認識到「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回復』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他却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旗幟下背離了這一些。因此他認爲「無產階級專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的政權」。所以，他對考茨基關於「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在無產階級佔多數的情況下，從純粹民主中必然產生出來的一種狀態」這種觀點感到「荒唐可笑」。如果說布爾什維克「簡單地運用現成的國家機器」的話，恐怕就是在這裏失足的吧？

當然，標準的原因還是俄國當時的經濟水平還不足，難以建立一個眞正的民主國家。經濟水平決定了它的上層建築水平。難怪馬克思不厭其煩的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馬恩選集》第二卷83頁）

是的，封建社會由於不能再容納生產力的發展而崩潰。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存在的物質條件却沒有在舊社會的胞胎裏成熟，資本主義由於各種因素的作用失去了帶規發展的條件，在這種歷史基礎上產生的當然只能是一種畸形的變異形態——「中間形態」。

從以上對蘇聯歷史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間形態」的產生并不是生產力、經濟發展的直接結果，而是上層建築（主要是國家政權）反作用的直接產物。這一點，在中國表現得尤其明顯，因而也就特別具有說服力。

早在就十月革命問題和「第二國際」、「孟什維克」時，列寧就預言到了中國革命情況。他說：「我們的歐洲庸人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衆多、社會情況無比複雜的國家裏，今後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的革命帶有更多的特色。」（《列寧選集》四集692頁）

的確，中國革命要比十月革命帶有更多的特色。因爲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同時又已有資本主義萌芽的社會。這三種因素，似乎是一個三合一的「中間條件」。

由於階級、民族矛盾的交叉激化，一場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農民土地革命）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的領導權，歷史地落到了接受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中國共產黨身上。當這場雙主（民主、民族）革命取得勝利的時候，共產黨也取得了政權。

這時，在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兩種……（缺文若干字）認爲：「今天（49年）中國資本主義是在青年時代，正是發揮它的歷史作用、建立功勞的時候。」「社會主義是將來的事情，現在提得過早。」「因爲現在工業只佔百分之十」，「如果現在就採取社會主義步驟」，就會「阻碍生產力的提高」。因此，劉少奇同志提出了一個綱領，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先機械化、後合作化。

另一種爲代表的是毛澤東同志。他堅決否決了劉的意見，主張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結果是毛澤東同志的主張付諸實行。

中國共產黨憑借着政權的强力開始了原始資本積累。這就是著名的「三大改造」。

這種原始積累的形式在工業裏是國家所有制，在農村，則是集體所有制。由於這一原始積累是直接憑借政權力量完成的，所以，在這種原始積累的同時就自然產生了一種特殊經濟體制——政經一體化體制。

然而歷史的發展并沒有超越它應當經歷的資本主義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相反，中國在完成了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的歡呼聲中，卻悄悄地向另一個方向滑去——「中間形態」。

在這種「中間形態」中原來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都發生了成員轉化。原來的被統治階級，無產階級中的一小部份——共產黨上升爲統治階級，并且在進行原始積累的同時，使自己接受了社會的總資本。爲了鞏固自己資本所有制的地位，它健全了政經一體化體制。而原來的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在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後，也就實際上和原被統治、被剝削階級處於了同等地位。即一無所有，□有的只是勞動力這一唯一可以賣維持生機的商品。

從蘇聯、中國進入「中間形態」的歷史來看，確實有些費解之處。兩國政權的執政者都確實想向共產主義過渡，可是卻偏偏進入了一種非驢非馬的「中間形態」，這種南轅北轍的現象該怎樣解釋呢？這裏重提一下第二國際兩個領袖和托洛茨基的觀點裏對於我們理解上述問題恐怕是不無益處的。

一八九九年，伯恩斯坦在《社會主義的前提與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文中說：社會主義的勝利只有寄托在一般的社會進步，其中寄托於工人階級（本身的知識及道德的成熟相伴隨的社會進步）的財富的增加或社會生產力的增長。

因此，他的結論是：對於目前的資本主義，不應當破壞它，而應當促進它進一步發展。

一九〇九年考茨基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一書說：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高度發達的地方，才有借助國家政權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變爲公有制的經濟可能性。

十月革命勝利後，考茨基一直在注視着蘇聯的發展。一九三〇年在《陷入□□的布爾什維克》……（缺文若干字）有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工業化的西

歐各國，一定在東歐各國的前面。他并且指出，沒有較高的教育水平和高度發展的工業，絕不可能建成能維持下去的農業大生產。因此，蘇聯的農業集體化不過是一場野蠻的試驗。

和兩位第二國際的領袖持有相同觀點的人在布爾什維克內依然存在。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在《和平綱領》的《□》一文中說：

「我們并沒有達到甚至沒有走進建立社會主義的階段……只有在生產力發展和繁榮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才是可能的。」他斷言：

「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眞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後，才會可能的。」

事實上，托洛茨基這一觀點和當時（ 23 年 ）列寧主張立即發展國家資本主義，通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觀點並無本質差異。

無論這三位名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的這些觀點有什麼錯誤，他們至少說對了一半。這就是蘇聯以及隨後在蘇聯影響培植出來的九個國家，都沒有進入社會主義。

以上我們分析了「中間形態」產生的歷史基礎和時代背景。「中間形態」的存在是一種現實，但是任何事物都處在不斷走向發展之中的。那麼，「中間形態」將會向甚麼方向發展呢？

三、發展趨勢

有生就有死。「中間形態」既然能夠產生就必然會滅亡。這一點是恐怕每一個略知辯証法的人都不會反對。

有就有這種「中間形態」究竟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中一條短暫的支流或曲線呢？還是它本身就是歷史發展中和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同時並存的兩條主流或幹線呢？

對此，最好不要急於作出回答。因爲祇有認清「中間形態」本身的內在矛盾，判明這一矛盾是否較之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內部的矛盾激烈，才有可能作出正確回答。

在此，有必要提及一種重要的觀點。

有一種觀點不同意把作者上述定爲「中間形態」的國家劃爲

「中間形態」，而提出這種「中間形態」仍屬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不過是一種病態的資本主義而已。其理由是：「中間形態」的生產方式基本或主要成份仍然屬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性質。這一點可以由商品生產、私有制這兩點得到証明。

顯然，上述觀點是不無道理的。但是「中間形態」的生產方式畢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很多差異。而且，它的內部矛盾不僅較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激烈，而且成份也要複雜很多。它不僅具有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這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矛盾，而且還具有一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曾有的矛盾。具體如下七種：

1.商品生產的市場經濟與政治生產的計劃經濟之間的矛盾。

2.現代化大工業生產同中世紀手工農業生產之間的矛盾。

3.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科學管理同僵化的政經一體化官僚管理之間的矛盾。

4.勞動者要求勞動自由與固定强制化勞動之間的矛盾。

5.勞動者要求提高消費水平和國家壓制消費擴大積累的矛盾。

6.生產的發展要求競爭和國家所有制壓抑競爭的矛盾。

7.價值規律與受到計劃經濟壓抑的矛盾。

很明顯，「中間形態」的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多得多，而且也尖銳得多。這一點，也可用反証方法証明，即「中間形態」的生產力水平，比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水平落後幾十年。因爲它本身就是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的，而是直接從崩潰的封建生產方式中產生出來的。既然生產力的水平決定生產方式的水平，那麼，「中間形態」的生產方式顯然落後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既然生產方式的水平決定社會形態的水平，那麼，「中間形態」就顯然落後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

既然「中間形態」落後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那麼，它就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同時並存的兩條主流或幹綫。它就一定會先於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滅亡。

這一結論的一個最新証據，也是一個最有力的証據就是：「

中國形態」的生產方式已經面臨着新的生產力——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衝擊了。就「中間形態」國家除蘇聯、東歐國家外，幾乎第一次工業革命都未全部完成。現在，以電腦信息爲標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先驅部隊已進入了「中國形態」的所有國家。這一巨大的生產力將會徹底改變「中間形態」的生產方式，既然如此，「中間形態」的崩潰就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一種舊事物的滅亡，同時也就是一種新事物的產生。「中間形態」崩潰後將產生一個甚麼新形態呢？換句話說，「中間形態」將會向甚麼方向發展呢？

這一點，西方政治經濟學中的一種趨同論觀點是值得注意的。趨同論認爲：

目前世界現存的兩大體系（資本主義和所謂社會主義）都不過是一種社會形態的分支發展。隨着生產的國際化和國際市場的形成，兩大體系生產方式之間的差異將會愈來愈小，最後使它們趨於同一。

這一點，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日本）宇野先生也表示贊同。不過，這種同一究竟是在進入人類社會的高級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完成，還是在目前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完成，我們必須對「中間形態」的發展趨勢作一個簡單分析。

從整個「中間形態」體系來看，變異現象在所有這些國家中都普遍存在着，即使是蘇聯這個「中間形態」的標本國家也在不由自主地進行着對自身的否定。愈來愈多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成份正在蘇聯社會中滋長。在整個社會經濟管理中資本主義的經濟管理方法已經被大量採用。這種趨勢遭到了中國領導人（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的堅決反對。他認爲這是復辟資本主義，是修正主義。爲了防止這種趨勢在中國發展，毛澤東同志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他的主觀願望是堅決保持中國的社會性質——「中間形態」，即他所認爲的社會主義。

但是，歷史的發展是不以個人意志爲轉移的。儘管毛澤東同志作了最大的努力，但也沒有阻止住中國這種「中間形態」社會變異的趨勢。他僅僅不過是把這一進程延援了十年而已。

目前，在中國社會中承認這種趨勢的人已經不再是少數人了，幾乎整個政府官員都意識到，中國現在的生產方式已經不能再容納生產力發展了。必須作出重大改革。否則，這個社會就會走向崩潰。因此，他們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經濟制度改革、擴大企業自主權，把國家所有制形式佔有的社會總資本分劃化爲各生產部門、企業具體經管的分資本，鼓勵它們相互之間開展自由競爭。在社會生產中逐漸削弱計劃經濟的統治地位，承認價值規律在商品生產中的調節作用。在分配方面，對勞動者實行獎金（剩餘價值的勞資分配），大量引進外資，大力發展集體所有制企業（把一家壟斷的社會總資本分劃爲多家集體經營的一種措施），同時容許少量個體小私有經濟存在。在政治改革方面開始提倡民主、强調法制，對幹部隊伍進行整頓，把科技人員逐步充實到生產領導崗位。在思想理論上，否決了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路線和政策。總之，他們正在做他們可以做的一切。一方面，他們企圖作出一些改革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他們又力圖予以不破壞現有的生產關係爲前提。然而，生產力之所以不能發展正是因爲舊的生產關係不能容納它發展。於是下層勞動者和上層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尖銳起來。前者要求改變生產關係的基礎——政經一體的國家所有制。因爲，只有這樣生產力才能發展，他們的物質利益才能實現。「政治是經濟集中的表現」，爲了使自己的經濟地位得到提升，勞動者愈來愈强烈地要求打破政治壟斷的一元化專政體制，擺脫超經濟的强制，消除官僚，實行民主，建立一個政治經濟多元化的民主共和國。

人民已經認識到，目前的這種「中間形態」是在四十年代末期落後的生產力基礎上產生的。「對它所由發生的時代和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馬恩選集》第四卷213頁）

根據本文在前面對中國社會生產方式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社會形態的水平還低於資本主義社會。它還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資本主義發展，才能夠變遷進入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但是，這絕不是說中國還是退回到封建社會解體時的原始資本主義發

展階段。事實上，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爲在中國這個「中間形態」社會的胞胎中正在孵化發育着一個新的生產關係——國家資本主義。所以，它完全可能而且只能躍過資本主義的低級階段——自由資本主義，直接進入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國家資本主義。

由「中間形態」轉化爲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無疑是一種質變。但是根據「中間形態」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來看，社會變革中憑借暴力的條件已經不存在了。因此，這一質變不可能僅以突變形式的飛躍完成，而只能以漸進形式的進化途徑實現。

從這種資本主義體系來看，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開始了向國家資本主義過渡的進程。因爲隨着資本的競爭必然形成壟斷，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日益消除，由無政府狀態導致的經濟危機已經成爲過去的歷史事實。資本主義的生產日益發展成爲計劃地組織生產，這一點，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有人天才地預見到了，這就是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國主義論」和菲法亭、布哈林一致提出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

因此，「中間形態」和資本主義這兩大體系將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上趨於同一，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入口，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從這一級就上升到叫做社會主義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級。」（《列寧選集》四卷510頁）十分顯然，歷史的發展正在証實並將繼續証實伯恩斯坦的科學名言：

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同時，也將証實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

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全世界同時爆發時才能夠獲得勝利！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

附記：

這篇文章是作者計劃擬寫的一個小册子的提綱，爲了獲得組織者的幫助，故在此先拿出來徵求意見。

本文提出的思想觀點無疑會遭到某些人的非議，因爲在他們看來這篇文章是對中國現在社會的否定。但是，假如他們不反對

馬克思主義的話，我可以簡單的告訴他，馬克思主義者「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証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証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馬恩選集》二卷218頁）

然而，這篇文章的思想觀點是否會給我個人帶來什麼麻煩，我是絲毫不顧忌的。因爲，我的見解不管人們對它怎樣評論，不管這多麼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這是我多年誠實探索的結果。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

這裏必須根絕一切猶豫，

這裏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

署名：方鐵

鍾粵秋

給全國民刊、全國同胞、黨中央、人大常委會的信

給全國民刊、全國同胞、黨中央、人大常委會：

前些日子，廣州地區《人民之路》、《生活》、《浪花》發表了《致全國民刊書》、《二、一六信》，我《庶聲》的同志再三閱讀，仔細琢磨，認爲《致書》、《二、一六信》是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堅持黨的「雙百方針」，是維護和實施五屆人大通過的憲法。就是說，《致書》和《二、一六信》是切合目前形勢的客觀實際反映，是可行的。

我《庶聲》引《致書》、《二、一六信》的例子爲警惕，引其中的道理爲方針，努力把《庶聲》辦好，努力加强《庶聲》和各民刊的團結，在共產黨領導下，和衷共濟，爲「四個現代化」的早日實現而反對官僚主義，用生活中的眞、善、美戰勝生活的醜、惡、邪，做出積極的貢獻。

「自去年十月以來，我們開始受殘酷的考驗。應該正視我們的處境：我們的同志，有些被抓了，被拘押了；我們的刊物，有的被迫停刊，有的被强行沒收。……」

「以前是無法可依，我們不可能運用法律這個武器。現在，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制定的法律、法令效力的決議，根據這個決議，五二年頒佈的出版法繼續生效。那麼，我們就應該很好地掌握這個武器。至於出版法中一些不符合現社會實情的條文，我們可以提請人大進行修改；對那些有法不依的頑固份子，則應該與之堅決鬥爭！」

「我們應該明確，黨的中央文件，只具有方針政策上指導的作用，並不應具有法律的權力。全國人大理所當然的立法權力的位置，從來被置于很不體面的地位，失去它本身應發揮的作用，

在現實，這是人民再不能容許的事情。鄧小平同志講話本身不是中共中央文件，我們更應該對其中提出的重大問題進行廣泛的討論，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對違背人民利益的做法，大胆提出自己的批評，這有甚麼可怕呢？我們難道竟會做出，僅僅爲了狹隘地保存自己而要在壓力面前退縮和對錯誤的容忍！我們爲什麼不去想想，這樣下去的話，悲劇的歷史將會重演。」

「我們行動的準繩是堅定維護憲法的權利。這就可以經受住任何誹謗與打擊。所以，我們希望各民刊都以公開的姿態站在維護憲法的立場上，維護人民的利益，爭取民刊的生存。這就是說要光明磊落地，理所當然地要求給以批准註册，堅定地信賴自己合法的地位。」

「任何人都沒有權利葬送我們的革命事業。我們沒有權利用我們的幼稚與錯誤，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再次受到耻辱！」

「修改憲法，删去四大自由，這是關係中國人民命運的大問題。這條憲法的去留，應該以充份聽取人民（各民族、各階層、各民主黨派和愛國志士）的意見作爲決定，而絕不能取決於某個人或某些人的主觀願望或需要，人民決不能允許那種一個人或者少數人說了就決定的現象重現。」

我們民刊參與國內大口的討論，反映社會的現實，本身就是爲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貫徹執行黨的「雙百方針」，就是實施憲法保障人民民主的權利。並非影响四個現代化，而是加快四個現代化的進程。

馬克思主義重要組成部份，就是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正確地運用了對立統一的規律分析社會的現實和歷史。民刊參與國內大口的討論，就是要正確地運用對立統一的規律。

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份，是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是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階級的社會裏，生產關係集中表現爲階級關係。恩格斯說，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係。」在任何社會中，生產關係總是同一定的生產力和上層建築密切相聯系着的。生產力，是指人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上層建築是建立在經濟

基礎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而經濟基礎正是一定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民刊今天所研究和探討的對象，就是這些問題。

馬克思主義還有一個重要的組成部份，科學社會主義。民刊就是爲了在地球上消滅人欺壓人、人剝削人的制度而奮鬥，向世界大同，即共產主義奮勇前進。我們民刊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運用、發展服務。

我們尊敬的鄧小平同志，曾英明地肯定：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民刊很願意作抓官僚主義者這個老鼠的「白貓」或「黑貓」。

我們的王希哲同志也說的好：既然黨報必須接受黨的宣傳紀律的約束，那麼，沒有民間的刊物，人民又怎麼能實現它批評黨和政府現行政策的權利？難道這種批評只能靜悄悄地通過某種「渠道」來進行？難道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徵？《人民日報》曾在某處表示，當黨的政策與人民的要求發生矛盾的時候，它服從人民。但是，即使他眞正的具備了這樣的勇敢，它也必須要有民間的刊物所表現的民意來作証明。

憲法保障公民有言論、通信、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這是人民羣衆一項基本的也是起碼的民主權利。民刊正是行使其中民主權力的實踐。

民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絕對不會破壞安定團結。

本着以上精神，讓我們在廣大人民羣衆的支持下，努力把民刊辦好！

《庶聲》

本報聯系人　廣東　韶關冶煉廠　ＳＩＣ車間　鍾衆

公元一九八〇年三月

陶森

我的態度和打算

首先感謝全體中文系全體選民對我的信任和支持！衷心感謝兄弟系選民對我的聲援和鼓勵！我一定身體力行，積極地、主動地去了解這次民主選舉的程序和方案，詳盡地向選民介紹選舉的實況，親自體驗這次民主選舉，到底是眞民主？還是假民主？是人民民主？還是壟斷民主？從而爲今後的民主選舉開拓良好的開端，或者吸取教訓，或者成爲殉葬品！我一定大胆地、堅決地爲選民說話，充分表達全院師生員工的心願。

下面略談我一旦當選後打算做的工作：

一、致力於我院教師隊伍的調整，行使人民代表的權力，準備以中文系爲試點，在系總支、在各教研室老師的幫助支持下進行人員安排情況的調查，將搞教學的、搞科研的、不稱職的、吃政治飯的等各方面的情況上報並公佈、協助、督促院領導進行調整、充實、加强教育第一綫工作，提高教學質量。

二、參與、監督各屆畢業生的分配工作，利用人民代表的權限公佈省計委、省教育局的分配方案，成立以任課老師爲主體的分配小組，因材錄用、合理分配。決不能像過去那樣以學生幹事說了算，以某領導說了算；杜絕一切營私舞弊，一旦發現，則行使人民代表的正當權力，堅決地、毫不留情地一方面向上級滙報，一方面向學生公佈，鬥爭到向中央政府申訴並得以改正爲止。

三、明確學生幹事的職責。學生幹事是指導學生學習的，而不是來當官吏的，更不是來封官許願的、來扶植親信、來破壞教學的。學生幹事必須有一定的教學經驗和文化知識，必須是學術上的內行，能指導學生學習，關心學生生活。學生幹事只有指導、組織學習的義務，而沒有壟斷分配的權力。對不稱職的學生幹

事要建議和敦促各系領導機構進行調整和撤換。

四、對教師住房問題聯系房管科進行全面登記，按人口、按政府有關規定進行公佈，對那些利用權力、關係多佔住房者勸其退址，使住房合理使用。

五、致力於學生生活的管理，聯系膳食科對各食堂進行調查，登記集體開餐和公共食堂的學生人數，以便協助後備部門合理安排，改善學生生活。各食堂可以開始競爭。食堂辦得好的應該提高獎金額。

六、改善學生文化生活，包括學術討論、舞會、音樂會、旅遊聯歡等活動。在憲法範圍內，任何人不得橫加干涉和阻撓。人民代表有權挺身而出維護法律，維護人民的合法權利，依法制止個別人權勢的惡性發作。

七、完善我院圖書資料借閱方式。圖書館必須滿足廣大學生的願望，從早上七點半至晚上十點爲大家服務，工作人員不夠時，組織學生自願服務小組，同時敦促學院開禁所有藏書，滿足學生求知慾。

八、對這次調資工作進行查詢。發現漏洞則行使人民代表權限向上級報告，搞好調資，促進教學。

以上只是我本人的打算和致力的工作。敬請師生員工批評幫助。

再次感謝選民們的積極支持！

人民萬歲！

人民民主萬歲！

中文系七七級首輪候選代表

陶　森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一九八〇年九月由湖南師範學院
「中文系77・78級部份選民」油印發表

陶森

民主選舉全過程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六日下午蘇副院長作動員報告，台上照本宣科，台下各行其事。

九月十九日下午全院各系各班（選民小組）開始第一輪代表候選人的推薦。在中文系77級1班的選舉中陶森同學受同學提名和要求站起來表示態度，談了對當前形勢的看法：民主選舉是改革幹部制度的第一步，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要擁護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義務地積極地搞好民主選舉。陶森同學、戴啟篁老師，還有梁恒、侯健、楊集中、張新奇、韓少功當選爲第一輪候選代表。

九月二十日中午陶森同學寫出「倡導書」，主要談民主選舉的意義，當前國家的形勢，選民應取的態度和職責。

晚上六時半陶森同學又在電影露天場宣讀了「倡導書」，受到數千名聽衆的熱烈歡迎。（梁恒同學也在電影場發表了演講）

九月二十一日中午陶森同學通過部分選民的調查所提出的要求，他總結後寫出「我的態度和打算」一文。

晚上六時十分至二十分院宣傳部周副部長親自把關，不准陶森等同學使用廣播和陽台宣傳民主選舉，並當衆誣蔑陶森同學的「倡導書」中提出了「打倒老一輩」，受到在場的數百羣衆的冷漠和斥責。這對陶森同學個人來說，周犯下了「誣蔑之罪」；這對民主選舉來說，周犯下了欺騙選民、破壞選舉之罪。特別是周那種以權位自居、以權勢壓人、陰險、粗暴、蠻橫的表演激起了羣衆的公憤，選民紛紛要求陶森同學根據憲法和選舉法向法院起訴。

六時三十分至七時正陶森同學向數千羣衆宣讀「我的態度和

打算」一文，劉忠陽同學還進行了演講，梁恒同學對周副部長的惡劣態度向選民作了介紹和質詢，並要求院選舉領導小組公佈選舉程序和方案，加强對選舉法的學習。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陶森同學、梁恒同學同時走訪院選舉領導小組，辦公室熊副主任說按照選舉法辦，進行三輪選舉。

晚上六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陶森同學向中文、政教、歷史三系代表傳達了院選舉領導小組的選舉程序，並徵求各系代表的意見，最後陶森同學要求代表多帶頭學習選舉法，多思攷，跟上當前的形勢，當政革的促進派。會議主持者是中文78級三班學生湯春生，77級三班學生程安庸。

九月二十三日課後陶森同學走訪蘇副院長，未見，中午，他寫出「選舉問答（一）」，回答「選什麼樣的人作代表」、「公開選舉合法嗎」等問題。

下午中文系77、78級部分選民聯合調查整理出「中文系主要代表候選人調查材料」，主要是介紹陶森同學的簡歷和政治見解。

中午，中文系學生幹事龔正榮（70屆工農兵大學生，經常憶苦思甜，而毫無文化水平，同學們稱爲「憶苦大學生」，從來不上課、不聽課，而善於向上級滙報，善於封官許願，壟斷大學生分配權，被院領導稱爲又紅又專的新長征突擊手，同學老師義憤很大）通知陶森同學下午四點去院黨委辦公室，並說：你這樣攪是資產階級的、是違法的，是破壞選舉。陶森同學回答：你要學習選舉法，要跟上當前形勢，不要再僵化了。

下午四點陶森同學進入中文系辦公室，見到的是蘇副院長、宣傳部陳部長、黨委辦公室文主任（女）、中文系總支李書記、系鄧超奇主任。

蘇：我們今天請你來，是要你談談對民主選舉的看法和打算，幫我們制定民主選舉的具體辦法。

陶：太感謝了，也許有點受寵若驚，我是一個普通學生、一般學生，談不出什麼來，請你們按照選舉法、按照中央政府和上級領導的佈置、聽取廣大選民的意見去辦吧。

鄧：我們這是對你關心，你們攪候選小組、攪自我介紹、攪

競選，都是錯誤的，競選是資產階級口號，你要站穩立場，不要跟着梁恒犯錯誤，他提出不信仰馬列、提胡趙體制、民主社會主義，都是錯誤的。

陶：謝謝你的一貫關心。我沒有攪候選小組，我只是說了自己應該說的話，只是談了形勢、意義、任務和積責。介紹是別的選民調查整理的，根據選舉法第七章三十條：各黨派、團體和選民，都可以用各種形式宣傳代表候選人。請你打開選舉法。（鄧沒有，連忙東尋西找，最後在李書記處找到，還翻不到所在章頁。）

陶：您還沒學過吧！

鄧：（語塞）

陶：提請各位領導注意，我沒有攪競選，我只寫了「倡導書」之類的文告，這是資產階級的嗎？如果是資產階級的口號，那選舉法三十條不是作廢了嗎？資產階級競選是說假話、說大話、用金錢收買選民、無耻地攻擊競選者，而我又是倡導大家跟上黨中央的步伐，義務地、積極地、主動地攪好民主選舉工作，爲今後的幹部制度改革和今後的無數次民主選舉起個良好的開端或者經驗總結，這難道是資產階級的嗎？我這樣做正是站穩了無產階級立場，正是站到了黨的立場、黨的政策的立場。至於梁恒，他不是我一個選民小組，他的觀點與我的毫不相同，這怎麼說我跟着他犯錯誤呢？他的立場與我無關，你們不要張冠李戴，借機打棍子。

陳：這不是打棍子，我們是關心你，你的熱情很好，但梁恒的演講是資產階級的，你也在一起念了倡導書，你就捲在一起了。

陶：電影場是公共的，梁恒也不是敵人，他也是選民，何況師生員工有分辨能力，不是羣氓，謝謝您的躭心和關心，他是不是資產階級我不予回答，你要說捲在一起就不對了，您仔細想想吧。您的水平比我高，工作時間比我生活時間都長，您會慢慢認識的。

蘇：九月二十日晚上的演講行動是錯誤的，對競選方式我何們不贊成，你一定要認識，我們不贊成九月二十號的行動，實質

上是資產階級的競選方式，你一定要明確。

你寫的倡導書是類似四大。對30條的「各種形式宣傳」是什麼含義？什麼形式？什麼叫合法？你懂嗎？

只有院選舉領導小組才能介紹宣傳代表候選人情況，任何選民、個人都是錯誤的，是違反選舉法28條的，在中央沒有通知前，你必須按我們辦。

只有靠我們院領導組織計劃來攪，個人宣傳影响我們的領導步驟和計劃。

陶：九月二十日晚向選民宣讀「倡讀書」是正確的、合法的，我沒有競選，也沒有對手，這是你對民主選舉的認識問題，你不贊成有你的權利，這不能證明九月二十日晚的錯誤，實質是資產階級的競選方式，你下結論過早，這就是又一條棍子，我們大家都要明確形勢、意義和任務。

我寫的倡導書不是四大，也不是類似四大，我用的是彩色紙，寫的是形勢、意義、職責、打算，沒有攻擊、貶低任何人，是義務地幫助宣傳，從形式、內容上都不是四大，如果紙上寫大字就算四大，那你們的通告、海報都成了大字報了。

選舉法三十條的含義、形式是否合法，你來解釋好了。既然有「各種形式」，那就包括口頭和書面，既然載入選舉法，那就合法了。二十八條是選舉委員會的具體工作和程序安排，請你好好學習二十八條和三十條，這裏是兩種問題，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三十條是對宣傳候選人而言，二十八條是對選舉工作、程序而言。選舉法是黨中央和人大常委會根據全國人民意願制定的，不必請示中央了，這就是民主選舉的根本依據，我的態度是依法選舉、違法必究、按黨的政策辦、按選舉法辦。我們這種義務宣傳，對你們只有幫助，沒有妨礙，如果你們有別的目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鄧：你和梁恒是不是競選團體？你的倡導書中寫了「官僚主義體制」和「不要做奴隸」，這是極端錯誤的。如果每個同學都象你那樣寫倡導書、寫態度那怎麼得了呢？這不是西單民主牆的魏京生那一套嗎？

陶：第一個問題上面已經回答，我不再單獨向你解釋了，你

剛才想什麼去了？

至於倡導書你看了嗎？

鄧：我沒有看，是聽別人滙報的。

陶：你太官僚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你學馬列毛著用到哪裏去了？很遺憾，你作爲一個文革前的中文系老大學畢業生連「體制」和「體系」這兩個詞語都區別不清，何況你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啊。

鄧：你寫體系也是錯誤的。

陶：沒有體系嗎？「四人幫」就是一個體系，林彪反黨集團也是一個體系，你結幫營私、對抗黨中央、與人民意願對立、在反右鬥爭中，你踏在無數的枯骨上、寃魂上往上爬，也是一個體系，怎麼沒有呢？

在「四人幫」淫威下，我們都做了奴隸，你沒有做奴隸嗎？那時也許你是做了一個無聲的主人，那麼你就成了「四人幫」的爪牙了，我們正要尋找這種爪牙哩！

如果每個同學都像我這樣，那就太好了，那就說明每個選民都對民主選舉關心、重視，都關心國家的前途，都關心自己的權利和命運，爲黨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幹部制度改革、爲今後的開門整黨開闢道路、總結經驗，取得一點試點性的參攷資料，接受民主選舉的洗禮，當好國家主人。我還要把全過程向中央作個義務滙報，對於那些破壞民主選舉的言行也要向中央有關部門控告。

至於與西單民主牆魏京生一伙，我們在形式上、內容上都有根本的區別，我們是順應歷史改革潮流，爲中央作義務工作，起推動作用，他們是攪極右、不懂馬列而篡改、反對馬列，利用黨在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否定整個黨，利用毛主席個人在社會主義時期所犯的錯誤而否定整個老一輩，這都是錯誤的，反動的。我們與魏京生有本質的區別。如果有人曲解，一種是認識問題！二種是別有用心，你們大概不會是第二種吧。

蘇：我們是關心你，不要上當受騙。

陶：要我對抗黨中央、叛賣民主選舉，你們這種威逼是無效的。

陳：蘇老是老幹部了，受了康生的迫害，你是革命的後代，要認識啊。

陶：我們不能躺在「受迫害」三字上，要化悲憤爲前進的力量，當務之急就是要跟上黨中央的步伐，攪好民主選舉和幹部制度的改革，這樣才是對「四人幫」的控告和批判，才對得起黨和人民對我們的平反昭雪和關懷。在資歷上，你們是前輩，你們就應該把好傳統、好作風、好經驗傳給我們後代，在法律上、在眞理面前，我們又是平等的，可以互相幫助，互相教育、協商、共同提高。

時近七時，我們的談話暫告段落，蘇副院長說另外通知今後的談話時間。

陶　森

致全體同學書

全體同學們：

在法律的旗幟下，我們以合理的行動，盡了我們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我們沒有獲得成功。因此，當我們走出省委大院的時候，許多同學流出了悲憤的眼淚。當公佈絕食行動開始時，我們記住了這個中國歷史上慘痛的時刻：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四日凌晨二點四十分。

我們的行動是不是辦法的辦法。我們不是「官」，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民。其實無論幹部黨員，那一個不是普通公民呢？當了官，入了黨，就可以蔑視民意、輕侮民心嗎？「當官不爲民作主，不如回家買紅薯」，這是七品芝蘇官的座右銘。但是，一個封建官吏能做到這一點，一個共產黨的幹部就不能做到這點嗎？我們過去也許抱有幻想。從蘇明開始，對我們的態度是粗暴專橫無理的，沒想到我們到省委也遭到了如此冷遇。我們在省委的第二次請願，代表足足等了一點五十七分鐘才等到了省委負責同志出來，談來談去沒有一點結果。於是，爲了人民的民主事業，爲了我們自己的人格和尊嚴，爲了我們的信念，我們採取了不是辦法的辦法，來達到我們通過代表提出的卻沒有回答的要求：

1. 對所謂「根據大多數選民意願」而定七名代表候選人問題查對核實。

2. 推遲正式投票時間。

3. 蘇明作出公開檢查並自動辭職。

4. 改組院選舉領導小組，選舉產生新的選舉委員會。我們相信，我們的行動是會得到大家的支持和理解的。

是的，我們的行動的確得到了同學們的大力支持，我們感到

了溫暖，我們的信心更足了，青年的人畢竟是相通的。在我們的絕食行列中就有八位湖大的同學志願和我們站在了一起，我們感謝大家和兄弟院校的同學！

但是，至現在爲止，沒有任何「老爺」來安慰我們，我們也不需要任何「老爺」的同情，我們鬥爭的矛頭就是直接指向那些大大小小不能爲民作主還要壓制人民、欺騙人民、愚弄人民的「老爺」們的。聽說院裏的大選有可能仍按計劃進行，我們的絕食聲明也被撕掉了，我們感到十分憤慨。既然這樣，那就用我們這七十多條人命來換取那個所謂的大選吧！我們將把自己的熱血，澆在人民民主這座宏偉的大厦上，我們也準備用自己的屍體來鋪平通往人民民主的光輝前景的大道！

全院的同學們，我們離開了你們，但我們的事業是共同的，我們的心是相連的，我們大家一起來以自己的行動爭取眞正的人民民主吧！歷史會對我們的行動作出公論的！

全體絕食同學

1980年10月14日上午9時10分

陶　森

長沙學生代表陶森的一封信

毅：您好！

早已收到您的兩次來信，因爲選舉問題，事態發展急劇，我沒有一點時間和精力來回答您了。下面簡介這段的戰鬥生活吧！

十月九日晚，兩千多名學生由自發到自覺地從學校開赴省委請願，高喊“打倒官僚主義！”“人民萬歲！”“人民民主萬歲！”壓制民主有罪！”“共產黨萬歲！”等統一性口號，震動了整個長沙，是晚上12：30分開始的，通宵在長沙示威遊行，我作爲學生請願總代表（人民代表最高票數3000多）帶領19名學生代表與副省長、秘書長、教育局長談判，但談判結束後，學院領導拒不承認錯誤和破壞選舉的行爲，反而歪曲省委表態，誣蔑談判代表，迫查請願學生，又激起學生反抗。十月十三日晚9：30又有兩千多名學生（加上湖大、礦冶部分學生）開赴省委再次請願，省委這次採取推托態度，我作爲總代表帶領20名談判代表與之辯理。晚2：20分特派員通知撤出代表，宣佈絕食，我一面安排學院工作，一面自帶87名學生絕食。14日凌晨2：27分開始，絕食隊伍坐在省委門口的水泥地上，一邊唱歌一面呼喊口號，14日下午正式投票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參加（主要是幹部、黨員），而80%的學生來到省委門前抗議示威和慰問絕食學生。晚上，下午，各兄弟院校、長沙市工人、職工紛紛前來慰問和聲援，15日達到高潮，示威遊行通宵達旦，十五日晚上我正在召開全市各高校代表、工人代表會議佈置16日全市總罷工、總罷課、總遊行，但正在這種關鍵時刻，我們隊伍出現了一批投降份子、右傾份子和分裂分子，加上省、院大批領導、打手、文痞、學賊的破壞，16日早晨六時開始動搖，九時正式撤回絕食隊伍，在大雨中，我

最後一個離開，面對前來聲援和慰問的工人、外校學生和各報記者，流下了痛苦的淚水，一次反官僚、爭民主點燃了的社會主義民主大改革的烈火被澆滅了，知識份子是多麼的軟弱啊！

當我回到學校時已是中午時分了，我餓了三天三夜，又忙於全綫部署，已經不成人形了。但那些分裂份子召開全院大會，造謠說我是學賊、投降派，使廣大選民學生處於迷惑混亂之中，10月17日、18日我重新召開會議。18日下午又選出23名代表赴省靜坐示威，並派出一批學生去街頭宣傳、募捐、發傳單，19日胡耀邦等中央首長來到長沙，但省委欺騙中央，不讓代表會見，24日中午我又召開大會，決定派代表上京滙報。晚上，省委院方又慌了起來，糾纏我們到12：30分，25號上午、下午一直糾纏，下午2：30分毛致用走出鐵門來與我會談，遭到代表們的查問，5：30分代表們在省、院方的重重包圍下衝出來，上了頭車。26日在武漢受到武漢大學、華中師院的熱情款待，27號受到湖北省委的生活照顧，晚上1：20分我們又踏上了赴京的征途。

10月14號王震打了電話給我，被毛致用（省委書記）接了，十五號下午3：45分又打了一個電話給我。二十五號又打了一個電話給我，又被毛致用接了，問題很複雜，我大概要在北京呆半個月，還要與北京各院校聯系奮鬥，再次點燃反官僚，爭民主，促進社會主義民主大改革的烈火。餘言後叙。

祝您

幸福!!

陶　森

寫於一四五次火車上

八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原載《責任》第二期

張京生

百分之四十的職工增加工資和工資制度改革

首先，我們應該肯定，這次給百分之四十的職工增加工資，總的來說人們是高興的，粉碎四人幫後僅三年多，這已經是第二次增加工資，「百分之四十」不算大，可也不算小。人們從此會感看到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對實現四個現代化和今後的美好生活更加充滿信心。

但是，在這次加工資中，矛盾也是比較多的。主要是，能增加工資的人數少和要求增加工資的人數多的矛盾，實質上是按人數的百分比分配，還是按勞分配的矛盾。

增加工資，並不等於按勞分配，但按勞分配必須從增加工資中體現出來。因此，怎樣增加工資才能體現按勞分配，就成了關鍵。

按勞分配，首先必須對絕大數人有利，也就是說絕大多數人通過實行按勞分配就不同程度地增加工資，絕大數人才會擁護實行按勞分配。否則，按勞分配是無法實行或實行不好的。由此可見，大多數人能不同程度地增加工資，是實行好按勞分配的條件。能夠增加工資的人數越多，越有利於實行按勞分配。相反，越不利於實行按勞分配。

大多數人如果不能通過實行按勞分配來增加工資，就不可避免地會盡量通過其他辦法來增加工資。例如，憑工齡輪流增加工資就是其中最主到的一種；有的甚至「走後門」等等。所以，儘管這次上級三令五申地要堅決按勞動和技術增加工資，但就是貫徹不下去。原因就在於能增加工資的人數少於不能增加工資的人數。

先進的、中間的、落後的三部分人，雖然不是一成不變的，

但在一定的時期內又有其相對的穩定性。因此，如果每次都硬性規定百分之幾十的最先進的人才能增加工資，那麼勢必打擊大多數職工的勞動積極性。顯然，這樣對生產是極爲不利的。正因爲如此，下面具體負責增加工資工作的同志，不能不採取折衷的辦法。勞動和技術總分數高和優的，工齡長的和短的，上次加了工資的和沒加工資的……，所有這些方面都不能不照顧，所以，不但增加所有制方面的互相矛盾，而且增加了每一方面的內部矛盾。例如，雖然有些人工齡、勞動、技術相同或相差很少，由於「百分比」的限制，有的人能增加工資，有的人卻不能增加工資，甚至有的人勞動和技術的「總分數」高達六十以上，卻由於「百分比」的限制而不能增加工資。事實證明，按人數的百分比增加工資，不但不是實行按勞分配的好政策，而且會嚴重地破壞按勞分配的客觀經濟規律，破壞人與人之間的團結，打擊很大一部份人的勞動積極性——其中包括先進的和中間的各自一部份人——即使採取最折衷的輪流加工資的辦法，也不過是這次加工資打擊他的積極性，下次打擊你的積極性罷了。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按人數的百分比增加工資呢？除了在理論上缺乏對按勞分配的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之外，關鍵在於目前的工資制不適應我國落後的經濟狀況。大家知道，我國經濟現在還十分落後，今後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從根本上改變落後狀況。因此國家不可能拿出很多的錢用來增加工資，而爲了及時地調動勞動積極性，最好能每年或二年增加一次工資。在這種情況下去死套那個八級工資制，每人每次升級加工資都非要五元、六元、七元……不可，照此一算，百分之幾十的人能加，而百分之幾十的人就不能加了。

要高速度發展經濟，就必須充份地調動絕大多數的人的積極性，而要充份地調動絕大多數人的的勞動積極性，就必須對所有的人都嚴格地實行按勞分配，而要對所有人都實行嚴格的按勞分配就必使絕大多數人通過實行這種分配都能不同程度地增加工資；而要使絕大多數人每次都能不同程度地增加工資，就必須堅決放棄按人數的百分比增加工資，而要改革按人數的百分比增加工資，就必須改革八級工資制，或暫時靈活地實行其它符合我國落

況的工資制。

例如，不論每次增加工資的總額是多少，國家根據全國職工每人每次平均能增加多少工資，來規定每個企業增加工資的總額，而不規定增加工資人數的百分比，也不具體規定每個人增加多少工資，再由各個企業根據本單位每個職工的勞動和技術水平決定多少人增加工資。

比如，對於勞動和技術「總分數」分別在六十分、七十分、八十分、九十分以上者，如果增加工資的總額少，那麼分別相應地增加工資0.5 元，1 元，2 元，3 元；如果增加工資的總額多，那麼分別相應地增加工資 1 元，2 元，3 元，4 元；其它類推。

當然，如果實行這種或類似這種靈活的工資制，會帶來許多其他的問題。例如，工資技術級別勢必混亂，不便於統一管理、審核等等。但是，我國工資制現在關鍵的是太死板、太不利於實行按勞分配。對於一支在軍備上十分落後的軍隊來說，爲了取得戰爭的勝利，最緊要採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對於一個在物質上十分落後的國家來說，要克服困難，高速度地發展經濟，更需要採取靈活的經濟政策。我國現在的工資制已經實行了幾十年沒變過，還是從蘇聯抄來的，這怎麼行？這裏存在着一個辯證法，沒有工資政策的靈活性，就沒有按勞分配的原則性。不顧實際情況，一成不變地死抱着一種工資制，決不是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如果我國的工資制不及時的合理的改革，調動絕大多數人的積極性將成爲一句空話，高速地實現四個現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希望大家對此引起重視和討論，提出更多更好的改革方案和建議，以上僅是粗淺的個人意見，錯誤的地方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八〇年四月於長沙

原載武漢《鐘聲》第四期

張京生

長沙《理想通信》致《生活》《浪花》《人民之路》編輯部的信

《生活》《浪花》《人民之路》編輯部：

你們寄給《民聲》的《致書》我們看了，二月十六日寄給《理想通訊》的信也收到了，下面就談談我們的意見。

民刊一致行動，要求註册，要求政府或官方予以承認，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憲法不是明文載有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嗎？在我們現實社會生活中有沒有呢？沒有！那麼乞求又有什麼用呢？從另一則面說，既然法律規定有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我們遵照法律辦了，何必又多此一舉呢？明明是不可能的了，明明是出爾反爾，我們乞討又有什麼用。

對于「四大」的取消問題，我們認爲，現在在我們這個國家裡一切都是「權力」說了算，爭不爭都于大局無補。但是，我們卻決不能聽任官僚們的橫行，爭還是爭一下，而爭的目的卻主要是爲了使人民懂得自己所處的所謂「主人」地位的欺騙性和憲法的虛弱，不管如何，我們要以實際的行動來捍衛和爭取人民的權利，無論它在表面上有沒有，用我們的刊物來作回答吧。

對于那種違反憲法、壓制和摧殘民刊的人或事，我們不能沉默，要勇于公佈于衆，並且必須一致行動，這就要求我們信件或人員聯系達到。我們也認爲，在目前的情況下，辦全國性的民刊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而在本地區內，根據情況，採用聯合或統一的辦法是可以和必要的。

當前，從表面來看這場民主運動，似乎處于衰落或窒息的地步，實際上它正一步步走向縱深、波及愈來愈廣泛。例如，《民聲》雖然停刊了，但是它在長沙和整個湖南人民心中，特別是青年之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大風吹折了一棵勁松，隨之洒落的無數松籽，必將四處破土而出，也更顯示出幼苗的蓬勃生機和强盛的

生命力。專制的實施可以一時掩人耳目，而決不能壓住人民的心
聲，更代替不了人民的意願。一場茫茫大雪，蓋住了幼苗，看來
有窒死和凍死幼苗的危險，但是，這正給了幼苗生長貯存了「春
水」，帶來了「溫暖」。當前的這場民主運動，不論走着什麼曲
折、艱難的道路，都一定發展、前進和勝利！

同志們、朋友們，今天和明天、中國和世界，我們決不允許
個人或少數人決定人們生存、判定人類命運的歷史再現，不論某
人或某事，他（它）如果阻扼歷史前進的車輪，違背人民的意願
，結果必將定與他的主觀臆斷相反。一個民主、自由的世界必將
在我們今天有志氣的青年手中創建。讓我們互相幫助，攜手共進
，一同迎接那美好、自由的明天吧！

此致

敬禮！

長沙《理想通訊》編委會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附録一：

陳若曦

中國民辦刊物及其他

去年冬天以來，我在加州大學所作的研究是有關一九七八年的民主牆和從那以後開始的民辦刊物。所以我今天就拿這個題目向大家作一個簡要的介紹，作爲引題，請大家一塊兒來討論現階段中國的民主政治。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民主牆最原始的起因是由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北京市委的決議，爲一九七六年被打成「反革命」的天安門事件作了平反。北京的市民非常激動，第二天就上街貼大字報，歡呼這個決議，同時提出更多的要求，希望能公佈整個案件的眞象。並且個人有很多恩怨統統都在大字報上揭露出來，這就引起一系列大字報的高潮，遍佈全國。以後由於要擴大影響力，許多大字報的作者，就走向油印，開始了民辦刊物。大字報和民辦刊物逐漸合二爲一，即年輕人又辦刊物，又寫大字報，寫完了大字報，覺得意猶不足，再編入刊物裏，這樣流傳和閱讀率便大爲提高。

這個運動最重要的口號，就是要民主，要現代化。在運動發展的同時，正好碰上知識青年的遊行示威和來自各地的農民上京請願。譬如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中國人權同盟的傅月華，領導了農民進行一個請願遊行。農民在街上舉了旗子，口號是：反迫害，反飢餓，要民主，要人權。由於人多勢衆，交通爲之阻塞。正好那個時候鄧小平要去美國訪問，中共政府雖然採取了容忍的態度，但也覺得應該採取措施，避免擴大，因此在一月底逮捕了傅月華。

這時民辦刊物已經擴大起來。光是在北京，一九七九年到現在就先後出現了五十多份的刊物。民辦刊物多半是工人或大學生辦的，他們在缺乏經費和印刷工具的艱苦情況下奮鬥，所以絕大多數是油印的，只有少數幾份大學當局支持的校園刊物像復旦的《大學生》是鉛印。油印最多只能四百份，所以他們的發行量並不大。即使這樣，這是三十年以來，中國第一次出現人民自己辦的刊物，鼓吹大衆渴望的民主和法制，就這一點說，它的意義和影響很大。雖然是寒冬時分，但

全國各大都市都紛紛興起了自己的民主牆，出版自己的刊物，言論空前的自由，這種現象使得西方記者把它比爲「北京之春」。

就在民主氣氛空前高漲的時刻，官方的壓力也隨之而來。鄧小平訪問美國回來，即刻發生了十七天長的中越邊界戰爭。戰爭成爲最佳的鎮壓口實。三月十六日，鄧在內部的一次高幹會議上首先發難。他指責大字報和民辦刊物是太過份了，說他們洩露一些國家機密，比如把越戰的消息告訴人家，說這些人如果是反革命的話，該抓的就要抓。

消息傳出，第一個起來辯駁的，就是魏京生。魏京生辦的一份《探索》，是言論比較激烈的雜誌。他曾寫過《論第五個現代化》等一系列文章，認爲中共提倡四個現代化還不夠，還要加一個「民主化」。他認爲沒有民主化，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因此需要五個現代化。其中尤以民主化爲首要。

針對鄧小平的威脅，魏京生就寫了一篇社論，叫做《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矛頭直接就對着鄧小平，他認爲鄧小平曾經公開支持過大字報，曾對西方記者說「大字報是個好事情」，「要千秋萬代的傳下去」，而現在竟來禁止大字報，魏京生認爲他是食言而肥；懷疑他與毛澤東沒有太大區別，是要開始走新的獨裁道路。三天之後，魏京生就被抓起來，《探索》被查禁。

四月份開始，中共中央就全面要遏止民主牆與民辦刊物。先舉行市容清潔衞生運動，開始刷牆，把北京、上海的牆刷乾淨，開始取締大字報。四月裏，中國人權同盟的主席任畹町被捕，以後其他的人也陸陸續續被捕。大字報和民刊大受打擊，大字報並且被遷到一個很小的月壇公園去，限制重重，簡直到了銷聲匿跡的地步。

到了一九七九年十月，中共對魏京生和傅月華進行公審，情況又有改觀。中共判魏京生十五年。這個判決引起國際上的關注，海內外華人也有很大的反應。很多人提出抗議，於是本來已經消沉的大字報又開始活躍起來。北大校園有大字報抗議宿舍太差；人大學生上街遊行示威，要求霸佔校舍的解放軍遷出去。低潮之後，新的民刊又大胆問世。在我收集到的資料裏，一九七九年到八〇年就有一百二十七份不同的刊物出現在全中國各地。

有一個《四五論壇》月刊，是比較溫和的政論雜誌，主編是工人徐文立，還有一個編輯叫劉青。對於魏京生批評鄧小平的社論，《四五論壇》當時就帶頭批評魏京生過火，然而在魏被捕後，這份雜誌卻站出來爲他辯護。多數民刊都認爲魏京生的審判，如控告他出賣軍事機密，是不公平的。

北京有一個文件流傳，說魏京生拿了外國人二十塊人民幣，這就是出賣情報的費用。《探索》在九月復刊以後，首先解釋這件事情。據說是外國記者想買他們的雜誌，大家公開討論後，就決定一年收二十塊，於是就收了一位記者二十塊錢。《探索》同仁認爲中國政府把中國情報估計得太廉價了，區區二十元就可以叫中國人出賣「國家機密」，實在小看了他們！

劉青把魏京生在法庭上的自辯詞油印出來，在民主牆公開發售。爲此，劉青被捕，判了三年，現在陝西勞改中。

劉青之被捕，使得一度有中興氣象之民刊運動又陷入低潮。一九八〇年三月，《四五論壇》爲了交換劉青的自由，自動宣佈停刊。九月，五屆人大正式取消「四大」自由，寫大字報成爲違法的行動。另外，純文學民刊《今天》以「不曾登記」爲由，被勒令停刊。這時，中國只剩下三十幾份民辦刊物。其中有廿七份決定要聯合起來，共同奮鬥。就在《今天》被迫停刊的九月裏，各刊物派代表到廣州開會，成立了「中華全國民刊協會」，共同出了一份機關刊物，叫《責任》，共推上海的鋼鉄工人傅申奇爲主編，本來是準備出雙月刊，以後由於情勢的需要，又改爲半月刊。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以民刊作者房志遠爲首的北大二十個學生，擬了一個「出版法草案」，要求中共參考制定。今年二月裏，約有六百多個學生簽名，海外也有五百多人附簽支持。目前，要求制定出版法是青年民主鬥士的奮鬥目標。

由於民刊逐漸流傳到國外，許多文章經常被香港的雜誌，如《中國人》、《七十年代》、《觀察家》及《中報月刊》等等轉載。這些雜誌又再流傳到中國大陸，影響更加擴大。中共終於決定全面禁止民辦刊物。今年二月，中共發佈了「九號文件」，專門對付民辦刊物，認爲民辦刊物與刊物的組織都是非法的，應該徹底查禁整肅。《解放日報》老早在一月十日就警告說，「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有害於中國的安定團結，因此要嚴加取締。四月十日徐文立和楊靖被逮捕。據香港《明報》消息，四月底王希哲也被捕。

王希哲是有名的《李一哲大字報》最主要的作者，他編的《學友通訊》是一份極有水準的政論刊物。去年秋天，他發表一篇四萬字長文《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文章非常客觀而有系統地介紹毛澤東參加中國革命的全部經歷，同時把文化大革命的來龍去脈分析一遍。對毛澤東的功過評價，一直是民辦刊物爭論的一點，聚訟紛紜，諸如三七開和七三開等。王希哲認爲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沒有任何一點功勞；因此，功只有一分，而過倒有九分。這篇文章在《七十年代》

全文轉載，其他刊物也有轉載，又流傳回大陸，引起很大的迴響。另外，王希哲也曾經間接批評過鄧小平的政策，這些可能是他被捕的主要原因。

下面我簡略談一下民辦刊物在這個階段究竟有些什麼貢獻。

首先，我認爲民辦刊物是近年來鄧小平號召解放思想，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民主運動的主流。運動的主題始終圍繞着民主與法制，當然還有政經改革，即現代化的問題。許多人認爲民辦刊物是淵源於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事件。每到清明節，這些民主鬥士都會舉行民主討論會，寫大字報，發表文章，並出版刊物。他們把四五運動比爲中國的第二次五四運動，因爲兩次運動的號召都相同。第一次五四運動，中國大學生起來要求的是民主和科學，所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而這一次，過了六十年，青年工人和學生起來所要求的也一樣是現代化和民主，因此是第二次五四運動，或是五四運動的繼續。

同樣要求民主和法制，這些民辦刊物是不是主張都一樣呢？也不盡然。民辦刊物大致分做兩派，一個是激進派，一個是溫和派。激進派以《探索》、《解凍》和《中國人權》等爲代表。溫和派就以《北京之春》、《四五論壇》、王希哲等等做代表。兩派對民主的看法有一點小小的不同。激進派認爲民主、人權是與生俱來的一種天賦人權，因此要求完全實現憲法上所規定的一系列人權。但是溫和派就取比較現實的態度。像徐文立，他就認爲民主和民權（他不叫人權，而叫民權）的實現，還有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改革等，都應該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進行。兩派都沒有要推翻共產黨，只不過一個言論比較激進，一個比較溫和而已。而溫和派是這整個運動的主流，佔多數。

兩派之間也常有互相批評，像魏京生在發表攻擊鄧小平的文章《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之後的第二天，徐文立就立刻寫了社論批駁魏京生。假使中共不這麼急着把魏京生逮捕起來的話，魏京生這些激烈的言論，也慢慢會受到運動內部的批評，最後很激烈的觀點也會被淘汰掉。

第二點貢獻是在文學的領域裏。民辦刊物是年輕人主辦，他們比較勇敢地打破了許多文學上的禁區。

我們知道，自從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大陸就有傷痕文學，或叫暴露文學，開始寫文革悲慘的這一段。接着愈寫愈多，連反右的慘劇，和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像幹部特權化，都有很多揭露。但是民辦刊物更進一步。官辦刊物認爲今天所以有這種種悲劇，都是因爲四人幫的關係。而民辦刊認爲不只因爲四人幫，這和毛澤東也有關係，且和共產黨這個制度本身有缺點更有關係。另外，民辦刊物在題材和技

巧上也比較敢於創新。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民辦刊物在中國第一個發表政治幻想小說。中國突出政治，政治是沒有人敢去作幻想的。民辦刊物不但發表政治幻想小說，而且相當大胆，把對象放在鄧小平的頭上。

《北京之春》發表一篇小說《可能發生在公元二〇〇〇年的悲劇》。小說預測說，在一九九八年，中共有一位領導人（影射了鄧小平）突然去世，很多人跟着神秘失踪。第二年，政權發生鬥爭和變化，掌權的開始清算這個死去的領導人，說他是資產階級反動司令部，於是大整肅，搞起運動來。這個時候也有民主牆，有一個叫余悸的，就貼出一張一九七八年民主牆運動裏發表過的大字報，它警告人們不要掉以輕心，四人幫現在雖然倒了，但是餘毒未盡，還有可能回來的。這時候到了二〇〇〇年，果眞四人幫式的政局又出現了。文革悲劇再度上演。當然，這張大字報一貼出來，作者馬上被抓起來，迫害致死。民主牆重新又用推土機推平了，再也沒有民主了。

除了小說題材能夠大胆想像外，他們所用的技巧也有象徵性手法。比如，這個主角叫余悸，就是從成語「心有餘悸」而來。雖說是政治幻想，其實非常寫實。

在文學禁區的突破方面，民辦刊物以愛情做主題的創作，也非常大胆。從一九七八年劉心武發表《愛情的位置》以來，全國歡呼，大家覺得現在又可以寫愛情了。但《愛情的位置》裏，主要討論愛情在生活裏，與革命工作比較，應該擺在什麼位置上，對愛情只是點到爲止，突破不大。可是民辦刊物就不同了。有些寫愛情較深入，尤其是寫愛情詩，民辦刊物可說開風氣之先。有個女詩人舒婷，寫了一首《致橡樹》，寫得很好，諸位有興趣可以找來讀。

純文學民刊《今天》發表了大量的小說和詩歌。這些年輕作者提倡唯美，號召「爲文學而文學」。這其實在中國三十年代，就翻來覆去辯論過很多次，在台灣也有過論戰。一九七九年在中國又引起了一場小辯論。在「文學爲人生」的氣氛下，《今天》公然提倡純文學，追求精神美，發表了很多詩來表達自己的文學觀。這些詩追求唯美，追求個人的感情，抒發譬如像愛情，或一己的感傷。有些詩讀起來有頹廢的傾向，但總的來說，他們完全不顧政治，不管教條。

民主牆上也有很多詩，頗能反映現實。例如有一首題目叫《生活》，全首詩只有一個字，即「網」。這詩引起議論紛紛，有人說這不叫詩，哪有詩只有一個字的？可是很多年青人都抄下來，說是好詩。他們認爲，在某種情勢下，尤其是文革這個階段，生活在中國，眞的就像陷在網裏，外界把你重重包圍在裏頭，很難跳出去。年青人喜歡

這個詩，認爲表達了他們的思想感情，寫出他們心裏的話。

民辦刊物雖然只有短短兩年的歷史，並且受到種種限制，但是我認爲它是推動社會與民主改革的一個先鋒。譬如我剛剛提到在文學的領域裏頭，它提倡唯美，提倡爲文學而文學，它還有很多暴露特權的文章。雖然刊物被查禁，但許多主張卻被官方刊物採納了。比如《詩刊》現在也刊登一些個人情感抒發的詩。最近，中國詩壇正在辯論「朦朧詩」。這就像台灣的一些新詩，寫得叫很多人看不太懂。現在大陸也有很多這樣的詩，也是受民辦刊物的影響。

中國大陸從去年開始，在低層進行民主選舉。而這民主選舉恰好就是大字報和民辦刊物--再鼓吹和提倡的。很多刊物裏提到台灣的選舉。去年選人民大會代表，而選舉中最活躍的份子就是民辦刊物的這些作者和編輯。在長沙、北京和上海，競選最熱烈的往往都是民刊最發達的地區。像北大的王軍濤、上海的傅申奇，都是活動份子，得票甚多。可見這些青年，在推動中國民主方面眞是起了先鋒作用。

另外，我認爲民辦刊物對這一代中國青年人起了一個喚醒和團結的作用。我們知道，二十出頭到三十七、八歲這一代年青人是很讓中國共產黨頭痛的。他們這一代青年在文革剛剛開始的時候，認爲自己是天之驕子，是「理想的一代」，他們的前輩都是佔着毛坑不拉屎，已經不革命了，應該叫他們都讓位，把他們都打倒；他們自己是眞正信仰毛澤東思想，前面的人都是走劉少奇修正主義的道路，認爲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代。可是經過文革，尤其是林彪事件，他們的幻想、理想破滅了，因此就變成「迷惘的一代」，自己不曉得怎麼辦。到了文革後期，他們上山下鄉去了，傷心頹廢，就成了「失落的一代」。然而經過一九七四年《李一哲大字報》，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民主牆運動，這一代人又起來了。他們對自己又重新有一個比較健康的估價，自稱爲「覺醒的一代」。現在他們對自己比較有自信，發現了奮鬥的目標，要爲中國的民主和現代化獻身。我認爲將來中國走民主政治是很有希望的，因爲年輕的這一代很有自信，而且也很有實際鬥爭的經驗。

此外，民辦刊物也代表了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心聲。雖然有些文章比較激進，但大多數要求民主，要求實現憲法上規定的權利，要民主選舉，經濟要改革，要學習台灣的長處……，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我認爲民辦刊物，在很大程度上，比較能正確地代表老百姓心裏想說的話。

年輕人是民刊最主要的讀者。也有很多有名的作家，對他們表示

支持。我在這裏有兩個人要特別提一提，白樺和劉賓雁。劉賓雁曾經公開支持一個十三個大學學生合辦的民刊《這一代》，白樺在一九七九年的四次文代會上也爲年青人和民刊說過話。

最後，我想藉今天這個機會，在這裏代表中華人權協會，向海峽兩岸的政府呼籲。我們中華人權協會希望中國政府能本着憲法，尊重言論自由等基本民權，儘快釋放徐文立和王希哲等；我們也向台灣的蔣經國先生呼籲，對林義雄進行人道之特赦。

原是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在芝加哥大學的演講詞

主辦及記錄整理：芝加哥大學中國同學會
芝加哥大學台灣同鄉會
芝加哥大學梅社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
芝加哥大學遠東研究中心
西北大學中國同學會

陳鼓應

海峽兩岸的民主運動(節錄)

陳鼓應曾任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現任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研究員；是一位研究老、莊哲學思想的學者，也是台灣民主運動的著名領導人之一，……七十年代初，因他主張言論自由及開放學生運動，保守派對他發動了一次大批評，從而引起所謂《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大論戰——這論戰在當時主要是「改革」與「偏安」的論戰，結果主張改革的意見得到了相當廣泛的輿論支持。

一九七一年至七二年，陳鼓應由於在台灣大學校園內推動自由化運動，並因在台大校園召開的「民族主義與中國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而遭逮捕，釋放後便不能再在台大教書，也不能公開發表政治言論；但在一九七八年，陳鼓應仍能參加台灣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在台北設立「民主牆」，與國民黨方人士的「愛國牆」展開大辯論，選舉期間再發表《告中國國民黨宣言》。一九七九年夏天赴美後，一直未能返回台灣；最近他首次來到香港，筆者便特地向他做了一個專訪，以下便是訪問的有關問答內容紀錄。

周：你在台灣的大學教了十幾年書，六十年代以後更以知識份子的身份關心國事，對台灣社會的接觸面很廣，在美國、香港也有很多你的朋友和學生，因此當你在台灣從事民主運動的時候，大家都很留意你的消息；但自從你於一九七九年赴美後，便一直沉默下來，至今已經兩年有多，大家都很想知道你的心路歷程，以及參加台灣民運的經過……

陳：好的，隨便談談吧。

周：你是怎樣到美國的？台灣發生「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之後，你相當緘默，爲了甚麼原因呢？目前你在美國做什麼呢？

陳：一九七九年二月間余登發老先生被逮捕，我們曾奔赴余的老家附近的高雄橋頭鄉，高舉「抗議政治迫害」的橫額，這就是外間所說的台灣第一次打破三十年來「戒嚴法」禁令的示威遊行；之後我也參加了黨外的一連串抗議活動，同年七月，我便到美國去了

。原來計劃是作三個月的短期旅行，爲我自己創辦的《鼓聲》雜誌籌募經費及約稿；可是到了九月，我的一位朋友張化民在台灣突然被捕，他的「罪名」是因爲寫了《中國文化之診斷》，以及因爲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一份建議書，以所謂「言論不當」獲罪。張化民基本上是位反共人士，他向國民黨當局所提的建議書，也是響應國民黨開放言路的號召而寫的，在建議書內他認爲中國應走上和平統一的路，但他並沒有說到談判，但就這樣便被重判入獄十年；早在六十年代，張化民因在台灣《自立晚報》寫了一篇被認爲「有辱元首」的文章而被關了八年多，據軍法的規定，若沒有人擔保是不會釋放出獄的。他是單身在台而沒有親戚的外省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做了他的擔保人，並承擔了擔保人所要負的「連坐」責任——因此，今回突然逮捕張化民，人們多理解是對我的一種警告。七九年十月三日，台灣當局又曾抓了陳映眞，理由到現在還未清楚，他自己也不明白，因爲他自從出獄後，並沒參加任何黨外活動；推想起來，他再次被捕的可能原因，當時正值雙十「國慶日」前一個星期，有關當局深怕海外有「複雜份子」混進來，故先給予一種警告，其時與美國的「協防條約」正要廢除，內部呈某種不穩狀態，而陳映眞是著名的「統一派」，抓他的用意實際上是十分明顯的。

正是由於當時張、陳先後被捕，陳映眞且是我當時創辦的《鼓聲》創刊號的實際編輯之一，以至使我回台灣的事情不能樂觀，同時我亦接受到一些間接的暗示，叫我不要回台灣；然而，我並不願意就此被變相放逐，我當時估計「協防條約」廢除以前還會有逮捕行動，但我還是讓我的妻、女先回台灣，以表示我要回台的決心。可是，過不了幾個星期，「高雄事件」發生了，我在島內的朋友許多都被捕了，島內的民主運動也受到很大的創傷。最近一年來，我曾經四次申請回台，起初是希望回台定居，不被批准，後改爲申請短期回台，也不予置理，這次來港轉赴日本，希望過境台灣幾小時探望我那七十多歲患病的岳母，但仍不給我簽證。可以說，別人是「牙刷主義」往外跑，我却是願意回去「共赴國難」。

（下略）

問：我最後提出一個問題，希望你能發表一下看法，就是對於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與大陸的民主運動之間，你怎麼樣的比較呢？

陳：首先講台灣的民主運動，六十年代在它開始發展的時候其實是選

舉運動，由一些地方性、區域性的選舉開始，其時參加者的一般理論水平都不高；另方面，則是一些知識份子、學者、文化界人士、學生對於言論開放的要求，以及一些不合理法律的批評。直至七十年代以後，才有知識份子直接介入選舉運動，加上台灣的經濟發展，中產階級興起，並强烈的表現出參政希望，日益關注政治上的「分權」問題。在這期間，雖則以《夏潮》雜誌爲代表的人士，已提出了要關注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整個社會與基層民衆的民生問題，但總的來說，台灣民主運動基本上可說是一個中產階級眼光與格局的運動。

至於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我了解得不多，但照我目下的理解，與台灣民主所代表中間階層的性質很不相同，而是從民間的基層、社會下層民衆裏冒起的；並且，大陸民間民主運動的視野和討論的問題，似乎與台灣的民主運動討論的層面不同——台灣民主所集中的討論的，大多是政論問題，但大陸的知識份子所集中討論的，却是在社會主義大方向下試圖檢討整個現行體制的問題，以至整個近代中國國運的問題，顯然海峽兩岸的民主運動有相當大的不同。至於大陸一般的知識份子，他們在近年來地位有所改善，而對着百廢待舉的局面，多想守住本身崗位，然後慢慢來改善情況，所以他們對大陸民間的民主運動並沒有怎麼介入和支持；然而，他們之中對現行體制提出較大膽的批評意見，也不是沒有。由於我對大陸情況所知不多，有關的看法就只能說這麼一點。

周：很好，這個訪問就到此爲止吧，多謝陳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

原載香港《百姓》第十三期（一九八一·十二·一）
訪問及紀錄：周逸

劉大任

知識份子的窄門（節錄）

（上略）經過了十年的沉默、觀察、分析和思考，我相信，許多「老保釣」都各自對國是問題取得了比較成熟的看法。我不能代表任何他人發言，我只能說，我個人的結論是比較趨向於悲觀的，然而也不是一片漆黑，一切要看中國這個苦難的民族有沒有潛力在歷經無量劫數後仍能建立一種清明的良知，並依循這種清明的良知，湧生一定的智慧和勇氣，致力於改進、選擇、創造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只有這種清明的良知在大多數的中國人的心裏取得優勢地位的時候，我們才能看到眞正的光明。我以爲，慘遭十年文革浩刼之後，中國大地上還能湧現以魏京生、傅月華、劉青、王希哲等人爲代表的「探索的一代」，他們的力量縱然微弱，思想縱然不夠成熟，行動固然有顧此失彼之處，我看到的並深深感動的，卻是這種清明良知的呈現。

所以，歸根結底，從一九七〇年保釣事件引發的一連串海外知識份子的政治活動，到大陸上「天安門」事件以後以青年學生和知識工人爲主體的地下和地上的民主運動和文學運動，到台灣始終未斷的此落彼起的關於文藝方向、政治革新、社會正義與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和活動，其實都沒有離開知識份子讀書不忘救國的優良中國傳統。在國族面臨風聲雨聲的危機時代，一個讀書人有沒有義無反顧的精神大胆表示他的意見，甚至訴諸於行動，仍然是衡量一個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人格、風骨的不變標準。就這一點而言，保釣運動的積極參與者，當年正是站在維護全中國老百姓和子孫後代權益的立場，敢於冒大不韙，對國是問題提出針貶，今天還是有不少當年的老保釣，仍然站在同一個立場，仍然敢於冒大不韙，對國是問題提出針貶，雖然針貶的對象因爲客觀事實的演變，主觀思想認識的深化成熟和對事態輕重緩急的權衡而必然有所變化，但在社會批評者的人格承担上完全是首尾一貫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　紐約

原載香港《七十年代》八一年十二月號

魯凡之

中國文化・民主運動・中體再造

「當我回顧歷史，我看見長長的陰影，裏邊有遇羅克、張志新、馬棉珍、史雲峯……。我內心有一絲酸痛的冷嘲，歷史是前進了，英雄們的血沒有白流……。當我瞻望未來，我看見民族背着歷史的重負，受着各種利害關係組成的羅網的纏糾，保守力量在拚死向後拖曳，感到歷史還需要遇羅克、張志新他們。我的心很沉重。我知道，推動歷史前進的燃料就是生命和鮮血，然而，我仍感到沮喪、沮喪……。」

這是北京著名民刊「四五論壇」被迫停刊前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劉青，在被拘禁之後，去年於獄中傳出的一份手記：《沮喪的回顧與前瞻——我向社會法庭控告……》的結束語。

然而，在這短短的說話裏，我們所感受到的，却是民族的悲痛，以及某種歷劫者的感情創傷；其實，這「長長的陰影」又豈只從遇羅克開始？那或許應該從譚天榮、林希翎便開始了。一九五七年，確實是現代中國的一個劃時代里程碑的起點——這「里程碑」的意義，在於中國出現了眞正新興的民間民主力量；這股新民主力量通過當時的「鳴放」運動而嶄露頭角，在肯定中國要向「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的前提下，對「無產階級專政」爲名、「一黨專政」爲實的全權式體制提出了質疑，而提出了「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

構成一九五七年「鳴放」的「社會主義民主派」一翼的，主要是大學生——譚天榮與林希翎正是這一類型的代表；他們並不像「中國民主同盟」那批知識份子（例如儲安平、費孝通、羅隆基等）受過正規的西方民主教育，也沒有後來「李一哲」大字報或王希哲的文章那樣有着完整化的理論系統，他們只是一般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民主」要求。從譚天榮的《教條主義及其產生的歷史必然性》一文，到林希翎在北京大學及人民大學的幾次著名演說，所强調者，都是反對將馬列主義變成教條主義，大力主張「爲了建設眞正的社會主義」、「爲了眞正的人的生活而奮鬥」！然而，作爲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派」的先行者，當「鳴放」運動變成所謂「陽謀」而轉爲「反右」運動（

即由「黨外」向「黨」鳴放變爲「黨」向「黨外」反右）後，譚天榮、林希翎等亦成了「黨」向異議者開刀的犧牲者之一；這曇花一現的「鳴放」，既開啓了中國新民主思潮的新歷史階段，也象徵着中共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歷史終結——這終結的實質，是在確立了「一元化」所有制的經濟基礎之上，亦相適應地建立起進一步「一元化」政治權力的上層建築——中共稱這爲從「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歷史「進步」；但若從眞正「社會主義民主」思潮的脈絡看，則這却顯然是更全面走向「全權主義」（政權、教權、財權「三位一體」，「黨權」又爲其總化身而不受任何制度性牽制）、實質上復辟馬克思所謂「東方專制主義」、甚至將中國傳統文化裏「中央專制國家」的壓迫功能發揚光大的歷史「倒退」！

中共若眞要檢討三十年得失，就必須充份認識到，一九五七年「鳴放」變成「反右」所導向的嚴重歷史倒退性質。

一九五七年，確實是中共執政後對整個中國發展極具關鍵性的一年，假若當時的「大鳴大放」運動得到正確的社會分析作爲策略指導的話，則中共、中國，以至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亦將出現重大的改觀；大體言之，中國「鳴放」運動的國內背景，是所謂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改造」（包括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等）基本完成——用中共自己的話說，便是由「新民主主義」階段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的轉折時刻，初步實現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要求相適應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築（這基本觀念一直支配着「後期毛澤東思想」，以至成爲「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根據之一），因而對「新民主主義」階段所包容的若干西式資本主義民主因素（例如「中國民主同盟」的某種「反對黨」功能、「政協」的某種監督黨權、政權的「議會式」功能……以至傾向「多黨制」的所謂「輪流坐莊」思想流佈等），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後便要加以取締——是爲中共將「鳴放」變成「反右」整肅運動的實質所在。

至於「鳴放」運動的國際背景，則可說是對於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的中國回應——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所帶來的某種解凍，以及在此「解凍」背景中爆發的「匈牙利事件」所帶來的衝擊，使當時的各國共產黨都發生極大震盪；正如「歐洲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EUROCOMMUNISM AND SOCIALISM) 一書作者、西班牙共產黨前中央委員哥羅丁（FERNADO CLAUDIN）所觀察，其時在舉世芸芸諸「共」之中，對此震盪最能主動作出回應者當推中共的毛澤東與意共的陶里亞蒂（PALMIRO TOGLIATTI）—— 毛澤東自信中共在中國人民羣衆中具

有較高威望，遂決然發動「鳴放」運動以圖解決共產黨執政國家的「民主」問題，而陶里亞蒂亦在意大利共產黨提出某種「民主化」的構想。然而，不管在中國還是在意大利，共產黨的相對「民主化」措施都立刻引來遠超出原來想象之外的强烈反應，並直接威脅到「一黨專政」及「集權模式」的國際共產黨傳統（其實是「蘇共模式」傳統）；於是，毛澤東和陶里亞蒂都相繼剎車，實行「反右」以確保共產黨的權威地位，而其付出的嚴重代價，則是特別在知識份子中引起空前廣泛的「信任危機」——在中國，是運用「國家機器」將超過三十萬的知識份子鎮壓下去（包括「中國民主同盟」的西式知識份子、大學生中的「社會主義民主派」、以及爲數最多的中學教員）；在意大利，則是引致數逾二十五萬的共產黨員（主要是知識份子）消極脫黨。

「鳴放」運動觸動到了共產黨體制的結構性實質，其結果不是共產黨走向自我改造的「結構改革」，便是將原來的結構性實質進一步强化而走向「專制主義」强化——意共走的是前一條路，但中共走的却是後一條路。

經歷了一九五七年的震盪之後，分別作爲東方與西方最具「民族道路」傳統的共產黨，中共和意共都更堅決地尋求摸索「非蘇式」道路的可能性——毛澤東是在進一步强化「中央集權」／「一黨專政」傳統的前提下，企圖藉「左傾化」、「革命化」以解決「民主」問題（遂有「文革」的所謂「大民主」提法）；陶里亞蒂則在西方代議民主的强大現實壓力下，轉向「右傾化」、「妥協化」以求轉寰的餘地，嚐試解決「民主」問題（遂有後來貝林格〔ENRICO BERLINGUER〕的「歷史的妥協」〔HISTORICAL COMPROMISE〕提法）——可知，在五十年代末以迄六十年代的毛澤東與陶里亞蒂意識形態衝突背後（在同期公開爆發的中蘇共大論戰之中，中意共論戰是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其實也有着一個共同的目標；尋求解決「蘇聯模式」／「布爾什維克體制」所不可能解決的「民主」問題（這揚棄「蘇聯模式」的共同命題，當時雖不爲人所注意，但却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成爲促使中共與意共可能重再合作的內在淵源之一）。

然而，毛澤東及中共採取進一步强化「中央集權國家」功能的道路，不僅將這「國家」／「黨國綜合體」放置到空前地凌駕及支配「社會」的位置，而且通過空前規模的羣衆動員（文化大革命）而放置到每一個「人」的頭上——由「國家機器」自上而下地發動的「羣衆運動」，既然不可能是眞正的「大民主」，那便只可能是對眞正「民主」的「大壓迫」；這種辯證的關係可說是一種歷史的悲劇（也正是「文革」所構成的「悲劇」本質所在）——一九五七年的「鳴放」，

不過是這種以「民主」爲名而壓迫「民主」爲實的悲劇本質的小規模排演，以黨外知識份子爲對象的演習而已（在這個意義上，「文革」可說是「鳴放」的全民化、矛頭黨內化的大規模再版）。

「後期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問題，在於何謂「社會主義」？眞正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一種「多元化」的「民主結構」，抑或是一種「一元化」的「全權結構」？「社會主義」究竟是一種立足於資本主義民主所取得的歷史進步前提上的「民主主義深化」、「人道主義深化」，抑或是全盤否定資本主義民主的「全權主義」、「國家主義」、「中央專制主義」發揚光大？毛澤東的傾向顯然是，將中國傳統文化裏「全權式」的「家長制」運作「民族國家化」，以及「國家」作爲「社會」組織者、人民羣衆「教化者」功能的極大化，當成「社會主義」！而這樣的「社會主義」，又與列寧主義範疇的「黨代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得到統一——但却與社會主義乃「民主主義深化」、「人道主義深化」的馬克思理論抵觸。

將「全權運作」的東方傳統「理念型」的相對現實化視爲「社會主義」，可說是迄今爲止種種被算在「社會主義」賬上的人類災難的「理論誤會」之源。在中國，一九五七年的確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轉折點，現在就是連中共官方的理論家，也承認那是國運由「上升期」轉向「挫折期」的關鍵性一年——當然，即使在中共氣勢如虹的「上升期」，亦早已隱伏着「倒退性」的因素，例如中央專制及家長制式的運作，在建國以來的「黨國綜合體」裏，從來沒有受到質疑；而又即使在中共已於歷史本質意義轉入「挫折期」後，那也只意味着中共從歷史「上升性」的巔峯上開始「倒退」下來、「倒退性」的因素不斷滋長及抬頭而已，並不意味中共總的來說已喪失了「上升性」——事實上，「羣衆動員」的空前規模及有效性，一方面固然表現傳統式「中央專制國家」的發揚光大，另方面亦是民族氣勢保持「上升」之勢的動力來源（以迄「文革」失敗）。

因此，若照筆者的劃分法，中共建國三十三年來的國運，大體言之，可區別之爲三大階段：（一）民氣凝聚上升期（一九四九—五七年，共歷八年），（二）民氣凝聚挫折期（一九五七—七六年，共歷二十年），（三）民氣離散維新期（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後開始，迄今已經六年，今後一段相當時期內應仍屬此性質的階段）。這三大時期中，爲時最長，佔了主體位置的第二時期——民氣凝聚挫折期，是最需要作歷史二重性的辯證分析的：中共所曾進行的最大規模、最大影響的歷史性改革——從農村的「人民公社」運動到以城市爲主的「文化大革命」種種變革，均發生在這個時期；而中國在國際上

作爲「新興力量」興起的象徵，從中蘇共大論戰到打破美國封鎖重進聯合國，亦都發生在這個時期。然而，第一，這個時期的變革雖然規模最大，影响最深，但不管「人民公社」還是「文革」，都是挫折重重以至慘敗收場的，故筆者最後還是要將之概括爲一個「挫折期」（用中共的話說，便是「走彎路」）；第二，這個時期的變革雖然挫折重重以至慘敗收場，但却又是在長期歷史發展的意義看觸動本質層次最深的，而且實際上一度將中國民族的民氣凝聚達到高峯，以至在「羣衆動員」的有效功能角度看，在世界歷史裏竟是空前的，因此筆者亦將這階段界定爲「民氣凝聚期」；第三，這充份發展的「民氣凝聚期」，乃建國初期「民氣凝聚上升期」的進一步體現，但爲甚麼更充份的「民氣凝聚」却帶來「挫折期」的特徵呢？這才是探討今日中國問題，中國式「社會主義」問題，以至「中國文化結構」根本運作原理及其改造問題……等等的關鍵所在。

中共在建國後初期的「民氣凝聚上升期」，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整個近世革命／民族救亡運動的直接發展，這對一個基本上由「靜態」（所謂「陰性」）作主導的文化來說：「民氣凝聚」就是最根本的「陽動」之氣，那是從救亡到種種變革的「動態」力源；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初步走向全面性發動的「民氣凝聚」，好比旭日初升，朝氣蓬勃，推動着整個「靜態」文化的大變革，正與中國文化「理念型」運作裏的「陰陽相濟」原理相適應。

可是，隨着「民氣凝聚」的不斷發動，特別在五十年代後期的「三面紅旗」運動（即所謂「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以迄由六十年代延入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結合着急劇變革接踵而來的，是在五十年代初步發動的「民氣凝聚」達到了全面性的高度發展，以至「旭日初升」演變爲「十日並作」，「陰陽相濟」亦失衡而成「陽氣過剩」；於是，終於出現了一種矛盾的現象，便是「陽氣過剩」（即變革的「動態」力源發動過烈），有違中國「文化結構」的「陰性」主導（即「靜態」主導）特質——也就是說，中國這個文化就「結構改造」的角度看，不能接受過猛過速（這所謂「過」是相對於其「靜態」主導來說）的急變，而只能接受漸進維新的緩變（也就是筆者所稱之「陰主陽動性」。中國文化並非排斥「陽動」之氣，但「陽動」之氣却並不能違背／脫離「陰主」的前提；因此，中國既非西方的「革命文化」，也不是印度的「靜止文化」，而是一種處於中間狀態，不變而變的「維新文化」）——正以此故，高度發動的「民氣凝聚」，在毛澤東後期的中國便成爲帝堯時所謂「十日並作」遠古神話的現代版，並由於變革過烈而帶來强力反動，從而構成一九五

七一七六年的二十年「民氣凝聚挫折期」的歷史階段性特徵；而緊接而來的，亦同樣導致「后羿射日」式遠古神話的現代版——「後毛澤東時代」的「批毛」或「評毛」或「非毛化」運動。

這樣看來，佔了中共建國以後三分之二時間的所謂「民氣凝聚挫折期」，其所以挫折之源正在於民氣「過份」凝聚，變成「濃得化不開」；而與「民氣凝聚」連繫在一起的所謂「羣衆動員」、「羣衆路綫」、「羣衆運動」、更藉「羣衆崇拜」及「領袖崇拜」的一胞雙胎而將中國傳統文化裏的「人教」原理推到顛峯。「領袖」成了血緣族長的化身，而「羣衆」則一方面是「民氣凝聚」的體現，另方面又成爲每一個「個體人」頭上的最具壓迫性的「上帝」（也應該是最後一位「上帝」）。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反對抽象「羣衆」，反對「羣衆崇拜」（及其派生物「領袖崇拜」），强調個體人的生命價值及公民權利，便成了由「鳴放」運動，經歷「文革」、天安門「四五」運動以迄「北京之春」民間民主運動，在中國社會重新醞釀新民主浪潮的主要命題之一。

筆者將中國在一九五七—七六年的這二十年間，基本界定爲所謂「民氣凝聚挫折期」，這個時期的最大成就，在於「羣衆動員」（甚至可以說是達到了人類有史以來的最高狀態）；而這個時期的最大反動，却也是與「羣衆動員」相伴隨在一起的「羣衆崇拜」，從而構成對「個體人」生命價值及基本權利的空前戕害（也可以說是達到了人類有史以來的最高狀態）。於是，在「羣衆運動」的大流中反「羣衆」的潮流，以至於在「羣衆運動」崩解後宣佈人類的這位「最後的上帝」——「抽象人」化身的「羣衆」死亡，便成爲「人」在中國、在「中國文化結構」爭取新生解放、爭取充份成長的必要前提條件。

我們若從當代中國的這條主綫脈絡出發去作觀察，便會很清晰地發覺到，正是在一則中國「民氣凝聚」走向高峯，另則中國社會變革「挫折」重重的一九五七至七六年間—在其間，一九五八至六一年的「三面紅旗」運動遇到嚴重挫折，到一九六六年再度全面掀起「文化大革命」之間，已經歷過了一次因挫折而被迫進行的調整／休養生息（即讓「陰主」文化的本體／母體因變革過烈的「陽氣過剩」而引起的創傷，「滋陰」一番以恢復「陰陽相濟」的元氣）——正是作爲中國傳統「人教」發揚光大的「羣衆崇拜」、作爲中國傳統「中央專制國家」發揚光大的「黨國全權制」運作均走向極致發展的時候，在「羣衆崇拜」的內在反省中萌生的「反潮流」精神和「個性解放」覺醒，在「黨國全權制」運作走向極限而物極必反的「民主法制」呼聲和「

人的價值」體悟，便成了與整個「民氣凝聚挫折期」相始終，並與這個歷史時期的主導形態相對立而艱難發展的「沉沉一綫」！

這「反潮流」、「個性解放」、「民主法制」與「人的價值」，是對於通過「人教」／「羣衆崇拜」而高度動員的「民氣凝聚」的相對「離散」，亦成爲根本針對那二十年「挫折期」之所以「挫折」的治本（甚至是「中體再造」）的要素；假如我們通過歷史的理性分析已然認識到，高度動員的「民氣凝聚」固然是作爲中國近世革命本質的民族救亡、回應「西方挑戰」的順理成章產物，但對於中國這個「陰主」文化的本體來說，却可以演變成由「朝陽」而「毒陽」的「十日並作」之局。那麼，某種相對的「民氣離散」因子，消極言之，至低限度亦可作爲消除「陽氣過剩」、醫治「陽毒」的解毒劑、清涼藥；積極言之，那更可成爲中國文化「維新」再造的內在根據。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筆者看來，可說是當代中國以至整個「中國文化結構」命運的寫照——而筆者稱之爲的「民氣離散維新期」，正是現階段（由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垮台開始）中國的歷史性特徵所在。

總結起來，一九五七年以迄今天，時起時伏的新民主浪潮的四大價值核心——「反潮流」，「個性解放」、「民主法制」、「人的價值」，其實是可以再進一步具體化爲三大焦點的：（一）個性解放（所謂「反潮流」可併入其內）；（二）公民權利（所謂「人的價值」可併入其內，或作其哲學根據）；（三）民主化結構大改革（所謂「民主法制」可併入其內，或作爲從經濟體制改革到政治體制改革背後的共同規範）。

可以說，作爲一九七六年天安門「四五運動」直接延伸的近年民間民主運動（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一年五月，共歷兩年半），其最大的歷史意義之一，是將自一九五七年以來的中國新民主浪潮本質，清晰地歸結到個性解放、公民權利、民主化結構大改革的三大範疇，而其中的「社會主義民主派」（例如廣州王希哲、北京劉青、徐文立、上海傅申奇等，基本上都屬此觀點），更意識到應作爲民間「改革派」，與官方「改革派」爭取「上下結合」以共同推動中國走向「社會主義民主化」的結構改革；然而，中共官方對這樣的民間「社會主義民主派」也不能容忍，一如一九五七年「鳴放」變成「反右」時對譚天榮、林希翎等「社會主義民主派」不能容忍一樣（而且對王希哲的判刑似乎更重），着實使人懷疑，中共在自承的二十年「走彎路」後，究竟反省到了甚麼東西?!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放」，不是也面臨着另一次變成「反右」的危機嗎？對民間民主運動的從鼓動（開始

時「民主牆」是得到鄧小平直接支持的）到轉而逐步鎮壓（由一九七九年三月逮捕「資本主義民主派」的魏京生，到一九八一年四月逮捕「社會主義民主派」的王希哲等數十人），正可作爲由「放」而「收」的量水尺之一（雖則總的來說，今回「收」與「放」的力量之間有着明顯的爭持，而不像一九五七年時的一面倒）。

人們看到，不管大規模的運動如「鳴放」、「文革」、「北京之春」，個別的案例如「李一哲大字報」事件，都是在中共官方上層發動的特定形勢之下，民間力量得以在某種「放」中乘時而起——「鳴放」是先由中共呼籲「黨外」向「黨」批評開始，「文革」是中共「毛派」借民力進攻黨內「劉派」作兆端，「北京之春」是中共「鄧派」用民氣攻擊黨內「凡是派」而萌生，即使「李一哲大字報」事件，也只有當一九七四年時趙紫陽在廣東與地方軍人有矛盾才可能發生；但亦無一次例外，民間力量都在中共官方上層轉向「收」後成爲犧牲品——「鳴放」變成「反右」、「文革」變成大鎮壓、「北京之春」變成鎮壓民運及今天知識份子文化界的「陰晴不定」。這種「一放一收」規律，正反映國情要「放」而黨情却結構性地、體制性地難充仗「放」的矛盾（可知最急切的關鍵改革還是「共產黨模式」本身的結構改革）；但另方面，人們也看到了天安門「四五運動」的本質性突破——那雖則也是在中共官方上層矛盾尖銳化（「鄧派」與「四人幫」鬥爭高潮）的空隙中爆發，但運動本身却是由民間首先自發地掀動的——「四五」的歷史意義之一，正在於「民間」之於「黨方」、「社會」之於「國家」的主動性。

中國的「國家機器」既管政治（政權）、又管生產（財權）、更管「人心」——人的感官和大腦——所謂教化（教權），而傾向於一元化的某種「全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運作，可謂自古已然，其基礎直接植根於中國文化的遠古相對「原型」裏；這所謂「文化原型」，看來並非意大利社會學家帕列圖(PARETO) 所說的「殘基」(RESIDUES)，因爲在當代現實生活所呈現的，顯然並非甚麼「傳統的殘餘」（這種說法也已爲官方理論所接受）那麼簡單，而似乎是相反——應是傳統的「極化」發揚！

作爲傳統「政權」核心的「皇權」，費孝通已曾精闢地指出其不能眞正落實到地方基層的情況（必須與地方勢力的「紳權」/「族權」妥協，而由後者作爲在地方上將「皇權」霸力「緩衝化」的墊子——用筆者的說話，便是折衷「皇權」的「陽氣」以避免「過烈」，從而保護文化「母體」在地方上的元氣，亦長期因此而維持着中國文化體的靜態「一盤散沙」特性）；但在今天，取代了中央「皇權」位置

的「黨權」，却在打擊家族血緣網絡後騰出的「空隙」中，藉高度中央集權的「黨國綜合體」網絡而直達地方基層，從而將傳統政權的「中央專制主義」功能推到一個歷史高峯，而肯定不能將之說成是「中央專制主義」的傳統「殘餘」。

作爲傳統「財權」核心的「家族地主制」，以至那作爲中國文化特產的「地主／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三位一體經濟結構，促使「皇族」亦只能作爲掌握最强武裝力量的「最大地主」（不是「唯一地主」），作爲皇族利益化身的「國家」（所謂「朕即國家」）亦只能在利潤最高的商業資本領域取得「霸權」（而不能取締廣泛存在的「私產財權」）；但在今天，取代了地主私有制及資本私有制的「生產資料國有制」，却使中央專制「國家」的「財權」功能，由過往的「最大地主」上昇爲「唯一地主」、由過往的「最大財權」上昇爲「唯一財權」，從而將傳統財權的「中央專制主義」傾向推到一個歷史高峯，而肯定不能將之說成是「中央專制主義」的傳統「殘餘」。

作爲傳統「教權」核心的「士大夫」次統治階級，一則在某些時機還有可能提出所謂「道統」，以向皇帝權威作微弱無力（大多屬於虛幻）的制衡，另則雖藉「禮治國家機器」的擴大化而及於「家庭制度」，而使「教權」的價值標準能在相當程度上內化於各階層的「人心」〔在當代法國力主「家庭」屬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部份的波蘭沙(POULANZA)，當在中國找到更强力地支持其「國家理論」的根據〕；但在今天，取代了士大夫「教權」的西方「舶來品」馬列主義「國教」，却將作爲傳統士大夫繼承者的「文化知識份子」打到一個更卑微的地位，根本不可能向「黨權」作出實質的制衡（最近「政協」地位提高，雖稍爲改善了這方面的情況，但顯然並沒有突破文化局限的意義），而另方面馬列毛主義「國教」却藉「黨國綜合體」這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統一教會」之助，將傳統教權的「中央專制主義」教化功能推到歷史高峯，而更具外在强迫性地壓到每一個人的頭上（大腦裏）。

假如人們承認，在取締生產資料私有制「主導」（注意：只是主導，並不是絕對）而社會化大生產的前提上，沿着「人道主義深入」、「民主主義深化」的方向繼續發展，不斷維新地進行革命性的根本結構改造，才是馬克思所謂「科學社會主義」的方向的話，則「全權主義」（政權、教權、財權合一）體制之被稱爲「社會主義」，顯然屬於「理論誤會」；這樣看來，則一九五七年之於中國，確實是極其關鍵性的一年——假如當年中共所宣稱的由「新民主主義」階段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其時中國大陸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集體化／國有化

改造，基本實現），若能向着「人道主義深化」、「民主主義深化」的方向結合具體國情條件逐步走，而不是實際上所發生的朝着「全權主義全面化」的方向走，則不僅所謂「文革浩劫」的「十日並作」可以避免，由一九五七—七六年的二十年「陽氣過剩」之「挫折期」（「陽毒症」，中共所謂「走彎路」）可以避免，而且中國作爲經濟生產力落後、公民意識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發展」是就前進的方向說，而不是就現實的結構說），亦至少可爲整個「第三世界」以至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提供出一個既非西方式資本主義，亦非「蘇聯模式」的工業化、民主化……（或所謂「現代化」）的成功例子了（「文革」有此心而走錯了使中國傳統中央專制主義發揚光大的路，今天所傾向的「東歐模式」——不管匈牙利模式或南斯拉夫模式，却都離不開不同程度的「蘇聯模式」改良版本性質）。

假如中共能認識到社會主義的本質除了社會化佔有、分配和大生產之外，還在於「人道主義深化」和「民主主義深化」，那麼，儘管中國要進入這種眞正社會主義／「大同世界」的現實條件還相當不利，但至低限度，一九五七年的「鳴放」不僅不應變成「反右」，而且應成爲在經濟所有制改造基礎上，朝着「民主化」、「人道化」方向的「社會主義發展」開端——例如管理權下放、經濟民主、政治權力多元化、發展公民權利、法制民主化、生產者民主、企業自治、社區自治、公社自治、政制民選化……等，再結合集體所有制多樣化、生產結構商品化，計劃市場功能綜合化……等經濟領域的「多元化」傾向發展，等等，等等；然而，二十年的「彎路」已經走過了，在「北京之春」及其後的一段時間，從民間到官方都有人提出了「民主化」與「人道化」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說明中國已從歷史反覆中總結出經驗教訓——跟隨着中共理論裏的「新民主主義」而來的，應是眞正「民主主義深化」的「社會主義民主」或「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傳統中央專制推向高峯的「全權主義」！可是，又正是從這樣的角度看來，鎮壓民間民運／民刊運動以至國內知識份子文化界的「陰晴不定」，却着實顯示出中共並未眞正掌握二十年「走彎路」的前述歷史教訓，因而中共近年總的來說所表現出來的若干相對進步，實只有量的意義而還遠沒有質的意義，而中國的民主法制前景，亦看來荆棘滿途！

附錄二：

本書作者簡介

譚天榮：

鳴放時期北京大學學生。當時譚天榮對掌政的官僚主義份子及其特權傾向作了最嚴厲的批評，對造成日漸嚴重的官僚主義的基礎進行徹底的清算。後來鳴放運動受壓制，官方把批評者打成右派份子，右全國各地掀起了「反右派」運動，很多在鳴放時敢於發言的人都被捕了，譚天榮便是其中一個。他與中國人民大學的林希翎同被打成學生界的右派代表，多次受到點名批判。

林希翎：

鳴放時期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共產黨員。當時，林希翎與很多知識份子與學生一樣，積極投身到這場「百鳥爭鳴」的運動中去，並且是最坦率最激烈的批評者之一。後來，鳴放受到壓制，林希翎與北大的譚天榮一起被打成學生界的右派，多次受到報紙點名批判，且被捕繫獄，直至「四人幫」倒台後才重獲自由。

遇羅克：

文革早期最早遇害的紅衛兵之一。他從小至大一直在北京長大，由於家庭出身不好，在他成長的歲月中，受盡了血統論的苦頭。遇羅克天生聰穎，學習成績優秀，但也因爲家庭成份不好未能進入大學就讀。中學畢業後，他應國家號召到北京市郊農村插戶，走出校門後，他更加努力學習，遍閱各類書籍，每日堅持讀書至深夜。文革開始後，他勇敢地跳出來與血統抗衡，寫出了著名的《出身論》，更無畏地與羣衆公開辯論，即使遭受到身繫牢獄的危險，他也毫無畏懼。正因爲他勇敢地與出身論挑戰，文革開始不久便被捕入獄。後來更以「反革命」等罪名判處死刑，死時才廿多歲。最近，遇羅克被摘下「反革命」的帽子，而導致他死亡的審判也被宣判無效。

楊曦光：

「文革」開始時是長沙一中高班學生，父母均是湖南省高級幹部。「文革」一開始，楊曦光即投身到「破四舊」揪鬥牛鬼蛇神的串連、造反等一連串「紅衛兵」的激烈行動中去，並參加「湘江風雷」等羣衆組織的奪權鬥爭，反「二月逆流」；及至武漢事件發生後，楊又參與了當時的搶槍。隨着「湘江風雷」擊潰了保守派，掌握湖南大權後，楊曦光也成爲「省無聯一中紅造會鋼319兵團『奪軍權』」的負責人，也是「省無聯」（即「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盟」的簡稱）的理論家。

後來，中央號召青年上山下鄉，但這些青年在農村被當權派所煽動之農民對抗情緒迫回城市，而城市的專政機關則捕捉他們，使他們無立足之地，楊支持並投身到造反隊伍中，並研究探求「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而《中國往何處去》一文是楊曦光所發表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具有極大的影响，代表了「文革」後期的民間「極左派」思潮，由提出「毛澤東背叛毛澤東」的觀點而開始在同代青年中打開了思想突破的大缺口。

六八年，中央文革宣佈「省無聯」爲反革命，康生並點名批判楊曦光，「省無聯」被鎮壓，楊曦光逃到上海被捕，解回湖南下獄。

李一哲：

包括王希哲、李正天、陳一陽、郭宏志等，都是「文革」時的活躍份子。七三年八月，李一哲聽聞即將舉行第四屆全國人大，即共同討論寫出「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的「李一哲大字報」，初期在機關內部貼出，影响不大，後來「李一哲大字報」經進一步討論後，張貼於廣州市北京路和中山五路交界處，引起了强烈的反應。但是中央對「李一哲大字報」定作反革命事件處理，廣東黨組織方面以「宣集文」署名文章對之攻擊，中央並以「李一哲」作爲反面教材，作爲批判的典型。七六年「四人幫」倒台後，李一哲反而被正式判刑，但在七八年底獲平反釋放。平反後，王希哲堅持不退卻，繼續發表了多篇切中時弊的而有較高理論水平的文章，並主辦《學友通訊》。至於李正天，則回到廣州美術學院任教。（有關王希哲，看王希哲之簡介）

陳爾晉：

雲南宣威人，只讀過小學。雖然幼年失學，但他勤奮苦讀了大量社會科學書籍，並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嘗試把理論與實踐結

合在一起，於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最黑暗期間寫出了《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長文，從馬克思主義立場考慮中國現實社會問題，並剖析了社會主義政權建立後具有走向「修正主義」的可能性的問題，提出了「叉路口社會主義」的概念。打倒「四人幫」後，作者以「殉道者」的筆名投寄廣州的中山大學、《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但作者因此而遭扣押審查，在七九年三月才被釋放。後來作者携此文到京，但「投刺天門」，只好透過《四五論壇》刊印出來。

徐水良：

在廣州出現「李一哲大字報」的同期，在南京街頭上徐水良也貼了轟動一時的大字報，從此徐水良被喻爲南京「李一哲」，可見其影响之大。後來徐水良被捕且被扣押，直至到「四人幫」倒台後數年才重見天日。在最近興起的民主運動中，徐水良的文章多次出現在各地民刊上。

韓志雄：

工人，曾參與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並憤寫血書直指「四人幫」，遭拘捕入獄，打倒「四人幫」後獲釋，並被選爲共青團中央委員。七九年「北京之春」民主運動時，韓志雄支持、並參與民刊《北京之春》的工作，後來韓也支持北京的地區人大代表選舉活動。

王軍濤：

北京大學學生。一九七六年，王參與了「四．五」天安門事件，由於與前來鎮壓的公安人員對抗而被捕入獄，「四人幫」被粉碎後，王被釋並被譽爲「四．五英雄」，也因此被選爲共青團中央候補委員。後來王軍濤考入北京大學，並參與七九年開始的「北京之春」民主運動，是著名民刊《北京之春》的編輯。八〇年地方選舉時，王軍濤參與了北大人大代表選舉活動。

魏京生：

一九五〇年生在北京，父母的原籍是安徽省巢縣的一個小村。家裏四個孩子，他年紀最長。母親已經去世。父親是人民解放軍退伍軍人，現爲第十級幹部，在頗爲重要的基本建設委員會担任某部門副主任。文化革命爆發時，魏京生在人民大學附中唸初中最後一年。人民大學附中與清華附中一樣，是出現第一批紅衛兵的地方。所以他是一

名「老紅衛兵」，於一九六六年底參加了「聯動」，「聯動」與江青敵對，名噪一時。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他遠途串連到了新疆，這時傳來了他一百多個同伴被公安部門逮捕的消息。他本人也於一九六七年底被關了三個月。一九六八年他躲在安徽的故鄉。從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三，在軍隊裏渡過四年，復員後，到北京動物園做電工。

七八年十二月，魏京生在民主牆貼出一張小字報，後來與路林、楊光聯合辦了《探索》，魏京生在《探索》發表了多篇言論激烈的文章，並積極參與「傳月華事件」的抗議行動。魏京生在七九年三月廿九日被捕，同年十月，魏京生被判十五年徒刑，並被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路　林：

《探索》撰寫人中唯一的工人家庭出身者。父親已去世，家中七個孩子都由母親撫養。他生於一九五五年。一九七一年初中畢業，在北京工廠工作。他雖被上司表揚爲「模範工人」，但仍積極參加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一九七八年，決定嘗試投考大學文科。爲了更充份地準備考試，他獲准在一個中學作旁聽生，因而他每天上學途中必經西單民主牆。一天，他終於決定放棄學業而投身於民主運動；他曾說過：「最好的大學還是社會」。

路林與魏京生、楊光等合辦《探索》。路林於魏京生被捕後，（也本人亦曾與魏差不多同時被捕，但不久獲釋），獨力負起復印《探索》的任務，並爲魏京生之審判奔走。

八一年七月，路林被公安局拘捕。

劉　青：

又名劉建偉，現年三十四歲。一九六五年以前在北京讀書，其後到山西省插隊；一九七三年被選拔爲「工農兵學員」，就讀於南京工學院土建系，七七年畢業後分配在陝西省漢西三機部豐峯機械廠工作。後因患腎炎到北京就醫。七八年尾「北京之春」民主運動開始，劉青積極參加民刊《四五論壇》的創辦工作，並於七九年初北京幾份有影响的民刊舉行「聯席會議」時被選爲總召集人，是北京民主運動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七九年十一月因公開印發《魏京生案件審訊過程》錄音稿被北京公安局無理拘押，後被判押往陝西省勞教三年。在勞教過程中，劉青寫出了十萬餘言之《沮喪的回顧與瞻望——我向社會法庭控告……》，並輾轉傳送出海外，公諸於世。

徐文立：

三十八歲，一九六三年高中畢業後參加解放軍，復員後轉業到鐵路局，當訊號燈的電器修理工。

七八年，他積極參加大字報運動，並於同年十一月將自己主辦的《四．五報》與《人民論壇》合併，組成《四．五論壇》成爲中國最具影响力的民刊，銷量達數千份。徐文立在《四．五論壇》發表了很多文章，成爲民運中最具影响力人士之一。「徐庶」是他的筆名。

八〇年三月，《四．五論壇》在官方壓制下停刊，徐文立轉而出版一份僅供傳閱的《學習通訊》，後來出版了《時代》、《人》。他主張改革要「上下結合」，「與官方合作」，因而草擬了一份「庚申改革建議書」，提出了切合現實的改革要求。七九年末劉青被拘押後，徐文立曾奔走呼籲，要求釋放劉青。

八一年四月官方全面鎮壓民運，徐文立不能倖免，被捕入獄，並判徒刑十五年。

王希哲：

三十三歲，原籍四川，於廣州長大。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在廣州市第十七中學參加紅衛兵。六七年曾入獄，一年後下放英德農場，受「羣衆監管」，六九年返回廣州。七三年與李正天、陳一陽、郭宏志合寫成《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即著名的「李一哲大字報」。七四年「李一哲」開始受批鬥，七七年三月被捕入獄，七八年底出獄並獲平反。他近年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多篇論文爲海外刊物轉載。計有：七九年九月《爲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而努力》，八〇年五月《民主的方向》及其後的《黨的領導與民主監督》，八〇年十月《爲劉青事件致五屆人大代表們的公開信》，八一年二月《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八一年六月《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道的專政》（被捕前傳出，被捕後發表）此外，王希哲還出版《學友通訊》，以通信方式與各地人仕交流思想，出版了十三期。王希哲於八一年四月廿日在廣州再度被捕入獄，並在八二年五月經廣州市人民法院審判判處十四年徒刑，剝削政治權利四年六個月。

傅申奇：

一九五四年出生於上海一個工人家庭，一九六八——一九七二年就讀於上海職業中學，離校後進入上海市動力機廠當工人。一九七七年考入上海第四師範學校，翌年因身體不好退學回廠。他在一九七八年投身民主運動，並且組織了振興社（後解散），一九七九年參加《民

主之聲》，同時參加了「上海青年經濟研究會」。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九日，傅申奇在國內散發競選傳單，參加人民代表的競選，隨即遭受工廠黨委圍攻，指爲「持不同政見者」，曾參加「反黨反社會主義組織」。然而，在泰山壓頂之下，羣衆還是推薦了他作爲候選人，並且獲得百分之四十三的選票。（因不過半數，按選舉法不能當選，需復選。）後該廠黨委竟取消第二輪選舉，使他無法競選。

一九八〇年十月中華全國民協成立後，出版全國性機關刊物《責任》，從第三期起由傅氏負責執行主編，並且改爲半月刊，至少出版了九期。

傅申奇在八一年四月上旬上訪，欲與官方領導當面交涉，保衛民辦刊物的當然權利而被捕。

何　求：

生於一九四八年，一九六五年畢業後考入廣州造船廠技工學校。文革期間，參加了紅衛兵的串連活動，並且開始思考中國的前途。一九七二年，在與其哥哥的通信中討論時弊，批評當時中國的內政外交，爲官方截獲，被判入獄三年。出獄後，他不斷地思考，在一九七八年民主運動興起時，他參加了民刊《人民之聲》，其後，創辦《人民之路》，逐漸成爲華南地區最具影響的民刊。他堅持辦刊的方針，鼓舞着其他民刊的發展。

何氏在八〇年八月因張貼「中華全國民協」與鍾粵秋、張京生、朱建斌等一同被捕。獲釋後，又因張貼《責任》的出版啓事再被捕，但又獲釋。八一年四月，他與其他民刊人仕上京交涉保衛民刊存在權利被捕。八二年五月廿八日何求被判處十年徒刑。

王一飛：

廣州活躍民運人仕，寫有《新階級、新社會》長文，以「珍師」爲筆名，作爲王希哲主編的《學友通訊》第七期發表。

孫　豐：

四十歲，青島市草藝製品廠工人。又名孫維邦，是民刊《海浪花》之編輯。發表過著名文章《就目前形勢致晏平仲的信》，批評當局的收緊政策。於八一年四月被捕。

秦永敏：

三十歲，武漢鋼鉄廠工人，很早便參加武漢市「民主牆」大字報活動，後與朱建斌合辦民刊《鐘聲》，並主辦「四．五學社」。秦永敏曾於七九年十一月因售賣民刊而被捕，但後來獲釋。八一年四月在全國鎮壓民運浪潮中，秦永敏再次被捕。

朱建斌：

又名方鉄，武漢鋼鉄廠工人，與秦永敏合辦民刊《鐘聲》，他於八〇年九月到廣州參加「全國營救劉青委員會」及「中華全國民刊協會」的籌備會議，被公安局拘捕，後釋放。朱建斌曾發表《中間形態及其趨勢》及《中間形態的歷史基礎》等文章，試圖探討中國社會的過渡性質。八一年四月，朱與全國各地民刊人仕一樣，被捕下獄。

鍾粵秋：

二十四歲，出身於幹部家庭，廣東韶關冶煉廠工人，七九年底創辦民刊《庶聲》，宣傳民主運動，評擊官僚主義。八〇年參加「人大代表」競選，提出要爲工人解決三十多個問題，獲得工人支持。但官方强行私定六名候選人，將他排於候選名單之外。八〇年八月赴穗商談成立「中華全國民刊協會」，被公安局逮捕，後被釋，但旋在八一年四月再被捕。

陶　森：

湖南瀏陽人，現年三十三歲，出身於長征幹部家庭。一九六六年在瀏陽第一中學畢業，同年七月入共青團，曾任該校之文革主任，後因反對抓打老師而被指爲「牛鬼蛇神」，被文革工作組貶爲治保主任，同年八月辭去職任回家鄉參與勞動生產。

陶森於七〇年被分配到肥料廠工作，因揭產廠書記和車間主任的犯罪行爲而被調職。七三年考進武漢大學數學系，後被指依藉父親背景走後門而告吹。七五年及七七年曾兩次上訪北京。後又進入長沙湖南師範學院。

八〇年十月，他參與人民代表的競選，在抗議校方黨委的官僚措施的鬥爭中担當重要角色，領導上訪團到北京交涉，並取得勝利。

張京生：

二十八歲，長沙市新中機械廠工人，民刊《流浪者》及後來之《

共和報》編輯，八〇年九月赴穗參加「全國營救劉青委員會」及「中華全國民刊協會」的籌備會議被拘捕，後被釋放。八〇年十月湖南師範學院「人大」代表的選舉中，張京生積極支持罷課之學生，並將消息迅速遍傳各地，爭取各地支持。

出版後記

《民主中華》初版時，所依據的原稿，來自多處，形式不一，有些是已在國內排印過的作品，海外鮮見流傳，有些則是手抄本、油印本，在國內亦屬難得。特別是民辦刊物，由於條件限制，油印技術並不好，加上輾轉傳抄，文字訛脫，在所多有。當時已作過整理，但確實不能還原的文字，只好以□代表，原文因忌諱而經作者本人省略的句子，則仍用×表示。現在再出新版，事前作過校勘，進一步復原了一批脫字，這是本「保存版」與前版不同之處。

本書的編選、校勘和出版，獲得香港中文大學81-82年度、82-83年度、85-86年度學生會，以及香港大學78屆、79屆、80屆、83屆一些學友的鼎力支持。從出版緣起到成書過程，處處顯示「民主中華」的呼聲受到認同，並且是堂堂正正的事業。本書一版再版而三版，亦代表了讀者的鼓勵，這些鐵的事實，亦足否定某些猜想和流言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世界潮流浩浩
蕩蕩順之則昌
逆之則亡

孫文題

靈堂無計逃神矢風雨
如磐閒故園寧意寒
星霜不察我以我血薦
軒轅

二十一歲時作三十一歲時
寫也時辛未春杰日也 魯迅

民主中華

中國大陸民間民主運動被捕者文集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編

他們是怎麼說的：

陳爾晉：

當今的世界，民主是主流，反民主是逆流。……國際民主潮流都必在世界上最不民主的地方，引起最強烈的反彈。

徐文立：

我們認為，要在中國實現一個比較科學的社會主義、美滿的社會主義制度，恐怕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所以我們這些人，只是給這場運動墊了一點鋪路的石子。鋪路是需要石子的，誰都不願當石子是不行的。

傅申奇：

瞻望實現民主制度的前景，尚有「路漫漫其修遠兮」之感。如果在前進的路上還需要新的血及新的犧牲，就請從我開始吧！

馬克思、恩格斯是怎麼說的：

恩格斯：

把革命的發生歸咎於少數煽動者的惡意的那種迷信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任何地方發生革命震動，總是有一種社會要求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這種要求也許還未被人強烈地普遍地覺到，因此還不能立即得到勝利；但是，如果企圖用暴力來壓制這種要求，那只能使它愈來愈強烈，直到最後把它的枷鎖打碎。

馬克思：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夠為人類作出貢獻的職業，我們就不會為它的重負所壓倒，因為我們是在為全人類而工作，我們的幸福屬於千萬人，我們的事業並不煊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而面對著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定價港幣三十八元

黃花岡光復網

www.huanghuagang.org

Youtube：光復之聲

以及梅花電視Mei TV

Twitter：@guangfuwan

以及@meihuatv

Facebook：@huanghuagang

以及@chinayouthforum

復國新銳

revivingroc.wordpress.com

Twitter：@revivingROC

Facebook：@Sun.Yat.sen1911

聲明

本電子書的編輯與傳播跟黃花岡光復網無關，乃復國新銳團隊出於熱心推薦。